

目录

[克里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 7](#_Toc55383971)

[理想國譯叢序 8](#_Toc55383972)

[地圖列表 39](#_Toc55383973)

[日期及專有名詞說明 47](#_Toc55383974)

[序言 48](#_Toc55383975)

[第一章 宗教戰爭 53](#_Toc55383976)

[第二章 東方問題 64](#_Toc55383977)

[第三章 俄國威脅 83](#_Toc55383978)

[第四章 歐洲和平的終結 102](#_Toc55383979)

[第五章 虛張聲勢 117](#_Toc55383980)

[第六章 土耳其人首嘗勝果 136](#_Toc55383981)

[第七章 阿爾馬 156](#_Toc55383982)

[第八章 秋天的塞瓦斯托波爾 172](#_Toc55383983)

[第九章 一月將軍和二月將軍 195](#_Toc55383984)

[第十章 炮灰 221](#_Toc55383985)

[第十一章 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 247](#_Toc55383986)

[第十二章 巴黎與新秩序 265](#_Toc55383987)

[結語 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神話與記憶 292](#_Toc55383988)

[縮略語說明 310](#_Toc55383989)

[致謝 311](#_Toc55383990)

[參考文獻 312](#_Toc55383991)

[譯后記 318](#_Toc55383992)





[英] 奧蘭多·費吉斯　著

呂品　朱珠　譯

# 克里米亞戰爭：被遺忘的帝國博弈

南京大學出版社

# 理想國譯叢序

“如果沒有翻譯，”批評家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曾寫道，“我們無異于住在彼此沉默、言語不通的省份。”而作家安東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回應說，“翻譯不僅僅是言詞之事，它讓整個文化變得可以理解。”

這兩句話或許比任何復雜的闡述都更清晰地定義了理想國譯叢的初衷。

自從嚴復與林琴南締造中國近代翻譯傳統以來，譯介就被兩種趨勢支配。

它是開放的，中國必須向外部學習；它又有某種封閉性，被一種強烈的功利主義所影響。嚴復期望赫伯特·斯賓塞、孟德斯鳩的思想能幫助中國獲得富強之道，林琴南則希望茶花女的故事能改變國人的情感世界。他人的思想與故事，必須以我們期待的視角來呈現。

在很大程度上，這套譯叢仍延續著這個傳統。此刻的中國與一個世紀前不同，但她仍面臨諸多嶄新的挑戰。我們迫切需要他人的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難題，保持思想的開放性是面對復雜與高速變化的時代的唯一方案。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保持一種非功利的興趣：對世界的豐富性、復雜性本身充滿興趣，真誠地渴望理解他人的經驗。

理想國譯叢主編  
 梁文道 劉瑜 熊培云 許知遠



1．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復活節景象（1900年左右）。G.埃里克和伊迪絲·馬特森照片收藏（G. Eric and Edith Matson Photograph Collection），國會圖書館印制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Washington D.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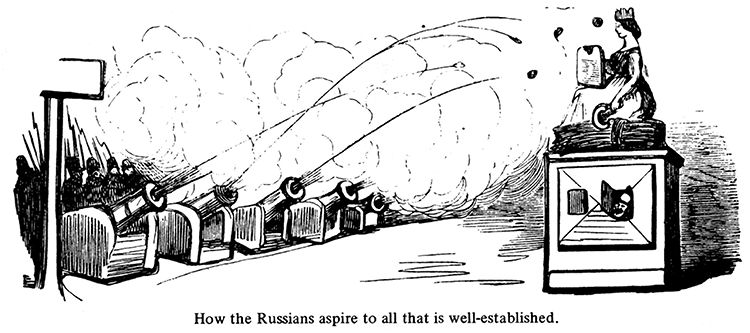
2．耶路撒冷為俄羅斯朝圣者準備的營房，由B.W.基爾伯恩（B. W. Kilburn）拍攝（1899年左右）。國會圖書館印制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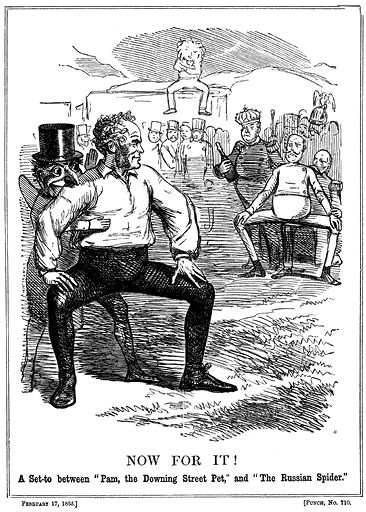
3．放在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大炮，背景是努斯瑞蒂耶清真寺（Nusretiye Mosque），攝于1855年，由詹姆斯·羅伯遜（James Robertson）拍攝。英國陸軍博物館（National Army Museum），倫敦。照片：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Bridgeman Art Library）。



4．尼古拉一世，作于1852年，作者弗朗茲·克魯格（Franz Kruger）。艾爾米塔什博物館（Hermitage），圣彼得堡。照片：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



5．《俄羅斯人向一座雕像開火》（Russians Firing at a Statue，1854年出版），作者古斯塔夫·多雷，出自《神圣俄羅斯珍奇史》（The Rare and Extraordinary History of Holy Russia）。



6．“現在就干！‘唐寧街寵物帕恩[\*](#__Pa_Mo_Si_Dun_Ming_Zi_De_Ni_Che)’與‘俄羅斯蜘蛛’間的一場搏擊”，出自《笨拙》周刊，1855年2月。



7．“俄羅斯圣徒尼古拉”，作者約翰·坦尼爾（John Tenniel），出自《笨拙》周刊，1854年3月18日。



8．多瑙河前線的土耳其士兵，攝于1854年，由卡羅·薩斯馬利（Carol Szathmari）拍攝。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名下皇家收藏版權所有（The Royal Collection©2010）。



9．在斯庫臺的一群冷溪近衛團士兵，攝于1854年，由詹姆斯·羅伯遜拍攝。敬謝基思·史密斯（Keith Smith）。



10．巴拉克拉瓦平原上的騎兵營地，攝于1855年，由羅杰·芬頓拍攝。國會圖書館印制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11．巴拉克拉瓦的哥薩克灣（Cossack Bay），攝于1855年，由羅杰·芬頓拍攝。國會圖書館印制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12．卡米什灣的法軍營地，攝于1855年，由詹姆斯·羅伯遜拍攝。敬謝國王御用皇家團博物館（King’s Own Royal Regiment Museum），蘭卡斯特，編號Acc. No. KO0438/10。



13．在克里米亞，法國士兵站在一組朱阿夫士兵旁邊，攝于1855年，由羅杰·芬頓拍攝。國會圖書館印制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14．韃靼人正在修理巴拉克拉瓦的一條道路，攝于1855年，由羅杰·芬頓拍攝。國會圖書館印制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15．“在巴拉克拉瓦，杰克是怎么樣讓土耳其人派上用場的”，1855年出版，作者約翰·利奇（John Leech），出自《笨拙》周刊，1855年。



16．從乳頭堡眺望馬拉霍夫看到的景象，攝于1855年，由詹姆斯·羅伯遜拍攝。敬謝諾丁漢大學手稿與特別收藏品部（Manuscripts and Special Collection,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編號Ref. Ne C 10884/2/19。



17．馬拉霍夫內部，攝于1855年，由詹姆斯·羅伯遜拍攝。敬謝諾丁漢大學手稿與特別收藏品部，編號Ref. Ne C 10884/2/16。



18．《塞瓦斯托波爾，1855年9月》（Sevastopol, September 1855），由萊昂—歐仁·梅海丁（Léon-Eugène Méhédin）拍攝。照片版權由巴黎軍事博物館（Musée de l’Armée）、法國國家博物館聯合會（Dist. RMN）及克里斯蒂安·穆塔爾德（Christian Moutarde）所有。



19．從馬拉霍夫眺望塞瓦斯托波爾，攝于1855年，由詹姆斯·羅伯遜拍攝。敬謝諾丁漢大學手稿與特別收藏品部，編號Ref. Ne C 10884/2/7。



20．從棱尖棱堡遠眺塞瓦斯托波爾，攝于1855年，由詹姆斯·羅伯遜拍攝。敬謝諾丁漢大學手稿與特別收藏品部，編號Ref. Ne C 10884/2/7。



21．近衛軍（克里米亞）紀念碑，由約翰·貝爾創作，攝于1885年。倫敦交通博物館（London Transport Museum）。



22．近衛軍（克里米亞）紀念碑細節，包括弗洛倫絲·南丁格爾和悉尼·赫伯特雕像，由約翰·貝爾創作。照片：倫敦科陶爾德藝術學院（The Courauld Institute of Art）版權所有。



23．《維多利亞女王第一次探訪傷員》，作者杰里·巴雷特，完成于1856年。1993年在國家遺產紀念基金（National Heritage Memorial Fund）和藝術基金（The Art Fund）資助下購得。倫敦國家肖像美術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版權所有。



24．《戰后點名，克里米亞》，作者伊麗莎白·湯普森，即巴特勒女爵，完成于1874年。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名下皇家收藏版權所有。



25．《三名克里米亞傷員》，攝于1855年，攝影者為約瑟夫·坎德爾和羅伯特·豪利特。伊麗莎白二世女王陛下名下皇家收藏版權所有。



26．皇家炮兵的克里斯蒂軍士長（Company Sergeant Christy）（右）和邁克吉福軍士（Sergeant McGifford），攝于1856年，由豪利特奉維多利亞女王旨意拍攝。英國陸軍博物館，倫敦。照片：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



27．巴黎的阿爾馬橋，攝于1910年洪水期間。照片：羅杰—維奧萊（Roger-Viollet）及Topfoto機構。



28．亞歷山大·肖夫洛投資興建的馬拉科夫塔，建于1856年。版畫于1860年出版，作者萊維（Lévis）。照片版權由馬拉科夫市市政府檔案館（Ville de Malakoff, Archives Municiples）所有。



29．全景畫《守衛塞瓦斯托波爾》的一部分，于1905年展出。作者弗朗斯·阿列克謝維奇·魯博（Franz Alekseevich Roubaud）。1950年代重塑。塞瓦斯托波爾全景博物館（Panorama Museum）。照片：Jaxpix/Alam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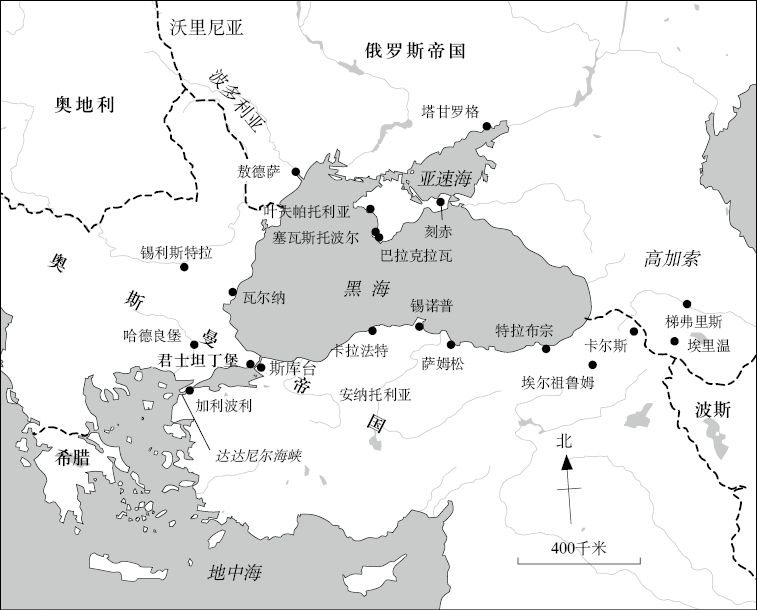


30．最后一名曾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的俄軍戰士，攝于1903年的莫斯科，由詹姆斯·揚（James Young）拍攝。英國陸軍博物館，倫敦。照片：布里奇曼藝術圖書館。

\* 帕默斯頓名字的昵稱Pam。——譯注

# 地圖列表

（本書地圖為原書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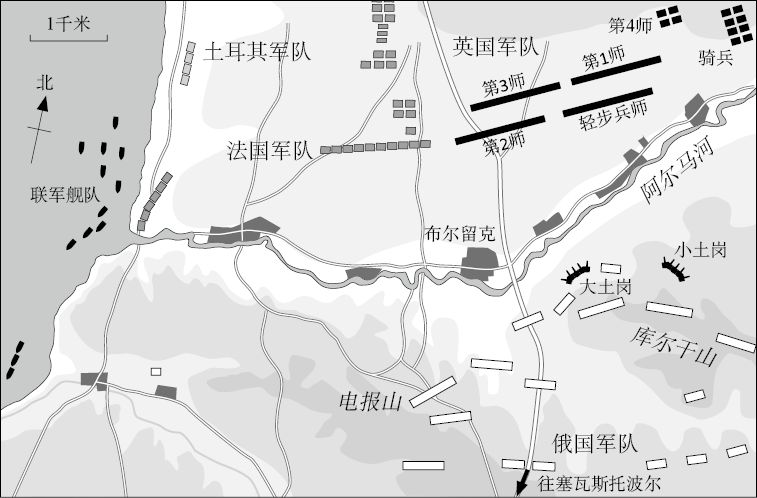
地圖一　近東問題涉及的沖突區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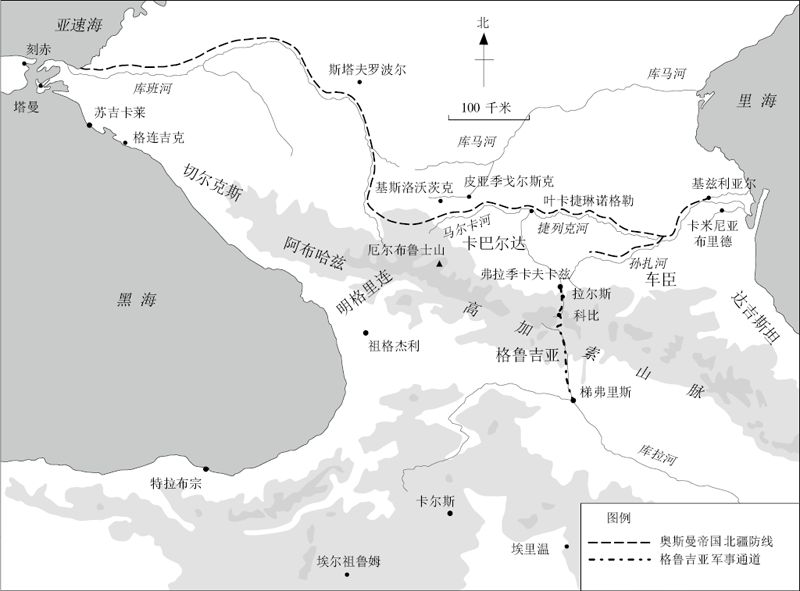
地圖二　多瑙河沖突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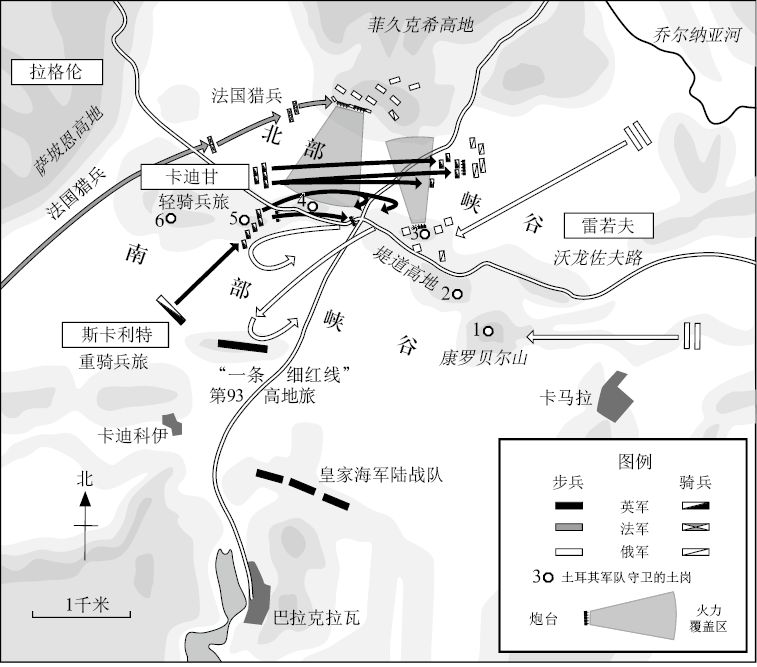
地圖三　聯軍向塞瓦斯托波爾進軍



地圖四　阿爾馬戰役



地圖五　高加索地區



地圖六　巴拉克拉瓦戰役



地圖七　因克爾曼戰役



地圖八　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

# 日期及專有名詞說明

日期

從1700年到1918年，俄國使用的是羅馬儒略歷（Julian calendar），比西歐使用的格里歷（Gregorian calendar），即現行公歷晚十三天。為避免混淆，本書統一使用格里歷日期。

專有名詞

本書中的俄語名稱統一按照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發布的標準音譯法拼寫，但是對于一些著名人物，則按慣例拼寫，如“沙皇亞歷山大”拼寫為Tsar Alexander。

# 序言

在英國多塞特郡（Dorset）一個寧靜的小村莊維奇安普敦（Witchampton）的教區教堂里，有一座為本村的五位子弟兵建立的紀念碑，他們都戰死在克里米亞戰場。紀念碑上刻著這樣的文字：

為效忠國家而死

長眠在克里米亞

愿他們的靈魂得到安息

公元1854年

在法國西南部埃里庫爾（Héricourt）的公墓里，有一塊墓碑，上面刻著九名本地士兵的名字，他們都戰死在克里米亞戰場。墓碑上這樣寫著：

為祖國戰死

朋友們，有一天我們還會相見

在這座墓碑下擺放著兩個加農炮的炮彈。一個上面刻著“Malakoff”（馬拉科夫，俄文拼作Malakhov，發音為馬拉霍夫），這是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在圍困俄羅斯海軍基地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的戰役中，被法軍攻陷的棱堡之一；另一個上面刻著“Sebastopol”（塞巴斯托波爾），也就是塞瓦斯托波爾的舊稱。這樣的墓碑為數不多，成千上萬的英法士兵埋葬在克里米亞，躺在沒有標識、無人看管的墳地里。

在塞瓦斯托波爾有幾百座紀念碑，許多都矗立在軍人公墓里，那是在圍困戰期間，由俄羅斯人建立的三座巨型墓地之一，有十二萬七千五百八十三名在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中陣亡的軍人埋在那里。如果是軍官，則還有自己的墳墓，墓碑上刻著姓名和所屬部隊的名字；普通士兵則被一起埋在大型墓坑里，每個墓坑內有五十到一百具尸體不等。和俄羅斯軍人埋在一起的還有來自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希臘的東正教軍人，他們都是響應沙皇號召，趕來為宗教信仰而戰的。

在一個埋葬著十五名水手的墳墓上，一塊小小的銘牌幾乎完全被長長的野草遮蓋。這塊銘牌是用來紀念這些“在1854—1855年間為保衛塞瓦斯托波爾而英勇犧牲”的水手的，上面刻著這樣的文字：

他們為祖國、為沙皇、為上帝而獻身

在塞瓦斯托波爾的其他地方，還有為紀念無名士兵、失蹤軍人而設立的長明燈和墓碑。據估計，在此地的三座軍人公墓里，共埋葬著約二十五萬俄羅斯士兵、水手和平民。[[1]](#_1_L__Liashuk__Ofitsery_chernomo)



埃里庫爾紀念碑（圖片來源：喬治·西蒙及紀念信息網站 www.memorial-genweb.org）

克里米亞戰爭的規模和人員損失均十分巨大，但其影響卻被后來的兩場世界大戰掩蓋了。對今天的人們來說，這似乎是一場不太重要的戰爭，與那些墓碑和銘牌一樣，幾乎已被遺忘。即使是在參加了這場戰爭的國家和地區：俄羅斯、英國、法國、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撒丁尼亞（Piedmont-Sardinia），以及奧斯曼帝國，包括那些后來歸屬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的地區，今天也沒有多少人了解克里米亞戰爭。但是對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人們來說，克里米亞戰爭是他們一生中最重要的戰爭，就如同兩次世界大戰對生活在20世紀的人們一樣重要。

克里米亞戰爭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至少有七十五萬軍人陣亡或病死，其中三分之二為俄羅斯軍人。法國損失了約十萬軍人，英國的損失小得多，僅有兩萬人，原因是參戰的英國軍隊人數少得多（共有九萬八千英國軍人和水手參戰，而法國有三十一萬人）。但即使如此，對于像維奇安普敦這樣的農村小地方，損失五名壯勞力依然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在愛爾蘭科克郡（County Cork）的懷特蓋特（Whitegate）、埃哈達（Aghada）和法西德（Farsid）地區，英軍招募了大量兵源，造成這些地方近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戰死在克里米亞。[[2]](#_2_Losses_of_Life_in_Modern_Wars)

沒有人統計過平民的傷亡數字，許多平民死于大炮轟擊，或是在圍困期間餓死，或是從軍人那里染上疾病而死。在高加索（Caucasus）、巴爾干（Balkans）和克里米亞等地，還有許多平民死于集體屠殺和種族清洗。克里米亞戰爭是第一場“全面戰爭”，今天常見的殃及平民、造成人道主義災難的戰爭，在19世紀就已經出現了。

克里米亞戰爭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戰爭，使用了最新的工業技術、現代來復槍、蒸汽機船和鐵路，還采用了新型的后勤和通訊手段，電報、軍事醫學上的一些重要發明，以及戰地記者和攝影師也出現在了戰場上。與此同時，克里米亞戰爭又是最后一場依然遵從“騎士精神”的戰爭，戰場上交戰雙方靠戰場使者（parliamentaries）傳信，在戰斗間隙，雙方會同意停火以便轉移尸體、救治傷員。戰爭早期發生在阿爾馬河（River Alma）和巴拉克拉瓦（Balaklava）的幾場戰斗，例如著名的“輕騎兵沖鋒”（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一役，與拿破侖戰爭期間的戰斗方式沒有什么兩樣。然而，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時間最長也最關鍵的戰役——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卻可以說是1914—1918年間工業化戰壕戰的前身。在長達十一個半月的圍困戰期間，雙方共挖掘了一百二十公里的戰壕，發射了一億五千萬發子彈和五百萬發各種口徑的炮彈。[[3]](#_3_J_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

克里米亞戰爭這個名字無法反映其跨國規模，也無法反映這場戰爭對歐洲、俄羅斯，以及從巴爾干到耶路撒冷（Jerusalem）、從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到高加索等交戰地區的重要意義。這一地區就是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所覆蓋的區域，一個由于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崩潰而造成的國際難題。也許我們可以采用俄國人對這場戰爭的稱呼：東方戰爭（Eastern War），這樣至少可以將其與“東方問題”聯系在一起；或是采用在許多土耳其文獻中常常見到的名字：土俄戰爭（Turco-Russian War），將其放置于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的漫長沖突這一背景之下。然而，這些名字都無法反映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西方國家干預這一關鍵因素。

克里米亞戰爭始于1853年，當時奧斯曼和俄羅斯軍隊在多瑙河邊，今屬羅馬尼亞（Romania）的摩爾達維亞（Moldavia）[\*](#__Mo_Er_Da_Wei_Ya_Gong_Guo_De_Xi)和瓦拉幾亞（Wallachia）公國地區發生了交戰。戰火隨后向高加索蔓延，在那里，當地穆斯林部落反抗俄羅斯的活動受到了土耳其和英國的鼓勵和支持。隨后戰火延伸到黑海其他地區。到了1854年，英法兩國加入土耳其一方，奧地利也威脅要加入反俄羅斯聯盟。在此形勢下，沙皇把軍隊從這兩個公國撤出，戰場轉到了克里米亞。在1854—1855年間，軍事沖突還出現在其他幾個地方：在波羅的海（Baltic Sea），英國皇家海軍計劃進攻俄羅斯首都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在白海（White Sea），皇家海軍于1854年7月炮擊了索洛韋茨基（Solovetsky）修道院，而索洛韋茨基當時是俄羅斯在白海的政治經濟中心；戰火甚至延伸到西伯利亞的太平洋沿岸地區。

克里米亞戰爭不僅卷入了多個國家和地區，涉及的人員也極為眾多。除了軍事人員外，本書中還講述了許多其他人的故事：國王與王后、親王與王子、宮廷隨從、外交官、宗教領袖、波蘭和匈牙利革命者、醫生、護士、記者、藝術家與攝影師、傳單寫手和作家。說到作家，當然沒有任何其他人比托爾斯泰更能提供俄羅斯人的視角。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他作為一名俄羅斯軍官在三個戰場（高加索、多瑙河和克里米亞）參加了戰斗。這樣的寫作角度，也許正是本書讀者所期待的，當然也可能是部分讀者所擔心的。無論如何，本書參考并引用了大量參戰軍官與士兵的信件和回憶錄，其中既有英國普通大兵、法國—阿爾及利亞輕步兵，也有俄羅斯的農奴戰士，讀者可以從這些人的視角來了解這場戰爭。

有關克里米亞戰爭，已經出版過許多英文書了。但即使與用其他語言寫成的著述相比，本書也是第一部資料大量取自俄羅斯、法國、奧斯曼帝國和英國文獻的書，全面反映了地緣政治、文化與宗教等因素是如何影響主要參戰國介入這場戰爭的。因為這場戰爭有著如此深遠的歷史淵源，急切想看戰斗場面的讀者在閱讀前面幾章的時候需要有些耐心（或干脆跳過不讀）。我希望本書能讓讀者對克里米亞戰爭有一個新的理解，認識到這是歐洲、俄羅斯和中東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對當今世界格局的影響猶在。許多英國人把這場戰爭看作“毫無意義”或是“沒有必要”的，我對此完全不贊同。這種觀點源自當時公眾對英國糟糕的軍事行動和有限戰果的失望，這種失望情緒對以后英國的歷史文獻產生了負面影響。長期以來，克里米亞戰爭一直沒有成為一個嚴肅的學術課題，于是英國的軍事歷史愛好者們便成為這段歷史的講述者。他們缺乏學術素養，只是簡單重復一些耳熟能詳的故事，例如“輕騎兵沖鋒”、英國指揮官的無能、弗洛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的事跡等，卻沒有能力討論這場戰爭爆發的宗教原因、“東方問題”的復雜性、黑海地區基督徒與穆斯林的關系，以及歐洲人對俄羅斯的敵視等等。如果忽略了這些因素，就很難理解這場戰爭真正的重要性。

克里米亞戰爭是一個關鍵的分水嶺，打破了長期以來維持歐洲秩序的俄羅斯—奧地利保守主義聯盟，讓一些新興國家，包括意大利、羅馬尼亞和德國得以誕生。這場戰爭讓俄羅斯對西方國家產生了深深的怨恨，覺得這些基督教國家竟然會背叛自己，與異教徒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也讓巴爾干地區人民的獨立期望受到打擊。從1870年代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里一直成為破壞列強關系穩定的地區。如果不把土耳其人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中的短暫露面計算在內的話，克里米亞戰爭是他們首次參加的歐洲戰爭。這場戰爭打開了奧斯曼帝國的大門，西方軍隊和技術的涌入，加快了這一地區融入全球資本主義經濟的步伐，同時也引發了伊斯蘭世界對西方持續至今的對立情緒。

參加克里米亞戰爭的各方都有自己不同的動機，民族主義情緒、帝國間的紛爭與宗教勢力交織在了一起。對于土耳其人來說，參戰是為了保衛他們衰亡中的歐洲帝國。面對俄羅斯以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東正教徒為幌子而發動的侵略，他們必須予以反擊，同時還可以借此壓制本國境內的伊斯蘭和民族主義革命。英國聲稱其參戰的目的是保護土耳其人免受俄羅斯的欺凌，但其實他們更關心的是打擊俄羅斯帝國，擔心以后雙方會在亞洲地區成為競爭對手，同時英國人還希望借助這場戰爭推動其在奧斯曼帝國內的自由貿易和宗教影響力。對法國皇帝拿破侖三世（Napoleon Ⅲ）來說，克里米亞戰爭給了他一個行動的機會，即使不能重拾他伯父拿破侖的輝煌，至少也可以讓法國在境外重新得到尊重、提升影響力，或許還能重繪歐洲版圖為一個自由主義國家的聯盟，實現拿破侖的理想。當然法國境內的天主教勢力出于宗教理由，也在鼓動法國與俄羅斯作戰。對于英國和法國來說，這是一場保衛歐洲自由與文明的戰爭。在他們眼中，俄羅斯野蠻殘暴、蠢蠢欲動，其擴張野心不僅針對西方，還威脅到整個基督教世界。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要對克里米亞戰爭負最大責任，而他發動這場戰爭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登基二十七年給他帶來了膨脹的虛榮與傲慢，在頭腦中形成了一套強國應該如何對付弱小鄰居的念頭，同時他還嚴重誤判了列強對俄羅斯舉動的反應；但最重要的是，他相信他發動的是一場宗教戰爭，一場圣戰，目的是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沙皇把擴大俄羅斯版圖當作自己的天賦使命，即使要與全世界作戰，也要把自己的東正教帝國擴張到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

歷史學家們往往低估戰爭的宗教動機，克里米亞戰爭的觸發點在巴勒斯坦，其爭執雙方一邊是由法國支持的天主教徒或拉丁人[†](#__Zhi_Lai_Zi_Ou_Zhou_De_Tian_Zhu)，另一邊是由俄羅斯支持的希臘人，他們在誰應該控制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re）和伯利恒（Bethlehem）的圣誕教堂（Church of the Nativity）的問題上發生了沖突。對沙皇來說，這場沖突為發動克里米亞戰爭提供了足夠的理由，但是許多歷史學著作對此卻僅僅用一兩段話輕飄飄地一帶而過。在過去的許多人看來，應該由誰來掌管幾座教堂的大門鑰匙這樣的小事，實在不可能和列強大戰有什么關系。在一些歷史觀點中，發生在巴勒斯坦的紛爭被用來表明克里米亞戰爭是一場“愚蠢”和“沒有必要”的戰爭。另一些觀點則認為宗教紛爭僅僅是一個契機，真正的原因是歐洲列強為擴大自己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為占領市場或受到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鼓動而戰。這些說法并沒有錯，卻低估了宗教在19世紀的重要性。近幾十年來，從1990年代的巴爾干戰爭到近年來伊斯蘭極端武裝勢力的興起，在在都明確表明宗教在戰爭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19世紀的“東方問題”上，各方都把宗教力量納為己用，政治與信仰緊緊地糾纏在一起，其中的每一個國家，特別是俄羅斯，在走向克里米亞戰場時，都堅信上帝站在自己這一邊。

[\*](#_4) 摩爾達維亞公國的西半部領土今屬羅馬尼亞，東半部則分屬摩爾多瓦共和國（Republic of Moldova）和烏克蘭。——編注

[†](#_5) 指來自歐洲的天主教徒，與來自東歐、巴爾干地區的東正教徒對立。——譯注

注釋

[[1]](#_1)L. Liashuk, Ofitsery chernomorskogo flota pogubshie pri zashchite Sevastopoliav 1854–1855 gg. (Simferopol, 2005); G. Arnold,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2), pp. 38–9.

[[2]](#_2)Losses of Life in Modern Wars: Austria-Hungary; France (Oxford, 1916), p. 142; Histoire militaire de la France, 4 vols. (Paris, 1992), vol. 2, p. 514; D. Murphy, Ireland and the Crimean War (Dublin, 2002), p. 104. 有關聯合軍事行動及傷亡問題，近年來研究做得最好的是 T. Margrave, ‘Numbers & Losses in the Crimea: An Introduction’, War Correspondent, 21/1 (2003), pp. 30–32; 21/2 (2003), pp. 32–6; 21/3 (2003), pp. 18–22.

[[3]](#_3)J. Herbe,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a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37; 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p. 157–8.

# 第一章 宗教戰爭

離復活節還有幾個星期，朝圣的人們就陸續來到耶路撒冷。他們來自東歐和中東的許多地方：埃及、敘利亞、亞美尼亞（Armenia）、安納托里亞（Anatolia）、希臘半島等等，但最多的還是來自俄羅斯。這些人先是坐船來到雅法港（Jaffa），再從那里租駱駝或是驢子上路。1846年4月10日耶穌受難日這一天，耶路撒冷聚集了兩萬名朝圣者。他們把能租的房子都租下了，實在不行就全家露天而睡。為了保證長途朝圣路上有足夠的盤纏，他們幾乎人人都會隨身帶上一些貨物，比如手工制作的十字架或是裝飾品，念珠或是繡品等，在抵達后賣給參觀圣殿的歐洲游客。朝圣活動的中心是圣墓教堂，前面的廣場也是一個忙碌的市場，售賣色彩鮮艷的水果和蔬菜的攤位與出售貨物的朝圣者擠在一起，教堂后面的皮革作坊也把氣味難聞的牛羊皮晾曬在那里。廣場還是乞丐們討錢的地方，他們的手看上去像是得了麻風病，就這么伸向陌生人，驚嚇之下人們只好散錢消災。有錢的游客會雇幾個土耳其向導，這些人揮舞手中的大棍子把乞丐趕開，保護自己的客人走向教堂大門。

1846年天主教和希臘東正教的復活節正好在同一天，于是朝圣地點比往年更加擁擠，氣氛也更為緊張。圣墓教堂內，建在耶穌受難處的祭壇是舉行復活節祭祀活動的地點，長期以來兩個教派的教眾一直為耶穌受難日那天誰有優先權爭執不下。那時候信奉天主教的拉丁人和信奉東正教的希臘人之間的矛盾已到白熱化程度，以至于奧斯曼帝國駐耶路撒冷的總督穆罕默德帕夏（Mehmet Pasha）[\*](#__Pa_Xia_Shi_Jing_Yu__Xiang_Dang)不得不派兵到教堂內外維持秩序，但還是無法阻止沖突的發生。

在耶穌受難日這一天，拉丁教士帶著白色的亞麻祭壇布來到圣墓教堂，卻發現希臘教士已經在祭壇上鋪上了他們的絲綢繡花壇布。拉丁教士質問希臘教士有何權利占著祭壇，要他們出示蘇丹的許可狀。希臘教士卻反問拉丁教士有何權利要求把絲綢壇布拿下，是不是也有蘇丹的許可狀。兩派教士打了起來，僧侶和朝圣者們立刻加入戰團，很快整個教堂變成了戰場。兩邊不僅拳腳相加，還操起各種家伙，十字架、蠟燭臺、圣餐杯、燈具、香爐都成了武器，甚至還有人從教堂里拆下了木頭。斗毆愈演愈烈，兩邊都使上了偷偷帶進教堂的刀子和手槍。當穆罕默德帕夏手下的士兵終于控制住場面時，教堂地上已經躺了四十多具尸體。[[1]](#_1_FO_78_446__Finn_to_Aberdeen)

“這就是以宗教之名干的好事！”英國社會評論家哈麗雅特·馬蒂諾（Harriet Martineau）1846年正在巴勒斯坦和敘利亞旅行，她繼續寫道：

耶路撒冷是基督徒和猶太人最神圣的地方，就像穆斯林的麥加（Mecca）一樣。這些人聲稱有同一個圣父，對他們來說這里都是圣所，那么他們又在這里干了些什么？穆斯林會把任何進入奧馬爾清真寺（Mosque of Omar）[†](#__Gai_Qing_Zhen_Si_Wei_Yu_Sheng)的猶太人或基督徒殺掉，而希臘人和拉丁人又相互敵對，會把任何進入圣墓教堂的猶太人或穆斯林殺掉。猶太人向敵人祈求平安，用的卻是自己先知留下來的仇恨的語言。[[2]](#_2_FO_78_446__Finn_to_Aberdeen)

基督教不同教派之間矛盾的加劇，原因是自19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朝圣者來到巴勒斯坦。鐵路和蒸汽機船的出現，為公眾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來自法國和意大利等天主教國家的旅行團以及歐美各地虔誠的中產階級教徒紛紛涌向巴勒斯坦。各個教會之間相互競爭，都要擴大影響力。這些教會支持朝圣團體的活動，搶著在巴勒斯坦購買土地，資助教區和修道院，建立宗教學校吸收阿拉伯東正教徒（以敘利亞和黎巴嫩人為主），讓這些巴勒斯坦人數最多但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民眾改信基督教。

1839年英國駐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領事威廉·揚（William Young）在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Lord Palmerston）提交的報告中說：“最近兩年內，有大批來自俄羅斯、法國、那不勒斯（Naples）和撒丁島（Sardinia）的政府官方禮物被送到耶路撒冷，用來裝點圣墓教堂。”他繼續寫道：

不同教派間的嫉妒和敵意不斷增加，后果明顯。在過去，拉丁人、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的修道院之間的紛爭并無大礙，常常以一方給土耳其當局更多賄賂作為解決。但是現在不行了，因為紛爭的背后，是歐洲國家在宗教事務上的介入。[[3]](#_3_FO_78_368__Young_to_Palmersto)

在1842年和1847年間，耶路撒冷熱鬧非凡：圣公會（Anglican）在這里建了一個主教公署；奧地利建立了一個方濟會（Franciscan）印刷所；法國建立了一個領事館并向天主教學校和教會送了很多錢；教皇庇護九世（Pope Pius IX）重新在此設立了一個常駐大主教的職位，這在12世紀十字軍東征后還是第一次；希臘東正教大主教從君士坦丁堡搬回耶路撒冷以加強控制；俄羅斯派來了教會使團，建起了一個俄羅斯大院，包括旅店、醫院、祈禱堂、學校和市場等，為人數越來越多的俄羅斯朝圣者提供協助。

在19世紀早期，由俄羅斯東正教會派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比其他基督教派都多。每年來到耶路撒冷參加復活節慶典的俄羅斯朝圣者多達一萬五千人，有些甚至徒步穿越俄羅斯和高加索，再經過安納托里亞和敘利亞而來。對俄羅斯人來說，巴勒斯坦的圣所是他們強烈宗教熱情的傾注點，到這里朝圣是他們信仰虔誠的最高表達。

在某種程度上，俄羅斯人把耶路撒冷看作他們精神家園的延伸。“神圣俄羅斯”這一概念并不受地域限制，而是一個東正教的帝國，供朝拜的圣所遍及基督教東部地區，而圣墓教堂又是所有圣所之母。一位俄羅斯神學家在1840年代寫道：“巴勒斯坦是我們的家鄉，在那里我們不把自己當作外人。”[[4]](#_4_Yin_Yong_Can_Jian_D__Hopwood)這種說法是有源頭的，幾百年來的朝圣活動把俄羅斯教會和圣地（包括通過耶穌的一生聯系在一起的伯利恒、耶路撒冷和拿撒勒[Nazareth]）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在許多俄羅斯人看來，奧斯曼帝國對巴勒斯坦擁有的政治主權不過是暫時的，而他們自己與圣地之間在精神信仰層面的聯系卻重要得多。

然而在天主教和新教徒身上卻完全沒有這種狂熱，他們對巴勒斯坦圣地的興趣不過是出于歷史的原因和浪漫的想象。19世紀英國旅行家和歷史學家亞歷山大·金萊克（Alexander Kinglake）認為“朝圣的拉丁教徒，最多也就是一名身攜日記本、對歷史有所了解、打算寫本書的法國游客而已”。東正教徒的激情狂熱，“野蠻”和“低俗迷信”的儀式，往往讓歐洲游客退避三舍。馬蒂諾就不愿意到圣墓教堂去看耶穌受難日為朝圣者洗腳的儀式，她寫道：“我可沒法去看這種借宗教名義演出的丑劇，相比之下，在非洲河邊舉行的最低級的拜物教儀式都沒有那么令人受到冒犯。”出于同樣的理由，她也不愿意參加復活節星期六舉行的圣火儀式。在圣火儀式上，朝拜者紛紛擠入圣墓教堂內，用耶穌墳墓上的長明火點燃自己手中的火把。來自希臘、保加利亞、摩爾達維亞、塞爾維亞和俄羅斯等地不同東正教派別的教徒爭先恐后地擠向耶穌墳墓，斗毆經常發生，有時候一些教徒會被踩死或是被煙嗆死。柯曾男爵（Baron Curzon）目睹了1834年的圣火儀式，他將看到的景象描述為“混亂和瀆神的場面”，那些朝圣者“幾乎全身赤裸，手舞足蹈，狂喊亂叫，仿佛惡魔上身一般”。[[5]](#_5_A__Kinglake__The_Invasion_of)

馬蒂諾是一神論者，柯曾是圣公會教徒，他們對這種宗教儀式的反感一點也不奇怪，因為在新教中，早就沒有了公開展示宗教熱情的行為。和許多歐洲游客一樣，他們覺得東正教徒狂亂的舉動幾乎不像一個基督徒所為，自己和他們沒有什么共通之處，反而是相對世俗化的穆斯林身上的含蓄和端莊，與自己習慣的安靜祈禱有著共通之處。這些作者對東正教徒的態度，影響了西方國家在與俄羅斯就圣地問題發生爭執時采取的外交政策，而這些外交政策的實施，最終導致了克里米亞戰爭。

歐洲的評論家們對圣地在俄羅斯人心中的地位一無所知，也不以為意，他們只會看到俄羅斯對西方教會利益的威脅在日益增長。在1840年代早期，英國領事威廉·揚定期給外交部報告“俄羅斯勢力”在耶路撒冷快速增長的情況，在他看來，俄羅斯正在通過資助朝圣者以及為東正教堂和修道院購買土地的方式，準備“對圣地的征服”。有一點他說得沒錯，俄羅斯宗教使團確實曾通過資助在巴勒斯坦修建教堂、學校和旅店的方式，對當地的希臘、亞美尼亞和阿拉伯東正教團體施加影響。這種做法實際是遭到俄羅斯外交部反對的，因為他們準確地預感到這種做法會讓西方列強產生敵意。但是在威廉·揚的報告中，對俄羅斯征服計劃的描述越來越夸張，他在1840年向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匯報時說：“有人聽到俄羅斯朝圣者在那里公開議論，說由俄羅斯政府來管理這塊地方的時機已經到了。俄羅斯政府可以在復活節期間，把耶路撒冷的一萬名朝圣者武裝起來。城里的修道院地方很大，只要稍微改建一下，就可以變成要塞。”英國人對“俄羅斯計劃”的擔心促使圣公會加快行動，終于在1845年開始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圣公會教堂。[[6]](#_6_FO_78_413__Young_to_Palmersto)

不過對俄羅斯在圣地的各種行動最警覺的還是法國人，對法國的天主教徒來說，法國和巴勒斯坦有著長久的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十字軍東征時期。他們認為作為歐洲“第一個天主教國家”，法國有保護圣地的特殊使命，即使是在近些年來拉丁朝圣者的人數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在那里有我們的遺產，必須捍衛我們的利益，”一份法國天主教地方報紙這么寫道，“十字軍東征時，法國人在圣地灑下的熱血，俄羅斯人永遠也比不上。俄羅斯人從來沒有參加過東征……在東方人心目中，法國是首要的基督教國家，所以土耳其人把基督教歐洲地區全部叫作法蘭西國（Frankistan）。”[[7]](#_7_R__Marlin__L_Opinion_franc_co)

為了對抗俄羅斯不斷增長的勢力，同時確立自己作為天主教徒首要保護者的地位，法國于1843年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一座領事館（當地穆斯林對西方列強一向十分仇恨，很快就有憤怒的人群把旗桿上的法國國旗扯了下來）。以后，不論是在圣墓教堂還是伯利恒圣誕教堂舉辦的拉丁禮拜，法國領事總是帶著一批隨從盛裝出席。在伯利恒舉辦圣誕午夜彌撒時，法國領事后面還有一群士兵保護，這些士兵雖然是穆罕默德帕夏派來的，但實際上是法國出的錢。[[8]](#_8_E__Finn__ed____Stirring_Times)

和圣墓教堂一樣，拉丁人和東正教徒也經常在圣誕教堂出現糾紛。多年來，他們一直在為拉丁僧侶是否應該配有主教堂大門鑰匙而爭執不休。希臘教士是主教堂的管理者，但是馬槽祈禱堂（Chapel of the Manger）是屬于天主教徒的，而要去馬槽祈禱堂必須穿過主教堂。雙方還一直爭論拉丁教士是否應該持有圣誕石窟（Grotto of the Nativity）的鑰匙。圣誕石窟位于主教堂底下，被認為是耶穌誕生的地方。還有一個爭議是有關石窟內耶穌誕生處大理石地面上鑲嵌的一顆銀星，這顆銀星由拉丁人在18世紀嵌入，上面刻著法國國徽和一句拉丁文“在這里圣母瑪利亞誕下耶穌基督”。希臘教士一直對此感到憤怒，認為這是法國人放在這里的“征服的象征”。1847年，這顆銀星被人偷走了，挖起銀星的工具就隨手丟在一邊，拉丁人立刻指責這一定是希臘人干的。不久之前，希臘人還在石窟周圍建了一堵墻，不讓拉丁人進入，于是引發雙方一場斗毆。銀星被偷走之后，法國人向“高門”（Porte），即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帝國政府提出外交抗議，依據是一項1740年簽署、早被人遺忘的條約，法國人說這項條約保證了天主教徒有保護石窟中的銀星的權利。但與此同時，希臘人也根據高門的慣例和特許權，聲稱這個權利是他們的。[[9]](#_9_FO_78_705__Finn_to_Palmerston)這看上去是一個小小的爭執，卻引發了一場關于誰能控制圣地的外交危機，繼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除了伯利恒的教堂大門鑰匙之外，以天主教代表自居的法國還聲稱擁有維修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屋頂的權利，依據也是這份1740年的協議。圣墓教堂的屋頂迫切需要維修，因為屋面一側防漏水的鉛質泛水大部分被人拿走了（希臘人和拉丁人相互指責是對方干的），雨水從屋頂縫隙漏下，甚至連鳥兒都能飛到教堂里。根據土耳其法律，誰擁有屋頂誰就擁有整座屋子，于是誰有權維修圣墓教堂的屋頂就關乎了所有權，因此成為拉丁人和希臘人激烈爭執的焦點。在這一爭論中，俄羅斯人代表東正教徒出面與法國人對峙，他們拿出的文件是1774年簽署的《庫楚克開納吉和約》（Treaty of Kuchuk Kainarji）[‡](#___Ku_Chu_Ke_Kai_Na_Ji_Jiu_Shi_J)，這份和約是土耳其在1768—1774年戰爭失敗后與俄羅斯簽署的。根據俄羅斯人的說法，該和約賦予了俄羅斯在奧斯曼帝國中代表東正教的權利。這一說法遠非實情。該和約用詞含糊，很容易在翻譯過程中把意思曲解。當時俄羅斯簽署的是用俄文和意大利文寫的和約，而土耳其人簽署的是用土耳其文和意大利文寫的和約，然后俄羅斯人又把和約翻譯成法文用于外交。[[10]](#_10_Guan_Yu_Dui_Tiao_Yue_Nei_Ron)不管怎樣，俄羅斯以此來給高門施加壓力，不讓法國人達到目的。夾在中間的土耳其人只好蒙混拖延，向雙方都說些好話。

1851年5月，法國總統路易-拿破侖（Louis-Napoleon）[§](#SS_Ji_Lu_Yi__Na_Po_Lun__Bo_Na_Ba)任命好友夏爾·德·拉·瓦萊特（Charles de La Valette）侯爵擔任駐奧斯曼帝國大使，進一步加劇了這場沖突。這一任命是拿破侖向法國天主教勢力讓步的結果，他在擔任總統兩年半以來，一直未能在與議會的斗爭中占上風，于是為了鞏固地位，他做了一系列事情向天主教示好：1849年在法國軍隊的護送下，逃亡法國的教皇回到了梵蒂岡；1850年通過的《法盧法案》（Falloux Law）為大量增加天主教學校鋪平了道路。對瓦萊特的任命也是向教會做出的讓步之一，因為他是一個狂熱的天主教徒，是神秘的“神父黨”（clerical party）中的重要人物，許多人認為這個派系在暗中操縱法國的外交政策，特別是針對圣地的政策，要求法國對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持強硬態度。瓦萊特擔任大使之后的所作所為，超過了他的職位所賦予他的權力。在上任途中，他改變事先擬定的行程到羅馬停留，說服教皇支持法國在圣地代表天主教徒。抵達君士坦丁堡后，他特意在和高門的交談中使用帶有攻擊性的言辭。他解釋說這是一種策略，在捍衛法國利益時，“讓蘇丹王和他的大臣們畏縮屈服”。法國的天主教報刊，特別是很有影響力的《辯論日報》（Journal des débats），為他提供了輿論支持，而這份報紙的主編就是他的親密朋友。瓦萊特則給報刊提供各種言論供其引用，進一步火上澆油，這讓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惱怒。[[11]](#_11_Memoires_du_duc_De_Persigny)

1851年8月，法國和奧斯曼帝國組成了一個聯合委員會共同商討宗教權利問題。土耳其人在希臘人和拉丁人的要求之間小心地權衡，因此委員會工作拖沓，遲遲沒有得出結論。但是在委員會還未取得任何成果之前，拉瓦萊特就公開宣布拉丁人的權利已經“清楚地確定了”，沒有必要繼續談判下去。他還說法國“有權采用極端手段”來維護拉丁人的權利，并吹噓法國“在地中海擁有極端先進的海軍”，可以用來保護法國的利益。

很難說瓦萊特以戰爭相威脅的言論是獲得拿破侖明確批準的。拿破侖對宗教事務不是很感興趣，對圣地上的糾紛細節也知之甚少，在中東基本采取守勢。但可能的情況是，他不介意甚至希望瓦萊特制造一場和俄羅斯之間的危機。他認為歐洲三強（英國、奧地利和俄羅斯）不僅把法國排擠出歐洲事務圈外，而且自從他伯父拿破侖·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戰敗后，法國一直屈從于1815年簽訂的“令人難堪”的條約。因此任何可以打亂這三強鼎立局面的行動，他都樂于嘗試一下。路易-拿破侖有一定的理由相信，如果在圣地上發生沖突，一個新的聯盟將會誕生：奧地利是天主教國家，也許愿意和法國聯合共同對付俄羅斯，而大英帝國也會為了保護自己在近東的利益而與俄羅斯對抗。不管出于何種動機，瓦萊特的敵對舉動讓沙皇大怒，向奧斯曼帝國蘇丹發出警告，任何承認拉丁人宗教權利的行為都會被認為是違反了高門與俄羅斯之間的條約，他將不得不中止兩國之間的外交關系。這一突然的變化讓英國警惕起來，英國原來一直鼓勵法國與俄羅斯達成某種妥協，現在看來必須為可能發生的戰爭做準備了。[[12]](#_12_A__Gouttman__La_Guerre_de_Cr)

戰爭真正爆發要在兩年之后，但是其火焰卻是在過去幾個世紀的宗教紛爭中不斷醞釀起來的。

\* \* \*

在當時的列強中，以宗教為國家中心的做法，以俄羅斯為甚，整個沙皇體系就建立在全民信奉東正教的基礎上。俄羅斯對疆土的概念以及對其國際義務的理解完全基于宗教的考慮。

在沙皇俄國的建國理念中，當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首都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陷之后，莫斯科就成了東正教的中心，即所謂的“第三個羅馬”。憑此邏輯，俄羅斯承擔著上天賦予的責任去解救陷于奧斯曼帝國統治之下的東正教徒，并奪回君士坦丁堡，將它恢復成為東基督教王國的首都，這場圣戰就是俄羅斯帝國存在的理由。從16世紀擊敗喀山（Kazan）和阿斯特拉罕（Astrakhan）蒙古可汗國，到18至19世紀征服克里米亞、高加索和西伯利亞地區，俄羅斯帝國就是建立于歐亞草原上基督教定居者與韃靼（Tatar）游牧民族的沖突之上的。在俄羅斯人眼里，國家以宗教責任，而不是以種族來定義，東正教徒即俄羅斯人，異教徒即外國人。在19世紀興起的俄羅斯民族主義，更是增強了這一意識。

在與土耳其人的沖突中，宗教原因一直是其根本。在19世紀中期，已有一千萬東正教徒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的歐洲疆土上，包括生活在歐洲的希臘人、保加利亞人、阿爾巴尼亞人、摩爾達維亞人、瓦拉幾亞人和塞爾維亞人，另有三四百萬生活在高加索和安納托里亞的基督徒（包括亞美尼亞人、格魯吉亞人[Georgians]和一小部分阿塞拜疆人[Abkhazians]）。[[13]](#_13_A__Ubicini__Letters_on_Turke)

奧斯曼帝國在其北疆修建了一系列要塞，構成一條從巴爾干半島的貝爾格萊德（Belgrade）到高加索的卡爾斯（Kars）之間的防線。自17世紀后半葉以來，這條防線一直是土耳其與俄羅斯發生軍事沖突的地點（包括1686—1699、1710—1711、1735—1739、1768—1774、1787—1792、1806—1812以及1828—1829年發生的戰爭）。克里米亞戰爭和后來發生在1877—1878年間的俄土戰爭也不例外。這些邊疆地區是宗教戰爭的戰場，東正教與伊斯蘭版圖之間的裂痕。

在歷次俄土戰爭中，最關鍵的有兩個地區：多瑙河三角洲（包含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個公國）以及黑海北岸地區（其中包括克里米亞半島）。這兩個地區也是克里米亞戰爭的主要戰區。

多瑙河三角洲水域寬闊、沼澤叢生，是防止俄羅斯軍隊從地面進攻君士坦丁堡的關鍵緩沖區。多瑙河流域的糧食供應，不論是對土耳其要塞，還是對進攻的俄羅斯軍隊來說都極為重要，所以當地農民對誰效忠一直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這些農民是東正教徒，于是俄羅斯就以把他們從穆斯林的統治下解放出來作為號召。土耳其人則采用焦土政策。當俄羅斯軍隊攻入多瑙河地區后，由于農作物已被撤退的土耳其人燒毀，在缺乏補給的情況下，俄軍往往因饑餓和疾病而不得不放棄進攻，這樣的失敗屢次發生在俄羅斯軍隊身上。因此如果要對土耳其首都發起進攻，俄羅斯人必須建立一條海上補給線，通過黑海把物資送到前線部隊手里。

但是黑海北岸和克里米亞本身也是奧斯曼帝國針對俄羅斯的緩沖區。奧斯曼帝國沒有直接占領這些地區，而是采用扶植附庸國家的辦法。這里的克里米亞汗國（Crimean khanate）的韃靼部落同樣說突厥語（Turkic），奧斯曼帝國就靠他們保護伊斯蘭的北疆，對抗基督教軍隊的入侵。克里米亞汗國由格來王朝（Giray dynasty）統治，是成吉思汗（Genghiz Khan）的直系后代，金帳汗國（Golden Horde）剩下的最后一塊領地。從15世紀到18世紀，金帳汗國的騎兵在俄羅斯與黑海之間的南部大草原上馳騁，闖入莫斯科大公國（Muscovy）后，這些韃靼部落經常把斯拉夫（Slavic）奴隸賣給奧斯曼帝國，用作性奴或是劃槳手，而俄羅斯和波蘭的君主們則向大汗提供貢品，作為互不侵犯的條件。[[14]](#_14_S__Montefiore__Prince_of_Pri)

17世紀末，俄羅斯并吞了烏克蘭，在那之后的一個世紀中，俄羅斯一直試圖把這些緩沖地帶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過來。在這些戰爭中，奪取黑海沿岸的不凍港是俄羅斯的戰略目標，因為這些港口對俄羅斯的貿易和海軍意義重大。但是戰爭背后同時也有宗教動機，例如在1699年，當俄羅斯及其盟國對奧斯曼帝國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強令土耳其保證希臘人對圣墓教堂的使用權，并允許俄羅斯人進入圣地。俄羅斯人對多瑙河流域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公國的爭奪，宗教也是動機之一。在1710—1711年的俄土沖突中，彼得大帝命令俄羅斯軍隊入侵這兩個公國，目的是希望能促使當地的基督徒起義反抗土耳其統治者。這個愿望最后落空了，但是鼓勵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起來抗爭以削弱土耳其人的統治這一想法，在其后的兩百年里，一直是沙皇的中心策略。

在葉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統治時期（1762—1796），這一策略成為正式的政策。在1768—1774年間的俄土戰爭中，俄羅斯軍隊打敗了土耳其人，一度占領了這兩個公國。在撤離之前，俄羅斯人并沒有要求奧斯曼帝國割讓大批土地，《庫楚克開納吉和約》規定俄羅斯取得黑海沿岸第聶伯河（Dnieper River）與布格河（Bug River）之間包括赫爾松（Kherson）港的一小塊地方，高加索的卡巴爾達（Kabarda）地區，以及克里米亞港口刻赤（Kerch）和艾尼卡勒（Enikale），即黑海與亞速海（Sea of Azov）交匯處。然而和約同時規定奧斯曼帝國必須放棄對克里米亞汗國的控制，讓那里的韃靼人獲得獨立。和約的另一項規定是準許俄羅斯船只自由通過土耳其境內連接黑海與地中海的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雖然俄羅斯沒有奪取大量領土，卻獲得了可觀的權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對奧斯曼帝國的事務進行干涉，保護生活在土耳其的東正教徒，這一情況后來對該地區產生了重大影響。根據《庫楚克開納吉和約》，俄羅斯把多瑙河流域的公國歸還給了奧斯曼帝國，但是在這些地方的東正教徒卻由俄羅斯負責保護。根據和約，俄羅斯獲準在君士坦丁堡修建一座東正教堂，對于俄羅斯來說，這象征著擁有了代表奧斯曼帝國內所有東正教徒的權利。和約還允許奧斯曼帝國境內的基督徒，包括希臘人、亞美尼亞人、摩爾達維亞人和瓦拉幾亞人可以在船只上懸掛俄羅斯旗幟，這讓俄羅斯能夠保護和推動其在貿易和宗教兩方面的利益。因為擔心歐洲列強的反應，俄羅斯不能直接并吞多瑙河流域的兩個公國，所以轉而向高門施加壓力，讓這兩個公國能成為在俄羅斯勢力影響下的半自治地區。俄羅斯希望這兩個公國會因為對東正教的虔誠，越來越向俄羅斯靠攏，以便削弱奧斯曼帝國的管制力，并保證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俄羅斯將在東南歐地區占主導地位。

在對土耳其戰爭中占了大便宜后，葉卡捷琳娜二世又開始與希臘人合作，宣稱有條約規定俄羅斯有權利也有義務保護希臘的東正教徒。她向希臘派出軍事代表，讓希臘人到俄羅斯軍事院校接受訓練，邀請希臘商人和海員到俄羅斯在黑海沿岸建設的新市鎮定居，讓希臘人覺得俄羅斯會支持他們對抗奧斯曼帝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她非常寵信的俄羅斯最高軍事首領格里戈里·波將金（Grigory Potemkin）親王同時也是一名政治家，在他的鼓動下，葉卡捷琳娜二世甚至夢想著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她可以在其廢墟之上重建拜占庭帝國。法國哲學家伏爾泰（Voltaire）在寫給她的信中，尊稱她為“希臘帝國女皇陛下”；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格林（Friedrich Grimm）男爵則在信中尊稱她為“希臘女皇”。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想象中，這個重建的古希臘帝國將是一個在俄羅斯庇護之下廣袤的東正教帝國，其子民說著拜占庭帝國時代的通用語言斯拉夫語。斯拉夫語是拜占庭帝國通用語言的說法是由俄羅斯第一位大歷史學家瓦西里·塔季謝夫（Vasily Tatishchev）提出的，但其實他是錯的。女皇給她第二個孫子起名為康斯坦丁（Constantine），與拜占庭帝國的第一位和最后一位君主同名。1779年康斯坦丁出生時，葉卡捷琳娜二世發行特制銀幣慶祝，銀幣上印著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亞大教堂（Hagia Sophia）。奧斯曼帝國占領君士坦丁堡之后，把這座宏偉的教堂改成了一座清真寺，但是在這枚特制銀幣上，圣索菲亞大教堂后的尖塔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其巨型穹頂上的一個東正教十字架。為了讓她的孫子將來成為重生的拜占庭帝國的統治者，葉卡捷琳娜二世從希臘的納克索斯（Naxos）請來奶媽教他希臘語，長大之后康斯坦丁的希臘語十分嫻熟。[[15]](#_15_W__Reddaway__Documents_of_Ca)

葉卡捷琳娜二世對這個“希臘計劃”到底有多認真，這一點從來都不是很清楚。1780年她的私人秘書，實質上的外交大臣別茲博羅德科（Bezborodko）子爵做了一份方案。根據這一宏大的方案，土耳其人將被全部趕出歐洲，空出的巴爾干地區將由俄羅斯和奧地利瓜分，然后“重建古希臘帝國”，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1781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和奧地利皇帝約瑟夫二世（Joseph II）討論了這一計劃，在第二年的書信來往中，他們同意這一計劃值得實施。但實際上，雙方是否真的打算付諸行動卻不是很明朗。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希臘計劃”不過是一種復古的想象，或是一場政治表演，并不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即使俄羅斯并沒有打算馬上行動，這一計劃依然顯示出葉卡捷琳娜二世的基本目標是讓俄羅斯成為黑海強國，通過貿易和宗教的紐帶，跟地中海東部，包括耶路撒冷在內的東正教地區連接起來。用葉卡捷琳娜二世喜歡的詩人，同時也是這一時期重要的俄羅斯政治家之一的加甫里爾·杰爾查文（Gavril Derzhavin）的話說，“希臘計劃”是為了：

推進圣戰，

滌蕩約旦河（Jordan River），

解放圣墓教堂，

把雅典歸還給雅典人，

把君士坦丁堡交給康斯坦丁

并重建雅弗（Japheth）[¶](#P___Sheng_Jing____Zhong_Nuo_Ya_D)的圣地。[\*\*](#___Gen_Ju_Zhong_Shi_Ji_E_Luo_Si)

《占領伊茲梅爾頌歌》（“Ode on the Capture of Izmail”）

葉卡捷琳娜二世和約瑟夫二世在大批隨從簇擁下共同巡視黑海港口時，顯然雙方并沒有把“希臘計劃”當作一場政治表演。女皇訪問了新建的俄羅斯市鎮和港口上的建筑工地，波將金還專門建了一座拱門獻給她，上面刻著“通往拜占庭之路”。[[16]](#_16_Davison__Essays_in_Ottoman_a)走過這道拱門，對女皇來說，顯示的是她的決心。

葉卡捷琳娜二世相信，要成為一個強國，俄羅斯必須轉向南方。自從中世紀莫斯科大公國起，俄羅斯就在北方通過波羅的海出口皮毛和木材，但這是不夠的。為了與歐洲列強競爭，俄羅斯必須為肥沃的南方出產的農產品找到一個出口途徑，這就必須在黑海沿岸的不凍港建立一個海軍基地，保障船只可以從那里出發駛向地中海。在地理位置上，黑海對俄羅斯來說極為關鍵，不僅因為這里是面對伊斯蘭世界的南疆，更因為它是保證俄羅斯成為歐洲強國的基礎。如果不能控制黑海，俄羅斯通往歐洲的唯一水路就只有波羅的海，而一旦發生沖突，波羅的海很容易被其他北歐強國封鎖（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波羅的海確實被英國封鎖了）。

把俄羅斯發展成為歐亞大陸南方強國的努力從1776年開始積極進行，那一年葉卡捷琳娜二世派波將金總領“新俄羅斯”（Novorossiia），即剛剛從奧斯曼帝國手中搶過來的黑海北部沿岸一塊人煙稀少的地方，命令他在此殖民。同時她把這里的許多土地分給了俄羅斯貴族，并邀請歐洲的東正教徒（德國人、波蘭人、意大利人、希臘人、保加利亞人還有塞爾維亞人）在大片的草原上定居從事農耕。一個個新的城市在這里建立起來：葉卡捷琳諾斯拉夫（Ekaterinoslav，意為“葉卡捷琳娜之榮耀”，今第聶伯羅，Dnipro）、赫爾松、尼古拉耶夫（Nikolaev）、敖德薩（Odessa）等，很多都是按法國和意大利的洛可可風格建造的。波將金親自監督葉卡捷琳諾斯拉夫的興建，將之建成一個希臘—羅馬式的夢想園地，以此來彰顯“希臘計劃”支持者們想象中的俄羅斯對古希臘的傳承。他想象出一批宏偉的新古典主義建筑，但其中很多都沒有成為現實。例如在寫給葉卡捷琳娜二世的信中，他設想將店鋪建成一個“半圓形，就像雅典的入口衛城山門（Propylaeum）”一般，或是建造一座“希臘和羅馬風格”的總督府邸、“古代圣殿”形狀的法庭、一座“模仿羅馬圣保羅大教堂”的教堂等。他在信中說，這將是“在您的關懷下，這里由一片荒蕪變成富足的花園，從野獸橫行變成宜居家園的見證”。[[17]](#_17_Montefiore__Prince_of_Prince)

敖德薩是俄羅斯南部皇冠上的明珠，其美麗的建筑風格應歸功于法國人黎塞留公爵（Duc de Richelieu），他在法國大革命后逃亡海外，在敖德薩做了多年的總督。不過敖德薩能夠成為一個重要的港口，則是希臘人的功勞。他們最早在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鼓勵下在這里定居，因為《庫楚克開納吉和約》給予了俄羅斯船隊在黑海與地中海之間自由航行的權利，敖德薩的重要性很快得以提升，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過去法國人在兩地貿易上的統治地位。

在對待克里米亞時，俄羅斯采取了不同的戰略。根據《庫楚克開納吉和約》，克里米亞汗國獲得了獨立，雖然奧斯曼帝國蘇丹以其伊斯蘭教宗教和政治最高領袖哈里發的身份，依然在名義上對這一地區擁有宗教權力。盡管在和約上簽了字，但奧斯曼帝國并不情愿接受克里米亞獨立這一事實，擔心它很快會像黑海北岸的其他地區一樣，被俄羅斯并吞。他們繼續據守第聶伯河口的奧恰科夫（Ochakov）要塞以防俄羅斯派兵干涉克里米亞半島，但是對于俄羅斯在政治和宗教上的滲透卻束手無策。

在和約簽署三年后，沙欣·格來（Şahin Giray）受推選成為克里米亞汗國的可汗。他是俄羅斯偏愛的人選，在威尼斯接受教育，已半西化了。之前帶領克里米亞代表團訪問圣彼得堡時，葉卡捷琳娜二世對他“愉悅的性格”和英俊的面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格來擁有克里米亞境內相當數量的基督教人口（包括希臘、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商人等）的支持。同時，生活在草原上的諾蓋（Nogai）游牧人口一向獨立于受奧斯曼帝國扶植的可汗，于是將沙欣·格來敬為他們的首領。但是奧斯曼帝國卻無法接受沙欣·格來，于是派出船隊把他們認可的可汗送到克里米亞取而代之，并鼓動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暴動反抗沙欣·格來這個“異教徒”。沙欣·格來逃離了克里米亞，但很快就帶兵返回，對叛亂的韃靼人進行瘋狂屠殺，其野蠻程度連俄羅斯人都看不下去了。在此之后，韃靼人在奧斯曼帝國的鼓勵下發動宗教戰爭，開始對克里米亞地區的基督徒進行報復，導致俄羅斯不得不協助大批基督教難民逃離當地，其中三萬人被轉移到了黑海沿岸的塔甘羅格（Taganrog）和馬里烏波爾（Mariupol），大部人無家可歸。

基督徒逃離克里米亞之后，當地經濟被嚴重削弱，沙欣·格來對俄羅斯的依賴更甚，俄羅斯開始施加壓力并吞克里米亞。為了趕在其他歐洲列強做出反應之前完成并吞，波將金一方面積極準備與奧斯曼帝國開戰，另一方面以優厚的待遇說服沙欣·格來退位。在沙欣·格來退位并移居圣彼得堡之后，波將金說服當地韃靼人向葉卡捷琳娜二世稱臣。他決心要把俄羅斯并吞克里米亞演得像是迫于當地人民的意愿一樣，于是在克里米亞到處舉辦儀式，讓韃靼人在毛拉[††](#___Mao_La__mullah__Mu_Si_Lin_Zon)的帶領下手持《古蘭經》向遠在千里之外的東正教女皇宣誓效忠，俄羅斯于1783年正式并吞了克里米亞。

對土耳其人來說，這是一場羞辱。這是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穆斯林的土地第一次被割讓給基督徒。高門的首相（Grand Vizier）雖然很不情愿，但還是接受了這一現實，可是其他人卻將這一失敗看作對奧斯曼帝國的致命打擊。他們指出俄羅斯將以克里米亞為基地攻擊君士坦丁堡和巴爾干地區，因此這些人鼓動奧斯曼帝國向俄羅斯開戰。但靠土耳其人獨自參戰是不現實的，西方列強介入的可能也不大：奧地利已和俄羅斯達成共識，等著奧斯曼帝國崩潰后瓜分土地；法國因為介入美國獨立戰爭而精疲力盡，無力向黑海派出艦隊；英國因為失去了美國，自己也傷痕累累，而且對這一事件并不關心，外交大臣格蘭瑟姆勛爵（Lord Grantham）的看法是“如果法國都沒什么動靜，我們為什么要摻和進去？現在不是再打一架的時候”。[[18]](#_18_Montefiore__Prince_of_Prince)

四年之后的1787年，葉卡捷琳娜二世巡視了新近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來的黑海沿岸市鎮。當時在高加索地區，土耳其人面臨繼續被俄羅斯蠶食土地的局面[‡‡](#_____E_Luo_Si_Yi_Zhi_Zai_Kuo_Zha)，她的巡視活動被視為一種挑釁。土耳其人終于無法忍受了，在與普魯士（Prussia）有結盟可能的情況下，奧斯曼帝國內部主戰派占了上風，向俄羅斯宣戰。戰爭爆發后，奧地利立刻向奧斯曼帝國宣戰，奧斯曼帝國不得不兩面作戰。一開始還取得一些勝利，在多瑙河戰線上迫使奧地利撤至巴納特（Banat）。但是普魯士遲遲沒有給予增援，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奧恰科夫要塞在經過漫長的圍困之后，終于被俄羅斯軍隊占領。接著貝爾格萊德和多瑙河流域各公國在奧地利軍隊的反擊下失守，同時俄羅斯軍隊占領了多瑙河入海口一帶的要塞。在不利的戰局面前，奧斯曼帝國不得不請求停戰。到1792年《雅西和約》（Treaty of Iaşi）簽署時，奧斯曼帝國名義上重新取得了多瑙河流域各公國的控制權；但是奧恰科夫要塞被割讓給了俄羅斯，德涅斯特河（Dniester River）成了俄土邊境線，土耳其人還不得不正式承認克里米亞是俄羅斯的一部分。但是他們從未完全接受這一損失，一直在等待復仇的機會。

\* \* \*

在俄羅斯與周邊伊斯蘭國家的宗教戰爭中，黑海地區的伊斯蘭文化一直被認為是很大的威脅。俄羅斯統治者擔心“伊斯蘭軸心”，即在土耳其人領導下的泛穆斯林聯盟會給俄羅斯南疆帶來危險。這一地區的穆斯林人口增長迅速，一方面是由于高出生率，另一方面是因為游牧民族轉信伊斯蘭教。為了保證俄羅斯帝國對這些人煙稀少的邊疆地區的控制，在19世紀初期，俄羅斯啟動了新的南部邊疆戰略，即驅逐穆斯林人口，鼓勵基督徒在這片新占領的土地上殖民定居。

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離多瑙河不過幾公里遠，在1806—1812年間的俄土戰爭中被俄羅斯占領，1812年《布加勒斯特條約》（Treaty of Bucharest）正式將其劃給了俄羅斯，并聲明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對多瑙河流域各公國共同擁有主權。沙皇派到比薩拉比亞的總督將當地穆斯林人口全部趕走，幾千名韃靼農民被當作戰俘送往俄羅斯，肥沃的土地則被摩爾達維亞人、瓦拉幾亞人、保加利亞人、魯塞尼亞人（Ruthenians）和希臘人占領。為了吸引移民，俄羅斯政府采用了給予稅收優惠、免于兵役、給技術工匠貸款等方式。因為急于讓更多人口搬到這里，沙皇政府甚至對逃亡而來的烏克蘭和俄羅斯農奴睜一只眼閉一只眼。1812年后，逃到這里來的農奴越來越多。興建教堂的活動十分活躍，在基什尼奧夫（Kishinev）教區建立之后，當地的宗教領袖就被納入了俄羅斯而不是希臘的東正教體系。[[19]](#_19_G__Jewsbury__The_Russian_Ann)

俄羅斯對高加索的征服也是其宗教戰爭的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這是一場對車臣人（Chechens）、印古什人（Ingush）、切爾克斯人（Circassians）和達吉斯坦人（Daghestanis）等高加索地區穆斯林山林部落進行基督教化的戰爭。這些穆斯林部落多為遜尼派（Sunni），他們極其抗拒任何世俗政治勢力的控制，但在宗教上認可奧斯曼帝國蘇丹為哈里發。1816年俄羅斯任命亞歷山大·葉爾莫洛夫（Alexander Ermolov）將軍擔任格魯吉亞總督。在他的領導下，俄羅斯軍隊發動了一場殘酷恐怖的戰爭，襲擊村莊、焚燒房屋、毀壞莊稼、鏟平森林，試圖以此征服山林部落，卻并未成功達到目的。俄羅斯軍隊的燒殺搶掠反而讓當地部落組織起來，共同對抗俄軍，這些抵抗運動很快形成了獨特的宗教特征。

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支宗教勢力是穆里德派（Muridism），來自納格什班底耶（蘇菲）（Naqshbandiya[Sufi]）派別。他們于1810年代開始在達吉斯坦興起，后傳到車臣（Chechnya），在伊瑪目加齊·穆罕默德（Imam Ghazi Muhammad）的領導下發起一場“圣戰”（jihad）保衛伊斯蘭法以及伊斯蘭教的純潔性。穆里德派把針對俄羅斯異教徒的宗教戰爭和針對王公貴族的社會仇恨結合在一起，號召力非常強。過去山地部落間矛盾沖突重重，在穆里德派的旗幟下，這些部落團結在了一起，伊瑪目因此可以開始征稅并實行兵役制。伊瑪目的指令通過穆里德（意為宗教信徒）執行，后者在由反抗運動控制的山村擔任地方官員和法官等。

抵抗運動越是宗教化，俄羅斯入侵高加索的行動也就越具有宗教戰爭色彩。對高加索地區實行基督教化是俄羅斯打這場戰爭的首要目的之一，因此俄羅斯拒絕與反抗運動的穆斯林領導層談判。一份俄羅斯官方文件這樣寫道：“只有當十字架插遍山巒峽谷，清真寺變成救世主基督的教堂后，我們和對方之間才談得上全面和解。在那之前，軍事力量是我們統治高加索的真正基礎。”每到一處，俄羅斯人就摧毀清真寺并嚴厲限制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引發最強烈抗議的是不允許穆斯林到麥加和麥地那（Medina）朝圣。在許多地方，俄羅斯的政策是拆毀穆斯林定居點，把山地部落趕到別處，再把他們的土地交給基督教定居者，這一政策在今天看來就是“種族清洗”。在庫班（Kuban）和北高加索地區，穆斯林部落被斯拉夫定居者取而代之，主要是來自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農民以及哥薩克人（Cossacks）。在南高加索的部分地區，信奉基督教的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人與入侵的俄羅斯軍隊站在一邊，共同分享勝利果實。例如在征服占賈（Ganja）汗國的戰斗中，格魯吉亞人參加俄羅斯軍隊做輔助工作。當地穆斯林在宗教迫害下紛紛逃離，俄羅斯就鼓勵格魯吉亞人占據那些被穆斯林拋棄的土地，后來這個地方被改名為伊麗莎白托波爾（Elizavetopol）。又如在埃里溫省（Erivan），大致相當于今天的亞美尼亞，原來的居民以土耳其穆斯林為主，在1828—1829年間的俄土戰爭中，俄羅斯從這里驅逐了約兩萬六千名穆斯林，在以后的十年中，差不多兩倍的亞美尼亞人移民到了這里。[[20]](#_20_M__Gammer__Muslim_Resistance)

然而，在俄羅斯對南部邊疆的擴張行動中，宗教色彩最強的還是在克里米亞。這里本身就有著漫長而復雜的宗教歷史。對俄羅斯人來說，這是一塊圣地。根據俄羅斯編年史，公元988年，基輔大公（Grand Prince of Kiev）弗拉基米爾（Vladimir）在克里米亞西南岸一座希臘人建的殖民城市赫爾松涅索斯（Khersonesos），也就是現代塞瓦斯托波爾城外某處接受洗禮，從而把基督教帶到了基輔羅斯人中。但是克里米亞又是其他許多人的家園，其中有西徐亞人（Scythians）、羅馬人、希臘人、熱那亞人（Genoese）、猶太人、亞美尼亞人、蒙古人（Mongols）和韃靼人。克里米亞位于基督教勢力與穆斯林和說土耳其語的部落之間的歷史分界線上，一直是各方爭奪之地，經歷過無數戰爭。宗教建筑和神廟等本身都成了戰場，因為在把原來的人口趕走之后，新來的居民往往把宗教建筑也占為己有。例如，在海濱城市蘇達克（Sudak）有一座圣馬太教堂（St Matthew church），最早是一座清真寺；后來被希臘人搗毀，重建為一座東正教堂；13世紀熱那亞人來到這里后將其改建成一座天主教堂；再后來又被奧斯曼人重新改回清真寺；而在俄羅斯并吞克里米亞之后，又再次被改建成一座東正教堂。[[21]](#_21_M__Kozelsky___Introduction)

俄羅斯并吞克里米亞之后，這里的三十萬居民都成了沙皇臣民，他們幾乎都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韃靼人和諾蓋人。俄羅斯試圖收買當地的貝伊（bey）[§§](#SSSS_Bu_Luo_Shou_Ling_______Yi_Z)和米爾扎（mirza）[¶¶](#PP_Gao_Deng_Gui_Zu___Qin_Wang_De)等貴族，勸說他們改信基督教并給他們封銜，但無人響應。這些貴族的勢力與他們擁有的土地和所屬的部落密切相關，帝國官銜或是政府內的一官半職對他們來說沒有什么意義。如果能保住土地的話，他們是不會離開自己的地盤去做官的。他們和奧斯曼帝國之間在宗教、貿易和親屬關系上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許多人在俄羅斯并吞克里米亞之后就離開這里去奧斯曼帝國了。

和貴族相比，俄羅斯對韃靼農民的政策就粗暴得多了。克里米亞本來沒有農奴制，韃靼農民的自由身份被俄羅斯帝國認可，把他們定位為“官定農民”（state peasants），一個有別于農奴的法律類別。但是在宗教上，他們繼續將奧斯曼帝國蘇丹認作哈里發，作為每周五祈禱的對象。俄羅斯人將此視作一種挑釁，懷疑這些沙皇新臣民的忠實度。在整個19世紀，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發生過多次戰爭，俄羅斯人總是很擔心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會發生暴動。他們認定韃靼農民祈禱的是土耳其人的勝利，期望土耳其人來解放自己。然而事實上，直到克里米亞戰爭前，這里的穆斯林人口一直是效忠沙皇的。

認定韃靼人不可信任后，俄羅斯人就想盡辦法把這些沙皇的新臣民趕走。韃靼人第一次大批逃離克里米亞是在1787—1792年的俄土戰爭期間，大部分人因為擔心俄羅斯報復而逃離，同時沙皇的政策，包括奪取土地、高昂稅收、強制征用勞力，以及哥薩克騎兵的欺凌，也讓他們難以留戀這里。到了1800年，近三分之一的韃靼人口，約十萬人，已經移居奧斯曼帝國，另有一萬人在1806—1812年間的俄土戰爭爆發時離開。填補人口空缺的是來自俄羅斯的定居者，以及從奧斯曼帝國逃出來的基督教難民，包括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等。韃靼穆斯林從克里米亞遷出是穆斯林逐漸退出歐洲的開始，在這之后的漫長歷史中，奧斯曼和東正教地區之間人口遷徙以及種族沖突頻頻發生，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的巴爾干危機。[[22]](#_22_K__O_Neill___Between_Subvers)

克里米亞的基督教化過程同時體現在教堂和宮殿的宏大設計以及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城市上，穆斯林居住過的痕跡則同時被抹去了。葉卡捷琳娜二世把克里米亞想象成俄羅斯南部的天堂，一座享樂花園，她統治下的開化社會的種種成績可以在這里向世人展示并發揚光大。克里米亞（Crimea 或Krym）是該半島的韃靼名字，但她喜歡用其希臘名字塔夫利（Taurida）來稱呼它，因為她認為這塊土地將俄羅斯與拜占庭的古希臘文明連接在了一起。她把大批土地送給俄羅斯貴族，讓他們在南部邊疆的海岸山嶺上建起一座又一座壯美的莊園，媲美意大利南部的阿馬爾菲（Amalfi）海岸。在她眼中，在這片曾經被異教徒占據的土地上建起的各種古典風格的建筑、地中海式花園和葡萄園，將承載起一個新的基督教文明。

克里米亞的城市規劃也加強了俄羅斯人的統治地位。韃靼人聚居的古鎮，例如原來克里米亞汗國的首都巴赫奇薩賴（Bakhchiserai），就被降級或者干脆廢棄了。在民族混居的市鎮，例如錫奧多西亞（Theodosia）[\*\*\*](#____Jin_Fei_Ao_Duo_Xi_Ya__Feodos)或是俄羅斯行政中心辛菲羅波爾（Simferopol），政府則逐漸重新布局，將市鎮中心從韃靼人聚居的老城轉移到建有俄羅斯教堂和政府建筑的新區。在新建的市鎮，例如俄羅斯海軍基地塞瓦斯托波爾，則整個地區都是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23]](#_23_A__Schonle___Garden_of_the_E)

建造教堂是相對緩慢的過程，在克里米亞的許多市鎮和鄉村，清真寺依然在天際線上十分突出。但是在19世紀早期，俄羅斯開始積極尋找古代基督教、拜占庭、苦行僧的洞窟教堂以及修道院遺址等等，試圖找到證據證明克里米亞是基督教的圣地、俄羅斯的阿索斯山（Mount Athos）[†††](#____Gu_Xi_La_De_Sheng_Shan)、斯拉夫基督教的搖籃、信徒們的朝圣之地。[[24]](#_24_M__Kozelsky__Christianizing)

克里米亞最神圣的地方，當然是赫爾松涅索斯遺址，在1827年通過官方主持的挖掘工作發現。在這個基輔大公帶領基輔羅斯人信奉基督教的象征性地點上，俄羅斯人建起了一座圣弗拉基米爾教堂（Church of St. Vladimir）。然而，離這座神殿不過幾米遠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亞戰爭中法國軍隊登陸扎營的所在，這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嘲弄。

[\*](#_6) 帕夏是敬語，相當于英國的“勛爵”，是奧斯曼帝國行政系統里的高級官員。——編注

[†](#_7) 該清真寺位于圣墓教堂旁邊。——譯注

[‡](#_10) 庫楚克開納吉就是今天保加利亞東北部城市凱納爾賈。——編注

[§](#SS) 即路易·拿破侖·波拿巴，1852年稱帝，尊號為拿破侖三世。——編注

[¶](#P) 《圣經》中諾亞的第三個兒子。——譯注

[\*\*](#_16) 根據中世紀俄羅斯編年史，在《創世紀》中記載的大洪水之后，羅斯（Rus）部落，即俄羅斯人的祖先，是定居在雅弗土地上的部落之一。——原注

[††](#_18) 毛拉（mullah），穆斯林宗教和圣法的教師。——譯注

[‡‡](#_19) 俄羅斯一直在擴張捷列克河（Terek River）沿岸的要塞系統（稱為“高加索防線”），并在剛成為俄羅斯保護地的格魯吉亞卡特利—卡赫季（Kartli-Kacheti）王國建立針對奧斯曼帝國的行動基地，占領第比利斯（Tbilisi）并為連接俄羅斯和高加索南部的格魯吉亞軍事公路打下了基礎。——原注

[§§](#SSSS) 部落首領。——譯注

[¶¶](#PP) 高等貴族、親王等的頭銜。——譯注

[\*\*\*](#_23) 今費奧多西亞（Feodosia）。——編注

[†††](#_24) 古希臘的圣山。——譯注

注釋

[[1]](#_1_1)FO 78/446, Finn to Aberdeen, 27 May 1846; 78/705 Finn to Palmerston, 5 Apr. 1847; H. Martineau, Eastern Life: Present and Past, 3 vols. (London, 1848), vol. 3, pp. 162–5.

[[2]](#_2_1)FO 78/446, Finn to Aberdeen, 27 May 1846; 78/705 Finn to Palmerston, 5 Apr. 1847; H. Martineau, Eastern Life: Present and Past, 3 vols. (London, 1848), vol. 3, pp. 120–21.

[[3]](#_3_1)FO 78/368, Young to Palmerston, 14 Mar. 1839.

[[4]](#_4_1)引用參見D. Hopwood,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1969), p. 9.

[[5]](#_5_1)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1, pp. 42–3; N. Shepherd, The Zealous Intruders: The Western Rediscovery of Palestine (London, 1987), p. 23; Martineau, Eastern Life, vol. 3, p. 124; R. Curzon, Visits to Monasteries in the Levant (London, 1849), p. 209.

[[6]](#_6_1)FO 78/413, Young to Palmerston, 29 Jan. and 28 Apr. 1840; 78/368, Young to Palmerston, 14 Mar. and 21 Oct. 1839.

[[7]](#_7_1)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ée, 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 23.

[[8]](#_8)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2 vols. (London, 1878), vol. 1, pp. 57–8, 76.

[[9]](#_9)FO 78/705, Finn to Palmerston, 2 Dec. 1847.

[[10]](#_10_1)關于對條約內容的不同詮釋，參見R. H. Davison, 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1774–1923: The Impact of the West (Austin, Tex., 1990), pp. 29–37.

[[11]](#_11)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aris, 1896), p. 225; L. Thouvenal, Nicolas Ier et Napoléon III: Les pre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2–1854 (Paris, 1891), pp. 7–8, 14–16, 59.

[[12]](#_12)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3–1856 (Paris, 1995), p. 69;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76, 82–3; 496 notes to pp. 10–22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17–18.

[[13]](#_13)A. Ubicini, Letters on Turkey, trans. Lady Easthope,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18–22.

[[14]](#_14)S. 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The Life of Potemkin (London, 2000), pp. 244–5.

[[15]](#_15)W. Reddaway, Document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Cambridge, 1931), p. 147; Correspondence artistique de Grimm avec Catherine II, Archives de l’art francais, nouvelle periode, 17 (Paris, 1932), pp. 61–2; The Life of Catherine II, Empress of Russia, 3 vols. (London, 1798), vol. 3, p. 211; The Memoirs of Catherine the Great (New York, 1955), p. 378.

[[16]](#_16_1)Davison, 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p. 37; H. 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of Conqu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d.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83–5; V.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2007), pp. 160–1.

[[17]](#_17)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pp. 274–5.

[[18]](#_18_1)Montefiore, Prince of Princes, pp. 246–8.

[[19]](#_19_1)G. Jewsbury,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Bessarabia: 1774–1828. A Study of Imperial Expansion (New York, 1976), pp. 66–72, 88.

[[20]](#_20)M.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ya and Dagestan (London, 1994), p. 44; J.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 1995), pp. 30–2.

[[21]](#_21)M. Kozelsky, ‘Introduction’, unpublished MS.

[[22]](#_22)K. O’Neill, ‘Between Subversion and Submissi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Crimean Khanate into the Russian Empire, 1783–1853’, Ph.D. diss., Harvard, 2006, pp. 39, 52–60, 181; A. Fisher,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1772–1783 (Cambridge, 1970), pp. 144–6; M. Kozelsky, ‘Forced Migration or Voluntary Exodus? Evolution of State Policy toward Crimean Tatar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unpublished paper; B. Williams, ‘Hijra and Forced Migration from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to the Ottoman Empire’, Cahiers du monde russe, 41/1 (2000), pp. 79–108; M. Pinson, ‘Russian Policy and the Emigration of the Crimean Tatars to the Ottoman Empire, 1854–1862’, Guney-Dogu Avrupa Arastirmalari Dergisi, 1 (1972), pp. 38–41.

[[23]](#_23_1)A. Schonle, ‘Garden of the Empire: Catherine’s Appropriation of the Crimea’, Slavic Review, 60/1 (Spring 2001), pp. 1–23; K. O’Neill, ‘Constructing Russian Identity in the Imperial Borderland: Architecture, Isla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imean Landscape’, Ab Imperio, 2 (2006), pp. 163–91.

[[24]](#_24_1)M. 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chap. 3; id., ‘Ruins into Relics: The 497 notes to pp. 23–37 Monument to Saint Vladimir on the Excavations of Chersonesos, 1827–57’, Russian Review, 63/4 (Oct. 2004), pp. 655–72.

# 第二章 東方問題

奧斯曼帝國的蘇丹騎著一匹白馬走在隊伍前面，徒步緊隨其后的是一隊大臣和高官。在轟鳴的禮炮聲中，他們穿過托普卡帕皇宮（Topkapi Palace）的帝國門（Imperial Gate），步入君士坦丁堡7月午時的驕陽之中。這一天是1849年7月13日星期五，伊斯蘭齋月（Ramadan）的第一天，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一世（Abdülmecid）正在前往圣索菲亞大清真寺的路上。這座大清真寺多年疏于維護，因此在過去兩年間一直閉門進行緊急修復，而這一天正是重開之日。圣索菲亞大清真寺是一座長方形廊柱大廳式建筑，曾為東正教堂。大清真寺北面廣場上聚集著大量人群，在那里蘇丹的母親、子女、妃子們坐在鑲金的馬車里等待他的到來。蘇丹騎馬穿過人群，來到大清真寺的入口，在此恭候的是伊斯蘭教的高級神職人員。根據伊斯蘭傳統，非穆斯林不能參加這樣的慶典，但今天有所例外，在恭候的人群中有兩位瑞士建筑師加斯帕雷·福薩蒂（Gaspare Fossati）和朱塞佩·福薩蒂（Giuseppe Fossati），這兩兄弟是修復大清真寺的負責人。

福薩蒂兄弟把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請進了大清真寺，在穿過幾個私人專用廳堂之后，來到了主禱堂上蘇丹的專用包廂里。根據蘇丹的指令，福薩蒂兄弟已將主禱堂重建并重新修復成后拜占庭風格，在入口上方刻著蘇丹的徽章。當參加慶典的人群全部進入主禱堂之后，伊斯蘭教總長老（Sheikh ül-Islam）開始主持祭禮。總長老是奧斯曼帝國時期的最高宗教官員，許多歐洲游客錯誤地將這一職位等同于天主教教皇。[[1]](#_1_R__Nelson__Hagia_Sophia__1850)

這一幕非同尋常，世界上最大穆斯林帝國的蘇丹哈里發率領宗教領袖們慶祝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重新開放，而這座清真寺原來卻是一座東正教大教堂，被土耳其人改成清真寺，現在又由兩名西方建筑師按原來的拜占庭風格裝修復原。在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奧斯曼人把圣索菲亞的大鐘取下，在四角上新建了尖塔。他們把教堂內的祭壇和圣像搬走，而且在之后的兩百年間，逐漸把內部的拜占庭鑲嵌畫用石膏抹上蓋住。直到1848年福薩蒂兄弟奉命修復圣索菲亞時，才在墻壁的石膏鋪面下發現了這些鑲嵌畫。他們先將北邊走廊拱頂處的鑲嵌畫清理出來一部分，蘇丹察看之后對其鮮艷的色彩大為贊賞，下令將所有被石膏抹上的鑲嵌畫恢復出來，于是這座大清真寺被掩藏的基督教原畫終于得以重見天日。

福薩蒂兄弟意識到這一發現意義重大，他們用素描和水彩畫的形式將這些拜占庭式的鑲嵌畫記錄下來，呈給沙皇，希望能得到資助出版這些作品。兩人曾在圣彼得堡工作過，哥哥加斯帕雷原來是被派到君士坦丁堡修建俄羅斯大使館的，弟弟朱塞佩后來加入。1845年，一座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大使館完工了。這一時期許多歐洲建筑設計師在君士坦丁堡工作，大部分負責興建外國大使館。當時年輕的蘇丹支持一系列西方自由主義改革，對西方的影響敞開大門，希望能借此實現經濟現代化。1845—1847年間，蘇丹雇用福薩蒂兄弟為君士坦丁堡大學興建了一座巨大的三層樓建筑。這座典型新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筑位于兩座大清真寺，即圣索菲亞和蘇丹艾哈邁德（Sultan Ahmet）清真寺之間，顯得十分別扭。1936年毀于一場大火。[[2]](#_2_R__Nelson__Hagia_Sophia__1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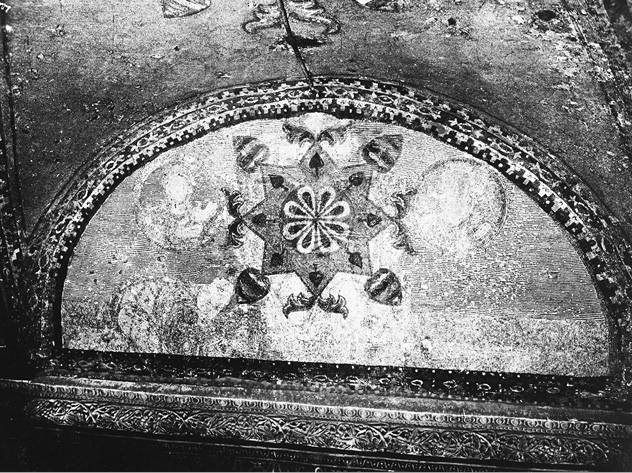


圣索菲亞大清真寺，詹姆斯·羅伯遜攝，1855（圖片來源：諾丁漢大學文稿和特色藏品，編號Ne C 10884/2/38）

沙皇尼古拉一世對福薩蒂兄弟的發現一定非常興奮，因為圣索菲亞大教堂是沙皇俄國宗教生活的聚焦點，而俄羅斯本身就以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傳承者自居。圣索菲亞是俄羅斯教堂之母，也是俄羅斯與東地中海巴勒斯坦圣地的東正教世界之間的紐帶。根據公元7世紀僧侶編撰的基輔羅斯人歷史《原初編年史》（Primary Chronicle），俄羅斯信奉東正教，正是因為被圣索菲亞的華美所傾倒。當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派出使者前往各國為羅斯人尋找“真正的信仰”。前往君士坦丁堡的使者匯報說：“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間還是天堂，因為人間不可能有這般絢麗輝煌的景象，語言已無法形容。我們只知道上帝一定住在其中，這里的慶典比其他國家更為華美，我們無法忘懷其美麗。”[[3]](#_3_N__Teriatnikov__Mosaics_of_Ha)在整個19世紀，重新奪回圣索菲亞一直是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宗教領袖的長期基本目標。他們夢想著征服君士坦丁堡，將其重建為疆土從西伯利亞一直覆蓋到巴勒斯坦圣地的俄羅斯帝國的首都“沙皇格勒”（Tsargrad）。用著名俄羅斯傳教士、1847年率宗教使團前往耶路撒冷的阿希曼德里特·烏斯片斯基（Archimandrite Uspensky）的話說：“俄羅斯自古以來就接受天命，啟迪亞洲，聯合斯拉夫人。所有的斯拉夫人，不管是來自亞美尼亞、敘利亞還是阿拉伯、埃塞俄比亞，都將團結在一起，在圣索菲亞為上帝高唱贊歌。”[[4]](#_4_T__Stavrou___Russian_Policy_i)

福薩蒂兄弟向尼古拉一世請求資助出版他們的畫作，但沙皇沒有答應。圣索菲亞大清真寺在奧斯曼帝國——這個建立在原拜占庭帝國疆域之上的帝國——享有極高的宗教和政治地位，盡管沙皇對這些畫作非常感興趣，卻認為俄羅斯當時還不宜卷入其中。但是領導和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東正教徒是俄羅斯自我授予的宗教使命，中心任務之一就是重新奪回圣索菲亞，將其恢復為東正教的教堂之母，同時把君士坦丁堡變成一個擁有從莫斯科到耶路撒冷廣大土地的東正教帝國的首都。正是這份使命感引發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的沖突，最終導致了克里米亞戰爭。

福薩蒂兄弟的素描和水彩畫要在十幾年后才得以出版，但是在1854年，由德國考古學家威廉·扎爾貝格（Wilhelm Salzenberg）臨摹的部分鑲嵌畫在柏林出版了，資助方是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他的妹妹就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皇后。[[5]](#_5_Nelson__Hagia_Sophia__p__33)通過這些臨摹的繪畫，19世紀的人們才知道在圣索菲亞內原來還藏著這樣的基督教寶藏。在蘇丹的命令下，純粹裝飾性的鑲嵌畫得以繼續展示，但是那些有人像的鑲嵌畫則被重新抹上石膏，因為伊斯蘭教不允許人像的存在。福薩蒂兄弟甚至還在這些新抹的石膏上作畫，保證和其他保留下來的鑲嵌畫風格一致。



圣索菲亞君王門上方的鑲嵌畫，P.伊斯坎德爾攝，1932（版權所有：敦巴頓橡樹園田野檔案和圖片收藏，華盛頓特區）

這些拜占庭鑲嵌畫的命運代表了奧斯曼帝國內穆斯林和基督教文化之間的交纏與競爭。在19世紀初，奧斯曼帝國是一個龐大的多民族國家，覆蓋從巴爾干到波斯灣，從亞丁（Aden）到阿爾及利亞的廣大地區，人口達三千五百萬。穆斯林是其中的大多數，約占60%，幾乎都居住在土耳其的亞洲地區、北非和阿拉伯半島，但其中土耳其人并不占多數，約為一千萬人，集中在安納托里亞。在奧斯曼人從原拜占庭帝國手中奪下的歐洲疆土上，大部分人口是東正教徒。[[6]](#_6_A__Ubicini__Letters_on_Turkey)

自從14世紀奧斯曼帝國建立以來，奧斯曼王朝的統治正當性一直都建立在通過圣戰不斷擴展伊斯蘭疆土上。但是奧斯曼人是現實主義者，并非宗教極端分子。在他們統治下的歐洲地區，是奧斯曼帝國內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方，所以他們在宗教上雖然敵視異教徒，但還是采取了較為現實的政策，以保證獲得最大利益。他們對非穆斯林征收額外的賦稅，將其視為下等的“野獸”（rayah），使之蒙受各種羞辱，例如在大馬士革（Damascus），基督徒不允許騎任何動物。[[7]](#_7_D__Hopwood__The_Russian_Prese)但是奧斯曼帝國統治者允許異教徒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一般不對他們進行迫害或強制其信奉伊斯蘭教。奧斯曼帝國還通過“米利特”（millet）制度[\*](#__MilletWei_Tu_Er_Qi_Yu__Zhi_Tu)進行宗教隔離，讓宗教領袖在自己的教會內部行使權力，甚至允許非穆斯林擁有一定的自治權。

這一制度是奧斯曼帝國在新征服的土地上對大批非穆斯林人口進行管理的一種辦法。只要非穆斯林宗教領袖效忠奧斯曼帝國，他們就可以在某些方面保留一定的自主權，包括教育、公共秩序、司法、稅收、慈善和宗教事務等，但是需要獲得蘇丹手下的宗教官員批準（即使是維修教堂屋頂這樣的事情）。米利特制度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方便了管理，但同時也強化了奧斯曼帝國內部種族和宗教的等級劃分，也就是說穆斯林的位置處于其他所有米利特，包括東正教、亞美尼亞的格雷戈里安教會（Gregorian Armenian）[†](#__Zheng_Shi_Ming_Cheng_Wei_Ya_Me)、天主教和猶太教之上，鼓勵穆斯林對基督徒和猶太人進行歧視；另一方面，這一制度導致非穆斯林教眾通過米利特表達怨恨，組織抗爭，成為奧斯曼帝國不穩定因素的主要源頭。

這一問題在東正教徒中最為明顯。東正教米利特是奧斯曼帝國中最大的一個米利特，擁有一千萬人口。東正教駐君士坦丁堡牧首是他們的最高領袖，代表了安條客（Antioch）、耶路撒冷和亞歷山大（Alexandria）的牧首。在許多世俗事務上，他是“希臘人”（奧斯曼帝國統治者眼中所有的東正教徒，包括斯拉夫人、阿爾巴尼亞人、摩爾達維亞人和瓦拉幾亞人）的真正負責人，在穆斯林和天主教徒面前維護東正教徒的利益。東正教會被勢力強大的法納爾人（Phanariots）控制，法納爾人由一批希臘（包括希臘化的羅馬尼亞人和阿爾巴尼亞人）商人家族組成，最早定居在君士坦丁堡的法納爾（Phanar）地區，因此得名。自18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政府內的通事（dragoman），包括外事秘書和翻譯等，大部分都是法納爾人。他們還買來了其他許多高級職位，控制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東正教會并擔任都督（hospodar）。法納爾人自認為是拜占庭帝國的繼承人，想要通過控制東正教會來推動并實現其希臘復國的夢想。他們希望能得到俄羅斯的幫助，但是對俄羅斯東正教會的活動十分戒備。俄羅斯人支持保加利亞教士作為斯拉夫人的代表，對抗控制了君士坦丁堡東正教會的希臘人。俄羅斯覬覦奧斯曼帝國的野心也讓法納爾人十分擔憂。

在19世紀之初的二十多年里，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本地教會勢力慢慢擴大，重要性逐漸提高，在君士坦丁堡取得了與被希臘人把持的東正教會同等的地位。許多斯拉夫人無法接受希臘人控制他們的教育和司法事務，于是越來越期望通過本地教會實現他們的民族身份，抗衡土耳其人。民族主義力量在巴爾干地區各類人群，包括塞爾維亞人、黑山人（Montenegrins）、保加利亞人、摩爾達維亞人、瓦拉幾亞人以及希臘人中都非常強大，他們各自通過語言、文化和宗教上的認同團結在一起，試圖擺脫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塞爾維亞人首先獲得解放，1804—1817年間，他們在俄羅斯的資助下起來反抗。土耳其人先是不得不讓塞爾維亞自治，最終承認塞爾維亞公國，他們擁有了自己的憲法并建立了由奧布雷諾維奇（Obrenović）家族領導的議會。此時奧斯曼帝國已搖搖欲墜，巴爾干地區其他種族獲得類似的自由已是遲早的事。

\* \* \*

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夕，俄國沙皇把奧斯曼帝國稱為“歐洲病夫”（sick man of Europe），這一觀點并不新鮮，很早以前就有許多人相信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塞爾維亞大公在1838年曾對英國領事說：“土耳其已支撐不住了，馬上就會倒下。其對各個省份管理上的錯失所引起的叛亂將導致自己的滅亡。”[[8]](#_8_S__Pavlowitch__Anglo_Russian)

奧斯曼帝國在管理上的錯失，其根源在于無法適應現代世界。勢力強大的宗教領袖如穆夫提（mufti）[‡](#___Yi_Wei_Jiao_Fa_Chan_Shu_Ren)和烏理瑪（ulema）[§](#SS_Yi_Si_Lan_Guo_Jia_You_Ming_Wa)之流讓改革停滯不前。伊斯蘭宗教機構的格言是“不要攪亂已有的規矩，不要向異教徒借東西，教義不允許這么做”，他們關心的是蘇丹頒布的法令是否符合《古蘭經》的教義。在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地區，對西方知識和技術的引進十分緩慢：商業貿易由非穆斯林（基督徒和猶太人）控制；直到1720年代才成立第一家土耳其語出版社；一直到1853年，在君士坦丁堡學習傳統伊斯蘭法和教義的學生人數，依然是在現代學校中學習世俗化課程人數的五倍。[[9]](#_9_F__Bailey__British_Policy_and)

經濟停滯不前的同時，官僚腐敗也極為盛行。在各個省份，通過買官貪污稅收的現象非常普遍，文武官員把自己管理的地區視為封地，極盡盤剝之能事。只要他們能繼續向高門進貢，與債主分贓，沒人關心他們是用了怎樣的殘暴手段把錢收上來的。奧斯曼帝國財政收入的一大部分來自非穆斯林人口，他們缺乏法律保護，無權在伊斯蘭法庭上為自己申訴，也沒人會聽基督徒的陳詞。據估計，在19世紀早期，一個普通的基督教農民或商人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一半以上繳給奧斯曼帝國。[[10]](#_10_W__Miller__The_Ottoman_Empir)

不過奧斯曼帝國衰亡的最主要原因還是軍事上的落后。在19世紀初，土耳其軍隊規模龐大，維持這支軍隊的經費可高達奧斯曼帝國財政支出的70%，但是與歐洲國家以征兵制建立的現代軍隊相比，它依然十分落后。土耳其軍隊缺乏中央化管理和指揮架構，也沒有軍事院校，部隊缺乏訓練，打仗仍舊依賴雇傭兵、非常規軍隊和邊遠地區的部落武裝。軍事改革迫在眉睫，特別是在土耳其軍隊多次被俄羅斯軍隊打敗，接著埃及又被拿破侖占據之后，一些蘇丹和他們的大臣也認識到了這一點。但是要建立一支現代軍隊，就必須對奧斯曼帝國進行根本性改革，建立中央集權制度控制地方省份，還會觸犯四萬名禁衛軍（janizaries）的利益——這些軍人由蘇丹出錢供養，代表了整個過時的軍事傳統，抵觸一切改革。[[11]](#_11_V__Aksan__Ottoman_Wars_1700)

蘇丹塞利姆三世（Selim III，1789—1807在位）是第一個意識到必須讓陸軍和海軍實現西方化的蘇丹。他的軍事改革議程在法國人的指導下進行。在18世紀晚期的幾十年中，法國人在奧斯曼帝國很有影響力，主要原因是法國的對手——奧地利和俄羅斯兩國都是奧斯曼帝國的敵人。塞利姆的軍隊現代化概念與俄羅斯彼得大帝在18世紀早期實行的軍隊西方化方案相似，土耳其人對此十分明了。他們做的只是引進西方新技術和做事辦法，但是絕不會學習任何可能威脅伊斯蘭權威的文化理念。土耳其人請法國人來指導軍隊現代化的部分原因，是想當然地認為法國是歐洲國家中宗教化程度最低的，既然如此，法國對伊斯蘭的威脅也就最低了，對法國的這一印象來自雅各賓黨人（Jacobins）的反宗教政策。

塞利姆的改革在禁衛軍和伊斯蘭教士們的聯合抵制下失敗了，但是蘇丹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1808—1839在位）將軍事改革繼續進行下去。他擴大了軍事院校的規模，通過考績晉升的方式提拔軍官，借此抗衡禁衛軍獨大的局面。他還成功地推動了對軍服的改革，引進西方軍事器械，廢除禁衛軍的封地，希望用這些方式建立一支由中央控制的歐式軍隊，最終與禁衛軍融合。1826年，抗拒改革的禁衛軍起兵叛亂，被蘇丹的新軍鎮壓下去，幾千名禁衛軍被殺，從此禁衛軍被解散。

當奧斯曼帝國日漸衰落、搖搖欲墜之時，列強的干涉也越來越頻繁，雖然名義上是為了保護這里的基督徒，但實質上是為了奪取更多的利益。歐洲國家的大使館不再滿足于提供國家之間聯絡的功能，而是直接插手奧斯曼帝國內政，支持民族和宗教團體、政黨和派別，甚至干預蘇丹對大臣的任命，以此來維護本國利益。為了加強奧斯曼帝國與本國的貿易，他們和奧斯曼商人以及金融家建立直接聯系，在主要的貿易中心建立領事館。歐洲國家還開始向奧斯曼帝國的臣民發放護照，到19世紀中期，已有高達一百萬奧斯曼帝國居民借助外國使團來逃避訴訟和納稅。俄羅斯在這方面最為活躍，為了建立黑海貿易而向大批奧斯曼蘇丹治下的希臘人發放護照，并允許他們在船只上懸掛俄羅斯旗幟航行。[[12]](#_12_D__Goldfrank__The_Origins_of)

對奧斯曼帝國內的東正教徒來說，俄羅斯是他們的保護人。是俄羅斯軍隊幫助塞爾維亞人取得了獨立，是俄羅斯人將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置于自己的保護之下，是俄羅斯人將比薩拉比亞的摩爾達維亞人從土耳其人統治下解救了出來。但是為了控制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歐洲地區，俄羅斯到底愿意付出多大代價呢？這一點可以從俄羅斯對希臘獨立的支持上找到答案。

希臘獨立運動的真正源頭在俄羅斯，獨立運動早期的領導人是一些希臘裔俄羅斯政客，他們從未踏足希臘本土，卻夢想著團結所有希臘人起來反抗土耳其人統治。他們計劃從多瑙河的兩個公國開始行動，最終完成希臘獨立。1814年，一批希臘民族主義者和學生成立了“友誼社”（Society of Friends），這一組織的分會迅速在希臘人聚居的地區，如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伊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君士坦丁堡和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等地，以及一些俄羅斯城市建立起來。1821年，友誼社在摩爾達維亞發動了希臘人起義，領導人亞歷山大·伊普西蘭蒂斯（Alexander Ypsilantis）是一名俄羅斯騎兵高級軍官，出身摩爾達維亞一個顯赫的法納爾人家族，他的父母在1806年俄土戰爭爆發時逃到了圣彼得堡。伊普西蘭蒂斯和俄羅斯宮廷關系密切，自十五歲起就得到沙皇保羅一世（Paul I）的遺孀瑪麗亞·費奧多羅芙娜（Maria Fedorovna）皇后的寵信，1816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把他任命為自己的副官。

在圣彼得堡的統治集團上層中，希臘人的游說勢力很強。俄羅斯外交部里有好幾個希臘裔外交官和希臘獨立運動的活躍分子，其中最重要的有兩人：一個是亞歷山德魯·斯圖爾扎（Alexandru Sturdza），他的母親來自法納爾人家庭，本人來自摩爾達維亞，后來成了比薩拉比亞的第一任俄羅斯總督。另一個是揚尼斯·卡珀蒂斯特里亞斯（Ioannis Kapodistrias），他來自希臘科孚島（Corfu）的一個貴族家庭，在1815年和卡爾·涅謝爾羅迭（Karl Nesselrode）共同被任命為俄羅斯外交部長。圣彼得堡的“希臘體校”（Greek Gymnasium）從1770年代起就開始訓練希臘裔年輕人，培養他們進入俄羅斯軍隊和外交系統，這里的許多畢業生加入了俄羅斯軍隊，在1806—1812年間的俄土戰爭中效力。在這場戰爭中協助俄羅斯的還有許多來自奧斯曼帝國的希臘志愿者，戰后他們都逃到了俄羅斯。所以1821年伊普西蘭蒂斯在摩爾達維亞發動希臘人起義時，他手下已經有了一大批在俄羅斯受過訓練、有作戰經驗的希臘軍人。

他的計劃是首先在摩爾達維亞發動起義，然后聯合瓦拉幾亞的希臘游擊武裝。這支武裝的首領圖爾多·弗拉迪米雷斯庫（Tudor Vladimirescu）也曾參加過1806—1812年的俄土戰爭，對他手下的農民來說，君士坦丁堡太遙遠，他們更憎恨當地的法納爾人統治者。《布加勒斯特條約》規定，兩公國均由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共管，但這里實際上沒有土耳其軍隊駐扎，只是地方官手下有小規模的武裝。伊普西蘭蒂斯相信，一旦他率領的希臘志愿軍跨越普魯特河（River Pruth），從俄羅斯進入摩爾達維亞，當地軍隊就會向他投誠，而且一旦起義發生，土耳其人必然派兵前來鎮壓，引起俄羅斯介入，支持希臘人的抗爭。于是當他抵達摩爾達維亞首都雅西（Iaşi）時，身上穿的還是俄羅斯軍官制服，并號稱自己有“一個強國作為后盾”。確實，在俄羅斯統治階層、軍事和宗教領袖中間有許多希臘人的支持者，俄羅斯設在兩公國的領事館甚至都成了起義者的征兵站。但是卡珀蒂斯特里亞斯和沙皇事先都不知道起義行動，兩人在得知消息之后都馬上公開譴責其為叛亂。不管他們對希臘的獨立運動多么同情，俄羅斯畢竟是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的發起者之一，這一保守同盟由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在1815年締結，目的就是為了對抗歐洲大陸的民族主義運動和革命起義。

沒有俄羅斯的支持，兩公國內的希臘人起義很快被三萬土耳其軍隊鎮壓下去。瓦拉幾亞的農民武裝撤進了山區，伊普西蘭蒂斯逃到特蘭西瓦尼亞（Transylvania），被奧地利當局逮捕。土耳其軍隊重新占領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并對當地的基督徒進行報復。士兵們劫掠教堂，屠殺教士和平民，男女老幼均不放過，肢解尸體，割下鼻子、耳朵和頭顱，軍官們則在一邊袖手旁觀。幾千平民逃到臨近的比薩拉比亞，給俄羅斯帶來了巨大的難民問題。暴力事件甚至波及了君士坦丁堡，1821年復活節時，東正教牧首和幾個教區主教被一些禁衛軍公開吊死。

隨著土耳其軍隊暴行的消息不斷傳來，俄羅斯人對希臘起義者的同情越來越強，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也越來越感覺有責任介入，盡管他同時還有遵守神圣同盟原則的義務。他覺得土耳其人的行為已經遠遠超過了捍衛主權所需，是在針對希臘人進行一場宗教迫害，而按照俄羅斯對《庫楚克開納吉和約》的詮釋，他們有責任保護奧斯曼帝國境內的東正教徒。沙皇向土耳其人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他們立刻撤出多瑙河兩公國，修復被毀的教堂，并承認俄羅斯對東正教徒的保護權。這是歐洲列強第一次公開出面為希臘人說話。土耳其人的反應卻是扣押俄羅斯船只，沒收糧食，關押船員。

俄羅斯斷絕了與奧斯曼帝國的外交關系，在沙皇的幕僚圈子中，許多人主戰。當時希臘起義已經蔓延到希臘中部、伯羅奔尼撒、馬其頓（Macedonia）和克里特島（Crete）。他們擔心如果俄羅斯不介入，這些地區的起義將遭受同樣的鎮壓和殘酷報復。1822年，奧斯曼帝國軍隊殘暴地鎮壓了希俄斯島（Chios）起義，吊死了兩萬居民，并將剩下的七萬希臘人押解出境賣為奴隸。整個歐洲都對這一暴行感到震驚，其恐怖場景在法國畫家歐仁·德拉克魯瓦（Eugène Delacroix）1824年的油畫作品《希俄斯大屠殺》（The Massacre of Chios）中得以再現。在俄羅斯外交部，卡珀蒂斯特里亞斯和斯圖爾扎力爭以宗教為由發動軍事介入，理由是俄羅斯保護基督徒不受穆斯林暴力侵犯的責任高于其對奧斯曼帝國主權的考慮，這種說法預演了1853年克里米亞戰爭前夕俄羅斯所提出的理由。他們指出，如果俄羅斯出面支持發生在西班牙或是奧地利的暴亂，那確實是違反了神圣同盟的原則，因為這兩個地方都在基督教政權的合法統治下；但是穆斯林政權不能被認作合法的，因此神圣同盟的原則不適用于希臘人反抗奧斯曼帝國統治的起義。“神圣俄羅斯”有義務保護東正教徒這一邏輯也同樣被沙皇駐法國大使波佐·迪·博爾戈（Pozzo di Borgo）采用，不過他對擴大俄羅斯的戰略野心更感興趣，呼吁發動戰爭將土耳其人逐出歐洲，并在俄羅斯的保護下建立一個新的拜占庭帝國。

這些觀點在俄羅斯政府高層、軍官和知識分子間非常流行，在1820年代早期，俄羅斯民族主義情緒以及對東正教事業救世主般的投入讓這些人團結起來，一時間有了“越過多瑙河，把希臘人從穆斯林暴行中解救出來”的說法。一名俄羅斯南方部隊的領導人呼吁對土耳其人開戰，將巴爾干所有的基督徒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希臘王國”。圣彼得堡宮廷對神圣同盟原則的認同更為堅定，但即使在那里也有主戰派的支持者。最熱心此事的是馮·克呂德納男爵夫人（Baroness von Krüdener），她是一名宗教神秘主義者，認為亞歷山大有拯救世界的責任，鼓吹發起東正教圣戰將穆斯林趕出歐洲，在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升起東正教的十字架等等，后來被沙皇逐出皇宮并勒令離開圣彼得堡。[[13]](#_13_A__Bitis__Russia_and_the_Eas)

亞歷山大非常看重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不可能真的考慮通過俄羅斯單方介入來解救希臘人。他信守會議制度（Congress System），這一制度在維也納會議確立，目的是讓歐洲列強通過國際談判解決重大危機。他意識到對希臘問題采取任何單方行動，都會遭到其他列強的反對。1821年10月，奧地利外交大臣、歐洲協調首席協調員梅特涅親王（Prince Metternich）已經在主持希臘危機的國際調解政策，參與此事的還有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勛爵（Lord Castlereagh）。因此當沙皇在1822年2月向這兩個人提議，要求在俄羅斯針對土耳其的行動上獲得支持時，各方同意召開國際會議解決這一危機。

亞歷山大呼吁建立一個在俄羅斯保護下的地域遼闊的希臘自治區，與當時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做法類似。但是英國擔心此舉將為俄羅斯提供對外擴張、干涉奧斯曼帝國事務的借口。奧地利則擔心一旦希臘人起義成功，在其治下的其他中歐地區都可能出現類似暴動。因為亞歷山大十分看重俄羅斯與奧地利的聯盟，所以沒有對希臘人施以援手，而是繼續呼吁歐洲聯合行動，然而列強對此均無動于衷。但是在1825年，兩件事的發生改變了列強的想法：第一件事是奧斯曼帝國蘇丹從埃及召來了著名將領穆罕默德·阿里（Mehmet Ali）來鎮壓希臘起義，引發了更多暴行，激發了更多對希臘人的同情和更高的要求干預的呼聲。第二件事是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去世了。

\* \* \*

新登基的沙皇是亞歷山大的弟弟、29歲的尼古拉一世。正是這位沙皇，將來會對克里米亞戰爭負最大的責任。尼古拉一世長得高大軒昂，頭頂已開始脫發，臉龐兩邊有長長的鬢角，留著軍官式的胡須。他是一個標準的“軍人”沙皇，早年就對軍事非常入迷，熟記哥哥手下將軍的名字，自己設計軍裝，參加各種軍事檢閱和戰術演練。雖然沒能實現少年時期的夢想，即參加抗擊拿破侖的戰斗，但他一直準備著以后做一名軍人。1817年他第一次獲得了軍事任命，擔任工兵總監督，那段經歷讓他對軍事工程和火炮產生了興趣。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炮兵是俄羅斯軍隊中最強的部分。他熱愛軍隊生活的井井有條，這正好符合他嚴格細致的性格、簡單樸素的生活習慣（他一輩子都堅持睡在一張行軍床上）。他對圈內人禮貌優雅，對圈外人卻冷漠嚴厲。在人生后期他變得越來越易怒急躁，常會做出莽撞盛怒的舉動，這些行為和沙皇家族遺傳下來的精神疾病有關，亞歷山大一世也有同樣的問題。尼古拉一世的另一個哥哥，1825年拒絕登基成為沙皇的康斯坦丁大公（Grand Duke Constantine）也有類似的癥狀。[[14]](#_14_A_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

和亞歷山大一世相比，尼古拉一世對捍衛東正教更為重視，這是他外交政策的中心。他堅信自己的天賦使命是保護東正教徒不受自由主義、理性主義和革命行動等西方異端邪說的侵擾。在執政的最后幾年，他一直夢想著率領俄羅斯發動圣戰，將巴爾干的基督徒從土耳其人手下解放出來，把巴爾干與俄羅斯合并，建立一個以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為精神中心的遼闊的東正教帝國。安娜·丘特切娃（Anna Tiutcheva）[¶](#P_Huang_Hou_De_Ban_Niang__E_Luo)從1853年起一直生活在宮中，她把尼古拉一世描述為“貴族中的堂·吉訶德，憑借著自己的精神和信念，拋棄一切，與歷史打一場無謂的戰爭”。[[15]](#_15_A__Tiutcheva__Pri_dvore_dvuk)

莫斯科附近的新耶路撒冷修道院（New Jerusalem Monastery）展現了尼古拉與巴勒斯坦圣地之間的個人紐帶。這座修道院由尼康（Nikon）大主教在1650年代負責興建，選擇了一個與圣地地形相似的地方，附近的伊斯特拉河（River Istra）象征著約旦河。修道院擁有好幾個教堂，這些教堂的位置布局也依照耶路撒冷的圣所位置而定。尼康還請來外國僧侶入住修道院以體現這里代表了從莫斯科到耶路撒冷的各個民族的東正教徒。尼古拉于1818年訪問了這座修道院，這一年他的兒子，也是皇儲出生，他把這一巧合看作天意。當修道院由于大火而部分被毀之后，尼古拉親自指揮，將修道院的中心教堂復活教堂（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重建成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翻版，為此他還特意派遣畫家去圣地朝覲，把圣墓教堂的樣子繪制下來，從而使其在俄羅斯的土地上重現。[[16]](#_16_R__Wortman__Scenarios_of_Pow)

在1825年登基之時，尼古拉的宗教野心還不是非常明顯，他態度的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開始他還擁護神圣同盟的原則，但到了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幾年，他就把為東正教徒伸張正義作為俄羅斯在巴爾干和巴勒斯坦的強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了。不過自從登基開始，他捍衛東正教徒反抗土耳其人的決心就十分明顯，而保護東正教徒必須從希臘開始。

尼古拉登基后恢復了與卡珀蒂斯特里亞斯的關系，這位俄羅斯原外交部長因為積極支持希臘獨立運動，不得不在1822年辭去官職并離開俄羅斯流亡海外。尼古拉還向土耳其人發出戰爭威脅，逼迫他們撤出多瑙河兩公國，并接受了由他的軍事顧問們制定的出兵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以支持希臘的方案。沙皇對外交部長卡爾·涅謝爾羅迭言聽計從，而涅謝爾羅迭對歐洲協調已經失去耐心，他加入主戰派行列不是因為多么關心希臘起義者，而是認為與土耳其人開戰能夠推進俄羅斯在近東的戰略目標。他的想法是，如果俄羅斯威脅軍事介入，至少會讓英國人有所動作，只要英國人不想讓俄羅斯在巴爾干地區獨大，他們就會與沙皇合作共同解決希臘問題。[[17]](#_17_Bitis__Russia_and_the_Easter)

1826年英國政府派威靈頓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到圣彼得堡與俄羅斯談判以期簽署一份英俄協定。威靈頓公爵是在滑鐵盧打敗拿破侖的英軍名將，現在已是英國政府內的高級政客。后來法國也加入談判，三方在1827年簽署《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呼吁在奧斯曼帝國統治下建立希臘自治省。在蘇丹拒絕了這一提議后，三方決定派出一支聯合艦隊到附近水域，艦隊指揮是英國海軍上將、親希臘的愛德華·科德林頓（Admiral Edward Codrington），他接到的指令是以和平手段脅迫蘇丹接受條約，“以火炮”作為最后手段。但是科德林頓可不是什么外交家，1827年10月，他指揮艦隊在納瓦里諾（Navarino）摧毀了整支土耳其埃及聯合艦隊。蘇丹聞訊大怒，拒絕再接受調停，宣布發動圣戰，對俄羅斯要求奧斯曼帝國從多瑙河兩公國撤軍的最后通牒不作理會。

蘇丹的強硬反應正中尼古拉下懷，他一直懷疑英國人不會為希臘而與奧斯曼帝國開戰，但是又擔心一旦俄羅斯派兵驅逐多瑙河兩公國的土耳其軍隊，英國人會以此為由宣布《倫敦條約》作廢。現在既然蘇丹對俄羅斯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尼古拉就有正當理由單獨向土耳其宣戰了。涅謝爾羅迭在1828年1月寫給卡珀蒂斯特里亞斯的信中說，俄羅斯將會為建立一個“希臘政府”而戰。沙皇向希臘起義軍送去經費和武器，卡珀蒂斯特里亞斯則向沙皇承諾未來俄羅斯將對希臘事務擁有“獨一無二的影響力”。[[18]](#_18_Bitis__Russia_and_the_Easter)

1828年4月，六萬五千名俄羅斯士兵和哥薩克騎兵渡過多瑙河，分三路向維丁（Vidin）、錫利斯特拉（Silistria）和瓦爾納（Varna）發起進攻，這三個地方都在通往君士坦丁堡的大路上。尼古拉堅持御駕親征，因為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親自參加戰斗。一開始俄羅斯軍隊推進很快，所到之處馬匹飼料豐富；但是不久就在瓦爾納附近遭到阻滯，許多士兵在多瑙河三角洲的惡劣環境下得了病。在1828—1829年間，俄羅斯士兵中有一半病死，增援部隊也同樣被疾病困擾。在1828年5月至1829年2月間，俄羅斯士兵中有二十一萬人次曾到軍隊醫院中接受治療，是整個戰爭期間投入兵力的兩倍。[[19]](#_19_Aksan__Ottoman_Wars__pp__346)這樣大規模的兵員流失在沙皇部隊中并不罕見，因為軍隊對農奴戰士的健康福利一點都不關心。

俄羅斯在1829年春天重新發起攻勢，占領了土耳其要塞錫利斯特拉，隨后攻占了埃迪爾內（Edirne），即后來的哈德良堡（也稱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至此，俄軍離君士坦丁堡已經不遠了，在君士坦丁堡甚至能聽到附近海面上俄羅斯艦隊的炮聲。俄羅斯海軍已控制了黑海和愛琴海（Aegean），陸軍則可以從希臘或保加利亞志愿軍那里獲得兵員補充，而土耳其軍隊則亂作一團。在高加索地區，俄羅斯軍隊也同時發起進攻，占領了土耳其要塞卡爾斯和埃爾祖魯姆（Erzurum），打開了進攻安納托里亞的大門。此時俄羅斯似乎可以輕而易舉地占領君士坦丁堡并將蘇丹趕下臺，奧斯曼帝國崩潰的日子仿佛不遠了，法國國王查理十世（Charles X）甚至已經提出由列強瓜分奧斯曼帝國的土地。[[20]](#_20_P__Schroeder__The_Transforma)

尼古拉自己也覺得奧斯曼帝國即將垮臺，他可以給予最后一擊，實現解放巴爾干地區基督徒的目標，但是他需要得到歐洲其他列強，特別是最親密的盟國奧地利的支持。當俄羅斯軍隊向君士坦丁堡進軍時，尼古拉通知奧地利駐圣彼得堡大使說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建議奧地利和俄羅斯一起分治奧斯曼帝國領土，“以免其他人來填補權力真空”。但是奧地利人并不信任俄羅斯，不愿與俄羅斯合作，反而寧愿通過歐洲協調解決問題。1829年，在缺乏奧地利支持的情況下，尼古拉停止了對奧斯曼帝國最后的進攻，擔心此舉會觸發歐洲列強聯合起來保護土耳其，更擔心如果奧斯曼帝國崩潰，歐洲列強會蜂擁而來爭奪地盤，這兩種情形都對俄羅斯不利。出于這樣的考慮，他聽從了外交部長涅謝爾羅迭的意見：對俄羅斯最有利的情形是保留奧斯曼帝國的存在，但是讓其衰弱到不得不依賴俄羅斯生存，這樣俄羅斯就可以繼續加強自己在巴爾干和黑海地區的勢力。一個病倒的土耳其比一個死去的土耳其對俄羅斯更有利。[[21]](#_21_A__Seaton__The_Crimean_War)

正因為如此，《哈德良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對土耳其一點也不苛刻。條約在1829年9月簽署，給予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在俄羅斯保護下的自治權，將多瑙河口的一些島嶼、格魯吉亞的幾個要塞割讓給了俄羅斯，歸俄羅斯所有的還有格魯吉亞的其他地區以及高加索南部的埃里溫汗國和納希切萬（Nakhichevan）汗國，這些是1828年俄羅斯剛從波斯人手里奪過來的。但是所有這些和俄羅斯有可能迫使土耳其人做出的讓步比起來都算不了什么。條約中最重要的條款也是《倫敦條約》簽字各方希望看到的結果：土耳其承認希臘自治，開放連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峽供所有商船使用。

雖然俄羅斯表現克制，但西方列強并不相信它真的會自動讓步。條約中沒有提到軍艦如何使用海峽，于是他們相信俄羅斯一定逼迫土耳其人簽署了秘密條款或給予了口頭保證，讓俄羅斯艦隊可以獨家控制黑海與地中海之間的水路要道。自希臘起義以來，西方國家就對俄羅斯勢力的擴張感到擔心，《哈德良堡條約》增強了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敵意。英國人對此特別警覺，威靈頓公爵此時已當上英國首相，他認為這一條約實質上讓奧斯曼帝國變成了俄羅斯的保護地，比奧斯曼帝國崩潰、被列強瓜分還糟糕，至少瓜分奧斯曼帝國時列強還能談判。當時擔任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的海茨伯里勛爵（Lord Heytesbury）聲稱蘇丹已“向沙皇稱臣，就像印度親王臣服在東印度公司腳下一樣”。[[22]](#_22_Bitis__Russia_and_the_Easter)他似乎對自己這番話中的諷刺意味毫不知覺，英國人自己可以將印度王朝踩在腳下，但是當俄羅斯人采用同樣的手段對待奧斯曼帝國時，英國卻以正義姿態出現，自認為是近東現狀的保護人。

由于擔心來自俄羅斯的威脅，英國開始醞釀解決東方問題的政策。為了不讓俄羅斯在希臘問題上獲得先機，英國開始支持希臘獨立，而不是俄羅斯支持的希臘自治。英國人擔心希臘名義上成為奧斯曼帝國的自治區，實質上卻完全依附于俄羅斯。英國人的擔心并非沒有道理，卡珀蒂斯特里亞斯就一再呼吁沙皇出兵驅逐歐洲地區的土耳其人，成立一個大希臘自治區，一個在俄羅斯保護下的巴爾干邦聯，也就是葉卡捷琳娜二世曾經倡導過的模式。但是在1831年，卡珀蒂斯特里亞斯遇刺身亡，他代表的親俄羅斯政黨勢力隨之漸弱，親西方的自由黨派勢力漸強，沙皇在希臘問題上的影響力因此大打折扣。在各方勢力此消彼長之下，1832年《倫敦公約》（Convention of London）順利達成，在列強的擔保下，一個獨立的現代國家希臘誕生了，國王是英國人的選擇——年輕的巴伐利亞王子奧托一世（Otto of Bavaria）。

\* \* \*

從1829年直至克里米亞戰爭，扶持一個“虛弱的鄰居”一直是俄羅斯在東方問題上的政策。并非所有人都贊同這一政策。在沙皇軍隊和外交部中，有一些人認為應該在巴爾干和高加索采取更為強硬的擴張主義政策。但是沙皇的政策有較強的靈活性，可以同時滿足野心勃勃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和那些擔心歐洲大戰的人。“虛弱的鄰居”政策的核心是在軍事威脅的支持下，借助宗教來擴大俄羅斯在奧斯曼帝國基督徒聚居區的影響力。

為了保證《哈德良堡條約》的實行，俄羅斯派兵占領了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在1829年至1834年的五年占領期內，俄羅斯制定了一部“憲法”（稱為《組織規程》，Règlement Organique）并對兩公國的管理進行改革，采用了相對偏向自由主義的原則，比同期俄羅斯國內的管制手段要寬松得多，目的是為了徹底清除奧斯曼帝國的遺留影響。俄羅斯當局嘗試減輕農民負擔，通過經濟讓利來贏得當地農民的支持。他們把教堂置于俄羅斯控制之下，征召當地武裝，改善軍事基建，讓兩公國能夠成為將來與土耳其人交戰時的軍事基地。有一段時間，俄羅斯曾考慮直接并吞這兩個公國，但是在1834年，俄羅斯軍隊還是撤離了，不過他們留下了相當數量的部隊控制軍事道路，同時也是為了提醒當地的王公貴族是誰給了他們權力。摩爾達維亞大公米哈伊·斯圖爾扎（Michael Sturdza）和瓦拉幾亞大公亞歷山大·吉卡（Alexander Ghica）都是由俄羅斯人挑選的。俄羅斯領事不僅密切監視兩地當局，還經常介入貴族議會和權力爭奪以保證俄羅斯的利益。按照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龐森比勛爵（Lord Ponsonby）的說法，斯圖爾扎和吉卡“表面是當地最高官員，實質是俄羅斯臣民”，他們“徒有其表，只聽命于俄羅斯政府”。[[23]](#_23_FO_97_404__Ponsonby_to_Palme)

有時候，為了維護這個既虛弱又有依賴性的鄰居，俄羅斯不得不替奧斯曼帝國出面維護主權。1833年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那一年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對蘇丹的權威提出了挑戰，在幫助蘇丹鎮壓希臘反叛之后，他要求獲得埃及和敘利亞的世襲繼承權，但沒有得到蘇丹的同意。于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兒子易卜拉欣帕夏（Ibrahim Pasha）帶兵進占了巴勒斯坦、黎巴嫩和敘利亞，這支軍隊由法國人按照歐洲軍隊的模式訓練，十分強大，橫掃奧斯曼帝國部隊，君士坦丁堡頓時成為板上魚肉。在埃及執政期間，穆罕默德·阿里實現了埃及經濟的現代化，融入國際市場，成為棉花出口地，運往英國的棉紡工廠；他還修建工廠，主要用來為埃及軍隊提供軍需品。入侵敘利亞的原因之一其實是為了擴大生產基地，以更好地面對全球市場的競爭。但同時穆罕默德·阿里還代表了卷土重來的穆斯林傳統勢力，與蘇丹較為寬松的宗教領導方式很不相同。他把自己的軍隊稱為圣戰者（Cihadiye）。根據當時觀察家的看法，一旦穆罕默德·阿里的軍隊占領了君士坦丁堡，他就會建立一個“新穆斯林帝國”，并對中東地區的基督教勢力持敵對態度。[[24]](#_24_F__Lawson__The_Social_Origin)

蘇丹向英國和法國求助無果，情急之下不得不乞求沙皇伸出援手。沙皇立刻派出七艘軍艦、四萬士兵協同保衛君士坦丁堡。俄羅斯人認為穆罕默德·阿里是法國人的走卒，對俄羅斯在近東的利益威脅極大。從1830年開始，法國人一直在進行征服奧斯曼帝國屬下阿爾及利亞的戰爭，法國軍隊是本地區唯一有實力遏制俄羅斯野心的力量。更讓俄羅斯人擔心的是，從搜集到的情報來看，穆罕默德·阿里誓言“恢復穆斯林曾經擁有的偉大力量”并要為1828—1829年俄土戰爭復仇。俄羅斯人擔心他會征服整個小亞細亞（Asia Minor）地區并建立一個新的伊斯蘭帝國代替奧斯曼帝國。這么一來，“虛弱的鄰居”將變成一個南部邊疆外威脅很大的伊斯蘭勢力，而且還和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有著很強的宗教聯系。[[25]](#_25_Bitis__Russia_and_the_Easter)

俄羅斯派兵的舉動讓英國和法國警覺起來，他們各自派出艦隊抵達達達尼爾海峽外的貝希克灣（Besika Bay），并在1833年5月調停穆罕默德·阿里和蘇丹參加屈塔希亞（Kütahya）會議并達成協議：穆罕默德·阿里以從安納托里亞撤軍換取克里特島和漢志地區（Hijaz）[\*\*](#___Jin_Sha_Te_Xi_Bu_______Yi_Zhu)，易卜拉欣獲任敘利亞終身總督。但是穆罕默德·阿里沒有得到埃及的世襲繼承權，為此他十分惱怒，急于卷土重來。英國人加強了他們在黎凡特地區（Levant）[††](#___Zhi_Di_Zhong_Hai_Dong_Bu_Yan)的艦隊并進入戰備狀態，以保護蘇丹。在英法兩國介入之后，俄羅斯就退出了，但是在撤兵之前，他們還是逼迫蘇丹在1833年7月簽署了一份《帝國碼頭條約》（Treaty of Unkiar-Skelessi）。條約主要是再次確認了俄羅斯從1829年《哈德良堡條約》中獲得的權利，但是加了一個秘密條款，規定俄羅斯有義務對土耳其提供軍事保護，作為條件，俄羅斯可以隨時要求土耳其封鎖連接黑海和地中海的海峽，不讓外國軍艦通過。這樣俄羅斯就可以阻擋英國和法國海軍艦船進入黑海，保證自己對黑海的絕對控制權。對俄羅斯來說，更重要的是，根據他們對這個條約的理解，俄羅斯擁有介入奧斯曼帝國事務的法律權利。[[26]](#_26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ia)

這個秘密條款很快被土耳其官員泄露給了英國和法國，在西方媒體引起一片嘩然。西方國家馬上懷疑俄羅斯不僅有權要求封鎖海峽不讓外國軍艦通過，而且還有權要求只向俄羅斯軍艦開放海峽。如果是這樣的話，俄羅斯海軍就可以在四天之內從黑海港口塞瓦斯托波爾駛到博斯普魯斯海峽，占領君士坦丁堡，而西方海軍根本來不及介入。事實上，這個秘密條款并沒有對這一點有清楚的說明。俄羅斯聲稱這一條款不過是為了自我保護，防止俄羅斯在黑海的港口塞瓦斯托波爾和敖德薩兩地遭受英法這兩個海上強國的攻擊。地中海通往黑海的海峽是“打開俄羅斯大門的鑰匙”，如果俄羅斯不能關上這扇大門，那么其南部虛弱的腹地，即黑海沿岸以及高加索，將會暴露在敵人面前。事實上，克里米亞戰爭中土耳其和西方軍隊就是這么干的。

\* \* \*

但此時無論俄羅斯如何辯解，西方都無人理睬，任何良好的意圖都會遭到懷疑。俄羅斯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舉一動，都被看作帝國擴張中的反動和侵略性行為。“毫無疑問，目前俄羅斯政府正在執行一套向南部擴張的策略，這一策略從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就已經開始，一直是俄羅斯對外政策的重要部分”，英國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勛爵在1833年12月給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龐森比勛爵的信中寫道：

每次在被問及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時，圣彼得堡內閣一般都會說自己絲毫沒有興趣，并且抗議說俄羅斯對自己廣袤的疆域已很滿意，并無擴大疆土的意愿，絕不承認任何外人強加在俄羅斯身上的擴張計劃……

盡管俄羅斯反復強調這一點，但是其向各方擴張的計劃其實已顯而易見，目標明確，步伐堅定。近些年來俄羅斯所有的重要行動，都是為了有利于進行領土擴張或增強對外影響力。

最近在黎凡特地區發生的各種不幸事件結合在一起，讓俄羅斯對土耳其的企圖大大地邁進了一步。這對大英帝國在這一地區的利益非常重要，必須考慮如何阻止俄羅斯進一步推進其目標，以及是否有可能削減它已經取得的優勢。

19世紀法國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François Guizot）認為1833年的《帝國碼頭條約》讓俄羅斯把黑海變成了“俄羅斯的內湖”，由其“傀儡政權”土耳其為之把守，“沒有什么能阻止俄羅斯穿過海峽，向地中海地區投入艦船和軍隊”。法國駐圣彼得堡代辦向俄羅斯政府遞交了一份抗議，警告俄羅斯說，一旦俄羅斯憑借這一條約干涉“奧斯曼帝國內部事務，法國政府將有權根據實際情況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在英國方面，龐森比從帕默斯頓那里得到了授權，一旦他認為君士坦丁堡將遭受俄羅斯威脅，可以馬上從地中海召集英國海軍艦隊進行防衛。[[27]](#_27_FO_181_114__Palmerston_to_Po)

1833年是英國對俄羅斯和土耳其外交政策的轉折點。在這之前，英國人關心的主要是能否維持奧斯曼帝國的現狀，擔心奧斯曼帝國的崩潰將導致歐洲勢力均衡被打破，甚至引發一場歐洲大戰。他們對蘇丹的主權狀況并不特別關心，這可以從他們的希臘政策上看出來。但是，一旦意識到奧斯曼帝國有可能被埃及人占領，并由此引發一場氣勢磅礴的伊斯蘭復興，更糟糕的是奧斯曼帝國有可能變成俄羅斯的保護國時，英國對土耳其的興趣馬上加強了，開始越來越多地介入奧斯曼帝國事務，鼓勵經濟政治改革，希望奧斯曼帝國能恢復生機，甚至擴大影響力。

英國的興趣主要在商貿方面。對英國來說，奧斯曼帝國不僅是一個日益增長的出口市場，還是寶貴的原材料來源地。作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世界工業強國，英國支持打開全球市場進行自由貿易；同時作為一個占統治地位的海上強國，英國隨時準備使用炮艦逼迫外國政府開放市場。這是一種“非正式的帝國”，或者可以叫“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英國可以憑借軍事威脅和政治影響來推動其經濟霸權，限制外國政府的獨立自主能力，并不需要直接進行統治。

英國的這一戰略意圖在奧斯曼帝國再明顯不過了。龐森比一再強調，擴大英國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影響力會帶來經濟上的回報。他在1834年向帕默斯頓匯報說：“保護我們政治利益的措施將會帶來商業繁榮的源頭活水，這一點是通過與別的地區交往所不可能達到的。”當時已經有一批英國商人在土耳其經商，他們人數眾多、勢力強大。為了維護在當地的龐大利益，他們不斷向英國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對土耳其進行政治干預。這部分人的觀點出現在了一些很有影響力的刊物上，如《布萊克伍德》（Blackwood’s）和《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等，這兩份刊物均受到這批商人的資助。他們的觀點還在一些親土耳其人士，例如戴維·厄克特（David Urquhart）等人中得到響應。厄克特在1833年率領一個秘密貿易代表團前往土耳其，認識到奧斯曼帝國的經濟發展將給英國貿易發展帶來很大潛力。他在1835年寫道：“土耳其的進步，如果能免受政治事件的干擾，向公平的方向發展，若干年后必將成為英國商品在世界上的最大市場。”[[28]](#_28_L__Levi__History_of_British)

1838年，通過一系列的軍事威脅和政治承諾，英國向高門強加了一項稅收協議，其結果是奧斯曼帝國幾乎變成了一個自由貿易港。在失去關稅這一財政來源后，高門保護本國尚在襁褓中的民族工業的能力被嚴重削弱。從此英國向土耳其出口的商品數量大幅提高，在1850年達到了原來的十一倍，使土耳其成為英國最有價值的出口市場，僅次于漢薩同盟地區（Hanseatic towns）和荷蘭。1846年英國廢除了限制外國谷物進口的《谷物法》（Corn Law），從土耳其，主要是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進口的谷物隨之增加。蒸汽海輪、內河蒸汽船以及鐵路的出現，讓多瑙河第一次成為繁忙的水上高速通道。多瑙河河道貿易被英國商船壟斷，英國商人把這里的谷物出口到西歐國家，然后從英國進口商品。與把持多瑙河水道的英國商人競爭的是以敖德薩、塔甘羅格和其他黑海港口為基地的一批商人，他們把烏克蘭和俄羅斯南部農業區的谷物出口到西歐。這一谷物貿易對俄羅斯越來越重要，因為自蒸汽機出現后，對俄羅斯木材出口的需求下降了。到19世紀中葉，俄羅斯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經由黑海港口運出。為了幫助黑海商人，俄羅斯在1829年占領多瑙河三角洲之后，故意要求外國船只必須經過耗時的隔離控制，甚至不對多瑙河進行清淤，以增加河道航行的困難。

在黑海東岸，英國的商貿利益越來越多地集中在土耳其東北部港口特拉布宗（Trebizond）。在這里，希臘和亞美尼亞商人進口大量的英國商品并運到亞洲內陸地區出售。馬克思認為這條商路對英國的重要性“可以在曼徹斯特商品交易中心看出來”，他在《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上寫道：“面龐黝黑的希臘買家的數量和重要性與日俱增。在這里，除了德語和英語之外，還能聽到希臘以及南部斯拉夫方言。”在1840年代以前，俄羅斯幾乎壟斷了亞洲這部分地區的商品貿易。俄羅斯產的布匹、繩子和亞麻占據了巴伊布爾特（Bayburt）、巴格達（Baghdad）和巴士拉（Basra）的集市。但是蒸汽機船和鐵路的出現，為開辟一條通往印度的距離更近的商路提供了可能：或者是穿過地中海到開羅（Cairo），然后從蘇伊士（Suez）到紅海；或者是穿過黑海到特拉布宗，然后沿幼發拉底河（Euphrates）抵達波斯灣（Persian Gulf）。在那時，帆船還不能很好地適應蘇伊士灣的強風和雨季，或是幼發拉底河狹窄的水道。英國人傾向開發幼發拉底河商路，主要是因為穿過的是蘇丹而不是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控制下的地區，開發這條商路還被視作在這一地區增加英國影響力，同時鉗制俄羅斯勢力的辦法之一。1834年英國從高門那里獲得許可，派弗朗西斯·切斯尼（Francis Chesney）對幼發拉底河商路進行測繪。這次測繪沒有成功，英國對這條商路的興趣也隨之降低了。但是在1850年代，修建一條幼發拉底河谷鐵路（Euphrates Valley Railway），通過阿勒頗（Aleppo）和巴格達連接地中海和波斯灣的計劃又再次被提了出來，原因是英國政府感到俄羅斯對印度的威脅日益增強，于是想辦法增強自己在這一地區的勢力。英國人因為缺乏資金保證，從未興建這條鐵路；但是德國人在1903年修建巴格達鐵路（Baghdad Railway）時，采用的路線和這一方案有許多相似之處。

俄羅斯對印度的威脅，是英國的恐俄人士最大的擔憂。對一些人來說，克里米亞戰爭的目的不僅是為了阻止俄羅斯征服土耳其，還是為了防止俄羅斯在整個小亞細亞直至阿富汗和印度占據統治地位。在這些人的想象中，俄羅斯是世界上擴張最快的帝國，其野心沒有止境。

事實上，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并不存在俄羅斯勢力伸向印度的危險。對俄羅斯來說，印度距離太遠，將軍隊派到那里也非常困難。沙皇保羅一世的確考慮過一個瘋狂的計劃：派遣一支俄法聯軍襲擊印度。1807年拿破侖在與沙皇亞歷山大的對話中又提及這一想法，拿破侖解釋道：“越是不現實的遠征行動，就越能讓英國人驚恐。”英國政府其實一直都清楚俄羅斯做這樣的遠征行動是不現實的，一名英國情報官員認為俄羅斯侵略印度的計劃只能是“派輛大篷車過去”。但是，雖然英國官方沒人把俄羅斯威脅印度當真，這并不能阻止恐俄的英國報刊大肆渲染對俄羅斯威脅的恐慌，強調俄羅斯征服高加索之后帶來的潛在威脅，以及其在波斯和阿富汗施展的種種“見不得人的手腕”。[[29]](#_29_B__Kingsley_Martin__The_Triu)

俄羅斯意圖侵略印度這一說法，最早出現在1828年出版的一份名為《論俄羅斯的企圖》（On the Designs of Russia）的小冊子上，作者是喬治·德萊西·埃文斯上校（Colonel George de Lacy Evans），此人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時，已晉升為將軍，擔任英軍第二步兵師的師長。在對俄土戰爭的結果進行猜測時，他編織了一個俄羅斯不斷侵略和擴張的噩夢般的畫面：俄羅斯占領了整個小亞細亞，切斷了英國與印度之間的貿易。他的基本論點，即俄羅斯帝國的急速擴張必須得到遏制，再次出現在1829年出版的第二份小冊子《論英屬印度被入侵的可能性》（On the Practicality of an Invasion of British India）。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德萊西·埃文斯聲稱俄羅斯軍隊可能已在印度西北邊境集結。這份小冊子在政府官員中流傳很廣，威靈頓公爵認為這對英國是一個警告，并告訴印度管理委員會（Board of Control for India）[‡‡](#_____Ying_Guo_Zheng_Fu_1784Nian)主席埃倫伯勒勛爵（Lord Ellenborough），“如果俄國對印度采取敵對行動”，他準備“在歐洲這邊解決這個問題”。1833年之后，看到俄羅斯似乎已把奧斯曼帝國捏在手中，英國人的這些恐懼變成了能夠自我實現的預言。1834年阿瑟·康諾利中尉（Lieutenant Arthur Connolly）出版了一部暢銷旅行日記《印度北部之旅》（Journey to the North of India）。在書中他指出，如果能得到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的支持，俄羅斯可以從印度西北邊境發起進攻。他是第一個用“大博弈”（the Great Game）來形容英俄兩國在小亞細亞地區的沖突的。[[30]](#_30_J__Gleason__The_Genesis_of_R)

俄羅斯人確實一直在增強他們在小亞細亞地區的實力，目的是貫徹“衰弱的鄰居”政策。俄羅斯派代表為波斯的外交出謀劃策，并為沙阿（Shah）[§§](#SSSS_Bo_Si_Guo_Wang_De_Tou_Xian)的軍隊提供支援。當波斯軍隊在1837年占領阿富汗城市赫拉特（Herat）時，許多英國人都相信這是俄羅斯為入侵印度而做的準備。“波斯人占領赫拉特，”一位前英國駐德黑蘭大使寫道，“不可能是其他原因，只可能是為了讓這個地方成為俄羅斯軍隊入侵印度時的集結地。”英國恐俄報刊指責政府無所作為，未能識破俄羅斯在波斯的種種陰險邪惡的招數。《先驅報》（Herald）警告說：“過去幾年來，我們一直在提醒政府，俄羅斯的野心超越了土耳其、切爾克斯和波斯，甚至對我們在東印度的附屬地都有所企圖。這自從葉卡捷琳娜二世時就已經開始，那時她就威脅要派出軍隊，將印度親王們團結在大蒙古的旗幟下。”《旗幟報》（Standard）呼吁：“對俄羅斯光是警惕已經不夠了，我們已經對俄羅斯保持警惕八年了，在這八年中，它已經向印度推進了兩千英里[¶¶](#PP_Yue_San_Qian_Er_Bai_Qian_Mi)。”[[31]](#_31_J__Gleason__The_Genesis_of_R)

究其本質而言，俄羅斯對印度是個威脅，這一看法在當時英國的大報讀者中十分流行。在1838年一份匿名出版的小冊子《印度、英國與俄國》（India,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中，有一段話與20世紀冷戰時期的“多米諾骨牌理論”[\*\*\*](#____Ji_Yi_Ge_Guo_Jia_Bei_Gong_Ch)很相似：

俄羅斯在各個方面的侵略行為完全戳穿了它以渴求和平自居的狡辯，任何有理性推斷能力的人都會同意，要阻止它對外征服，就必須遏制它的實力。在俄羅斯西面，波蘭已成了它的附庸國。在南面，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如果還沒有被俄羅斯奪走，也正在等著被它征服。黑海上，沒有莫斯科大公的許可，別國船只無法航行，英格蘭的旗幟曾在全世界的海洋上驕傲地飄揚，在這里卻被羞辱，大英帝國商人經營的貿易被壓制。在東面，俄羅斯同樣在進行系統性的擴張侵犯：切爾克斯已被擊垮；波斯先是順從，然后依附俄羅斯，最終被吞并。在波斯之外是阿富汗，目前已經成為俄羅斯入侵印度的通路。一旦跨過了印度河（Indus），還有什么能阻止俄羅斯之鷹飛向英屬印度的心臟？印度是俄羅斯窺伺之處。我們必須認真應對。[[32]](#_32_India__Great_Britain__and_Ru)

為了對抗想象中的俄羅斯威脅，英國開始在小亞細亞和高加索建立緩沖地帶。1838年英國占領了阿富汗，名義上是為了幫助國王舒亞·沙阿（Emir Shah Shuja）恢復王位，但是在王位恢復后，英軍卻繼續占領阿富汗，扶持舒亞·沙阿的傀儡政權。英國人的最終目的是在這里實現英國統治，但1842年阿富汗部落反叛，英軍遭遇災難性失敗，不得不撤出阿富汗。與此同時，英國增強了在德黑蘭的外交力量，試圖通過建立防衛同盟、承諾提供軍事援助等讓波斯人疏遠俄羅斯。在英國的壓力下，波斯軍隊撤離了赫拉特，并在1841年和英國簽署了貿易協議。英國甚至還曾考慮占領巴格達，以為阿拉伯人會把英國的行動看作把他們從土耳其人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即使這招不靈，阿拉伯人反對英國占領巴格達，遜尼派和什葉派穆斯林之間的矛盾也會削弱他們的反抗力量。用英國駐巴格達總領事亨利·羅林森（Henry Rawlinson）的話說，總可以想辦法“讓他們互斗”。羅林森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名軍官，著名的東方學家，他是第一個翻譯出在貝希斯敦（Behistun）發現的古波斯楔形文字的人。他積極鼓吹英國必須遏制俄羅斯對中亞、波斯和阿富汗地區的擴張，是這一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他認為英國應該建立一個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n）帝國并將其置于歐洲列強保護之下，作為對付俄羅斯在高加索擴張行動的緩沖地帶，同時還可以防止俄羅斯征服底格里斯（Tigris）和幼發拉底峽谷，這樣就可以切斷俄羅斯通往印度的道路。他甚至還建議派印度軍隊進攻格魯吉亞、埃里溫和納希切萬等地，這些地方雖然被俄羅斯通過《哈德良堡條約》占領，但英國從未承認其合法性。[[33]](#_33_R__Shukla__Britain__India_an)

羅林森還積極參與將英國援助送到高加索穆斯林部落手中的行動，這些部落一直在當地抗擊俄羅斯人。1834年一位新領袖沙米勒（Shamil）伊瑪目出現了，他的個人感召力很強，追隨者似乎把他當作一個刀槍不入，從天而降的首領。當地流傳著許多他的傳奇故事：勇敢作戰，擊敗俄軍，神奇地死里逃生等等。在這樣一位一呼百應的領袖的率領下，穆斯林部落重拾信心，繼續反抗俄羅斯的武裝斗爭。沙米勒部隊的優勢是他們與山區部落之間聯系密切，借助山區部落的支持，采用游擊戰術，搞得俄羅斯軍隊焦頭爛額。沙米勒的部隊可以說無處不在但又無影無蹤，村民隨時可以變成戰士，戰士也能在一瞬間變回村民。山區居民是沙米勒部隊的眼線，為他們刺探軍情，俄軍隨時都可能遭遇伏擊。沙米勒的部隊在俄軍外圍活動，對暴露在外的俄羅斯部隊、要塞和補給線發起突襲，然后消失在大山之中。他們很少與俄軍正面交鋒，因為知道敵不過俄軍人數和炮火上的優勢。俄軍對這些戰術束手無策，許多人從未經歷過這樣的戰斗。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俄軍只能通過投入越來越多的部隊，試圖在沙米勒的根據地車臣地區將其打敗，但卻毫無建樹。到1830年代末期，甚至連俄羅斯人也開始相信他刀槍不入的神話了。一個沙皇部隊里的將軍哀嘆道，沙米勒已成為一個“宗教神話里的軍事人物，就像伊斯蘭傳說中穆罕默德的劍讓四分之三的宇宙顫抖一樣”。[[34]](#_34_M__Gammer__Muslim_Resistance)

\* \* \*

但是對英國人來說，土耳其才是對付俄羅斯的最大緩沖區。他們很快明白，當初拒絕幫助蘇丹抵抗埃及軍隊入侵的決定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失去了一個極好的機會讓英國成為奧斯曼帝國內占主導地位的外國勢力。帕默斯頓認為這是“英國內閣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誤算”。既然這個機會已經錯過，英國人決定加倍努力，向高門施加影響，推動一系列改革解決奧斯曼帝國境內基督教人口的問題，希望不再給俄羅斯的干涉提供任何借口。

英國人相信政治改革的作用，認為以炮艦為后盾，他們可以將自己的自由主義原則輸出到全球各地。在他們看來，對奧斯曼帝國進行改革是解決東方問題的真正辦法，因為東方問題的根源是蘇丹統治下國家的衰落，治好了這個“病人”，東方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但是英國人推動自由主義改革的動機不僅僅是為了讓奧斯曼帝國不再依賴俄羅斯，同時也是為了擴大英國對土耳其的影響力：讓土耳其人依賴英國人的政治指導和金融貸款；將土耳其置于英國的軍事保護之下；讓土耳其人在英國人的監護下“文明化”，傳授給他們英國自由主義原則、宗教寬容以及政府管理方法等優點（不過議會和憲政被認為不適合傳授給土耳其人，因為他們缺乏必要的“歐洲”素質）；倡導英國的自由貿易原則（雖然好聽，但實際上可能對奧斯曼帝國有所傷害）；保證印度商路的安全（當然英國人是不會提倡對印度實施自由貿易的）。

英國人注意到，在蘇丹馬哈茂德二世執政的最后幾年，土耳其文化中出現了一些西化的表現，他們因此很受鼓舞，視之為改革成果。雖然蘇丹的軍事改革成效不大，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精英在衣著方式和生活習慣上有所變化：現代的束腰衣和氈帽取代了長袍和頭巾，男人的大胡子不見了，女性開始進入社會。這些表面的變化體現在一批新興的土耳其官員或紳士身上，這些所謂的“歐化土耳其人”（European Turk）掌握了外語，學會了西方習慣、做派和脾氣，但是在其他方面依然深植于傳統的伊斯蘭文化之中。

歐洲旅行家看到了土耳其人在行為舉止上的變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們的游記文字開始改變英國人對土耳其的看法。在這些出版物中，最為暢銷、影響最大的當屬朱莉婭·帕多（Julia Pardoe）的《1836年的蘇丹之城與土耳其人的生活習慣》（The City of the Sultan, and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36），從1837年到克里米亞戰爭開始，這本書共出了四版，賣出超過三萬冊。帕多的目的是為了糾正她認為的過去旅行者對奧斯曼帝國的偏見。她認為，從表面看來，土耳其人似乎符合所有歐洲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奇異、懶惰、感性、迷信、蒙昧、對宗教狂熱，但是一旦貼近仔細觀察，就不難發現他們身上的“高貴氣質”為其接受自由主義改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哪個不帶偏見的人會注意不到這里沒有嚴重的犯罪，下層人士身上帶著滿足感甚至為自己驕傲，上層人士身上則沒有自以為是和傲慢之氣？”帕多還認為“土耳其文明化”的唯一障礙是俄羅斯，“它已經對土耳其人施加了種種限制，在他們文明化的道路上設置諸多障礙，而且會毫不猶豫地將他們踩在腳下”[[35]](#_35_J__Pardoe__The_City_of_the_S)。

到1840年代時，這類觀點經常可以在眾多旅行筆記和親土派小冊子上看到。查爾斯·懷特（Charles White）在《君士坦丁堡三年》（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又稱《1844年土耳其人的生活習慣》（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一書中贊同英國人讓“土耳其人文明化”的努力，列舉了一些土耳其人習慣和行為獲得改善的例子，例如穿上西式服裝，拒絕宗教狂熱，以及“中間和下層”人士對教育的渴望。他寫道，在這兩個社會階層中：

善高于惡是毫無疑問的。沒有一個地方對社會和道德原則的遵守比這里更加嚴格，沒有一個地方能比這里看到更多正義廉潔、溫厚單純、熱愛家庭的例子，沒有一個地方侵犯人身財務的犯罪行為比這里更少。其原因一定是內心的誠實，而不是外部的防范措施。[[36]](#_36_C__White__Three_Years_in_Con)

與這個觀點緊密相關的是對伊斯蘭的浪漫同情，許多英國的親土派將伊斯蘭想象為一個良性的、進步的力量，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羅斯的東正教：極其迷信，甚至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厄克特就認為伊斯蘭是一股容忍而溫和的力量，保證了奧斯曼帝國內部各個基督教派別之間的和平相處，土耳其人大概也認為自己在扮演這樣的角色。厄克特寫道：

哪個旅行者沒有看到過這些教派的狂熱和仇恨，他們相互之間的敵意？但是又有誰把他們之間的和平相處歸功于伊斯蘭的包容性？伊斯蘭是平和、深思的，沒有教條，不強迫改教，目前正用自己含蓄靜默的特性對待其他教派。如果把這個管理者移走，那么敵意將重新出現在政府和軍營里，政治勢力和政治對立將與宗教勢力和宗教仇恨攪在一起，其結果是帝國變成一片血海，直到俄羅斯采用暴力恢復秩序。[[37]](#_37_Urquhart__England_and_Russia)

親土派的一些觀點得到了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勛爵（Lord Stratford de Redcliffe，1786—1880）的認同。在1852年封爵之前，他的名字是斯特拉特福德·坎寧（Stratford Canning），曾經五次出任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并直接指導了年輕的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與其改革派大臣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Mustafa Reshid Pasha，1800—1858）1839年之后的改革議程。他和喬治·坎寧（George Canning）是堂兄弟，喬治·坎寧曾任英國外交大臣，在1827年去世前還曾短暫地擔任過一段時間的首相。斯特拉特福德性格強勢，缺乏耐心，這也許和他家庭背景優越，從不需要擔心職位晉升有關。他剛從伊頓公學和劍橋大學畢業，年僅二十四歲時，就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到君士坦丁堡擔任特派全權代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在1824年第一次擔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時，很不喜歡土耳其，聲稱自己的使命是阻止這個國家“自毀”。在給堂兄喬治·坎寧的信中，他寫道，他的“秘密心愿”是讓土耳其人“帶上所有東西”滾出歐洲，還說他“詛咒歐洲的權力平衡，讓可惡的土耳其人因此得到保護”。但是他對俄羅斯的敵意遠遠超過了他對土耳其的厭惡。1832年，斯特拉特福德被任命為駐俄大使后，了解他恐俄立場的沙皇異乎尋常地拒絕在圣彼得堡接見他。俄羅斯在土耳其日益增長的勢力讓斯特拉特福德相信，只有自由主義的改革才能拯救奧斯曼帝國。

與厄克特和其他親土派不同，斯特拉特福德對土耳其了解有限。他不會說土耳其語，在奧斯曼帝國去過的地方也不多，絕大部分時間待在位于佩拉（Pera）的英國大使館或是位于特拉比亞（Therapia）的避暑地這些與外界隔絕的地方。他不看好土耳其制度的現代化，不同情甚至不了解伊斯蘭。在他看來，土耳其的唯一希望是全盤接受歐洲文明，而且必須是基督教文明，只有這樣才能從宗教蒙昧中解脫出來，走上理性啟蒙的道路。1832年他第二次擔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時看到的土耳其人在衣著和舉止上的西方化，讓他感到鼓舞，這些現象讓他相信，土耳其人如果不可能變得完美，至少可以改善。“和我上次在這里時相比，土耳其人完成了一場完全的蛻變，至少在衣著上。”他在給帕默斯頓的信中繼續寫道：

他們現在正處于從頭巾到帽子，從襯裙到馬褲的轉變中。在外表之下有多大的轉變我無法了解，但我知道除了基督教文明化之外沒有其他替代辦法。蘇丹的改革會成功嗎？我有所保留。不管怎么樣，這肯定是一個艱巨緩慢的過程，如果不是不可實現的話。[[38]](#_38_S__Lane_Poole__The_Life_of_t)

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斯特拉特福德斷斷續續地向蘇丹和他的改革派大臣們講授了如何以英國的方式讓土耳其自由化的策略。

對于斯特拉特福德所希望看到的、在奧斯曼帝國改革的前沿出現的歐化土耳其人，穆斯塔法·雷希德是一個完美的例子。在回憶錄中，斯特拉特福德寫道：“他的出生和所受的教育讓他成為紳士，性格善良，崇尚自由。在他的種族和階層中，雷希德最能得到我的贊同。”雷希德長得矮小粗壯，留著黑色絡腮胡，臉上表情豐富。他曾是高門派駐倫敦和巴黎的大使，英語和法語都說得很好，在法國的戲院和沙龍中頗為引人注目，于1837年升為外交部長。同19世紀土耳其的許多改革派人物一樣，他和歐洲共濟會（European Freemasons）有聯系，在1830年代加入了倫敦的一個共濟會會所。在當時，對于雷希德這樣傾向西方的土耳其人來說，加入共濟會可以讓他們既擁抱西方的世俗理念，又不必放棄穆斯林信仰或遭受叛教指控（叛教直到1844年還是死罪）。受到西方的啟發，雷希德希望將奧斯曼帝國轉變成為一個現代君主國家，蘇丹在位但無權統治，教士的權力受到限制，帝國事務則由一批新型的受到啟蒙的官僚主理。[[39]](#_39_S__Lane_Poole__The_Life_of_t)

1839年，年僅十六歲、剛成為蘇丹的阿卜杜勒-邁吉德發布《玫瑰堂詔書》（Hatt-i Şharif of Gülhane），宣布了一系列改革，其中第一項稱為“坦齊馬特”（Tanzimat）[†††](#____Yi_Wei__Ge_Xin________Yi_Zhu)。阿卜杜勒-邁吉德在位期間（1839—1861），一直在推動坦齊馬特，最終在1876年，奧斯曼帝國成立了第一個議會。這份詔書由雷希德帕夏在1838年起草，他當時第二次被派往倫敦擔任大使，在倫敦布萊恩斯頓廣場（Bryanston Square）的住所完成草稿，交給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獲得首肯。詔書的行文很明顯地體現了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的價值觀，向蘇丹的臣民承諾，無論信仰什么，每個人的安全、榮譽和財產都能獲得保障；它強調法治、宗教寬容、制度現代化、公平合理的中央稅收和征兵系統。在本質上，詔書希望通過給予奧斯曼帝國最活躍的人口——非穆斯林的米利特——個人自由上的保障，來提升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在過去，穆斯林對占人口少數的米利特的不公正對待一直是社會不穩定的根源。[[40]](#_40_A__Cunningham__Eastern_Quest)

起草詔書在多大程度上是為了吸引英國的支持來幫助深陷危機的奧斯曼帝國，這尚有爭議。詔書終稿還曾被當時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龐森比修改過，有些用自由主義語言裝點門面、顯示英國特色的痕跡，但這并不能說明詔書是言不由衷的，或是為吸引英國人不得已而為之。這份詔書確實體現了土耳其自由派相信奧斯曼帝國需要改革的真誠心愿，雷希德和他的追隨者們相信，為了拯救奧斯曼帝國，他們最終必須創建一個將帝國團結在一起的全新的世俗理念，即奧斯曼主義（Ottomanism），這一理念的基礎是不論信仰如何，每一個蘇丹的臣民都是平等的。改革派對此事的認真，以及他們對保守派可能的反對方面的考慮，還體現在詔書的遣詞造句上，他們把詔書中開放的權利描述成是為了保衛伊斯蘭傳統以及“光輝的《古蘭經》”信條。事實上，蘇丹和許多著名的改革派人物，包括穆斯塔法·雷希德和1839—1841年間擔任首相的穆罕默德·胡斯雷夫（Mehmet Hüsrev）都跟嚴格強調伊斯蘭法教學的納格什班底耶教團（Naqshbandi lodges）有密切的聯系。從許多方面看，坦齊馬特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嘗試創建一個更加中央集權但同時更有容忍度的伊斯蘭國家。[[41]](#_41_B__Abu_Manneh___The_Islamic)

但是奧斯曼政府并沒有努力將這些崇高的宣言變成現實，其中最大的障礙，是詔書中提高基督教人口生活條件的條款引發了來自傳統穆斯林教士和保守派的反對。基督徒的生活條件只略微獲得了改善。1844年蘇丹廢除了叛教的死罪，但還是有一小部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和改信伊斯蘭的基督徒被地方當局處死。褻瀆教義依然是死罪。有些軍事院校開始接收基督徒，基督徒也必須開始服兵役，但是因為在軍隊里升遷的可能性不高，許多基督徒選擇繳納一筆特殊稅以避免服役。從1840年代開始，基督徒可以成為地方議會的成員監督地方官的工作，基督徒還可以在自由應用西方法律原則的商業法庭上和穆斯林一起擔任陪審員。但除此之外，基督徒的生活沒有什么改變，奴隸貿易仍在繼續，在君士坦丁堡奴隸市場上被販賣的大部分是從高加索地區抓來的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土耳其人依然把基督徒當作下等人，認為不應放棄穆斯林享有的特權。雖然有些法律改了，但是很多明文規定或是不成文的規矩慣例依然把基督徒當作二等公民。然而，在奧斯曼帝國中，基督徒正迅速成為一群經濟實力很強的人，有些人還通過取得外國護照、獲得外國保護來逃稅。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的巨大反差，日益成為族群關系緊張和嫉恨的原因。

1842年，斯特拉特福德第三次被任命為駐奧斯曼帝國大使。回到君士坦丁堡時，他對坦齊馬特改革的前景越來越感到失望。蘇丹太年輕、雷希德太弱，兩人都無法與樞密院（Divan）內漸占上風的保守派抗衡。改革進程還和個人恩怨糾纏在一起，特別是雷希德和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met Ali Pasha）[‡‡‡](#_______Qing_Wu_Yu_Qian_Wen_Ti_Da)之間的個人矛盾。穆罕默德·阿里曾是雷希德的親信，在1841—1844年間擔任駐倫敦大使，1846年升任外交部長，1852年取代雷希德成為首相。雷希德對此萬分嫉恨，甚至在1850年代早期加入反對給予基督徒權利的穆斯林反對派陣營，希望借此把穆罕默德·阿里拉下馬。蘇丹的改革議程還面臨實際操作上的困難：奧斯曼帝國沒有鐵路、郵局、電報和報紙，在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君士坦丁堡往往顯得山高皇帝遠。

但是改革最大的阻力還是來自傳統的精英階層，不只穆斯林，米利特的宗教領袖也反對改革，他們覺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坦齊馬特改革的打擊。所有米利特，特別是希臘教會，全都提出了抗議。在亞美尼亞教會，世俗主義者還幾乎發動了一場政變。但最抗拒改革的是伊斯蘭宗教領袖和精英。在奧斯曼帝國，地方總督和穆斯林教士的利益是建立在傳統米利特制度歧視基督徒的基礎之上的。高門越是想推動中央集權和改革，伊斯蘭宗教領袖和精英就越積極煽動穆斯林的怨氣，把政府描繪成被“異教徒”把持、依賴外國勢力掌權的地方。在宗教領袖的鼓勵下，許多市鎮的穆斯林上街示威反對改革，出現了針對基督徒的暴力事件。一些教堂被毀，甚至還有人威脅要燒毀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區。

看到這一景象，斯特拉特福德·坎寧面臨一個道德難題：如果一個穆斯林政府不能阻止對基督教公民的迫害，那么英國是否應該繼續支持它？1850年2月，在聽到魯米利亞（Rumelia，后屬保加利亞）的基督徒被“殘忍地屠殺”的消息后，斯特拉特福德·坎寧陷入極度沮喪中。在給外交大臣帕默斯頓的信中，他用陰郁的語氣寫道：“改善的努力現已失敗。”

這個國家最大的問題是宗教……雖然伊斯蘭主義（Islamism）總體上來說給國家帶來了力量和生機，但它是建立在獲勝種族的霸權以及長期的暴力統治基礎上的。可以不過分地說，這個國家能在重新走向繁榮和獨立的道路上走多遠，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從不公正和軟弱的源頭掙脫出來。

帕默斯頓同意奧斯曼帝國對基督徒的迫害不僅招致俄羅斯的干涉，還讓俄羅斯人的所作所為合法化了。在他看來，英國沒有其他選擇，只能撤回對奧斯曼政府的支持。在第二年11月寫給雷希德的信中，他預計奧斯曼帝國將“因為其君主和大臣們的膽怯、虛弱和遲疑而垮臺，很顯然，我們不能再等太長時間，必須開始考慮在這以后應該如何安排”。[[42]](#_42_FO_97_413__Stratford_to_Palm)

與此同時，英國介入土耳其政治事務引發了穆斯林對西方干預的反感。到1850年代早期，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的地位已遠遠不只是英國大使或是高門顧問了，他在君士坦丁堡被稱為“特權大使”（Great Elchi），對土耳其政府事務有直接影響力。那個時代，倫敦和君士坦丁堡之間還沒有電報，來自白廳（Whitehall）[§§§](#SSSSSS_Lun_Dun_De_Yi_Tiao_Jie__S)的指示通常需要幾個月才能到達，因此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在英國對奧斯曼帝國的政策上有相當大的靈活處理空間。蘇丹手下的高官們對他十分反感，非常害怕這個頤指氣使的大使來找自己麻煩。地方貴族和伊斯蘭教士對他維護基督徒的努力亦非常敵視，認為他對政府的干涉侵犯了帝國的主權。土耳其人對外國勢力——不管是英國、法國還是俄羅斯——干預奧斯曼帝國事務所產生的敵意，將對克里米亞戰爭前夕土耳其的政策制定產生很大的影響。

[\*](#_25) Millet為土耳其語，指土耳其的宗教團體。在米利特制度下，非穆斯林人和穆斯林一樣都是帝國的臣民，但不受伊斯蘭信仰及法律的約束或管制。——編注

[†](#_26) 正式名稱為亞美尼亞使徒教會（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編注

[‡](#_27) 意為教法闡述人。——譯注

[§](#SS_1) 伊斯蘭國家有名望的神學家和教法學家的統稱。——譯注

[¶](#P_1) 皇后的伴娘，俄羅斯詩人費多爾·丘特切夫（Fedor Tiutchev）的女兒。——譯注

[\*\*](#_28) 今沙特西部。——譯注

[††](#_29) 指地中海東部沿海地區。——譯注

[‡‡](#_30) 英國政府1784年根據《東印度公司法案》設立的對印度實施管理的機構。——譯注

[§§](#SSSS_1) 波斯國王的頭銜。——譯注

[¶¶](#PP_1) 約三千二百千米。——編注

[\*\*\*](#_32) 即一個國家被共產政權統治，一連串國家都會轉投共產主義陣營。——譯注

[†††](#_40) 意為“革新”。——譯注

[‡‡‡](#_42) 請勿與前文提到的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混淆。——原注

[§§§](#SSSSSS) 倫敦的一條街，是英國政府部門所在地。——譯注

注釋

[[1]](#_1_2)R. Nelson, Hagia Sophia, 1850–1950: Holy Wisdom Modern Monument (Chicago, 2004), pp. 29–30.

[[2]](#_2_2)R. Nelson, Hagia Sophia, 1850–1950: Holy Wisdom Modern Monument (Chicago, 2004), p. 30.

[[3]](#_3_2)N. Teriatnikov, Mosaics of Hagia Sophia, Istanbul: The Fossati Restoration and the Work of the Byzantine Institute (Washington, 1998), p. 3; The 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 Laurentian Text, trans. S. Cross and O. Sherbowitz-Wetzor (Cambridge, Mass., 1953), p. 111.

[[4]](#_4_2)T. Stavrou, ‘Russian Policy in Constantinople and Mount Atho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 L. Clucas (ed.), The Byzantine Legacy in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1988), p. 225.

[[5]](#_5_2)Nelson, Hagia Sophia, p. 33.

[[6]](#_6_2)A. Ubicini, Letters on Turkey, trans. Lady Easthope,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18–22.

[[7]](#_7_2)D. Hopwood,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1969), p. 29.

[[8]](#_8_1)S. Pavlowitch,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Serbia, 1837–39 (Paris, 1961), p. 72; B. Lewis,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Turkey (Oxford, 2002), p. 31.

[[9]](#_9_1)F. Bailey, British Policy and the Turkish Reform Movement, 1826–1853 (London, 1942), pp. 19–22; D. Ralston, Importing the European Army: The Introduction of European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Institutions into the Extra-European World, 1600–1914 (Chicago, 1990), pp. 62–3.

[[10]](#_10_2)W. Miller, The Ottoman Empire, 1801–1913 (Cambridge, 1913), p. 18.

[[11]](#_11_1)V. Aksan,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2007), p. 49.

[[12]](#_12_1)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41–2.

[[13]](#_13_1)A.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Arm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815–1833 (Oxford, 2006), pp. 33–4, 101–4; Aksan, Ottoman Wars, pp. 290–96; T. Prousis,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reek Revolution (De Kalb, Ill., 1994), pp. 31, 50–1.

[[14]](#_14_1)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1, pp. 8, 19; L. Vyskochkov, Imperator Nikolai I: Chelovek i gosudar′ (St Petersburg, 2001), p. 141; M. Gershenzon, Epokha Nikolaia I (Moscow, 1911), pp. 21–2.

[[15]](#_15_1)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9), pp. 96–7.

[[16]](#_16_2)R.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vol. 1: From Peter the Great to the Death of Nicholas I (Princeton, 1995), p. 382; D. Goldfrank, ‘The Holy Sepulch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Crimean War’, in E. Lohr and M. Poe (eds.),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1450–1917 (Leiden, 2002), pp. 502–3.

[[17]](#_17_1)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p. 167–76.

[[18]](#_18_2)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 187.

[[19]](#_19_2)Aksan, Ottoman Wars, pp. 346–52.

[[20]](#_20_1)P. Schroe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uropean Politics, 1763–1848 (Oxford, 1994), pp. 658–660.

[[21]](#_21_1)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 36.

[[22]](#_22_1)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p. 361–2, 366.

[[23]](#_23_2)FO 97/404, Ponsonby to Palmerston, 7 July 1834;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135–60.

[[24]](#_24_2)F. Lawson, The Social Origins of the Egyptian Expansionism during the Muhammad Ali Period (New York, 1992), chap. 5; Aksan, Ottoman Wars, pp. 363–7; A. Marmont,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Turkish Empire, trans. F. Smith (London, 1839), p. 289.

[[25]](#_25_1)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pp. 468–69.

[[26]](#_26_1)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 235.

[[27]](#_27_1)FO 181/114, Palmerston to Ponsonby, 6 Dec. 1833; P. Mosely, Russian Diplomacy and the Opening of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1838 and 1839 (Cambridge, Mass., 1934), p. 12; Bailey, British Policy, p. 53.

[[28]](#_28_1)L. Levi, History of British Commerce, 1763–1870 (London, 1870), p. 562; Bailey, British Policy, p. 74; J. Gallagher and R.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 6/1 (1953); FO 78/240, Ponsonby to Palmerston, 25 Nov. 1834; D. Urquhart, England and Russia (London, 1835), p. 110.

[[29]](#_29_1)B. Kingsley Martin,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3), p. 85.

[[30]](#_30_1)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p. 103.

[[31]](#_31)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211–2, 220.

[[32]](#_32_1)India, Great Britain, and Russia (London, 1838), pp. 1–2.

[[33]](#_33)R. Shukla, Britain, India and the Turkish Empire, 1853–1882 (New Delhi, 1973), p. 27.

[[34]](#_34)M. Gammer,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ya and Dagestan (London, 1994), p. 121.

[[35]](#_35)J. Pardoe, The City of the Sultan; and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36, 2 vols.(London, 1854), vol. 1, p. 32.

[[36]](#_36)C. White, Three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or, Domestic Manners of the Turks in 1844, 3 vols. (London, 1846), p. 363. 也請參見 E. Spencer, Travels in Circassia, Krim-Tartary, &c., including a Steam Voyage down the Danube from Vienna to Constantinople, and round the Black Sea in 1836, 2 vols. (London, 1837).

[[37]](#_37)Urquhart, England and Russia, p. 86.

[[38]](#_38)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17.

[[39]](#_39)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104. 有關19世紀土耳其共濟會，請參見Paul Dumont的眾多著作，包括‘La Turquie dans les archives du Grand Orient de France: Les loges maçnniques d’obédience françise à Istanbul du milieu du XIXe siècle à la veill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in J.-L. Bacqué-Grammont and P. Dumont (eds.), économie et société dans l’empire ottoman (fin du XVIIIe siècle–début du XXe siècle) (Paris, 1983), pp. 171–202.

[[40]](#_40_1)A.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2 vols. (London, 1993), vol. 2, pp. 118–9.

[[41]](#_41)B. Abu Manneh, ‘The Islamic Roots of the Gulhane Rescript’, in id., Studies on Islam and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tanbul, 2001), pp. 83–4, 89.

[[42]](#_42_1)FO 97/413, Stratford to Palmerston, 7 Feb. 1850;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 215.

# 第三章 俄國威脅

1844年6月1日星期六晚，一艘荷蘭蒸汽機船駛入倫敦東部泰晤士河下游的伍利奇（Woolwich）碼頭，船上的乘客只有“奧爾洛夫伯爵”（Count Orlov）和他的隨從。奧爾洛夫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化名，這次他是從圣彼得堡專程私服訪問英國的。自從1831年俄羅斯軍隊殘酷鎮壓波蘭起義之后，尼古拉一直擔心被波蘭民族主義分子刺殺，所以習慣私服出訪。倫敦有許多波蘭流亡者，1月份兩國政府討論沙皇訪問英國的安排時，沙皇的人身安全一直是一個重要議題。為保障安全，沙皇的行程沒有透露給任何人，車隊只在柏林稍作停留，就飛快地跨過歐洲大陸。直到5月30日尼古拉在漢堡登船后，英國方面才被通知沙皇即將到訪，此時離他抵達倫敦僅有兩天時間了。

甚至俄羅斯駐倫敦大使布魯諾夫男爵（Baron Brunov）也不知道沙皇的具體抵達時間，所以他只好一整天都等在伍利奇碼頭上，最后在晚上十點，沙皇的蒸汽機船終于駛入碼頭。尼古拉身穿1828年俄土戰爭時期穿過的灰色大衣，幾乎讓人認不出來。上岸后他和隨行人馬立即入住位于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阿什伯納姆大樓（Ashburnham House）的俄羅斯大使館。盡管時間已晚，尼古拉還是馬上派人給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的丈夫傳信，要求盡快與女王見面。在圣彼得堡，沙皇習慣于不分白天黑夜隨時召見手下，所以不會想到在凌晨時分吵醒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是件很不禮貌的事情。[[1]](#_1_S__Tatishchev___Imperator_Nik)

這不是尼古拉第一次訪問倫敦。早在1816年，當時不過二十歲，還是大公爵的尼古拉訪問倫敦，深得上流社會女士們的歡迎。當時宮廷內著名美女、威爾士親王夫人（Princess of Wales）的女侍官夏洛特·坎貝爾夫人（Lady Charlotte Campbell）驚嘆道：“多么可愛的人兒！魔鬼般的英俊！他一定是歐洲最英俊的男人！”那次訪問讓他覺得英國皇室貴族會成為他的盟友。作為世界最大國家的獨裁者，他完全無法理解君主立憲制下英國君主權力有限，以為可以來英國與女王和她的高級大臣們直接決定兩國外交事務。他對維多利亞女王說：“能夠時不時地面談真是件好事，有時候沒法完全相信外交官”，兩個君主之間的會面能創造“一種友誼和關懷的感覺”，“如果能在一次會面把感覺、觀點和動機解釋清楚，那將勝過無數報告和信件”。沙皇覺得俄羅斯和英國之間可以達成一個“君子協定”，共同處理奧斯曼帝國崩潰后的局面。[[2]](#_2_E__Stockmar__Denkwurdigkeiten)

這已經不是尼古拉第一次試圖從其他歐洲列強那里尋求支持，共同瓜分奧斯曼帝國。1829年，當他預見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時，也曾向奧利地建議雙方瓜分奧斯曼帝國在歐洲的領土以避免戰后的混亂局面，但是那一次奧地利沒有被他說服，而是支持歐洲協調體系。到1843年秋天，他再次向奧地利提議建立一個由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三國，即1815年的三國聯盟（Triple Alliance）扶持的希臘帝國，以防止奧斯曼帝國垮臺后英國和法國插手搶奪地盤。尼古拉堅持俄羅斯沒有擴張到巴爾干的野心，為此他建議由奧地利占領從多瑙河到亞得里亞海（Adriatic）所有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領土，把君士坦丁堡變成一個不設防城市，由奧地利負責守衛。但是不管他怎么努力，都無法消除奧地利對俄羅斯的戒備之心。奧地利駐圣彼得堡大使相信，沙皇企圖經營出某種局面，讓俄羅斯可以借口保衛土耳其而干涉其事務，從而通過武力推行俄羅斯的瓜分方案。他認為，俄羅斯的真實目的，不是維持一個三國聯盟保護下的希臘帝國，而是“一個在經濟、理念和宗教上與俄羅斯相聯，由俄羅斯派出的親王統治”的國家，“俄羅斯從未放棄這個目標，這是俄羅斯實現其理想的必由之路……現在的希臘將會成為俄羅斯擴張機會的一部分”。[[3]](#_3_G__Bolsover___Nicholas_I_and)由于對俄羅斯的動機深懷戒心，因此除非取得英法兩國的同意，奧地利不想染指俄羅斯的分治方案。于是尼古拉現在就親自來到倫敦，希望說服英國接受他的想法。

從表面上看，尼古拉想要和英國結成聯盟的想法不太現實。英國一直致力于幫助奧斯曼帝國進行自由主義改革，并將俄羅斯視為主要威脅。但是，讓沙皇感到鼓舞的是，最近英國和俄羅斯之間的關系有所緩和，原因是兩國都對法國在中東地區的活動產生了警覺。

1839年，在法國的支持下，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再次在敘利亞發動叛亂，埃及軍隊擊敗了奧斯曼帝國的部隊。人們開始擔心他們會像六年前一樣，直逼君士坦丁堡。當奧斯曼帝國海軍在亞歷山大港附近被埃及海軍打敗之后，年輕的蘇丹阿卜杜勒-邁吉德已沒有辦法靠自己的能力拒絕穆罕默德·阿里對敘利亞和埃及世襲繼承權的要求了，高門只好像六年前那樣再次向歐洲列強求援。1833年埃及第一次叛亂時，俄羅斯獨自行事替蘇丹挽回了局面，這次沙皇希望能與英國合作保護蘇丹，目的是避免英法兩國在這件事上走到一起。

和俄羅斯一樣，英國對法國日益卷入埃及事務感到警覺，埃及是拿破侖在1798年宣稱要摧毀大英帝國的地方。在1830年代，法國大量投資埃及的棉花經濟作物和工業經濟，派出軍事顧問幫助埃及訓練陸軍和海軍。在法國的支持下，不僅埃及人成為對土耳其統治的主要威脅，穆罕默德·阿里作為強大的伊斯蘭復興運動的領袖，反抗外國干涉奧斯曼帝國內基督教地區事務，也激發了高加索地區穆斯林叛軍反沙皇統治的斗爭。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英國、奧地利和普魯士共同呼吁穆罕默德·阿里從敘利亞撤軍，接受列強提出的和平條件，這些條件在1840年的倫敦會議（London Convention）上擬定并由四強和奧斯曼帝國共同簽署，同意給予穆罕默德·阿里對埃及的世襲繼承權。為保證叛軍撤離，一支英軍艦隊行駛至亞歷山大附近，另一支英國奧地利聯軍則進駐巴勒斯坦。穆罕默德·阿里先是不愿讓步，希望能得到法國的支持；當法國表示拒絕和平條件并聲稱將會支持穆罕默德·阿里時，人們開始擔心一場歐戰將會爆發。但是在最后關頭，因為不想卷入戰爭，法國還是同意了和平條件，穆罕默德·阿里不得不從敘利亞撤出。隨后法國人很不情愿地在1841年的倫敦會議上簽署了和平條件，穆罕默德·阿里獲得了埃及的世襲繼承權，條件是他承認蘇丹對奧斯曼帝國其他地方的主權。

1841年倫敦會議的重要性不僅在于讓穆罕默德·阿里撤軍，還規定在戰爭爆發時，連接黑海與地中海的海峽將對除蘇丹盟軍以外的外國軍艦關閉，這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讓步，因為這樣英國軍艦就能駛過海峽進入黑海，直接威脅俄羅斯南部邊疆的薄弱地帶。簽署這份條約后，俄羅斯實際上放棄了自己在奧斯曼帝國的主導位置和對海峽的控制權，沙皇希望能以此改善與英國的關系，孤立法國。

從沙皇的角度來看，扶持蘇丹只能是權宜之計。他認為，現在法國因為支持叛軍而削弱了自己的影響力，俄羅斯與英國又在中東問題上達成一致，倫敦會議的成功，讓俄羅斯與英國有了結成同盟的可能。1841年英國政權更迭，由羅伯特·皮爾爵士（Sir Robert Peel）領導的保守黨政府上臺，這給沙皇帶來了更多的希望，因為保守黨不像上屆由墨爾本勛爵（Lord Melbourne，1835—1841年在任）領導的輝格黨（Whig）政府那么敵視俄羅斯。沙皇相信保守黨政府會更愿意聽取他的建議，讓歐洲在英俄兩國的領導下共同決定奧斯曼帝國的未來。在1844年親自前往倫敦時，沙皇對說服英國參與他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計劃充滿了信心。

沙皇在6月的突然造訪，把英國政府搞得措手不及。英俄雙方的確從當年春天起就在商討沙皇訪英一事，但是談得很隨意。3月2日在“倫敦酒館”（London Tavern）為俄羅斯貿易公司（Russian Trading Company）舉行的宴會上，首相皮爾對沙皇訪英的建議表示歡迎。三天之后，外交大臣阿伯丁勛爵（Lord Aberdeen）通過俄羅斯駐英國大使布魯諾夫男爵發出了正式邀請，并向沙皇保證他的造訪將“在英國消除任何波蘭人宣揚的對俄羅斯的偏見”。布魯諾夫在給外交部長涅謝爾羅迭的信中寫道：“阿伯丁是一個含蓄又愛擔心的人，連他對這事都這么有信心，那就很說明問題了。”維多利亞女王起先不是很愿意接見尼古拉一世，因為她的舅舅、新近獨立的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Leopold）長期和沙皇有紛爭。利奧波德在1830年代把許多波蘭流亡者吸收到了自己的軍隊中。作為神圣同盟的支持者，尼古拉打算出手干預，恢復被1830年法國和比利時的革命運動打亂的君主制，但是他的這一計劃因為同年11月的華沙革命而未能實現。因為他曾威脅軍事干預，西方的自由主義者對他很不信任，把他稱為“歐洲憲兵”，許多因革命失敗而逃亡海外的波蘭人則發現巴黎、布魯塞爾和倫敦都很歡迎他們。這些紛爭讓維多利亞女王感到擔憂，但最終還是她丈夫阿爾伯特親王（他是利奧波德國王的侄子）說服了她，認為沙皇訪英有助于修復歐洲皇室之間的關系。在她發出的邀請信中，她說希望能在5月底6月初會面，但是具體日期未定。到5月中旬時，英國方面依然不能肯定沙皇是否會到訪，當女王得知沙皇終于要來的時候，尼古拉的蒸汽機船還有幾個鐘頭就要抵達倫敦了。這一消息讓女王的手下措手不及，亂作一團，而且薩克森王國（Saxony）的國王正好也是同一天到訪，許多準備工作只能匆匆應急完成。[[4]](#_4_Tatishchev___Imperator_Nikola)

沙皇這次即興造訪，是他性情變得越來越急躁的表現之一。做了十八年沙皇后，他登基早期所表現出來的典型性格：謹慎、保守、含而不露等漸漸消失了。在執政晚期，他日益受到家族遺傳精神疾病的困擾，他的哥哥亞歷山大一世也有同樣的癥狀。尼古拉變得做事浮躁，缺乏耐心，經常沖動行事，比如貿然前往倫敦，將自己的想法強加在英國人身上。他的古怪行為被阿爾伯特親王和維多利亞女王注意到了，女王在給她舅舅利奧波德的信中寫道：“阿爾伯特覺得此人不能很好地控制沖動和情緒，因而會做出不當的舉動。”[[5]](#_5_Martin__The_Life_of_His_Royal)

在沙皇抵達倫敦的第二天，維多利亞女王在白金漢宮接見了他。他還與劍橋公爵（Duke of Cambridge）、威靈頓公爵和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會面，之后游覽了倫敦西區時髦的街道。沙皇視察了因1834年大火而正在重建中的議會大廈，參觀了完工不久的攝政公園（Regent’s Park）。晚上賓主一起坐火車前往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之后的五天里，沙皇一直住在那里。沙皇簡樸的生活習慣把溫莎城堡的仆人驚呆了，他的貼身男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馬廄找一些干草，填到隨身攜帶的一個皮制套子里，放在一張行軍床上當作床褥。尼古拉從來就是這么睡的。[[6]](#_6_Tatishchev___Imperator_Nikola)

當時維多利亞已懷孕了相當一段時間，而且還在為阿爾伯特親王的父親戴孝，因此沒有為沙皇舉辦皇家舞會。但是其他的娛樂活動并不少：狩獵聚會、檢閱儀仗隊、出席皇家賽馬會（Ascot）等等。為了向沙皇致敬，皇家賽馬會還把授予獲勝者的“金杯”（Gold Cup）改名為“皇帝金盤”（Emperor’s Plate）[\*](#__Ke_Li_Mi_Ya_Zhan_Zheng_Bao_Fa)，女王還陪同沙皇一起聽了一次歌劇。在一場豪華宴會上，六十名賓客享用了五十三道菜，餐具是皇室的“大宴餐具”（Grand Service），可能是世界上最精致的一套銀邊瓷器了。沙皇在倫敦的最后兩次晚餐上，所有男賓都在尼古拉的要求下穿軍裝出席，因為他不習慣穿晚餐正裝，他還向維多利亞女王坦言，如果沒有穿軍裝，自己會覺得很不自在。[[7]](#_7_Tatishchev___Imperator_Nikola)

從公關的角度來看，沙皇對倫敦的訪問非常成功。上流社會的女士們為他英俊的相貌和優雅的舉止所傾倒。“他依然對女性之美十分欣賞，”斯托克馬男爵（Baron Stockmar）寫道，“對他的英國舊愛表現得極為關切。”維多利亞女王對他的看法也有所改善，欣賞他“端莊優雅”的風度、對孩子的慈愛和真誠的態度，但是她覺得尼古拉很憂郁。“他留給阿爾伯特和我的印象是他不是很開心，他的地位和權力帶來巨大的壓力，讓他在重壓下感到痛苦，”她在6月4日給利奧波德的信中寫下了她的觀察，“他很少笑，如果笑也不是開心的笑。”一星期后，沙皇訪英行程幾近結束，這時維多利亞女王又給她舅舅寫信，信中她對尼古拉的評價十分深入：

他身上有許多東西我很難不感到喜歡，我覺得他的性格應該被人理解，不要帶任何先入為主的觀念。他既嚴格又嚴厲，對“責任”有固執的理解，這一點什么都改變不了。我覺得他并非“聰明機智”，他的心智也尚未開化，沒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只關心政治和軍事，對藝術和其他軟性活動沒有什么感覺，但是我很肯定他是真誠的，即使他在獨斷專行的時候，也真的相信那是唯一的統治辦法。

墨爾本勛爵是輝格黨中的反俄派，但是當他在輝格黨腹地奇西克大樓（Chiswick House）與尼古拉共進早餐時，兩人卻相談甚歡。即使是輝格黨的前外交事務發言人帕默斯頓勛爵這個對俄羅斯政策上的強硬派，也認為讓沙皇“對英格蘭留下個好印象”很重要：“他手中權力很大，可能做有利于我們的事，也可能傷害我們，取決于他對我們是心懷善意還是敵意。”[[8]](#_8_The_Letters_of_Queen_Victoria)

在訪英期間，沙皇與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還有皮爾和阿伯丁勛爵有過好幾次政治會談。英國人對他的坦誠感到驚訝，女王甚至認為他“過于坦率了，在那么多人面前把話說得那么直白，他不應該那么做，但是他忍不住”，她在給利奧波德的信中這么寫道。沙皇認為坦誠是讓英國人克服對俄羅斯的疑心和偏見的唯一辦法。“我知道有人認為我在裝模作樣，”他對皮爾和阿伯丁說道，“但是我沒有。我是絕對直截了當的，我只會和你說我真心想的，真心保證會做的事。”[[9]](#_9_Martin__The_Life_of_His_Royal)

在談到比利時時，沙皇表示他愿意與利奧波德修復關系，但是“當比利時國王的軍隊中依然有波蘭軍官服役時”，恢復關系“是完全不可能的”。他對阿伯丁勛爵“不是以一個皇帝的身份對一個大臣說話，而是以一個紳士的身份對另一個紳士”解釋自己的想法，表達自己對西方雙重標準的反感：

波蘭人依然在反抗我的統治。如果有一批人叛亂反抗一個紳士，另一個紳士卻接納那批人成為自己的手下，這樣的行為能讓人接受嗎？利奧波德收入麾下的正是發動叛亂反抗我的波蘭軍人。如果我接納奧康奈爾（O’Connell）[†](#__Ao_Kang_Nai_Er_Wei_Ai_Er_Lan_D)，還想讓他擔任我手下的部長，你們會怎么想？

談到法國時，尼古拉希望英國能與俄羅斯聯手，共同遏制法國。英國人自拿破侖戰爭以來一直不信任法國人，尼古拉從這點出發，對皮爾和阿伯丁勛爵表示再不能容忍法國“制造混亂，出兵境外”。他希望英俄兩國結成聯盟，共同對付法國。“通過我們的友好交流，”沙皇帶著感情說道，“我希望能消除兩國之間的偏見。我對英國朋友的意見高度重視，對法國，我則嗤之以鼻。”[[10]](#_10_Tatishchev___Imperator_Nikol)

尼古拉與皮爾和阿伯丁勛爵會談的一個主要議題是法國在中東地區的活動，他特別希望以此來調動英國人的情緒。“土耳其是一個垂死之人，”他說道。

我們也許可以努力讓它活著，但是我們不會成功。它會，也應該死去。那將會是一個緊要關頭。我預計到時候我必須動員俄羅斯軍隊準備戰斗，奧地利也會做同樣的準備。在這一危機中我最擔心的是法國。它想要干什么？我預計它會在幾個方向同時出擊：埃及、地中海，還有近東。還記得[1832年]法國對安科納（Ancona）的軍事行動嗎？它為什么不會對克里特島和士麥那（Smyrna）采取同樣的行動呢？如果法國真的動手了，難道英國不會調動軍艦嗎？果真如此的話，那些地區陸地上將是俄羅斯和奧地利的陸軍，海上是英國的艦隊，一場災難恐怕難以避免。

沙皇指出，現在時機已到，歐洲列強應該在俄羅斯和英國的領導下協調出一套瓜分奧斯曼帝國領土的方案，這樣至少能避免一旦奧斯曼帝國崩潰而引發的列強相互爭奪的混亂局面，減少國內革命和歐洲大戰的可能。皮爾和阿伯丁勛爵都對沙皇堅信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俄羅斯和英國應該合作應對這一點印象深刻，俄英合作至少能阻止法國侵吞埃及和東地中海，這一點是英國當時最為關心的。尼古拉對皮爾說：

我對土耳其領土沒有一寸的野心，但我也不允許法國侵占它一寸的領土……我們不能明文宣示應該如何在土耳其倒下時瓜分其領土，這樣做只會加速它的死亡，因此我會盡我所能維持現狀。但是我們必須真誠理性地看待它最終會崩潰這一事實，我們應該對此做理性的思考，努力在這個問題上取得直接而真誠的一致意見。[[11]](#_11_Tatishchev___Imperator_Nikol)

皮爾和阿伯丁勛爵都同意應該為奧斯曼帝國崩潰后的局面提前做好準備，但只在必要的時候才這樣做，他們覺得現在時機還沒有到。根據會談的結論，布魯諾夫起草了一份秘密備忘錄，尼古拉和阿伯丁勛爵都對內容表示同意，但未簽署。

離開英國時，沙皇堅信他與皮爾和阿伯丁勛爵之間的會談是對雙方共同政策的陳述，現在他可以期待英國與俄羅斯合作，共同制定瓜分奧斯曼帝國領土的方案，以保證雙方的利益。他這么想不是沒有道理，他手中的秘密備忘錄就可以證明。但事實上他在這里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以為和英國政府在東方問題上達成了“君子協議”，但對英國方面來說，這一次會談不過是雙方相互交換了看法，沒有任何約束力。尼古拉一世以為只要說服維多利亞女王和她手下的高級大臣們就可以了，沒有意識到議會、反對黨、公共輿論以及媒體可能會影響英國政府的外交政策。這一誤判將是尼古拉一世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夕犯下一系列錯誤的重要原因。

\* \* \*

英國人對俄羅斯的不信任，是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沙皇的訪問并沒有改變這一現實。盡管俄羅斯事實上對英國利益的威脅很小，兩國在貿易和外交上的關系一直到克里米亞戰爭爆發都不錯，但是恐俄情緒可以說是英國對境外勢力看法的最重要成分，比恐法情緒更甚。整個歐洲對俄羅斯的看法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基于恐懼和幻想，英國也不例外。俄羅斯在18世紀的迅速擴張，以及它在打敗拿破侖時展露的軍事力量，給歐洲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世紀初，以“俄國威逼”歐洲大陸為主題的各類出版物在歐洲各地盛行，包括小冊子、旅行筆記和政治論著等。不管來自俄羅斯的威脅是真是假，這些說法的形成，大都還是基于作者對一個亞洲“異類”威脅歐洲的自由和文明這么一種想象。通過這些荒誕不經的文章，一個對俄羅斯充滿偏見的認識漸漸形成了：它本性野蠻強悍，喜歡侵犯擴張，同時又很狡猾，善于欺騙，與其他“無形的勢力”聯手共同對付西方國家，滲透文明社會。[‡](#___Zhe_Xie_Kan_Fa_Hen_Ming_Xian)

證明“俄國威脅”確實存在的文件是所謂的《彼得大帝遺囑》（“Testament of Peter the Great”），被持恐俄態度的作家、政客、外交官、軍人等視為證明俄羅斯有統治世界野心的最確鑿無疑的證據。根據這份文件，彼得大帝的目標極為狂妄：同時在波羅的海和黑海兩個方向擴張，與奧地利聯手將土耳其人從歐洲大陸趕走，“征服東地中海”并控制通往印度群島（Indies）的商路，在歐洲播下異議與矛盾的種子，直至成為歐洲大陸的主人。

《彼得大帝遺囑》是一些波蘭、匈牙利和烏克蘭人在18世紀時偽造的，他們和法國或是奧斯曼帝國的一些勢力有聯系。《遺囑》曾幾易其稿，最后完成的版本在1760年代收入了法國外交部的檔案。出于外交政策的考慮，法國人比較愿意相信這份文件的真實性。法國在歐洲東部的盟友：瑞典、波蘭和土耳其等都曾遭受俄羅斯的打擊，實力受到削弱。法國在18世紀和19世紀制定外交政策時，都假設《遺囑》反映了俄羅斯的真實意圖。[[12]](#_12_H__Ragsdale___Russian_Projec)

拿破侖一世就特別受《遺囑》的影響，他手下的高級外交顧問經常引用其中的一些理念和措辭，例如1795—1804年間擔任外交部長的夏爾·莫里斯·德·塔利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就曾說：“彼得一世以后的整個［俄羅斯帝國］系統……一直企圖如洪水野獸般壓垮歐洲。”外交部中另一名重要人物、受拿破侖信任的亞歷山大·德奧特里夫（Alexandre d’Hauterive）說得更露骨：

在戰爭時期俄羅斯會企圖征服它的鄰居，在和平時期它會設法讓它的鄰居乃至整個世界陷于猜疑、騷動、不和的混亂中……它在歐亞兩地所干的壞事路人皆知。它試圖摧毀奧斯曼帝國，它試圖摧毀德意志帝國。俄羅斯不會直接去實現它的目標……它會采用卑劣手段來削弱[奧斯曼帝國]；它會煽動陰謀；它會鼓勵外省叛亂……與此同時，它卻會不斷表示對高門的善意；它會不斷聲稱自己是朋友，是奧斯曼帝國的保護者。俄羅斯會用類似手段對付……奧地利……然后維也納就淪陷了。這樣我們西方國家就失去了保護我們免受俄羅斯入侵的最有力屏障。[[13]](#_13_Ragsdale___Russian_Projects)

1812年，法國人公開出版了《彼得大帝遺囑》，同一年拿破侖率軍進攻俄羅斯。從那以后，《遺囑》多次重印，被廣為引用，作為俄羅斯擴張主義外交政策的決定性證據。每次有俄羅斯參與的歐洲戰爭爆發前：1854、1878、1914、1941年等，這份《遺囑》都會重新冒出來被人重印。在冷戰時期，《遺囑》還被用來說明蘇聯的侵略野心。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前，美國的《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和《時代》（Time）雜志以及英國下議院還用它來解釋莫斯科擴張野心的根源所在。[[14]](#_14_Ragsdale___Russian_Projects)

《遺囑》產生影響最大的地方是英國，當地媒體都樂于宣揚各種對俄羅斯威脅的荒謬恐懼。《紀事晨報》（Morning Chronicle）在1817年宣稱：“俄羅斯人長久以來一直有這樣一個信念，認為他們最終將成為世界的主宰，這一信念在俄語出版物中不止一次被提到。”即使是嚴肅刊物也接受了俄羅斯將以打敗拿破侖為起點走上統治世界之路這一觀點。《愛丁堡評論》在1817年對近幾年發生的事件進行回顧之后表示：“預言俄羅斯可能會占領德里（Delhi）甚至加爾各答（Calcutta），似乎一點也不比預言俄羅斯將會占領巴黎夸張。”[[15]](#_15_J__Gleason__The_Genesis_of_R)讓英國人一直保持恐俄情緒的，除了業余人士的觀點外，還有旅行作家對俄羅斯和東方的各種描述。旅行寫作在19世紀早期非常流行，這些游記作品不僅主導了英國公眾對俄羅斯的認識，而且還為英國政府對俄羅斯的政策提供了大量的實用知識。

這些游記作品中，最早也是最有爭議的一部是《1817年俄羅斯軍事與政治速寫》（A Sketch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 in the Year 1817），作者羅伯特·威爾遜爵士（Sir Robert Wilson）曾于拿破侖戰爭期間在俄國軍隊做過一小段時間的軍官。他提出了一系列夸張的觀點，聲稱都是憑他對沙皇政府內部的了解得出的，這些說法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俄羅斯決意將土耳其人逐出歐洲，征服波斯，進軍印度，進而統治全球云云。威爾遜的觀點過于不著邊際，引來一些人的嘲笑，比如《泰晤士報》（Times）就諷刺地說俄羅斯其實還將進軍南非好望角、南極和月球。但是正因為他的觀點極端，反而吸引了大量關注，得到廣泛的辯論分析。當時政府內部閱讀量最大的《愛丁堡評論》和《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一方面同意威爾遜夸大了俄羅斯帶來的直接威脅，但另一方面又稱贊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并認為俄羅斯的所作所為值得以“懷疑的態度進行細致的研究”。[[16]](#_16_R__Wilson__A_Sketch_of_the_M)換句話說，威爾遜極端看法的基本觀點，即俄羅斯對世界來說是一個威脅，現在已經被接受了。

從這時起，在英國的政治語境中，原本是憑空想象的俄羅斯威脅成了現實。俄羅斯正在暗中策劃如何統治近東進而征服大英帝國這一說法開始經常出現在各種宣傳小冊子上。到了1830—1840年代，這些傳單又被恐俄人士當作真憑實證來支持自己的觀點。

這些宣傳單中最有影響力的是本書第二章中提到的《論俄羅斯的企圖》，作者喬治·德萊西·埃文斯后來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成了一名英軍指揮，他是第一個詳細論述所謂俄羅斯對小亞細亞地區造成威脅的人。不過讓這本小冊子受到關注的，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埃文斯在文中提出了一個肢解俄羅斯帝國的詳細方案，后來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被英國政府內閣采用。他提倡對俄羅斯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以阻止其侵犯意圖，建議從波蘭、芬蘭以及俄羅斯防守最薄弱的黑海和高加索地區發起攻擊。他的八點方案看上去就像是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的戰略藍圖：

1．切斷俄羅斯對外貿易，促使因此遭受損失的俄羅斯貴族起來反對沙皇政府。

2．摧毀喀瑯施塔得（Kronstadt）、塞瓦斯托波爾等地。

3．在俄羅斯海岸線上，特別是黑海沿線發動一系列破壞性襲擊并為軍隊提供足夠后援。在這些海岸沿線上，甚至在俄羅斯軍事防線的后方，有許多飽受壓迫、不屈不撓的反俄山地部落武裝……

4．協助波斯人重新奪回高加索。

5．派出一支實力強大的陸軍或海軍艦隊到芬蘭灣（Gulf of Finland），“威脅俄羅斯駐波蘭和芬蘭的側后”。

6．資助俄羅斯帝國內的革命力量，“鼓動農奴暴動”。

7．炮擊圣彼得堡，“如果可行的話”。

8．向波蘭和芬蘭派出軍隊，“將它們從俄羅斯的統治下解放出來”。[[17]](#_17__Lieut__Col___Sir_George_de)

著名的恐俄派戴維·厄克特也提倡對俄羅斯發動一場預防性戰爭。在為英國公眾做好發動克里米亞戰爭的心理準備上，厄克特起了最大的作用。他是蘇格蘭人，在牛津大學學習古典主義。1827年，他第一次親身經歷了東方問題，那一年他二十二歲，加入一批志愿軍為希臘獨立而戰。他去過奧斯曼帝國歐洲領土的許多地方，被土耳其人的美德吸引，開始學習土耳其語和現代希臘語，改穿土耳其服裝。1831年，他為英國《晨間信使報》（Morning Courier）寫了一系列報道，很快在英國被認為是一名土耳其問題專家。同年11月，通過家庭關系，在英國國王威廉四世（William IV）的私人秘書赫伯特·泰勒爵士（Sir Herbert Taylor）的介紹下，厄克特加入了由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率領的代表團，赴君士坦丁堡參加談判，最終確認即將獨立的希臘的邊境線。在君士坦丁堡期間，他更加堅信俄羅斯干涉土耳其事務給西方帶來的威脅。在上層支持者的鼓勵下，他撰寫了《土耳其及其資源》（Turkey and Its Resources，1833年出版），否認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并指出如果英國給予土耳其援助并保護其免受俄羅斯入侵，將給英國帶來巨大的商業機會。這本書出版后非常成功，得到了時任格雷勛爵（Lord Grey）政府（1830—1834）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頓勛爵的賞識，他還得到一項新的任命，參加一個派駐君士坦丁堡的秘密使團，研究英國與巴爾干地區、土耳其、波斯、俄羅斯南部和阿富汗之間發展貿易的可能性。

在君士坦丁堡期間，厄克特很快成了英國大使龐森比勛爵政治上的密切盟友。龐森比是著名的恐俄派，堅信俄羅斯的目標是征服土耳其。他一直呼吁英國政府派遣艦隊到黑海并支持高加索地區部落的反俄抗爭，在1834年他甚至說服了帕默斯頓給予他“斟酌權”，可以根據需要召集英國軍艦到黑海地區。不過這項權力后來被威靈頓公爵收回了，認為把發動戰爭的權力交給這樣一個立場強硬的知名恐俄派不夠明智。在龐森比的影響下，厄克特越來越多地介入政治活動，不再滿足于寫作，而開始以行動促成英國對俄開戰。1834年他訪問了切爾克斯人部落，表示英國會支持他們反抗俄羅斯占領的斗爭，這一行為具有明顯的挑釁性，帕默斯頓不得不將他召回倫敦。

回到倫敦后，厄克特進一步加緊行動呼吁在土耳其對俄羅斯采取軍事行動。1834年12月，他和龐森比共同發表了名為《英格蘭、法國、俄羅斯與土耳其》（England, France, Russia and Turkey）的宣傳手冊，一年之內就重印五次，并且獲得很高評價。在宣傳手冊成功的鼓勵下，他在1835年11月創辦了一份期刊《組合》（The Portfolio），發表他的反俄羅斯言論。以下是典型的一段：“俄羅斯人的無知讓他們與眾不同，不會在意其他國家人民的感情。俄羅斯人會把別人對他們政府非正義行為的譴責當作對自己的攻擊，而俄羅斯政府的所作所為已經表明它不會接受任何他人的道義標準。”[[18]](#_18_The_Portfolio__or_a_Collecti)

厄克特還做了另一個挑釁性舉動，他在《組合》上發表了一批號稱是從倫敦的波蘭流亡者那里得到的俄羅斯外交文件，謊稱是在1830年華沙暴動期間，在康斯坦丁大公的皇宮中發現的。其實大部分文件，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都是厄克特偽造的。其中包括一份所謂“禁止外傳的”沙皇尼古拉一世的講話，稱俄羅斯將繼續其壓迫政策直到完全征服波蘭，另外一份是高加索部落的所謂“獨立宣言”。這些偽造的文件被英國媒體廣為接受，認定為真實文件，反映了當時英國恐俄情緒的高漲。[[19]](#_19_The_Portfolio__or_a_Collecti)

厄克特的名氣越來越響，在英國外交和政治圈內的影響力也越來越大，迫使帕默斯頓將他召回外交部。1836年厄克特回到君士坦丁堡擔任英國使館秘書，但是權力十分有限。到了君士坦丁堡后，他又開始推動切爾克斯地區的反俄活動，企圖挑起一場英俄戰爭。其中最赤裸裸的一次挑釁行動是指使一艘英國雙桅縱帆船“雌狐”（Vixen）號前往切爾克斯地區，故意觸犯俄羅斯根據《哈德良堡條約》獲得的在黑海東部沿海對外國艦船的禁制令。“雌狐”所屬的公司是“格拉斯哥與倫敦喬治和詹姆斯·貝爾”（George and James Bell of Glasgow and London），因為俄羅斯在多瑙河地區借助隔離條例故意拖延外國船只行程，這家公司已經與俄羅斯當局發生過沖突。“雌狐”號名義上是載鹽的，但實際上裝滿了為切爾克斯反叛武裝準備的武器。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龐森比事先知道“雌狐”號的行程目的，但并未阻止。當輪船公司向他詢問英國外交部是否認可俄羅斯的禁制令以及英國當局是否會像厄克特之前承諾的那樣保護他們在黑海的航行權時，他故意不作理會。俄羅斯方面對厄克特故意挑起戰火的舉動有所了解。1836年夏天，得知厄克特的親信前往切爾克斯并向當地反叛武裝承諾英國會向他們提供支持后，沙皇就曾向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提出抗議。1836年10月，“雌狐”號起航了，正如厄克特所料，這艘船被俄羅斯當局在高加索沿岸的蘇吉卡萊（Soujouk Kalé）截獲。消息傳到英國，《泰晤士報》和其他報紙紛紛強烈譴責俄羅斯的舉動并呼吁向俄國開戰，龐森比也呼吁帕默斯頓向黑海派出英國艦隊。帕默斯頓雖然不愿意承認俄羅斯在黑海的禁制令以及對切爾克斯擁有的主權，但是他并不愿意被厄克特、龐森比和英國報紙等拉入戰場，于是他公開承認“雌狐”的確違反了俄羅斯的規定，但只認可禁制令在蘇吉卡萊區域有效，并不覆蓋整個高加索海岸線。

厄克特本人立刻被召回倫敦。1837年，在帕默斯頓的命令下，厄克特被外交部開除，并被指控泄露政府機密。厄克特堅稱帕默斯頓事先知道他的“雌狐”計劃，對帕默斯頓的“背叛”一直耿耿于懷。隨著英國與俄羅斯關系的緩和，厄克特越發沮喪，恐俄觀點也越發極端。他呼吁對俄羅斯采取強硬手段，不排除發動戰爭來捍衛英國對外貿易以及在印度的利益。他甚至指控帕默斯頓被俄羅斯政府收買。他在媒體中的支持者們亦紛紛附和，其中包括對英國中產階級觀點有重大影響的《泰晤士報》，也加入了反對帕默斯頓所謂“親俄”政策的陣營。1839年，《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系列以拉丁語署名“英國人”（Anglicus）的信件，但其實是由厄克特的助手亨利·帕里什（Henry Parish）撰寫的。這些幾乎成為報紙社論的信件警告大眾，若向俄羅斯這個一心征服歐亞的帝國妥協將會帶來惡果。

1847年，厄克特以獨立候選人身份當選英國下議院議員，他在競選時選擇了代表切爾克斯的綠黃兩色作為自己的官方顏色，當選之后，他繼續強烈抨擊俄羅斯。一年之前保守黨在是否廢除對進口谷物征稅，即《谷物法》上發生嚴重分歧，之后輝格黨上臺，約翰·羅素勛爵（Lord John Russell）當選首相，帕默斯頓重新擔任外交大臣。此時厄克特再一次指控帕默斯頓被俄羅斯收買，甚至在1848年發起動議彈劾帕默斯頓，理由是作為外交大臣，他未能執行更為激進的對俄政策。厄克特的主力盟友托馬斯·安斯蒂（Thomas Anstey）議員在下議院辯論中滔滔不絕，說了五個小時，指責帕默斯頓執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十分丟人，面對氣勢洶洶的俄羅斯，未能盡責捍衛歐洲的自由，導致英國國家安全受到危及。安斯蒂特別提出英國未能保衛波蘭的憲政自由，而這正是1815年維也納會議（Congress of Vienna）決定將波蘭王國納入俄羅斯保護之下時，西方列強提出的條件之一。安斯蒂堅稱，1831年華沙起義被俄羅斯殘酷鎮壓后，英國有義務介入波蘭事務，支持反叛武裝，即使這么做意味著觸發一場與俄羅斯的戰爭。在為自己辯護時，帕默斯頓解釋了為什么以軍事手段支持波蘭叛軍是不現實的，同時公開詮釋了他的自由干涉主義（liberal interventionism）原則。在克里米亞戰爭前，他又重申了這些原則：

我堅持認為，除了那些涉及英國自身的政治或商業利益的情況外，英國外交政策的真正目的，應該是成為正義與公道的倡導者，并以謹慎克制的手段行事。在全球舞臺上，英國不應該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堂·吉訶德，而應該在它認為正義所在之處，或是不公道行為發生之地，投入力量，提供道義上的支持或制裁。[[20]](#_20_Hansard__HC_Deb__23_Feb__184)

厄克特的恐俄觀點雖然與1840年代英國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馳，但是在英國議會中卻有相當多的擁護者，有一批勢力強大的政客支持他的呼吁，要求對俄羅斯采取更為強硬的立場，其中包括斯坦利勛爵（Lord Stanley）和在1842年接替龐森比出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在英國議會外，厄克特對自由貿易的支持（這是1840年代主要的改革議題）為他贏得了一批英格蘭中部和北部商人的支持，這些人都相信他在公共演講中反復提出的說法，即俄羅斯的關稅是英國經濟陷入衰退的主要原因。他還得到一批很有影響力的外交官和文人墨客的支持，其中包括亨利·布爾沃（Henry Bulwer）、詹姆斯·赫德森爵士（Sir James Hudson）以及《英國與外交評論》（British and Foreign Review）的創辦人之一托馬斯·溫特沃思·博蒙特（Thomas Wentworth Beaumont）等，在厄克特的影響下，這些人對俄羅斯的態度日益敵對。

到1840年代后期，甚至在那些最為溫和的知識分子圈子里，恐俄情緒都變得越來越嚴重。高端刊物如《外交評論季刊》（Foreign Quarterly Review）原來并不重視俄羅斯威脅歐洲自由和英國東方利益的論調，視之為“危言聳聽”，現在也在恐俄氣氛中轉向了。與此同時，在各類公眾場合，諸如教堂、酒館、演講廳和憲章運動分子（Chartist）的集會上，任何與塑造國家身份認同有關的對自由、文明與進步的討論中，對俄羅斯的敵視都往往成為焦點。

\* \* \*

英國人對土耳其抱有同情，擔心失去自己在印度的利益，但是激發英國人恐俄情緒最關鍵的因素莫過于對波蘭前途的憂慮。歐洲各地的自由主義者把波蘭起義視為對俄羅斯暴政的反抗，是為自由而戰的正義高尚的斗爭。和其他因素相比，波蘭起義被殘酷鎮壓這一事件對英國人卷入歐洲事務和加劇與俄羅斯的緊張關系影響最大，這一切最終導致了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

沒有幾個國家的歷史比波蘭更加多災多難。原來的波蘭聯邦（Polish Commonwealth）是波蘭王國（Kingdom of Poland）和立陶宛大公國（Grand Duchy of Lithuania）的聯合體，幅員遼闊；但是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它被瓜分了至少三次，其中兩次（分別在1772年和1795年）被三個鄰國，即俄羅斯、奧地利和普魯士瓜分，另一次是被俄羅斯和普魯士瓜分，借口是波蘭日益成為醞釀革命情緒的堡壘。在被多次瓜分后，波蘭王國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領土。波蘭人對重獲獨立越來越感到絕望，于是在1806年投靠了拿破侖；然而拿破侖戰敗，于是波蘭再次遭到瓜分。1815年歐洲列強通過《維也納條約》（Treaty of Vienna）建立了波蘭會議王國（Congress Poland），領土大致相當于拿破侖時期的華沙公國（Duchy of Warsaw），并將其置于沙皇俄國的保護之下，條件是俄羅斯必須保障波蘭的憲政自由。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從未認可波蘭會議王國的政治自治權，對他來說，在俄羅斯實行獨裁的同時，又在波蘭保障憲政是不可想象的事。尼古拉一世的鎮壓行動進一步促使波蘭人叛離，1820年代俄羅斯多次違反《維也納條約》：收回報刊出版自由，沒有獲得波蘭議會同意就宣布加稅，迫害反對沙皇的自由主義者等等。導火索終于在1830年11月被點燃，波蘭總督、沙皇的哥哥康斯坦丁大公發布命令在波蘭強制征兵到法國和比利時鎮壓革命。

當一批華沙俄羅斯軍事學院（Russian Military Academy）的波蘭軍官抗命反對大公的征兵令時，波蘭起義爆發了。這些軍官從兵營里奪出武器，沖向大公的官邸貝爾韋德宮（Belvedere Palace），大公不得不男扮女裝逃走。起義軍占領了華沙軍火庫，在武裝平民的支持下將俄羅斯軍隊趕出了華沙。波蘭軍隊隨后加入起義軍，波蘭臨時政府成立了，由亞當·恰爾托雷斯基親王（Prince Adam Czartoryski）牽頭，并召開了全國議會。激進派在全國議會中占據了領導地位，宣布向俄羅斯開戰、解放波蘭。1831年1月，他們舉行典禮宣布沙皇在波蘭的統治已被推翻，波蘭獨立了。沒過幾天，俄羅斯軍隊就越過國境線，向波蘭首都進發。俄羅斯軍隊的指揮官是伊萬·帕斯克維奇（Ivan Paskevich）將軍，他曾參加過對土耳其人和高加索山地部落的作戰，鎮壓手段殘酷，在波蘭的國家記憶中，他的名字成為殘忍的俄羅斯的代名詞。1831年2月，四萬人的波蘭軍隊在維斯圖拉河（Vistula）打退了六萬俄軍，保住了華沙。但是俄羅斯援軍很快趕到，逐漸耗盡了波蘭人的抵抗力量。在俄軍包圍下，饑餓的華沙居民開始打劫求生，城里出現了反對臨時政府的暴亂。9月7日，在激烈的巷戰之后，華沙陷落了。幸存的波蘭軍隊不愿意落入俄羅斯人手中，有約兩萬人逃往普魯士。普魯士曾經參與瓜分波蘭領土，是俄羅斯的盟友，這些波蘭軍隊殘部馬上被普魯士政府拘押起來。恰爾托雷斯基親王流亡到了英國，其他叛軍中許多人逃到了法國和比利時，在那里受到英雄般的歡迎。

英國公眾也一樣同情叛軍。在波蘭起義被鎮壓后，英國出現了大規模集會、公眾會議和請愿活動，抗議俄羅斯的鎮壓行為，并要求英國政府干預。許多報刊都呼吁對俄羅斯宣戰，其中包括《泰晤士報》。1831年7月，《泰晤士報》寫道：“到底要等多久，對波蘭大打出手的俄羅斯才會受到懲罰？波蘭是法國的盟友、英國的朋友，一個古老而高貴的國家，幾個世紀前，歐洲文明正是靠波蘭人打退土耳其和莫斯科大公國的野蠻之徒才得以保全。”倫敦、諾丁漢、伯明翰、赫爾（Hull）、利茲（Leeds）、格拉斯哥和愛丁堡等地紛紛成立波蘭之友協會（Associations of Friends of Poland），組織支持波蘭的活動。激進派議員，其中許多是愛爾蘭人，呼吁英國政府采取行動保衛“被欺凌的波蘭人”。參與憲章運動、伸張民主權利的工人階層人士宣布他們和為自由而戰的波蘭人站在一起，有些甚至聲言準備參加戰斗捍衛自由，而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國外。“除非英國能挺起腰板，”憲章運動刊物《北方解放者》（Northern Liberator）寫道，“否則我們將會看到這樣的可怕景象：武裝到了牙齒、載滿士兵的俄羅斯艦隊大搖大擺闖入英吉利海峽（English Channel），在斯皮特黑得（Spithead）[§](#SS_Ying_Ge_Lan_Nan_Bu_Gang_Kou_P)和普利茅斯灣（Plymouth Sound）下錨！”[[21]](#_21_The_Times__20_July_1831__Nor)

為波蘭自由而戰激發了英國公眾的熱情，他們將之歸因于他們所認同的“英國精神”，即熱愛自由、致力于保護弱者對抗欺凌。不管是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1939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戰爭爆發時，英國都認為自己是為捍衛這些原則而走向戰場的。1830年代初正是英國自由主義改革時期，中產階級從中獲得了新的自由，因此支持波蘭人為自由而戰的情緒高漲。在英國議會于1832年通過《改革法案》（Reform Act）后不久，《曼徹斯特時報》（Manchester Times）主編在波蘭之友協會舉辦的一場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英國和波蘭一起在為爭取自由而戰：

這也是為我們自己而戰（觀眾回應：“是的，是的！”）。我們在境外作戰所秉持的原則，和我們在家鄉與地主斗爭的原則一樣。波蘭只是我們抗爭中的一站。英格蘭和整個歐洲所遭受的折磨，尋本溯源，都可以歸結到波蘭第一次被列強瓜分的那一刻。假如波蘭還是自由之地，人民未遭鎖鏈加身，那么我們就不會看到俄羅斯野蠻之徒蹂躪歐洲大地、卡爾梅克人（Kalmyks）和哥薩克人在巴黎的街道花園安營扎寨……有哪個英國水手、哪個英國水兵不會挺身而出，為自由的事業出力、為遭難的波蘭人解困？（觀眾歡呼）我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喀瑯施塔得城堡打爛，把俄羅斯暴君的耳朵震聾。（觀眾歡呼）在一個月的時間里……我們的海軍就可以摧毀世界每一片水面上的俄國商船。（觀眾歡呼）讓我們派遣艦隊到波羅的海把俄國港口重重封鎖，到時候俄國皇帝會變成什么？不過是一個卡爾梅克野蠻人，加上幾個蠻族部落而已。（觀眾歡呼）面對英格蘭和法國海軍，俄羅斯的海上力量，比中華帝國強不了多少。（觀眾歡呼）[[22]](#_22_Gleason__Genesis_of_Russopho)

波蘭臨時政府領袖、“波蘭無冕之王”恰爾托雷斯基親王流亡倫敦，加強了英國公眾對波蘭人事業的同情。而他曾任俄羅斯外交部長這一事實，更讓英國人相信他有關俄羅斯威脅的警告。恰爾托雷斯基在1803年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時期加入俄國外交部，當時他才三十三歲。那時候他還相信通過與沙皇建立良好關系，波蘭可以恢復其獨立地位并收回大部分失去的領土。作為沙皇秘密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他曾經寫過一份長篇備忘錄，在其中他重新設計了歐洲版圖。在他的設想中，波蘭王國將得以重建，置于俄羅斯的保護之下，成為抵擋奧地利和普魯士入侵的屏障；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將建成一個由希臘人主導的巴爾干王國，由俄羅斯控制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斯拉夫人將擺脫奧地利人，重獲自由，并得到俄羅斯保護；德國和意大利將以美國模式建成獨立的聯邦國家；英國和俄羅斯將共同維護歐洲大陸的勢力平衡。這份計劃是不現實的，因為沒有哪一個沙皇會同意重建原來的波蘭—立陶宛王國。

當重建波蘭的夢想因拿破侖戰敗而破滅之后，恰爾托雷斯基流亡歐洲，但在1830年11月起義爆發之際及時趕回了波蘭。他加入了起義的革命執行委員會，被選為臨時政府總統，并召開了全國議會。當波蘭起義被鎮壓之后，他逃亡倫敦，和其他波蘭流亡者一起繼續從事反抗俄羅斯的活動。恰爾托雷斯基試圖說服英國政府介入波蘭事務，如果必要的話對俄羅斯宣戰。他對帕默斯頓說，一場自由主義的西方與獨裁殘暴的東方之間的大戰是必不可免的了。他的活動得到一些有影響力的自由派和恐俄派人士的公開支持，其中包括喬治·德萊西·埃文斯、托馬斯·阿特伍德（Thomas Attwood）[¶](#P_Ying_Guo_Zheng_Zhi_Huo_Dong_Ji)、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和羅伯特·卡特拉爾·弗格森（Robert Cutlar Fergusson）[\*\*](#___Su_Ge_Lan_Lu_Shi_He_Zheng_Ke)。這些人都在下議院發言，呼吁對俄羅斯宣戰。帕默斯頓同情波蘭人的事業，公開對沙皇的鎮壓行動表示了譴責，但是考慮到奧地利和普魯士不大可能與俄羅斯對立，因為這兩個國家手上也有波蘭的領土，帕默斯頓認為“以武力捍衛英國的立場是不慎重的”，并有可能引發“一場歐洲大戰”。把恐俄派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派往圣彼得堡擔任英國大使（因其恐俄立場強硬，沙皇拒絕接見），以此宣示英國對俄羅斯在波蘭行動的反對立場，已是英國政府愿意做的極限。恰爾托雷斯基對英國政府的無所作為感到失望，在1832年秋天離開倫敦前往巴黎。“他們對我們毫不在意，”他寫道，“他們只顧自己的利益，不會為我們做任何事情。”[[23]](#_23_Kukiel__Czartoryski__p__205)

恰爾托雷斯基在巴黎的朗貝爾旅館（Hôtel Lambert）住下，這里是波蘭流亡者的聚集地，組成了一個朗貝爾集團，差不多可以算是非正式的波蘭流亡政府。朗貝爾集團積極開展活動，保持波蘭流亡者對國家憲政理想的信心。這里也是波蘭文化活動的中心，經常在此出現的包括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Adam Mickiewicz）和作曲家肖邦（Frédéric Chopin）。恰爾托雷斯基與英國外交官和政客中支持對俄羅斯開戰的人士繼續保持密切聯系，特別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建立了很深的友誼。19世紀三四十年代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恐俄心態的日益增長，與此不無關系。恰爾托雷斯基在倫敦的代表是瓦迪斯瓦夫·扎莫伊斯基（Władysław Zamoyski），他曾是俄羅斯駐波蘭總督康斯坦丁大公的副官，在波蘭起義中擔任過領導。扎莫伊斯基在倫敦與龐森比和厄克特等人關系密切，甚至還為厄克特的“雌狐”行動出資。毫無疑問的是，以坎寧和扎莫伊斯基等人為渠道，恰爾托雷斯基一直在對帕默斯頓的思想施加較大的影響，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帕默斯頓這位未來將帶領英國走向克里米亞戰場的領導人逐漸接受了建立一個歐洲聯盟反抗俄羅斯的想法。與此同時，恰爾托雷斯基還與法國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的自由派領袖們培養了密切的關系，特別是跟1836年擔任首相的阿道夫·梯也爾（Adolphe Thiers），以及1840年代的法國外交部長、七月王朝最后一任首相弗朗索瓦·基佐（1847—1848年在任）聯系甚密。兩人都意識到，波蘭逃亡者可以為法國所用，成為其與英國政府及公眾建立友好關系的橋梁，改善雙方之間的冷淡不信任狀態。在這一點上，恰爾托雷斯基在英法結盟上起了重要作用，后來在1854年，正是這一聯盟宣布與俄羅斯開戰。

恰爾托雷斯基和朗貝爾集團的波蘭流亡者也在推動法國的恐俄風潮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的二十年左右時間里，法國的恐俄情緒一直不斷高漲。1830年代之前，法國人對俄羅斯的看法還比較溫和，有相當多的法國人曾跟隨拿破侖到過俄羅斯，對俄羅斯人的印象比較好，這些良好印象足以抗衡法國恐俄派的宣傳。這時候法國恐俄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是天主教宣傳家、政治家弗朗索瓦-馬里耶·德弗羅芒（François-Marie de Froment），他曾在1817年出版的《俄羅斯觀察》（Observations sur la Russie）上警告俄羅斯擴張主義的危險。另一位著名的恐俄派人物是教士和政客多米尼克-喬治-弗雷德里克·德普拉特（Dominique-Georges-Frédéric de Pradt），他在1823年出版的《英俄兩強并列對歐洲的影響》（Parallèle de la puissance anglaise et russe relativement à l’europe）中，把俄羅斯描述為“歐洲自由的亞洲之敵”。[[24]](#_24_R__McNally___The_Origins_of)從1830年代開始，法國人對俄羅斯的態度發生了改變。沙皇對法國1830年七月革命持反對態度，引起了自由派和左派人士的憎恨，而俄羅斯的傳統盟友、波旁王朝（Bourbon dynasty）的支持者又都是觀點強硬的天主教徒，波蘭問題讓他們對俄羅斯日漸疏遠。

在1830年代，一系列有關波蘭歷史與文化的作品在法國很受歡迎，波蘭作為一個烈士國家的形象在法國人心中扎下了根。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無疑是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的作品《波蘭朝圣者之書》（Book of Polish Pilgrims），被觀點極端的天主教宣傳家夏爾·蒙塔朗貝爾（Charles Montalembert）翻譯成法語并作序，在出版時還附加了教士和作家費利西泰·羅貝爾·德拉梅內（Félicité Robert de Lamennais）寫的《波蘭贊歌》（“Hymn to Poland”）。[[25]](#_25_A__Mickiewicz__Livre_des_pel)法國對波蘭爭取國家解放事業的支持，也得益于兩國同屬天主教的事實。法國人對波蘭天主教徒的同情，還擴大到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西部信奉東儀天主教（Uniate）的魯塞尼亞人身上。1831年，這些東儀天主教徒被強迫改信俄羅斯東正教，他們所遭受的宗教迫害在1830年代的法國并未引起很大注意，但是當這些迫害活動在1840年代早期蔓延到波蘭會議王國時，法國的天主教輿論震怒了。當時廣為流傳的一些政治宣傳手冊呼吁發動圣戰，解救“五百萬”被俄羅斯強迫放棄信仰的波蘭天主教徒。1842年羅馬教皇發布了針對“在俄羅斯帝國和波蘭的土地上天主教徒遭受的迫害”的宣言，受此鼓舞，法國報刊也積極參與對俄羅斯的譴責。“今天波蘭唯一剩下的是它的天主教信仰，于是沙皇尼古拉就對此下手了，”1842年10月，當時很有影響力的報紙《辯論日報》在其社論中這樣寫道，“他想要摧毀波蘭作為一個國家所擁有的最后、也是最強的信念，奪走苦難的波蘭人身上最后一點自由和獨立的標志，消滅最后一個障礙，以便建立一個只有一個法律、一種道義、一種思想、一個信仰的龐大帝國。”[[26]](#_26_Cinq_millions_de_Polonais_fo)

1846年，明斯克（Minsk）一批修女被殘暴對待的消息傳到法國，法國人對沙皇迫害天主教徒的憤怒情緒達到了高潮。事情要從1839年說起，當年白俄羅斯波洛茨克（Polotsk）的教區會議（Synod）宣布解散當地的希臘天主教會，并將其名下產業全部轉入俄羅斯東正教會。這一教會內部親法的教士們曾積極支持1831年的波蘭起義，但現在教區會議的領袖卻是一名親俄羅斯的主教謝馬什科（Semashko）。他過去曾在明斯克一家有兩百四十五名修女的修道院擔任神父。在當上波洛茨克希臘天主教會主教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命令這些修女改投俄羅斯東正教會。據后來傳到法國的說法，當這些修女拒絕改變信仰時，謝馬什科下令把她們抓起來，在她們的手腳上綁上鐵鏈，押送到維捷布斯克（Vitebsk）。在那里，五十名修女被關進監獄，被迫穿戴鐵鐐做苦工，飽受虐待毆打。四名修女在1845年春逃了出來，其中一名是修道院院長、六十一歲的馬克雷娜·米奇斯瓦夫斯卡（Makrena Mieczysławska）嬤嬤。她想辦法來到波蘭，得到波茲南（Poznan）大主教的協助，并在他助手的陪同下前往巴黎。在朗貝爾旅館，她向波蘭逃亡者講述了所遭受的苦難，接著去往羅馬并受到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Pope Gregory XVI）召見，這正好發生在1845年12月沙皇尼古拉一世訪問梵蒂岡之前。據說尼古拉在與教皇會面之后，胸中充滿羞恥與困惑：與教皇見面時，他矢口否認曾對魯塞尼亞天主教徒進行迫害，然而教皇卻拿出一份文件，上面有沙皇稱贊謝馬什科完成了他的“神圣使命”的字樣。

明斯克“修女烈士”的遭遇最早發表在1846年5月的法國報紙《通訊報》（Le Correspondant）上，接著又在各種宣傳手冊上轉載，在天主教地區廣為流傳。俄羅斯外交官和政府代表們試圖說服公眾馬克雷娜的故事是編造的，但是梵蒂岡官方對她做了醫學檢查，確認她確實常年受到毆打。這一事件對法國天主教徒沖擊很大、影響深遠，坐實了沙皇有“向西方擴張傳播東正教”的企圖，并“采用武力”逼迫天主教徒改教。[[27]](#_27_The_Nuns_of_Minsk__Narrative)當法國與俄羅斯就圣地問題發生爭執時，以上的看法對法國輿論產生了重大影響。[††](#___Zai_Ke_Li_Mi_Ya_Zhan_Zheng_Ba)

與法國人對俄羅斯宗教迫害的恐懼相伴隨的是他們對俄羅斯龐大軍隊掃除歐洲文明的擔憂。恰爾托雷斯基的同伴之一，波蘭流亡者瓦萊里安·克拉辛斯基伯爵（Count Valerian Krasinski）撰寫出版了多份小冊子，警告西方來自俄羅斯的威脅，聲稱俄羅斯意圖建立一個從波羅的海到亞得里亞海，直至太平洋的帝國。“俄羅斯有很強的侵略性，”克拉辛斯基在其中一份小冊子中寫道，“只要看一下它在過去一個世紀侵占的土地就足以證明這一點。”他指出，自彼得大帝時期以來，俄羅斯已并吞了大半個瑞典，從波蘭那里瓜分到的土地與奧地利帝國一樣大，從土耳其人那里奪來的地盤比普魯士王國還大，從波斯獲得的領土面積和英國相仿。自第一次瓜分波蘭以來，俄羅斯已將其邊境線向維也納、柏林、德累斯頓（Dresden）、慕尼黑和巴黎推進了一千三百七十公里，向君士坦丁堡推進了五百二十公里，離瑞典首都不過幾公里遠，而且還占領了波蘭首都。他的結論是,為保護西方不受俄羅斯威脅，唯一的辦法是重建一個獨立而強大的波蘭。[[28]](#_28__Count__V__Krasinski__Is_the)

法國文人德屈斯蒂納侯爵（Marquis de Custine）的作品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幫助法國人形成俄羅斯是一個富有侵略性和攻擊性的國家的印象。他的游記《1839年的俄羅斯》（La Russie en 1839）寫得很有娛樂性，從影響19世紀歐洲對俄羅斯的態度方面來看，沒有其他文學作品能出其右。這部游記講述的是一名法國貴族在俄羅斯旅行期間的印象和反思，1843年首次在巴黎出版，隨后多次重印，很快成為國際暢銷書。德屈斯蒂納去俄羅斯的目的，就是為了寫一部游記，希望以此造就自己的名聲。在這之前他曾寫過小說、劇本和故事，但都不太成功，游記文學是他成名的最后機會。

德屈斯蒂納是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朗貝爾集團中有許多人是他的朋友。他一位波蘭朋友的同父異母姐妹是俄羅斯宮廷中人，通過這層關系他進入了圣彼得堡的上流社會圈子，甚至還得到了與沙皇直接會面的機會，從而保證他的游記在西方一定會有市場。德屈斯蒂納對波蘭的同情態度，讓他從一開始就對俄羅斯抱有反感。在圣彼得堡期間，他經常與自由派貴族和知識分子在一起，其中一些還改信了天主教，這些人對尼古拉一世反對變革的政策深為失望。1825年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起義被鎮壓，六年之后波蘭起義被鎮壓，這些自由派期待俄羅斯走上西方憲政道路的幻想破滅了。這種悲觀情緒助長了德屈斯蒂納對當時俄羅斯的陰暗印象，既鄙視又懼怕：沙皇獨裁專斷，俄羅斯貴族卻奴顏婢膝，在沙皇面前不過是一群奴仆，他們以學會歐洲氣派為榮，卻掩蓋不住其亞洲野蠻人的本質。社會上個人自由與尊嚴缺失，充滿著對真相的不屑和偽裝。和在他之前的許多西方旅行者一樣，德屈斯蒂納對俄羅斯政府所興建的任何東西都具有宏大的規模感到震驚，圣彼得堡本身就像“一座紀念碑，宣告俄羅斯的降世”。他認為這種對宏大氣派的鐘愛，反映了俄羅斯想要超越西方并統治西方的野心，俄羅斯人對歐洲既嫉妒又仇恨，“就像奴隸恨主子一樣”，這就是其侵略性的根源。他寫道：

醞釀在俄羅斯人心中的野心，是深切而廣大的，這種野心只能在飽受壓迫的最底層滋生，在無處不在的悲苦中發芽。這是一個因貧困而變得既好斗又貪婪的國家，因為長期在其他國家的榮耀與財富面前感到羞辱屈從，繼而對此產生痛恨。就像一個奴隸，自己下跪著，卻把公眾與個人的自由看作丑惡與褻神的行為，夢想著哪一天由自己來統治世界。

德屈斯蒂納聲稱俄羅斯是上天“借用一個入侵者來懲罰歐洲文明”，是給西方的一個警告：“如果我們的奢侈和不公應該得到懲罰”，那么歐洲將會屈服在野蠻人的統治之下。《1839年的俄羅斯》的最后一段十分有名：

一個人如果想感受一下在歐洲國家享受到了什么樣的自由，他可以去俄羅斯，去那個沒有自由的監獄，在那里待上一段時間，不給他一丁點喘息的機會。如果你的孩子對法國感到不滿，試一下我的法子：讓他們去俄羅斯。對于任何外國人來說，俄羅斯之旅都很有意義，不論是誰，只要對那個國家做了認真的考察，都會樂于住在俄羅斯之外的任何地方。[[29]](#_29_Marquis_de_Custine__Russia)

《1839年的俄羅斯》出版后，幾年內就在法國再版了至少六次，在布魯塞爾被盜版重印多次，被翻譯成德語、丹麥語和英語，還被縮減成小冊子以其他歐洲語言出版。總計起來，這本書共賣出了幾十萬冊。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夕外國人寫的有關俄羅斯的作品中，這無疑是最受歡迎、最具影響力的一本。其成功的關鍵，是明確道出了當時在歐洲廣為流行的對俄羅斯的恐懼和偏見。

在當時，對俄羅斯快速增長的軍事力量的擔憂已蔓延到整個歐洲大陸，俄國對波蘭和多瑙河公國的入侵，加上其在巴爾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讓許多人擔心《1839年的俄羅斯》所描述的斯拉夫人對西方文明的威脅即將成為現實。在德語地區，德屈斯蒂納的書也非常受歡迎，許多小冊子都聲稱尼古拉一世正在密謀建立一個跨歐洲的斯拉夫帝國。如果要保證德國的統一，就必須發動戰爭打擊俄羅斯的氣焰。一本1830年代早期匿名出版、名為《俄羅斯與文明》（Russland und die Zivilisation）的小冊子重申了這一觀點。這本小冊子后來被翻譯成法語，以亞當·古羅華斯基伯爵（Count Adam Gurowski）的名義出版，是最早提出“泛斯拉夫”（pan-Slav）概念的作品之一，在歐洲大陸引發了許多討論。古羅華斯基認為到當時為止，歐洲歷史上一直只有兩大文明：拉丁文明和德意志文明，但是上天授意俄羅斯給世界帶來了第三個文明——斯拉夫文明。當德意志文明占主導地位時，斯拉夫國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Slovakia）、塞爾維亞和斯洛文尼亞（Slovenia）等，都在衰落中。但是這些國家將會在俄羅斯的領導下統一起來獲得重生，并進一步統治歐洲大陸。[[30]](#_30_Cadot__La_Russie_dans_la_vie)

1840年代，西方對泛斯拉夫主義的擔憂主要集中在俄羅斯影響力日漸增長的巴爾干地區。奧地利對于俄羅斯對巴爾干和多瑙河公國的企圖越發警惕，英國人也一樣，他們在貝爾格萊德、布勒伊拉（Braila）、雅西等地設立領事館，在推動英國貿易的同時監視俄羅斯人。當時最受關注的是俄羅斯對塞爾維亞政治的干預。1830年塞爾維亞獲得了在奧斯曼帝國實行自治的權利，奧布雷諾維奇家族的米洛什親王（Prince Milos）成為世襲親王。被稱為“俄羅斯人黨”（Russian Party）的一批親俄人士希望俄羅斯能采取更多激進的外交政策支持巴爾干地區的斯拉夫運動，這些人的支持者遍布塞爾維亞貴族、教士、軍人甚至宮廷，許多人對米洛什親王的專斷感到不滿。英國的對策是支持米洛什政權，理由是一個親英國的獨裁者比一群親俄羅斯的貴族高官掌權對英國有利，與此同時英國也向米洛什親王施加壓力推動憲政改革。俄羅斯對此的反應是通過自己的影響力挑動叛亂威脅米洛什政權，并于1838年迫使奧斯曼帝國當局同意《建制法》（Organic Statute），用以取代英國的憲政模式。《建制法》保證公民自由，但由終身制的貴族理事院而不是選舉產生的議會來抗衡親王的權力。因為大多數貴族理事是親俄羅斯的，在1840年代，沙皇政府可以通過他們對塞爾維亞政府施加相當大的壓力。[[31]](#_31_S__Pavlowitch__Anglo_Russian)

很難說沙皇在巴爾干的所作所為，其背后的動機是什么。他堅稱反對任何泛斯拉夫運動或是任何可能危及歐洲大陸、奧斯曼帝國和米洛什政權主權的民族主義運動。他對巴爾干地區進行干預，是為了防止民族主義革命波及俄羅斯統治下的其他斯拉夫國家，特別是波蘭。在俄國內部，他公開譴責泛斯拉夫主義運動者是危險的自由派和革命分子。“以同情在其他國家遭受壓迫的斯拉夫人為幌子，”他寫道，“掩藏其拉攏斯拉夫人建立聯盟的反叛想法，盡管這些斯拉夫人在友好的鄰國中都有自己合法的公民身份。他們不遵從天意，而是試圖用暴力來實現自己的意圖，這樣下去將會給俄羅斯帶來滅頂之災。”[[32]](#_32_N__Tsimbaev__Slavianofil_stv)“俄羅斯人黨”被尼古拉視為重大威脅，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曾被政治警察“第三科”（Third Section）密切監視。1847年，基輔的泛斯拉夫運動活動中心、圣西里爾和美多迪烏斯兄弟會（Brotherhood of Sts Cyril and Methodius）就曾被警方關閉。[[33]](#_33_A__Bitis__Russia_and_the_Eas)

但是，沙皇是否堅持這些原則，則視具體情況而定。他會在基督教國家堅持這些原則；在伊斯蘭國家，如果堅持這些原則便意味著與東正教徒對立，那就不是一回事了，例如他會支持希臘人起義反抗奧斯曼帝國。隨著時間的推移，尼古拉越來越把捍衛東正教與俄羅斯的利益（在他看來這是一回事）置于歐洲協調以及神圣同盟的國際原則之上。于是，雖然他在政治理念上與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相似，并愿意支持他們治下的帝國，但這并不妨礙他鼓勵奧地利帝國中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烏克蘭人的民族主義運動，因為這些人是東正教徒。而他對那里的天主教斯拉夫人（捷克、斯洛文尼亞、斯洛伐克、克羅地亞［Croats］和波蘭人）的態度卻沒有那么積極。

至于奧斯曼帝國內的斯拉夫人，尼古拉起先不愿意支持他們的解放運動，但慢慢地不再那么反對了，原因是他相信歐洲土耳其的崩潰不可避免、隨時可能發生。因此，為了維護俄羅斯的利益，必須與這些地方的斯拉夫國家建立聯盟，為即將到來的領土重新劃分做好準備。沙皇想法的改變只是戰略上的變化，而非基本理念上的：如果俄羅斯不對巴爾干進行干預，則西方列強一定會插手，希臘即為一個先例，而且他們一定會將巴爾干國家改造成反俄羅斯、親西方的政權。不過也有證據表明，在1840年代，尼古拉開始對斯拉夫派（Slavophiles）[‡‡](#_____Zhi_Si_La_Fu_Wen_Hua_You_Yu)以及泛斯拉夫運動中反映出來的宗教與民族情緒產生了認同。泛斯拉夫運動人士將神圣俄羅斯帝國想象為一個東正教的代表，這一點符合尼古拉對沙皇的國際使命的理解：

莫斯科、彼得大帝之城、康斯坦丁之城——

全都是俄羅斯沙皇治下的神圣之都……

但是，沙皇之土到哪里為止？哪里是俄羅斯的邊疆？

向北、向東、向南、向太陽落山的地方？

未來的命運會告訴我們……

七個海洋、七條大河，都屬于俄羅斯！

從尼羅河到涅瓦河（Neva），從易北河（Elbe）到阿穆爾河[§§](#SSSS_Yuan_Wen_Wei_China_Zhi_A_Mu)——

從伏爾加河（Volga）到幼發拉底河，從恒河（Ganges）到多瑙河……

這些都屬于俄羅斯沙皇……即使時光流逝，亦不會消失。

圣靈預知之，達尼爾（Daniel）[¶¶](#PP_13Shi_Ji_E_Luo_Si_Jun_Zhu)預言之。

——費多爾·丘特切夫  
 《俄羅斯地理》（“Russian Geography”），1849年[[34]](#_34_N__Riasanovsky__Nicholas_I_a)

泛斯拉夫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家是米哈伊爾·波戈金（Mikhail Pogodin），他是莫斯科大學（Moscow University）的教授，還是富有影響力的《莫斯科人》（Moskvitianin，即Muscovite）雜志的創辦人、主編。通過教育部長謝爾蓋·烏瓦羅夫（Sergei Uvarov）的介紹，波戈金進入了宮廷和政府高官的圈子。烏瓦羅夫還是波戈金的保護人，讓他免遭警察的騷擾。在烏瓦羅夫的鼓動下，他在政府里的許多同事開始接受波戈金的理念，認同俄羅斯必須從宗教立場出發支持斯拉夫人的解放運動。在沙皇宮廷內，波戈金還有一位積極的支持者：安東寧娜·布盧多娃女爵（Countess Antonina Bludova），一位身居高位的俄羅斯政治家的女兒。俄羅斯王儲亞歷山大大公（Grand Duke Alexander）也對波戈金抱有同情態度。1838年，波戈金在一份呈送沙皇的備忘錄中陳述了自己的想法，他認為歷史就是上天選擇的子民世世代代的傳承，如果俄羅斯能夠擔當起上天賦予的使命，建立一個斯拉夫帝國，并帶領其實現使命，那么未來就是屬于斯拉夫人的。1842年他再次向沙皇呈上意見：

這是我們作為俄羅斯人、斯拉夫人、歐洲人、基督徒的使命！作為俄羅斯人，我們必須奪取君士坦丁堡以保障國土安全；作為斯拉夫人，我們必須解放幾百萬同宗同族、同一信仰的兄弟、施教者和施恩人；作為歐洲人，我們必須驅逐土耳其人；作為東正教徒，我們必須讓十字架重新回到圣索菲亞的穹頂之上。[[35]](#_35_N__Riasanovsky__Nicholas_I_a)

尼古拉表面上依然反對這一理念。外交部長卡爾·涅謝爾羅迭堅稱，如果俄羅斯表現出任何支持巴爾干地區斯拉夫人的跡象，必將疏離與奧地利這個最古老的同盟之間的關系，破壞與西歐各國的良好合作，造成俄羅斯被孤立。但是從沙皇寫在波戈金文件頁邊上的文字上看，至少在私下里他是贊同波戈金的想法的。

\* \* \*

俄羅斯對1848年革命的劇烈反應，加深了西方對它的恐懼。1848年2月，七月王朝被驅逐下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建立，左派們擔心俄羅斯會派出軍隊支援反革命右派恢復巴黎的“秩序”，所有人都認為俄羅斯會在這時入侵法國。“我在學俄語，”劇作家普羅斯珀·梅里美（Prosper Mérimée）在給意大利友人的信中寫道，“這樣的話當我在杜伊勒里宮（Tuileries）[\*\*\*](#____Ceng_Shi_Fa_Guo_Wang_Gong__Z)遇到哥薩克人時，也許有助于我與他們交談。”那一年春天，當民主革命的浪潮波及德國和奧地利時，對許多人來說（拿破侖就曾這么說過），在這個十字路口上，整個歐洲要么變成共和國，要么被哥薩克騎兵征服。歐洲大陸的革命似乎將成為歐洲與俄羅斯和“歐洲憲兵”沙皇尼古拉之間的生死搏斗。德國的第一個議會——法蘭克福全國議會新進當選的代表們就公開呼吁和法國建立聯盟，創建一支歐洲軍隊以抵御俄羅斯的入侵。[[36]](#_36_P__Merimee__Correspondence_g)

對德國和法國來說，波蘭是抵御俄羅斯的第一道防線。1848年春天，巴黎的全國議會上一直有人支持和呼吁發動戰爭恢復波蘭獨立。5月15日，一群憤怒的示威者闖入議會抗議，他們聽到謠傳（后來證明是真的）說外交部長阿方斯·德拉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已和俄羅斯人就波蘭問題達成妥協。在示威者“波蘭萬歲！”的呼喊聲中，激進派代表一個接一個地聲明他們對發動戰爭解放波蘭的支持，要求將波蘭領土恢復到被列強瓜分前的邊界，將俄羅斯人從波蘭所有的土地上驅逐出去。[[37]](#_37_Cadot__La_Russie_dans_la_vie)

接著在7月份，俄羅斯對羅馬尼亞人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發動的革命做出反應，更進一步激怒了西方。這場革命從一開始就是反俄的。俄羅斯人結束1829—1834年對這兩個公國的占領，將它們歸還奧斯曼帝國前，在當地建立了親俄政權。這些政權一直遭到羅馬尼亞自由派和民族主義者的反抗，反抗的焦點最早是貴族議會。根據俄羅斯實施的《組織規程》，貴族議會的政治權利非常有限，例如公國總督就不是由議會選舉產生，而是由沙皇任命的。1840年代，當溫和派領袖揚·克珀爾內亞努（Ion Campineanu）等人流亡海外時，年輕一代的活躍分子接掌了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權。其中許多人是在巴黎受過教育的貴族子弟，他們組成秘密革命社團，模仿意大利燒炭黨（Carbonari）和法國的雅各賓黨人當年的活動方式。

1848年春天，這些革命社團中最大的一個“兄弟會”（Fratja）的活動公開化了，他們在布加勒斯特和雅西舉行公共聚會，要求恢復被《組織規程》廢除的權利。各種革命委員會開始形成。在布加勒斯特，由兄弟會組織的大規模示威迫使格奧爾基·比貝斯庫親王（Prince Gheorghe Bibescu）退位并支持組建臨時政府。共和國宣布成立，發布了自由主義憲法，取代《組織規程》。俄羅斯領事逃到了奧地利治下的特蘭西瓦尼亞。羅馬尼亞三色國旗飄揚在布加勒斯特街頭，接受民眾歡呼，革命運動領袖呼吁各公國統一起來，建立一個獨立國家。

這些事件讓俄羅斯感到焦慮，擔心革命會蔓延到俄羅斯領土上，于是在7月份，俄羅斯派出一萬四千人的軍隊占領了摩爾達維亞，防止這里出現像布加勒斯特一樣的革命政府，并從比薩拉比亞調動三萬軍隊駐扎在瓦拉幾亞邊境，準備對臨時政府發起攻擊。

在此形勢下，布加勒斯特的革命者向英國求援。英國領事羅伯特·科洪（Robert Colquhoun）一直在外交部的授意下積極鼓勵反抗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運動。英國人并不想支持羅馬尼亞獨立，而是希望借此打擊俄羅斯勢力，恢復土耳其主權，建立一個更傾向自由主義的政府，從而更好地保護英國在這里的利益。英國駐布加勒斯特領事館是革命者的聚會地點之一。英國人甚至將波蘭流亡者偷帶進來，以組織一場在英國保護下，團結波蘭、匈牙利、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人的反俄羅斯運動。[[38]](#_38_R__Florescu__The_Struggle_ag)

科洪意識到阻止俄羅斯入侵是保證瓦拉幾亞獨立的唯一希望，于是在當地革命領袖與奧斯曼當局之間進行斡旋，希望說服土耳其人承認臨時政府。他向奧斯曼帝國特使蘇萊曼帕夏（Suleiman Pasha）保證布加勒斯特的臨時政府將會忠于奧斯曼帝國——這當然是一個精心計算的謊言；他還指出以后一旦土俄間再次開戰，有一個仇視俄羅斯的瓦拉幾亞政府將對奧斯曼帝國有利。蘇萊曼被科洪說服了，在布加勒斯特，他向歡呼的人群發表演講，為“羅馬尼亞國家”舉杯慶賀，并聲稱一個“統一的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將會是扎在俄羅斯腹部的一支長槍”。[[39]](#_39_FO_195_321__Colquhoun_to_Pal)

在這樣的舉動面前，俄羅斯仿佛是公牛看到了紅布。俄羅斯駐君士坦丁堡大使弗拉基米爾·蒂托夫（Vladimir Titov）要求蘇丹立即停止與革命者的談判并恢復瓦拉幾亞的秩序，否則俄羅斯將進行干預。這一威脅足以讓土耳其人的態度發生大轉變。9月初，新任特使福阿德·埃芬迪（Fuad Efendi）被派往布加勒斯特，并在俄國將軍亞歷山大·迪阿梅爾（Alexander Duhamel）的幫助下恢復秩序。福阿德帶領一支一萬兩千人的部隊進入瓦拉幾亞，駐扎在布加勒斯特城外，三萬從比薩拉比亞召集來的俄羅斯軍隊在迪阿梅爾的帶領下同時趕到。9月25日，兩支軍隊聯合向布加勒斯特進軍，只在街道上遭遇小股反叛武裝的抵抗，就輕易地占領了布加勒斯特。這場革命就此失敗。

俄羅斯軍隊控制了整座城市，進行大規模搜捕，迫使幾千名羅馬尼亞人逃到國外，英國公民也被抓捕。被占領軍扶持上臺的親俄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公眾集會，撰寫任何政治議題的文章都構成犯罪行為，要受到懲罰，甚至連私人信件都會被警察細讀。“這里有一套偵聽系統，”科洪在報告中寫道，“任何人都不允許討論政治，德語和法語報紙都被禁了……土耳其特使覺得有必要禁止所有人在公共場合談論政治。”[[40]](#_40_FO_195_332__Colquhoun_to_Str)

在協助恢復多瑙河公國的秩序之后，作為回報，沙皇要求奧斯曼帝國必須簽署新的條約，擴大俄羅斯對這里的控制權。他的要求是敲詐性的：俄羅斯軍隊駐扎七年，俄土兩國共同決定公國總督人選，允許俄羅斯軍隊通過瓦拉幾亞前往特蘭西瓦尼亞鎮壓匈牙利革命。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懷疑俄羅斯不達到完全并吞多瑙河公國的目的不會罷休，因此呼吁土耳其人對沙皇的要求保持強硬態度，但是他卻不能向土耳其人保證一旦奧斯曼帝國與俄羅斯開戰，英國會出手干預。他請求外交大臣帕默斯頓向俄羅斯發出威懾，派遣一支艦隊宣示對奧斯曼帝國的支持。他相信為了阻止沖突爆發，這是必要之舉。如果這次帕默斯頓聽從了他的意見，英俄兩國也許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六年就已經開戰了。但是帕默斯頓還是不愿意付諸行動，盡管對俄羅斯持強硬立場，他暫時還是愿意相信俄羅斯聲明的軍事干預多瑙河公國的動機，認為沙皇確實并不想并吞這些地方。也許帕默斯頓甚至歡迎俄羅斯出手恢復日益動蕩的奧斯曼和奧地利帝國土地上的秩序。

沒有英國的支持，土耳其政府沒有其他退路，只能和俄羅斯進行談判。根據1849年簽署的《巴爾塔—利曼協定》（Convention of Balta Liman），沙皇的大部分要求都得到了滿足：多瑙河公國的總督將由俄羅斯和土耳其人共同任命；貴族議會被取締，由顧問理事會取而代之，受俄土兩國監督；俄羅斯軍隊將駐守至1851年。這一法案事實上恢復了俄羅斯對這里的控制，公國政府的自治權被大大削減，比原來《組織規程》規定的還少。[[41]](#_41_Florescu__Struggle_against_R)沙皇認為，從此以后，這些公國將完全處于俄羅斯控制之下，只是在他的酌情處理下土耳其才保留其主權，而且即使俄羅斯在1851年撤軍，他依然可以隨時派兵入侵，迫使高門做出更多讓步。

俄羅斯這次干預多瑙河公國的成功，促使沙皇在1849年6月決定對匈牙利進行軍事干預。匈牙利革命始于1848年3月，當時匈牙利議會（Hungarian Diet）在法德兩國革命運動的激勵下，由雄辯家拉約什·科蘇特（Lajos Kossuth）帶領，宣布自治，拒絕繼續接受奧地利帝國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匈牙利議會宣布了一系列改革行動，包括廢除農奴制、控制國家預算、接管奧地利帝國軍隊中的匈牙利部隊等等。當時奧地利政府正忙于應付維也納革命，無暇他顧，接受了匈牙利的自治要求；但是在鎮壓了維也納革命之后，帝國政府立即宣布解散匈牙利議會并對匈牙利宣戰。在戰斗中，匈牙利人獲得了境內少數民族如斯洛伐克、德國和魯塞尼亞人的支持，同時大批波蘭和意大利人也自愿加入匈牙利軍隊，共同抗擊奧地利帝國。雙方打成了平手。1849年4月，戰事已成膠著狀態，這時匈牙利也向奧地利宣戰，爭取獨立。在此情況下，登基不久、年僅十八歲的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Franz Joseph）向沙皇請求干預。

尼古拉立刻答應無條件出兵干預鎮壓匈牙利革命。對他來說，這是維護神圣同盟的責任。如果奧地利帝國崩潰，將對歐洲力量平衡產生嚴重影響。但是這一行動也是出于維護俄羅斯的利益，眼看著革命的浪潮從中歐向各處蔓延，特別是波蘭也掀起了新的起義浪潮，沙皇覺得不能袖手旁觀。匈牙利軍隊中有許多波蘭流亡者，最出色的一些將領就是波蘭人，其中有約瑟夫·貝姆（Jozef Bem）將軍，他是1830年波蘭起義時主要的軍事領導人之一，在1848—1849年間率領匈牙利軍隊在特蘭西瓦尼亞打敗了奧地利軍隊。對尼古拉來說，除非將匈牙利革命鎮壓下去，不然革命很可能會蔓延到加利西亞（Galicia）。那里大部分是由奧地利控制的波蘭領土，如果革命蔓延至此，波蘭將再次成為俄羅斯帝國面臨的問題。

1849年6月17日，十九萬俄羅斯軍隊越過匈牙利邊境進入斯洛伐克和特蘭西瓦尼亞。帶領俄羅斯軍隊的是帕斯克維奇將軍，1831年曾率俄軍對波蘭起義進行殘酷打擊。進入匈牙利后，俄羅斯軍隊對當地人民發動了一系列猛烈的攻擊，俄軍本身也因病疫，特別是霍亂而損失慘重。但是匈牙利軍隊人數遠遠少于俄軍，經過八個星期的抵抗后，大部分人于8月13日在維拉古什（Vilagos）投降，然而有五千名左右的軍人，其中包括八百名波蘭軍人，逃到了奧斯曼帝國，大部分到達瓦拉幾亞，在那里有部分土耳其軍隊依然在和俄羅斯軍隊作戰，拒不接受《巴爾塔—利曼協定》的規定。

沙皇傾向于寬大處理匈牙利革命的領袖，反對奧地利帝國對革命者的瘋狂報復。但是他決心一定要抓住逃亡的波蘭人，特別是匈牙利軍隊中的波蘭將領，擔心這些人會領導下一次波蘭起義。8月28日，沙皇向土耳其政府發出要求，強令必須引渡那些逃到奧斯曼帝國的波蘭人。奧地利則要求引渡逃到奧斯曼帝國的匈牙利人，其中包括匈牙利議會領袖科蘇特。科蘇特當時已成為土耳其人的座上賓。雖然根據國際法，奧斯曼帝國應該引渡罪犯，但是土耳其人沒把這些流亡者看作罪犯，反而很高興在自己的土地上款待這些反抗俄羅斯的戰士，給予他們政治庇護，就像西方國家在1831年給予波蘭流亡者政治庇護一樣。土耳其人在英法的鼓勵下，拒絕在俄羅斯和奧地利的壓力面前低頭，兩國因此斷絕了與高門的關系。應土耳其人軍事援助的請求，英國在10月份派出馬耳他中隊（Malta Squadron）前往達達尼爾海峽外的貝希克灣，一支法國艦隊也被派來會合。各方劍拔弩張，西方列強與俄羅斯之間的大戰一觸即發。

此時英國公眾在匈牙利難民問題上已群情激憤，匈牙利人反抗沙皇軍隊暴行的英勇斗爭再次激發了英國人強烈的反俄情緒。在媒體上，匈牙利革命被美化成1688年光榮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的再現。在光榮革命中，英國議會推翻了詹姆斯二世（James II）的統治，創立了君主立憲制。在英國人眼中，科蘇特是一個非常“英國”的革命者：他是一個持自由主義觀點的紳士，支持一個啟蒙開智的貴族階層，為議會民主和憲政原則而戰。兩年之后，當他到英國做巡回演講時，受到了大批民眾英雄般的歡迎。匈牙利和波蘭難民被視作浪漫的自由斗士。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于1849年作為政治流亡者來到倫敦，在這里發起政治運動，視俄羅斯為自由的敵人。俄羅斯軍隊在匈牙利和多瑙河公國種種鎮壓與暴行的報道傳到英國，讓英國人感到非常厭惡。當帕默斯頓下令派出軍艦前往達達尼爾海峽協助土耳其人對抗俄羅斯時，英國人感到歡欣鼓舞。這種強硬的外交政策，隨時準備為維護英國的自由主義價值而在全球任何地方進行干預的立場，正是英國中產階級對政府的期待，這在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事件中也體現了出來。[†††](#____1850Nian__Pa_Mo_Si_Dun_Pai_C)

英法艦隊的到來促使沙皇與奧斯曼帝國當局在難民問題上達成妥協。土耳其人保證采取措施讓波蘭難民遠離俄羅斯邊界，這一讓步和西方國家認可的政治庇護原則相吻合；作為交換，沙皇不再要求引渡這些難民。

就在雙方快要達成協議時，從君士坦丁堡傳來消息，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對1841年倫敦協定做了一番非官方的解讀，認定駛到達達尼爾海峽的英國艦隊如果遭遇大風，可以進入避風港。英國艦隊10月底抵達這里時，剛好發生大風，就以此為借口停留在達達尼爾海峽。尼古拉對此非常惱怒，命令俄國大使蒂托夫通知高門，俄羅斯艦隊在博斯普魯斯海峽擁有同樣的權利。這一應對十分高明，因為如果俄羅斯艦隊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向君士坦丁堡發起攻擊，英國艦隊還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從達達尼爾海峽趕來。帕默斯頓讓步了，他就此事向俄方道歉，并重申英國政府致力遵守1841年倫敦協議。英法撤走艦隊，戰爭威脅再一次被消除。

在帕默斯頓道歉的消息傳到之前，沙皇在圣彼得堡向英國特使做了一番講話。這番話揭示了尼古拉當時的心態，那時候距離他向西方列強開戰只有四年的時間了。

我難以理解帕默斯頓勛爵的做法。如果他想向我開戰，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宣戰。俄英交戰，對兩國都是不幸之事，但是我已不得不接受現實。然而他沒有必要在我身邊跳來跳去玩把戲，這不是一個偉大國家應有的做法。今天奧斯曼帝國依然存在，那是因為我的努力。如果哪一天我決定收手不再保護和維系奧斯曼帝國，它馬上就會崩潰。

12月17日，沙皇命令普佳京上將（Admiral Putiatin）準備一個突襲達達尼爾海峽的應急方案：當俄羅斯再次卷入多瑙河公國危機時，尼古拉希望確保俄羅斯海軍的黑海艦隊能阻止英軍進入達達尼爾海峽。他還批準建造四艘昂貴的蒸汽戰艦用以實現這一計劃，顯示了他的決心。[[42]](#_42_D__Goldfrank__The_Origins_of)

在英國方面，帕默斯頓的讓步對斯特拉特福德·坎寧來說是一個重大打擊，因為他急切地希望英國打一場決定性的戰爭，徹底打消俄羅斯繼續干預多瑙河流域公國事務的念頭。1849年以后，盡管對土耳其的自由化改革依然存有疑慮，但坎寧越來越堅持通過加速改革來鞏固奧斯曼帝國在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實力，并通過加強土耳其軍隊的實力來對抗俄羅斯的威脅。帕默斯頓同樣認同多瑙河流域公國的重要性，在1848—1849年的危機之后，他也開始支持采用更激進的措施幫助土耳其抵御俄羅斯的入侵。

下一次沙皇派兵入侵多瑙河流域公國是為了迫使土耳其在圣地糾紛上讓步，但那時的國際局勢已大不相同，沙皇的行動終將引發一場大戰。

[\*](#_43) 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后，又被重新改回“金杯”。——原注

[†](#_44) 奧康奈爾為愛爾蘭獨立運動領袖，全名丹尼爾·奧康奈爾（Daniel O’Connell）。——譯注

[‡](#_45) 這些看法很明顯地和冷戰期間西方對俄羅斯的看法有相似之處。冷戰期間的恐俄情緒，部分也受到了19世紀西方對俄羅斯態度的影響。

[§](#SS_2) 英格蘭南部港口樸次茅斯（Portsmouth）外的海灣。——譯注

[¶](#P_2) 英國政治活動家、經濟學家，曾任國會議員。——譯注

[\*\*](#_46) 蘇格蘭律師和政客，曾任國會議員。——譯注

[††](#_47) 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前，這一事件同樣影響了英國輿論。1854年5月，《明斯克修女的真實故事》（“The True Story of the Nuns of Minsk”）在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主編的周刊《家庭箴言》（Household Words）上發表，作者是弗洛倫絲·南丁格爾。南丁格爾曾于1848年在羅馬與馬克雷娜見面，寫下了這位修女遭受的苦難，將材料存放在抽屜里。在錫諾普（Sinope）戰役發生后，俄羅斯海軍消滅了土耳其的黑海艦隊，南丁格爾覺得這個故事能激勵英國公眾站起來反抗俄羅斯，于是重新取出這篇文字寄給了狄更斯，狄更斯將其改短之后發表在《家庭箴言》上。——原注

[‡‡](#_48) 指斯拉夫文化優越論者，抵制西歐國家對俄羅斯的影響。——編注

[§§](#SSSS_2) 原文為China，指阿穆爾河（Amur）的別稱China。——譯注

[¶¶](#PP_2) 13世紀俄羅斯君主。——譯注

[\*\*\*](#_49) 曾是法國王宮，在1848年革命中遭到搶劫和破壞。1851年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改共和為帝制并自稱拿破侖三世后，杜伊勒里宮再度成為皇宮。1871年被焚毀。——編注

[†††](#_50) 1850年，帕默斯頓派出皇家海軍艦隊封鎖雅典港以支持唐·帕西菲科，此舉受到了英國公眾的贊揚。唐·帕西菲科是一位居住在雅典的英國公民，他的住宅在一次反猶太人的暴亂中被燒毀，他因此向希臘政府提出申訴要求賠償。唐·帕西菲科是一位葡萄牙猶太人的后裔，案發當時是葡萄牙駐雅典的領事，但是他在直布羅陀出生，因此根據“英國公民”原則（Civis Britannicus Sum）他就是英皇子民。帕默斯頓就是以此為理由，為自己派出艦隊的舉動辯護的。——原注

注釋

[[1]](#_1_3)S.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I v Londone v 1844 godu’, Istoricheskii vestnik, 23/3 (Feb. 1886), pp. 602–604.

[[2]](#_2_3)E.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n Papieren des Freiherrn Christian Friedrich V. Stockmar (Brunswick, 1872), p. 98; T.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the Prince Consort, 5 vols. (London, 1877), vol. 1, p. 215.

[[3]](#_3_3)G. Bolsover, ‘Nicholas I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Slavonic Review, 27 (1948), p. 135.

[[4]](#_4_3)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p. 355–8.

[[5]](#_5_3)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vol. 1, p. 224.

[[6]](#_6_3)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4;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 98.

[[7]](#_7_3)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4.

[[8]](#_8_2)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 1907–8), vol. 2, pp. 16–7; 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vol. 1, p. 219; 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09.

[[9]](#_9_2)Martin, The Life of His Royal Highness, vol. 1, p. 223;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p. 397, 400.

[[10]](#_10_3)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15;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 399.

[[11]](#_11_2)Tatishchev, ‘Imperator Nikolai’, p. 615; Stockmar, Denkwürdigkeiten, pp. 396–9.

[[12]](#_12_2)H. 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of Conques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id.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75–7; O. Subtelnyi, ‘Peter I’s Testament: A Reassessment’, Slavic Review, 33 (1974), pp. 663–78.

[[13]](#_13_2)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pp. 79–80.

[[14]](#_14_2)Ragsdale, ‘Russian Projects’, p. 81.

[[15]](#_15_2)J. Gleason,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pp. 39, 43.

[[16]](#_16_3)R. Wilson, A Sketch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Power of Russia in the Year 1817 (London, 1817); Gleason, Genesis of Russophobia, p. 56.

[[17]](#_17_2)[Lieut. Col.] Sir George de Lacy Evans, On the Designs of Russia (London, 1828), pp. 191, 199–219.

[[18]](#_18_3)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etc.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1 (1836), p. 103.

[[19]](#_19_3)The Portfolio; or a Collection of State Papers, etc. etc.,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Our Times, 1 (1836), pp. 187–95. See further, M. Kukiel, Czartoryski and European Unity 1770–1861 (Princeton, 1955), p. 236.

[[20]](#_20_2)Hansard, HC Deb. 23 Feb. 1848, vol. 96, pp. 1132–1242; HC Deb. 1 Mar. 1848, vol. 47, pp. 66–123 (Palmerston quotation at p. 122).

[[21]](#_21_2)The Times, 20 July 1831; Northern Liberator, 3 Oct. 1840.

[[22]](#_22_2)Gleason, Genesis of Russophobia, p. 126.

[[23]](#_23_3)Kukiel, Czartoryski, p. 205.

[[24]](#_24_3)R. McNally, ‘The Origins of Russophobia in France: 1812–1830’,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7/2 (Apr. 1958), pp. 179–83.

[[25]](#_25_2)A. Mickiewicz, Livre des pèlerins polonais, traduit du polonais d’A. M. par le Comte C. de Montalembert; suivi d’un hymne à la Pologne par F. de La Menais (Paris, 1833).

[[26]](#_26_2)Cinq millions de Polonais forcés par la czarine Catherine, les czars Paul, Alexandre et récemment Nicolas d’abjurer leur foi religieuse. Eclaircissements sur la question des Grecs-Unis sous le rapport statistique, historique et religieux (Paris and Strasburg, 1845); Journal des débats, 23 Oct. 1842.

[[27]](#_27_2)The Nuns of Minsk: Narrative of Makrena Mieczysławska, Abbess of the Basilian Convent of Minsk; The History of a Seven Years’ Persecution Suffered for the Faith, by Her and Her Nuns (London, 1846), pp. 1–16; Hansard, HL Deb. 9 Mar. 1846, vol. 84, p. 768; M.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1839–1856 (Paris, 1967), p. 464.

[[28]](#_28_2)[Count] V. Krasinski, Is the Power of Russia to be Reduced or Increased by the Present War? The Polish Question and Panslavism (London, 1855), p. 4.

[[29]](#_29_2)Marquis de Custine, Russia, 3 vols. (London, 1844), vol. 3, pp. 21, 353; G. Kennan, The Marquis de Custine and His Russia in 1839 (London, 1971).

[[30]](#_30_2)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p. 471.

[[31]](#_31_1)S. Pavlowitch,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Serbia, 1837–1839 (Paris, 1961).

[[32]](#_32_2)N. Tsimbaev, Slavianofil’stvo: Iz istorii russkoi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oi mysli XIX veka (Moscow, 1986), p. 36.

[[33]](#_33_1)A. Bitis,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Arm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815–1833 (Oxford, 2006), pp. 93–7.

[[34]](#_34_1)N.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p. 152.

[[35]](#_35_1)N.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p. 166.

[[36]](#_36_1)P. Mérimée, Correspondence générale, 18 vols. (Paris, 1941–1965), vol. 5, p. 420; 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p. 516; L. Namier, 1848: The Revolu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Oxford, 1946), pp. 40–2.

[[37]](#_37_1)Cadot,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caise, p. 468.

[[38]](#_38_1)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chaps. 7 and 8.

[[39]](#_39_1)FO 195/321, Colquhoun to Palmerston, 16 Aug. 1848.

[[40]](#_40_2)FO 195/332, Colquhoun to Stratford Canning, 2 July 1849.

[[41]](#_41_1)Florescu,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pp. 217–218.

[[42]](#_42_2)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68–71.

# 第四章 歐洲和平的終結

1851年5月1日，萬國博覽會（Great Exhibition）在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開幕。博覽會期間，共有六百萬人次，相當于當時英國人口的三分之一，前來水晶宮（Crystal Palace）參觀。水晶宮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玻璃建筑，里面陳列著一萬三千件來自世界各地的機械產品、手工制品和其他各式各樣的東西。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社會和經濟動蕩之后，萬國博覽會似乎在向世人展示建立在英國工業化和自由貿易原則基礎上的繁榮和平前景。水晶宮本身就是一個建筑上的奇跡，證明了英國在工程制造上的創造力。與此相呼應，水晶宮內部的展品也在向世人呈現：在每一個工業領域，英國都領先世界。水晶宮象征的是“不列顛治世”（Pax Britannica），一個英國希望在歐洲乃至全世界廣為宣傳的形象。

對和平唯一的威脅似乎來自法國。1851年12月2日，在拿破侖1804年登基的紀念日，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總統路易-拿破侖發動政變，宣布廢除憲法，自立為獨裁者。次年11月，通過全民公決，法蘭西第二共和國正式變成第二帝國。1852年12月2日，路易-拿破侖登基，成為拿破侖三世（Napoleon III）。

拿破侖三世登基的消息讓歐洲列強警惕起來。英國人擔心拿破侖擴張主義死灰復燃，議員們要求召回里斯本中隊（Lisbon Squadron）防衛英吉利海峽。拉格倫勛爵（Lord Raglan）——未來克里米亞戰爭中的英軍首領——在1852年的夏天一直在規劃，一旦法國海軍發起進攻，應該如何保衛倫敦。在整個1853年，這一任務依然是英國海軍計劃的重點。奧地利外交部長布奧爾伯爵（Count Buol）強烈要求拿破侖公開聲明其和平意向。沙皇的要求則帶有羞辱性，要拿破侖宣布沒有任何對外擴張的企圖；同時還向奧地利保證，一旦法國入侵，俄羅斯將提供六萬軍隊給予支援。為了化解列強的擔憂，拿破侖于1852年10月在波爾多（Bordeaux）發布聲明：“那些不信任我的人說，皇帝意味著戰爭；但是我說，皇帝意味著和平。”[[1]](#_1_You_Guan_Ying_Guo_Hai_Jun_Di)

事實上，人們對路易-拿破侖抱有疑慮并非沒有道理。當時的歐洲格局就是在拿破侖戰敗之后，為了遏制法國而設置的，很難想象拿破侖三世會對此滿意。他確實獲得了法國人真誠而廣泛的擁戴，但這是因為他善于激發民眾對拿破侖時代的美好回憶，雖然從各方面講他都比不上他伯父。他身軀龐大卻不自然、瘸腿、唇上留著小胡子、下巴上一把山羊胡，看上去更像一個銀行職員，而不是拿破侖·波拿巴再世。1855年，維多利亞女王第一次見到拿破侖三世后，她在日記中形容他“非常矮小，但是腦袋和胸口很大，仿佛本應該長在一個遠比他高大的人身上”。[[2]](#_2_RA_VIC_MAIN_QVJ_1855__16_Apr)

拿破侖三世制定外交政策時的動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遵循波拿巴主義者（Bonapartist）的傳統。他的目標是即使不能恢復他伯父的榮耀，也至少要將法國變為一個廣受尊重、有影響力的國家。他希望能改變1815年確定的歐洲格局，將歐洲變成一個自由國家組成的家庭，正如拿破侖一世所展望的那樣。他認為可以通過與英國結盟來實現這個目標。他的政治密友、內政部長德佩爾西尼公爵（Duc de Persigny）曾于1852年在倫敦待了一段時間，他說服拿破侖三世英國已不再由貴族把持，而是受新興的“布爾喬亞勢力”主導，這股勢力將來也將主導整個歐洲大陸。通過與英國結盟，法國將可以“發展出一套偉大光榮的外交政策，為過去的失敗復仇。與英國結盟比在滑鐵盧重打一仗更能讓我們得益”。[[3]](#_3_Memoires_du_duc_De_Persigny)



路易-拿破侖，1854（圖片來源：羅杰-維奧萊及Topfoto機構）

而俄羅斯卻不一樣，法國可以通過和俄羅斯打一仗來恢復國家榮譽。過去與俄羅斯打交道的種種記憶：拿破侖從莫斯科撤退、隨后的軍事失敗、俄羅斯軍隊占領巴黎等等，一直讓法國人感到悲痛羞辱。俄羅斯還是1815年制定的歐洲格局以及法國波旁王朝復辟的主要推動者。在法國人看來，沙皇是自由的敵人，是在歐洲版圖上發展自由國家的障礙。而且尼古拉還是唯一一個不承認拿破侖三世的歐洲君主。英國、奧地利和普魯士都愿意承認他的君主地位，即使奧地利和普魯士不太情愿；但是尼古拉卻拒絕承認，理由是皇帝是天命的，而不是全民公投選出來的。沙皇在稱呼拿破侖三世時，故意用“我的朋友”（mon ami）而不是歐洲君主間互稱時慣用的“我的兄弟”（mon frère），以顯示他對拿破侖三世的輕蔑。[\*](#__Ao_Di_Li_He_Pu_Lu_Shi_Yuan_Lai)拿破侖三世身邊的一些幕僚，特別是德佩爾西尼，希望他能借這個機會斷絕與俄羅斯的關系。但是拿破侖三世不想讓私人爭吵成為其統治的起點，于是反唇相譏道：“兄弟是天定的，但朋友是可以選擇的。”[[4]](#_4_A__J__P__Taylor__The_Struggle)

在拿破侖三世看來，與俄羅斯在圣地問題上的糾紛可以為他所用，把因1848—1849年革命而分裂的法國團結起來。如果法蘭西第二帝國能夠為了自由而和俄羅斯這個“歐洲憲兵”打一仗的話，左派革命勢力就能因其“為自由而戰”而支持他，接受拿破侖三世發動政變和登基稱王的行為；同時天主教右派也會繼續支持他，因為他們一直在推動發起圣戰，消滅威脅基督教和法國文明的東正教異端。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拿破侖三世任命了持極端天主教立場的瓦萊特擔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瓦萊特是“奧賽碼頭”（Quai d’Orsay），即法國外交部內一個勢力很大的教士游說集團的成員。據德佩爾西尼稱，這一集團一直在運用其影響力，夸大圣地糾紛的后果。

我們的外交政策經常受到一個教士游說組織的干擾，這個組織已經慢慢滲透到外交部的密室中。12月2日的行動未能將其清除，它反而變得越發大膽，趁著我們忙于處理國內事務，將我國外交政策與圣地復雜的糾紛纏繞在一起，取得的一丁點成功都被自吹自擂為民族的勝利。

在與俄羅斯的爭執中，瓦萊特態度咄咄逼人，宣稱拉丁人在圣地的權利已“清楚地確定了”，并召來法國艦隊為自己撐腰，在法國的極端天主教媒體上贏得一片喝彩。拿破侖三世本人在圣地糾紛上的立場則溫和一些，他曾向外交部首席政治顧問愛德華·安托萬·德圖弗內爾（Édouard Antoine de Thouvenel）坦陳自己對這些糾紛的細節所知甚少，并對宗教沖突“被鬧大到不成比例的地步”感到遺憾。圣地糾紛確實被鬧得太大，但是拿破侖三世在國內需要取得天主教輿論的支持，在外交事務上需要聯合英國對抗俄羅斯，這意味著他并無動力約束瓦萊特的挑釁行為。直到1852年春天，因英國外交大臣馬姆斯伯里勛爵（Lord Malmesbury）的抗議，拿破侖三世才將瓦萊特從君士坦丁堡召回。但即使在召回瓦萊特后，法國依然繼續執行炮艦政策迫使蘇丹讓步，相信會因此激怒沙皇，并希望這樣能迫使英國與法國結盟，共同對抗俄羅斯侵略。[[5]](#_5_Memoires_du_duc_De_Persigny)

法國的炮艦政策起了作用。1852年11月，高門發布一項新的裁決，允許天主教教士持有伯利恒圣誕教堂的大門鑰匙，他們可以自由出入馬槽祈禱堂和圣誕石窟。當時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正在英國，而留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國代辦休·羅斯上校（Colonel Hugh Rose）對高門為什么會發布這項裁決的解讀很簡單：法國最新的蒸汽炮艦“查理曼大帝號”（Charlemagne）可以以每小時8.5海里的速度從地中海駛來，其姊妹艦“拿破侖號”（Napoleon）時速可達十二海里，這意味著技術落后的土耳其和俄羅斯艦隊聯起手來都不是法國艦隊的對手。[[6]](#_6_FO_78_895__Rose_to_Malmesbury)

土耳其向法國人做出的讓步令沙皇非常惱怒，威脅說自己同樣會使用武力。12月27日，他命令從比薩拉比亞的第四、第五軍團調動三萬七千人，準備對君士坦丁堡發起閃電進攻；另外調動九萬一千人，準備對多瑙河流域公國和巴爾干其他地區同樣發起進攻。沙皇親自下了命令，事先沒有和外交部長卡爾·涅謝爾羅迭、戰爭部長多爾戈魯科夫親王（Prince Dolgorukov）商量，他甚至都沒有和政治警察“第三科”負責人奧爾洛夫伯爵討論這一決定，而當時兩人幾乎每天都會見面商討事務。在俄國高層還有傳言說沙皇準備肢解奧斯曼帝國，第一件事就是要占領多瑙河流域公國。在一份寫于1852年底的備忘錄中，沙皇明言其瓜分奧斯曼帝國的計劃：俄羅斯將占領多瑙河流域公國和位于三角洲的多布羅加（Dobrudja）地區；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將成為獨立國家；亞得里亞海岸歸奧地利所有；塞浦路斯（Cyprus）、羅德島（Rhodes）和埃及歸英國；法國會得到克里特島；希臘將得到周圍的島嶼，成為一個地域更大的國家；君士坦丁堡將成為一個不設防的城市，受國際條約保護；而土耳其人則將被從歐洲驅趕出去。[[7]](#_7_K__Vitzthum_von_Eckstadt__St)

此時沙皇開始了與英國的新一輪談判，如果俄羅斯與法國在近東地區發生沖突，英國的態度將起到決定性作用，因為英國擁有比任何國家都強大的海軍艦隊。沙皇依然相信在1844年訪問期間，他與英國人已達成了諒解，現在他可以請英國人來約束法國，保證俄羅斯憑借條約在奧斯曼帝國擁有的權利。他還希望能說服英國人，讓他們相信瓜分土耳其的時候到了。在1853年2、3月間，沙皇與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勛爵（Lord Seymour）舉行了多次會談。“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病人，”他的話題從土耳其開始，“他已病入膏肓。如果我們讓他就此離去，特別是在善后工作還沒有做好之前，那將非常不幸。”在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之際，英國與俄羅斯之間達成協議，有計劃地瓜分領土將是“非常重要”的。這樣至少能阻止法國派兵到近東地區，一旦法國派兵，俄羅斯也將不得不派兵進駐奧斯曼帝國領土。“如果英國和俄羅斯達成了協議，”沙皇對西摩說，“那么其他國家怎么想、怎么做都無關緊要了。”沙皇還“以一名紳士的身份”保證俄羅斯已放棄了葉卡捷琳娜的領土野心，他并不愿意征服君士坦丁堡，而想讓其成為一個國際城市；但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不能讓英國或法國軍隊控制這個城市。在奧斯曼帝國崩潰的混亂中，他將不得不作為托管人（dépositaire）暫時占領君士坦丁堡，保證土耳其不會分裂成為許多共和制小國，成為科蘇特、馬志尼（Mazzini）[†](#__19Shi_Ji_Yi_Da_Li_Ge_Ming_Zhe)這些歐洲革命者的避難所。“我無法放棄我神圣的職責，”沙皇強調，“俄羅斯的宗教來自近東，這些感情、這些責任，我們永遠不能拋諸腦后。”[[8]](#_8_FO_65_424__Seymour_to_Russell)

西摩對沙皇瓜分奧斯曼帝國領土的計劃并不感到震驚，在發給外交大臣羅素勛爵的第一份報告中，他甚至對此表現出歡迎態度。他寫道，如果俄羅斯和英國“這兩個最關注土耳其命運的”基督教大國能夠占領歐洲原來被穆斯林統治的地區，這將是“19世紀文明世界取得的高貴勝利”。在阿伯丁勛爵領導下的聯合政府中，許多人，包括羅素以及財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William Gladstone），都對英國眼看著土耳其人迫害基督徒，卻繼續扶持奧斯曼帝國的做法有所保留。但是另外一些人則對坦齊馬特改革十分熱衷，希望給他們更多時間。拖延當然對英國有利，因為它被夾在俄羅斯和法國中間，而這兩個國家它都不信任。“俄羅斯人指責我們太親法國，”維多利亞女王對這個問題看得很透徹，“而法國人又指責我們太向俄羅斯人靠攏。”英國政府內閣拒絕接受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的看法，并決定不會為這樣的假想局面設計應急措施。他們認為，設計應急措施這一動作本身就可能鼓舞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起義然后遭受鎮壓，進一步加快奧斯曼帝國的滅亡。英國政府和議會中，甚至有人對沙皇一再堅持奧斯曼帝國即將崩潰產生疑心，認為沙皇正在密謀操作推翻奧斯曼帝國。正如西摩在2月21日與沙皇會面后的記錄中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一位君主如此堅定地認為他的鄰國即將滅亡，那么他心中一定知道他能夠控制鄰國倒下的時間。”[[9]](#_9_FO_65_424__Seymour_to_Russell)

在后來與西摩的談話中，沙皇對自己瓜分奧斯曼帝國的方案越來越有信心，甚至還透露了更多細節。他將會把土耳其變成一個傀儡國家，就像他對待波蘭那樣；他會給予多瑙河流域公國、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獨立地位，但將它們置于俄羅斯保護之下；他還宣稱自己已獲得奧地利的支持。“你要明白，”他對西摩說，“當我說俄羅斯會如何行動時，我知道奧地利也會采取同樣的行動。符合一國的利益的行動，必然也符合另一國的利益。在土耳其問題上，兩國的利益完全一致。”西摩對沙皇“魯莽沖動”的計劃日益厭惡，他覺得沙皇似乎打算把寶都押在與土耳其一戰獲勝之上，他將此歸咎于沙皇在位近三十年積累起來的傲慢。[[10]](#_10_FO_65_424__Seymour_to_Russel)

沙皇的信心肯定也緣于他誤判了英國政府對他的支持。他覺得在1844年訪問倫敦期間，他與阿伯丁勛爵之間建立了某種情感聯系。當時阿伯丁勛爵是外交大臣，現在已成為英國首相，是英國領導人中最親俄的一個。阿伯丁在圣地糾紛上對俄羅斯的支持，被尼古拉解讀為英國贊同他對奧斯曼帝國的瓜分方案。俄羅斯大使布魯諾夫男爵在2月份發回的一份報告中告知沙皇，說阿伯丁在一次隨意的對話中談到奧斯曼帝國政府是世界上最惡劣的政府，英國一點都不愿意繼續扶持它。1853年春天，在看到這份報告后，尼古拉相信已不用擔心英國會與法國結盟。在與西摩的會談中，他越來越多地談到應該對法國和土耳其采取激進立場。[[11]](#_11_Cunningham__Eastern_Question)然而與此同時，在東方問題上，阿伯丁在英國內閣中日益孤立，沙皇對此卻一無所知，他完全不了解英國政府的政策正在走向反俄的方向。

為逼迫蘇丹恢復俄羅斯在圣地上的特權，1853年2月，沙皇向君士坦丁堡派出了一位特使。特使人選是沙皇特意選擇的，反映了尼古拉采取軍事行動的傾向性：擔任特使的不是經驗豐富的外交官，而是一名軍人。六十五歲的亞歷山大·緬什科夫親王（Prince Alexander Menshikov）曾參加過1812年的俄法戰爭，在1828—1829年對土耳其的戰爭中擔任海軍將軍，被加農炮炮彈打掉了睪丸。他曾作為一名海軍官員參與制定封鎖土耳其海峽的方案，在1831年擔任芬蘭總督，還參加了對波斯的談判。根據西摩的估計，緬什科夫是一個“知識豐富的人”，“在沙皇身邊的人中，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具獨立精神。他的諷刺性觀察顯露出其思維上奇異的變化，這讓他在圣彼得堡頗不得待見”。但是緬什科夫親王缺乏對土耳其人采取懷柔政策所需的技巧和耐心，這一點在西摩看來是值得注意的。

如果必須派一名軍人到君士坦丁堡，那么沒有比他更好的人選了。但是不得不注意的是，沙皇派一名軍人擔任特使本身就具有某種意義，而且如果與土耳其人的談判沒有進展，談判者可以立即成為軍隊指揮官，有權召集并統領十萬軍人。[[12]](#_12_FO_65_424__Seymour_to_Russel)

緬什科夫的使命是要求蘇丹撤銷1852年11月份發布的偏向天主教的法令，恢復希臘教士對圣墓教堂的特權；作為賠償，蘇丹還必須發布一項正式公告（sened），保證俄羅斯作為圣地乃至整個奧斯曼帝國內東正教的代表。在俄羅斯人看來，這一權利在1774年的《庫楚克開納吉和約》中就已經說明了。緬什科夫還得到授權可以向蘇丹建議，一旦法國抗拒希臘教士對圣墓教堂的控制權，俄羅斯將派出一支海軍艦隊和四十萬士兵支援蘇丹對抗西方列強入侵，條件是蘇丹在行使主權時傾向東正教。根據緬什科夫在其日記中的記述，他受命統領海軍和陸軍，同時擔任“戰爭與和平全權特使”之職。他收到的指令是對蘇丹好言相勸，但同時亦不妨以武力相逼。沙皇已經批準了一項軍事方案，命令十四萬俄軍集結在俄羅斯與多瑙河流域公國的邊境上，一旦土耳其人拒絕緬什科夫的要求，便即刻出兵占領。他同時還準備派出黑海艦隊和陸軍威脅君士坦丁堡，逼迫蘇丹就范。在出發前往君士坦丁堡之前，緬什科夫于2月28日在塞瓦斯托波爾登上“雷霆號”（Thunderer）蒸汽護衛艦，高調檢閱了俄羅斯海軍艦隊。在抵達君士坦丁堡時，他受到了一大群專程趕來的希臘居民的歡迎。他的一大批隨從中有第四軍團的參謀長涅波科伊奇茨基將軍（General Nepokoichitsky）和黑海艦隊參謀長弗拉基米爾·科爾尼洛夫中將（Vice-Admiral Vladimir Kornilov）。科爾尼洛夫的任務是刺探土耳其人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和君士坦丁堡的布防，為俄軍艦隊的閃電進攻做準備。[[13]](#_13_RGAVMF__f__19__op__7__d__135)

緬什科夫的要求事實上是不可能得到滿足的，沙皇卻認為他有可能成功，這說明尼古拉的想法已經多么地脫離現實。公告草稿由外交部長涅謝爾羅迭準備，所涉及的范圍已完全超出了圣地糾紛。俄羅斯提出的要求相當于簽署一份新的條約，將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希臘教堂置于俄羅斯保護之下，每一位東正教牧首均將由俄羅斯終身任命，高門完全沒有話語權。對奧斯曼帝國來說，它的歐洲領土不僅將成為俄羅斯的保護地，而且將實際上成為俄羅斯的附庸，生活在其軍事威脅的陰影之下。

即使沙皇的計劃本身還有一點成功的希望，也被緬什科夫在君士坦丁堡的舉動給徹底破壞了。抵達兩天后，他就打破外交慣例，沒有穿軍裝禮服，而是一身普通裝束，套上一件大衣就去參加高門主辦的歡迎儀式了，這對主人來說是一種侮辱。在會見首相穆罕默德·阿里時，緬什科夫要求首相立即撤銷外交部長福阿德·埃芬迪的職務，因為就是他在1852年11月屈從法國壓力授予天主教教士圣墓教堂大門鑰匙的。除非埃芬迪被撤換，換上一個親俄羅斯的外交部長，否則緬什科夫拒絕與高門談判。為了羞辱埃芬迪，緬什科夫故意在大庭廣眾之下對他不予理睬，借此向世人宣示任何仇視俄羅斯的高門部長“即使在蘇丹的宮殿也會被羞辱和懲罰”。[[14]](#_14_RGAVMF__f__19__op__7__d__135)

緬什科夫的行為讓土耳其人目瞪口呆，但是俄羅斯在比薩拉比亞的軍事集結讓他們十分擔憂，于是不得不屈從于緬什科夫的要求，不僅撤換了埃芬迪，甚至在任命他的繼任者里法特帕夏（Rifaat Pasha）之前還讓俄羅斯譯員代表緬什科夫對他進行了面試。但是緬什科夫依然仗勢欺人，威脅高門說如果俄羅斯的所有要求不能立即得到滿足，他將斷絕兩國關系。他的這一做法卻適得其反，土耳其高官此時更傾向于向法國和英國求助，幫助他們抵制俄羅斯的威脅，因為俄羅斯的種種要求已危及土耳其的主權。

緬什科夫抵達君士坦丁堡之后不過一個星期左右，他對高門提出的要求就被土耳其官員泄露或是出賣給了所有西方國家的大使館。穆罕默德·阿里對局勢感到十分焦慮，秘密向英法兩國全權代辦求助，請求兩國派出艦隊前往愛琴海地區以備君士坦丁堡遭到俄羅斯入侵。英國全權代辦羅斯上校對緬什科夫的行為特別警覺，他擔心俄羅斯即將把一個新的《帝國碼頭條約》強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更糟糕的情況”是俄軍占領達達尼爾海峽，這將是對1841《海峽公約》（Straits Convention）的公然違背。他相信自己必須馬上采取行動，不能坐等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回到君士坦丁堡才做決定。坎寧在1月份辭職回到倫敦，2月份又被阿伯丁勛爵政府重新任命為駐君士坦丁堡大使，但是當緬什科夫已抵達君士坦丁堡時，坎寧尚未就任。于是在3月8日，羅斯通過蒸汽快船向駐馬耳他的海軍中將詹姆斯·鄧達斯爵士（Sir James Dundas）傳遞信息，請他率領海軍中隊前往伊茲密爾（Izmir）附近的烏爾拉（Urla）。鄧達斯在沒有得到來自英國政府的確認之前不愿意執行這一命令。在倫敦，幾個政府大臣于3月20日會面討論了羅斯的請求，這些人后來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成為“核心內閣”的成員。[‡](#___Cheng_Yuan_Bao_Kuo_Shou_Xiang)他們對俄羅斯在比薩拉比亞的軍事集結、“在塞瓦斯托波爾集結大批艦船”，以及緬什科夫對高門使用的“敵對性語言”感到擔憂。羅素勛爵相信俄羅斯正準備摧毀土耳其，因此傾向于同意派出英國艦隊前往博斯普魯斯，占領君士坦丁堡，這樣英法兩國能以維護《海峽公約》為由在黑海和波羅的海向俄羅斯海軍發起全面進攻。羅素背后有時任內政大臣帕默斯頓的支持，如采取這樣的行動，大部分英國公眾也會站在他這一邊。但是參加討論的其他幾位高官傾向于謹慎行事，他們擔憂的是法國，因為當時法國依然被視為英國的軍事威脅，他們也不同意羅素提出的建立英法聯盟能夠壓制法國蒸汽艦隊挑戰英國海上霸權的看法。他們的觀點是，法國這次是在故意挑釁俄羅斯，而俄羅斯確實應該在圣地糾紛上獲得對方讓步，他們還相信俄羅斯駐倫敦大使布魯諾夫男爵以“一名紳士”的名義對俄羅斯和平愿望做出的保證。因為這些理由，倫敦方面拒絕了羅斯的請求。這幾名內閣大臣指出，作為一名全權代辦，羅斯沒有權力召集艦隊、在戰爭與和平這樣的問題上做出決策，羅斯擅自請求英軍支援的行動屬于因“土耳其政府的警報……以及俄羅斯軍艦壓境的謠傳”而貿然行事。他們決定等待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回到君士坦丁堡，并希望達成一個和平解決方案。[[15]](#_15_FO_65_420__Clarendon_to_Seym)

3月16日，羅斯試圖召集英國海軍艦隊的消息傳到了巴黎。三天之后，法國政府內閣開會討論土耳其形勢，外交部長德魯安·德呂（Drouyn de Lhuys）發言，將局勢描繪得如同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一般：“土耳其最后的日子即將到來，雙頭鷹（沙皇羅曼諾夫［Romanov］家族的徽章）將出現在圣索菲亞的塔樓之上。”然而他拒絕派出法國艦隊，至少不允許法國艦隊在英國派出艦隊之前行動，因為歐洲各國一直擔心拿破侖時代的法國復活，貿然行事會讓法國受到孤立。內閣成員中，只有內政部長德佩爾西尼和他的意見相左，德佩爾西尼宣稱，如果法國挺身而出“阻擋俄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的步伐”，英國“將欣喜地加入我們的行列”。在他看來，出兵阻擋俄羅斯進犯土耳其關乎法國的國家榮譽。他指出，發動12月2日政變，將拿破侖三世送上皇位的法國軍隊是一支有傳統榮譽的“禁衛軍”。德佩爾西尼警告拿破侖三世，如果他接受內閣的意見，采用拖延行事的辦法，那么“當您在士兵面前走過，您會看到他們哀傷的臉龐，沉默的隊列，您會感覺腳下的土地開始動搖。您一定知道，要贏回軍隊的信任必須冒一定的風險。陛下，如果您不惜一切只為求得和平，那么反而會深陷恐怖的火海之中”。到了這一步，本來還猶豫不決的拿破侖三世終于被德佩爾西尼說服，派出了法國艦隊，但是并沒有讓艦隊前往達達尼爾海峽，而是讓其停留在屬于希臘水域的薩拉米斯（Salamis），作為對俄羅斯人的警告，宣示“法國并非對正在君士坦丁堡發生的事情不感興趣”。[[16]](#_16_Memoires_du_duc_De_Persigny)

拿破侖三世派出法國艦隊主要有三個目的：第一，正如德佩爾西尼所暗示的，有謠言說法國軍隊中有人在密謀推翻拿破侖三世，此時擺出一副強硬姿態是將這些企圖扼殺在搖籃的最好辦法。1852年冬天，拿破侖三世在給歐仁妮皇后（Empress Eugénie）的信中寫道：“我必須告訴你，軍隊中真的有人在密謀。我會緊盯此事，而且我覺得我可以采取這樣或那樣的行動阻止這些陰謀——也許打一仗是個辦法。”第二，拿破侖急于恢復法國海軍在地中海上的地位。當時對法國海軍地位的普遍看法從盧浮宮館長奧拉斯·德·維耶爾-卡斯特爾（Horace de Viel-Castel）的話中可見一斑：“如果哪一天地中海被英國和俄羅斯瓜分了，那法國就不再是世界強國了。”斯特拉特福德·坎寧途經巴黎前往君士坦丁堡上任時，拿破侖三世接見了他，并向他描述了法國對地中海地區勢力的考慮。3月10日，斯特拉特福德在一份備忘錄中記錄了這段對話：

他說他并沒有意愿讓地中海成為“法國的內陸湖”——這是一個經常能聽到的說法——但是他愿意讓地中海成為一個“歐洲”的內陸湖。他沒有解釋這個說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說地中海所有的海岸線都應該是基督教的領地，那么這個任務是相當艱巨的……我對這段對話的感覺是……路易-拿破侖希望與我們友好相處，至少在目前的局勢下如此，因此他愿意在君士坦丁堡問題上和英格蘭在政治上保持步調一致。當然我們還不知道他是希望恢復土耳其的地位，還是希望為土耳其崩潰之后法國的利益做準備。

拿破侖三世調動法國海軍艦隊的最重要目的，還是為了“和英格蘭……保持步調一致”，建立一個英法聯盟。“德佩爾西尼說得對，”他在3月19日對手下的大臣們說，“如果我們派出艦隊到薩拉米斯，就會迫使英格蘭也采取同樣舉措。如果兩支艦隊能夠聯合行動，最終會讓兩國聯盟共同對付俄羅斯。”根據德佩爾西尼的理解，法國皇帝推斷如果法國派出艦隊，就能夠把英國恐俄派爭取過來，贏得英國布爾喬亞媒體的支持，迫使在這個問題上持更為謹慎立場的阿伯丁政府加入法國的行動。[[17]](#_17_Memoires_du_comte_Horace_de)

然而英國政府的反應與拿破侖三世預期的大相徑庭。當法國艦隊3月22日駛出土倫港（Toulon）時，英國在馬耳他的艦隊依然按兵不動。英國政府認為法國人在火上澆油，呼吁法國艦隊不要駛進意大利那不勒斯以東水域，讓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有足夠時間和平解決危機。斯特拉特福德在4月5日抵達土耳其首都，發現土耳其人已經進入了一種不愿意再向緬什科夫讓步的情緒狀態，民族主義和宗教情緒高昂，土耳其各方的分歧只在于跟俄羅斯對抗應該走多遠，以及還應該花多少時間等待西方的軍事增援等問題。這些分歧同時還與奧斯曼帝國高層內部長期的個人恩怨糾纏在一起，一方是首相穆罕默德·阿里，另一方是斯特拉特福德的長期盟友、前首相雷希德，現在他在政府中已失去權力了 。聽說穆罕默德·阿里打算向緬什科夫讓步，斯特拉特福德呼吁他對俄羅斯保持強硬立場，并以個人名義保證，如有需要英國艦隊會馳援救助。他指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將圣地糾紛與俄羅斯其他方面的要求分開。在圣地糾紛上，俄羅斯確實有權提出要求根據條約恢復特權，但是為了維護土耳其主權，必須拒絕俄羅斯的其他要求。蘇丹的臣民應享受什么樣的宗教權利，必須由蘇丹憑其奧斯曼帝國君主地位授予，而不是通過某種由俄羅斯把持的體系決定。在斯特拉特福德看來，沙皇把圣地糾紛、保護希臘教會等當作了一匹特洛伊木馬，其真正目的是滲透和肢解奧斯曼帝國。[[18]](#_18_Correspondence_Respecting_th)

4月23日，奧斯曼帝國大議會（Grand Council）開會討論緬什科夫的要求時，決定聽從斯特拉特福德的建議，同意與俄羅斯談判圣地糾紛，但在授予俄羅斯對東正教徒的保護權上不做讓步。5月5日，緬什科夫提出了一個修改后的公約草案，不再要求俄羅斯有權決定東正教終身牧首任命權，但同時給出最后通牒，限令五日之內簽署，否則他將離開君士坦丁堡，斷絕俄羅斯與奧斯曼帝國的外交關系。斯特拉特福德呼吁蘇丹堅守立場。5月10日最后通牒到期時，奧斯曼帝國內閣依然拒絕簽署。緬什科夫為了能完成沙皇授予的使命，又不至于發起戰爭，又給了土耳其四天時間。在這期間，在斯特拉特福德和雷希德的操縱下，穆罕默德·阿里被剝奪了首相職位，雷希德當上了外交部長。他聽從斯特拉特福德的意見，繼續保持強硬立場，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在解決圣地糾紛的同時，不損害奧斯曼帝國的主權。此時奧斯曼帝國駐倫敦大使科斯塔基·穆蘇拉斯（Kostaki Musurus）發來消息，稱英國將協助保護奧斯曼帝國主權。雷希德需要更多時間贏得內閣的支持，這一消息更是給他壯了膽。

5月15日大議會再次開會，政府部長和穆斯林領袖們反俄情緒十分高昂，這是斯特拉特福德的功勞，他在開會之前親自拜訪了他們中的許多人，請求他們在俄羅斯人的威逼面前站穩腳跟。終于大議會做出決定，拒絕了緬什科夫的要求。當天晚上收到消息后，緬什科夫回復說俄羅斯現在不得不與奧斯曼帝國斷絕外交關系了，但是因為黑海風暴，他會在君士坦丁堡停留數天，當然他其實還是希望能達成某種妥協。但妥協并未到來。最后，在5月21日，俄羅斯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上的俄羅斯國徽被摘了下來，載著緬什科夫的“雷霆號”離開海港，向敖德薩駛去。[[19]](#_19_BOA__AMD__44_81__Musurus_to)

\* \* \*

緬什科夫外交使命的失敗讓沙皇相信，現在他需要采取武力行動了。他在5月29日給帕斯克維奇元帥的信中寫道，如果他早就采取強硬手段，也許已經迫使土耳其人讓步了。因為擔心西方列強的介入，他本不想對土耳其發動戰爭，但是現在他打算使用武力威脅來撼動土耳其帝國的根基，得到他想要的東西，保證在他看來條約賦予俄羅斯的作為東正教保護者的權利。在信中他透露了自己的想法，同時也顯示了當時的心理狀態：

［緬什科夫使命失敗的］后果是戰爭。不過在開戰之前，為了向世界宣示我愿意盡力避免戰爭的決心，我決定先派軍隊到［多瑙河流域］兩公國去，同時給予土耳其人八天時間滿足我的要求。如果他們拒絕接受，我將對他們開戰。我的目標是和平占領公國，如果土耳其人不出現在多瑙河左岸的話……如果他們抵抗，我會封鎖博斯普魯斯海峽，俘虜黑海上所有的土耳其艦船。我會向奧地利提議，讓他們占領黑塞哥維那（Herzegovina）和塞爾維亞。如果土耳其人依然不為所動，我會讓兩公國、黑塞哥維那和塞爾維亞獨立——到那時候土耳其帝國將開始崩塌，各地基督徒將群起抗爭，奧斯曼帝國最后的日子便會來臨。我不打算跨過多瑙河，［土耳其］帝國本來就會崩潰，但是我會為戰爭做好準備，第十三、十四師將會在塞瓦斯托波爾和敖德薩備戰。坎寧的行為……沒有讓我泄氣：我必須走自己的路，憑著我的信仰，為了俄羅斯的榮耀，擔當我的責任。你無法想象這些想法多么令我悲傷。我已漸漸年老，但是我希望我的生命在和平中終結！[[20]](#_20_A_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

沙皇的計劃其實是一種妥協，最初他的設想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在西方列強能夠反應之前占領君士坦丁堡，但是帕斯克維奇的想法要謹慎一些。帕斯克維奇曾率領俄軍對匈牙利和波蘭的反叛武裝進行懲罰性的襲擊，是沙皇最信任的軍事顧問。他對沙皇的突然襲擊方案抱懷疑態度，擔心俄羅斯會因此陷入一場歐洲大戰。兩人的不同之處主要在于對奧地利可能采取行動的看法。尼古拉對他與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之間的私交信心十足，而且他在1849年還出手為奧地利解決了匈牙利問題，他相信弗蘭茨·約瑟夫會和他一起加入對土耳其的軍事威脅，而且有必要的話，還會參與對奧斯曼帝國的瓜分。他相信如果奧地利站在他這一邊，就不可能發生歐洲大戰，土耳其人將被迫認輸。正是基于這一想法，沙皇才會對土耳其采取強硬的外交政策。然而帕斯克維奇對奧地利的支持抱有懷疑，他的看法后來被證明是正確的：奧地利不可能歡迎俄羅斯軍隊進入多瑙河流域公國和巴爾干地區，擔心那里的塞爾維亞人和其他斯拉夫人會因此發動針對奧地利的暴動。一旦俄羅斯軍隊跨過多瑙河，如果斯拉夫人中真的出現反奧地利暴動的話，奧地利甚至可能加入西方列強對抗俄羅斯。

為了限制沙皇的進攻計劃，帕斯克維奇決定以沙皇的泛斯拉夫幻想來打動他。他說服尼古拉俄羅斯軍隊只需以防御姿態占領多瑙河流域公國，就可以鼓勵巴爾干的斯拉夫人起來抗爭，逼迫土耳其人接受沙皇的要求。他提出如果有必要的話，俄軍只需占領兩公國幾年，憑著俄羅斯的宣傳就可以召集當地基督徒加入沙皇的巴爾干軍隊，人數可達五萬之多，足以讓西方列強不敢干預，至少能讓奧地利保持中立。在4月初的一份備忘錄中，帕斯克維奇描述了俄羅斯軍隊開進之后，巴爾干地區的宗教戰爭將是怎樣的一幅場景：

身處土耳其的基督徒是來自武士部落的后代。如果說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人尚未拿起武器，那只是因為土耳其人的統治還沒有影響到他們的村莊。但是，如果基督徒與穆斯林發生沖突，當我們的軍隊發起戰爭，這些人身上的武士精神就會重新煥發，他們不會忍受土耳其人對自己村莊的蹂躪……沒有一座村莊，甚至沒有一個家庭，會沒有受壓迫的基督徒加入我們與土耳其人的戰斗。這一點會成為我們的武器，足以摧毀土耳其帝國。[[21]](#_21_Russkii_arkhiv__1891__no__8)

快到6月底時，沙皇下令比薩拉比亞的兩支俄軍跨過普魯特河占領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帕斯克維奇依然希望俄軍入侵兩公國的行為不會導致一場歐洲大戰，但是他擔心如果這種情況真的出現，沙皇也不會退讓。他在6月24日向這兩支軍隊的俄軍統帥米哈伊爾·戈爾恰科夫將軍（General Mikhail Gorchakov）解釋了這一想法。俄軍進發到了布加勒斯特，在那里建立了指揮部。每到一處，俄軍便張貼沙皇宣言，聲稱俄羅斯無意侵占領土，占領兩公國的目的只是為了解決宗教糾紛，從奧斯曼帝國政府那里取得“擔保”。“如果高門能夠擔保東正教會不可侵犯的權利，我們愿意隨時停止軍事行動。但是如果高門依然拒絕，那么在上帝庇佑下，我們將繼續前進，為我們的信仰而戰。”[[22]](#_22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俄羅斯占領軍對在圣地發生的糾紛一無所知。“我們不做任何思考，我們什么也不知道。我們讓指揮官替我們思考，我們只按他們的命令行事。”一名參加過多瑙河戰事的老兵泰奧菲爾·克萊姆（Teofil Klemm）回憶道。克萊姆當時十八歲，是一個識字的農奴，被選拔到烏克蘭克列緬丘格（Kremenchug）參加培訓成為一名軍官，1853年從那里被征召入俄羅斯步兵。他對在第五軍團廣為流傳的泛斯拉夫小冊子沒什么感覺，“我們中沒有誰對這些想法感興趣”，他寫道。但是和俄羅斯軍隊中的每一個士兵一樣，他上戰場時脖子上掛著十字架，相信這是自己的使命，為上帝而戰。[[23]](#_23_Za_mnogo_let__Zapiski__vospo)

俄羅斯軍隊是一支農民部隊，征兵的主要對象是農奴和官定農民（state peasants），這也是它的主要問題。俄羅斯擁有當時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共有超過一百萬步兵，二十五萬非正式部隊（以哥薩克騎兵為主），在各地的軍事屯田區還有七十五萬預備役軍人。但即使如此龐大，俄羅斯軍隊還是不足以防御極為漫長的邊境線，存在許多薄弱點，例如波羅的海海岸、波蘭、高加索等地；但是如果繼續征兵，又將會削弱農奴經濟、引發農民起義。俄羅斯在歐洲的領土面積相當于其他歐洲國家的總和，但人口卻只有歐洲國家的五分之一，大部分農奴在俄羅斯中央的農耕地帶，離邊境距離遙遠。一旦開戰，邊境地區需要很快補充兵員，但是在尚無鐵路的情況下，征召農奴士兵并通過步行或是馬車把他們送到前線需要幾個月的時間。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前，俄羅斯兵力就已經捉襟見肘，幾乎所有適合入伍的農奴都已應征。新兵質量也在急劇下降，因為地主和村莊急于留住最后一批能干農活的勞動力，于是把低質量的農奴送去應征。一份1848年的報告顯示，在最近的征召中，三分之一的應征者因為身高不合規定（僅要求1.60米）而不合格，另有一半因為身患慢性病或有其他身體缺陷而不宜入伍。解決兵力短缺的唯一辦法是擴大征兵范圍，向歐洲的全民征兵體系靠攏；但是這么做將會終結農奴制，那可是貴族們堅決維護的俄羅斯社會基礎。[[24]](#_24_F__Kagan__The_Military_Refor)

盡管經歷了二十年的改革，俄羅斯軍隊的質量仍然比歐洲其他國家差很多。軍官教育程度低，士兵幾乎都是文盲：1850年代的官方數字顯示，在六個師約十二萬軍人中，僅有二百六十四（0.2%）人能讀能寫。18世紀盛行的喜好表面功夫、只圖閱兵時氣派的風氣依然在軍中占主導地位，提拔僅憑是否服從軍紀。馬克思曾這樣描述：“他們的最主要品質包括無條件服從、卑躬屈膝，加上極佳的眼力，能一眼看出軍裝上紐扣和紐扣眼上的毛病。”訓練中強調的是外表整齊劃一，戰斗能力其次。即使在戰場上，依然還有各種夸張的規矩，對姿態、步長、行軍整齊要求仔細，這些全部寫在軍事手冊上，與戰場實際狀況完全沒有關系：

當作戰陣形向前行進或向后撤退時，各營之間必須保證每一條隊列的整齊以及各營之間距離的一致。在此情況下，僅是各營內隊列保持整齊還不夠，各營之間還必須保持同一步伐，這樣各營的持旗士官可以保持一條直線，并與行軍路線垂直。

檢閱文化在俄羅斯軍隊中占主導地位，也和俄軍武器的落后有關。當時的軍隊普遍要求士兵保持密集隊形，原因之一是為了確保軍隊大規模運動時，能夠保持軍紀，不至于出現混亂。但是對俄羅斯軍隊來說，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們使用的滑膛槍性能太差，不得不依賴刺刀，這一軍事缺陷卻被美化為“俄羅斯軍人的英勇無畏”，所以在拼刺刀時更顯雄風。俄軍對輕火器忽視的程度，根據一位軍官的說法，到了“沒幾個士兵知道怎么使用滑膛槍”的地步。“對我們來說，戰場上的勝利完全依靠行軍的藝術和步調的正確。”[[25]](#_25_Brooks___Reform___pp__70_71)

但是這種過時的作戰方法在19世紀早期為俄羅斯帶來了幾次重大勝利，對手包括波斯和土耳其軍隊，當然還有拿破侖。俄法戰爭是俄羅斯贏得的最重要的戰爭，讓俄羅斯人相信他們的軍隊是戰無不勝的。正因如此，俄軍沒有任何壓力提升部隊戰斗力，以適應蒸汽機和電報時代的戰爭。與新興的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俄羅斯經濟落后、財政虛弱，要在和平時期對人數眾多、花費巨大的軍隊進行現代化，頗受限制，進展緩慢。只有到了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俄軍的滑膛槍在英法軍隊的米涅來復槍（Minié rifle）面前顯得毫無招架之力時，俄羅斯才開始采購來復槍裝備部隊。

在八萬名跨過普魯特河，從俄羅斯進入摩爾達維亞的俄軍士兵中，只有不到一半能活過一年，沙皇軍隊兵員損失的速度比其他歐洲國家軍隊高得多。在戰場上，貴族高級軍官為了取得一點進展，不惜犧牲大批士兵的生命。這些軍官對手下農奴士兵的死活毫不關心，想到的只有如何向上方匯報取得的勝利以利于自己的晉升。絕大部分俄軍士兵不是在戰斗中陣亡，而是死于傷病。如果有恰當的醫療服務，許多人不至于喪命。俄軍每次發動攻勢時，都有同樣的悲慘故事：在1828—1829年的多瑙河流域公國，一半的士兵死于霍亂和其他疾病；在1830—1831年的波蘭戰役中，七千名俄軍士兵在戰斗中身亡，八萬五千人因傷病而被抬下戰場；在1849年的匈牙利戰斗中，只有七百零八名士兵戰死，卻有五萬七千名俄軍士兵被送到奧地利醫院中。即使在和平時期，俄軍都有65%的人處于病中。[[26]](#_26_Curtiss__Russian_Army__pp__2)

在俄軍高發病率的背后，是農奴士兵遭受的殘酷對待。為維持軍紀，鞭笞士兵是家常便飯，每個團中的每個士兵都可能身上帶著鞭傷。軍隊后勤系統腐敗充斥，軍官們薪酬很低，原因是俄羅斯國庫空虛，常年軍費不足。軍官們于是先從軍費中給自己撈足了油水，這樣給士兵們留下的軍費就很少了。因為后勤不可靠，俄羅斯軍隊必須靠自己生存。例如政府雖然提供材料，但是每個團都要自己負責制作軍服和靴子。團里不僅有裁縫和鞋匠、理發師、面包師、鐵匠、木匠，還有金屬工、木工、油漆工、歌手和樂隊，所有人都把自己的鄉村手藝帶到了軍隊里。如果沒有這些農民的技藝，不要說打仗了，僅僅維持一支軍隊都不可能。每個俄軍士兵在上戰場時都要依靠他作為農民的知識記憶和生存能力而活。他們會在背包里自帶繃帶，受傷之后可以自救。他們在露天睡覺的能力很強，會找樹枝葉片、草垛、農作物為自己遮風擋雨，有時甚至會在地上挖洞把自己埋起來睡覺。這一技巧非常重要，保證了整支部隊在行軍時可以不用攜帶帳篷。[[27]](#_27_Za_mnogo_let__pp__34_35__45)

當俄羅斯軍隊跨過普魯特河，進入摩爾達維亞之后，土耳其政府命令魯米利亞軍指揮官奧馬爾帕夏（Omer Pasha）加強多瑙河沿岸土耳其要塞，做好防守準備。同時高門從奧斯曼帝國屬地埃及和突尼斯征調部隊，到8月中旬，已有兩萬名埃及士兵、八千名突尼斯士兵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安營扎寨，準備前往多瑙河沿岸要塞增援。一名英國大使館官員在寫給斯特拉特福德·德·雷德克利夫勛爵夫人的信中對此進行了描述：

可惜您看不到特拉比亞邊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到處都是戰艦。在海峽對岸的高地上，是埃及軍隊的綠色帳篷。君士坦丁堡仿佛倒退了五十年，街上擠滿了來自邊遠省份、準備與俄國人一戰的奇異人物。頭巾、長矛、錘子、戰斧，在擁擠的窄巷里叮當作響，他們很快統統被送到舒姆拉（Shumla）的營地，恢復了我們平靜的生活。[[28]](#_28_BOA__I__HR__328_21222__S__Ki)

土耳其軍隊由來自各個民族的士兵組成，包括阿拉伯人、庫爾德人、韃靼人、埃及人、突尼斯人、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等，其中許多人要么對土耳其政府抱有敵意，要么聽不懂土耳其人或是歐洲軍官的指揮（奧馬爾帕夏手下的軍官有許多是波蘭人或是意大利人）。這些士兵中最奇特的是來自北非、中亞和安納托里亞，被稱為巴什波祖克（Bashi Bazouks）[§](#SS_Yi_Wei__Mei_You_Tou_Nao__Huo)的黑人騎兵。他們離開自己的部落，二三十人一組，年齡和裝束各異，來到土耳其首都參加對抗俄羅斯異教徒的圣戰。英國海軍軍官、曾協助訓練土耳其海軍的阿道弗斯·斯萊德（Adolphus Slade）在他關于克里米亞戰爭的回憶錄中，描述了一群巴什波祖克士兵在被送往多瑙河前線之前，在君士坦丁堡街頭游行的場面。他們大都穿著自己部落的裝束，披著“頭巾和披肩長袍，身攜手槍、土耳其彎刀、佩劍等等奇異的裝飾，有些還拿著掛有旗子的長矛。每一支隊伍都有自己的顏色和軍鼓，看上去還是他們的祖先在圍困維也納時用過的”[¶](#P_Ao_Si_Man_Di_Guo_Zui_Hou_Yi_Ci)。奧斯曼帝國軍隊士兵所用的語言之多，以至于即使是規模較小的軍事單位也經常要雇翻譯和喊話人負責傳呼軍官發布的命令。[[29]](#_29_A__Slade__Turkey_and_the_Cri)

語言不通只是問題之一，許多穆斯林士兵不愿意聽從基督教軍官，甚至是奧馬爾帕夏的命令。帕夏原名米哈伊洛·拉塔斯（Mihailo Latas），是一名克羅地亞的塞爾維亞人和東正教徒，曾在奧地利軍校接受教育，為逃避腐敗指控來到奧斯曼帝國的波斯尼亞（Bosnia）省并改信伊斯蘭教。奧馬爾帕夏生性詼諧健談，非常享受作為魯米利亞軍指揮官的豪華生活。他身穿鑲著金鏈和寶石的軍裝，隨軍攜帶一套私房供女眷專用，還配有一套德國交響樂隊。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他讓交響樂隊演奏威爾第（Verdi）的歌劇新作《游吟詩人》（Il Trovatore）中的《啊！最后的時刻已到》（“Ah! Che la morte”）。奧馬爾帕夏不是一名出色的指揮官，據說他被提升的原因是寫得一手好字。阿卜杜勒-邁吉德小時候曾請他擔任書法教師，1839年登基成為蘇丹之后馬上將他晉升為上校。在這一點上，盡管是東正教出身，奧馬爾帕夏卻是一個奧斯曼軍官階層的典型，靠宗派關系而不是作戰經驗向上爬。蘇丹馬哈茂德進行的軍事改革和坦齊馬特改革都沒能為一支現代職業軍隊打下根基。大部分土耳其軍官戰術素養很差，許多軍官依然采用過時的戰術，讓士兵分散在戰場的每一個角落，而不是集中大量士兵組成密集陣形。奧斯曼軍隊善于打埋伏和騷擾之類的“小仗”，在圍困戰上十分出色；但是一直紀律不佳、缺乏訓練，無法組成讓滑膛槍發揮作用所必需的統一號令隊形，與俄羅斯軍隊剛好相反。[[30]](#_30_T__Buzzard__With_the_Turkish)

在收入和生活條件上，軍官與士兵之間差別極大，比俄軍更甚。許多高級軍官生活奢華，手下的士兵卻在打仗期間幾個月，有時甚至幾年都拿不到軍餉。俄羅斯外交官和地質學家彼得·奇哈喬夫（Pyotr Chikhachev）1849年在俄羅斯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館工作時分析了這個問題。根據他的計算，土耳其步兵每人每年的總開支（包括軍餉、給養和軍服）為十八銀盧布，俄羅斯步兵為三十二盧布，奧地利五十三盧布，普魯士六十盧布，法國八十五盧布，而每個英國步兵每年總開支達一百三十四盧布。多瑙河前線土耳其士兵的生活條件讓歐洲軍人十分震驚。據一名英國軍官說，他們“吃得糟糕、穿得破爛，是最倒霉的”。從埃及派來的援軍被一名俄羅斯軍官形容為“老的老，小的小，沒有接受過任何作戰訓練”。[[31]](#_31_RGVIA__f__450__op__1__d__33)

\* \* \*

英國政府內部在如何對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做出反應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內閣中最主張和平處理的是首相阿伯丁勛爵，他拒絕將俄羅斯占領多瑙河流域公國的行為視作侵略，甚至認為俄羅斯人是為了逼迫高門承認他們在圣地應有的權利才做出此舉，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能找到和平途徑，讓俄軍撤出，但又保全沙皇的面子。他最擔心的是被土耳其人拖入一場與俄羅斯的戰爭。他從來就不信任土耳其人，1853年2月，他致信下議院領袖羅素勛爵，反對派遣英國艦隊幫助土耳其人：

這些野蠻人仇恨我們所有人，一定會很高興能找到機會讓我們卷入與其他基督教國家的紛爭。也許我們有必要給予他們道義上的支持，并且努力延長他們的存在；但是如果我們不得不為土耳其人而拿起武器，那真是我們最大的不幸。

內閣中主戰一方的代表是內政大臣帕默斯頓，他認為俄羅斯占領兩公國屬于“敵對之舉”，英國必須立即做出反應，以“保護土耳其”。他主張派遣英國軍艦到博斯普魯斯海峽，給俄羅斯施加壓力，逼迫它從兩公國撤軍。帕默斯頓的支持者中，除了恐俄的英國媒體外，還有反俄的外交官如龐森比和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等人，這些人認為俄軍占領兩公國給了英國一個機會，糾正1848—1849年沒有反對俄羅斯占領多瑙河流域的錯誤。[[32]](#_32_M__Chamberlain__Lord_Aberdee)

倫敦有一個龐大的羅馬尼亞流亡者社區，這些人都是俄羅斯上次占領多瑙河流域公國時逃亡出來的，他們組成了有影響力的壓力集團，試圖說服英國政府進行干預。他們的游說活動受到幾位內閣大臣的支持，其中包括帕默斯頓、時任財政大臣格拉德斯通和其他許多下議院議員，他們通過在下議院提問有關多瑙河戰事問題的方式游說議會。羅馬尼亞流亡者的領導人與意大利流亡者關系密切，他們還加入了由馬志尼組建的“民主委員會”（Democratic Committee），此時這個委員會中還有流亡倫敦的希臘和波蘭革命者。羅馬尼亞人很注意與這些民族主義者的革命政策保持距離，他們非常明白，為了在英國贏得支持，就必須將自己的訴求表達得符合英國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理念。在幾份全國性報紙和期刊的支持下，他們成功地向英國公眾解釋了對抗俄羅斯入侵、保衛多瑙河流域公國對于保障歐洲大陸的人身與貿易自由如何重要。厄克特幾乎每天都在《廣告晨報》（Morning Advertiser）上撰寫文章，呼吁英國干預多瑙河流域公國事務。不過他更關心的是保衛土耳其主權，以及英國的自由貿易權利。隨著俄羅斯繼續入侵，羅馬尼亞宣傳者的行動越來越大膽，開始舉辦巡回演講直接向英國公眾發出呼吁。演講的主題都是面對俄羅斯暴君，歐洲必須奮起抗爭，例如康斯坦丁·羅塞蒂（Constantine Rosetti）在普利茅斯舉行的一場演講中，對聽眾說：“在多瑙河邊，十萬羅馬尼亞人已準備好，隨時加入民主大軍。”[[33]](#_33_R__Florescu__The_Struggle_ag)

在俄羅斯占領多瑙河流域公國行為的性質尚不明朗之時，英國政府對將皇家海軍艦隊派往哪里舉棋不定。在內閣中，帕默斯頓和羅素想把艦隊派往博斯普魯斯海峽以防止俄羅斯艦隊進攻君士坦丁堡；但是阿伯丁則傾向讓艦隊停留在稍靠后的位置，不至于對和談造成威脅。最后雙方達成妥協，英國海軍艦隊將開往達達尼爾海峽外的貝希克灣備戰。這樣做的想法是讓英軍艦隊離君士坦丁堡距離足夠近，遏制俄羅斯艦隊向君士坦丁堡發起進攻；但又足夠遠，不至于引發俄英之間開戰。到了7月份，俄羅斯對兩公國的占領看來更為認真了，傳到歐洲各國首都的消息說俄羅斯已下令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的都督們斷絕與高門的關系，轉而向俄羅斯進貢。這一消息引發了歐洲國家的警覺，因為俄羅斯的企圖似乎是永久占領兩公國，而不是像沙皇聲稱的那樣只是迫使高門就范。[[34]](#_34_FO_65_422__Palmerston_to_Sey)

歐洲列強對此反應很快。奧地利調動了兩萬五千人的軍隊前往南部邊境，主要是為了警告塞爾維亞人和其他哈布斯堡帝國的斯拉夫人不要發起暴動，支持俄羅斯對多瑙河流域公國的入侵。法國下令艦隊準備作戰，隨后英國艦隊才開始行動。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是第一批收到有關俄羅斯對兩公國都督下的命令的人，他迫切希望能彌補1848—1849年間英國未能站出來對抗俄羅斯入侵的過失，呼吁英國政府果斷采取軍事行動保衛兩公國。他警告英國外交部說：“整個土耳其的歐洲領土，從奧地利邊境到希臘”，都即將落入俄羅斯手中。如果俄羅斯人跨過多瑙河，巴爾干地區各地的基督徒將紛紛起來暴動；如果能得到英法的支持，奧斯曼帝國蘇丹和他手下的穆斯林臣民將與俄羅斯一戰。他還說雖然被卷入一場結果難料的戰爭對英國來說是件不幸的事，但是與其等到將來不可收拾，不如現在就處理俄羅斯帶來的危險。[[35]](#_35_Correspondence_Respecting_th)

俄羅斯占領兩公國在歐洲列強中引發了對國家安全的擔憂，這些國家都不能坐視俄羅斯摧毀奧斯曼帝國。英國、法國、奧地利，以及基本上跟隨奧地利決定的普魯士同意共同行動推動和平解決方案。外交行動由奧地利牽頭，它本身就是《維也納條約》的關鍵擔保人和主要受益者。奧地利的對外貿易非常依賴多瑙河，因此不能忍受俄羅斯并吞兩公國；但是它又最不能承受與俄羅斯開戰帶來的負擔，因為戰爭的破壞會最大程度地落在奧地利頭上。奧地利的提議大概是無法實現的：他們希望能達成某種外交方案，讓俄羅斯撤銷對高門的要求，從兩公國撤軍，同時還保全沙皇的面子。

和平進程以歐洲各國間高調傳送外交文件為手段，各方在遣詞造句上進行了無數次修改，以圖滿足俄羅斯的要求，同時又保障土耳其的獨立。最終達成的是一份名為《維也納說明》（Vienna Note）的文件，在7月28日由四方外交部長代土耳其政府草擬而成，和所有為了終止敵對行動而擬定的外交文件一樣，《維也納說明》故意含糊其詞：高門同意保障俄羅斯保護蘇丹的東正教臣民的協約權利。沙皇將此視為俄羅斯在外交上的勝利，在8月5日同意立即簽署《維也納說明》而“無需任何修改”。但是四方外長事先并未征得土耳其人同意，當土耳其人要求澄清文件中的一些細節時，問題就出來了。他們擔心《維也納說明》對俄羅斯干預奧斯曼帝國事務未能做出適當的限制。這一擔心很快被證明是有道理的，根據一份被泄露給一家柏林報紙的內部外交文件，俄羅斯人對《維也納說明》的理解是：他們可以在奧斯曼帝國的任何地方做出干預行動以保護東正教利益，而不僅限于已發生沖突的特定地點如圣地等。蘇丹建議對《維也納說明》在文字上做少量改動，對土耳其人來說這些措辭很重要，因為這是他們為了保住最富庶的兩個公國而對俄羅斯人做出的讓步。蘇丹還要求在與俄羅斯恢復外交關系前，俄羅斯軍隊必須先撤出兩公國，同時四方必須擔保俄羅斯不會再次入侵。對于一個主權國家來說，這些要求并不過分，但是沙皇拒絕接受土耳其人修改《維也納說明》的要求，理由是他同意的是修改前的文件。沙皇懷疑土耳其人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的挑動下采取了不妥協的立場，因此這份文件也就沒有意義了。9月初，《維也納說明》不得不被放棄，在土耳其即將對俄羅斯宣戰的形勢下，四方不得不再次開始談判。[[36]](#_36_Goldfrank__Origins_of_the_Cr)

事實上，與沙皇懷疑的情形相反，在土耳其人拒絕《維也納說明》的過程中，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只起了很小的作用。眾所周知，他強烈支持土耳其行使主權，同時對俄羅斯十分仇視，所以當土耳其意外地拒絕西方列強姑息俄羅斯的妥協方案時，人們很自然地會把這件事算到他頭上。后來英國外交部也認為是斯特拉特福德讓土耳其走上了戰爭的道路，他們的看法是：如果斯特拉特福德態度正確的話，本來是可以說服土耳其人接受《維也納說明》的，但是因為“他自己也比土耳其人好不了多少，他在那里生活得太久，對［俄羅斯］皇帝充滿了仇恨，渾身都是土耳其人的精神，再加上他自己的脾氣，采取了與政府指令完全相反的做法”。[[37]](#_37_The_Greville_Memoirs_1814_18)外交大臣喬治·克拉倫登勛爵在10月1日回顧和平努力失敗的原因時得出結論，認為如果當時由一個比斯特拉特福德立場更為溫和的人擔任駐君士坦丁堡大使，情形可能會好一些，因為俄羅斯人的蒙蔽手法“挑起了他對俄羅斯人的全部反感，讓他從一開始就認定與俄羅斯開戰是土耳其的最佳選擇。事實上任何一個能讓俄羅斯下得了臺的和平方案都不會讓他滿意”。[[38]](#_38_H__Maxwell__The_Life_and_Let)但是這樣的看法對斯特拉特福德是不公平的，英國政府調解失敗，卻讓他承擔了責任。事實上，斯特拉特福德已經盡最大努力說服高門接受《維也納說明》了，但是在1853年的夏天，他的話已經沒有什么影響力了，因為整個君士坦丁堡已經被游行示威所席卷，游行的人們紛紛要求政府向俄羅斯發動一場“圣戰”。

多瑙河流域兩公國遭俄羅斯入侵一事，在奧斯曼首都不僅激發了穆斯林的情緒，還刺激了土耳其的民族主義。高門一直在鼓勵穆斯林人口反抗入侵，此時已無法控制因此產生的宗教情緒。都市里的宗教權威們越來越多地使用戰爭語言，讓虔誠的穆斯林相信，侵略者們將會搗毀清真寺并在它們的遺址上建起教堂。與此同時，高門一直對維也納和談一事秘而不宣，聲稱“只有當沙皇被蘇丹的威嚴震懾”，和平才會來臨。這一想法無疑繼續鼓勵了穆斯林至上的民族主義情緒。各種謠言紛紛揚揚：有的說蘇丹會花錢請英法艦隊為土耳其而戰；有的說安拉選擇了歐洲來保衛穆斯林；還有的說沙皇已派他的皇后到君士坦丁堡乞求和平，并且將放棄克里米亞，作為對入侵兩公國的賠償。許多謠言都是由最近被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的手下制造和傳播的，目的是為了損害雷希德的聲望。到8月底，穆罕默德·阿里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的“主戰派”領袖，在大議會中勢力漸長。除了穆斯林宗教領袖外，他還受到一批年輕軍官的追捧。這些人都是民族主義者，宗教情緒高漲，反對西方對奧斯曼帝國事務的干涉；但是他們也考慮到，如果能把英法兩國拉到自己這邊共同對抗俄羅斯，將對自己十分有利，甚至能夠逆轉一百多年來奧斯曼軍隊在俄軍面前屢戰屢敗的局面。為了得到西方艦隊的協助，他們愿意向斯特拉特福德這些手伸得很長的歐洲人許諾改善國家治理，但是他們拒絕坦齊馬特改革，因為在他們看來，給予基督徒更多的民事權利將會對穆斯林統治形成潛在的威脅。[[39]](#_39_Slade__Turkey_and_the_Crimea)

在9月的第二個星期，君士坦丁堡的戰爭情緒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出現了一系列主戰游行，并且有六萬人簽名請愿，要求政府對俄羅斯發動“圣戰”。宗教學校（medrese）和清真寺成為這些游行請愿的組織中心，它們的影響還體現在張貼在大街小巷的海報所使用的語言上：

榮耀的帕迪沙（Padishah）[\*\*](#___Ao_Si_Man_Di_Guo_Guo_Min_Dui)！為了您的尊嚴，您所有的臣民都愿意獻出生命、財產和孩子。您和您的祖上都曾在阿尤部安薩里（Eyyub-I Ansari）清真寺佩上穆罕默德的寶劍，現在寶劍出鞘的責任落在了您的身上。您的部下對此猶豫不決，那是因為他們沾染上了虛榮的毛病而不能自拔，但是現在的局面有可能（上天保佑不要發生）把我們帶向危險的境地。因此，我們的帕迪沙，您勇猛的戰士和虔誠的奴仆想要投入一場捍衛自己權利的戰斗！

君士坦丁堡的宗教學校中有四萬五千名學生，這是一個心存不滿的群體，坦齊馬特改革推動新式世俗學校，損害了宗教學校學生的社會地位和職業前景，這股怨氣讓他們的抗議行動更為激進。土耳其政府非常擔心，如果他們不向俄羅斯宣戰，將會引發一場伊斯蘭革命。[[40]](#_40_Saab__Origins_of_the_Crimean)

9月10日，三十五位宗教領袖向大議會呈交了一份請愿書，大議會在第二天進行了討論。據《泰晤士報》的報道：

請愿書的內容主要摘自《古蘭經》（Koran）上有關向伊斯蘭敵人開戰的段落，并暗示如果大議會不聽從請愿書提出的要求，社會將出現動蕩。請愿書的語氣極為大膽，近乎張狂。一些高級大臣努力與遞交請愿書的人講道理，但是得到的回答卻是鏗鏘簡短：“這些都是《古蘭經》上的話，如果你是穆斯林，就必須遵守。你們現在對外國使館的異教徒大使言聽計從，要知道他們是伊斯蘭信仰的敵人。我們是先知的子孫，我們有一支大軍在手，急切地想投入戰斗。異教徒羞辱我們已久，我們決心復仇。”據說每當政府大臣要與請愿者說理時，得到的回答都是“這些是《古蘭經》上的話”。這里的大臣們都處于憂慮焦急中，因為目前的形勢在土耳其非常少見。一場革命看來即將爆發，他們擔心在這個不適當的時刻被迫發動一場戰爭。

9月12日，宗教領袖獲得了蘇丹的召見，他們向蘇丹發出最后通牒：要么開戰，要么退位。阿卜杜勒-邁吉德向斯特拉特福德和法國大使埃德蒙·德拉庫爾（Edmond de Lacour）求助，兩人同意如果在君士坦丁堡爆發革命，兩國將召集艦隊協助鎮壓。[[41]](#_41_The_Times__27_Sept__1853__Co)

當晚蘇丹召集大臣開會，會上他們同意向俄羅斯宣戰，不過要先給予高門足夠時間確定西方艦隊的支持并壓制君士坦丁堡的抗議活動。9月26—27日大議會召開擴大會議，蘇丹手下的大臣、穆斯林教士和軍隊中的高層人物都參加了，決議正式通過。在會上，穆斯林教士們積極主張一戰，軍官們則猶豫不決，因為他們對土耳其軍隊是否有能力戰勝俄羅斯軍隊沒有信心。奧馬爾帕夏認為在多瑙河流域需要額外增加四萬人的部隊，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準備好要塞和橋梁對付俄羅斯軍隊。新近被任命為軍隊總司令的前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盡管是“主戰派”的領導人，卻不愿意表示是否有可能戰勝俄軍。海軍大元帥馬哈茂德帕夏（Mahmud Pasha）也不愿意明確表態，他說土耳其海軍能夠與俄羅斯艦隊抗衡，但是如果以后戰敗的話不要回頭找他算賬。最后還是雷希德站到了穆斯林領袖這一邊，也許是感覺到如果在這時候繼續反對開戰將會激發一場宗教革命，徹底摧毀坦齊馬特改革，而這正是西方列強支持土耳其對抗俄羅斯的條件。“與其不做抵抗，不如戰死疆場，”雷希德宣布，“如果上天在我們這一邊，我們一定會大勝而歸。”[[42]](#_42_A__Turkgeldi__Mesail_i_Muhim)

[\*](#_51) 奧地利和普魯士原來同意效仿俄羅斯，但后來讓步了，擔心此舉會造成與法國關系的破裂。他們找到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即稱拿破侖三世為“我的兄弟君”（monsieur mon frère）。——原注

[†](#_52) 19世紀意大利革命者。——譯注

[‡](#_53) 成員包括首相阿伯丁勛爵、下議院院長約翰·羅素勛爵、外交大臣喬治·克拉倫登勛爵 （Lord George Clarendon）、海軍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Sir James Graham），以及內政大臣帕默斯頓。——原注

[§](#SS_3) 意為“沒有頭腦”或“沒有紀律”。——譯注

[¶](#P_3) 奧斯曼帝國最后一次圍困維亞納發生在1683年。——譯注

[\*\*](#_54) 奧斯曼帝國國民對蘇丹的稱呼，意為征服者。——譯注

注釋

[[1]](#_1_4)有關英國海軍抵抗法國的戰略，參見 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56 (Manchester, 1990), pp. 25–7.

[[2]](#_2_4)RA VIC/MAIN/QVJ/1855, 16 Apr.

[[3]](#_3_4)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aris, 1896), p. 212.

[[4]](#_4_4)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1955), p. 49.

[[5]](#_5_4)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 225; E. Bapst, Les Origines de la Guerre en Crimé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de 1848 à 1851 (Paris, 1912), pp. 325–7.

[[6]](#_6_4)FO 78/895, Rose to Malmesbury, 28 Dec. 1852.

[[7]](#_7_4)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1864,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 38; D. Goldfrank,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pp. 109–10.

[[8]](#_8_3)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11 and 22 Jan., 22 Feb. 1853.

[[9]](#_9_3)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11 Jan., 21 Feb. 1853; A.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2 vols. (London, 1993), vol. 2, p. 136.

[[10]](#_10_4)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22 Feb. 1853; FO 65/425, Seymour to Clarendon, 29 Mar. 1853.

[[11]](#_11_3)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vol. 2, pp. 139–40.

[[12]](#_12_3)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10 Feb. 1853.

[[13]](#_13_3)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37; FO 65/424, Seymour to Russell, 7 Jan.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121–4.

[[14]](#_14_3)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43; 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 94.

[[15]](#_15_3)FO 65/420, Clarendon to Seymour, 23 Mar., 5 Apr. 1853; 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pp. 136–8.

[[16]](#_16_4)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p. 226–231; Bapst, Origines de la Guerre en Crimée, p. 354.

[[17]](#_17_3)Mémoires du comte Horace de Viel-Castel sur le regne de Napoléon III, 1851–1864, 2 vols. (Paris, 1979), vol. 1, p. 180; J. Ridley, Napoleon III and Eugenie (London, 1979), p. 365;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 237.

[[18]](#_18_4)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p. 256–8;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pp. 159–62; 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pp. 147–8, 156–7; A.Saab,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Charlottesville, Va., 1977), pp. 135–7;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 248.

[[19]](#_19_4)BOA, AMD, 44/81, Musurus to Reshid Pasha, 13 May 1853; RGAVMF, f. 19, op. 7, d. 135, l. 52;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74–6.

[[20]](#_20_3)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1, pp. 739–40.

[[21]](#_21_3)Russkii arkhiv, 1891, no. 8, p. 169;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Russkaia starina, 16 (1876), pp. 681–7;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76.

[[22]](#_22_3)RGVIA, f. 846, op. 16, d. 5407, ll. 7–11; d. 5451, ll. 13–14;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 74.

[[23]](#_23_4)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 74; RGB OR, f. 743, T. Klemm, ‘Vospominaniia starogo-soldata, rasskazannye synu, kadetu VII klacca Pskovskogo kadetskogo korpusa’, l. 6.

[[24]](#_24_4)F. Kaga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Nicholas I: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London, 1999), p. 221; E. Brooks, ‘Reform in the Russian Army, 1856–1861’, Slavic Review, 43/1 (Spring 1984), p. 64; E. Wirtschafter, 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 (Princeton, 1990), p. 24.

[[25]](#_25_3)Brooks, ‘Reform’, pp. 70–71; 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9), pp. 397–398; J. Curtiss, The Russian Army under Nicholas I, 1825–1855 (Durham, NC, 1965), p. 115; P. Alabin, Chetyre voiny: Pokhodnye zapiski v voinu 1853, 1854, 1855 i 1856 godov, 2 vols. (Viatka, 1861), vol. 1, p. 43.

[[26]](#_26_3)Curtiss, Russian Army, pp. 248–9.

[[27]](#_27_3)Za mnogo let, pp. 34–35, 45–47; RGB OR, f. 743, T. Klemm, ‘Vospominaniia starogo-soldata’, ll. 4, 7–8; Wirtschafter, 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 p. 87.

[[28]](#_28_3)BOA, I, HR, 328/21222; S. Kiziltoprak, ‘Egyptian Troops in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in Vostochnaya (Krymskaya) Voina 1853–1856 godov: Novye materialy i novoe osmyslenie, 2 vols. (Simferopol, 2005), vol. 1, p. 49;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 296.

[[29]](#_29_3)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186;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86–87.

[[30]](#_30_3)T. Buzzard, With the Turkish Army in the Crimea and Asia Minor (London, 1915), p. 121; J. Reid, Crisi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elude to Collapse 1839–1878 (Stuttgart, 2000), p. 257.

[[31]](#_31_2)RGVIA, f. 450, op. 1, d. 33, ll. 4–12; A Visit to Sebastopol a Week after Its Fall: By an Officer of the Anglo-Turkish Contingent (London, 1856), p. 53; 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v 1853–54 gg.: Iz dnevnika P.B. (St Petersburg, 1887), p. 566.

[[32]](#_32_3)M. Chamberlain, Lord Aberdee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1983), p. 476; FO 65/421, Palmerston to Seymour, 16 July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 400.

[[33]](#_33_2)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241–6.

[[34]](#_34_2)FO 65/422, Palmerston to Seymour, 2 Aug. 1853.

[[35]](#_35_2)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p. 400–4.

[[36]](#_36_2)Goldfrank,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pp. 190–213.

[[37]](#_37_2)The Greville Memoirs 1814–1860, ed. L. Strachey and R. Fulford, 8 vols. (London, 1938),vol. 1, p. 85.

[[38]](#_38_2)H. Maxwell,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Fourth Earl of Clarendon, 2 vols. (London, 1913), vol. 2, p. 25.

[[39]](#_39_2)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pp. 101–2, 107; 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p. 64; Cunningham, Eastern Questions, pp. 198–9.

[[40]](#_40_3)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p. 81;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pp. 80, 90.

[[41]](#_41_2)The Times, 27 Sept. 1853;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p. 562–3.

[[42]](#_42_3)A. Türkgeldi, Mesail-i Mühimme-i Siyasiyye, 3 vols. (Ankara, 1957–60),vol. 1, pp. 319–21;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p. 93.

# 第五章 虛張聲勢

土耳其向俄羅斯宣戰的消息正式在1853年10月4日的官方報紙《每日事件》（Takvim-i Vekayi）上刊出，“高門宣言”隨后發表，聲明由于俄羅斯拒絕從多瑙河流域公國撤出，奧斯曼帝國政府被迫向其宣戰，但是為了顯示政府的和平意愿，在發起進攻前，魯米利亞部隊的最高長官奧馬爾帕夏會給予俄羅斯軍隊十五天時間讓其撤離。[[1]](#_1_BOA__HR__SYS__907_5)

即使在這個當口，外交解決的希望猶在。土耳其人決定宣戰其實是為了爭取時間，一方面平息君士坦丁堡宗教人士的抗議，另一方面向西方政府施加壓力促其干預。奧斯曼帝國政府并沒有準備好與俄羅斯真正開戰，于是采取虛張聲勢的辦法，避免在君士坦丁堡發生一場伊斯蘭革命，同時迫使西方國家派遣艦隊前來逼退俄羅斯軍隊。

10月19日，土耳其最后通牒日期已到。英法兩國的建議都是暫時按兵不動，但是土耳其不顧勸阻，在多瑙河流域公國向俄軍發起了進攻，他們的算盤是西方媒體會因此激發民眾支持土耳其抗擊俄羅斯的舉動。土耳其政府意識到英國報刊影響力很大，也許認為報刊代表的就是政府的聲音，因此花了很大力氣積極爭取。1853年秋，高門向其駐倫敦使館輸送了大量資金，用于“資助并秘密組織一系列公眾示威和報刊文章”，呼吁英國政府行動起來對抗俄羅斯。[[2]](#_2_BOA__HR__SYS__903_2_26)

在高門的命令下，奧馬爾帕夏于10月23日率軍在卡拉法特（Kalafat）跨過多瑙河，從哥薩克騎兵手中奪下了卡拉法特，成為克里米亞戰爭的第一場小沖突。這里在1848年瓦拉幾亞革命中曾是反俄據點，當奧馬爾帕夏的軍隊到來時，村民們拿起獵槍加入土耳其軍隊與其并肩作戰。土耳其軍隊也在奧爾泰尼察（Oltenitsa）跨過多瑙河，與俄軍的沖突比在卡拉法特的戰斗更為激烈，但是戰果并不明朗，雙方都號稱自己取得了勝利。[[3]](#_3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2)

這些最初的小沖突促使沙皇下決心按照他5月29日給帕斯克維奇的信中的計劃，發動一場大規模戰役。但是作為沙皇的軍事首領，帕斯克維奇此時比在同年春天更加反對大規模作戰。他認為土耳其軍隊實力太強，西方艦隊距離太近，俄羅斯軍隊不宜在此時進攻君士坦丁堡。9月24日，他給沙皇呈上備忘錄，懇請沙皇采取在多瑙河北岸做守勢，在南岸鼓動基督徒起義反抗土耳其的策略。他的目標是脅迫土耳其人做出讓步，避免使用武力。“我們擁有對付奧斯曼帝國的最致命武器，”他寫道，“連西方列強也無力阻止。我們最讓對手膽寒的武器是對土耳其境內基督徒的影響力。”

帕斯克維奇的主要憂慮是，一旦俄羅斯在巴爾干地區發起攻勢，奧地利因為擔心境內臨近地區的斯拉夫人會發起暴動，而將站出來反對。他不想把俄軍投入與土耳其人的作戰中，這樣才有實力面對奧地利可能發起的進攻。如果奧地利與俄羅斯交戰，最有可能的戰場將是波蘭，而一旦失去波蘭，俄羅斯的歐洲部分將面臨崩潰。但是帕斯克維奇不敢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沙皇，所以他采取拖延戰術，不理會盡快南進的命令，而是將部隊集中在多瑙河沿線。他這樣的做法有兩重目的：首先將多瑙河鞏固為一條從黑海向巴爾干地區的補給線，其次可以在這里組織巴爾干的基督教民間武裝，為俄軍未來的攻勢做好準備，這一攻勢也許會發生在1854年春天。“這個想法新穎漂亮，”他寫道，“我們可以和土耳其境內最有戰斗力的部落：塞爾維亞人、黑山人、保加利亞人保持密切的聯系。這些人也許不支持我們，但是他們一定反對土耳其人。在我們的幫助下，他們真的有可能摧毀土耳其帝國……而不需要俄羅斯人灑下一滴血。”[[4]](#_4__Vostochnaia_voina__Pis_ma_kn)帕斯克維奇知道這樣做不符合沙皇不在境外煽動暴動的原則，于是他以宗教理由為自己辯護：這樣做是為了保護東正教徒免受穆斯林迫害。他還認為這樣做已有先例，在過去的俄土戰爭中（1773—1774、1788—1791、1806—1821），俄羅斯軍隊都曾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內召集基督徒參戰。[[5]](#_5__Voina_s_Turtsiei_1828_1829_i)

其實在這一點上說服沙皇是很容易的。1853年11月，沙皇寫了一份備忘錄，在手下大臣和高級軍官之間傳閱。這份備忘錄顯示沙皇的想法很受帕斯克維奇影響，他期待塞爾維亞人會起義反抗土耳其人，而保加利亞人也將緊隨其后。俄羅斯軍隊會首先在多瑙河沿岸鞏固陣地，一旦南方的基督徒發動起義，俄軍將揮師南下解放巴爾干地區。為了這一戰略能夠成功，俄軍必須長期占領多瑙河流域兩公國，這樣才有足夠時間將基督徒整編為武裝力量。沙皇這樣展望一年之后的景象：

到1855年初我們就能知道可以把多大的希望寄托在土耳其境內的基督徒身上，英法兩國是否還會繼續與我們對抗。只有當那里出現一場最激烈、最廣泛的爭取獨立的起義之時，我們才有取得進展的機會。沒有大眾的合作，我們發起攻勢是不可能的。戰斗應該在基督徒和土耳其人之間展開，我們可以說是一支后援部隊。[[6]](#_6_A_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i)

外交部長涅謝爾羅迭對此卻較為謹慎，想給沙皇的巴爾干革命戰略潑點涼水，而大部分俄羅斯外交官也對此有所保留。11月8日，在呈交沙皇的一份備忘錄中，涅謝爾羅迭提出觀點，認為巴爾干地區的斯拉夫人不會發動大規模起義。[\*](#__Nie_Xie_Er_Luo_Die_Shou_Dao_Le)他還指出煽動基督徒暴亂將會讓歐洲國家懷疑俄羅斯是否對巴爾干地區抱有野心，而且這樣的做法具有危險性，因為土耳其也可以在高加索和克里米亞地區煽動沙皇治下的穆斯林起來暴動。[[7]](#_7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ia_v)

但是尼古拉發動一場宗教戰爭的目標不容動搖，他把自己視為東正教信仰的守衛者，不會被區區一個外交部長說服改變立場，況且在沙皇眼中，具有新教背景的涅謝爾羅迭本身在宗教事務上就沒有多大發言權。尼古拉堅信將斯拉夫人從穆斯林統治下解救出來是他的神圣使命。在針對巴爾干地區斯拉夫人的所有宣言中，他都明確表示俄羅斯發動的是一場宗教戰爭，目的是把他們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來。在他的指令下，俄羅斯指揮官在占領了基督徒村鎮之后，會向當地教堂捐獻大鐘，以此贏得民眾支持，同時俄羅斯軍隊還會把當地清真寺改造成教堂。[[8]](#_8__Voina_s_Turtsiei_1854_g____R)

沙皇的宗教狂熱與更大范圍的軍事考慮，特別是與帕斯克維奇的戰術設想交纏在一起，以至于得出結論認為巴爾干地區的基督徒能夠為俄軍提供廉價的兵員和足夠的物資。到1853年，尼古拉已同斯拉夫派和泛斯拉夫主義者走得很近，不僅在宮中有好幾個這樣的人物，而且沙皇的長期情婦巴爾貝·涅利多夫（Barbette Nelidov）也是他們的支持者。根據詩人費多爾·丘特切夫的女兒、宮中女侍官安娜·丘特切娃的記載，皇儲亞歷山大大公和他的夫人瑪麗亞·亞歷山德羅芙娜（Grand Duchess Maria Alexandrovna）當時已在宮中公開表示贊同泛斯拉夫觀點。丘特切娃好幾次都聽到他們在交談中說到俄羅斯應該將斯拉夫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盟友，俄軍跨過多瑙河后，應該支持斯拉夫人為獨立而進行的戰斗。宮中另一位泛斯拉夫主義者布盧多娃女爵甚至呼吁沙皇同時向土耳其和奧地利宣戰，解放斯拉夫人。她多次向沙皇轉交泛斯拉夫主義領袖波戈金的信件，請求尼古拉出面，在俄羅斯的領導下將斯拉夫人聯合起來，締造一個斯拉夫人基督教帝國，并將首都設在君士坦丁堡。[[9]](#_9_RGIA__f__711__op__1__d__35__l)

沙皇在一份波戈金呈交的備忘錄頁邊空白處的批注顯示了他在1853年12月時的想法，那段時間他幾乎接受了泛斯拉夫主義理念。當時尼古拉向波戈金詢問他對俄羅斯在俄土戰爭中的斯拉夫政策有什么看法，波戈金的回答是一份對俄羅斯與歐洲列強關系的詳細論述，其中充滿了他對西方國家的怨恨。波戈金的觀點顯然得到了尼古拉的贊同。和波戈金一樣，尼古拉認為俄羅斯作為東正教徒保衛者的地位并沒有被人認同或理解，俄羅斯沒有得到西方的公平對待。尼古拉特別贊同以下一段話，其中波戈金對西方列強的雙重標準提出批評，認為他們自己可以進行領土擴張，卻不允許俄羅斯做同樣的事情：

法國從土耳其那里奪得了阿爾及利亞，英國幾乎每年都在印度并吞一個公國，而這些都不會影響勢力平衡；但是當俄羅斯占領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時，盡管只是暫時的，卻干擾了勢力平衡。法國在和平時期占領羅馬并駐軍了好幾年[†](#__Zhi_1849__1850Nian_Jian__Wu_Di)，但那不算什么；當俄羅斯還只是在考慮占領君士坦丁堡時，歐洲和平就受到了威脅。英國人向中國人宣戰[‡](#___Zhi_Ya_Pian_Zhan_Zheng__1839)，僅僅因為中國人似乎冒犯了他們，這誰也無權干預；但是如果俄羅斯與鄰居發生爭執，卻必須獲得歐洲許可。為了支持一個可悲的猶太人的謊言，英國向希臘發出威脅，燒毀了它的艦隊[§](#SS_Zhi_Tang__Pa_Xi_Fei_Ke_Shi_Ji)，那是合法的行動；但是當俄羅斯要求簽署一份條約保護幾百萬基督徒時，卻被看作是在近東擴張勢力，犧牲勢力平衡。在西方國家身上，除了盲目的仇恨和惡意外，我們不能指望還能得到任何東西。它們不理解我們，也不想理解我們。（尼古拉在這里的頁邊空白處批注：“這就是問題所在。”）

在激發了沙皇內心對西方的怨恨情緒之后，波戈金鼓勵他獨自行動，憑著自己在上帝面前的良知行事，捍衛東正教，推動俄羅斯在巴爾干地區的利益。尼古拉對此表示贊同：

誰是我們在歐洲的盟友？（尼古拉在此批注：“誰也不是，我們也不需要他們，只要我們相信上帝，毫無條件地、自覺自愿地相信上帝。”）我們在歐洲真正的盟友是斯拉夫人，在血緣、語言、歷史和信仰上，他們都是我們的兄弟，在土耳其有一千萬，在奧地利有幾百萬之眾……在土耳其的斯拉夫人可以為我們提供一支超過二十萬人的部隊——那將是怎樣一支部隊啊！這還沒有算上克羅地亞人、達爾馬提亞人（Dalmatians）和斯洛文尼亞人（Slovenians）等。（尼古拉在此批注：“夸張了，降低到十分之一還差不多。”）……

土耳其人向我們宣戰，這就相當于廢除了決定兩國關系的所有過去簽署的條約，所以現在我們可以使用武力解放斯拉夫人了，因為土耳其人自己選擇了戰爭。（尼古拉在此批注：“說得對。”）

如果我們不去解放斯拉夫人，將他們置于我們的保護之下，那么我們的敵人，英國和法國……將把他們收入自己囊中。他們已經在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和波斯尼亞這些地方通過西方式的政黨活躍于斯拉夫人之中。如果讓他們成功，那么我們將何以自處？（尼古拉在此批注：“絕對正確。”）

是的！如果我們沒有利用這次有利機會，如果我們這次犧牲了斯拉夫人，背叛了他們對我們的期望，或是把他們的命運留給其他列強，那么我們給自己安排的，就不再是一個瘋狂與我們作對的波蘭，而是十個這樣的國家（正中我們敵人的下懷，而他們正在積極向這個方向努力）……（尼古拉在此批注：“說得對。”）

波戈金指出，如果斯拉夫人成為敵人，俄羅斯將變成一個“二流強國”。尼古拉在最后幾句話下面劃了三道橫線：

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時刻到來了——也許比波爾塔瓦（Poltava）[¶](#P_Zai_1709Nian_De_Bo_Er_Ta_Wa_Zh)和博羅季諾（Borodino）[\*\*](#___1812Nian_E_Luo_Si_Jun_Dui_Yu)還要偉大。在這個當口，俄羅斯不進則退——這是歷史規律。但是俄羅斯真的可以退卻嗎？上帝會允許嗎？不！他正在引導著俄羅斯偉大的靈魂，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光輝燦爛的俄羅斯歷史上看到。他一定不會允許這樣的事情發生：彼得大帝在東方建立了俄羅斯，葉卡捷琳娜鞏固了俄羅斯，亞歷山大擴大了俄羅斯版圖，然后尼古拉把俄羅斯丟給了拉丁人。不，這樣的事不能發生，這樣的事不會發生。上帝與我們同在，我們絕不能退縮。[[10]](#_10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ia)

為了讓沙皇接受泛斯拉夫主義理念，波戈金很聰明地從兩個方面說服沙皇：尼古拉認為自己承擔著保衛東正教的天賦使命，同時他也越來越覺得自己遭到西方的排斥。在11月發給手下大臣們的備忘錄中，尼古拉聲稱俄羅斯已別無他路，只有與斯拉夫人攜手，因為西方列強，特別是英國，已經和土耳其人結盟共同抵制俄羅斯的“神圣使命”了。

我們呼吁所有基督徒加入我們的行列，把他們從奧斯曼帝國幾個世紀的統治下解放出來。我們宣布將支持摩爾達維亞—瓦拉幾亞人、塞爾維亞人、保加利亞人、波斯尼亞人和希臘人尋求獨立的斗爭……我不知道還有什么其他辦法可以終止我們與英國之間的對立，因為在我們表明立場之后，英國人不應該再與土耳其人保持聯盟，繼續迫害基督徒。[[11]](#_11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ia)

但是，尼古拉對泛斯拉夫主義依然有所保留：他并沒有波戈金在巴爾干地區動員大批斯拉夫人組成軍隊的幻想，在政治理念上他不贊同煽動革命起義，而更愿意從宗教立場上對斯拉夫人的解放運動提供支持。然而，西方國家越是明確表示反對俄羅斯占領多瑙河流域兩公國，他就越傾向于把賭注押在建立一個東正教同盟上，威脅說如果奧地利也加入西方列強反對俄羅斯的話，俄羅斯將支持斯拉夫人起義。強烈的宗教信念讓年邁的沙皇變得草率魯莽，不惜犧牲俄羅斯經過幾十年的外交和武力才獲得的利益，在與斯拉夫人共同一戰上孤注一擲。[[12]](#_12_L__Vyskochkov__Imperator_Nik)

寄希望于塞爾維亞人將會起義，沙皇希望俄軍從布加勒斯特朝西南方向的魯塞（Rusçuk）行軍，這樣一旦塞爾維亞人發動起義，俄軍可就近協助。帕斯克維奇則傾向于將俄軍集中在東部多瑙河邊的土耳其要塞錫利斯特拉。尼古拉在寫給帕斯克維奇的一封信中解釋，軍事戰略必須為解放斯拉夫人的事業服務，而塞爾維亞人的起義即將發生：

當然錫利斯特拉很重要……但是在我看來，如果想在基督徒中推進我們的計劃并保持預備狀態，那么占領魯塞更有意義，因為從那里我們可以隨時向瓦拉幾亞中央地區發起進攻，同時留在保加利亞人中間，并與塞爾維亞人保持就近距離，我們肯定是需要他們的。在我們占領魯塞之后，基督徒們馬上會發動起義，這時我們可以決定是否需要從魯塞繼續向前推進。我認為占領錫利斯特拉不會對塞爾維亞人產生這么大的影響，因為離他們還太遠。[[13]](#_13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ia)

但是帕斯克維奇更為謹慎，他很緊張塞爾維亞人的起義會迫使奧地利發動干預，以防止起義蔓延到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領土。在12月，他向沙皇建議保留在波蘭的預備隊，以備奧地利從那里發起進攻，同時從布加勒斯特向錫利斯特拉進軍，在那里俄軍周圍將都是保加利亞人，不用擔心奧地利的進攻。帕斯克維奇認為三星期內即可拿下錫利斯特拉，這樣就可以讓沙皇軍隊在次年春天向哈德良堡發起進攻，在西方列強還沒來得及行動之前讓土耳其人屈服。尼古拉這次聽從了帕斯克維奇的建議。[[14]](#_14__Vostochnaia_voina__Pis_ma_k)

但是，當俄軍向錫利斯特拉推進時，那里的保加利亞人并未發生大規模暴動，其他斯拉夫人也沒有什么動靜。保加利亞人一般來說是親俄羅斯的，在近幾年中曾在維丁、尼什（Nish）和其他地方參與過反抗穆斯林統治的大規模起義。他們歡迎俄羅斯軍隊，把他們視作解放者，并與俄軍一起向土耳其據點發起進攻，但是沒有很多人加入志愿軍。保加利亞人的起義都是零星、小規模的，幾乎所有起義都被奧馬爾帕夏的軍隊殘酷地鎮壓了下去。在起義規模最大的舊扎戈拉（Stara Zagora），幾十名婦女和女孩慘遭土耳其軍隊蹂躪。[[15]](#_15_M__Pinson___Ottoman_Bulgaria)

1854年1月，駐瓦拉幾亞的英國領事寫道，俄羅斯占領軍“積極招募志愿軍，這些人主要包括希臘人、阿爾巴尼亞人、塞爾維亞人和保加利亞人”，他們參加的是一個“希臘—斯拉夫軍團”（Greek-Slavonic Legion）。領事還寫道，到那時為止，俄軍只招募到一千名志愿者，他們被征召來參加針對土耳其人的“圣戰”，“這些人組成了一個十字軍東征集團，由俄軍提供武器和開支”。這些志愿者被稱為“戴著十字架的人”，因為他們的帽子上都有一個“白底紅字的東正教十字架”。根據一位俄羅斯軍官的說法，盡管他們接受了軍事訓練，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被用來作為輔警在后方維持秩序。俄軍的占領行動是壓制性的，公開集會被禁止，地方政府被俄軍取而代之，言論審查被加強，食物和運輸工具被軍隊征用，這些都造成了廣泛的反感。英國領事寫道，摩爾達維亞人和瓦拉幾亞人都瞧不起俄羅斯人，“只要沒有什么危險，每個人都會嘲笑俄羅斯人”。在鄉村地區，出現了十幾起反抗征用的暴動，有些被哥薩克騎兵殘酷地鎮壓了下去，他們殺害農民，燒毀村莊。奧馬爾帕夏的軍隊采用同樣的恐怖手段對付保加利亞人定居點：搗毀教堂、砍頭殺害教士、肢解受害者、強奸女孩，以此防止保加利亞人起義或是參加俄羅斯軍隊。[[16]](#_16_FO_195_439__Grant_to_Clarend)

奧馬爾帕夏更擔心的是俄軍會從土耳其側翼攻入塞爾維亞境內，那里的塞爾維亞東正教教士以及部分農民傾向俄羅斯，強烈支持起來暴動。這說明沙皇向塞爾維亞發起進攻的分析和傾向是對的。土耳其指揮官將部隊集中在維丁附近的戰略位置，此處是多瑙河地區通往塞爾維亞人聚居區的東線要點，1853年12月下旬，一萬八千名土耳其士兵在多瑙河的另一邊將四千名俄軍從切塔泰（Cetatea）擊退。戰斗結束后，土耳其人將留在戰場上的一千多名俄軍傷兵全部殺死，這樣的事情后來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經常發生。[[17]](#_17_Vospominaniia_ofitsera_o_voe)

土耳其人急于保衛塞爾維亞，原因是那里局勢很不穩定。受到高門認可的塞爾維亞君主亞歷山大親王（Prince Alexander）已失去管制能力，塞爾維亞教會和宮廷內部親俄羅斯勢力正積極準備在俄軍到來之時舉行暴動。塞爾維亞軍隊指揮官已經接受了將被俄軍接管的事實，甚至暗中活動與親俄勢力合作。根據英國駐貝爾格萊德領事的記載，在1854年1月，塞爾維亞軍隊總指揮告訴他：“對抗一支無法戰勝的俄羅斯軍隊是毫無意義的，他們會征服整個巴爾干地區，把君士坦丁堡變成東正教斯拉夫王國的首都。”[[18]](#_18_FO_78_1008__Fonblanque__cons)

如果丟掉了塞爾維亞，那么整個巴爾干地區都有可能起來反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如果俄軍占領塞爾維亞，那么他們離色薩利（Thessaly）和伊庇魯斯（Epirus）就不遠了，在那里原來已有四萬名希臘人組織起來武裝反抗土耳其人的統治，并受到希臘政府的支持。當俄羅斯占領多瑙河流域兩公國時，希臘已抓住時機與土耳其開戰，意在奪取這兩個地區。雖然英國人警告希臘人不要介入這兩個地區的爭端，但希臘國王奧托并未理會，他認定俄羅斯將會獲勝，或者至少多瑙河流域的戰斗將會曠日持久，他可以借此機會擴大希臘版圖，鞏固自己的君主專制。1853年是君士坦丁堡落入土耳其人手中四百周年，希臘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昂，許多希臘人希望借助俄羅斯人的力量，在拜占庭的廢墟上重建一個新的希臘帝國。[[19]](#_19_L__Guerrin__Histoire_de_la_d)

\* \* \*

土耳其人擔心他們可能會在巴爾干地區全線潰敗，于是決定沿著多瑙河建立防線，同時在高加索地區向俄羅斯發起進攻，迫使俄羅斯從多瑙河戰線抽調部隊。在高加索地區，土耳其人可以依賴當地穆斯林部落的支持。1853年3月，高加索地區穆斯林反抗部落的首領沙米勒伊瑪目曾向奧斯曼帝國求助，請求土耳其人支持他反抗俄羅斯人的戰斗。“我們是您的子民，”他在給蘇丹的信中寫道，“我們已精疲力竭……與我們的信仰之敵交戰已久。我們失去了所有的力量，處于災難之中。”在與俄軍的交戰中，沙米勒的部隊已被逐漸擠出他們在車臣和達吉斯坦的游擊基地。1845年，“新俄羅斯”和克里米亞總督米哈伊爾·沃龍佐夫（Mikhail Vorontsov）被任命為高加索總督和軍事司令，在此之后，俄軍在這一地區的人數急劇增長。[††](#___Ke_Li_Mi_Ya_Zhan_Zheng_Zhong)沃龍佐夫的戰略不是直接攻擊反叛武裝的據點，而是將其包圍，通過燒毀農作物和村莊斷絕反叛武裝的糧食來源。他的部隊還通過砍伐森林等手段把反叛武裝從隱藏之處趕出來，同時向反叛地區修建道路，以方便俄軍。到1853年，已有跡象表明這一戰略確有成功的可能：成百個車臣村落投向俄方，希望能繼續耕作，免遭戰火蹂躪；反叛武裝內部則士氣低落。俄羅斯人認為他們已經成功地遏制了反叛勢力，于是把高加索地區的大部分部隊調往多瑙河流域戰線，切爾克斯海岸上一些規模較小的俄軍要塞也隨之關閉。[[20]](#_20_Shamil____stavlennik_sultans)

這正是土耳其人希望利用的機會。如果能在高加索地區打敗俄軍，就能鼓舞黑海地區的波斯人和穆斯林，甚至可能導致這一地區俄羅斯統治的倒臺。同時這么做一定能吸引英國人的支持，在過去幾年中，英國人一直在秘密地向切爾克斯和格魯吉亞的反叛武裝輸送槍支和金錢，并一直想和沙米勒伊瑪目建立聯系。[[21]](#_21_E__Adamov_and_L__Kutakov___I)

在1853年之前，土耳其人一直不敢公開支持沙米勒。根據1829年簽署的《哈德良堡條約》，高門同意放棄對高加索俄占地區的領土訴求，在那之后，面對埃及總督穆罕默德·阿里（他和沙米勒關系良好）的干預，俄羅斯成功地保住了高加索。但是當土耳其向俄羅斯宣戰之后，一切就不一樣了。10月9日，蘇丹終于答應了沙米勒的請求，命令他發動保衛伊斯蘭的“圣戰”，配合由阿卜迪帕夏（Abdi Pasha）指揮的安納托里亞軍團攻擊高加索地區的俄軍。為了等待這一時機的到來，沙米勒已經調動了一萬人的部隊向第比利斯進發，同時還在切爾克斯和阿布哈茲（Abkhazia）動員志愿者參加。10月17日，英國駐埃爾祖魯姆領事向外交部匯報說沙米勒已經動員了兩萬人的部隊供阿卜迪帕夏調遣。八天之后，土耳其人發動了高加索戰役。在第一場戰斗中，阿卜迪帕夏手下的巴什波祖克部隊從阿爾達漢（Ardahan）出發，占領了巴統（Batumi）北部的俄軍要塞圣尼古拉（St Nicholas），那里被格魯吉亞人稱為沙克維第利（Shekvetili），土耳其軍隊在這場戰斗中殺死了一千多名哥薩克士兵。根據要塞的俄軍指揮官緬什科夫親王的報告，土耳其士兵還對幾百名平民用刑、強奸婦女、帶走了大批格魯吉亞男孩女孩送到君士坦丁堡售為奴隸。[[22]](#_22_M__Gammer___Shamil_and_the_O)

為支援高加索地區的攻勢，土耳其人必須依靠他們的黑海艦隊輸送補給。土耳其海軍艦隊一直沒有從1827年納瓦里諾海戰的失敗中恢復元氣，據派駐高門的英國海軍顧問阿道弗斯·斯萊德的說法，在1851年，土耳其海軍共有一萬五千名水手和六十八艘能在海上航行的艦船，但是缺少高素質的軍官，絕大部分水手缺乏訓練。雖然不是俄羅斯海軍的對手，但到10月底，土耳其海軍的信心卻高昂起來，因為英法兩國的艦隊已經抵達君士坦丁堡郊外，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貝伊科茲（Beykoz）下錨：其中有五艘風帆戰列艦（各有兩至三層甲板，至少七十門炮），十一艘雙層甲板戰艦，四艘三帆快速戰艦以及十三艘蒸汽機船。所有戰艦加起來，火力足以和俄羅斯艦隊抗衡。俄羅斯的黑海艦隊分為兩支中隊：一支由弗拉基米爾·科爾尼洛夫中將指揮，負責黑海西部；另一支由帕維爾·納希莫夫（Pavel Nakhimov）中將指揮，負責黑海東部。緬什科夫命令兩支中隊擊沉任何向高加索地區輸送補給的艦船。土耳其政府部長和高級軍官們知道俄羅斯海軍在黑海巡邏，但還是決定派出一支小型艦隊進入黑海。俄羅斯海軍完全有理由相信這支艦隊是向高加索輸送武器和兵員的，而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是土耳其人認為如果他們的艦隊遭到俄羅斯海軍攻擊，英法艦隊不會坐視不管。也許這正是土耳其人的本意：挑動俄羅斯艦隊開火，迫使西方列強在黑海卷入與俄羅斯的海戰。很明顯土耳其人對這支小艦隊的死活并不關心，命令他們在安納托里亞海岸的錫諾普下錨，那里很容易成為納希莫夫中隊的目標。俄羅斯艦隊的規模和火力比這支小艦隊強得多，共有六艘現代戰列艦、兩艘三帆快速戰艦和三艘蒸汽機船。[[23]](#_23_B__Lewis___Slade_on_the_Turk)

11月30日，納希莫夫下達了進攻的命令。俄軍艦隊重炮發射的爆炸彈摧毀了整個土耳其艦隊。這是爆炸彈第一次在海戰中被使用。俄軍設計了一種先進的炮彈，在穿透土耳其艦船的木殼之后才爆炸，從內部將船只炸得四分五裂。英國海軍顧問斯萊德在唯一一艘僥幸逃生的土耳其明輪蒸汽機船“塔伊夫”號（Taif）上，他寫道：

在一小時或一個半小時后，炮擊基本停止了，海面上偶爾有一兩聲炮響。土耳其艦隊船員一半陣亡，大部分艦炮被掀翻，完全被數量和火力占優的俄軍艦隊打敗。一些船只還在燃燒……俄羅斯人歡呼雀躍，他們進入海灣的目的達到了，摧毀了土耳其艦隊。不管從哪方面考慮，他們都應該停火了。如果他們在這時候停火，沒人能指責他們什么，但是他們繼續向失去戰斗力、漂浮在海面的船只開火。俄軍的三帆快速戰艦駛入海灣，把仍在海面上的船只全部擊沉。許多人或是被炮火擊中身亡，或是在向海岸逃生時溺水而亡……除了土耳其艦隊外，俄羅斯人還向錫諾普灣的土耳其人聚居區開火。尸橫遍地，一片廢墟，當地居民在戰斗打響時，就跟隨當地官員一起逃走了。

根據斯萊德的說法，錫諾普灣的四千二百名土耳其水手中，有兩千七百人被俄軍炮火所殺。當地飯館餐廳成為臨時醫院，幾百名傷員卻只有三名醫生救治。六天之后俄軍才停止炮擊，傷員得以被送上船只運到君士坦丁堡。[[24]](#_24_FO_195_309__Slade_to_Stratfo)

幾天之后，斯萊德向高門匯報了這場海戰的細節，他奇怪地發現土耳其的大臣們對這一新聞無動于衷，這無疑印證了原先的懷疑：土耳其人本來就想通過挑動俄軍開火，將西方列強卷入戰爭。

他們居室內亮麗的靠墊，身上順滑的裘皮大衣，與錫諾普破爛餐廳內瑟瑟發抖的人群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聽到發生在錫諾普令人傷心的事件時，他們毫不關心；在看到“嚴懲號”（Retribution）海軍上尉奧賴利（O’Reilly）在海戰發生幾天后拍攝的錫諾普灣全景照片時，他們亦不為所動。換了一個對奧斯曼帝國種種怪相一無所知的人，也許會覺得這些人聽到的和看到的是發生在遙遠的中國海面上的一場災難而已。[[25]](#_25_A__Slade__Turkey_and_the_Cri)

事實上，土耳其在海戰中的失利為高門的外交努力注入了生機，顯示了雷希德的影響力和他阻止戰爭進一步升級的決心。他認為，土耳其必須通過西方列強最后再做一次和平努力，這樣的話，一旦開戰，西方列強才會站在土耳其這一邊。

12月5日，奧地利外交部長布奧爾伯爵向俄羅斯遞交了由高門提出、經四方列強（奧地利、普魯士、英國和法國）在維也納會議上同意的和平條件：如果沙皇同意立即撤出多瑙河流域兩公國，土耳其將在國際監督下，派出代表直接與俄羅斯進行和平談判。他們承諾繼續與俄羅斯的條約，并接受沙皇對圣地的要求。12月18日，奧斯曼帝國大議會同意基于這些條件議和。

消息傳開，憤怒的宗教學生涌上君士坦丁堡街頭舉行示威游行，反對大議會的決定。“過去的三天里，土耳其首都處于暴動狀態。”斯特拉特福德在12月23日寫道。宗教學生舉行非法集會，威脅雷希德和其他大臣。有謠傳說在君士坦丁堡的歐洲區發生了針對基督徒的屠殺事件。斯特拉特福德把西方外交官和他們的家人請到了英國大使館暫避。他給雷希德寫信，呼吁他對宗教學生采取強硬立場。但是雷希德從來不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已經辭了職躲到他兒子在貝西克塔什（Besiktas）的宅子里。斯特拉特福德沒能找到他。因為擔心出現宗教革命，斯特拉特福德將停留在貝伊科茲的英國艦隊中的幾艘蒸汽艦船調到了君士坦丁堡市中心水面，并拜訪蘇丹，要求他果斷采取行動，防止暴亂發生。第二天，土耳其警察逮捕了一百六十名宗教學生，并把他們帶到大議會前要他們為暴亂承擔責任。學生領袖回答說，大議會的求和行為“違反了《古蘭經》所說的打敗敵人再談和平的指示”。大議會向學生們解釋說，高門并未向俄羅斯求和，而是提出了談判的條件。當被問到既然他們求戰如此心切，是否愿意上前線時，這些學生回答說他們的責任是布道而不是戰斗。在這之后，這些學生都被發配到了克里特島。[[26]](#_26_BOA__HR__SYS__1346_38__S__La)

12月11日，錫諾普海戰的消息傳到了倫敦。照理說，既然俄羅斯與土耳其處于交戰狀態，那么俄羅斯艦隊攻擊土耳其軍艦的行為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英國媒體立即將其形容為“駭人聽聞的暴力行為”和“一場屠殺”，并對平民傷亡大肆夸張，稱有四千平民在俄羅斯的炮火中喪生。《泰晤士報》寫道：“錫諾普一戰，打消了我們平息戰火的念頭……我們一直認為有責任維護和平，只要因此求得的和平與我們國家的榮譽與尊嚴保持一致……但是俄國皇帝向海軍列強們下了戰書……現在戰爭已經開始了。”《紀事報》（Chronicle）宣稱：“我們迫不得已，將拔劍出鞘，這不僅僅是為了保衛盟友的獨立，還是為了打擊一個暴君的意圖與伎倆，他的野心已讓其成為所有文明國家的公敵。”地方報紙也跟倫敦的主戰恐俄立場保持一致。“僅僅和沙皇對話毫無用處，”《謝菲爾德和羅瑟勒姆獨立報》（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指出，“看來我們采取行動的時機已經來臨，我們必須打消俄羅斯的邪惡意圖和用心。”在倫敦、曼徹斯特、羅奇代爾（Rochdale）、謝菲爾德、紐卡斯爾（Newcastle）和其他許多市鎮，都出現了支持土耳其的公眾集會。在蘇格蘭佩斯利（Paisley）的公眾集會上，反俄鼓動家戴維·厄克特向集會群眾做了長達兩個小時的講話，最后他呼吁“英格蘭人民……向他們的君主提出請求，要么向俄羅斯宣戰，要么將英國艦隊撤出土耳其水域”。英國報紙還刊登了各種請愿信，要求英國女王對俄羅斯采取更積極強硬的立場。[[27]](#_27_Morning_Post__16_Dec__1853)

此時的英國政府是一個在阿伯丁勛爵領導下的脆弱的聯盟，由自由黨和支持自由貿易的保守黨成員組成。他們的立場因為英國公眾對錫諾普事件的反應而發生了急劇的變化。一開始英國政府的反應是冷靜的，大部分內閣成員與首相的意見一致，認為需要給由奧地利主導的和平進程更多時間。他們同意英法兩國的艦隊必須留在黑海，并做出姿態顯示兩國政府對戰事的關切，但目的不是為了真的與俄羅斯開戰，而是迫使俄羅斯接受和平談判。大部分人覺得英國不應該被土耳其拖入一場戰爭中去，土耳其人基本上屬于咎由自取。維多利亞女王自己都曾發出警告：

我們和法國一道承擔了打一場歐洲大戰的風險，卻沒有限制土耳其的行動，不讓其挑動戰事。現在事件的決策權完全被君士坦丁堡樞密院的一百二十名土耳其狂熱分子掌握，與此同時，我們卻承諾英法會保衛他們的領土主權！這樣重大的權力，議會從來都是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的，連英國皇室都不得干涉，現在卻這樣交給了土耳其人。[[28]](#_28_The_Letters_of_Queen_Victori)

此時女王同意阿伯丁勛爵的看法，認為俄羅斯入侵多瑙河兩公國的行為不足以成為與其開戰的理由。和他一樣，女王依然傾向于信任沙皇的動機，十年前她見到沙皇時，對他有喜愛之心，認為他的挑釁行為是可以被約束的。她的個人立場是反土耳其的，這也影響了她對俄羅斯入侵的看法。在錫諾普海戰之前，她曾在日記中寫道：“如果土耳其人被狠狠擊敗的話，將會有利于和平，總的來說有好處。”但在這之后她的看法發生了改變，轉而希望這一事件后，俄羅斯和土耳其人都更愿意在歐洲的支持下接受和平。“俄羅斯在陸地上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后，也許，我也希望，能讓各方冷靜下來，沙皇能表現出寬宏大量，土耳其人能更為理性。”她在12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29]](#_29_RA_VIC_MAIN_QVJ_1853__13_Nov)

但是對土耳其人的戰爭情緒保持冷靜是一回事，對抗英國媒體上的種種求戰呼聲則是另外一回事。12月14日，帕默斯頓辭去了內政大臣的職務，表面上是對議會改革有不同意見。離開內閣后，他馬上加入了要求英國采取軍事行動的行列，他的目的是立足于政府之外，憑借公眾輿論，向傾向和平的阿伯丁發出挑戰。他堅持認為既然西方國家把艦隊派到了博斯普魯斯海峽作為對俄羅斯的警告，那么俄羅斯艦隊在錫諾普的舉動實際上是對西方列強的間接進攻。“蘇丹的艦隊是在土耳其港口被消滅的，如果英法艦隊在那里的話，將能保護土耳其艦隊。”他向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西摩勛爵解釋道。俄羅斯艦隊襲擊錫諾普為英國提供了一個道義上的理由，現在可以出手摧毀近東的俄羅斯威脅了，這也是帕默斯頓一直在尋找的機會。這是一場“正義和必要的戰爭”，繼續維也納和談只會增加西方列強發動這場戰爭的困難度。在英國內閣中，下議院議長羅素勛爵是帕默斯頓的支持者。非常關鍵的是，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勛爵也站到了帕默斯頓這一邊，他是在感覺到英國公眾對錫諾普事件的激烈反應之后改變立場的。女王在12月15日的日記中寫道，克拉倫登“比以前更加主戰了，因為擔心報紙輿論”。“你覺得我太在意公眾的觀點了，”克拉倫登在12月18日給阿伯丁的信中寫道，“但是在得知錫諾普發生的可怕慘劇之后，光是從人道角度出發，我們就必須采取行動阻止類似事件的發生，如果無所作為，實在太臉上無光了。”[[30]](#_30_FO_65_423__Palmerston_to_S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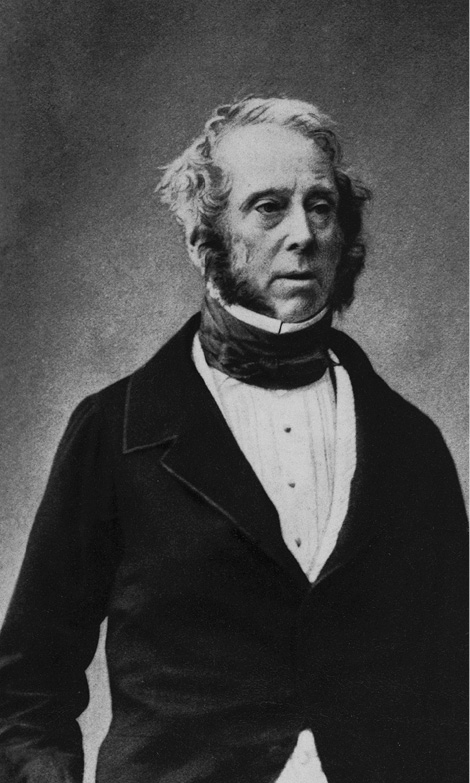
自從帕默斯頓離開了內閣，克拉倫登就成了內閣主戰派的領袖。他試圖說服阿伯丁，錫諾普事件證明俄羅斯“沒有和平的意圖，盡管土耳其人的和平條件是合理的”，所以現在已無必要繼續與俄羅斯對話。他敦促首相以錫諾普事件為“道義理由”拒絕奧地利的和平努力，對俄羅斯采取強硬態度。為了破壞和平談判，他讓斯特拉特福德向土耳其人發出指令采取強硬立場，同時還警告布奧爾伯爵說奧地利對俄羅斯太軟了。他對英國駐巴黎大使考利勛爵（Lord Cowley）說，對話已經太遲，現在是西方列強“終結俄羅斯近東海軍強國地位的時候了”。[[31]](#_31_FO_65_423__Palmerston_to_Sey)

法國方面的支持對帕默斯頓和英國內閣主戰派非常關鍵。拿破侖三世決心以錫諾普事件作為對俄羅斯采取強硬行動的理由，部分原因是考慮可以借此鞏固與英國的聯盟，另一部分原因是相信如果不對俄國人的行為做出懲罰的話，那將是法國艦隊的恥辱，作為法國皇帝，他對此不能容忍。12月19日，他提議英法兩國艦隊進入黑海，迫使俄羅斯軍艦撤回塞瓦斯托波爾港。他甚至威脅說如果英國人拒絕行動的話，法國艦隊將單獨行動。雖然心里不情愿，但是這一威脅足以讓阿伯丁妥協：即使俄羅斯得勢的可能還不足夠讓他采取行動，那么對法國重新崛起的擔憂就讓他不能坐視不管了。12月22日，兩國同意組成聯合艦隊共同保護黑海水域的土耳其艦船。1853年圣誕節前夜，帕默斯頓重回英國內閣，成為內閣主戰派的領袖。[[32]](#_32_A__Saab__The_Origins_of_the)

\* \* \*

然而，僅僅研究政治領袖和外交官的動機是無法真正理解克里米亞戰爭的起因的。這是歷史上第一場迫于媒體輿論和公眾觀點的壓力而引發的戰爭。隨著鐵路的興起，英國在1840年代和1850年代出現了全國性報紙，公眾輿論成為英國政治中一股強大的力量，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超過了議會和內閣的影響力。《泰晤士報》長期以來一直與保守黨關系密切，但是它越來越將自己的地位視為不亞于任何一家國家機構，用該報外交事務主編亨利·里夫（Henry Reeve）的話說就是“第四種力量”（Fourth Estate）。他在1855年是這么描述其職業的：“新聞報道不是統治階層內部不同派別的傳聲筒，而是整個國家智慧的匯總，一個對統治階層進行批判和控制的工具。它確實是‘第四種力量’，而不是第三種力量在文字和聲音上的體現。”[‡‡](#_____Dang_Shi_Ying_Guo_Yi_Ban_Ba)政府別無他法，只能接受這一新的現實。“英國的政府大臣不得不討好報紙，”阿伯丁哀嘆道。他是一名傳統的保守黨人，向來只在白金漢宮和他所在的蓓爾美爾街（Pall Mall）上的俱樂部之間行走。“報紙總是大喊大叫，橫加干涉。他們善于欺凌他人，把政府也變成了惡霸。”[[33]](#_33_Yin_Yong_Can_Jian__S__Brady)

在這一點上，帕默斯頓是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政治家。他明白為了贏得大眾的支持，必須培養與報刊的關系并且用簡單明了的語言向公眾傳達理念。宣揚與俄羅斯交戰是他贏得輿論支持的手段。他的外交政策能夠贏得英國人心，因為其所代表的正是英國人自我想象中的英國國家特征和理想：信仰新教、熱愛自由、充滿活力、勇于冒險、自信大膽，他們不惜為保護弱小者而戰，為自己是英國人而感到自豪，蔑視外國人，特別是天主教和東正教教徒。帕默斯頓將天主教和東正教教徒與歐洲大陸最糟糕的奢靡丑惡聯系在一起。英國公眾對他以自由主義理念進行對外干預的言辭非常喜愛，因為約翰牛（John Bull）[§§](#SSSS_Yue_Han_Niu_Shi_18Shi_Ji_Ka)就是這么看英國的：英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政府的任務是將英國的生活方式帶給那些不幸的外國人。



帕默斯頓，邁耶和皮爾遜攝（圖片來源：赫爾頓檔案館及格蒂圖片）

帕默斯頓越來越受歡迎，在英國公眾心目中，他的外交政策與捍衛“英國價值”連成了一體，以至于不管誰想阻止英國參戰，都會被舉著愛國大旗的報刊丑化攻擊。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和約翰·布賴特（John Bright）就遭到了這樣的攻擊。他們兩人都是和平主義者、激進的自由貿易主義者，拒絕將俄羅斯視為威脅了英國利益，認為與俄羅斯進行貿易是維護英國利益更好的辦法。因為堅持這樣的觀點，他們被英國報刊批判為“親俄”，在這當口等同于“反英”。甚至女王的丈夫阿爾伯特親王都被當作“德國人”或“俄國人”遭到指責，許多人似乎搞不清楚這兩者之間的差別。他被一些報刊指責“叛國”，其中最起勁的是“紅頭小報”[¶¶](#PP_Ying_Guo_De_Xiao_Bao_Da_Bu_Fe)《廣告晨報》，原因是有謠言說12月帕默斯頓辭去內政大臣一職是一場宮廷陰謀。當帕默斯頓重返內閣時，許多庸俗報紙紛紛報道說阿爾伯特親王叛國罪已定，將被押送到倫敦塔關押云云，于是就有好事者聚集在倫敦塔外看熱鬧。《廣告晨報》甚至呼吁處死阿爾伯特親王：“與其在投入戰斗時猶豫不決，不如讓罪人的鮮血灑在倫敦塔的絞架上！”維多利亞女王對此極為憤怒，以退位相威脅。阿伯丁和羅素代表女王與主要報紙的主編們交涉，得到的結果卻是這場攻勢不會馬上消退，因為這些文章是報紙主編們同意刊登的，有些甚至是主編們自己寫的，就是為了可以多賣幾份報紙。[[34]](#_34_M__Taylor__The_Decline_of_Br)

在英國公眾心目中，與俄羅斯一戰涉及“英國原則”：捍衛個人自由、文明與自由貿易。保衛土耳其代表了英國的美德：為弱小無助者伸張正義，反抗暴君和惡霸。因為仇視俄羅斯，土耳其便成了道德楷模，這種對土耳其的浪漫想象源自1849年土耳其為匈牙利和波蘭反抗沙皇統治的自由戰士提供庇護的舉動。1854年初，當親土耳其的戴維·厄克特成立“保衛土耳其及其他國家反分裂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Turkey and Other Countries from Partition）時，很快就有幾千名激進分子加入。

對英國圣公會教徒來說，一個重大障礙是支持土耳其就意味著與穆斯林一起共同對抗俄羅斯基督徒，這對身為圣公會保守黨人的阿伯丁和格拉德斯通來說是一個困境，對維多利亞女王來說更是一個問題，因為基于宗教信仰，她是仇視土耳其人的，在私底下，她希望建立一個“希臘帝國”取代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部分，她還希望有一天土耳其人“全都變成基督徒”。[[35]](#_35_RA_VIC_MAIN_QVJ_1853__8_Dec)可是福音派教徒中的激進派對于支持土耳其反對東正教卻沒有什么問題，他們認為坦齊馬特的改革代表了土耳其自由主義和宗教寬容。有些教會領袖甚至宣稱土耳其人為新教在近東地區的傳播做出了貢獻，這么說主要是因為新教傳教士在奧斯曼帝國進行的傳教活動。因為高門禁止任何人向穆斯林傳教，這些傳教士的傳教對象是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的東正教和天主教徒，每個轉投新教的人都會對原來教會里的教士如何邪惡進行一番討伐。沙夫茨伯里勛爵（Lord Shaftesbury）在上議院一場有關奧斯曼帝國在色薩利和伊庇魯斯兩地鎮壓希臘人起義的辯論中講述了這個問題，他提出巴爾干地區的基督徒既受土耳其當局的壓迫，更是俄羅斯人支持的希臘東正教會的受害者。他的結論是，從轉投新教的基督徒的角度說，被土耳其人統治好過生活在沙皇的陰影下。在俄羅斯，沙皇甚至不允許傳播俄文版的《圣經》。[\*\*\*](#____Zai_1870Nian_Dai_Qian__Yi_Zh)一旦俄羅斯人征服了巴爾干，這里也將進入黑暗世紀，新教徒將無處容身。他還說，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高門對圣公會傳教士的工作并無敵意，還曾做出干預以保護轉投新教的基督徒免受其他東正教或天主教教徒的迫害，甚至在1850年授予了新教米利特的資格。他沒有提到的是，根據奧斯曼帝國法律，那些改投新教的穆斯林將會被處以死刑。和許多圣公會教徒一樣，沙夫茨伯里對伊斯蘭抱有同情，認為穆斯林靜默的宗教儀式與圣公會教徒自己的內省祈禱行為比較相近，而不像東正教儀式那樣吵吵鬧鬧，甚至帶有未被基督教轉化的異教色彩。這樣的想法在福音派中十分流行，例如12月一次討論俄土沖突的公眾集會上，一位演講者堅稱“土耳其人不是異教徒，他們是一神論者”。《紐卡斯爾衛報》（Newcastle Guardian）報道了他的發言：“至于說在希臘的俄羅斯人和希臘的東正教徒，他本人并不反對他們的教義，但他們確實是一群瘋瘋癲癲、手舞足蹈的人。這是他親眼看到的。”[[36]](#_36_Saab__Origins_of_the_Crimean)

在公眾集會上，只要提到蘇丹的名字，就足以引起觀眾的一片掌聲。例如在切斯特（Chester）某個劇院舉辦的一場集會中，兩千多人以歡呼喝彩的形式通過了一項議案，呼吁政府“以最強的武力行為”協助蘇丹，這么做的原因是：

在英國，對蘇丹的支持超過了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君主比蘇丹為宗教寬容做出更多努力，他在自己的領地上確立了宗教平等。把他與阿爾弗雷德（Alfred）和愛德華這些英國歷史上偉大的君主相提并論，對英國人來說并無任何有失體面之處。如果在這場危機中蘇丹可以得到西歐真正的支持，那他將會領導他的國家走向幸福昌盛，并與大不列顛建立互惠的貿易往來。

當《泰晤士報》提出巴爾干地區的基督徒更愿意接受沙皇的保護，而不愿意被蘇丹統治時，《先驅晨報》（Morning Herald）和《廣告晨報》立即以激烈的民族主義語調對其發起攻擊，指責《泰晤士報》“非英”：“這些觀點是用英語寫下來的，但是除此之外，沒有一點是英國的，而是徹頭徹尾的俄羅斯思維。”[[37]](#_37_O__Anderson___The_Reactions)

在法國，報刊也積極影響著拿破侖三世的外交政策。最大的壓力來自地方性的天主教報紙。自從圣地爭執開始以來，這些報紙就一直在呼吁與俄羅斯一戰，在錫諾普事件之后，這些呼聲就更強烈了。1854年元旦，《弗朗什孔特聯合報》（Union franc-comtoise）發表社論，稱“如果法國與英國不能阻止俄羅斯對土耳其的威脅，這兩個國家今后也會像土耳其那樣受俄羅斯奴役”。

反俄宣傳的主旨是“反抗野蠻主義的文明圣戰”，1854年出版的一本恐俄暢銷書、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é）的《對神圣俄羅斯的諷刺漫畫》（Histoire pittoresque, dramatique et caricaturale de la Sainte Russie）也以此為主旨。這本諷刺漫畫表達的觀點是俄羅斯的侵略性源自其野蠻主義，這在英法兩地的戰前游說中十分常見。在英國，這一觀點被用來反駁科布登和布賴特關于俄羅斯太落后、沒有能力入侵英國的看法。有人發起了一場宣傳運動，試圖證明正因為俄羅斯太落后，它必須通過地域擴張來取得更多資源。在法國，這一說法帶有更強的文化意味，讓人把俄羅斯人與匈奴（Huns）相比。“尼古拉皇帝和匈奴王阿提拉（Attila）[†††](#____Gu_Dai_Ou_Ya_Da_Lu_Xiong_Nu)很相似。”法國報紙《公平報》（Impartial）在1854年1月下旬的一篇社論中寫道。

對此視若無睹將是對所有秩序與公正的顛覆。政治與宗教的謊言正是俄羅斯所代表的。它本身是野蠻的，卻想模仿我們的文明，這讓我們生疑，其暴政讓我們感到恐怖……它的暴力統治也許適用于一個野蠻性與生俱來、與瘋狂野獸相差無幾的民族，但是肯定不適用于文明人……尼古拉的政策在歐洲所有文明國家中都引發了怒潮，因為他的政策是燒殺搶掠。他們不過是一群規模比較大的土匪。[[38]](#_38_R__Marlin__L_Opinion_franc_c)

對持教皇至上主義（Ultramontane）的報刊來說，俄羅斯的宗教是對西方文明最大的威脅。他們聲稱，如果不能阻止沙皇軍隊西進的話，基督教將被東正教霸占，天主教徒將面臨新一輪的宗教迫害。“如果我們讓俄羅斯人并吞土耳其，”《弗朗什孔特聯合報》主編寫道，“我們很快就會看到哥薩克軍隊強迫我們所有人接受希臘邪教。歐洲不但會失去自由，連宗教也會喪失……我們將被迫看著我們的孩子接受希臘教派的教育，那些敢于出聲抵抗的天主教徒將被發配到西伯利亞冰天雪地的戈壁，在那里默默死去。”《第戎旁觀者報》（Spectateur de Dijon）則響應巴黎大主教的呼吁，要求法國的天主教徒們起來參加一場反抗俄羅斯和希臘人的“圣戰”，捍衛他們的宗教遺產：

對所有天主教徒來說，俄羅斯代表了一種特殊的威脅，我們決不能誤讀這一點。尼古拉皇帝聲稱希臘教士在圣墓教堂擁有特權，這些特權是靠俄羅斯人的鮮血換來的。法國人在維護圣地的征戰中灑下的鮮血，俄羅斯人再過幾百年都趕不上一丁點兒……那里有我們的遺產需要保護，有我們的利益需要捍衛。但不僅如此。希臘—俄羅斯教堂要對我們進行改教的企圖，是對我們的直接威脅。我們知道，在圣彼得堡，他們一直做夢都希望將宗教專制強加給西方。他們希望通過無休止的軍事擴張，迫使我們改信他們的異教。如果俄羅斯占據了博斯普魯斯，那么他們要征服馬賽或是羅馬就易如反掌，憑借一次快速襲擊就足以在其他力量介入之前廢黜教皇和所有大主教。

對地方性天主教報刊來說，這場圣戰還是一個在法國重新加強宗教戒律的機會，借以對抗法國大革命帶來的世俗化影響，并將教會的地位重新恢復到國民生活的中心。他們期望因1848年革命而分裂成不同派別的法國人會因為攜手保衛共同的信仰而重新團結起來。[[39]](#_39_Marlin__L_Opinion_franc_comt)

這一想法正中拿破侖三世下懷。無疑，他想象一場光榮的戰爭會讓法國最終接受發動政變送他上臺的軍隊。然而，法國公眾其實從未和他一樣熱衷于和俄羅斯開戰，他們對圣地的糾紛并不關心，即使是在錫諾普事件的消息傳來之后也是如此。拿破侖三世一直在說走上“光榮之路”抗擊俄羅斯侵略，法國報刊一直聲稱他們表達的是“法國公眾的憤怒”，但是根據地方官和檢察官們的報告，普通法國人并不為之所動。盡管在之后很快到來的克里米亞戰爭中，投入戰斗和死于戰火的法國人比英國人多得多，但他們其實從未像英國人那樣急切地想投入這場戰爭。甚至可以說法國人對與傳統對手英國人聯合參戰的想法抱有反感，許多法國人認為法國被拖入了一場保衛英國利益的戰爭中，并將為此付出代價，這正是拿破侖三世的反對派經常提出的觀點。法國商界對參戰尤為反對，擔心因此導致高稅收，損害經濟。有人預測一旦開戰，不到一年這場戰爭就會變得極為不受歡迎，法國將不得不因此尋求和平。

1854年1月底，反戰情緒蔓延到了法國皇帝的幕僚中。1月4日，拿破侖三世召集了一批高級官員開會，討論應該如何回應俄羅斯對英法聯合艦隊進入黑海提出的抗議。在這次會議上，拿破侖三世兩名關系最密切的盟友——財政大臣讓·比諾（Jean Bineau）和議員阿希爾·富爾德（Achille Fould）建議與俄羅斯和解以避免陷入戰爭。他們擔心法國缺乏軍事準備：在1851年12月政變上臺之后，拿破侖三世為讓英國人放心，通過裁軍表明法國不會入侵英國，所以在1854年初，法國軍隊尚未動員起來，也缺乏戰爭準備。比諾甚至威脅如果戰爭爆發，他將辭去財政部長職務，原因是為支持戰爭而提高稅收，是不可能不引起社會動蕩的（不過后來他并未兌現他的威脅）。這些反對的聲音給拿破侖三世潑了足夠多的冷水，他決定再考慮一下參戰決定，并且重新開始尋求外交途徑解決危機。1月29日，他直接寫信給沙皇，提出愿意以奧地利為中介，談判一個和平解決方案，并建議作為談判的基礎，英法艦隊撤出黑海，同時俄羅斯軍隊撤出多瑙河流域兩公國。拿破侖三世的這封信馬上被公開了，目的是向焦慮的法國公眾表示他正在盡一切努力保證和平，正如他親口向奧地利駐巴黎大使許布納男爵（Baron Hübner）表示的。[[40]](#_40_L__Case__French_Opinion_on_W)

帕默斯頓和其主戰派同僚密切關注著法國局勢，他們擔心拿破侖三世會在最后關頭退出與俄羅斯的軍事沖突，于是采用各種手段加強他的決心，同時破壞他達成外交妥協的努力。1854年初，最盼望戰事爆發、推動戰爭最積極的是英國人，而不是法國人。

\* \* \*

英國主戰派不需要花什么力氣破壞外交妥協，因為沙皇的立場非常強硬。2月16日，俄羅斯正式與英法兩國斷絕外交關系，從倫敦和巴黎撤回大使。五天之后，沙皇拒絕了拿破侖三世提出的雙方同時在黑海和多瑙河流域兩公國撤軍的提議，拋出了一項反建議：西方國家在黑海的艦隊必須阻止土耳其艦船向俄羅斯黑海沿岸運送武器，這顯然是在暗示為什么會發生錫諾普事件。如果這一條件得到滿足，而且只有這一條件得到了滿足，沙皇才會在圣彼得堡與高門特使展開談判。他可能意識到這一立場有可能引起戰爭，于是向拿破侖三世發出警告說，1854年的俄羅斯和1812年一樣，已經準備好擊敗入侵的法國軍隊。

沙皇如此直截了當地拒絕法國的提議，是相當令人震驚的，因為這是他避免與英國和土耳其正式開戰的最好辦法，拿破侖三世的提議是避免俄羅斯在歐洲完全被孤立的最后機會。沙皇在1月底試圖與奧地利和普魯士結成聯盟，他派出親信奧爾洛夫伯爵到維也納，提議如果奧地利、普魯士以及德意志各成員國宣布中立的話，俄羅斯會幫助奧地利抵御西方列強。他顯然希望以此打動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因為他知道奧地利皇帝一直擔心拿破侖三世會在哈布斯堡家族治下的意大利挑起麻煩。但是奧地利也對俄羅斯在巴爾干的軍事行動感到擔心，雖然沙皇一直建議俄羅斯與奧地利共同瓜分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領土，但奧地利人并不相信他的承諾，并且清楚地表示不會與俄羅斯合作，除非土耳其邊境保持不變。他們對塞爾維亞人起義支持俄羅斯軍事行動非常擔心，額外調動了兩萬五千人的部隊集結在塞爾維亞邊境上。[[41]](#_41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vol)

沙皇在2月9日就已經知道奧爾洛夫的使命失敗了，而且還知道奧地利正在準備派出軍隊到塞爾維亞防止俄軍入侵。此時他斷然拒絕拿破侖三世提出的最后和平機會，實在是異乎尋常，因為他一定會擔心如果連奧地利都成為對手，俄羅斯與西方列強的交戰一定會以失敗告終。有些歷史學家傾向于認為這時的尼古拉終于失去了對輕重的權衡能力，他身上遺傳的精神疾病，包括浮躁魯莽的行為和陰郁易怒的傾向，與登基近三十年被阿諛奉承者圍繞造成的傲慢交織在一起。[[42]](#_42_Can_Jian_Zhu_Ru__V__Vinograd)應該說這樣的解釋有一定的說服力，在1853—1854年危機時期，他有時候表現得的確像是一個莽撞的賭徒下注過火：在多年耐心經營俄羅斯在近東的地位之后，他愿意在與土耳其開戰上冒極大風險，把幾十年積累的所有利益一股腦兒都押到賭桌上。

但是，從尼古拉的角度看，他真的是在進行一場賭博嗎？從他的私人記錄中，我們知道他確實很自信地將局勢與1812年相比。他經常提及他哥哥帶領俄羅斯抵抗拿破侖的那場戰爭，并以此作為這次俄羅斯也能獨自與世界作戰的理由。“如果歐洲迫使我們與之開戰，”他在1854年2月寫道，“我會像哥哥亞歷山大在1812年所做的那樣，只要外國軍隊還在俄羅斯領土上，哪怕敵人把我們逼到烏拉爾山脈（Urals）以東，我們也絕不會放下武器。”[[43]](#_43_GARF__f__678__op__1__d__451)

這不是什么理性的想法，并不是基于對手可調動軍隊的數量，或是面對比自己強大的歐洲軍隊時俄羅斯軍隊可能遭遇的困難所做出的分析。緬什科夫和其他高級軍官曾一再指出可能面臨的困難，并多次提醒沙皇不要入侵多瑙河流域兩公國，以免挑起與土耳其和西方列強的戰爭。尼古拉的想法完全是一種情緒，源于他的自負與傲慢，源于他對俄羅斯力量與地位認識的膨脹，最重要的也許是源于他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自己是在為實現俄羅斯的天賦使命而發動一場宗教戰爭。尼古拉真心相信他是在上帝召喚下，為將東正教徒從穆斯林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而發動一場圣戰，什么也無法阻擋他的“神圣使命”。1854年3月，他向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解釋道，如果西方列強與土耳其人站在一起，他愿意率領俄羅斯獨自與他們一戰：

我打這一仗不是為了奪取利益，也不是為了征服領土，捍衛基督教是我唯一的目的。難道真的只有我會在圣十字架的大旗下走向戰場，而其他自稱是基督徒的人卻聚集在新月旗下攻擊基督教？……我已別無選擇，只有戰斗，去奪取勝利，不然就光榮犧牲，加入為我們神圣信仰而死的烈士行列。這是我以俄羅斯之名發出的肺腑之言。[[44]](#_44_T__Schiemann__Geschichte_Rus)

這些話不是出自一個魯莽的賭徒，而是出自一個經過深思的信徒。

在遭到沙皇拒絕后，拿破侖三世別無選擇，只能在英國要求俄羅斯從兩公國撤軍的最后通牒上加上了自己的簽名。對他來說，這事關法國的榮譽和地位。這份最后通牒于2月27日送給沙皇，聲稱如果俄羅斯不在六天之內回復，西方列強與俄羅斯將自動進入戰爭狀態。最后通牒上沒有提到和平談判，不給沙皇任何機會提出和平條件，所以這份通牒的目的就是為了開戰。毫無疑問沙皇將拒絕這最后通牒，他認為連回復都是自降身份。所以最后通牒剛剛送出，西方列強就開始行動，仿佛雙方已經宣戰。2月底，軍隊已經開始動員起來了。

法軍總軍需官安托萬·塞特（Antoine Cetty）在2月24日給德·卡斯特拉內元帥（Marshal de Castellane）的信中寫道：

沙皇［對拿破侖三世的信］反應消極，現在能做的，就只有準備打仗了。皇帝的想法是盡其所能避免派遠征軍去近東作戰，但是英國急于打仗，把我們也拖下水了。當英國的旗幟插在君士坦丁堡城頭時，法國的旗幟也必須一起飄揚。如果任由英國單獨行事，它很快就會獨霸所得，不會放手。

這番話很好地總結了當時的局面。在必須做出決策時，拿破侖三世對是否參戰曾經猶豫不決，但最終他必須與英國結盟，而且擔心法國一旦退縮，到了摘取勝利果實時就沒有自己的份了。他在3月2日對法國上下議院發表演說時就已經表達了這個意思：

在阻止俄羅斯永久性擴張至君士坦丁堡這件事上，法國的利益甚至超過英國，因為占領君士坦丁堡就意味著統治地中海。先生們，我想你們中沒有誰會說只有英國在地中海的利益至關重要吧？法國的地中海海岸線就有三百里格（leagues）[‡‡‡](#_______Fa_Guo_Dang_Shi_Shi_Yong)……我們為什么要派兵前往君士坦丁堡？我們去那里，是為了和英國一起保衛蘇丹的事業，也是保護基督徒的權利。我們去那里，是為了捍衛海洋的自由，捍衛我們在地中海上應有的影響力。[[45]](#_45_E__Boniface__Count_de_Castel)

事實上，西方盟軍到底為何而戰，遠不是那么簡單明了。和歷史上許多戰爭一樣，當聯軍被派往近東地區時，沒有人真的知道到底為何而戰。西方列強將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時間，通過與奧地利曠日持久的談判才得出開戰的理由。即使在1854年9月，聯軍已經在克里米亞登陸后，也還需要很長時間，盟軍才就這場戰爭的目的達成一致。

在開戰之初，英法兩國的想法就不一樣。兩國于3月在巴黎召開了一系列會議討論戰爭目標和戰略。法國提出，除了在多瑙河流域兩公國開戰外，還要把戰爭延伸到克里米亞。如果奧地利和普魯士能被說服加入盟軍的話，法國傾向于在兩公國和俄羅斯南部地區舉行大規模會戰，同時由奧普聯軍在波蘭發起戰斗配合。但是英國人不相信奧地利人，認為他們對俄羅斯太軟弱，不想與之結盟，免得奧地利妨礙英國打擊俄羅斯膨脹的野心。

英國內閣內部在戰爭目標和戰略上也有分歧。阿伯丁堅持發動一場有限戰爭，以恢復土耳其主權為目標；但是帕默斯頓和主戰派則建議在作戰上更為大膽，趁機削弱俄羅斯在近東的影響力，徹底打敗它。最后雙方達成妥協，同意海軍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擬定的海戰計劃。自1853年12月的錫諾普事件后，格雷厄姆就一直在修訂這個計劃。他的想法是對塞瓦斯托波爾發動快速襲擊，消滅俄羅斯黑海艦隊并占領克里米亞，成功之后在1854年春天從波羅的海發起進攻，兵臨圣彼得堡城下。這一想法其實是照搬與法國開戰時的戰略計劃，不過是把法國軍港瑟堡（Cherbourg）換成了塞瓦斯托波爾。[[46]](#_46_Lambert__The_Crimean_War__pp)

1854年初，英國進入備戰狀態，整個國家都陷入了戰爭狂熱，把戰爭控制在有限規模的想法早被拋諸腦后。英國的戰爭目標不斷升級，這不僅僅是出于媒體好戰的沙文主義，更是由于許多人相信戰爭潛在的成本巨大，因此必須有宏大的目標才“配得上英國的榮耀與偉大”。帕默斯頓的言論總是圍繞著這一點，他的戰爭目標在細節上雖有所變化，但一貫以反俄羅斯為中心。在3月19日發給內閣成員的備忘錄中，他勾勒了瓦解俄羅斯帝國、重繪歐洲版圖的野心：芬蘭和奧蘭群島（Aaland Islands）[§§§](#SSSSSS_Jin_Shu_Fen_Lan_______Yi)從俄羅斯歸入瑞典；沙皇手下的波羅的海省份劃給普魯士；擴大波蘭版圖成為一個獨立王國，作為歐洲與俄羅斯之間的緩沖地帶；奧地利將得到多瑙河流域公國以及俄羅斯的比薩拉比亞（奧地利同時將被迫退出意大利北部地區）；克里米亞和格魯吉亞送給土耳其；切爾克斯將成為土耳其保護下的獨立國家。該計劃呼吁進行一場針對俄羅斯的歐洲大戰，在反俄羅斯這一邊，不僅有奧地利和普魯士，最好還有瑞典參與。英國內閣對此番雄心勃勃的規劃表示極大保留。阿伯丁的愿望是進行一場短促的戰爭，以便盡快“全力回到國內改革”中去，他反對的理由是這一規劃需要再來一場三十年戰爭（Thirty Years War）[¶¶¶](#PPP_San_Shi_Nian_Zhan_Zheng_Fa_S)才可能實現。但是帕默斯頓不顧反對，繼續推進自己的方案。事實上，在克里米亞戰爭開始之后，戰事拖得越長，他就越來越堅定地推行自己的主張，理由是只有實現了“領土上的大變動”，才能為這場戰爭帶來的巨大傷亡做出交代。[[47]](#_47_Schroeder__Austria__Great_Br)

到3月底，將這場戰爭從保衛土耳其變為針對俄羅斯的歐洲大戰這一想法在英國政治體系內已獲得極大支持。阿爾伯特親王對是否能夠拯救土耳其抱有疑慮，但是他相信可以通過一場戰爭奪走俄羅斯西部領土來抑制其對歐洲的影響力。他認為可以通過向普魯士承諾“領土以防衛俄羅斯突襲”來吸引其參戰，他還主張采取措施吸引其他德意志國家加入，一起馴服俄國熊，“拔其尖齒，砍其利爪”。他在給比利時國王的信中寫道：“對于包括比利時和德國在內的歐洲各國來說，保障高門有一個完整獨立的未來，是其利益之所在，但更為重要的，是擊敗并懲罰俄羅斯。”著名亞述學家（Assyriologist）[\*\*\*\*](#_____Ya_Shu_Xue_Shi_Yan_Jiu_Gu_D)、下議院議員、曾擔任外交部政務次官的亨利·萊亞德爵士（Sir Henry Layard）則呼吁這場戰爭必須打到俄羅斯“殘廢”為止。斯特拉特福德·坎寧提議通過戰爭徹底瓜分俄羅斯帝國，“讓波蘭和其他被俄羅斯摧毀的鄰近國家從它的獨裁統治下長久解脫出來”。在寫給克拉倫登的信中，斯特拉特福德強調摧毀俄羅斯意志的必要性：不僅要打擊其“現時的暴力行為”，而且還要給俄羅斯“內心帶來永久的束縛”。任何由歐洲國家發動的針對俄羅斯的戰爭，其目的必須是一勞永逸地消滅來自俄羅斯的威脅，讓俄羅斯被包圍在由獨立國家（多瑙河公國、克里米亞、切爾克斯和波蘭）組成的緩沖圈內，以保證俄羅斯永遠受到束縛。在英國政府準備向俄羅斯宣戰之時，羅素向克拉倫登提議，不要在女王的議會宣戰發言中加入任何可能導致西方列強承諾維持原有邊界的內容。[[48]](#_48_RA_VIC_MAIN_QVJ_1854__6_Mar)

即使在這一刻，阿伯丁依然不太愿意宣戰。3月26日英國宣戰前夕，他對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說他是被帕默斯頓“拖入戰爭”的，因為帕默斯頓擁有媒體和公眾輿論的支持。三個月前，女王和阿伯丁一樣不愿意投入英國軍隊以保衛土耳其，但現在她已意識到戰爭的必要性。她寫下了她和阿爾伯特親王是如何一起向首相解釋的：

我們倆再次向他表明，我們堅信戰爭在目前是必不可免的，他對此無法否認。我還跟他說，我認為即使其中有錯誤和不幸，現在我們已不能避免這場戰爭，因為俄羅斯的勢力和擴張必須受到抵制。他還是看不到這一點，認為此事“令人生厭”，還認為英國唯一需要擔心的外部勢力是法國！他還說北部三強必須協同行動，但無法說明此論有何依據。當然我們無法同意他的看法，并且指出德意志各國的卷入是尼古拉皇帝造成的，我們不能再用過去的觀點來判斷現在的局勢。一切皆已改變。阿伯丁勛爵不想同意我們的意見，他說他毫不懷疑不久以后人們對這場戰爭的看法就會發生改變，變得更愿意實現和平。[[49]](#_49_RA_VIC_MAIN_QVJ_1854__26_Mar)

女王所說的“一切皆已改變”到底指什么我們并不清楚。也許她想到的是法國已和英國一起向俄羅斯發出了最后通牒，英法兩國士兵已登上了駛向土耳其的戰艦。也許她和阿爾伯特親王一樣認為目前是時候讓德意志各國加入一場針對俄羅斯的歐洲大戰了，因為俄羅斯對多瑙河流域公國的入侵對歐洲大陸構成了一種迫在眉睫的新威脅。但也有可能她想到的是排外報刊對阿爾伯特親王的攻擊，在她的日記中，這一直是她所擔心的事情，因此意識到一場短促的勝仗能夠確保公眾對皇室的支持。

那天晚上女王舉辦了一場小型的家庭舞會慶祝劍橋公爵的生日，劍橋公爵是女王的表親，即將開赴君士坦丁堡指揮英軍第一師。薩克森王國派駐倫敦的大臣菲茨圖姆·馮·艾克施泰德伯爵（Count Vitzthum von Eckstädt）受邀參加舞會。他寫道：

女王跳舞非常積極，跟漢密爾頓公爵（Duke of Hamilton）和埃爾金勛爵（Lord Elgin）跳了一曲蘇格蘭快步舞（Scotch reel），他們兩人都穿著蘇格蘭傳統服裝。因為我已經不再跳華爾茲，女王就和我跳了一曲四對舞。當晚她和我交談時態度極為親切隨和，告訴我說雖然充滿遺憾，但是她明天一早就不得不向俄羅斯宣戰了。

第二天早晨，在法國向俄羅斯宣戰前一天，克拉倫登在英國議會宣讀了女王的宣戰決定。正如著名的克里米亞戰爭歷史學家亞歷山大·金萊克所述（他的這番言辭適用于任何一場戰爭）：

將重大決策的理由以書面形式表述清楚，是政治領導人需要掌握的一門學問。即使是在懸而未決之時，主戰一方也應將其真實觀點公之于眾，記錄在案，而不是隱藏于含糊其詞的言論和私下觀點之中，這對全人類都是一件好事。

對于克里米亞戰爭來說，如果那些主張這場戰爭的人的想法真能被記錄在案，那一定會透露其真實動機是削弱俄羅斯帝國的規模和實力，以利于“歐洲”，特別是西方列強。但是這些動機是不能寫進女王的宣戰書中去的，宣戰書中所寫的，是以最含糊的言辭表明英國捍衛土耳其的立場，聲稱其中并無私利，而只是“為了維護反對不公的權利”。[[50]](#_50_K__Vitzthum_von_Eckstadt__St)

\* \* \*

英國的宣戰書剛一公開，教會領袖們就立即將其稱為一場正義的圣戰。4月2日星期日，英國各地的教堂都能聽到支持戰爭的布道，其中許多以小冊子的形式出版，有些甚至賣出了幾萬份，因為當時不管是圣公會還是新教的教士都有如社會名流。[[51]](#_51_Can_Jian__R__Ellison__The_Vi)在倫敦梅費爾（Mayfair）康迪特街（Conduit Street）的三一禮拜堂（Trinity Chapel），亨利·比米什牧師（Reverend Henry Beamish）對教眾們說這是英格蘭的“基督教義務”：

用自己的力量保護一個弱小的盟友，對抗野心勃勃、不講信義的獨裁者毫無理由的挑釁；并憑借武力懲罰自私與野蠻的壓迫行為，這一壓迫行為比過去見到的更為令人憎惡和具有破壞性，因為它是以提倡宗教自由、維護基督教最高利益為幌子替自己正名的。

4月26日星期三是一個特別為“紀念國恥以及為宣戰祈禱”而設置的齋日，英格蘭西北的凱西克（Keswick）圣約翰教堂（St John’s Church）的T.D.哈福德·巴特斯比牧師（Reverend T.D. Harford Battersby）在他的講道中宣稱：

從一開始直到宣戰，我們的大使和政治家們都表現得非常誠實坦率、忍讓平和，因此現在沒有什么讓我們感到羞恥的，反而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正義事業充滿信心。我們應該在上帝面前歡慶，說：“我的上帝，我們向您感恩，因為我們和其他不公、貪婪、壓迫、殘忍的國家不一樣，我們是信仰宗教的民族，我們誦讀《圣經》、參加禮拜、派出傳教士在世界各地布道。”

同一天，在利茲的布倫瑞克禮拜堂（Brunswick Chapel），約翰·詹姆斯牧師（Reverend John James）聲稱俄羅斯對土耳其的進攻侵犯了“人類共同的最神圣權利，與販奴一樣令人憤慨，其罪行與之相差無幾”。詹姆斯聲稱基督徒在蘇丹統治下的巴爾干地區擁有的宗教自由會比在沙皇統治下的更多：

在法國和英國一心向善的部門的協助下，把土耳其交到蘇丹手上，這些謙卑的基督徒，在上帝的保佑下，他們的良心將獲得完美的安寧……一旦把他們交給俄羅斯管制，這些基督徒的建制將被拆散、學校被關閉、祈禱場所被搗毀，或是被改造成廟堂，被一個像羅馬天主教一樣不純潔、道德敗壞和不寬容的信仰所用。在這樣的情況下，像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應該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我們作為基督徒難道還有什么可猶豫的嗎？……我們發動的是一場神圣的戰爭，將當代阿提拉[††††](#_____Zhi_Xiong_Nu_Wang_A_Ti_La)之眾逐回，他們不僅對土耳其，而且對整個文明世界的自由和基督教都是一種威脅。[[52]](#_52_H__Beamish__War_with_Russia)

在倫敦瓦爾布魯克（Walbrook）的圣斯蒂芬教堂（St Stephen’s Church），喬治·克羅利牧師（Reverend George Croly）在慶祝英國“基督教戰士”奔赴近東戰場的講道中，堅稱英國參加的是一場“捍衛人類”的戰爭，因為“無望和墮落”的俄羅斯人正在準備征服世界。這是一場反抗希臘教義、保衛真正的西方信仰、“自十字軍東征以來第一次在近東展開”的“宗教戰爭”。“如果說在上一次[反抗拿破侖]的戰爭中，英格蘭是自由信念的避難所，那么在下一次戰爭中，她或將成為宗教信念的避難所。會不會是上天的旨意，讓英格蘭再登高位，在得勝回朝之時，成為人類的良師？”克羅利牧師認為，即將到來的戰爭也許將推動英格蘭在近東的使命：讓土耳其人成為基督徒。“這項偉大的工程也許會漫長、艱難、被國家的衰亡或是凡人的情緒所干擾，但終將開花結果。為什么英國教會不協助這一事業？為什么我們不即刻為正義戰爭的成功、為和平的恢復、為異教徒的感化而祈禱？”[[53]](#_53_G__Croly__England__Turkey__a)

克里米亞戰爭的主要參戰各方：俄羅斯、土耳其、法國和英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把宗教帶到了戰場上。然而當戰爭正式打響之時，克里米亞戰爭的緣由：東正教徒與天主教徒在圣地的糾紛，卻早已被人遺忘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場歐洲列強聯合對付俄羅斯的戰爭。在圣墓教堂，1854年的復活節慶典“在平靜中過去了”，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詹姆斯·芬恩（James Finn）如此寫道。因為克里米亞戰爭，來自俄羅斯的朝圣者人數減少，奧斯曼帝國當局對希臘教士主持的儀式進行了嚴密的監管，擔心再次發生教徒之間的斗毆。在幾個月之后，世界的注意力將轉向克里米亞戰場，耶路撒冷將從歐洲的視野中漸行漸遠。但是從圣地來看，發生在遠方的戰事卻有不一樣的意義。英國駐巴勒斯坦領事這樣寫道：

在耶路撒冷，人們對這事的看法有所不同。各方的交手似乎只是原有地基上的上層建筑而已，因為雖然在外交上，這一問題（東方問題）從表面上看變成了一個宗教保護問題……但是我們這些人之間已經形成了一個堅信不疑的共識：問題的根源就在我們身邊，就在圣地，圣彼得堡以條約為由宣稱擁有對宗教的保護權，但從一開始就是為了占領基督教發源地的神圣殿堂——這些殿堂對正在遠方交手的列強來說，是它們爭奪的戰利品。[[54]](#_54_FO_195_445__Finn_to_Clarendo)

[\*](#_55) 涅謝爾羅迭受到了俄羅斯駐維也納大使邁恩多夫男爵（Baron Meyendorff）的支持。他在11月29日向沙皇報告說，“弱小的基督徒們”不會與俄羅斯共同作戰。他們從未獲得來自俄羅斯的支持，處于“軍事上一無所有”的地位，沒有能力抗擊土耳其人。(Peter von Meyendorff: Ein russischer Diplomat an den Höfen von Berlin und Wien. Pollitischer und privater Briefwechsel 1826 – 1863, ed. O. Hoetzsch, 3 vols. ［Berlin and Leipzig, 1923］, vol. 3, pp. 100-104.)

[†](#_56) 指1849—1850年間，烏迪諾(Oudinot)將軍的遠征軍向反對教皇的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發起進攻，并將庇護九世迎回羅馬。在這之后，法國軍隊留在羅馬保護教皇，直到1870年才離開。——原注

[‡](#_57) 指鴉片戰爭（1839—1842）。——原注

[§](#SS_4) 指唐·帕西菲科事件。——原注

[¶](#P_4) 在1709年的波爾塔瓦之戰中，彼得大帝打敗瑞典軍隊，使俄羅斯成為一個波羅的海強國。——原注

[\*\*](#_58) 1812年俄羅斯軍隊與拿破侖軍隊間的大戰。——譯注

[††](#_59) 克里米亞戰爭中帶有諷刺意味的事件之一是這位俄軍將領本人是一個親英派，他的侄子悉尼·赫伯特(Sidney Hebert)曾在1852年至1855年間擔任英國軍務大臣（Secretary at War）。米哈伊爾的父親謝苗·沃龍佐夫伯爵（Count Semyon Vorontsov）曾任俄羅斯駐英國大使，退休后繼續住在倫敦，在英國度過了四十七年。謝苗的女兒凱瑟琳（Catherine）嫁給了彭布羅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喬治·赫伯特（George Herbert）。米哈伊爾作為一名將領曾參加過拿破侖戰爭，在1823年被任命為“新俄羅斯”地區總督。他花了很大力氣建立起敖德薩的地位，在那里修建了一座華麗的宮殿，還積極推動修建蒸汽機船用于黑海航行，并參加了1828—1829 年的俄土戰爭。遵照家族的親英傳統，他在克里米亞南海岸的阿盧普卡（Alupka）修建了一座漂亮的盎格魯—摩爾風格（Anglo-Moorish）的宮殿。1945年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期間，英國代表團即在這座宮殿內駐扎。——原注

[‡‡](#_60) 當時英國一般把下議院、貴族和教士稱為“三種力量”。——譯注

[§§](#SSSS_3) 約翰牛是18世紀開始出現的漫畫人物，經常用來代表英國國民性。——譯注

[¶¶](#PP_3) 英國的小報大部分將報頭以紅底白字方式印在頭版上方，因此被稱為“紅頭小報”。——譯注

[\*\*\*](#_61) 在1870年代前，一直都沒有俄文版的《圣經》，只有一本贊美詩集（Psalter）和《時辰祈禱書》（Book of Hours）。——原注

[†††](#_62) 古代歐亞大陸匈奴人的領袖和皇帝，曾多次率領大軍入侵東羅馬帝國及西羅馬帝國，并對兩國構成極大的威脅。——譯注

[‡‡‡](#_63) 法國當時使用的長度單位，一里格約等于四千米。——譯注

[§§§](#SSSSSS_1) 今屬芬蘭。——譯注

[¶¶¶](#PPP) 三十年戰爭發生于1618—1648年，是由神圣羅馬帝國內戰演變而成的全歐洲參與的一場大規模國際戰爭，是當時歐洲歷時最長、破壞最大的戰爭。——譯注

[\*\*\*\*](#_64) 亞述學是研究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語言、文字、社會和歷史的學科。——譯注

[††††](#_65) 指匈奴王阿提拉。——譯注

注釋

[[1]](#_1_5)BOA, HR, SYS, 907/5.

[[2]](#_2_5)BOA, HR, SYS, 903/2–26.

[[3]](#_3_5)RGVIA, f. 846, op. 16, d. 5429, ll. 11–17; ‘Vospominaniia A. A. Genritsi’, Russkaia starina, 20 (1877), p. 313.

[[4]](#_4_5)‘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Russkaia starina, 15 (1876), pp. 163–91, 659–74 (quotation, p. 182);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p. 216–8.

[[5]](#_5_5)‘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Russkaia starina, 16 (1876), pp. 700–1; S. Nikitin, ‘Russkaia politika na Balkanakh i nachalo vostochnoi voiny’, Voprosy istorii, 4 (1946),pp. 3–29.

[[6]](#_6_5)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2, pp. 523–4;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p. 708.

[[7]](#_7_5)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p. 321–2, 564.

[[8]](#_8_4)‘Voina s Turtsiei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18 (1877), p. 141;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6), vol. 1, pp. 415–18; RGVIA, f. 846, op. 16, d. 5417, l. 7.

[[9]](#_9_4)RGIA, f. 711, op. 1, d. 35, ll. 1–3;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p. 129–30, 146–8, 162–3.

[[10]](#_10_5)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p. 702–8.

[[11]](#_11_4)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p. 559–61.

[[12]](#_12_4)L. Vyskochkov, Imperator Nikolai I: chelovek i gosudar ′ (St Petersburg, 2001), pp. 296–297.

[[13]](#_13_4)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vol. 1, p. 535.

[[14]](#_14_4)‘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p. 190.

[[15]](#_15_4)M. Pinson, ‘Ottoman Bulgaria in the First Tanzimat Period – the Revolts in Nish (1841) and Vidin (1850)’,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1/2 (May 1975), pp. 103–46; H. Inalcik, Tanzimat ve Bulgar Meselesi (Ankara, 1943), pp. 69–71; ‘Vospominaniia o voine na Dunae v 1853 i 1854 gg.’, Voennyi sbornik, 14/8 (1880), p. 420; Rossiia i Balkany: Iz istorii obshchestvennopoliticheskikh i kul’turnykh sviazei (xviii veka–1878 g.) (Moscow, 1995),pp. 180–2.

[[16]](#_16_5)FO 195/439, Grant to Clarendon, 11 Jan. 1854; FO 78/1014, Grant to Clarendon, 9 Jan. 1854; 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v 1853–1854 gg.: Iz dnevnika P.B. (St Petersburg, 1887), pp. 531, 535, 543; ‘Vospominaniia A. A. Genritsi’, p. 313; A. Ulupian, ‘Russkaia periodicheskaia pechat’ vremen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o Bolgarii i bolgarakh’, in Rossiia i Balkany, pp. 182–3; A. Rachinskii, Pokhodnye pis’ma opolchentsa iz iuzhnoi Bessarabii 1855–1856 (Moscow, 1858), pp. 8–11.

[[17]](#_17_4)Vospominaniia ofitsera o voennyh deistviyah na Dunae, pp. 585–9; A. Baumgarten, Dnevniki 1849, 1853, 1854 i 1855 (n.p., 1911), pp. 82–7.

[[18]](#_18_5)FO 78/1008, Fonblanque (consul in Belgrade) to Stratford Canning, 31 Dec. 1853, 11, 17, 24 and 26 Jan. 1854.

[[19]](#_19_5)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2 vols. (Paris, 1858), vol. 1, p. 63; J. Koliopoulos, ‘Brigandage and Insurgency in the Greek Domain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853–1908’, in D. Gondicas and C. Issawi (eds.), Ottoman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99), pp. 147–8.

[[20]](#_20_4)Shamil’ – stavlennik sultanskoi Turtsii i angliiskikh kolonizatorov: Sbornik dokumental’nykh materialov (Tbilisi, 1953), p. 367; ‘Voina s Turtsiei 1828–1829 i 1853–1854’, p. 696.

[[21]](#_21_4)E. Adamov and L. Kutakov, ‘Iz istorii proiskov inostrannoy agentury vo vremya Kavkazskikh voyn’, Voprosy istorii, 11 (Nov. 1950), pp. 101–25.

[[22]](#_22_4)M. Gammer, ‘Shamil and the Ottomans: A Preliminary Overview’, in V. Milletlerarasi Turkiye Sosyal ve Iktisat Tarihi Kongresi: Tebligler. Istanbul 21–25 Agustos 1989 (Ankara, 1990), pp. 387–394; M. Budak, ‘1853–1856 Kırım Harbi Baslarinda Dogu Anadolu-Kafkas Cephesi ve Seyh Samil’, Kafkas Arastirmalari, 1 (1988), pp. 132–3;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 294.

[[23]](#_23_5)B. Lewis, ‘Slade on the Turkish Navy’, 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Turkluk Bilgisi Aras，tırmaları, 11 (1987), pp. 6–7;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107–9.

[[24]](#_24_5)FO 195/309, Slade to Stratford Canning, 7 Dec. 1853.

[[25]](#_25_4)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152.

[[26]](#_26_4)BOA, HR, SYS, 1346/38; S.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vol. 2, pp. 333–5;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vol. 1, p. 814.

[[27]](#_27_4)Morning Post, 16 Dec. 1853; The Times, 13 and 18 Dec. 1853; Sheffield and Rotherham Independent, 17 Dec. 1853; Chronicle, 23 Dec. 1853.

[[28]](#_28_4)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 1907–1908), vol. 2, p. 126.

[[29]](#_29_4)RA VIC/MAIN/QVJ/1853, 13 Nov. and 15 Dec.

[[30]](#_30_4)FO 65/423, Palmerston to Seymour, 27 Dec. 1853; RA VIC/MAIN/QVJ/1853, 15 Dec.;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122.

[[31]](#_31_3)FO 65/423, Palmerston to Seymour, 27 Dec. 1853; RA VIC/MAIN/QVJ/1853, 15 Dec.; 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123–6.

[[32]](#_32_4)A. Saab,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Charlottesville, Va., 1977), pp. 126–7; 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1856 (Manchester, 1990), p. 64.

[[33]](#_33_3)引用參見 S. Brady, Masculinity and Male Homosexuality in Britain, 1861–1913 (London, 2005), p. 81; G. Henderson,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Glasgow, 1947), p. 136.

[[34]](#_34_3)M. Taylor, The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1847–1860 (Oxford, 1995), pp. 230–231; R. Seton Watson, Britain in Europe 1789–1914: A Survey of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37), pp. 321–322; RA VIC/MAIN/QVJ/1853, various entries, Nov. and Dec.

[[35]](#_35_3)RA VIC/MAIN/QVJ/1853, 8 Dec.; RA VIC/MAIN/QVJ/1854, 15 Feb.

[[36]](#_36_3)Saab,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p. 148; id.,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p. 31.

[[37]](#_37_3)O. Anderson, ‘The Reactions of Church and Dissent towards the Crimean War’, Journal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6 (1965), pp. 211–2; B. Kingsley Martin,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3), pp. 114–5, 164.

[[38]](#_38_3)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ée, Annales Litte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p. 19–20; Taylor, Decline of British Radicalism, p. 226.

[[39]](#_39_3)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pp. 22–3.

[[40]](#_40_4)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16–24.

[[41]](#_41_3)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p. 405–28.

[[42]](#_42_4)參見諸如：V. Vinogradov,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I for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 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H.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159–70.

[[43]](#_43_1)GARF, f. 678, op. 1, d. 451, l. 306.

[[44]](#_44_1)T. Schiemann, Geschichte Russlands unter Kaiser Nikolaus I, 4 vols. (Berlin, 1904–1919), vol. 4, p. 430.

[[45]](#_45_1)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75–6; J. Ridley, Napoleon III and Eugenie (London 1979), p. 365.

[[46]](#_46_1)Lambert, The Crimean War, pp. 64 ff.

[[47]](#_47_1)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 150; Lady F. Balfour, The Life of George, Fourth Earl of Aberdeen, 2 vols. (London, 1922), vol. 2, p. 206.

[[48]](#_48_1)RA VIC/MAIN/QVJ/1854, 6 Mar.;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3; Henderson, Crimean War Diplomacy, p. 72; BLO Clarendon Papers, Stratford Canning to Clarendon, 7 Apr. 1854, c. 22; Lane-Poole,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vol. 2, pp. 354–8; PRO 30/22/11, Russell to Clarendon, 26 Mar. 1854.

[[49]](#_49_1)RA VIC/MAIN/QVJ/1854, 26 Mar.

[[50]](#_50_1)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1864,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p. 83–4;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1, pp. 476–7.

[[51]](#_51_1)參見 R. Ellison, The Victorian Pulpit: Spoken and Written Sermon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Cranbury, NJ, 1998), pp. 43–9.

[[52]](#_52_1)H. Beamish, War with Russia: God the Arbiter of Battle. A Sermon Preached on Sunday April 2, 1854 (London, 1854), p. 6; T. Harford Battersby, Two First-Day Sermons Preached in the Church of St John, Keswick (London, 1855), p. 5; J. James, The War with Russia Imperative and Righteous: A Sermon Preached in Brunswick Chapel, Leeds, on the Day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London, 1854), pp. 14–5.

[[53]](#_53_1)G. Croly, England, Turkey, and Russia: A Sermon Preached on the Embarkation of the Guards for the East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Walbrook, February 26, 1854 (London, 1854), pp. 8, 12–3, 26–7, 30–1. 類似布道參見：H. Bunsen, ‘The War is a Righteous War’: A Sermon Preached in Lilleshall Church on the Day of Humiliation and Prayer (London, 1854); R. Burton, The War of God’s Sending: A Sermon Preached in Willesden Chur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Fast,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R. Cadlish, The Sword of the Lord: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Free St George’s Church, Edinburgh on Wednesday,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H. Howarth, Will God Be for U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Parish Church of St George’s, Hanover Square, on Wednesday,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A Sermon Preached by the Rev. H. W. Kemp, Incumbent of St John’s Church, Hull, on Wednesday, April 26th: Being the Day Appointed by Her Gracious Majesty the Queen for the Humiliation of the Nation on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with Russia (London, 1854); J. Cumming, The War and Its Issues: Two Sermons (London, 1854); J. Hall, War with Russia Both Just and Expedient: A Discourse Delivered in Union Chapel, Brixton Hill, April 26, 1854 (London, 1854); John, Bishop of Lincoln, War: Its Evils and Duties: A Sermon Preached in the Cathedral Church of Lincoln on April 26th, 1854 (London, 1854).

[[54]](#_54_1)FO 195/445, Finn to Clarendon, 28 Apr. 1854; 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2 vols. (London, 1878), vol. 2, pp. 130–1.

# 第六章 土耳其人首嘗勝果

1854年3月，一名年輕的炮兵軍官來到米哈伊爾·戈爾恰科夫將軍的總部，他的名字是列夫·托爾斯泰（Leo Tolstoy）。他在1852年加入軍隊，那一年他在俄羅斯最重要的文學月刊《當代人》（Contemporary）上發表了回憶錄《童年》（Childhood），引起了文學界的關注。托爾斯泰對自己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游手好閑的貴族生活感到厭倦，正好大哥尼古拉（Nikolai）休假結束即將返回位于高加索的軍營，于是決定與其一同前往。托爾斯泰被派往駐扎在高加索北部哥薩克村莊斯塔羅格拉德斯卡雅（Starogladskaya）的一個炮兵旅，參加了對沙米勒的穆斯林武裝的進攻，好幾次都差點被叛軍抓獲。在對土耳其的戰爭爆發后，他申請轉派到多瑙河前線。在1853年11月寫給二哥謝爾蓋（Sergei）的信中，他解釋說他想參加一場真正的戰爭：“將近一年來，我想的都是怎么放棄武力，然而我卻做不到。既然我不得不在這里或那里參加戰斗，那么還是在土耳其更好些。”[[1]](#_1_Tolstoy_s_Letters__ed__and_tr)



列夫·托爾斯泰，1854（圖片來源：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及Topfoto機構）

在1月份，托爾斯泰通過了沙皇軍隊中最初級的少尉軍官的考試，被派往瓦拉幾亞加入第十二炮兵旅。他花了十六天時間，乘坐雪橇穿越俄羅斯南方的雪地，于2月2日來到自己的莊園亞斯納亞波利亞納（Yasnaya Polyana）。3月3日，他再次乘坐雪橇離開莊園。當雪地變得泥濘，雪橇無法通行時，又改坐馬車穿越烏克蘭到基什尼奧夫，于3月12日抵達布加勒斯特。兩天之后戈爾恰科夫親王親自接見了他，把這位年輕的伯爵當作自家人一樣。“他擁抱了我，讓我答應以后每天都要和他一起用晚餐，還想讓我成為他的幕僚。”托爾斯泰在3月17日寫給圖瓦內特（Toinette）姨媽的信中寫道。

在俄羅斯軍隊中，貴族之間的關系網非常有用。托爾斯泰很快就加入了布加勒斯特的社交活動，在親王的官邸與主客共進晚餐、在客廳玩牌參加音樂聚會、晚上去看意大利歌劇和法國戲劇——與不過幾英里外的多瑙河前線的景象有著天壤之別。“當您想象我面臨戰爭帶來的各種危險時，我其實連土耳其軍隊的氣味都沒有聞到，在布加勒斯特過著平靜的生活，散散步、寫寫曲子、享受冰淇淋。”他在5月初給姨媽的信中寫道。[[2]](#_2_A__Maude__The_Life_of_Tolstoy)

托爾斯泰剛好趕上了俄軍在多瑙河發動的春季攻勢。沙皇決心盡快派兵南下，搶在西方列強軍隊登陸之前抵達瓦爾納和黑海海岸。這一計劃的關鍵是占領錫利斯特拉的土耳其要塞，這樣就能讓俄軍在多瑙河地區建立一個據點，將多瑙河變成由黑海通往巴爾干內陸的補給線，還能為招募保加利亞志愿者提供一個基地。這正是帕斯克維奇說服沙皇采取的戰略，目的是避免讓奧地利人因疑心而反目。在多瑙河地區西部，塞爾維亞人不僅人數眾多，而且比較支持俄羅斯。帕斯克維奇擔心如果俄軍西進，塞爾維亞人為迎接俄軍到來而起義的消息可能會傳到奧地利境內，威脅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英法軍隊至少在兩個星期內還到不了這里，”沙皇在3月26日給戈爾恰科夫的信中寫道，“我相信他們會在瓦爾納登陸，向錫利斯特拉進發……我們必須在他們到來之前占領要塞……一旦控制了錫利斯特拉，我們就有足夠多的時間從保加利亞人中招募更多志愿者。但是我們不能鼓動塞爾維亞人，以免讓奧地利人警覺。”[[3]](#_3__Voina_s_Turtsiei_1854_g____R)

沙皇希望能從保加利亞人和其他斯拉夫人中招募到士兵。雖然不愿意鼓動塞爾維亞人反抗奧地利，但是他希望俄軍的攻勢能引發基督徒起義，最終摧毀奧斯曼帝國，大獲全勝的俄羅斯就能夠由此確定巴爾干地區的宗教格局。“所有屬于土耳其的基督教地區，”他在1854年春天寫道，“都必須獨立，恢復成過去的樣子：公國、基督教國家，并由此重新加入歐洲基督教國家的大家庭。”他對這一宗教事業如此投入，如果奧地利反對俄羅斯對東方問題的解決方案的話，他甚至愿意為此而挑起針對奧地利的革命。“我們的勝利很有可能導致斯拉夫人在匈牙利舉行暴動，”他在給俄羅斯駐維也納大使的信中寫道，“我們將可以利用這一機會威脅奧地利帝國的心臟，迫使它的政府接受我們的條件。”至此，沙皇已經打算為了他的圣戰成功而拋棄幾乎所有過去他一直堅持的正統原則。他對歐洲列強的反俄立場感到震怒，開始談論各種可能性，包括在西班牙挑動革命以打亂法軍在東線的部署，甚至想到與馬志尼在倫巴第（Lombardy）和威尼斯的解放運動聯手，削弱奧地利的力量。不過沙皇的手下勸服了他，讓他放棄支持民主派的革命運動。[[4]](#_4_RGADA__f__1292__op__1__d__6)

俄軍春季攻勢的開始，被斯拉夫派稱為世界歷史上一個新的宗教時代的破曉，是邁向近東基督教帝國復興的第一步。他們還給這個帝國未來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起了一個新名字：沙皇格勒。在他的《致俄羅斯》（“To Russia”，1854年發表）中，詩人霍米亞科夫（Khomiakov）以“呼喚圣戰”歡慶春季攻勢的開始：

我的祖國，起來！

為了我們的弟兄！上帝呼喚你

越過多瑙河洶涌的波濤……

在1839年發表的同名詩作中，霍米亞科夫曾經提到俄羅斯肩負將東正教傳播到世界各地的使命，但是警告俄羅斯不可過于傲慢。而到了1854年，他的新詩就開始呼吁俄羅斯參加“血戰”、“揮出利劍——上帝之劍”了。[[5]](#_5_A__Khomiakov__Polnoe_sobranie)

然而俄軍的推進十分緩慢，在多瑙河以北沿途多次遭遇土耳其軍隊的頑強抵抗，最后不得不停下來。在伊布萊爾（Ibrail）[\*](#__Jin_Bu_Le_Yi_La__Braila__Shu_L)，兩萬名俄軍擲彈兵在內河炮艦和蒸汽機船的支援下投入戰斗，卻無法攻克防備完善的土耳其要塞。在默欽（Mǎcin），六萬俄軍駐扎在要塞之外，卻難以攻入。進攻受阻，俄軍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用松樹枝搭建木筏和浮橋，3月底在加拉茨（Galaţi）渡過了多瑙河，途中沒有遭遇任何抵抗。[[6]](#_6_FO_78_1014__Cunningham_to_Str)

渡河之后，俄軍繼續向錫利斯特拉進發，卻陷在了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澤地里。1828—1829年俄土戰爭期間，俄軍就是在這里因為霍亂損失慘重。這一地區人口稀少，糧食供應不足，無法支持人數眾多的俄軍，許多士兵因饑餓與疾病倒下。到了4月，入侵多瑙河公國的二十一萬俄軍中，有九萬人病倒了。1854年夏天俄軍撤離久爾久（Giurgevo）[†](#__Jin_Pin_Xie_Wei_Giurgiu_Shu_Lu)要塞，一位看到丟棄在城內的谷糠的法國軍官記載，俄軍士兵吃的干面包軍糧幾乎沒有任何營養，連老鼠和野狗都不會吃。一位俄軍中的德國軍醫認為，“俄軍士兵長期食用劣質食物”是他們一旦受傷或得病后“像蒼蠅般紛紛倒下”的主要原因之一。“俄軍士兵的神經系統是如此之弱，失血幾盎司就會倒地不起。受同樣的傷，體質稍好的人一定會挺過去，而這些士兵卻常常因此而喪生。”[[7]](#_7_E__Jouve__Guerre_d_Orient__Vo)

俄軍士兵在家信中描述了他們惡劣的生活條件，許多人請求家人寄錢過來。有些信件被警察截獲，送到了戈爾恰科夫那里，他認為信中內容在政治上有危險，于是這些信件被封存起來，保留至今，成為展示普通俄軍士兵生活的一個獨特窗口。格里戈里·祖比亞恩卡（Grigory Zubianka）是第八騎兵中隊（8th Hussar Squadron）的一名普通士兵，他3月24日在給妻子瑪麗亞（Maria）的信中寫道：

我們在瓦拉幾亞的多瑙河岸邊，對面就是我們的敵人……每天河兩岸都有交火，每一小時、每一分鐘我們都可能被子彈打中，但是我們向上帝祈禱。每一天過去，如果我們還健康地活著，我們就感謝天主降福。但是每天每夜我們都在饑寒交迫中度過，因為他們什么吃的都不給我們，我們得自己想辦法保護自己，愿上帝保佑我們。

尼基福爾·布拉克（Nikifor Burak）是托博爾斯克步兵團（Tobol’sk Infantry Regiment）二營的一名士兵，他在給住在基輔省錫多羅夫卡村（Sidorovka）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的信中寫道：

我們現在已離開俄羅斯很遠了，這里的土地和俄羅斯完全不同，我們幾乎已在土耳其了，每一個鐘頭我們都可能陣亡。說實話我們團幾乎全被土耳其人消滅了，但是感謝上帝我還好好地活著……我希望能回到家鄉，回到你們身邊，親耳聽到你們說話，但是目前我們在最險惡的境地中，我害怕死。[[8]](#_8_RGVIA__f__9198__op__6_264__cb)

隨著俄軍損失不斷加劇，帕斯克維奇越發不愿意繼續保持攻勢。雖然他曾經主張向錫利斯特拉進攻，但是此時他開始擔心奧地利軍隊在塞爾維亞邊境的集結。當時英法聯軍隨時可能在東部海岸登陸，南方土耳其繼續堅守防線，而西邊奧地利軍隊正在集結，多瑙河公國的俄軍被敵軍包圍的危險很大。帕斯克維奇請求沙皇下令撤退，他甚至違反了沙皇加快進攻的指令，推遲了對錫利斯特拉的攻勢，擔心奧地利會趁俄軍后方空虛發起進攻。

帕斯克維奇對奧地利威脅的憂慮是有道理的。奧地利因為擔心俄羅斯會占領塞爾維亞，已經動員軍隊在塞爾維亞邊境集結，準備鎮壓塞爾維亞人可能展開的暴動，同時阻擋俄軍從東部入侵奧地利的塞爾維亞人聚居區。1854年春，奧地利一直在要求俄羅斯從多瑙河公國撤軍，并威脅說如果沙皇不下令撤軍的話，奧地利將加入西歐列強的陣營。俄羅斯對塞爾維亞的影響力也同樣讓英國人感到擔心，根據英國駐貝爾格萊德領事的說法，塞爾維亞人“被告知一旦俄軍占領錫利斯特拉，就會立刻前往塞爾維亞”，并要他們準備好“加入俄軍，一起向奧地利南部的斯拉夫人地區進軍”。在帕默斯頓的授意下，這位領事向塞爾維亞人發出警告，聲稱如果他們拿起武器支持俄軍，英法兩國將采取武力應對。[[9]](#_9_FO_78_1009__Fonblanque_to_Pal)

在陸地戰呈停滯狀態的同時，1854年4月22日，東正教的復活節星期六，英法艦隊向黑海港口敖德薩開炮，開始了對俄羅斯本土的攻擊。英國從抓獲的商船水手那里得到情報，稱俄羅斯在敖德薩集結了六萬名士兵和大量軍火，準備送往多瑙河前線。事實上，敖德薩港口沒有什么軍事價值，能抵御西方艦隊的只有幾座炮臺。他們向敖德薩總督奧斯滕-薩克恩將軍（General Osten-Sacken）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他投降并交出所有艦船。在未收到任何回復之后，聯軍的九艘蒸汽機船、六艘火箭船和一艘驅逐艦向港口發起炮擊。炮轟持續了十一個小時，嚴重破壞了港口，摧毀了幾條船，炸死了幾十個平民。炮彈還擊中了克里米亞總督沃龍佐夫建在港口懸崖頂上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宮殿，其中一顆加農炮彈打中了敖德薩第一任總督黎塞留公爵的雕塑。讓人啼笑皆非的是，整個敖德薩受炮擊破壞最嚴重的是普里莫爾斯基大道（Primorsky Boulevard）上的倫敦旅館（London Hotel）。

聯軍艦隊在5月12日發動了第二輪炮擊，英國蒸汽機船“虎號”（Tiger）在濃霧中擱淺，遭到俄軍海岸上火炮的猛烈打擊。船員們曾試圖燒毀擱淺的船只，后來被謝格洛夫（Shchegolov）少尉指揮的一小隊哥薩克士兵俘虜，整個過程中敖德薩的婦女們都打著陽傘在岸邊觀看。英國船員（包括二十四名軍官和二百零一名士兵）被哥薩克士兵從岸邊押送到鎮里關押起來，一路遭到俄羅斯水手和平民的辱罵。俄羅斯人對英國人選擇于復活節炮擊敖德薩格外憤慨，東正教士也在一邊鼓動情緒。不過當地守軍仍然為在炮擊中受傷而于6月1日因壞疽身亡的“虎號”船長亨利·韋爾斯·吉法德（Henry Wells Giffard）舉行了一個完整的軍事葬禮。根據老派的騎士傳統，吉法德船長的一束頭發還被送到了他在英格蘭的遺孀手中。“虎號”的一些碎片后來被沖上海岸，其中還包括成箱的英國朗姆酒，船上的加農炮被當作戰利品陳列在敖德薩。[‡](#___Qi_Zhong_Yi_Men_Xian_Chen_Lie)

教士們宣布這場勝利是神的旨意，他們說英法艦隊在復活節星期六發動炮擊，等于發動了一場宗教戰爭，因此“虎號”被俘是上天對他們的懲罰。沖上海岸的酒很快被碼頭上的水手和工人喝了，酒醉之后發生了斗毆，死了好幾個人。另外還有一些船只部件殘片被當作紀念品賣掉。俘獲了“虎號”船員的謝格洛夫少尉一夜之間成為英雄，幾乎被當作圣人，刻著他頭像的手鐲和徽章甚至能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買到，還有一種香煙以他命名，煙盒上印著他的畫像。[[10]](#_10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敖德薩遭遇炮擊向俄軍指揮部敲響了警鐘，說明西方艦隊已逼近多瑙河前線，現在的問題是，英法聯軍還需要多久到達，增援錫利斯特拉的土耳其軍隊。帕斯克維奇擔心如果繼續在多瑙河流域公國保持攻勢，俄軍所面臨的局面將變得非常糟糕。他在4月23日寫給剛被任命為克里米亞俄軍總司令的緬什科夫的信中表達了希望撤退的想法：

不幸的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敵人，不僅有海上力量，而且還有奧地利，普魯士看來也在背后支持。英國會不惜一切代價讓奧地利和她站在一起，因為如果沒有德國人的支持，他們不能對我們怎么樣……如果歐洲各國都在針對我們，我們就不能把多瑙河作為戰場。

整個1854年春天，帕斯克維奇都在拖延執行沙皇圍攻錫利斯特拉的命令。到4月中旬，五萬名俄軍占據了錫利斯特拉對面多瑙河上的島嶼，但是帕斯克維奇仍然遲遲不下令進攻。尼古拉對手下將領缺乏斗志感到十分惱怒，雖然他自己也承認奧地利有可能加入敵對陣營，但是尼古拉依然憤怒地傳令帕斯克維奇，勒令他開始攻擊。“如果奧地利人背信棄義地攻擊我們，”他在4月29日寫道，“四個兵團和龍騎兵就足以阻擋他們！我不會再跟你廢話，該說的都已經說了！”

一直到5月16日，經過三個星期的騷擾戰控制了錫利斯特拉西南部的高地之后，俄軍才開始對要塞發起炮擊。即使如此，帕斯克維奇選擇的攻擊目標主要還是城外由石堡和土木堡壘組成的一道弧形防線，離錫利斯特拉還有幾公里遠。帕斯克維奇希望能借此消磨土耳其人的抵抗意志，以在俄軍正式發起攻擊時減少損失，但是執行圍攻任務的軍官們知道這是空想。在高門對俄羅斯宣戰之后，土耳其人有幾個月的時間鞏固自己的防線，要塞和堡壘都被大大加固，指揮這項工程的是普魯士人格拉赫上校（Colonel Grach），一位戰壕戰和地雷戰專家。俄軍的炮擊對土耳其防線的破壞相對較輕，不過錫利斯特拉城外主要棱堡“阿拉伯的塔比亞”（Arab Tabia）在圍攻中遭受嚴重炮擊，土耳其守軍不得不多次重建。保衛錫利斯特拉的有一萬八千名土耳其軍人，其中大部分來自埃及和阿爾巴尼亞，他們頑強的斗志大出俄羅斯人意料。指揮“阿拉伯的塔比亞”守軍的是兩名英國炮兵軍官：錫蘭來復槍團（Ceylon Rifles）的詹姆斯·巴特勒上尉（Captain James Butler）和孟買炮兵團（Bombay Artillery）的查爾斯·內史密斯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Nasmyth）。“不得不對土耳其人臨危不懼的精神感到欽佩。”巴特勒如此記下自己的看法。

在修筑一堵防護墻時，為了能得到一點點掩護，只有兩人可以同時工作。然而在五分鐘之內，就有三名土耳其人中彈身亡。每當有人倒下，在一邊待命的土耳其人立刻從他手中拿過鐵鍬繼續工作，神態鎮定，仿佛他所做的，不過就是平時在路邊挖一條壕溝一般。

帕斯克維奇意識到必須逼近外圍堡壘進行轟擊才可能對它們真正造成破壞，于是他命令希爾德將軍（General Shil’der）展開周密的土工作業，開挖塹壕把俄軍大炮送到靠近堡壘的地方。俄軍對錫利斯特拉的圍困很快成為日復一日的單調動作：從日出到日落不停地炮擊，河面上俄軍艦隊的大炮也加入增援。土耳其士兵這樣曠日持久地處于危險之中，在世界戰爭史上還是第一次。盡管如此，俄軍還是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進展。[[11]](#_11_RGVIA__f__481__op__1__d__89)

巴特勒在圍困期間所寫的日記被保存了下來。在日記中，他認為俄軍重炮的威力“被大大夸張了”，土耳其的輕型火炮完全可以與之抗衡，盡管土耳其人做什么事情都“大大咧咧的”。他還認為宗教對土耳其人的頑強抵抗起了很大作用，每天清早要塞司令穆薩帕夏（Musa Pasha）都在斯坦波爾城門（Stamboul Gate）舉行晨禱，號召士兵們誓死保衛錫利斯特拉，“成為先知的傳人”。土耳其士兵則以“呼喊‘感贊安拉！’作為回應”[§](#SS_Mu_Sa_Pa_Xia_Zhen_Wang_Hou__T)。要塞中沒有一棟房子是安全的，城中居民白天都藏在自己挖的地洞里躲避炮擊，整個要塞“仿佛被廢棄了一般，只能看到野狗和士兵的身影”。傍晚時分，當俄軍炮擊接近尾聲時，巴特勒“看到幾個不過九歲、十歲樣子的頑童竟然跟著炮彈跑，加農炮彈的彈丸落在城里，還在撞來蹦去的時候，他們就在后面追著，就像是追著板球玩似的，看誰能第一個抓到。上交一個加農炮彈彈丸就可以從帕夏那里得到二十佩拉（peras）的獎賞”。入夜之后，他能聽到俄軍士兵在戰壕里唱歌，“當他們高興起來時，甚至還有一支樂隊演奏波爾卡和華爾茲”。

來自沙皇的壓力越來越大，帕斯克維奇不得不在5月20日和6月5日之間下令步兵發動了超過二十次進攻，然而依然未能取得突破。“土耳其人英勇抵抗，像是中了邪似的。”巴特勒在5月30日寫道。有時候小股俄軍爬上了堡壘頂部，但是在與土耳其人的徒手搏殺中卻不敵而退。6月9日，要塞主墻外發生了一場大戰，土耳其軍隊在打退了俄軍大規模沖鋒之后，向俄軍陣地實施了反擊。戰斗結束后，兩千名左右俄軍士兵的尸體躺在戰場上。巴特勒寫道，在第二天，

許多居民走到城外，將戰死的俄軍士兵的頭顱砍下，希望領取獎賞，但是在城門口被擋住，那些野蠻人不允許他們把這些東西帶進城里。于是死人的頭顱在城門外堆成了一大堆，好長時間沒有被埋葬。當我們和穆薩帕夏圍坐在一起時，一個混混忽然出現在我們面前，向他腳下丟了兩只從俄軍士兵身上割下的耳朵。另一個混混還炫耀說，一個俄羅斯軍官祈求看在先知的份上饒他一命，但是他毫不留情地拔出刀子割斷了這個軍官的喉嚨。

俄軍士兵的尸體好幾天都沒有被埋葬，他們身上幾乎所有東西都被當地居民搶光了，阿爾巴尼亞非正規軍士兵也參與了碎尸和偷搶。幾天之后，巴特勒看到這些情形，形容那景象“令人惡心”。“空中的氣味已經非常難聞。那些躺在溝壕里的尸體都已被扒光衣服、姿態怪異，有些尸首分離，另一些喉嚨半露，手臂向上伸出保持著他們倒下時的姿勢。”[[12]](#_12_NAM_1968_03_45___Journal_of)

托爾斯泰在這場大戰后的第二天抵達錫利斯特拉，他是以軍械員的身份隨謝日普托夫斯基將軍（General Serzhputovsky）的參謀部前來的。參謀部把總部設在位于山頂的穆薩帕夏官邸花園，托爾斯泰得以從這個安全的制高點欣賞戰場的景象。在給姨媽的信中，他描述看到的戰爭景象：

不用說多瑙河、河中的島嶼和河岸（分別由我們和土耳其人占領）了，就連錫利斯特拉城、要塞和城外堡壘都近在眼前，仿佛伸手可觸。這里夜以繼日都能聽到加農炮的炮聲和步槍射擊的聲音，用野戰望遠鏡看還能隱約分辨出土耳其士兵的身影。看著人們相互殘殺確實能給人帶來異樣的快感，這是真的。每天清晨和夜晚我會站在推車上，花好幾個鐘頭觀看戰事，而且也不是我一個人這么干。戰場景象真的非常美麗，尤其是在晚上……我們的戰士通常在晚上修建戰壕工事，土耳其人會向他們發起進攻，阻止他們工作，然后你就能看到彈藥的閃光，聽到步槍的槍聲。頭一天晚上……我自娛自樂地對著手表記錄我聽到的加農炮炮聲，在一分鐘之內我就數到一百下。然而雖然這些就發生在附近，卻一點不像我想象的那么令人害怕。在夜晚，因為什么都看不到，炮擊就成了比賽誰能消耗更多火藥，雙方發射了幾千發炮彈，最多也就能造成三十人陣亡。[[13]](#_13_Tolstoy_s_Letters__vol__1__p)

帕斯克維奇聲稱自己在6月10日的戰斗中被炮彈彈片擊中，其實他沒有受傷，但是借此把指揮權交給了戈爾恰科夫將軍。他本來就反對發動這場進攻，現在不再承此重擔，立刻坐上馬車，渡過多瑙河去了雅西。

6月14日，沙皇收到消息說奧地利正在調集軍隊，準備在7月底之前參戰對抗俄羅斯，同時他還擔心英法聯軍隨時可能前來增援。時間已經不多了，但沙皇還是下令對錫利斯特拉發動最后一次進攻，戈爾恰科夫將這一天定在了6月22日。[[14]](#_14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vol)

\* \* \*

這時候英法兩國軍隊正在瓦爾納地區集結。從4月初開始，他們先是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登陸，目的是保護君士坦丁堡不受俄軍的攻擊；但是很快就發現加里波利地方太小，不足以支持一只龐大的軍隊。他們花了幾個星期在附近搜尋物資，在君士坦丁堡周圍的其他地方安營扎寨，最后還是決定搬到北部的瓦爾納港口，在那里他們可以方便地獲得由英法艦隊運送來的物資。

兩國軍隊在俯視舊港要塞的高地上分別安營扎寨，雖然是盟軍，但在觀察對方的時候卻依然帶著遲疑提防，近來的歷史讓雙方都心生警惕。指揮英國陸軍的是年邁的拉格倫勛爵，他曾擔任過威靈頓公爵的軍事秘書，參加過1808—1814年的半島戰爭，并在滑鐵盧戰役中失去了一條胳膊，這是一件很有名的事。[¶](#P_Dang_Shi_Ta_De_Shou_Bi_Zai_Mei)他在提到“敵人”時，有時在不經意中，指的不是俄軍而是法國軍隊。

從一開始兩國就在戰略上有分歧——英國傾向于在加里波利登陸，然后謹慎地向內陸挺進；而法國則希望在瓦爾納登陸，阻止俄軍向君士坦丁堡邁進。法國人還提出由較為先進的英國海軍控制海上作戰，同時由法軍指揮陸地軍事，這樣他們可以充分利用從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得到的經驗。這是一個合理的建議，但是任何要接受法國人號令的想法都會讓英國人心生厭惡、不寒而栗，而且他們不信任法軍指揮圣-阿諾元帥（Marshal Saint-Arnaud）。他是一個追隨拿破侖的波拿巴主義者，曾因在巴黎證券交易所（Bourse）投機而頗有惡名，以至于英國統治層中許多人相信他會把個人利益置于聯軍的戰略目標之上，阿爾伯特親王甚至認為他會做出接受俄羅斯人賄賂這樣的事來。這樣的想法自上而下傳到英軍中。“我恨法國人，”奈杰爾·金斯科特上尉（Captain Nigel Kingscote）寫道。金斯科特和拉格倫的許多副官一樣，是他的侄子。“圣-阿諾的參謀們，除了一兩個之外，都和猴子差不多，腰帶束得緊緊的，上下都鼓鼓的像是氣球一樣。”[[15]](#_15_B__Gooch__The_New_Bonapartis)



拉格倫勛爵，羅杰·芬頓攝，1855（圖片來源：國會圖書館印刷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法國人對英軍也沒有什么好感。“參觀英軍營地之后，讓我為自己是法國人而感到自豪”，讓-朱爾·埃爾貝上尉（Captain Jean-Jules Herbé）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

英軍士兵熱情高漲、體格健壯。我欣賞他們雅致的新軍裝、優雅的舉止、精確整齊的操練、漂亮的戰馬，但是他們最大的弱點是習慣于舒適的條件實在太久了，一旦開始行軍，他們的諸多要求將難以滿足。[[16]](#_16_J_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

路易·努瓦爾（Louis Noir）是法國朱阿夫（Zouaves）第一營的士兵，這是一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建立起來的精銳步兵部隊。[\*\*](#___Di_Yi_Pi_Zhu_A_Fu_Bu_Dui_De_S)他回憶在瓦爾納見到英軍時的可悲印象，特別是英軍軍官鞭笞醉酒和違反軍紀的士兵的行為，讓他想起早就在法軍中消失的舊時代封建體系：

英國士兵似乎來自社會底層，也許這個階層的人更容易被軍餉所吸引。如果被征召入伍的是富裕家庭的孩子們，那么軍官鞭笞士兵的現象肯定已經被軍令禁止了。我們厭惡軍中體罰，這提醒我們1789年的革命確立了全民征兵制，同時廢除了軍中體罰……法國軍隊是由一群特殊的公民組成的隊伍，軍事法律雖然嚴苛，但是每個人不論軍銜高低都必須遵守。在英格蘭，士兵其實和農奴差不多——他只是政府的財產。驅使他的只有兩個：一個是棍棒，另一個是物質待遇。英國人已經養成了追求舒適的習慣，他們住在舒適的帳篷里，吃著美味的烤牛肉，就著一壺紅酒和源源不斷的朗姆酒——這就是英軍向往的東西，就是他勇敢作戰的必備條件……但是，如果這些東西未能及時送到，如果他不得不在泥濘中睡覺，如果他只能自己去找樹枝生火，如果他沒有酒肉下肚，那么英國人就會立刻無心戀戰，軍中上下馬上就會士氣低落。[[17]](#_17_L_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

法國軍隊在許多方面都比英國軍隊優秀。法國的軍官學校培養了一整代新興職業軍人，與英國軍人相比，他們技術上更先進，戰術上更出色，而且和英國軍隊中的貴族軍官相比，在社會階層上更接近手下的士兵。法軍配備的米涅來復槍發射速度快，在一千六百米射程內依然保持精準，這讓法國士兵以攻擊時的沖勁聞名。朱阿夫部隊更是擅長快速的進攻和有序的撤退，這些特點都是他們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培養起來的。他們的勇氣被所有法國步兵所仰慕，只要朱阿夫部隊領頭，其他法軍士兵都會跟上。朱阿夫部隊久經沙場，在最艱難的地形和崎嶇的山地中打過仗，多年在阿爾及利亞（還有在1848年面對巴黎起義的街壘）的征戰讓士兵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戰友情。保羅·德·莫萊尼（Paul de Molènes）是圣-阿諾在阿爾及利亞征召的西帕希（Spahi）騎兵部隊中的一名軍官，他認為朱阿夫部隊身上散發出一種“特殊的誘惑力”，在1854年吸引了大批巴黎的年輕人應征。“‘朱阿夫們’不拘一格的軍裝、隨心所欲勇往直前的形象、傳奇的名聲等都讓他們有一種騎士般的魅力，自拿破侖時代以來這還是第一次見到。”[[18]](#_18_P__de_Molenes__Les_Commentai)

在阿爾及利亞的作戰經驗使法國軍隊具備了決定性的優勢；相比之下，英國軍隊自滑鐵盧以來從未打過一場大仗，在許多方面還停留在半個世紀以前。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一度有三十五萬法軍參戰，法國人從中認識到小規模作戰單位在保持戰場紀律和秩序上的關鍵作用。這個備受20世紀軍事理論家推崇的理念，最早是由法國人阿爾當·杜·皮克（Ardant du Picq）推廣的。他從巴黎郊外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圣西爾軍校（École Spéciale Militaire de Saint-Cyr）[††](#___Sheng_Xi_Er_Jun_Xiao_You_Na_P)畢業，在瓦爾納作戰時是一名上尉，他通過觀察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法軍士兵的表現總結出自己的軍事理論。法軍還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學會了如何高效地補給軍隊，當英法聯軍在加里波利登陸時，法軍在這方面的優勢立刻顯露了出來。據隨同英軍一起抵達的《泰晤士報》記者威廉·羅素（William Russell）報道，英軍在抵達之后，有兩天半的時間都無法上岸，“因為什么都沒準備好”。而法國軍艦后面就跟著一支龐大的補給船隊：“他們一靠岸，治療傷病的醫院、提供面包餅干的烤房、裝載貨物和行李的貨車等等，所有的必需品和提供舒適服務的裝備就應有盡有。在我們這邊，港口里連一面英國三角旗都沒有！代表我們這個偉大的海上帝國的，只有一艘私人擁有的蒸汽機船。”[[19]](#_19_The_Times__26_Apr__1854)

克里米亞戰爭的爆發讓英國軍隊措手不及。在這之前，軍事預算被削減多年，只有在1852年拿破侖發動政變在英國造成恐法情緒之后，羅素領導的英國政府才得到議會批準，一定程度地增加了軍事開支。在1854年春，英國陸軍共有十五萬三千人，其中三分之二在大英帝國海外某個遙遠的角落服役，因此參加黑海遠征的部隊不得不倉促征召。英國沒有建立法國的全民征兵制，只能以賞金為誘惑招募志愿兵。在1840年代，由于各種工業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加上許多人向美國和加拿大移民，身體條件合適的青壯年男性不多，軍方只好在失業人口和其他最窮苦的社會階層——例如愛爾蘭饑荒難民等——中發掘兵源，這些人急于得到賞金償還債務并讓家人免于被送往濟貧院（poorhouse）[‡‡](#_____Dang_Shi_You_Zheng_Fu_Chu_Z)的命運。募兵的主要場所是酒吧、游樂場和賽馬場，這些都是導致窮人酗酒度日、債務纏身的地方。[[20]](#_20_C__Bayley__Mercenaries_for_t)

如果說英軍士兵來自社會上最窮苦的階層，那么軍官官銜則是可以花錢購買的，這一制度保證了軍官們大都來自貴族階層。高級軍官中，大部分人是有著良好的宮廷關系卻缺乏作戰經驗的年邁紳士，這與法國軍隊的職業化程度形成天壤之別。拉格倫勛爵六十五歲，工兵司令約翰·伯戈因爵士（Sir John Burgoyne）已經七十二歲高齡。拉格倫指揮部中，五名高級軍官是他的親屬，其中最年輕的劍橋公爵是維多利亞女王的表親。這支軍隊和俄軍一樣，軍事理念和文化依然停留在18世紀。

拉格倫堅持要英軍士兵穿著緊身長袍軍裝和高頂硬軍帽上戰場，當在校閱場上以整齊方陣行軍的時候，這樣的裝束確實很威武，但是在戰場上卻完全不實用。軍務大臣[§§](#SSSS_Jun_Wu_Da_Chen_Fu_Ze_Jun_Du)悉尼·赫伯特在5月份致信拉格倫，建議放寬對英軍的裝束要求，不要強求士兵每天刮胡子，拉格倫回復說：

對你提出的關于軍隊中胡子的提議，我的看法有所不同，而且目前沒有必要采納這一建議。我的想法是比較老派的，我依然堅持一個英國人必須有英國人的樣子，即使法國人正在努力讓自己看上去像是非洲人、土耳其人和異教徒。我一直認為對英國最底層的人來說，首要的清潔工作是刮胡子。我敢說軍中上下大部分人和我想法一致，雖然有些軍官可能會羨慕盟軍中某些渾身長毛的人。當然，如果我們是在行軍中，暴露在高溫和塵土中，我認為陽光會曬傷士兵的臉，那時候我們會考慮是否可以放松一下軍紀，但是現在讓我們有英國人的樣子。[[21]](#_21_NAM_1968_07_289__Raglan_to_H)

當7月熱浪襲來之時，對胡子的約束再也堅持不下去了，但是英軍士兵依然可笑地穿著正裝。與之相比，俄羅斯和法國士兵就穿得輕松簡單。第一（皇家）團的（1st ［Royal］ Regiment）[¶¶](#PP_Ji_Huang_Jia_Su_Ge_Lan_Ren_Tu)的喬治·貝爾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George Bell）抱怨說：

身上一套衣服，背包里一套換洗的，對一名士兵來說就足夠了，但是他不得不像頭驢子一樣背一大堆東西：大衣和毯子、緊束的……皮帶死死扣在他胸前、武器和額外裝束、六十發米涅來復槍子彈、背包加上背包里的東西。感謝《笨拙》（Punch）[\*\*\*](#____Yi_Ben_Ying_Guo_Feng_Ci_Man)和《泰晤士報》，我們不用再戴著硬邦邦的皮領子了。軍事當局非要士兵在上戰場之前就已經被勒得半死、壓得動彈不得，憑著從軍四十年的經驗去和他們理論，卻完全不被當一回事，只有公眾輿論和新聞報紙才救了士兵。下一個我想丟掉的是那個被叫作阿爾伯特帽（Albert）[†††](#____Yi_Zhong_Gao_Ding_Ying_Pi_Ma)的可惡東西，這里中午的陽光猛烈到能烤熟士兵的配給牛肉，那頂真皮做的高帽子能吸收十倍的陽光，把士兵的腦袋烤昏。[[22]](#_22_NAM_1994_01_215__Bell_letter)

英法聯軍駐扎在瓦爾納周圍的平原上，等待來自錫利斯特拉的戰事消息。因為整天無事可做，兩國士兵開始在附近的酒館和妓院尋樂。天氣炎熱，加上軍中警告士兵不要飲用當地的水，造成了大規模的瘋狂飲酒，特別是當地的拉克酒（raki），既便宜酒勁又大。“成千的英國人和法國人聚集在簡陋的酒館，”保羅·德·莫萊尼寫道，“我們國家所有的葡萄酒和白酒都倒給了這群鬧哄哄的醉鬼……土耳其人站在家門口外，面無表情也毫不驚訝地看著這些上天派來保衛他們的怪人。”市鎮里醉酒士兵之間打架斗毆是家常便飯。蘇格蘭燧發槍近衛團（Scots Fusilier Guards）的一位副官休·菲茨哈丁·德拉蒙德（Hugh Fitzhardinge Drummond）在從瓦爾納寫給他父親的信中說：

我在高地團（Highlanders）的朋友們喝起酒來像魚一樣，我們部隊的士兵……比他們在斯庫臺（Scutari）[‡‡‡](#_______Jun_Shi_Tan_Ding_Bao_De_T)時喝得還要多。朱阿夫們是你可以想象的舉止最惡劣、最無法無天的人，他們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就在前天他們還處決了一名士兵，上個星期一個文森獵兵（Chasseur de Vincennes）差點被一群喝醉的混混用一把短劍砍成兩半。法國人喝得厲害，我覺得和我們的士兵們喝得一樣多，而且喝醉后更加不聽命令。

瓦爾納居民的抱怨越來越多。這里以保加利亞人為主，土耳其人雖然是少數，但數量也不少。讓他們生氣的是，英法士兵到穆斯林人開的飯館要酒喝，一旦被告知飯館不賣酒馬上就訴諸暴力。土耳其人也許會想這些號稱來保衛他們的人或許比俄羅斯暴徒更危險，以下是在君士坦丁堡的英國海軍軍官阿道弗斯·斯萊德的觀察：

法軍士兵在祈禱期間闖進清真寺，色迷迷地看著披著面紗的婦女，毒死街頭的狗……在港口射殺海鷗，在街道上向鴿子開槍，模仿嘲笑清真寺尖塔里宣禮員的呼喚聲，開著玩笑砸倒墓碑用來鋪路……土耳其人聽說他們來自文明之地，現在真的看到了所謂的文明人，卻讓他們萬分驚愕。搶劫、醉酒、賭博、嫖妓，一切都在東方的艷陽下肆無忌憚地發生著。[[23]](#_23_A__Slade__Turkey_and_the_Cri)

在瓦爾納周圍的平原上，還駐扎著土耳其軍隊，就在英軍營地旁邊，英國人立刻對他們產生了不好的印象。“我看到的土耳其人還不多，但已讓我覺得他們是很糟糕的盟友，”拉格倫的副官金斯科特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我敢肯定他們是世上最出色的騙子。如果他們告訴你他們有十五萬人馬，只要調查一下就會發現其實不過是三萬人。所有的話都這樣被夸大了。而且從我所了解到的情況看，我不明白為什么俄羅斯人不能輕松擊垮他們。”法國人也瞧不起土耳其軍隊，盡管朱阿夫部隊里因為有很多阿爾及利亞人，所以和土耳其人建立了良好的關系。路易·努瓦爾認為英軍士兵對土耳其人持有種族主義和帝國主義態度，使得他們在蘇丹的軍隊中廣受仇視。

英軍士兵以為他們到土耳其來，不是為了救助，而是來征服的。在加里波利，他們經常為了消遣，在沙灘上找一個土耳其人來逗弄取樂：在他周圍的地上劃一個圓圈，告訴他這代表了土耳其；然后他們命令土耳其人離開這個圓圈，將它劃為兩半，一半叫作“英格蘭”，另一半叫作“法國”；然后將他推到一個叫作“亞洲”的地方。[[24]](#_24_NAM_1973_11_170__Kingscote_l)

殖民者的偏見造成西方列強不愿意充分借助土耳其軍隊。拿破侖三世認為土耳其人懶惰腐化，英國駐巴黎大使考利勛爵給拉格倫提出的忠告是“沒有一個土耳其人值得信任”，可以承擔任何關乎國家安全的軍事任務。英法軍隊的指揮們都認為土耳其人只能在要塞堡壘的屏障后面作戰，雖然可以做一些類似挖戰壕的輔助工作，但是缺乏必要的紀律和勇氣，不能和歐洲軍隊在開放的戰場上并肩作戰。[[25]](#_25_J__Howard_Harris__Earl_of_Ma)土耳其人成功地守住了錫利斯特拉（當時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英國軍官的功勞）這一事實并沒有改變這些種族主義態度，當主戰場轉移到克里米亞之后，這樣的傾向變得更為明顯。

\* \* \*

事實上，土耳其人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守住了錫利斯特拉。在6月22日，俄軍發起了最后一次攻勢。21日早晨，戈爾恰科夫帶領他的參謀們視察了“阿拉伯的塔比亞”棱堡前的俄軍戰壕，第二天的總攻將從這里開始。托爾斯泰對戈爾恰科夫十分敬佩，后來在創作《戰爭與和平》時，他把戈爾恰科夫作為庫圖佐夫將軍（General Kutuzov）的原型。“那天早晨，我第一次看到他面對戰火，”他在給哥哥尼古拉的信中寫道，“你能看到他是如此專注于戰場大局，完全沒有注意到子彈和加農炮彈在周圍飛舞。”為了削弱土耳其軍隊的抵抗，俄軍的五百門大炮一整天都在炮擊對方的陣地堡壘，一直持續到夜幕降臨。總攻定在凌晨三點開始。“我們都在那里，”托爾斯泰寫道，“和每一次大戰前夕一樣，我們都假裝不去考慮第二天將跟其他日子有什么不同，然而我很肯定，在我們的心底深處，想到明天的總攻，每個人都有一點點（不是一點點，而是明顯的）焦慮。”

你知道的，尼古拉，開戰前的那段時間是最不舒服的，那是唯一一段你有工夫感覺害怕的時間，而恐懼是最令人不快的感覺之一。當清晨來臨，離總攻的時刻漸近，恐懼漸消。快到三點，在等待信號火箭升空發起總攻信號的時候，我已處于心情非常好的狀態，如果這時候有誰告訴我進攻取消了，我會感到非常難過。

他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凌晨兩點，戈爾恰科夫的一名副官給他送來一個消息，命令他取消圍困。“我很肯定，我敢毫無疑義地說，”托爾斯泰向他哥哥寫道，“所有收到這個消息的人，無論士兵還是軍官或將軍，都認為這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消息。更令人遺憾的是，根據常從錫利斯特拉為我們帶回消息的間諜報告（我自己常有機會和他們交談），一旦我們面前的這座堡壘被攻克——沒有人懷疑我們不會成功——錫利斯特拉最多能守兩到三天。”[[26]](#_26_Tolstoy_s_Letters__vol__1__p)

托爾斯泰不知道或不愿意考慮的是此時已有三萬法軍、兩萬英軍和兩萬土耳其部隊準備好隨時增援錫利斯特拉。與此同時，奧地利已在塞爾維亞邊境調集了二十萬部隊并向沙皇發出最后通牒，要求俄軍撤離多瑙河流域兩公國。奧地利實際采取的是一種傾向西方聯盟的武裝中立立場，通過動員哈布斯堡的軍隊來迫使俄羅斯撤離多瑙河。由于俄羅斯占領多瑙河流域兩公國的舉動越來越像是領土并吞，奧地利擔心會因此激起本國境內的塞爾維亞人起義。如果奧地利真的從西部向俄軍發動進攻，很有可能會切斷俄軍的多瑙河補給線路并阻斷其主要撤退線路，這樣的話，俄軍將面對南部聯軍的進攻而沒有退路。為了保住俄軍，沙皇別無選擇，只能撤退。

奧地利的行動讓尼古拉深深地感到背叛。1849年匈牙利人起義時，俄羅斯還曾出兵救助。他對比他小三十多歲的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有一種作為父輩的喜愛，覺得對方應該對他有所感激才對。在收到奧地利的最后通牒時，他的悲哀和震驚之情溢于言表，將一幅弗蘭茨·約瑟夫的肖像倒掛在墻上，在后面親手用德語寫：“你這個忘恩負義的人！”他在7月份告訴奧地利大使艾什泰哈齊伯爵（Count Esterhazy），自己為奧地利皇帝所做的一切已經完全被皇帝忘記了，“因為兩國君主之間互以對方帝國福祉為念的信任已不再有，兩人之間的親密關系也將不再存在”。[[27]](#_27_A__Tiutcheva__Pri_dvore_dvuk)

沙皇寫信向戈爾恰科夫解釋了他下令取消圍困的原因。和其他信件不同，在這封信中，尼古拉展露了許多他個人的想法：

我親愛的戈爾恰科夫，多么讓人悲傷痛苦，我被迫同意伊萬·費奧多羅維奇[帕斯克維奇]親王一直堅持的看法……在做了這么多努力，失去了這么多勇敢的靈魂之后，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現在不得不撤軍——我不需要告訴你這對我意味著什么。你自己可以判斷！！！但是當我查看地圖時，我怎么能不同意他的看法呢。現在危險已不再緊迫，你能夠給厚顏無恥的奧地利人一個嚴厲的懲罰。我只是擔心撤退會打擊我們隊伍的士氣。你必須鼓舞他們的精神，讓他們明白有時候撤退是更好的辦法，可以讓我們在未來發起進攻，就像1812年那樣。[§§§](#SSSSSS_Zhi_1812Nian_E_Fa_Zhan_Zh)　[[28]](#_28_Bogdanovich__Vostochnaia_voi)

俄軍開始從多瑙河流域撤退，土耳其軍隊聞風而動在后面追擊，俄軍不得不沿途阻擋。俄軍已疲憊不堪、士氣低落，許多士兵好多天沒有吃東西，傷病人數巨大，無法全部帶回，成千的士兵被丟棄給土耳其人。7月7日，土耳其軍隊（許多由英國軍官指揮）從魯塞渡過多瑙河，在英國炮艦的支援下，向久爾久要塞發起進攻，俄軍損失了三千人。戈爾恰科夫率領從錫利斯特拉撤下的部隊前來增援，但很快不得不命令全軍撤退。當英國國旗飄揚在久爾久的城墻上時，土耳其士兵開始對殘留的俄軍士兵進行瘋狂報復，殺死了超過一千四百名傷員，砍下他們的腦袋，肢解他們的尸體，奧馬爾帕夏和英國軍官則在一邊袖手旁觀。[[29]](#_29_Jouve__Guerre_d_Orient__p__1)

土耳其人的報復行動帶有鮮明的宗教色彩。一旦城內的俄軍被掃除干凈，土耳其士兵（巴什波祖克和阿爾巴尼亞人）就開始洗劫基督教居民區的民宅和教堂。以保加利亞人為主的全部基督教人口都已經隨俄軍部隊一起逃離了久爾久，他們在俄軍向北撤離時，匆忙收拾包袱推著小車全家老小跟在后面。一名法國軍官描述淪陷幾個星期之后的久爾久：

俄軍在撤離時，全部一萬兩千人口中只有二十五個居民留了下來！只有幾間屋子還是完好的……盜賊們在洗劫民居之后還不滿足，幾座教堂都被搶了。我親眼看到一座希臘教堂內的可怕景象，一名年邁的保加利亞司事正在清理被打破的神像和教堂的窗子，雕塑、燈和其他圣器就這樣堆在那里。我打著手勢問他這是誰干的，是俄羅斯人還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佬”（Turkos），他緊咬牙關回答。他說話的語氣讓我明白，如果哪一天有一個巴什波祖克人落在他手上，是不會得到饒恕的。[[30]](#_30_Jouve__Guerre_d_Orient__pp)

俄軍每經過一個市鎮，害怕土耳其人報復的當地人就加入難民行列，一路上都是混亂驚恐的景象。成千上萬的保加利亞人離開村子、趕著牲口加入逃難隊伍。由于難民的小車堵了路，俄軍不得不放慢撤退的速度。戈爾恰科夫一度考慮派士兵擋住難民，不讓他們上路，但是他手下的高級軍官說服他不要這么做。最后一共有差不多七千個保加利亞家庭撤離到了俄羅斯境內。托爾斯泰在7月19日抵達布加勒斯特后，給他姨媽寫信描述了他在一個村莊看到的景象：

我從營地到一個被[土耳其人]破壞的村莊去找一些牛奶和水果。[戈爾恰科夫]親王告訴保加利亞人，只要他們愿意，就可以和俄軍一起渡過多瑙河成為沙皇的臣民。話音剛落，整個村子的人就都行動起來了，每個人都帶上他的妻子、孩子和牛馬來到橋邊準備過河。當然我們不可能把他們都帶上，親王沒有辦法，只能拒絕后到的人，你應該看一下他是多么傷心。那些可憐的人派出代表來求情，他親自和每個人交談，試圖向他們解釋自己是多么無可奈何，提議他們拋棄小車和牲畜，只身渡河，并向他們擔保，他會提供生活費直到他們抵達俄羅斯，他還自掏腰包雇用船只運送這些人。[[31]](#_31_Tolstoy_s_Letters__vol__1__p)

混亂的景象同樣出現在布加勒斯特。許多有叛心的俄軍士兵趁亂開了小差躲到城中，為此軍事當局發布公告，威脅居民交出逃兵，否則將面臨懲罰。原來加入俄軍的瓦拉幾亞志愿兵現在已經消失不見了，許多人逃到南方加入英法土聯軍。在撤離布加勒斯特前，俄軍發布沙皇公告，警告“背信棄義的瓦拉幾亞人”：

沙皇陛下不相信那些聲稱自己是東正教徒的人會投靠一個非基督教政府。即使瓦拉幾亞人因為受歐洲人影響太深，不明白這一點而投靠偽教，沙皇亦不能放棄上天賦予他作為東正教領袖的使命：把那些以基督教作為自己唯一信仰的人，也就是希臘人，從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解救出來。自登基以來，沙皇陛下就一直秉持這一信念，現在這一時刻已經到來，沙皇陛下將實現他計劃多年的宏圖，不管無能的歐洲國家的企圖是什么。那些背信棄義的瓦拉幾亞人已讓沙皇陛下震怒，總有一天，他們將為自己的不忠不義付出極高的代價。

7月26日，戈爾恰科夫向聚集在布加勒斯特的波雅爾（boyar）[¶¶¶](#PPP_Bao_Jia_Li_Ya_Zui_Gao_Yi_Ji)宣布了沙皇的公告，并加上了自己的告別語：“先生們，我們現在暫時離開布加勒斯特，但我希望很快就會回來——就像1812年那樣。”[[32]](#_32_Jouve__Guerre_d_Orient__p__1)

對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斯拉夫派來說，俄羅斯進軍巴爾干是一場解放斯拉夫人的戰爭，他們對俄軍的撤離感到非常震驚，認為這是對他們理想的背棄，因此感到十分沮喪。俄羅斯作家康斯坦丁·阿克薩科夫（Konstantin Aksakov）夢想著建立一個在俄羅斯領導下的斯拉夫聯邦，他曾以為俄土之戰的結果將是十字架高懸在君士坦丁堡的圣索菲亞頂端。從多瑙河撤軍讓他感到“厭惡和羞恥”，他在給弟弟伊萬（Ivan）的信中解釋道：

這讓人覺得我們撤離的是東正教信仰。如果這是因為我們不相信圣戰，或是因為我們從一場圣戰中退出，那么這將是俄羅斯建國以來最令人羞恥的時刻——我們打敗了敵人，卻無法戰勝自己的恐懼。現在應該如何是好！……我們正在從保加利亞撤退，但是那些可憐的保加利亞人該怎么辦？保加利亞各地教堂上的十字架又會怎么樣？……俄羅斯！如果你背離上帝，上帝就會拋棄你！俄羅斯，你放棄了上帝賦予你的保衛神圣信仰、解救受苦兄弟的使命，現在上帝之怒將降臨在你頭上！

和許多斯拉夫派一樣，阿克薩科夫兄弟將撤軍的責任歸咎于外交部長、“德國人”涅謝爾羅迭。在民族主義者的圈子里，他被看作背叛俄羅斯的賣國分子，而且還是“奧地利代言人”。泛斯拉夫主義者和他們的領袖波戈金一樣，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沙龍上活動，希望能勸說沙皇撤銷撤軍命令，讓俄羅斯獨自與奧地利和西方列強作戰。他們為俄羅斯能夠獨自對抗歐洲而欣喜不已，相信如果俄羅斯能為斯拉夫人的解放事業與西方打一場圣戰，將成功擔當起救世主的角色。[[33]](#_33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vol)

在俄軍撤離的同時，奧地利軍隊開始進入瓦拉幾亞恢復秩序。一支一萬兩千人的奧地利部隊在科羅尼尼將軍（General Coronini）的帶領下，一直推進到布加勒斯特，但是在那里他們與土耳其軍隊發生了沖突。土軍在俄軍撤離后已經占領了這座城市，自稱為“收復公國的總督”的奧馬爾帕夏不愿交出布加勒斯特。他本人就是一個叛逃到奧斯曼帝國的原奧地利子民，不可能指望他把自己辛苦占領的地盤拱手交給一個奧地利皇室的宮廷幕僚。科羅尼尼是奧地利皇帝的私人教師，代表了奧馬爾帕夏所痛恨的哈布斯堡皇室的一切。英法兩國也在背后支持奧馬爾帕夏，西方聯盟花了很大力氣終于說服奧地利加入戰爭，現在卻對奧地利的干預喜憂參半。他們很高興奧地利出手幫助驅逐俄軍，但是同時懷疑奧地利人打算長期占據多瑙河兩公國，以填補俄羅斯人離開后的政治真空，或者是通過犧牲西方利益來解決俄土沖突。西方國家對奧地利的猜疑變得越來越重，因為奧地利不僅阻止奧馬爾帕夏的部隊進入比薩拉比亞追擊俄軍（這是拿破侖三世傾向的方案），還讓原來俄羅斯任命的都督官復原職，顯然是為了向震怒中的沙皇示好。在英國和法國看來，奧地利出手救助多瑙河兩公國的舉動，并不是在扮演歐洲協調警察的角色，也不是為了伸張土耳其的主權，而是出于利己的政治動機。[[34]](#_34_P__Schroeder__Austria__Great)

一方面是為了對抗來自奧地利的威脅，另一方面是為了保障黑海沿岸的安全以備俄羅斯南部以及克里米亞的進攻，法國在7月下旬向多瑙河三角洲的多布羅加地區派出了一支部隊。這支派遣軍由優素福將軍（General Yusuf）指揮，下轄被法國人稱為“東方西帕希”（Spahis d’Orient）的巴什波祖克非常規軍，以及康羅貝爾將軍（General Canrobert）指揮的第一師、博斯凱將軍（General Bosquet）指揮的第二師和拿破侖親王（Prince Napoleon）[\*\*\*\*](#_____Na_Po_Lun_San_Shi_De_Tang_D)指揮的第三師這三個師的步兵。優素福原名朱塞佩·萬蒂尼（Giuseppe Vantini），1815年6歲時在意大利厄爾巴島（Elba）被來自北非的巴巴里（Barbary）海盜抓走，在突尼斯大公（Bey of Tunis）的宮中長大，后來成為西帕希騎兵的創建人和指揮官，被法國人雇傭參加征服阿爾及利亞的戰爭。他在阿爾及利亞的成功使他成為代表法國指揮巴什波祖克騎兵的理想人選。7月22日，他在瓦爾納組建了一個騎兵旅，主力為四千名奧斯曼帝國交給法國指揮的巴什波祖克人，以及其他各種非正規軍獨立連隊，包括由法蒂瑪·哈努姆（Fatima Khanum）指揮的庫爾德（Kurdish）騎兵。被稱為“庫爾德斯坦圣女”（Virgin of Kurdistan）的哈努姆已經七十歲，她率領部落中的追隨者，以刀劍和手槍為武器，舉著一面綠色的穆斯林戰斗旗幟。優素福喜歡用圣戰來鼓舞士氣，這樣可以給手下的士兵一個戰斗的目標，而不只是為了戰后的搶劫，法國軍事當局已下決心終止這種以掠劫為誘惑的傳統。“我們是來保衛蘇丹，我們的哈里發的。”一群巴什波祖克人對路易·努瓦爾說，他們所屬的朱阿夫部隊也加入了優素福派遣軍從瓦爾納向北進發。“如果我們為他戰死，而不是為了軍餉上前線，我們死后將直接上天堂；如果我們收了錢才打仗，那么我們中誰也沒有權利上天堂了，因為我們已經在人間得到了酬勞。”[[35]](#_35_La_Vicomte_de_Noe__Les_Bachi)

然而，即使上天堂的許諾也不能保證優素福騎兵的紀律。他們剛收到命令從瓦爾納出發，就有巴什波祖克人開始脫隊，聲稱他們不會在外國軍官的指揮下作戰（雖然優素福說阿拉伯語，但是他手下的敘利亞、土耳其和庫爾德士兵都聽不懂他的突尼斯阿拉伯語）。在圖爾恰（Tulcea），先遣隊的士兵一看到哥薩克騎兵立刻作鳥獸散，留下法國軍官獨自應戰，結果他們全部陣亡。28日，優素福的部隊打敗了哥薩克騎兵，迫使對方撤退，但是這些人獲勝之后立刻忘了軍紀，開始洗劫村莊，殘殺基督徒，還把被害者的頭顱割下拿回去找優素福將軍領賞——這是土耳其軍隊的傳統，在圣戰期間，被打敗的異教徒包括平民的頭顱可以被拿來領賞。有些士兵甚至殺害基督教婦女兒童，肢解尸體來換賞金。[[36]](#_36_Noe__Les_Bachi_Bazouks__pp)

第二天，優素福派遣隊中的一批士兵染上了霍亂。多瑙河三角洲的沼澤和湖泊中疾病橫行，士兵的死亡率讓人擔心。因為患上霍亂而脫水，加上多日在烈日下行軍，士兵們紛紛在路邊倒下身亡。優素福的部隊很快瓦解，士兵因擔心染上霍亂而逃跑，要不然就是在樹蔭處躺下然后就再也沒起來。優素福下令撤退。當8月7日這支隊伍終于回到瓦爾納時，就只剩下一千五百人了。

瓦爾納也出現了霍亂，其實所有地方都有霍亂，因為1854年夏天，霍亂席卷了整個東南歐。法軍軍營首先被感染，然后是英軍軍營。一陣熱風從內陸吹來，整個軍營被一層白色的石灰粉和死蒼蠅覆蓋，士兵中間開始出現惡心腹瀉，有了這些癥狀就只能在帳篷里躺下等死。因為對病因無知，士兵們毫無提防，繼續飲用被污染的生水。不過有些人對霍亂有一定了解，比如朱阿夫士兵就在北非遇到過這種病，他們知道應該以酒代水，或是煮開水之后沖咖啡喝（法軍每天飲用大量咖啡）。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霍亂經常在倫敦和其他英國城市發生，但是直到1880年代人們才把不良的衛生條件和霍亂聯系起來。一位名叫約翰·斯諾（John Snow）的倫敦醫生發現飲用煮開的水能夠防止霍亂，但是他的發現基本上被忽視了。在瓦爾納，霍亂被認為是附近湖泊的瘴氣、過度飲酒或食用軟水果導致的。軍事當局完全忽略了基本的衛生條件：廁所里糞便四溢，動物尸體在烈日下任由腐爛。得了病的人被送到老鼠橫行的軍營，照顧他們的勤務兵疲于應對、精疲力竭，后來在8月有一小批法國修女前來照顧病人。死去的人被裹上被單埋在一個大坑里，后來又被土耳其人為了偷裹尸布而挖出來。到8月的第二個星期，已有五百名英軍士兵死于霍亂；在法軍營地，死亡率一度達到每天六十人。[[37]](#_37_C__Mismer__Souvenirs_d_un_dr)

這時候大火又降臨了瓦爾納。第一場大火發生在8月10日晚上，從老城的商業街區開始，很快蔓延到附近的港口，而那里剛好存放著準備裝船的盟軍物資。幾乎可以肯定，縱火的是同情俄羅斯的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在起火點附近抓住了幾個身帶黃磷火柴的人。當英法兩軍士兵帶著水泵趕來時，半個城市已被大火席卷。滿是朗姆酒和葡萄酒的商店和碼頭在火中爆炸，酒精在街道上四處流淌，應該負責救火的人卻在水溝里舀酒喝。當大火終于被控制住時，盟軍的物資已經受到嚴重損壞。“瓦爾納存放著整個軍隊的所有彈藥、所有物資、所有裝備，”埃爾貝在8月16日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法國人、英國人和土耳其人的火藥庫成了一片火海。城鎮大部分被夷為平地，士兵們的希望也隨之煙消云散。”[[38]](#_38_M__Thoumas__Mes_souvenirs_de)

\* \* \*

大火之后，幸存的物資僅夠盟軍八天所需。很明顯，盟軍必須盡快離開瓦爾納，不然就會被霍亂和饑餓摧毀。

現在既然俄軍已經從多瑙河公國撤退，照理說英法聯軍可以以勝利者的姿態打道回府了。戰爭可以就此告一段落，奧地利和土耳其軍隊可以作為維和部隊占領兩公國（8月中時，兩國已經劃好了各自的占領區，同意共同擁有布加勒斯特的控制權），同時西方列強還可以通過威脅干預迫使俄羅斯承諾不再入侵土耳其領土。那么，既然戰爭已經打贏了，為什么盟國還要繼續入侵俄羅斯呢？克里米亞戰爭到底為什么會發生？

讓盟軍指揮官們感到生氣的是俄軍的主動撤退。當英法兩國千里迢迢把軍隊帶到土耳其之后，俄軍卻放棄了多瑙河流域兩公國，這讓英法指揮官們覺得失望，用圣-阿諾的話說是“勝利的果實被搶走了”，他們想達到一個軍事目標來說明他們的努力沒有白費。在軍事動員以來的六個月時間內，盟軍士兵幾乎沒向敵人開過槍，因此遭到土耳其人的譏諷、本國國民的嘲弄。“在那兒，”馬克思在8月17日《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一篇社論中寫道，“八九萬英法兩國士兵聚集在瓦爾納。指揮他們的，一個是威靈頓時代的軍事秘書，另一個是法國元帥（他的最大戰利品是在倫敦的典當行買到的，真的）——在那兒，法國人無所事事，英國人則以最快的速度幫助他們無所事事。”[[39]](#_39_K__Marx__The_Eastern_Questio)

在倫敦，英國內閣也覺得僅僅迫使俄軍撤出多瑙河地區不足以彌補已經做出的犧牲。帕默斯頓和他的“主戰派”不愿意在俄軍依然保持完整的情況下和俄羅斯談判。他們想要嚴重打擊俄羅斯的實力，摧毀其在黑海地區的軍事能力，從而不僅保障土耳其的安全，也讓俄羅斯再也不能威脅英國在近東地區的利益。強烈主戰的戰爭大臣紐卡斯爾公爵（Duke of Newcastle）在4月就已經說過，把俄羅斯趕出多瑙河流域兩公國，“但沒有讓其大傷元氣、再也不能憑借武力威脅土耳其，這樣的目標根本不值得英法兩國去爭取”。[[40]](#_40_A__Lambert__The_Crimean_War)

但是怎樣才能嚴重打擊俄羅斯的實力？英國內閣考慮了多種可能。他們認為進入比薩拉比亞追擊俄軍沒有什么意義，反而會將士兵置于霍亂的威脅下；法國人提出發動一場解放波蘭的戰爭，但是即使英國內閣里的保守派能被說服支持一場革命戰爭（這種可能性并不大），奧地利也肯定會反對。英國內閣也不贊同發動一場波羅的海海戰就能讓俄羅斯屈服這樣的說法。戰爭開始不久，指揮波羅的海盟軍艦隊的英國將軍查爾斯·內皮爾爵士（Sir Charles Napier）即得出結論，認為如果沒有能夠在堡壘附近的淺礁中航行的炮艦和迫擊炮艦的話，盟軍艦隊不可能攻克守衛圣彼得堡的堅固海上要塞喀瑯施塔得，甚至連赫爾辛福斯（Helsingfors，赫爾辛基的瑞典語名稱）港口外防守較弱的芬蘭堡（Sveaborg）都對付不了。[††††](#_____Shi_Shi_Zheng_Ming_Zhe_Shi)有一陣子還流傳著在高加索地區向俄軍發起進攻的說法，一批高加索叛軍的代表曾訪問駐守在瓦爾納的盟軍，提出如果盟軍派出軍隊和艦船到高加索地區，他們保證動員穆斯林發動一場反抗俄羅斯的戰爭。奧馬爾帕夏支持這個建議。[[41]](#_41_L_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但是英國內閣認為，所有這些行動對俄羅斯造成的打擊，都不如失去塞瓦斯托波爾和黑海艦隊那么大。所以當俄軍從多瑙河兩公國撤軍時，英國內閣已做出決定，認為入侵克里米亞是唯一能對俄羅斯做出有效一擊的辦法。

克里米亞作戰計劃最初是由英國海軍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在1853年12月提出的，他在錫諾普海戰之后，準備了一份海軍作戰方案，目標是通過快速一擊摧毀塞瓦斯托波爾港。“這是我心之所向，”他寫道，“俄國熊的犬牙必須拔掉。在它的黑海軍艦和武器全部被摧毀之前，君士坦丁堡都不會安全，歐洲和平不會有保障。”[[42]](#_42_Lambert__The_Crimean_War__p)格雷厄姆的計劃從來沒有正式呈送內閣，但是卻被內閣接受為其戰略的基礎。6月29日，紐卡斯爾公爵向拉格倫傳達了內閣入侵克里米亞的指示。他的語氣十分堅定：進攻克里米亞的遠征行動必須馬上開始，任何原因，“除非是實在不能克服的障礙”，都不能推遲進攻塞瓦斯托波爾、摧毀俄羅斯黑海艦隊的行動，不過為了協助對克里米亞的進攻，可能有必要對高加索的俄軍發起攻擊。這份指示給拉格倫的印象是內閣已達成一致意見，而且除了入侵克里米亞沒有其他選擇。[[43]](#_43_WO_28_199__Newcastle_to_Ragl)但其實內閣成員間在入侵克里米亞的可行性上看法有沖突，最終接受這一方案是兩派之間妥協的結果。其中以阿伯丁勛爵為代表的一派希望發動一場有限的戰爭恢復土耳其主權，另一派以帕默斯頓為代表，把遠征克里米亞作為對俄羅斯發動大規模戰爭的起點。與此同時，英國報刊正在向內閣施加壓力，要求對俄羅斯做出致命一擊，而摧毀塞瓦斯托波爾的黑海艦隊就成了好戰的英國公眾心目中具有象征意義的勝利。他們無法想象因為俄軍已經從多瑙河撤軍，所以沒有必要進攻克里米亞。

“這場戰爭真正的主要目標，”帕默斯頓在1855年承認，“是抑制俄羅斯的侵略野心。我們參加這場戰爭的目的主要不是保衛蘇丹和土耳其的穆斯林，而是不讓俄羅斯插手。”在他的設想中，進攻克里米亞是一場長期戰爭的第一步，意在打擊俄羅斯在黑海地區以及高加索、波蘭和波羅的海的勢力。他在3月19日給內閣的備忘錄中就已經陳述了這些想法，其中他勾畫了肢解俄羅斯帝國的宏偉計劃。到8月底，戰爭擴大化的想法已在內閣成員中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他還和法國外交部長德魯安·德呂達成了非正式的一致意見：“小的戰果”不足以彌補這場戰爭必然帶來的人員損失，只有在多瑙河地區、高加索、波蘭和波羅的海發生“巨大的領土改變”，才會讓克里米亞戰爭值得一戰。[[44]](#_44_W__Mosse__The_Rise_and_Fall)

但是只要阿伯丁還是首相，帕默斯頓的主張就不可能成為盟軍的政策。8月8日，經過幾個月的談判，西方列強和奧地利終于同意了《四點方案》，其中列出了更多有限目標。根據這四點方案，盟國與俄羅斯之間實現和平的條件包括：

1．俄羅斯宣布放棄對塞爾維亞和多瑙河兩公國的領土要求，這些地區將被置于歐洲列強和高門的共同保護之下；

2．多瑙河對所有商業航行開放；

3．以“歐洲勢力平衡”為目標修改1841年的《海峽公約》（俄羅斯海軍在黑海地區的主導地位將被中止）；

4．俄羅斯放棄對土耳其基督徒的保護權，他們的安全將在五國（奧地利、英國、法國、普魯士和俄羅斯）與土耳其政府達成一致后得到保證。

《四點方案》的文字保守（否則奧地利不會滿意）但措辭又足夠模糊，讓英國人可以隨著戰爭的進行添加條件。此時英國雖想削弱俄羅斯的勢力，但還不知道應如何制定具體政策。事實上，奧地利不知道還有一個秘密的第五點，已經獲得英法兩國同意，允許兩國根據戰爭進展追加新的條件。對帕默斯頓來說，《四點方案》是保證奧地利和法國加入歐洲大聯盟，共同參與一場針對俄羅斯的開放式戰爭的辦法，即使將來征服克里米亞的目標已經實現，這場戰爭依然可以繼續擴大。[[45]](#_45_Schroeder__Austria__Great_Br)

帕默斯頓甚至為克里米亞制定了一個大致的長期計劃。他提議把這一地區交給土耳其，這樣就能和其他從俄羅斯手中奪回來的領土：亞速海周邊地區、切爾克斯、格魯吉亞和多瑙河三角洲連成一片。但是沒有幾個人和他有一樣的野心。拿破侖三世想占領塞瓦斯托波爾的目的，主要是為了有一個“光榮勝利”的結果，同時對俄羅斯入侵多瑙河流域兩公國做出懲罰。他的想法和英國內閣中大部分人相似，基本上假定一旦塞瓦斯托波爾失守，俄羅斯就會失去斗志，西方列強可借此宣告獲勝，并強迫俄羅斯接受停戰條件。但其實這樣的想法沒有什么道理，喀瑯施塔得和其他波羅的海要塞直接守衛圣彼得堡，而塞瓦斯托波爾是沙皇帝國的遙遠一站，沒有合理的理由可以認為一旦盟軍奪取這個港口沙皇就將屈服。正是因為無人質疑這一假設，所以當1855年塞瓦斯托波爾沒有被很快攻下時，盟軍仍然繼續以它為主要目標，使塞瓦斯托波爾戰役成為截至當時，軍事歷史上時間最長、代價最大的圍困。本來盟軍應該積極尋求其他途徑削弱俄羅斯陸軍，因為陸軍而非黑海艦隊才是俄羅斯對土耳其的真正優勢所在。[[46]](#_46_Schroeder__Austria__Great_Br)

發動克里米亞戰爭不僅在認識上是錯誤的，而且計劃和準備工作也都十分糟糕。做出決定時沒有任何情報，盟軍指揮官手里連份地圖都沒有，他們掌握的信息來自已經過時的游記，例如德·羅斯勛爵（Lord de Ros）的克里米亞旅行日記，以及亞歷山大·麥金托什少將（Major-General Alexander Macintosh）的《克里米亞日記》（Journal of the Crimea），都在1835年出版。這兩本書讓他們以為克里米亞的冬天非常溫暖，但其實已經有更新的書指出那里冬天其實很冷，例如1853年出版的勞倫斯·奧利芬特（Laurence Oliphant）的《1852年秋天的俄羅斯黑海沿岸》（The Russian Shores of the Black Sea in the Autumn 1852）。采納錯誤信息的后果是盟軍沒有準備冬天的被服和營房，而部分原因也是他們相信這將是一場速戰速決的戰爭，寒霜未至即可得勝回師。盟軍對克里米亞到底有多少俄軍一無所知（估計從四萬五千至八萬都有），也不知道俄軍的布防情況。盟軍艦船只能從瓦爾納運送六萬至九萬人到克里米亞，即使采用最樂觀的估計，也達不到軍事教科書推薦的圍困城市應該有三倍兵力要求的一半，這個運兵數字還是在不攜帶野戰醫院、軍用牲畜以及其他必需裝備的情況下算出來的。盟軍懷疑從多瑙河地區撤退的俄軍將被送往克里米亞，因此決定最好的策略是在撤退的俄軍還未抵達之前，全力一擊，占領塞瓦斯托波爾、消滅黑海艦隊、破壞港口軍事設施。他們估計如果對塞瓦斯托波爾的突襲不很成功的話，就有可能需要占領克里米亞與大陸之間的地峽彼列科普（Perekop）以阻止俄軍輸送援兵和物資。在6月29日的命令中，紐卡斯爾公爵要求拉格倫必須“絕不拖延”地執行這項任務，但是拉格倫拒絕執行，聲稱如果立刻前往，他手下的士兵將遭受克里米亞平原熱浪的折磨。[[47]](#_47_S__Harris__British_Military)

當啟程的日子迫近時，將領們開始臨陣退縮了，尤其是法軍指揮官，他們對這項任務抱有疑慮。紐卡斯爾的命令由法國戰爭部部長瓦揚元帥（Marshal Vaillant）抄送給了圣-阿諾，但是圣-阿諾對這項任務是否能夠成功有所懷疑，他的手下大部分也和他看法一致，都認為進攻塞瓦斯托波爾對海軍大國英國更有利。但是由于英法兩國的政客急切地希望發動一場攻勢來迎合公眾情緒，他們向軍事當局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加上想讓軍隊盡快離開霍亂肆虐的瓦爾納地帶，以上這些疑慮并沒有被認真考慮。到8月下旬，奧古斯特·圣-阿諾得出結論，與其讓士兵們在瓦爾納死于霍亂，還不如對塞瓦斯托波爾發起進攻，說不定犧牲的人數還少些。[[48]](#_48_E__Boniface__Count_de_Castel)

對許多官兵來說，收到登船的命令是一種解脫，他們“寧愿像一個男人那樣戰斗，也不愿意被饑餓和疾病打倒”，埃爾貝形容道。“軍官和士兵們對他們在這里的命運日益感到厭惡。”一名英國騎兵軍官羅伯特·波特爾（Robert Portal）在8月下旬寫道。

除了掩埋戰友外，他們什么都干不了。他們公開地說，他們被帶到這里，沒有讓他們打仗，卻讓他們在這個到處是霍亂和發燒的地方病倒、死去……我們聽說在法軍營地發生了嘩變，士兵們發誓說他們愿意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唯獨不想在這兒等死。

配屬法軍參謀部的英軍上校羅斯確認了法軍營地發生嘩變的傳聞，他在9月6日向倫敦匯報，法國指揮官“沒有認真考慮士兵的情緒波動和反抗意志”。[[49]](#_49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所以是該把士兵們送到前線去的時候了，否則他們不是被病魔擊垮，就是起來造反。8月24日，士兵開始登船。先由小船把步兵擺渡到軍艦上，然后是騎兵和他們的軍馬、彈藥車、裝物資的馬車、軍用牲畜，最后是重炮。許多來到碼頭等待登船的士兵已經病得不輕或是體力不支到扛不動背包和槍支，只好讓身體較好的戰友幫忙。法軍沒有足夠的運兵船，裝不下三萬士兵，于是有些人就擠到了戰艦上。如果此時遭到俄羅斯黑海艦隊的攻擊，這些戰艦根本無法還手。保護盟軍艦隊的任務全部落到了英國皇家艦隊身上，在航行中，兩側是皇家海軍的戰艦，中間是運載英國軍隊的二十九艘蒸汽機船和五十六艘船只。在碼頭邊還出現了一幕讓人難過的景象：英軍宣布不是所有的隨軍妻子都能被帶上船[‡‡‡‡](#_________Ying_Jun_Zhun_Xu_Mei_Ge)，這些隨軍妻子悲傷欲絕，為了能登上船避免與丈夫分離而與周圍的人扭打起來，有些則被偷偷帶上了船。在艦隊離岸的最后時刻，當指揮官們得知英軍沒有給這些留在瓦爾納的女人提供任何保障時，出于同情，終于讓大部分人都上了船。

9月2日，登船完成了，但是由于天氣惡劣，艦隊到7日才起航。這支有四百條船的船隊由蒸汽機船、戰艦、運兵船、帆船、軍用拖船和其他小一些的船只組成，指揮官是英國海軍少將埃德蒙·萊昂斯爵士（Rear Admiral Sir Edmund Lyons），他坐鎮的“阿伽門農號”（HMS Agamemnon）[§§§§](#SSSSSSSS_A_Qie_Men_Nong_Shi_Gu_X)是皇家海軍第一艘采用螺旋槳推進的蒸汽機船，配備九十一門大炮，航速達每小時十一海里。“士兵們都記得9月7日這個美麗的早晨，”歷史學家金萊克寫道，

月光依然在海面上漂浮，但是在無數甲板上，士兵們已能看到東方的黎明。夏日的輕風從岸上飄來。在五點差一刻時，“布里坦尼婭號”（Britannia）一聲炮響，發出了起錨的信號。空氣中到處都是蒸汽機船煙囪里冒出的煙霧，難以想象如何能夠收到信號，信號又會從哪兒來。但是現在能清楚看到“阿伽門農號”起航了，所有桅桿上都掛著信號旗——萊昂斯就在那條船上，指揮著整個船隊。法國的蒸汽戰艦先行，隨后是他們的運輸船和大批其他船只。法軍艦船出港速度比英軍快，秩序也更好。他們的許多運兵船都非常小，不得不擠滿了人。我們的運輸船排成五列并行，每列只有三十條船。在這之后是保衛整個船隊的英軍戰艦，排成一列，緩緩地駛出海灣。[[50]](#_50_Kinglake__Invasion_of_the_Cr)

[\*](#_66) 今布勒伊拉（Brăila），屬羅馬尼亞。——譯注

[†](#_67) 今拼寫為Giurgiu，屬羅馬尼亞。——譯注

[‡](#_68) 其中一門現陳列在普里莫爾斯基大道上的杜馬（Duma）大樓前。——原注

[§](#SS_5) 穆薩帕夏陣亡后，土耳其士兵的抵抗意志就更帶有宗教色彩了。當時他正在主持一場晚禱，祈求上天顯靈保佑錫利斯特拉，被一發炮彈直接命中身亡。——原注

[¶](#P_5) 當時他的手臂在沒有施加麻醉的情況下被截，拉格倫還要回了被截掉的胳膊，把手指上他妻子送給他的戒指取了下來。這個故事使他的英勇無畏一時傳為美談。——原注

[\*\*](#_69) 第一批朱阿夫部隊的士兵招募自柏柏爾（Berber，譯者注：生活在北非的原住民）山地部落之一扎瓦阿（Zouaoua）。后來加入朱阿夫部隊的法國士兵沿用了原來的摩爾人風格（Moorish）裝束和綠色頭巾。——原注

[††](#_70) 圣西爾軍校由拿破侖始創，建于巴黎郊外的圣西爾。后與諸兵種軍校和行政技術軍校共同組成法國陸軍初級軍校群，現位于莫爾比昂省。——編注

[‡‡](#_71) 當時由政府出資收容窮人的場所，一般條件惡劣，被公眾視為一種羞辱和懲罰。——譯注

[§§](#SSSS_4) 軍務大臣負責軍隊管理，但其職權范圍不包括軍事政策。此職位通常低于戰爭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War）一職，但有時也是英國內閣成員。——譯注

[¶¶](#PP_4) 即皇家蘇格蘭人團（Royal Scots）。——譯注

[\*\*\*](#_72) 一本英國諷刺漫畫雜志。——譯注

[†††](#_73) 一種高頂硬皮帽，以阿爾伯特親王的名字命名，據說是由他設計的。——原注

[‡‡‡](#_74) 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軍營，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曾歸英軍使用。——譯注

[§§§](#SSSSSS_2) 指1812年俄法戰爭時俄羅斯先撤退然后反擊打敗入侵的拿破侖軍隊。——譯注

[¶¶¶](#PPP_1) 保加利亞最高一級的貴族。——譯注

[\*\*\*\*](#_75) 拿破侖三世的堂弟。——譯注

[††††](#_76) 事實證明這是對的。8月8日內皮爾指揮盟軍艦隊對位于瑞典和芬蘭之間奧蘭群島上的博馬松德（Bomarsund）要塞發起了進攻，主要目的是希望將瑞典拉入戰爭，因為一旦進攻俄羅斯首都，瑞典軍隊的支持將是必需的。盟軍艦隊的狂轟濫炸把要塞變成了一片廢墟，俄軍指揮官和手下的兩千名士兵投降。但是博馬松德不過是小勝，與喀瑯施塔得或圣彼得堡無法相比，因此盡管英國人一再逼迫，瑞典人還是不為所動。除非盟軍在波羅的海戰場投入更多資源，否則他們是不可能說服瑞典參戰的，更別說威脅圣彼得堡了。但是對波羅的海的重要性英法之間有分歧，英國人比較起勁，尤其是帕默斯頓，占領芬蘭是他肢解俄羅斯帝國的宏大計劃中的一部分；但是法國人遠遠沒有那么熱心，他們認為波羅的海的戰斗主要是為英國的利益服務，因此不愿意投入更多兵力。對拿破侖三世來說，克里米亞才是法國的作戰重心，波羅的海戰場并不重要，不過是用來牽制俄軍，防止沙皇向克里米亞投入更多兵力的。——原注

[‡‡‡‡](#_77) 英軍準許每個連隊帶上四個士兵的妻子前往加里波利。這些女人由軍隊（“出于好意”）配備供給，她們向部隊提供烹飪洗衣服務。——原注

[§§§§](#SSSSSSSS) 阿伽門農是古希臘出征特洛伊的海軍艦隊指揮。——譯注

注釋

[[1]](#_1_6)Tolstoy’s Letters,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38.

[[2]](#_2_6)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p. 96–97.

[[3]](#_3_6)‘Voina s Turtsiei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18 (1877), p. 327.

[[4]](#_4_6)RGADA, f. 1292, op. 1, d. 6, l. 68;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 273; ‘Vospominaniia kniazia Emiliia Vitgenshteina’, Russkaia starina, 104 (1900), p. 190.

[[5]](#_5_6)A. Khomiakov,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8 vols. (Moscow, 1900), vol. 8, p. 350.

[[6]](#_6_6)FO 78/1014, Cunningham to Stratford Canning, 4, 20, 23 and 30 Mar. 1854.

[[7]](#_7_6)E. Jouve, Guerre d’Orient: Voyage à la suite des armées alliées en Turquie,en Valachie et en Crimée (Paris, 1855), p. 115; FO 78/1008, Fonblanque to Stratford Canning, 27 Mar. 1854; FO 78/1014, Cunningham to Stratford Canning, 23 Mar. 1854.

[[8]](#_8_5)RGVIA, f. 9198, op. 6/264, cb. 6, d. 14, ll. 101, 104, 106.

[[9]](#_9_5)FO 78/1009, Fonblanque to Palmerston, 27 May 1854; Palmerston to Fonblanque, 10 July 1854.

[[10]](#_10_6)RGVIA, f. 846, op. 16, d. 5417, ll. 41–44;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p. 203–15; S. Plaksin, Shchegolovskii al’bom: Sbornik istoricheskikh faktov, vospominanii, zapisok, illiustratsii i.t.d. za vremia bombardirovki Odessy v 1854 (Odessa, 1905), pp. 43–7.

[[11]](#_11_5)RGVIA, f. 481, op. 1, d. 89, ll. 1–5; M. 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4 vols. (St Petersburg, 1876), vol. 2, pp. 89–93; 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2 vols. (Paris, 1858), vol. 1, pp. 111–15; J. Reid, Crisi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elude to Collapse 1839–1878 (Stuttgart, 2000), pp. 255–257; NAM 1968–03–45 (‘Journal of Captain J. A. Butler at the Siege of Silistria’).

[[12]](#_12_5)NAM 1968–03–45 (‘Journal of Captain J. A. Butler at the Siege of Silistria’); RGVIA, f. 846, op. 16, d. 5520, ch. 2, l. 62.

[[13]](#_13_5)Tolstoy’s Letters, vol. 1, pp. 39–40.

[[14]](#_14_5)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p. 445–7.

[[15]](#_15_5)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p. 82, 109; NAM 1973–11–170 (Kingscote letter, 15 May, p. 2).

[[16]](#_16_6)J.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0.

[[17]](#_17_5)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22.

[[18]](#_18_6)P. de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aris, 1860), pp. 58–9.

[[19]](#_19_6)The Times, 26 Apr. 1854.

[[20]](#_20_5)C. Bayley, Mercenaries for the Crimean: The German, Swiss, and Italian Legions in British Service 1854–6 (Montreal, 1977), p. 20. 有關英國軍隊里的愛爾蘭人，參見 D. Murphy, Ireland and the Crimean War (Dublin, 2002), pp. 17–25.

[[21]](#_21_5)NAM 1968–07–289 (Raglan to Herbert, 15 May 1854).

[[22]](#_22_5)NAM 1994–01–215 (Bell letter, June 1854).

[[23]](#_23_6)A. Slade,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p. 355.

[[24]](#_24_6)NAM 1973–11–170 (Kingscote letter, 29 Apr. 1854, p. 3);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12.

[[25]](#_25_5)J. Howard Harris, Earl of Malmesbury, Memoirs of an Ex-Minister, 2 vols. (London, 1884), vol. 1, p. 412; The Diary and Correspondence of Henry Wellesley, First Lord Cowley, 1790–1846 (London, 1930), p. 54.

[[26]](#_26_5)Tolstoy’s Letters, vol. 1, pp. 40–1.

[[27]](#_27_5)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9), p. 195;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Osterreichische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ser. 1, vol. 2 (Munich, 1980), p. 248.

[[28]](#_28_5)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vol. 2, pp. 107–8.

[[29]](#_29_5)Jouve, Guerre d’Orient, p. 121;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2, p. 56;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vol. 1, pp. 123–5.

[[30]](#_30_5)Jouve, Guerre d’Orient, pp. 108, 116.

[[31]](#_31_4)Tolstoy’s Letters, vol. 1, p. 41.

[[32]](#_32_5)Jouve, Guerre d’Orient, p. 123;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guerre, vol. 1, p. 127; FO 195/439, Colquhoun to Clarendon, 13 Aug. 1854.

[[33]](#_33_4)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1, pp. 454–5; M. Levin, ‘Krymsk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 in id.,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obshchestvennoi mysl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Leningrad, 1974), pp. 293–304.

[[34]](#_34_4)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207–9; R. Florescu,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pp. 284–6.

[[35]](#_35_4)La Vicomte de Noe, Les Bachi-Bazouks et les Chasseurs d’Afrique (Paris, 1861), pp. 9–11;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15.

[[36]](#_36_4)Noe, Les Bachi-Bazouks, pp. 34, 38–42, 56–68; J. Reid,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in the Collapse of the Ottoman Empire, 1780–1918’, Journal of Modern Hellenism, 10 (1993), pp. 143–52.

[[37]](#_37_4)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é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 34;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 30; FO 78/1009, Fonblanque to Palmerston, 10 June 1854; C. Hibbert, The Destruction of Lord Raglan: A Tragedy of the Crimean War, 1854–1855 (London, 1961), p. 164;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26;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p. 61–2.

[[38]](#_38_4)M.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92), pp. 107–9;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55.

[[39]](#_39_4)K. Marx,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9), p. 451.

[[40]](#_40_5)A.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1856 (Manchester, 1990), p. 106.

[[41]](#_41_4)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18–9.

[[42]](#_42_5)Lambert, The Crimean War, p. 84.

[[43]](#_43_2)WO 28/199, Newcastle to Raglan, 29 June 1854.

[[44]](#_44_2)W.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1871: The Story of the Peace Settlement (London, 1963), p. 1;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3.

[[45]](#_45_2)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p. 193–4.

[[46]](#_46_2)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 204; Lambert, The Crimean War, pp. 86–7.

[[47]](#_47_2)S. Harris,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1), p. 37;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36–7; 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 10; FO 881/550, Raglan to Newcastle, 19 July 1854.

[[48]](#_48_2)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90–1; L. de Saint-Arnaud, Lettres du Marechal Saint-Arnaud,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 462.

[[49]](#_49_2)Herbe,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p. 59; R. Portal,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1854–1855 (Winchester, 1900), pp. 17, 25; 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6 Sept. 1854.

[[50]](#_50_2)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2, pp. 148–9.

# 第七章 阿爾馬

很快，盟軍的船隊變成一長串，在黑海上形成了一片船桅森林，飄揚著黑色的濃煙和蒸汽。“仿佛是飄在水上的一座巨大的工業城市。”法國軍醫讓·卡布羅爾（Jean Cabrol）如此描述眼前這幅壯觀的景象。他是法軍總指揮圣-阿諾元帥的軍醫，當時圣-阿諾在“法國城市號”（Ville de France）上，已進入病危狀態。每一名法軍士兵都隨身攜帶八天的口糧，其中有米、糖、咖啡、豬油和餅干。在運兵船上，還能領到一條被單，讓他能躺在甲板上睡覺。英軍士兵的待遇比這差得多。“最糟糕的是，”英軍第五十團的一名列兵約翰·羅斯（John Rose）在從瓦爾納給父母的信中寫道，“我們有錢也買不到酒。我們每天有一磅半褐面包和一磅肉[\*](#__Yue_Yi_Jin_San_Liang_He_Mian_B)，但是當兵的沒有酒喝。”[[1]](#_1_J__Cabrol__Le_Marechal_de_Sai)

船上的士兵并不清楚他們正前往何方。在瓦爾納時，戰爭計劃是向他們保密的，于是各種謠言滿天飛。有些人認為他們正前往切爾克斯，另一些則認為是敖德薩或是克里米亞，但是沒有人確信等待他們的將是什么。他們既沒有地圖，對俄羅斯沿岸地形也沒有直接認識，從船上看到的陸地，對他們來說完全可能是非洲海岸，整個旅程讓他們覺得自己像是地理大發現年代歐洲探險船的水手一樣。因為無知，他們的想象就更加不著邊際，有些人相信他們上岸后，會在俄羅斯“叢林”中遇見熊和獅子。幾乎沒有人知道他們到底為什么參戰——除了“打敗俄羅斯人”和“為上帝的意愿而戰”，這是從兩名法國士兵的家書中摘錄出來的。如果羅斯的家書反映了當時的實際情況，那么許多士兵甚至不知道他們的盟軍到底是誰。“我們離思巴斯特波爾（Seebastepol）[†](#__Luo_Si_Xin_Zhong_Dui_Sai_Wa_Si)還有四十八小時航程，”他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

我們將去的地方離思巴斯特波爾六英里[‡](#___Yue_Jiu_Qian_Liu_Bai_Wu_Shi_L)遠，第一場戰斗將會面對土耳其人和俄羅斯人。除了英法聯軍外，還有三萬土耳其人和四萬哈斯特人（Hasterems）［即奧地利人］，戰斗很快就會打響。我們想敵人看到我們強大的火力就會放下武器投降，我希望上帝會很高興看到我們把一場亂子變成平安，會保住我的性命讓我回家，那時候我就能把這場仗的故事都講給你們聽。[[2]](#_2_P__de_Molenes__Les_Commentair)

船隊已經向克里米亞進發了，可指揮官們還不能就登陸地點達成一致。9月8日，蒸汽機船“卡拉多克號”（Caradoc）上的英軍總指揮拉格倫與“法國城市號”上的法軍總指揮圣-阿諾商議登陸地點，可是拉格倫因為只有一條胳膊，無法登上法國軍艦；而圣-阿諾因為胃癌病重已臥床不起，兩人只能通過下屬傳信交流。圣-阿諾最后終于同意拉格倫選擇的登陸地點卡拉米塔灣（Kalamita Bay），這是在塞瓦斯托波爾以北四十五公里的一處長沙灘。9月10日，“卡拉多克號”載著一群高級軍官，其中包括圣-阿諾的二把手弗朗索瓦·康羅貝爾將軍，前往克里米亞西海岸偵察。聯軍原來打算對塞瓦斯托波爾實行突然襲擊，但是選擇距離遙遠的卡拉米塔灣便使這一計劃不再可能。

為保護登陸部隊的側翼免遭俄軍攻擊，聯軍指揮官們決定先占領葉夫帕托里亞鎮（Evpatoria），這是那一帶海岸線上唯一可安全落錨的地點，還能提供淡水和其他物資。從海上望去，葉夫帕托里亞最大的特色是那里大量的風車。該鎮是一個繁榮的貿易中心，克里米亞草原上收獲的谷物在這里進行加工。鎮上的九千人口主要是克里米亞韃靼人、俄羅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和卡拉派猶太人（Karait Jews）[§](#SS_Ji_Sheng_Jing_Pai_You_Tai_Ren)，這些猶太人還在鎮中心興建了一座漂亮的猶太教堂。[[3]](#_3_A__de_Damas__Souvenirs_religi)

葉夫帕托里亞是聯軍占領的第一片俄羅斯土地，整個占領過程直截了當，甚至帶點兒喜劇色彩。9月13日盟軍艦隊逼近港口，鎮上的居民聚集在碼頭兩邊，在窗口或是屋頂上觀看。鎮長兼軍事指揮官兼防疫官兼海關總長、白發蒼蒼的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卡茲納切耶夫（Nikolai Ivanovich Kaznacheev）身穿全套禮服，佩戴勛章，與一群俄羅斯官員一起站在主碼頭的最前方迎接英法聯軍的戰場使者和翻譯。聯軍正式要求葉夫帕托里亞投降，鎮上除了幾個養傷的士兵外沒有俄軍駐防，因此卡茲納切耶夫完全不可能以武力抵抗，只能搬出文件條例來，毫無意義然而卻冷靜認真地堅持英法聯軍必須在鎮上的傳染病院處登陸，以便進行防疫隔離。第二天，一小支聯軍部隊占領了葉夫帕托里亞，向居民保證人身安全，堅持出錢購買他們在鎮上需要的東西，還允許居民如果愿意可以放假一天。這一地區的主要官員和地主都是俄羅斯人，在聯軍艦隊剛在海面上出現時，許多居民，特別是俄羅斯人，就把私人財物裝上車逃到了彼列科普，希望在克里米亞被敵軍切斷之前逃回大陸。克里米亞80%的人口是韃靼人，俄羅斯人對韃靼人的恐懼不亞于對聯軍的害怕。在逃往彼列科普的路上，許多俄羅斯人被韃靼土匪打劫、殺害，后者聲稱是在代表新成立的葉夫帕托里亞“土耳其政府”沒收俄羅斯人的財物。[[4]](#_4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9)

沿岸的俄羅斯人在恐慌中逃離，希臘人也緊隨其后。道路上擠滿了向北逃難的平民、車輛和牲畜，迎面而來的是從彼列科普南下的俄軍士兵。克里米亞行政中心辛菲羅波爾到處都是從海岸市鎮逃來的難民，他們帶來了各種夸張的故事，繪聲繪色地形容西方艦隊的樣子。“許多人完全失去了主見，不知道該怎么辦，”一名辛菲羅波爾的居民尼古拉·米赫諾（Nikolai Mikhno）回憶道，“其他一些人則以最快速度收拾行裝離開克里米亞……他們言辭中充滿恐懼，反復說英法聯軍將會向無力自保的辛菲羅波爾直逼過來。”[[5]](#_5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5)

正是這種無助感促使當地居民恐慌逃亡。俄軍在克里米亞的總指揮緬什科夫對英法聯軍的到來措手不及，他沒有想到盟軍會在冬天即將到來之時發動進攻，因此沒有及時動員部隊守衛克里米亞。俄軍在西南沿海有三萬八千名士兵和一萬八千名水手，在刻赤和錫奧多西亞有大約一萬兩千人的部隊，在被嚇壞的居民的想象中，這點兵力遠遠比不上侵略者的人數，而辛菲羅波爾只有一個營的部隊駐守。[[6]](#_6_W__Baumgart__The_Crimean_War)

9月14日是1812年法軍進入莫斯科的周年日，這一天聯軍艦隊在葉夫帕托里亞以南的卡拉米塔灣落錨。與此同時，在陸地南方的阿爾馬高地上，緬什科夫部署了他的主力，在此阻擋聯軍南下進攻塞瓦斯托波爾。羅伯特·霍達謝維奇（Robert Chodasiewicz）是哥薩克部隊中的一名上尉，他這樣描述看到的壯觀景象：

抵達我方在高地上的據點時，我們這些人一輩子能看到的最壯觀景象便展現在面前。整個聯軍艦隊都停在葉夫帕托里亞南邊的咸水湖外，一到晚上各種顏色的燈籠照亮了如同森林一般的桅桿。不管是軍官還是士兵都被眼前如此眾多的船只驚呆了，尤其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還從來沒見過大海。士兵們說：“看哪！異教徒在海上建起了一座神圣莫斯科！”他們把桅桿比作了莫斯科眾多的教堂尖頂。[[7]](#_7_R__Hodasevich__A_Voice_from_w)

法軍率先登陸，先遣部隊搶上灘頭后，每隔固定的距離便搭起不同顏色的帳篷，指引康羅貝爾、皮埃爾·博斯凱將軍和拿破侖親王的部隊在不同地點登陸。到天黑時，所有法軍部隊和他們的火炮都已上岸。士兵們升起法國旗幟并外出尋找柴火和食物，有些人帶回了雞和鴨子，水壺里灌滿了在臨近農莊找到的葡萄酒。保羅·德·莫萊尼和他的西帕希騎兵在俄羅斯的土地上吃了第一頓飯，雖然既沒有肉也沒有面包，“但是我們有一些餅干和一瓶香檳，本來是留作慶祝勝利用的”。[[8]](#_8_Cullet__Un_regiment__p__68__M)

和法軍相比，英軍的登陸過程一片混亂——在克里米亞戰爭中，這一強烈對比屢見不鮮。因為假設總會在登陸過程中遭遇抵抗，英軍沒有制定在未受抵抗情況下的登陸方案，于是步兵先行登陸，這時海面還風平浪靜，但是輪到騎兵登陸時，風浪已經大了起來，馬匹不得不在大浪中掙扎。而此時圣-阿諾已經在沙灘上舒服地坐在椅子上讀報紙了。看著英軍混亂的登陸過程，他越發感到灰心喪氣，因為英軍的拖延影響了他突襲塞瓦斯托波爾的計劃。“英國人有一種令人不悅的習慣，他們總是遲到”，他在給拿破侖三世的信中寫道。[[9]](#_9_L__de_Saint_Arnaud__Lettres_d)

英軍先后花了五天時間，才終于讓所有步兵和騎兵都登上了岸。許多士兵因為身患霍亂不得不被抬下船只。因為沒有運送行李和器材的工具，只得派人在當地韃靼農莊里征繳推車和拉車。士兵身上除了在瓦爾納派發的只夠三天的口糧外，沒有任何食物和飲水。又因為帳篷和背包還沒有從船上卸下來，在登陸的頭幾天英軍士兵只能無遮無蓋地過夜，飽受夜間大雨和第二天炎熱天氣的折磨。“我們隨身帶上岸的，除了大衣和一條床單外什么也沒有，”一名隨軍外科醫生喬治·勞森（George Lawson）在家信中寫道，“我們飽受缺水困擾。第一天非常熱，我們沒有水喝，只能在地上前一天晚上下雨的積水處弄水來喝。即使到現在水還是渾濁得厲害，如果把水倒進玻璃杯子，你都看不到杯底。”[[10]](#_10_V__Bonham_Carter__ed____Surg)

到9月19日，英軍終于準備好了，黎明時分，盟軍開始向塞瓦斯托波爾進軍。法軍在右側、靠近海岸處行軍，他們的藍色制服和英軍猩紅色的長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海面上，艦隊也伴隨地面部隊同時南下。行軍部隊正面有六千五百米寬，全長不到五公里，第二十團軍樂隊指揮弗雷德里克·奧利弗（Frederick Oliver）在日記中將行軍隊伍形容為“忙碌而喧囂”。除了密集的士兵行列外，還有應接不暇的“騎兵、大炮、彈藥、馬匹、馱馬、騾子、單峰駝、牛群，以及大群的綿羊、山羊和牯牛，這些都是搜索隊在附近農村里搜羅來的”。中午時分，烈日當空，行軍隊伍開始斷開，口渴難耐的士兵要么掉了隊，要么被派去附近的韃靼人定居點找水。下午，當他們抵達距卡拉米塔灣十二公里處的布爾加納克河（River Bulganak）時，興奮的英軍士兵紛紛跳進“污濁的溪流”，紀律完全被拋諸腦后。[[11]](#_11_NAM_2003_03_634___The_Diary)

在前方，布爾加納克河南岸的斜坡上，英軍第一次遭遇了俄羅斯軍隊——兩千名哥薩克騎兵向英軍第十三輕龍騎兵團（13th Light Dragoons）的偵察分隊開火了。第十三輕龍騎兵隸屬有“英騎兵驕傲”美譽的輕騎兵旅（Light Brigade）。在遭到俄軍襲擊之后，輕騎兵旅雖然人數只有哥薩克騎兵的一半，卻依然毫無畏懼地準備發起沖鋒。此時在遠處高地觀戰的拉格倫發現在哥薩克騎兵后面，還有相當數量的俄軍步兵，而英騎兵指揮官盧肯勛爵（Lord Lucan）和卡迪甘勛爵（Lord Cardigan）因為位于山腳，無法看到這些俄軍步兵。拉格倫隨即命令輕騎兵旅撤退。哥薩克騎兵對不戰而退的英軍騎兵發出怪叫嘲笑，還開槍打傷了幾個人[¶](#P_Ke_Li_Mi_Ya_Zhan_Zheng_Zhong_Y)，他們隨后撤回到南邊的阿爾馬河邊，那里俄軍已經在高處布置好了兵力。這場遭遇戰對輕騎兵旅來說很丟面子，因為面對衣衫襤褸的哥薩克騎兵，這些平時衣著光鮮合身、趾高氣揚的英國騎兵卻不敢交戰，而且這一切都被英軍步兵看在眼里。步兵大都來自貧困或是勞工家庭，看到這些平時高高在上的騎兵遇此尷尬，不免幸災樂禍。“活該，這些打扮得像孔雀一樣的傻蛋。”一名列兵在家信中寫道。[[12]](#_12_H_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Q)

當晚英軍在布爾加納克河南岸露營，從那里他們可以看到五公里開外的阿爾馬高地上集結的俄羅斯軍隊。他們將在第二天向河谷進發，與布置在阿爾馬河對岸的俄軍交戰。

緬什科夫的策略是投入主力防衛阿爾馬高地，因為這將是保衛塞瓦斯托波爾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從9月15日開始，俄軍已經在此集結。但是他還擔心盟軍會在刻赤和錫奧多西亞登陸（沙皇也有此擔心），因此手里保留了一支龐大的預備隊，在阿爾馬高地只布置了三萬五千名俄軍，比西方盟軍的六萬部隊人數要少，但是占據了制高點，有地形優勢，同時還有超過一百門大炮。通往塞瓦斯托波爾的道路在距海岸四公里處跨過阿爾馬河，在路邊的制高點上，俄軍將最重型的大炮布置在一系列炮臺上，但是在面海懸崖之上并沒有布置大炮，緬什科夫認為這里的懸崖太陡峭，敵人不可能爬得上來。駐守炮臺的俄軍為了自己舒服，趕走了附近布爾留克（Burliuk）村里的韃靼居民，把村民家的床、門、木板，加上一些樹枝抬回高地，給自己搭了簡易木板房，躲在里頭把從村子里搶來的葡萄吃個精光。他們還在村民的房子里塞滿稻草，準備在敵人到來時付之一炬。俄軍指揮官相信他們至少能在這里守住一星期，緬什科夫甚至向沙皇保證能守住六個星期，為加固塞瓦斯托波爾的防守贏得寶貴時間，并將戰事拖到冬天，而寒冷的冬天一向是俄軍對付入侵者的最好武器。許多軍官相信勝利在望，嘲笑英軍只會在殖民地的“野蠻人”面前逞強。他們還為1812年的勝利干杯，聲稱要將法國人趕回大海。緬什科夫的信心膨脹到了極點，甚至邀請了塞瓦斯托波爾的名媛前來阿爾馬高地欣賞戰事。[[13]](#_13_N__Dubrovin__Istoriia_krymsk)

但是俄軍士兵卻沒那么自信，一名在俄軍陣營的德國軍醫費迪南德·普夫盧格（Ferdinand Pflug）認為“似乎每個人都相信第二天的戰斗將以失敗告終”。[[14]](#_14_E__Perret__Les_Francais_en_O)幾乎沒有人曾經與歐洲強國的軍隊交過手，看到敵人的艦隊就停泊在附近海面，艦炮隨時準備用火力支援陸軍，俄軍士兵們意識到他們所面對的是一支比自己強大的軍隊。大部分高級軍官可以憑借當年抗擊拿破侖軍隊的記憶來為自己鼓氣，但是真正要面對敵人的士兵大部分很年輕，根本沒有這樣的經歷。

大戰前夜，士兵們都努力掩飾心中的恐懼，不在戰友面前表露出來。當夜幕降臨，炎熱的白天變成寒冷的夜晚，雙方軍隊都在為第二天早晨的戰斗而準備。對于許多人來說，這將是他們生命中的最后幾個鐘頭。他們點起篝火，做上晚飯，然后就是等待。大部分人都沒有胃口，有些人再次清理一遍自己的滑膛槍，另一些給家人寫信，許多人做了祈禱。第二天是東正教的假日，在俄羅斯是慶祝圣母瑪利亞誕生的日子。俄軍在營地舉行了禮拜，祈求她的保佑。一群群士兵圍坐在篝火邊，一直聊到深夜。老兵向年輕的戰友講述過去的戰斗經歷，他們喝酒、抽煙、講笑話，盡量表現得鎮靜自如。歌聲時不時飄過平原，塔魯京斯基團（Tarutinsky Regiment）的士兵們用低沉的聲音吟唱一首戈爾恰科夫將軍寫的曲子，一直傳到緬什科夫搭建在塞瓦斯托波爾路（Sevastopol Road）的帳篷里：

他的寶貴生命

隨時愿意奉獻；

俄羅斯東正勇士

殺敵絕無二念。

法國人、英國人——有什么了不起？

還有土耳其人的防線？

站出來，你們這些異教徒，

接受我們的挑戰！

接受我們的挑戰！

漸漸地，當夜空中星斗滿天，篝火變得微弱，話語聲也越來越輕。士兵們躺在地上，希望能睡一會兒，但是誰也睡不著。陰森的靜謐籠罩著峽谷，偶爾能聽到的，只有廢棄村莊里野狗的叫聲。[[15]](#_15_Dubrovin__Istoriia_krymskoi)

凌晨三點，天空依然黑漆漆的，霍達謝維奇仍舊無法入睡。在俄軍陣地上，士兵們“圍攏在巨大的篝火邊，燒的是從布爾留克搶來的柴火”。

過了一會兒，我爬上山坡（因為我們營駐扎在山溝里）察看對面聯軍的露營地。但是幾乎什么也看不到，對面只有一堆堆的篝火，以及時而在火堆前閃過的人影。一切似乎都凝固了，看不出一場大戰即將到來的樣子。兩支大軍就這樣躺著，相隔不遠。有多少人，又會是誰，將在這里度過他們生命最后的時光，現在不可能知道。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我會不會是其中之一呢？[[16]](#_16_Hodasevich__A_Voice__pp__55)

四點鐘時，法軍營地開始活動起來，士兵們煮上咖啡，相互談笑如何狠揍俄羅斯人。然后軍令下達，士兵們背上背包，排成隊列，由軍官向他們喊話。“打起精神來！”第二十二團的一名上尉給手下士兵鼓勁：“我們是不是法國男子漢？今天二十二團要是不能功成名就，你們就是一幫混蛋。誰要敢做縮頭烏龜，小心我用佩劍勾出你的腸子。向右列陣！”與此同時，在俄軍陣地上，士兵們也排好了隊列聽長官訓話：“兄弟們，我們已經等了好多天了，現在大干一場的時候終于到了。我們不會給俄羅斯丟臉，我們會打退敵人，為沙皇主上（Batiushka the Tsar）爭光，贏得功勛得勝而回！”七點鐘時，軍中教士祈求圣母保佑打敗敵人，他們舉著神像在隊伍中走過，士兵們紛紛跪倒在地，在胸口劃著十字。[[17]](#_17_Perret__Les_Francais_en_Orie)

\* \* \*

到了上午中段，盟軍已在平原上集結完畢，英軍在塞瓦斯托波爾路左邊，法軍和土耳其軍在右邊，向海岸懸崖方向散布。這是一個晴朗無風的日子，電報山（Telegraph Hill）上聚集著衣冠楚楚的人群，他們都是受緬什科夫邀請來觀戰的。從那里遠眺，英法兩軍著裝的細節都能分辨清楚，軍鼓、軍號和風笛聲，甚至金屬的撞擊、軍馬的嘶鳴都可以聽到。[[18]](#_18_R__Egerton__Death_or_Glory)

俄軍事先在盟軍的行軍路線上樹立了距離標桿，以讓炮手知道何時敵軍進入了射程范圍。當盟軍進行到一千八百米處時，俄軍大炮開火了，但是英法盟軍并不停頓，繼續向阿爾馬河行進。根據前一天確定的作戰計劃，英法兩軍同時向前推進，保持一個寬廣的前沿鋒線，然后從左側，即內陸側，繞到敵軍側翼發起攻擊。但是在最后一刻，拉格倫決定推遲英軍的進攻，等待法軍在右翼取得突破。他命令已經進入俄軍大炮射程內的英軍就地臥倒待命，等待合適的時機沖向阿爾馬河。從一點一刻到兩點三刻，英軍就地待命了一個半小時，暴露在俄軍炮火下，傷亡不斷增加。這個讓人震驚的例子反映了拉格倫優柔寡斷的性格。[[19]](#_19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__4)

當待命的英軍在地上挨打之時，法軍博斯凱師抵達了阿爾馬河岸。在法軍面前，河對岸的懸崖非常陡峭，幾乎高出河面五十米，因此緬什科夫以為沒有必要配備炮火守衛。博斯凱師的前鋒是一個朱阿夫團，大部分士兵來自北非，在阿爾及利亞戰場上積累了豐富的山地作戰經驗。他們把背包留在岸上，游過阿爾馬河，在樹叢的掩護下很快爬上了懸崖。俄軍被朱阿夫士兵的靈活驚呆了，眼睜睜看著他們借著樹木爬上懸崖，靈活得像猴子一樣。朱阿夫士兵一爬到崖頂就馬上躲藏在巖石和樹叢中，把防守的俄軍一個個干掉，等待援軍到來。“朱阿夫士兵隱蔽得如此之好，”和第一批士兵一起爬上崖頂的努瓦爾回憶道，“就連經驗豐富的指揮官也找不到他們。”在朱阿夫部隊的鼓舞下，更多法國士兵爬上了懸崖，他們還把十二門火炮運了上去。如果馬匹不愿意在陡峭的山路上往上爬，士兵就用佩劍抽打。法軍火炮到達非常及時，正好用來對付緬什科夫剛剛從戰線中部調來的火炮和士兵增援，他意識到自己正面臨戰線被突破的危險，試圖保住自己的左翼。[[20]](#_20_M__Masquelez__Journal_d_un_o)

緬什科夫的救急方案落空了，當俄軍增援部隊抵達左翼時，整個博斯凱師，再加上許多土耳其士兵都已經抵達崖頂。俄軍有二十八門大炮，數量上比法軍的十二門多，但是法軍火炮口徑更大、射程更遠，法軍來復槍的威力讓俄軍大炮不敢靠近，法軍大炮的射程優勢馬上就顯示了出來。意識到俄軍炮火打不到他們，一些朱阿夫士兵情緒高漲，干脆在陣地上跳起波爾卡舞來，借此嘲笑激怒敵人。與此同時，附近海面上聯軍艦隊的大炮也開始轟擊崖頂上的俄軍陣地，打擊俄軍官兵的士氣。當第一批增援俄軍的大炮抵達陣地時，他們發現駐守的莫斯科團（Moscow Regiment）殘部已經開始撤退了，對面朱阿夫部隊的米涅來復槍比起俄軍步兵使用的老式舊滑膛槍來，射程更遠、準度更高。俄軍左翼的指揮官V.I.基里阿科夫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V.I. Kiriakov）是沙皇軍隊中最無能的將軍之一，而且經常酗酒，很少處于清醒狀態。基里阿科夫手里拿著一瓶香檳，命令明斯克團（Minsk Regiment）向法軍開火，卻搞錯方向，把火力瞄準了基輔驃騎團（Kiev Hussars）。遭遇友軍攻擊，基輔驃騎團不得不撤退。明斯克團對醉醺醺的指揮官完全失去了信心，同時對法軍來復槍的致命精準感到恐慌，因此也開始撤退。[[21]](#_21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__5)

與此同時，在戰線中部，由康羅貝爾和拿破侖親王率領的兩個法國師在橫渡阿爾馬河時受阻，遭到對面電報山上俄軍炮火的猛烈攻擊。拿破侖親王向他左翼的德萊西·埃文斯將軍傳遞命令，要求英軍向前移動，以減輕法軍面對的壓力。此時拉格倫依然在等待法軍取得突破，讓埃文斯不要理會法軍命令。但是經不住埃文斯的一再請求，拉格倫終于讓步了。在兩點四十五，他命令英軍輕步兵師（Light Division）、第一師、第二師向前，卻沒有說向前干什么。這條命令非常典型，反映出拉格倫的軍事思維方式依然停留在拿破侖戰爭時期，那時步兵經常需要在沒有什么裝備的情況下直接向準備就緒的陣地發起進攻。

英軍士兵剛從地上爬起來，躲藏在葡萄園里的哥薩克騷擾部隊就把布爾留克村點著了。他們這么做本是為了阻礙英軍前進，但實際效果卻是制造了一堆濃煙，反而讓俄軍炮火無法瞄準。為了最大程度地發揮來復槍的威力，英軍士兵排成一條條窄橫隊向前進發，這樣的陣形在地形崎嶇的地方必須有嚴格的指揮才能保持得住。見到一條細紅線從煙霧中冒出來，俄軍都驚呆了。“對我們來說這是最異乎尋常的事，”霍達謝維奇回憶道，“我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士兵排成兩列橫隊作戰，我們也從沒想到他們的紀律如此嚴明，能以這種顯然很弱的陣形向我們龐大的集群發起進攻。”

進入正在燃燒的村子和葡萄園時，英軍的進行隊伍斷開了。在田野中，一只灰獵犬正在追逐野兔。英軍小隊行進，將哥薩克騷擾部隊從村子和葡萄園里趕了出去。“我們跑步向前，把前方敵人的騷擾部隊趕走了，”德比郡團（Derbyshire Regiment）的一名列兵布盧姆菲爾德（Bloomfield）回憶道，“為了方便向我們開火，他們中的有些人甚至爬到了樹上，但是被我們發現，把他們揍了下來。有些人從樹上掉下來時……衣服或是腳踝纏在了樹上，就這樣掛了好幾個小時。”當英軍行進到阿爾馬河邊時，進入了俄羅斯槍炮的射程范圍，被擊中的士兵悄無聲息地倒下，但是周圍其他人依然繼續前進。輕步兵師的布朗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Brown）回憶道：“在我看來，最驚人的景象是死亡的悄然降臨。看不到、也聽不到任何跡象，一名士兵倒下了，翻倒在一邊，或是在隊伍中跌落在塵土上。一顆子彈找到了自己的目標，但是這一切似乎發生在一片神秘的靜謐中——這些人消失不見了，被遺棄一邊了，而我們仍舊在他們身邊走過。”[[22]](#_22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__5)

頂著猛烈的炮火，英軍抵達了阿爾馬河邊，因為不清楚河水的深淺，他們一組組地圍在一起，卸下身上裝備。有些士兵把來復槍和子彈袋舉過頭頂，從河中走到對岸，但是其他人就不得不游過河，有些被急流沖走淹死。與此同時，俄軍一直在向他們發射霰彈和炮彈。俄軍在這里準備充分，土崗上有十四門炮，在公路橋的兩邊又各布置了二十四門炮。當布盧姆菲爾德抵達河邊時，“河水被鮮血染成了紅色”。河里布滿尸體，許多士兵被嚇壞了，縮在河岸上，不敢下水。軍官們騎著馬來回奔跑，呼喝士兵游泳過河，甚至舉起手里的佩劍相威脅。過了阿爾馬河的部隊則亂作一團，不同連隊的士兵混在一起，兩列橫隊的陣形現在變成了一大堆人擠在一起。俄軍從“大土崗”（Great Redoubt）兩側居高臨下向英軍開火，過了河的英軍軍官騎著馬試圖重新組織隊伍，但是完全沒有可能。好不容易過了河的士兵已經精疲力竭，寧愿躲在河岸邊俄軍火力的盲點。有的干脆坐下喝水，還有一些甚至拿出面包和肉開始吃飯了。

意識到形勢危險，輕步兵師第一旅指揮官科德林頓少將（Major-General Codrington）急切地試圖重新集結手下的隊伍。他騎著一匹白色的阿拉伯馬沖上山坡，向亂作一團的步兵喊道：“上刺刀！離開河岸，向前沖鋒！”很快整個旅的部隊，在各個團的士兵混在一起的情況下，開始一群群地爬向庫爾干山（Kurgan Hill）。下級軍官放棄了組織陣形的企圖，因為根本沒有時間，只是催促士兵們“盡管往上沖”。當他們爬上開闊的山坡時，大部分士兵開始一邊狂喊一邊向山坡上五百米高處大土崗上的俄軍炮臺沖去。眼看著兩千名敵人向他們沖來，俄軍炮手雖然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發出的炮彈卻也很容易找到目標。輕步兵師的一些尖兵沖到了大土崗的塹壕里，他們翻過胸墻，或是從炮眼鉆到土崗里，很多被俄軍射殺或砍倒。可是幾分鐘內大土崗就被大批人馬淹沒，一些人還在胸墻上搏殺的時候，另一些人就已經在揮舞戰旗呼喊喝彩了。俄軍匆忙將大炮撤離，在混亂中，兩門大炮被英軍繳獲。

這時弗拉基米爾斯基團（Vladimirsky Regiment）的四個營（約三千人）忽然從高處向大土崗沖了過來，與此同時，庫爾干山更高處的俄軍火炮也開始向大土崗轟擊。俄軍步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槍，喊著“烏拉！”沖下來，把英軍趕出了大土崗，并繼續向下撤的英軍開火。輕步兵師重新布置了一條陣線試圖反擊，但這時英軍中的一支軍號忽然吹響了停火的號聲，其他團的軍號也接著重復停火號聲。于是在這個戰斗的生死關頭，英軍忽然在迷茫中停火了，原因是一名姓名不詳的軍官誤把俄軍當成了法軍，命令手下停火。當這個錯誤的命令被糾正過來時，弗拉基米爾斯基團已經占了上風，迅速朝山坡下進攻，沿途到處都是傷亡的英軍。這時軍號又發出了真正撤退的號聲，輕步兵師殘部潰退下來，重新藏身在河岸邊。

英軍此次沖鋒失敗，部分原因是沒有第二波兵力增援。劍橋公爵沒有派他手下的近衛軍部隊前進增援輕步兵師，因為他沒有收到拉格倫的命令（這是拉格倫的又一次失誤）。在他右側的埃文斯后來假冒拉格倫的命令，才讓劍橋公爵繼續向前推進，而這時候他其實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拉格倫。[\*\*](#___Zai_Fa_Chu_Le_Jin_Gong_Ming_L)

近衛軍旅（Guards Brigade）的三個團：擲彈兵團（Grenadiers）、蘇格蘭燧發槍團和冷溪團（Coldstream）涉過了阿爾馬河。他們身穿紅色軍袍，頭戴熊皮帽，看上去非常威武。過河之后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才重新集結成隊。實在受不了他們的磨蹭，高地旅（Highland Brigade）指揮官科林·坎貝爾爵士（Sir Colin Campbell）下令立即發起進攻。他堅信端刺刀沖鋒的威力，讓部下直到“離俄羅斯人只有一碼遠”的時候才開槍。蘇格蘭燧發槍團是最先過河的部隊，收到命令后立即向坡上發起沖鋒，結果重復了輕步兵師的錯誤。那時剛好是輕步兵師從坡上敗退下來，兩支部隊迎面相撞，蘇格蘭燧發槍團受損最大，士兵紛紛被撞翻在地，熊皮帽到處飛舞。當他們終于避開迎面而來的友軍，繼續向大土崗沖鋒時，就只剩下一半人馬了，而且陣形一片散亂。在這一片亂軍中，有一名二十三歲的少尉休·安斯利（Hugh Annesley），他是這樣回憶當時的情景的：

忽然間，俄軍似乎再次布滿了土崗，他們的火力越來越密集。這時候第二十三團一窩蜂地從坡上退下，沖亂了我們的陣線……我不斷呼喊：“近衛團，向前”，我們沖到了離塹壕不過三四十碼的地方。就在這時，一顆滑膛槍彈丸正面打在我的嘴上，我以為這下我玩完了。忽然我們的副官騎馬上來，手里還拎著左輪手槍，命令我們撤退。我轉身就跑，使出全身力氣，一路向坡下河邊跑去。這時越來越多的滑膛槍彈丸向我們飛來，我覺得我一定逃不了，會再被擊中一次。半路上我絆了一跤摔倒在地，我很肯定我被打中了，但是等我爬起身來，卻發現并無大礙，于是繼續往下撤。我的劍和熊皮帽都丟了，但是終于逃回河岸邊，找到了藏身之地，一大群士兵都躲在那里。

安斯利受傷嚴重：子彈從他左臉頰進入，從右邊嘴角出來，打掉了二十三顆牙齒和部分舌頭。在他身邊是被打垮的蘇格蘭燧發槍團士兵，后來在這一戰役中，盡管一再被敦促投入戰斗，他們卻再也沒有執行過進攻的命令。[[23]](#_23_Spilsbury__Thin_Red_Line__pp)

近衛軍旅的另兩個團（擲彈兵團和冷溪團）填補了蘇格蘭燧發槍團撤退留出的戰線空隙，卻拒絕執行向坡上沖鋒的命令；相反，他們自己想出了使用米涅來復槍向俄軍齊射的辦法。約兩千名近衛軍旅士兵排成橫排，向俄軍步兵發動了十四次齊射。齊射時火力非常密集，相當于幾挺機關槍的威力，俄軍步兵徹底被擊垮，成片地被擊中倒地，不得不撤退到坡上更高處。近衛軍旅士兵沒有聽從指揮官挺刺刀沖鋒的命令，卻展示了一項關鍵的戰術創新，發揮了現代來復槍遠射的威力，這一舉措在克里米亞戰爭早期將成為一個決定性因素。米涅來復槍是當時的一種新式武器，大部分英軍是在前往克里米亞途中才得到配發的，只匆忙接受過訓練。這種步槍帶來的戰術優勢是，在俄軍滑膛槍和大炮的射程之外，依然能保持致命的準確度，而英軍士兵事先對此一無所知，直到在阿爾馬戰役時才自己發現。俄軍工兵愛德華·托特列邊（Eduard Totleben）在書寫克里米亞戰爭歷史時，對米涅來復槍帶來的沖擊做了如下思考：

當英軍不得不扮演狙擊手的角色時，他們在槍林彈雨中并無畏懼，也不需要長官下令。當他們發現手中武器精度高射程遠之后，馬上對自己充滿了信心……敵人離我們三百步遠時，我們的滑膛槍就打不著他們了，而敵人卻可以在一千兩百步遠的地方向我們開火。因為相信自己輕武器的優勢，敵人避免與我們近戰。每次我們發起沖鋒時，他們都會后退一定距離，然后開始謀殺般的齊射。我們的縱隊發起進攻時，實現不了任何目標，只能給自己造成可怕的損失，我們根本不可能穿過敵人的彈雨，還未沖到敵人陣前就已經被打退了。

在致命的米涅來復槍面前，守在高處的俄軍步兵和炮兵沒有塹壕的保護，根本守不住陣地。很快英軍右翼埃文斯指揮下的第二師也學會了近衛軍團的齊射戰術，從他們在河岸邊的位置，第三十團能夠清楚地看到三個俄軍炮兵連的位置，當他們用米涅來復槍齊射端掉俄軍大炮時，俄軍士兵甚至都不知道子彈是從哪里飛來的。俄軍步兵和炮兵向后撤退，英軍慢慢向坡上推進，腳下滿是敵軍的尸體和傷兵。“大部分傷兵都喊著要水，”列兵布盧姆菲爾德寫道，“我們連的一名戰士給了一名俄軍傷兵一點水喝，當他轉身離開時，那名俄軍卻端起滑膛槍向這名戰士開火，子彈從他腦袋邊飛過。他立刻轉回來，將刺刀扎進這名俄軍士兵的身體。”到下午四點，英軍從各個方向朝俄軍位置逼近——近衛軍旅在左翼擊退了俄軍在庫爾干山的最后一支預備隊，科德林頓的手下以及其他近衛軍旅士兵正逼近大土崗，第二師正沿著塞瓦斯托波爾路向上推進。與此同時，法軍已經控制了右側的崖頂。非常清楚，聯軍已經打贏了這場戰役。[[24]](#_24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p)

看到火力強大的敵人向自己步步逼近，俄軍開始出現恐慌。教士們到隊列中為戰士們祈福，士兵們的祈禱越來越急切。軍官們騎在馬上甩著鞭子逼士兵向前，但是除此之外，沒有什么俄軍指揮官在對戰事進行控制。“沒有人向我們發布命令，告訴我們該怎么做，”霍達謝維奇回憶道，“在戰斗打響的五個小時里，我們既看不到，也聽不到任何一位師長、旅長、團長的命令。我們沒有從他們那里接到任何命令，不管是前進還是撤退。當我們撤退時，也沒有人告訴我們該向左轉還是向右。”喝得醉醺醺的基里阿科夫發出了從高地左側撤退的命令，然后就因為驚慌過度而不見蹤影了，幾個小時之后有人發現他躲在一個地洞里。下級軍官不得不承擔起組織撤退的責任，但是“要讓手下的士兵保持秩序極為困難”，霍達謝維奇回憶當時的情景時寫道，他不得不威脅“哪個敢不聽從命令，就地正法”，有好幾次他真的這么做了。

因為不知道該從哪里撤退，俄軍開始四處潰散，逃下高地，離敵人越遠越好。軍官們騎著馬甩著鞭子把逃跑的士兵趕來趕去，就像牛仔趕牛一樣，但完全不能制止潰逃，士兵們對長官已經失去了耐心。霍達謝維奇聽到兩名士兵的一段對話：

士兵甲：“是的，開火的時候，哪兒都看不到這些貴人[指軍官]，現在他們多得像小鬼一樣，向我們咆哮：‘安靜！保持步伐！’”

士兵乙：“你總是滿腹牢騷，像個波蘭佬似的，上天都要被你激怒了。我們現在還活著，得多謝老天。”

士兵甲：“不是你挨鞭子，你當然無所謂。”

霍達謝維奇描述了當時各種混亂無序的景象，還有醉醺醺的軍官，“那十分鐘是在恐懼和戰栗中度過的，在高地第二道防線上，我們親眼看到敵方騎兵追殺我們撤退時掉隊的散兵，其中大部分都是傷兵”。[[25]](#_25_A__Khrushchev__Istoriia_obor)

導致俄軍失敗的最終原因，不僅僅是敵人手里火力強大的米涅來復槍，還因為士兵中爆發了恐慌。阿爾當·杜·皮克建立自己的軍事理論時，曾在參加過阿爾馬戰役的法軍老兵中進行了問卷調查，他認為在現代戰爭中，士氣是決定性的因素。他提出兩軍對峙很少會真正變成面對面的搏殺，因為幾乎總有一方會在交手之前恐慌爆發落荒而逃。在戰場上，關鍵的是軍紀——軍官能否讓手下士兵保持鎮定，不因害怕而潰逃——因為當士兵轉身逃跑時，最有可能被敵人殺死。所以壓制恐懼是軍官的主要職責，要達到這個目標，他必須建立自己的權威，并讓手下士兵團結一致。

能夠讓士兵在作戰中服從命令和指揮的，是軍紀。這包括：對指揮官的尊敬和信心；對戰友的信任，還有擔心如果自己把戰友拋棄在危險中，將受到責備和懲罰；懷有與其他人共進退而不顯得格外恐慌的愿望。一句話，這就是“團隊精神”。只有通過組織才能產生這種精神。有了這種精神，四名士兵可以抵得上一頭雄獅。

這些觀點后來成了20世紀軍事理論的中心，德·皮克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是在1869年讀了一封阿爾馬戰役老兵的來信之后。這名老兵回憶在戰斗中，他的連長的行動是如何起了關鍵作用的。當時一名高級軍官誤以為俄軍騎兵即將向他們沖來，下令軍號手吹響撤退號：

還好，一名鎮定的軍官，達蓋爾上尉（Captain Daguerre），意識到這是一個嚴重錯誤，以洪亮的聲音下令部隊“前進”。在他的命令下，我們停止撤退，轉而繼續進攻。這輪進攻讓我們控制了電報山的戰線，打贏了這場戰斗。面對我們的沖鋒，俄軍認輸逃跑了，我們的刺刀都夠不到他們。所以當一名少校擅自吹響撤退號，差點丟掉成功機會時，一名上尉下令“前進”，把我們引向了勝利。[[26]](#_26_A__du_Picq__Battle_Studies)

戰斗在四點半結束。絕大部分俄軍成群結隊地向卡恰河（River Kacha）潰退，既沒有指揮官，也不知道該做什么、往哪里去。許多士兵在幾天之后才歸隊。在電報山頂，一群哥薩克兵想把緬什科夫的馬車拉走，結果被法軍繳獲。他們發現馬車里還有一個戰地廚房，此外還從車里繳獲了沙皇的信件、五萬法郎現鈔、法語色情小說、緬什科夫的靴子，還有幾條女人的內褲。在山頂上還有被丟棄的野餐、陽傘和戰地望遠鏡，這些都是來自塞瓦斯托波爾的觀戰者們丟下的。[[27]](#_27_Dubrovin__Istoriia_krymskoi)

在戰場上，到處橫躺著死傷的戰士，其中有兩千英軍，一千六百法軍，也許有五千俄軍，因為人數太多，確切數字無法統計。英軍花了整整兩天時間才把自己的傷兵運走。離開瓦爾納時，他們忘了帶上醫療器材，醫療隊的大車和篷車，還有擔架手們都還在保加利亞，于是醫生們只得求助于運糧車把傷員從戰場上運走。運糧隊的一名管理員約翰·羅（John Rowe）把他大車上的坐椅空出來幫助運送傷員，在回去取貨的路上，他遇到一群受傷的軍官，休·安斯利也在其中：

一名第三十團的軍官手臂受了傷，但是還攙扶著一位蘇格蘭燧發槍近衛團的軍官。這名近衛團軍官身體前傾，嘴里的鮮血不斷地滴下來。他沒法說話，但是用一支鉛筆在一個小本子上寫道他是安斯利大人，一顆滑膛槍彈丸打掉了他的牙齒和一部分舌頭，現在彈丸還卡在他的喉嚨里。他想知道燧發槍團的軍醫在哪塊田野（如果我們能稱之為田野的話）里救治傷員，我能不能把他送過去。我不知道軍醫在哪里……我還告訴他我無權自行使用運糧騾車，我是接受命令來這里行使職責的。

安斯利只好自己想辦法找軍醫。我們不知道他后來得到了什么樣的救治，不過當時能做的最多就是取出彈丸而已。取彈丸時很可能沒有使用合適的醫用敷料，也沒有用氯仿減痛。戰場救治是簡單低級的，輕步兵師的隨軍外科醫生喬治·勞森最先只能在地上做手術，后來終于找到一塊舊門板，作為他的臨時手術臺。[[28]](#_28_NAM_1974_02_22_86_4__21_Sept)

第二天一大早，拉格倫的侄子、他的副官之一薩默塞特·考爾索普（Somerset Calthorpe）給自己的酒壺灌滿白蘭地，然后“出發巡視戰場”。

那些可憐的傷兵比昨天晚上安靜多了，毫無疑問許多人沒能熬到今天，還有許多人太虛弱、太疲憊，只剩下呻吟的力氣了。有點酒喝，所有人都很高興……戰場景象恐怖，到處是各種姿態的死尸。我特別注意到那些心口或額頭中彈身亡的，看上去都面帶微笑，大都仰面朝天倒在地上，四肢伸開……那些看上去在極端痛苦中死去的是腹部中彈的士兵，他們的手腳蜷縮著，臉上帶著各種痛楚的表情。[[29]](#_29_S__Calthorpe__Letters_from_H)



休·安斯利，1854（得到北愛爾蘭公共檔案館副館長許可復制）

俄軍無法從戰場上運走他們的傷兵。[††](#___Yi_Wei_Ming_Jiao_Da_Li_Ya__Mi)還能走路的只好自己尋找救治，阿爾馬河以南十五公里處的卡恰河邊有一個包扎站，許多俄軍傷兵擠在那里，另一些在后來的幾天里一瘸一拐地回到了塞瓦斯托波爾。一名俄軍勤務兵回憶起第一天晚上的景象，當時他正在前往卡恰河的車上：

幾百名傷兵被部隊丟在后面，他們哭喊著、呻吟著，做出各種求助的動作，請求我們的車帶他們一程。但是我又能為他們做什么呢？車輛已經超載，裝得滿滿的了。我只好安慰說他們部隊的篷車會回來拉他們的，不過我知道這不可能。一個傷兵幾乎走不動路了——他的手臂沒有了，肚子被射穿；另一個一條腿被炸飛，下巴被打碎，舌頭露在外頭，身上全是傷口——他只能用臉上的表情請求我給他一口水。但是又上哪兒去找水呢？

那些無法行走的俄軍傷兵，大約有一千六百人左右，被丟在了戰場上。他們在那里躺了好幾天，直到英法兩軍把自己的傷員全部運走，開始掩埋死尸之后，才把俄軍傷兵送到君士坦丁堡外斯庫臺的軍事醫院。[[30]](#_30_Seaton__The_Crimean_War__pp)

戰斗結束后的第三天，威廉·羅素描述俄軍傷兵“躺在那里呻吟顫抖”：

一些人被堆在一起，方便運走；一些人在樹叢后捂著傷口，盯著你，惡狠狠地仿佛野獸一般；另一些向我們發出哀叫，雖然語言不通，但毫無疑問是要水，或是請求施以救助，他們向我們伸出被砍斷或打爛的手腳，或是指著身上的彈痕。一些人臉上陰沉憤怒的表情讓人害怕，眼中噴射出無盡的狂熱與仇恨。一個人如果帶著同情與憐憫看這些人，就能（不情愿地）理解為什么這些人能夠帶著野蠻的狂熱殘殺傷者，而且還向那些好意伸出援手的勝利者開槍。[[31]](#_31_The_Times__1_Dec__1854)

確實出現過俄軍傷兵向給他們送水的英法士兵開槍的事件，也有俄軍在戰場上殺死傷兵的報告。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是對敵人的恐懼和仇恨。法軍在對俘獲的俄軍士兵進行盤問時發現，俄軍士兵“被教士們灌輸了各種奇異的故事，比如說我們都是怪物，能夠做出最野蠻兇惡的事情，甚至會吃人”。有關這些俄軍“野蠻殺戮”的報道激怒了英軍士兵和公眾輿論，加深了他們認為俄羅斯人“比野蠻人好不了多少”的觀念。但是這樣的憤怒其實是虛偽的，戰場上同樣發生過許多英軍士兵殺死俄軍傷兵的事件，讓人感到不安的事情還包括英軍士兵射殺“惹麻煩”的俄軍俘虜等。還必須指出的是，英軍士兵走到俄軍傷兵中去，不僅僅是給他們送水，有時候還會偷他們的東西。他們從俄軍士兵脖子上取下銀十字架，到背包里翻找紀念品，看到什么東西喜歡就隨手從傷兵或死尸身上拿走。“我在阿爾馬為你找到了一件戰利品，一件特別適合你的東西，”蘇格蘭燧發槍近衛團副官休·德拉蒙德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這是一個很大的希臘銀十字架，上面還刻著救世主的名字和一些俄羅斯文字。我是從一名被打死的俄軍上校的脖子上取下來的，可憐的人，這個十字架是他貼身掛著的。”[[32]](#_32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e)

\* \* \*

如果此時聯軍立即長驅直入，直取塞瓦斯托波爾的話，很可能幾天之內就會打敗猝不及防的守軍，付出的人員傷亡代價也會相對較小。然而實際情況是，聯軍犯了種種錯誤，處處拖延，最后塞瓦斯托波爾的圍困戰持續了長達三百四十九天，幾萬人因此喪生。

9月21日，俄軍還處于一片混亂中，塞瓦斯托波爾幾乎沒有防御能力。雪上加霜的是，緬什科夫認為不值得把他手下士氣低落的部隊增派到那里。他在卡恰整理了阿爾馬戰役殘部之后，沒有去塞瓦斯托波爾，而是讓部隊向東北方向的巴赫奇薩賴進發，目的是防止聯軍占領彼列科普，保證克里米亞與俄羅斯大陸之間的通路不被切斷，并在那里等待援軍。塞瓦斯托波爾就只剩下五千守軍和一萬水手，而且從未受過保衛塞瓦斯托波爾所需的防御訓練。俄軍沒有想到聯軍會在第二年春天之前進攻克里米亞，所以也沒有加強塞瓦斯托波爾的防御工事。城市北部的要塞工事自1818年建成以來就一直沒有好好改進過。[‡‡](#_____E_Guo_Zhan_Zheng_Bu_Xia_Shu)“星星要塞”（Star Fort）的墻壁因為失修而坍塌，里面也沒有配置足夠的大炮，抵擋不了大規模進攻。在城市南邊，緬什科夫在1854年1月下令修建了三座新炮臺，但是這一帶的防御能力只比北邊稍好一些而已。面向大海是連綿的城墻，配以火力強大的炮臺，在港口入海處有兩座火力配置良好的要塞：“隔離炮臺”（Quarantine Battery）和“亞歷山大要塞”（Alexander Fort），兩處火力合在一起足以抗衡聯軍艦隊。但是在陸地上，南線防御相對較弱。這里有一道四米高、兩米厚的石墻，上面的最關鍵位置修建了土崗或是炮臺，但是這道石墻只能保護城市的部分區域。不是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能抵御迫擊炮的轟擊，石墻只在對付滑膛槍時有效。總而言之，整座城市的防御極其脆弱，許多人認為隨時可能陷落。俄軍工兵托特列邊被派去管理防御工事，據他所說“基本上沒什么東西可作抵擋，敵人幾乎能直接走進來”。[[33]](#_33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此時，從阿爾馬河敗退下來的俄軍并不急于趕往塞瓦斯托波爾加強防御，反而沿途打劫村莊，那里的住戶在得知俄軍戰敗的消息后都已經逃走了。與所屬部隊和指揮官們失去聯系后，俄軍士兵完全忘記了紀律是什么。“哥薩克人是最壞的，”一名目擊者回憶道，“沒有什么東西他們不偷。”

如果看到一座屋子門窗緊鎖，他們會砸開大門，打爛窗戶，在每個房間里翻箱倒柜，只要是能拿得走的都不會留下。他們相信住戶一定在屋子里藏了金錢鉆石或其他細軟，于是把什么東西都倒騰一番，連沙發和扶手椅上的靠枕都不放過。書房和圖書也被搗毀，鏡子太大用不了的，就把它打碎，這樣就可以拿一塊放進自己的袋子里。[[34]](#_34_Dubrovin__Istoriia_krymskoi)

聯軍指揮官對俄軍此時的脆弱和混亂一無所知。拉格倫希望能盡快南下，根據事先同意的方案，直取塞瓦斯托波爾；但是這時法軍卻沒有準備就緒，他們在渡過阿爾馬河前，把背包留在了北岸，現在需要花時間取回。和英軍不同的是，法軍沒有足夠數量的騎兵可以追擊潰敗的俄軍，所以他們不太愿意沖得太快。失去先機后，聯軍指揮官就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了。他們雇傭的韃靼間諜傳回了錯誤的情報，說塞瓦斯托波爾北邊的星星要塞如何堅不可摧，緬什科夫決心在此全力防守，同時他們又說城市南邊幾乎沒有防御工事。這些錯誤信息促使聯軍指揮官決定放棄原來從北邊發起快速攻擊的想法，而是將部隊從東邊繞過城市，從南邊開始攻城。英軍的工兵指揮約翰·伯戈因爵士一直是這個方案的積極倡導者。[§§](#SSSS_Gen_Ju_E_Luo_Si_Fang_Mian_D)

聯軍改變計劃的另一個原因，是俄軍果斷的沉船行動。黑海艦隊的指揮官意識到自己的艦隊在速度和火力上都比聯軍艦隊遜色，因此決定將五艘帆船和兩艘護衛艦在港口的出海口處炸沉，以此阻止聯軍軍艦進入海港，從北邊支援攻城行動。這幾條船被拖到沉船地點，降下艦旗，還舉行了宗教儀式將船只交給大海，然后在9月22日午夜被炸沉。其中一條護衛艦“三圣徒號”（The Three Saints）沒有被一次炸沉，于是第二天早晨一條炮艦在近距離向它開炮，兩個小時后才終于將它擊沉。炮聲一直傳到了集結在卡恰河邊的聯軍那里，圣-阿諾在了解到炮聲緣由之后感嘆道：“真是對1812年莫斯科戰役的拙劣模仿啊。”[[35]](#_35_Den__i_noch__v_Sevastopole)

港口被堵之后，聯軍失去了艦隊火力的支援，指揮官們認為從北邊進攻塞瓦斯托波爾太危險了，決定改從南邊發起攻擊，這樣的話，英法艦隊還可以分別從巴拉克拉瓦和卡米什（Kamiesch）兩個港口提供支援。聯軍改變攻城計劃是一個致命的誤判，因為不僅城南的防御工事相對牢固，而且一旦聯軍將主力搬到南邊，就很難切斷俄軍通往北方腹地的補給線，這本來是聯軍計劃中的一個關鍵考慮。即使如此，如果聯軍能很快從南邊發起攻城行動，問題還不是太大，但是聯軍放棄了原來的“全力快擊”戰略后，就立刻陷入了常規的軍事思維：自17世紀以來，圍城戰一直是一個漫長而機械的過程，要先把塹壕一直挖到離城防不遠的地方，讓大炮可以轟擊守軍的防御工事，然后才發起步兵沖鋒。法軍比較喜歡長時間圍困的戰術，而且說服了英軍接受他們的傳統思維。長時間圍困確實看上去要比快速攻擊穩妥一些。英軍工兵指揮伯戈因本來是支持快速攻擊的，但此時卻改變了主意，他的理由很荒誕：如果對塞瓦斯托波爾發動快速攻擊，將會損失五百人，這樣的損失在他看來是“完全不合情理的”；然而聯軍在阿爾馬已經損失了三千六百人（而且還將在圍困戰中遭受數以萬計的人員損失）。[[36]](#_36_Egerton__Death_or_Glory__p)

9月23日，聯軍開始向南方移動。在頭兩天里，聯軍一直沿著卡恰河和貝爾貝克河（Belbek）的河谷行進，這里土壤肥沃，沿途的農莊主人已經逃離，到處都是葡萄、桃子、梨和其他成熟的軟水果，聯軍士兵毫不客氣地采摘食用。士兵們疲憊厭戰，許多人因為脫水而暈倒，沿途還不得不經常停下來掩埋染上霍亂身亡的戰友。然后聯軍部隊開始轉向南方，目標是繞到塞瓦斯托波爾以南，他們在因克爾曼高地（Inkerman Heights）茂密的橡樹森林兜兜轉轉一番之后，終于抵達了一處叫作麥肯齊農莊（Mackenzie’s Farm）的開闊地，這個地方是以一位18世紀定居這里的蘇格蘭人的名字命名的。在這里，英軍騎兵與俄軍遭遇，這批部隊是在緬什科夫帶領下向東北方向移動、前往巴赫奇薩賴的俄軍的后衛部隊。第十五國王驃騎兵團的路易·諾蘭上尉（Captain Louis Nolan）此時和拉格倫的參謀部一起，在隊伍的最前方位置。他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讓騎兵部隊一顯身手，狠狠打擊一下俄軍。諾蘭認為自從登陸克里米亞以來，好幾次英軍指揮部都沒有發揮騎兵的威力，先是在布爾加納克河第一次與俄軍遭遇時，然后是在阿爾馬河戰役中俄軍開始潰退時，這讓他越來越感到憤懣。這次他要求派驃騎兵攻擊俄軍后衛部隊的請求又被盧肯勛爵拒絕了，令他簡直憤怒難耐。在戰地日記中，他描述了當時在麥肯齊高地（Mackenzie Heights）上看著坡下俄軍在眼皮底下溜走的情景：

在下方的道路上，幾輛溜走的炮車和馬車正在急急逃跑。兩邊散亂的步兵也在往坡下逃跑，這些步兵既沒有頭盔也沒帶武器。我們的大炮向他們開了幾炮，他們就跑得更快了，一直往山下跑，那里有一隊又一隊的俄軍。我們有兩個騎兵團沿著道路向下追了一段距離，沿途繳獲車輛和馬匹，一共有二十二輛之多，其中還有戈爾恰科夫將軍的馬車，由兩匹漂亮的黑馬拉著。[[37]](#_37_NAM_1989_06_41__Nolan_diary)

聯軍的行軍隊伍越來越長，掉隊者要么過于疲憊趕不上隊伍，要么在茂密的森林里迷了路。軍紀開始散漫，許多士兵就和俄軍中的哥薩克部隊一樣，開始打劫塞瓦斯托波爾周圍因為主人逃亡而被遺棄的農舍和莊園。比比科夫（Bibikov）[¶¶](#PP_E_Luo_Si_Gui_Zu_Jia_Zu)的宮殿遭到了法軍的破壞和洗劫，士兵們從莊園巨大的酒窖里拿出香檳和勃艮第葡萄酒一邊喝一邊胡鬧，把家具從窗口扔到外面，打爛窗戶，還在屋內地板上大便。圣-阿諾元帥就在現場，但完全沒有阻止手下士兵搶劫鬧事，而把這看作對疲憊士兵的一種獎賞。他甚至還收下了手下送給他的一個搶來的茶幾，讓人運到君士坦丁堡送給他夫人。朱阿夫士兵本來就愛表演，他們到公主閨房里找來衣服穿上，男扮女裝演了一出喜鬧劇。有人找到一架大鋼琴，于是開始彈奏華爾茲舞曲，讓士兵們跳舞。宮殿的主人在法軍到達之前幾個小時才剛剛逃走，一名法軍軍官回憶道：

我走進一間小閨房……壁爐臺上的花瓶里還插著剪下不久的鮮花。在一張圓桌上擺著幾份[法語雜志]《畫報》（Illustration），一個寫字盒，一些紙和筆，還有一封沒有寫完的信。這封信是由一個年輕姑娘寫給她在阿爾馬前線作戰的未婚夫的，信中她談到了勝利和成功，那種自信充滿每一個年輕人，特別是年輕女孩的心。殘酷的現實將這一切——信件、幻想、希望——全都生生打斷。[[38]](#_38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e)

在聯軍部隊南下逼近塞瓦斯托波爾之際，恐慌正在克里米亞的俄羅斯人中蔓延。阿爾馬戰敗的消息嚴重打擊了士氣，戳穿了俄軍戰無不勝的神話，俄軍對法國人戰之能勝的神話還是1812年流傳下來的。在克里米亞行政首府辛菲羅波爾，俄羅斯居民異常驚慌，總督弗拉基米爾·佩斯捷利（Vladimir Pestel′）下令全城撤離。他們把財物搬上大車，向彼列科普逃去，希望趕在聯軍切斷克里米亞與俄羅斯大陸之間的通路之前逃離。佩斯捷利聲稱自己有病在身，第一個棄城而逃。自從恐慌開始蔓延，他就未在公開場合露面，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維持秩序，連韃靼人從俄羅斯人開的商店中拿走軍事物資送到聯軍那里，他也沒有管。在衛隊和一大幫隨從的簇擁下，佩斯捷利離城而去，沿路一大幫韃靼人朝著他的馬車譏諷嘲笑，大聲喊道：“看吶！邪教徒（giaour）[\*\*\*](#____Tu_Er_Qi_Ren_Dui_Ba_Er_Gan_D)跑了！我們的救星快到了！”[[39]](#_39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在聯軍登陸前，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還小心翼翼地向沙皇表忠心，自從聯軍到來之后，他們的膽子變得越來越大。自多瑙河流域戰事打響以來，克里米亞的俄羅斯當局就對韃靼人加強了監控，哥薩克騎兵在對鄉村進行管制時非常兇惡。但是聯軍剛一登陸，韃靼人馬上團結起來支持聯軍，特別是年紀較輕的男子，對俄羅斯統治還不是那么害怕。他們把聯軍入侵視為對自己的解放，而且土耳其士兵效忠的哈里發，也是韃靼人在清真寺祈禱的對象。幾千名韃靼人離開村莊前往葉夫帕托里亞，歡迎聯軍到來。他們認為一個新的“土耳其政府”已經在那里建立，并公開表示忠誠。聯軍部隊很快將當地一名韃靼商人托帕爾·烏默帕夏（Topal Umer Pasha）任命為葉夫帕托里亞總督。隨聯軍一起抵達克里米亞的還有穆薩德·格來（Mussad Giray），他是克里米亞汗國古老統治王朝的后代，呼吁克里米亞的韃靼人起來支持聯軍。[†††](#____Zai_E_Luo_Si_Zhan_Ling_Ke_Li)

韃靼人給聯軍送來牛馬和大車，認為可以因此獲得獎賞，有些人還為聯軍充當間諜或探子。另一些人則糾集在一起，組成馬隊掃蕩鄉下，揮舞著馬刀，頭頂反戴羊皮帽以示推翻沙皇統治。他們以燒毀屋子作為威脅，有時還以性命相逼，強迫俄羅斯地主把所有牲畜、食物和馬匹交給他們，算是送給“土耳其政府”的。“半島上所有俄羅斯居民都非常害怕韃靼馬隊。”赫爾松—陶利德（Kherson-Tauride）教區的東正教大主教因諾肯季（Innokenty）寫道。一名俄羅斯地主在自己的領地被劫之后，認為打劫他的韃靼馬隊是被伊瑪目煽動起來報復基督徒的，以為克里米亞將重新恢復穆斯林統治。一些叛亂馬隊不僅殘殺俄羅斯人，還對亞美尼亞和希臘人下手，摧毀教堂，甚至殺死教士，這是確有其事的。俄羅斯當局也故意挑動對宗教報復的恐懼，希望借此贏得俄羅斯居民對沙皇部隊的支持。因諾肯季在9月巡視克里米亞時，公開宣稱聯軍入侵是一場“宗教戰爭”，俄羅斯“有偉大而神圣的責任保護東正教信仰以對抗穆斯林的桎梏”。[[40]](#_40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9月26日，聯軍抵達了卡迪科伊村（Kadikoi），這里已經能夠望見克里米亞南部海岸。同一天，圣-阿諾終于向病魔投降，把指揮權交給了康羅貝爾。他坐上一條蒸汽機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但在船上心臟病發作去世，于是這條船將他的尸體送回了法國。這條船同時還帶回了一條錯誤的消息，說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已經打響了。聽到這一消息后，英國駐巴黎大使考利通知倫敦，說聯軍在幾天之內“就可能占領那座城市”。[[41]](#_41_T__Royle__Crimea__The_Great)

事實上，圍困戰要等到三個星期后才會開始。此時風中已帶著俄羅斯冬季的寒冷，聯軍慢慢地在可以俯瞰塞瓦斯托波爾的南部高地上安營扎寨。開始幾天英法兩軍的物資都通過巴拉克拉瓦輸送，這條狹窄的水道從海面上幾乎注意不到，只依稀可見懸崖上由熱那亞人修建的古要塞。[‡‡‡](#_______Ba_La_Ke_La_Wa__Yuan_Lai)很快聯軍就發現這個港口太小了，不可能讓所有帆船進來。于是法國人把基地轉移到了卡米什灣，將其作為一個補充基地。那里的情況比巴拉克拉瓦好，不僅港口大很多，而且靠近法軍在赫爾松涅索斯的營地——這里是弗拉基米爾大公帶領基輔羅斯人改信基督教的地方。

10月1日，埃爾貝上尉和法國軍隊一起來到高地，仔細偵察僅僅兩公里開外的塞瓦斯托波爾。他們用戰地望遠鏡可以“看到這座著名城市的許多細節來滿足好奇心”，埃爾貝在第二天給父母的信中寫道：

我們可以分辨得出在我們下方的防御堡壘，一大批人正在那里挑著擔子，揮舞著鐵鍬修建工事。你甚至可以在一大堆勞工中分辨出幾個女人來。用望遠鏡我能很清楚地看到港口中有幾條看上去有點陰郁的戰艦，倒在兩側的白帆，黑色的舷梯，大炮從炮眼伸出來。如果俄軍把所有這些大炮都安在堡壘上，那真的會有一場好戲呢！[[42]](#_42_J_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

[\*](#_78) 約一斤三兩褐面包和九兩肉。——編注

[†](#_79) 羅斯信中對塞瓦斯托波爾的錯誤拼寫。——譯注

[‡](#_80) 約九千六百五十六米。——編注

[§](#SS_6) 即圣經派猶太人。——譯注

[¶](#P_6) 克里米亞戰爭中英軍第一個受傷的是第十三輕龍騎兵團的普里斯特利中士（Sergeant Priestley），他失去了一條腿，被送回英格蘭。后來英國女王送給他一條用軟木做成的假腿。（A. Mitchell, Recollection of One of the Light Brigade ［London, 1885］, p.50）——原注

[\*\*](#_81) 在發出了進攻命令之后，拉格倫做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決定，帶領他的參謀們騎馬到戰線前方，以便更好地觀察戰斗。他們跨過阿爾馬河，停留在電報山上一處暴露的高地上，遠遠超過了英軍前線的位置，幾乎就和俄軍騷擾部隊比鄰。“我是怎么逃過一死的，實在是件神奇的事，”拉格倫的一名參謀蓋奇上尉（Captain Gage）第二天在阿爾馬寫道，“炮彈從我身邊呼嘯而過，子彈從我兩側和頭頂飛過，米涅來復槍和滑膛槍的槍聲在我耳邊尖叫，拉格倫勛爵參謀部（我所在之處）的馬匹和騎手在我身邊紛紛中彈倒下，非死即傷，然而我卻非常安全，完全沒有意識到身處險境。”（NAM 1968-07-484-I, “Alma Heights Battle Field, Sept. 21st 1854”）——原注

[††](#_82) 一位名叫達里婭·米哈伊洛娃（Daria Mikhailova）的俄羅斯女子，自己花錢買了一輛大車和一些藥品救助傷員，成了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傳奇人物。她的父親是塞瓦斯托波爾的一名水手，在錫諾普海戰中戰死，當時她才十八歲。在聯軍入侵克里米亞時，她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基地當一名洗衣工。根據民間流傳的說法，她把從父親那里繼承來的一點遺產全部變賣，然后從一個猶太商人那里買了一匹馬和一輛馬車，把自己頭發剪短，穿上水手裝束，隨著部隊一起去了阿爾馬。在那里她向傷兵們分發水、食物和酒，用醋為他們的傷口消毒，甚至撕下自己的衣服為他們包扎。士兵們看出她是女扮男裝，但沒有阻止她勇敢無私的舉動。她先是在卡恰河的包扎站為傷兵服務，當塞瓦斯托波爾被圍困時，又在醫院擔任護士。“塞瓦斯托波爾女英雄”的故事傳開了。她不僅成了普通俄羅斯人愛國精神的象征，還代表了被普希金等詩人一再浪漫化的俄羅斯女性的“犧牲精神”。因為不知道她的姓氏，塞瓦斯托波爾醫院里的傷兵就親切地把她叫作達莎·塞瓦斯托波爾斯卡婭（Dasha Sevastopolskaia，譯者注：“達莎”是“達里婭”的昵稱），而這成為她名留青史的名字。1854年12月她被沙皇授予了“熱忱金章”（Gold Medal for Zeal），成為唯一一個非貴族出身而獲得這項榮譽的俄羅斯婦女。皇后送給她一個銀十字架，上面刻著“塞瓦斯托波爾”字樣。1855年，達里婭嫁給了一個受傷退伍的戰士，在塞瓦斯托波爾開了一家酒館，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892年去世。（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 77）——原注

[‡‡](#_83) 俄國戰爭部下屬的工程部未能施行一份1834年的加固防御工事的計劃，聲稱缺乏資金，但與此同時，大筆資金被花在了離邊境線有幾百公里遠的基輔防御工事上。尼古拉一世總是擔心奧地利軍隊會從俄羅斯西南方入侵，于是在基輔地區布置了一支龐大的預備隊，卻沒有想到把塞瓦斯托波爾放到同等重要的高度，因為他不相信土耳其和西方列強會從黑海向這里發動進攻。蒸汽機船出現后，可以通過海路輸送大量陸軍部隊，這一技術革命對戰爭的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但是尼古拉一世完全忽視了這一點。——原注

[§§](#SSSS_5) 根據俄羅斯方面的資料，得知情報錯誤之后，英軍下令槍殺了這些韃靼間諜。（S.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od Sevastopolem ［St Petersburg, 1897］, p. 86）——原注

[¶¶](#PP_5) 俄羅斯貴族家族。——譯注

[\*\*\*](#_84) 土耳其人對巴爾干地區基督徒的蔑稱。——譯注

[†††](#_85) 在俄羅斯占領克里米亞之后，格來家族逃到了奧斯曼帝國。19世紀初，格來家族成員曾在巴爾干地區當過官員，有些還參了軍。奧斯曼帝國軍隊中有各種由克里米亞流亡者組成的軍事單位，這些人參加了1828—1829年的俄土戰爭，在1853—1854年間還加入了多瑙河流域土耳其軍隊。穆薩德·格來駐守瓦爾納，在那里，他說服了聯軍把他帶去克里米亞鼓動韃靼人起來支持聯軍入侵。9月20日，聯軍把穆薩德·格來送回了巴爾干，贊揚他的努力，認為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務。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后，他被法國授予了榮譽軍團勛章（Légion d’Honneur）。——譯注

[‡‡‡](#_86) 巴拉克拉瓦，原來被熱那亞人叫作貝拉克拉瓦（Bella Clava，意為“美麗港”），港口大部分由他們所建，曾一度十分繁榮。15世紀時，土耳其人驅逐了熱那亞人，并將鎮子洗劫一空。在19世紀前，這里基本上一直是一片廢墟。山坡之上有一個修道院，里面駐守著一些希臘士兵，聯軍到來之后都被趕走了。——原注

注釋

[[1]](#_1_7)J. Cabrol, Le Marechal de Saint-Arnaud en Crimée (Paris, 1895), p. 312;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19; 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 68; NAM 2000–02–94 (Rose letter, 28 Aug. 1854).

[[2]](#_2_7)P. de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aris, 1860), p. 5; E. Vanson, Crimée, Italie, Mexique: Lettres de campagnes 1854–1867 (Paris, 1905), p. 23; NAM 1978–04–39–2 (Hull letter, 12 July 1854); NAM 2000–02–94 (Rose letter, 28 Aug. 1854).

[[3]](#_3_7)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147–8.

[[4]](#_4_7)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50–51; 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p. 13–4, 21–2; A.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vo vremia krymskoi voiny: Po arkhivnym materialam (Simferopol, 1905), pp. 18–23; 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2, p. 166.

[[5]](#_5_7)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29–32; N. Mikhno, ‘Iz zapisok chinovnika o krymskoi voine’, in N. Dubrovin (ed.), Materialy dlia istorii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Sbornik izdavaemyi komitetom po ustroistvu sevastopol’skogo muzeia, vyp. 3 (St Petersburg, 1872), p. 7.

[[6]](#_6_7)W. Baumgart,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Oxford, 1999), p. 116.

[[7]](#_7_7)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35.

[[8]](#_8_6)Cullet, Un regiment, p. 68; Mole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 45.

[[9]](#_9_6)L. de Saint-Arnaud, Lettres du Marechal Saint-Arnaud,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 490.

[[10]](#_10_7)V. Bonham-Carter (ed.), Surgeon in the Crimea: The Experiences of George Lawson Recorded in Letters to His Family (London, 1968), p. 70.

[[11]](#_11_6)NAM 2003–03–634 (‘The Diary of Bandmaster Oliver’, 15, 16, 17 Sept. 1854); J. Hume, Reminiscences of the Crimean Campaign with the 55th Regiment (London, 1894), p. 47.

[[12]](#_12_6)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 44.

[[13]](#_13_6)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1, pp. 215–217; Hodasevich, A Voice, pp. 47, 68; Damas, Souvenirs, p. 11; M. Bot’anov, Vospominaniia sevastopoltsa i kavkatsa, 45 let spustia (Vitebsk, 1899), p. 6;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35.

[[14]](#_14_6)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 103.

[[15]](#_15_6)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 222; id.,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52; 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p. 75–6.

[[16]](#_16_7)Hodasevich, A Voice, pp. 55–6.

[[17]](#_17_6)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p. 106; Hodasevich, A Voice, p. 32; 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 21.

[[18]](#_18_7)R. Egerton, Death or Glory: The Legac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0), p. 82.

[[19]](#_19_7)Small, The Crimean War, p. 47; N. Dixon, On the Psychology of Military Incompetence (London, 1994), p. 39.

[[20]](#_20_6)M. Masquelez, Journal d’un officier de zouaves (Paris, 1858), pp. 107–8;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26–8;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p. 232–233; 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ee 1853–1856 (Paris, 1995), pp. 294–8; RGVIA, f. 846, op. 16, d. 5575, l. 4.

[[21]](#_21_6)Small, The Crimean War, p. 5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30–1;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0; Hodasevich, A Voice, pp. 69–70.

[[22]](#_22_6)Small, The Crimean War, p. 50;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30–1;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0; Hodasevich, A Voice, p. 70;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61; A. Massie,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 (London, 2004), p. 36.

[[23]](#_23_7)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64–5;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2, pp. 332 ff.; NAM 1976–06–10 (‘Crimean Journal, 1854’, pp. 54–5).

[[24]](#_24_7)Small, The Crimean War, pp. 51–4;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65–9; E. Totleben, Opisanie oborony g.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863–78), vol. 1, p. 194.

[[25]](#_25_6)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 13; Hodasevich, A Voice, pp. 73–6;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20.

[[26]](#_26_6)A. du Picq, Battle Studies (Charleston, SC, 2006), pp. 112, 223.

[[27]](#_27_6)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p. 267–8; Baron de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to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260–262.

[[28]](#_28_6)NAM 1974–02–22–86–4 (21 Sept. 1872); Bonham-Carter, Surgeon in the Crimea, p. 73.

[[29]](#_29_6)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p. 76–7.

[[30]](#_30_6)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96–97; Kh. Giubbenet, Slovo ob uchastii narodov v popechenii o ranenyh voinakh i neskol’ko vospominanii iz krymskoi kampanii (Kiev, 1868), p. 15.

[[31]](#_31_5)The Times, 1 Dec. 1854.

[[32]](#_32_6)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34; Egerton, Death or Glory, pp. 219–20; H. Drummo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855), pp. 49–50.

[[33]](#_33_5)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41–2; H. Elphinstone,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s Conducted by the Corps of Royal Engineers (London, 1859), pp. 21–2; 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p. 302–5; Totleben, Opisanie, vol. 1, pp. 66 ff.

[[34]](#_34_5)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p. 268–9.

[[35]](#_35_5)Den’ i noch’ v Sevastopole: Stseny iz boevoi zhizni (iz zapisok artillerista) (St Petersburg, 1903), pp. 4–5;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ée, p. 305.

[[36]](#_36_5)Egerton, Death or Glory, p. 92.

[[37]](#_37_5)NAM 1989–06–41 (Nolan diary, p. 35).

[[38]](#_38_5)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39;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pp. 119–20.

[[39]](#_39_5)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62–3;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1, pp. 293–302;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23; Hodasevich, A Voice, pp. 119–21.

[[40]](#_40_6)RGVIA, f. 846, op. 16, d. 5492, ll. 57–8;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pp. 9–10; ‘1854 g.’, Russkaia starina, 19 (1877), p. 338;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pp. 16–39; Molènes,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p. 46, 71–2.

[[41]](#_41_5)T. Royle, Crimea: The Great Crimean War 1854–1856 (London, 1999), p. 244.

[[42]](#_42_6)J. Herbe,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04.

# 第八章 秋天的塞瓦斯托波爾

如果埃爾貝能像托爾斯泰那樣，在1854年11月進入塞瓦斯托波爾城內，他會看見整座城市都在高度戒備中，到處緊張而匆忙。在《塞瓦斯托波爾故事》（Sevastopol Sketches）的宏大開篇中，托爾斯泰用筆讓讀者身臨其境。黎明時分，城市蘇醒了，生命躍然紙上：

在北邊，白天的活動正逐漸取代夜晚的安寧：看這兒，伴隨著滑膛槍的嘭嘭作響，一隊哨兵從旁邊走過，正在去換哨的路上；看這兒，一名列兵剛剛從戰壕里爬出來，用冰涼的水洗了洗古銅色的臉，轉向東方，迅速地在胸口劃了個十字，開始祈禱；再看這兒，幾匹駱駝拖著一輛笨重的大車，吱吱呀呀地駛向墓地，車上滿滿的都是帶血的尸體，將在那里被掩埋。走近碼頭，你能聞到一種特異的氣味，混合著煤炭、牛肉、糞肥和潮濕的味道。成千上萬件各色物品亂七八糟地堆放在一起——木柴、肉塊邊角、石籠網[\*](#__Zhuang_Man_Ni_Tu_De_Liu_Tiao_K)、面粉袋、鐵條等等——就這么堆在碼頭邊。來自各個部隊的士兵，有些帶著滑膛槍和背包，有些沒有，在這兒晃蕩著，抽著煙，相互吐著臟話，或是正在把沉重的物件從卸貨板上拖到錨泊的船上，煙囪里還冒著煙。民用帆船上，各色人等擠在一起——士兵、水手、商人、女人——沿著海濱頻頻靠岸、駛離……

碼頭邊色彩斑斕：士兵身上的灰色、水手身上的黑色、女人身上各種各樣的顏色。農婦在賣面包卷，手持大茶壺的俄羅斯鄉民吆喝著“熱蜜水”（sbiten）[†](#__Yi_Zhong_You_Feng_Mi_He_La_Jia)。就在這兒，在碼頭臺階的最底下，躺著加農炮彈丸、榴彈炮彈、霰彈、各種口徑的鑄鐵加農炮。稍遠處一大塊空地上，塞滿了大批的方木梁、炮架，還有橫七豎八正在睡覺的士兵，周圍是馬匹、篷車、裝著彈藥盒的綠色野炮、架在一起的步兵滑膛槍。士兵、水手、軍官、商人、女人和孩子來來往往；載滿干草、麻袋或是木桶的大車川流不息；時不時會冒出來一個騎著馬的哥薩克軍官，或者是坐在滑板車上的將軍。右邊的街道被一道街壘堵住了，炮眼里伸出一門小加農炮的炮管，坐在一邊的是一名水手，握著煙斗吞云吐霧。在左邊是一棟山形墻上刻著羅馬數字的端莊房子，站在墻下的士兵手里提著染著血污的擔架——到處都能看到軍營里特有的令人不快的景象。[[1]](#_1_L__Tolstoy__The_Sebastopol_Sk)

塞瓦斯托波爾是一個軍事城市，海軍基地有一萬八千人的部隊，而在這里的約四萬人口中，每個人的生活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和海軍基地的運作聯系在一起，正是這種緊密的關聯造就了這座軍港的頑強。有些水手和他們的家人自從1780年代建港之時就一直生活在這里。城市的社會生活很單調，在市中心大道上，除了海軍制服外，極少能看到穿著正式大衣的人。這里沒有出色的博物館、畫廊、音樂廳或是其他知識文化的珍寶，市中心威嚴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筑全都帶著軍事色彩：海軍部、海軍學校、軍火庫、軍營、修船廠、軍隊商店和倉庫、軍隊醫院，這里還有一個軍官圖書館，是歐洲最富有的軍官圖書館之一。甚至連貴族議事廳（就是托爾斯泰筆下那座“刻著羅馬數字的端莊房子”）在圍困期間也被改造成了一座醫院。

這座城市由兩部分組成：北城和南城，中間被港口隔開，船是溝通兩邊唯一的交通工具。在南城，沿著港口有一片雅致的新古典主義風格建筑；北城則仿佛另一個世界，幾乎沒有一條道路是兩邊都蓋滿房子的，住在這里的漁民和水手的生活方式是半農村式的，在小屋的花園里種植蔬菜飼養牲畜。在南城，與軍港西邊的行政中心相比，東邊的海軍碼頭區還是有細微差別的，在這里水手們或是住在軍營里，或是和家人一起住在小木屋里，離防御工事不過幾步之遙。女人們晾衣服的晾衣繩就掛在自己的小屋和堡壘或是棱堡外墻之間。[[2]](#_2_M__Vrochenskii__Sevastopol_sk)

和托爾斯泰一樣，來到塞瓦斯托波爾的訪客都會對這里“軍事營寨與市井生活、秀麗的市鎮與骯臟的露營奇異地交纏在一起”的景象留下深刻印象。葉夫根尼·葉爾紹夫（Evgeny Ershov）是一名年輕的炮兵軍官，他在1854年秋天來到塞瓦斯托波爾。當地居民在圍困期間的紛亂中依然正常地過著日常生活，讓他感到佩服。“這里讓人有一種奇異的感覺，”他寫道，“人們繼續自己正常的生活——一名年輕女子推著童車走在外面，商人仍在做買賣，孩子在街道上奔跑嬉鬧，而在他們周圍就是戰場，隨時可能死于非命。”[[3]](#_3_Tolstoy__Sebastopol_Sketches)

在聯軍入侵克里米亞之前，人們無盡地狂歡、暴飲、豪賭，仿佛沒有明天一般，妓女的客人絡繹不絕。聯軍登陸的消息傳來，向人們潑了一點涼水，但是下級軍官依然信心爆棚，以為俄軍一定能打敗英法聯軍，仍在為1812年的勝利而干杯。“我們當時情緒亢奮，”一名年輕的海軍學員米哈伊爾·波塔諾夫（Mikhail Botanov）回憶道，“我們一點都不怕敵人。唯一一個不像其余所有人那么自信的是一名蒸汽機船船長。和我們不一樣，他經常被派往海外，喜歡說一句諺語‘憤怒不等于力量’。后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他比我們有遠見，對現實狀況比我們懂得多。”[[4]](#_4_M__Bot_anov__Vospominaniia_se)

俄軍在阿爾馬的失敗讓塞瓦斯托波爾的平民恐慌起來，所有人都以為聯軍隨時可能從北邊進攻，所以當他們看到聯軍艦隊出現在南邊時，都感到不解，誤以為城市已經被包圍了。“沒有人不向上天祈禱，”一名居民回憶道，“我們都以為敵人馬上就會沖進城里了。”第四棱堡（Fourth Bastion）的炮臺指揮官尼古拉·利普金上尉（Captain Nikolai Lipkin）在9月底給自己在圣彼得堡的兄弟寫信說：

許多居民都已經逃離了，但是我們軍人會留在這里，準備教訓一下那些不速之客。連續三天（9月24、25和26日）都有宗教游行走過鎮中心和所有炮臺。戰士們站在他們的營地邊，當舉著十字架和神像的婦女在他們面前經過時，他們紛紛鞠躬。看到這一景象實在讓人感到謙卑……教堂里的財寶都轉移了，我說沒有必要這么做，但是沒人聽我的，他們都很害怕。所以，我的兄弟，目前局勢就是這樣，明天會發生什么，只有上天知道。

盡管利普金表現得很有自信，但其實在阿爾馬戰敗后，俄軍指揮官認真考慮過放棄塞瓦斯托波爾。在港口北邊有八艘蒸汽機船正在待命，隨時準備撤離部隊，在南邊有十條戰艦準備提供保護。當敵人逼近時，城市中的許多居民開始自發地逃離，但是被俄軍阻止了。城市供水能力降到了危險的程度，噴泉斷了水，居民只能從井里打水，而這個季節井里的水位本來就很低。聯軍從俄軍逃兵那里得知城里的供水來自他們駐扎的高地，于是切斷了水源，塞瓦斯托波爾只剩下給海軍碼頭供水的水渠中還有水。[[5]](#_5_E__Totleben__Opisanie_oborony)

當聯軍在南邊高地上安營扎寨，準備炮擊的時候，城內的俄軍開始夜以繼日地加強城南的防御工事。這時候緬什科夫不見了蹤影，指揮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任務主要落在三個人的身上：黑海艦隊參謀長科爾尼洛夫中將；工兵托特列邊；軍港總指揮納希莫夫，他是錫諾普海戰的英雄，很受水手歡迎，被認為是“自己人”。這三個人都是新型的職業軍人，與宮廷幕僚緬什科夫大相徑庭。他們精神十足，在哪里都能看到科爾尼洛夫，他每天都巡視防御工事的每一個角落，給人們鼓勁，承諾只要能守住城市，每個人都能論功行賞。托爾斯泰是利普金的隨從，他在抵達這里的第二天給哥哥寫信，描述科爾尼洛夫巡視陣地的情形。見到士兵時，科爾尼洛夫不是用“祝你們健康！”這樣傳統的問候方式，而是向他們喊：“如果要你拼命，你敢不敢挺身向前？”托爾斯泰寫道：“然后，士兵們一起高呼：‘我們敢，大人。萬歲！’他們不是裝樣子的。在每一張臉上，我看到的不是玩笑，而是極度真誠。”[[6]](#_6_Tolstoy_s_Letters__ed__and_tr)

其實對于能否守住，科爾尼洛夫心里遠不是那么肯定。他在9月27日給妻子的信中寫道：

我們只有五千預備隊和一萬水手，手里的武器五花八門，甚至還有用長矛的，實在稱不上是一支稱職的守軍。我們需要防守的戰線很長，而且非常分散，甚至連直接聯系都做不到。但是以后要怎樣就怎樣吧。我們已下定決心堅守。如果我們能守住，那會是個奇跡；如果我們守不住……

當他得知水手們在碼頭倉庫里找到大批伏特加并痛飲三天后，心里就更沒底了。科爾尼洛夫最后只好命令銷毀所有的酒，好讓水手做好戰斗準備。[[7]](#_7_S__Gershel_man__Nravstvennyi)

加強防御工事的工作進行得匆匆忙忙，不得不湊合了事。工程剛開始，守軍就發現塞瓦斯托波爾沒有鐵鏟，于是派人去敖德薩緊急采購，三個星期之后派去的人回來了，帶回來的卻是四百把鐵鍬。與此同時，城里軍民用木板做成木鏟開始了工作。全部塞瓦斯托波爾的人口——水手、士兵、戰俘、勞工、女人（包括妓女）——都投入了挖戰壕、給防御工事送土、修城墻和兵營、建造炮臺的工作。炮臺是由泥土、柴捆和石籠網建成的，水手們把自己船上的重炮拖到炮臺上。所有能擔土的工具都用上了，當籃子、包裹、木盆都用完后，挖土的人就用自己的衣服兜土。因為擔心敵人馬上要發起進攻，每個人都有很強的緊迫感。一年之后，當英法聯軍檢查這些防御工事時，不得不為俄羅斯人的技巧和創造力感到驚嘆。[[8]](#_8_E_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2)

在得知塞瓦斯托波爾人的英勇行為之后，沙皇在9月底給戈爾恰科夫將軍寫信，提醒他當年在面對拿破侖時，是“俄羅斯人的特殊精神”拯救了國家，呼吁他再次鼓起這種精神對抗英法兩國。“我們將向上帝祈禱，祈望你能鼓起這種精神，保住塞瓦斯托波爾、保住黑海艦隊、保住俄羅斯的土地。不要向任何人低頭，”他親自在這里加了下劃線，“向世界宣告，我們還是1812年的俄羅斯人，堅決不退縮。”沙皇還給當時在塞瓦斯托波爾外東北方向貝爾貝克河邊的緬什科夫寫信，讓他向城里人民傳達信息：

告訴我們年輕的水手，我的全部希望都在他們身上。告訴他們不要向任何人低頭，寄希望于上帝的慈悲，記住自己是俄羅斯人，是在守衛我們的祖國、我們的信仰，將自己托付在上帝手中。愿上帝保佑你們！我的祈禱全都為你們而做，全都為我們的神圣使命而做。[[9]](#_9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61)

與此同時，聯軍投入了漫長的圍困準備工程。拉格倫曾想立即發動進攻，他看出俄軍防守中有弱點。英軍第四師的指揮官喬治·卡思卡特爵士（Sir George Cathcart）是一位直截了當、才智高超的軍人，他也贊成拉格倫快速突襲的想法。從部隊占據的一處高坡上，他能俯視塞瓦斯托波爾全城。他在那里向拉格倫報告：

如果您和約翰·伯戈因爵士能到我這兒來的話，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防御布局，實在是沒有多少。他們正在修建兩三座土崗，但是整座城市的城墻就和公園的圍墻差不多，而且沒有妥善維護。如果把我們的部隊全部部署在海岸線和我現在的位置之間，我肯定，只要找個天黑的夜晚，或是破曉之前，我可以帶人就這么走進城里，而不用擔心傷亡損失。即使是大白天，我們都可以輕裝上陣、沖進城市，從這些土崗上也就只能朝我們開幾炮而已。

英軍工兵總指揮伯戈因原來是快速突襲的倡導者，現在卻不同意了，擔心快速突襲會造成過多人員傷亡。他堅持要先用圍困火炮打啞敵人的火力，然后才由步兵發起沖鋒。法國人的想法和他一樣。于是聯軍開始了一個將圍困火炮運上陸地，再拉到高地的漫長過程。英軍在運送火炮時問題重重，不得不把許多大炮拆了，才能從船上運到岸上。“把我們艦上的重炮部署到陸地上，是一件非常麻煩的事，”擲彈兵近衛團的威廉·卡梅倫上尉（Captain William Cameron）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艦炮不得不全部拆散，炮架也一樣，因為它們只有小滾輪，沒有大輪子，不方便移動。而一般的圍困火炮都架在大輪子上，可以直接推到部署位置。我們剛剛給一座炮臺部署了五門各九十五英擔（cwt）[‡](#___Yue_Si_Qian_Ba_Bai_Qian_Ke)重的六十八磅加農炮——全都是艦炮，過去的圍困戰從來沒見過這么重的大炮。地面非常糟糕，全是石頭，所以我們還得把修葺護墻的泥土運上去。[[10]](#_10_NAM_1968_07_292__Cathcart_to)

英軍花了十八天才把所有大炮部署好，在這關鍵的十八天中，俄軍加強了塞瓦斯托波爾的防御工事。

當英軍還在拉炮到位的時候，法軍已經開始挖塹壕了。他們冒著俄軍的炮火，慢慢地朝塞瓦斯托波爾防御工事方向修筑鋸齒形的塹壕。開挖第一條塹壕是最危險的，因為完全暴露在俄軍炮火下，無處躲藏。10月9日晚、10日凌晨，第一批士兵約八百人在夜幕下，攜帶鏟子和鶴嘴鋤，借助石塊的掩護，悄悄地摸到離塞瓦斯托波爾的“旗桿棱堡”（Flagstaff Bastion）不到一公里遠的地方，軍官在需要挖塹壕的地方劃上線，士兵們就地開挖，把土填到面前的石籠網里用來抵擋俄軍炮火。那個晚上天朗月明，但刮的是西北風，把挖塹壕的聲音傳得很遠。黎明時分，當睡眼惺忪的俄軍終于醒悟過來時，法軍已經挖出了一條一千米長的塹壕。在這之后，三千名法軍士兵冒著俄軍的猛烈炮火，繼續挖掘，每天晚上開挖新塹壕，白天則修補被俄軍炮火破壞的部分，爆破彈和迫擊炮的炮彈就從他們頭頂飛過。到10月16日，法軍已經修好了五座炮臺，用泥土袋和木頭做成柵欄、胸墻和堞墻，超過五十門大炮（包括加農炮、迫擊炮和榴彈炮）被安裝在高出地面的平臺上。[[11]](#_11_E__Perret__Les_Francais_en_O)

緊隨法軍之后，英軍也開始修筑塹壕。第一批炮臺建在綠山（Green Hill）和沃龍佐夫山（Vorontsov Hill）上，分別稱為“左翼攻擊位”（Left Attack）和“右翼攻擊位”（Right Attack），兩個位置之間是一條很深的山溝。五百名士兵輪班修筑炮臺，另外還有兩倍于此的士兵負責守衛炮臺，以備俄軍夜間發起襲擊。“今天早晨四點終于輪到我休息了，之前我已經在塹壕里待了二十四小時。”第二十團的拉德克利夫上尉（Captain Radcliffe）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當我們躲在前晚修好的胸墻背后時，是相當安全的。但是因為塹壕是俄軍炮火的目標，我們不得不一直在胸墻背后躺著，因為塹壕還沒完工，而俄軍的炮火又日夜不斷。有幾名士兵負責觀察，他們只把腦袋伸出塹壕外幾英寸，觀察俄軍炮兵陣地。如果在白天看到煙霧升起，或晚上看到火光，就高喊“炮擊來了”—— 那時候塹壕里所有人都立刻躺倒在胸墻背后，直到炮彈飛過才重新開工。這種辦法讓我們在白天的時候只損失了一名士兵，他是被一顆加農炮彈丸擊中的。[[12]](#_12_NAM_1982_12_29_13__Letter__1)

10月16日晚，盡管英軍炮臺還沒有完全修好，但聯軍終于決定從第二天早晨開始炮轟塞瓦斯托波爾。陣地上充滿了樂觀情緒。“所有的炮兵軍官——法國、英國和海軍——都說在四十八小時的炮轟之后，塞瓦斯托波爾就只會剩下一堆瓦礫了。”輕步兵師的一名參謀亨利·克利福德（Henry Clifford）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伊夫林·伍德（Evelyn Wood）是一名海軍學員，在阿爾馬戰斗期間他曾爬到桅桿頂觀戰，現在隨著海軍旅（Naval Brigade）轉移到了陸地上，他寫道：

10月16日，我們營地開始押注，賭俄軍能守多長時間。賭可以守住幾個小時的人都很少，因此賠率很高。一些年紀大些、比較謹慎的軍官估計俄軍也許能守住四十八小時，但這已是極端的看法。一名士兵想把他在阿爾馬時從一名俄國軍官身上拿到的巴黎造懷表賣給我，要價二十先令。我的一名同伴叫我不要買，他說四十八小時之后，這塊表就不再那么值錢了。[[13]](#_13_H__Clifford__Letters_and_Ske)

10月17日一大早，晨霧剛剛散去，俄軍觀察哨就發現敵人炮臺的炮眼已經打開。未等敵人開火，俄軍搶先開炮，接著聯軍的火炮，包括七十三門英軍火炮，五十三門法軍火炮，一起轟鳴。幾分鐘內炮擊就達到高潮，開炮時低沉的轟鳴聲，炮彈在空中翻滾的尖叫聲，還有炮彈落地時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完全淹沒了軍號和軍鼓的聲音。塞瓦斯托波爾被淹沒在一片巨大的黑色濃煙中，濃煙飄浮在戰場上空，天色都為之變暗，聯軍炮兵根本無法瞄準目標。“我們只能坐在那里猜測目標的位置，希望能夠擊中。”考爾索普寫道，當時他正和拉格倫一起，在沃龍佐夫山的采石場觀察炮擊效果。[[14]](#_14_S__Calthorpe__Letters_from_H)

幾千名平民的家園被炸成了廢墟，對許多躲藏在那里的居民來說，這是一生中最恐怖的時刻。“我從來沒有見過，也沒有聽說過這樣的情景，”一位居民寫道，“在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時間里，炮彈瘋狂飛舞的聲音從未中斷過，根本分不清楚是哪一發炮彈發出的聲音，腳下的大地不斷顫抖……天空中充滿了濃煙，遮住了太陽，如同夜晚一般，連房間里都滿是煙霧。”[[15]](#_15_Sevastopol__v_nyneshnem_sost)

炮擊一開始，科爾尼洛夫就帶著他的執旗中尉、V.I.巴里亞京斯基親王（Prince V.I. Bariatinsky）開始巡視各個防守位置。他們先去了整個塞瓦斯托波爾最危險的地方：第四棱堡，那里同時遭受英軍和法軍的炮擊。“在第四棱堡內，”巴里亞京斯基回憶道，“景象駭人，損壞嚴重，一整支炮兵隊都被榴彈炮火打倒了，擔架隊正在運走死傷者，但依然有成堆的人躺在那里。”科爾尼洛夫巡視了每一個炮位，為炮兵們鼓勁。接著他來到第五棱堡（Fifth Bastion），這里遭受敵人火力的壓力并不比第四棱堡小。在那里，科爾尼洛夫見到了軍港總指揮納希莫夫。和平常一樣，他還是穿著一件配有肩章的長大衣。納希莫夫臉部受了傷，但是巴里亞京斯基覺得他自己并未察覺，在和科爾尼洛夫說話時，他臉上的鮮血一直流到脖子上，染紅了他所佩戴的圣喬治十字勛章（St George Cross）的白色緞帶。正在交談時，巴里亞京斯基看到一名軍官向他們走來，但是“他沒有眼，也沒有臉，因為他的五官都被一片模糊的血肉覆蓋了”，原來一名水手在附近被炸飛，血肉都濺到了他的臉上。這名軍官一邊把臉上的血肉抹掉，一邊問巴里亞京斯基有沒有香煙。科爾尼洛夫的手下勸他不要繼續巡視了，因為實在太危險，但是他沒有聽從，繼續來到被稱為棱尖（Redan）的第三棱堡（Third Bastion），這里正被英軍重炮以致命的密集程度轟擊著。當科爾尼洛夫抵達時，棱尖棱堡的指揮官還是波潘多上尉（Captain Popandul），但是很快他就陣亡了，那天接替他的五任指揮官都遭到了同樣的厄運。科爾尼洛夫通過塹壕系統來到離英軍炮臺不遠的地方，越過山溝，爬進了馬拉科夫棱堡（Malakov Bastion），在那里和受傷的士兵們交談。就在他即將完成巡視，從山上爬下，走在烏沙科夫山溝（Ushakov Ravine）時，被一發榴彈擊中，下身被炸飛，送往軍事醫院后沒多久就死了。[[16]](#_16_V__Bariatinskii__Vospominani)

臨近中午時分，聯軍艦隊加入了炮擊行動，在港口入海口外排成一個弧形，從那里向塞瓦斯托波爾開炮。軍艦離海岸約八百至一千五百米遠，俄軍在入海口的沉船行動讓聯軍艦隊無法靠得更近。在長達六小時的炮擊中，聯軍共投入了一千二百四十門大炮，而守軍的海岸炮臺只有一百五十門炮。“這是我見到的最可怕的炮擊景象，”一名在更遠處的海面上觀戰的商船水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在日記中寫道，“幾艘軍艦連續不斷開炮，聽上去就像是掄打一面大鼓一樣……我們看到炮彈像冰雹一樣砸在要塞腳下的水面上，掀起陣陣巨浪。”開炮產生了巨大的煙霧，讓俄軍炮手連聯軍軍艦在哪里都看不清楚。有些炮手被嚇破了膽子，但也有一些十分勇敢，盡管聯軍炮彈就在他們頭頂附近炸開，還是瞄著籠罩在煙霧中的聯軍艦隊冒出火光的地方開炮。第十棱堡（Tenth Bastion）是法軍艦隊炮擊的重點，這里的一名炮兵軍官回憶說，他看到一些在過去曾因作戰勇敢而受嘉獎的士兵卻在這次炮擊開始時就嚇得逃跑了。“我被兩種情緒交纏著，”他回憶道，“一方面我想跑回家保護家人，但是我的責任心又告訴自己必須堅守。我作為一個男人的情緒戰勝了作為一名戰士的責任感，于是我丟下炮臺，去找家人了。”[[17]](#_17_NAM_1969_01_46__Private_jour)

但實際上，英法艦隊造成的破壞還不如自己遭受的損失大。聯軍的木殼帆船無法駛到離海岸足夠近的距離進行破壞——就憑這一點，俄軍沉船行動是有成效的——但是聯軍艦隊自己卻處在俄軍海岸火炮的火力范圍內。俄軍海岸火炮雖然數量較少，但因為是架在陸地上，所以射擊準確度比聯軍艦炮高得多。聯軍艦隊一共發射了約五萬發炮彈，卻沒有造成什么實際的破壞，只好起錨離去，清點損失：五條船嚴重損壞，三十名水手陣亡，超過五百人受傷。在缺少蒸汽動力的鐵殼船時代，聯軍艦隊在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中注定只能扮演配角。

聯軍第一天的炮擊在陸地上取得的成果也不那么令人鼓舞。法軍對魯道夫山（Mount Rodolph）的進攻剛取得一點進展，主軍火庫就被炸了，于是只能停火。英軍對第三棱堡造成了相當大的破壞，傷亡的一千一百名俄軍中，大部分是那里的；但是英軍缺少重型迫擊炮，無法讓火力優勢真正發揮作用。事前備受推崇的六十八磅蘭開斯特大炮（68-Pounder Lancaster gun）在發射榴彈時可靠性不夠好，炮擊距離較遠的俄軍工事效果不佳，炮彈又較輕，落地時會直接陷在泥土中。“我擔心蘭開斯特是一個失敗，”勒欣頓上尉（Captain Lushington）在第二天給艾雷將軍（General Airey）的報告中寫道：“我們的大炮射程不夠遠，對自己炮眼造成的破壞比對敵人的還多……我一再要求所有軍官在指揮發射時必須穩健緩慢……但是敵人離我們實在太遠了……炮彈打在那些土堆上，就像打在軟軟的布丁上一樣。”[[18]](#_18_A__Khrushchev__Istoriia_obor)

第一天炮擊的慘痛失敗讓聯軍警醒。“這座城市好像是用抗爆炸材料建成的一樣。”范妮·杜伯利（Fanny Duberly）寫道。她是跟隨她的丈夫、第八驃騎兵團（8th Hussars）的主計官亨利·杜伯利（Henry Duberly）來到克里米亞進行戰爭觀光的。“昨天雖然曾出現兩次小火，但立即就被撲滅了。”[[19]](#_19_Mrs_Duberly_s_War__Journal_a)

在俄軍方面，第一天的炮擊打破了聯軍在阿爾馬勝利中建立起來的神話。忽然之間，敵人不再是不可戰勝的，俄羅斯人重新獲得了希望和自信。“我們都以為城里的炮臺救不了我們，”一名塞瓦斯托波爾居民在第二天寄出的信中寫道，“所以你可以想象，當今天我們發現所有的炮臺都還在，所有的大炮也都在時，我們的驚訝之情！……上帝保佑了俄羅斯，我們為信仰而遭受的侮辱，終于得到了補償！”[[20]](#_20_Sevastopol__v_nyneshnem_sost)

\* \* \*

在扛過了第一天的炮擊之后，俄軍決心打破圍困。他們的計劃是進攻巴拉克拉瓦，切斷英軍補給線。阿爾馬戰敗之后，緬什科夫跑去了巴赫奇薩賴，目的是保證克里米亞與大陸的聯系不被切斷。現在戰略改變了，于是他開始在塞瓦斯托波爾東部的喬爾納亞（Chernaia）谷地集結部隊。這時第一批從多瑙河戰線趕來增援的部隊、帕維爾·利普蘭季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Pavel Liprandi）指揮的第十二步兵師已經趕到，加入了隊伍。10月24日晚，六萬名步兵、三十四個中隊的騎兵和七十八門大炮在恰爾根（Chorgun）村附近的菲久克希高地（Fediukhin Heights）安營扎寨，準備第二天早晨向巴拉克拉瓦的駐防英軍發起進攻。

俄軍的目標選擇得很好，英軍也知道自己兵力嚴重分散，如果敵人用大量兵力對他們的供應基地施行突襲，自己毫無還手之力。英軍在沃龍佐夫路（Vorontsov Road）兩側、被稱為堤道高地（Causeway Heights）的山脊上修建了六座小型土崗。這是一條東西向的道路，將巴拉克拉瓦谷地分為南北兩部分，菲久克希高地在路北，而路南的南部谷地中，就是一條通往巴拉克拉瓦港口的道路。聯軍在其中四座已經完工的土崗上派駐了土耳其守衛部隊，大部分由新兵組成，加上兩到三門十二磅大炮。在這些土崗后方，也就是谷地的南側，駐守著英軍第九十三高地步兵旅（93rd Highland Infantry Brigade），由科林·坎貝爾爵士指揮，他是負責港口守衛的總司令。在他們的側翼是盧肯勛爵率領的騎兵師。在更靠后的位置，可以俯視峽谷的高地上，駐守著一千名皇家海軍陸戰隊士兵，還有一些野戰炮兵。一旦遭受俄軍襲擊，坎貝爾可以請求英國步兵增援。駐扎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高地上由博斯凱將軍率領的兩個法國師也可以前來增援，但是在援軍到達之前，守衛巴拉克拉瓦的只有五千名士兵。[[21]](#_21_WO_28_188__Burgoyne_to_Ragla)

10月25日拂曉，俄軍的進攻開始了。在靠近卡馬拉（Kamara）村的地方修建了一座臨時炮臺后，俄軍開始向臨近的一號土崗發動猛烈炮擊。一號土崗建在康羅貝爾高地上，英軍以法軍指揮官的名字為這座山頭命名。前一天晚上拉格倫已經收到來自一名俄軍逃兵的警告，說進攻即將開始。但是就在三天前，拉格倫曾聽信假消息而派出一千名部隊前往巴拉克拉瓦增援，所以這次他決定按兵不動（這又是一次記在他頭上的失誤）。不過在當天早晨，當俄軍開始進攻的消息傳到指揮部時，他還是及時趕到薩坡恩高地（Sapoune Heights）觀察下方谷地展開的一場大戰。

就跟在錫利斯特拉的時候一樣，一號土崗上的五百名土耳其士兵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堅持了一個多小時，損失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士兵。但這時，一千二百名上了刺刀的俄軍向土崗發起了沖鋒，迫使疲憊不堪的守軍放棄陣地，七門從英軍那里借來的加農炮也丟了三門。“可惡的是，”在薩坡恩高地和拉格倫的參謀部一起觀戰的考爾索普回憶道，“我們看到一串士兵從土崗的后門跑出來，沿著山坡往下跑，穿過我軍的防線繼續逃跑。”這時候，其他三個臨近的土崗（第二、三、四號土崗）里的土耳其守軍看到一號土崗守軍已經逃離，也學著他們的樣子紛紛放棄陣地，朝著港口方向逃跑，手里還不忘拿著床單瓦罐和鍋子。他們穿過英軍（第九十三旅）防線時，還喊著“上船！上船！”。考爾索普看著一千名土耳其士兵從他們駐守的山坡上逃下，一大幫哥薩克騎兵在后面追殺他們。“那些狂野騎手的呼喝聲一直傳到我們這里，他們從山坡上直沖而下，追擊那些失魂落魄的土耳其人，其中不少人被哥薩克騎兵手中的長矛刺殺。”

當潰逃的土耳其士兵經過卡迪科伊村時，一群英國軍人的妻子在路邊向他們起哄嘲笑。其中有一個洗衣女工身形巨大，手臂粗壯，手腕“就像牛角般堅硬”。當一名土耳其士兵撞到她晾曬的衣物時，她一把將他逮住，狠狠地踢了幾腳。當她意識到眼前這個土耳其兵拋棄了她丈夫所屬的第九十三旅時，馬上怒罵起來：“你這個怯懦的異教徒，你逃跑了，卻讓勇敢的高地基督徒去抵擋！”周圍有的土耳其兵試圖安撫她，但是有些卻叫她“科卡娜”（Kokana）[§](#SS_Zhe_Shi_Tu_Er_Qi_Ren_Dui_Chua)。這更讓她怒火中燒：“科卡娜！好吧！我來把你咔嚓嚓！”她一邊吼叫，一邊揮舞著棍子把土耳其兵趕下山去。疲憊沮喪的土耳其士兵一直潰逃到通往港口的一個山溝才停下，把隨身東西全部往地上一丟，一頭倒在路邊，想歇一口氣。其中一些人把祈禱毯在地上鋪開，開始朝麥加方向祈禱。[[22]](#_22_Calthorpe__Letters__p__125)

英國人指責土耳其士兵怯懦，但這并不公平。據拉格倫勛爵的土耳其語翻譯約翰·布倫特（John Blunt）的說法，大部分土耳其士兵來自突尼斯，還沒有經過正式訓練，也沒有戰斗經驗。當他們抵達克里米亞時，已經餓得不行了，自從幾天前從瓦爾納上船起，他們就沒有收到過穆斯林可以吃的軍糧，以致一下船就做出了搶當地平民東西這樣丟臉的事。布倫特騎馬追上潰逃的土耳其士兵，向一名軍官傳達了盧肯要他們在第九十三旅后方重新集結的命令，但卻被土耳其士兵惡言相向。他說這些土耳其兵“因饑渴疲憊看上去像是枯萎了一般”。他們質問他為什么英軍沒有出動支援他們，抱怨說他們被丟棄在土崗里幾天沒有食物飲水，還聲稱供應給他們的炮彈與土崗里的大炮配不上。其中一個頭上纏著繃帶，抽著一桿長煙槍的士兵用土耳其語對他說：“長官，我們能怎么辦？這是上天的旨意。”[[23]](#_23_D__Austin___Blunt_Speaking)

俄軍步兵占領了堤道高地上的第一至第四土崗，在把其中的大炮炮架摧毀之后，丟棄了第四土崗。俄軍騎兵在雷若夫將軍（General Ryzhov）的指揮下，由東邊運動到這幾個土崗后方的巴拉克拉瓦北部峽谷（North Valley），然后轉過方向，朝著第九十三旅的防線發起了沖鋒，當時這道防線是唯一能夠阻擋俄軍直抵巴拉克拉瓦港口的英軍陣地，因為側翼的英軍騎兵已收到命令撤退，等待從塞瓦斯托波爾高地下來的增援部隊。雷若夫手下的四支騎兵中隊，約四百人，從堤道高地沖下，直撲高地旅而來。[¶](#P_Zhe_Chang_Zhan_Dou_Zhong_De_Yi)范妮·杜伯利正在輕騎兵旅營地附近的一個葡萄園觀戰，看到這一情景，感到十分恐慌。子彈“開始飛舞”，“現在俄軍騎兵正從山坡上沖下來，越過峽谷，直奔高地旅的細長防線而來。啊，情況緊急！面對迎面沖來的騎兵，那一細條的士兵怎么能對抗這么多的敵軍，這么快的沖鋒？然而他們卻在那里站著不動”。坎貝爾讓手下的士兵排成兩行，組成一條細長的防線，而不是組成通常對抗騎兵時排成的方陣，他把希望都寄托在米涅來復槍的威力上了，那是他在阿爾馬戰役時親眼目睹的。當俄軍騎兵向他們逼近時，坎貝爾騎著戰馬，沿著防線一邊奔跑一邊向士兵呼喊，要他們站穩了，“死就死在這里”。據第九十三旅的斯特林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Sterling）的說法，坎貝爾在說這些話時，“看上去像是當真的”。《泰晤士報》記者羅素也正在高地上觀戰，對他來說，第九十三旅的防線看上去像是“一條鋼繩尖頭上的紅色斑紋”（后來一直被錯誤地引用為像是一條“細長的紅線”）。看到前方紅色軍服組成的一條防線紋絲不動，俄軍騎兵倒開始猶豫了。就在這時候，雙方相隔已有一千米左右，坎貝爾發出命令，第一次齊射打響了。當煙霧散去后，第九十三旅的芒羅軍士（Sergeant Munro）看到“俄軍騎兵依然在向我們直沖而來。第二次齊射打響了。這時我們看到敵人中出現了一點混亂，他們開始轉向我們的右方”。第三次齊射在更近的距離打響，擊中了已經開始轉向的俄軍騎兵側翼，迫使他們急促左轉，掉頭回去。[[24]](#_24_Mrs_Duberly_s_War__p__93__NA)

雷若夫第一梯隊四個中隊的騎兵被打退了，但是俄軍騎兵主力、兩千人的驃騎兵加上外側的哥薩克騎兵，此時從堤道高地上沖下來，對高地旅發起了第二次沖鋒。這一次，英軍步兵得到了及時趕來的英軍騎兵的救援。重騎兵旅（Heavy Brigade）的八個中隊，約七百人，受命重返南部峽谷（South Valley）支援第九十三旅。這是拉格倫下的命令，從其觀戰的薩坡恩高地，他能清楚地看到高地旅面臨的危險。重騎兵旅慢慢爬上山坡，保持步調一致，隊形整齊，然后在離敵人約一百米處，向他們直沖過去，揮舞手中長劍，惡狠狠砍向敵人。英軍重騎兵的先鋒部隊是蘇格蘭灰騎兵團（Scots Greys）和因尼斯基林斯團（Inniskillings），即第六龍騎兵團（6th Dragoons）。他們完全被俄軍騎兵包圍，因為俄軍騎兵剛好在英軍騎兵沖鋒前延展了自己的側翼。但是從后面跟上的英軍第四和第五龍騎兵團很快加入了混戰，直撲俄軍騎兵的側翼和背后。纏斗中雙方騎兵緊緊擠在一起，完全沒有空間施展劍術，能做的僅僅是舉起長劍，揮起馬刀，向任何夠得著的地方砍去，就像一場街頭斗毆一般。第五龍騎兵團的軍士長亨利·弗蘭克斯（Sergeant Major Henry Franks）目睹列兵哈里·赫伯特（Private Harry Herbert）同時遭到三名哥薩克騎兵的攻擊。

他一刀劃過其中一人的脖子后方，使其再無還手之力。第二人見狀急忙逃跑了。赫伯特一劍刺向第三人的胸口，但是劍鋒在離劍柄三英寸[\*\*](#___Yue_Ba_Li_Mi_______Bian_Zhu)處折斷了……他把沉重的劍柄擲向俄軍騎兵，打在他的臉上。哥薩克騎兵立即摔在地上，他沒有死，但是被破了相。

第四龍騎兵團的威廉·福里斯特少校（Major William Forrest）回憶起這場瘋狂的搏斗以及他的對手時，這樣說道：

一個俄軍驃騎兵向我的腦袋砍來，但是被我的黃銅頭盔擋住，只是輕微擦傷。我向他砍去，但覺得沒怎么傷到他，就像他沒怎么傷到我一樣。我的肩頭還被不知道是誰打了一下，但是一定打得不著力，因為只是劃破了軟甲，造成了肩頭上的輕微擦傷。

讓人驚訝的是，在這場混戰中，傷亡人數很少，雙方加起來陣亡的不過十幾人，另有三百人左右受傷，大部分在俄軍這一方。不過這場戰斗持續時間很短，不到十分鐘。俄軍騎兵厚重的大衣和頭盔幫助他們抵擋了軍刀的砍殺，而他們自己的劍在英軍重騎兵面前又不怎么管用，因為英軍的馬匹更高大，盔甲保護更好，打擊范圍也更大。[[25]](#_25_H__Franks__Leaves_from_a_Sol)

在這樣一場纏斗中，總有一方最終會讓步潰退。這場戰斗中是俄軍心理先崩潰了，調轉馬頭向北部峽谷逃去，英軍騎兵在后面追趕，直到遭受俄軍在菲久克希高地和堤道高地炮臺上火炮的轟擊才撤回。

正當俄軍騎兵撤退時，從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高地下來增援的英軍步兵也趕到了，增援守在南部峽谷的第九十三旅。第一步兵師先到，隨后是第四步兵師，接著法軍增援部隊也到了，包括法國第一師和兩個中隊的非洲獵兵（Chasseurs d’Afrique）輕騎兵部隊。聯軍增援部隊到來之后，俄軍騎兵沒有膽量重新發起沖鋒。巴拉克拉瓦保住了。

當俄軍放棄目標，返回營地之時，在薩坡恩高地觀戰的拉格倫和他的參謀們注意到俄軍正在把堤道高地上土崗內的英軍大炮牽走。據說威靈頓公爵在戰斗中從未丟過一門大炮，這是他在英國軍事集團內的崇拜者們一直想保持的一個神話。如果英軍大炮被俄軍繳獲，送到塞瓦斯托波爾街頭當作戰利品展示，這一景象對拉格倫來說是無法忍受的。他立即向英軍的騎兵指揮盧肯勛爵發出命令，讓他奪回堤道高地上的土崗，并保證剛剛抵達的步兵會為其提供支援。盧肯在他自己所處的位置看不到聯軍步兵在哪里，認為自己指揮的騎兵不應單獨作戰，于是在接下來的四十五分鐘里沒有做出任何行動。拉格倫越來越擔心被俄軍俘獲的大炮的下落，口頭傳達了第二道命令給盧肯：“拉格倫勛爵希望騎兵快速向前行進——追擊敵人并盡力阻止敵人將大炮帶走。騎馬炮兵（Troop Horse Artillery）可以隨行。法軍騎兵在你左翼。立即行動。”

這道命令不僅不清楚，而且很奇怪，盧肯完全不知道應如何理解才對。他所處的位置是堤道高地的西端，從那里他可以看到的是：在他右邊，土崗里的英軍大炮被俄軍從土耳其守軍手中截獲；在他左邊，也就是北部峽谷的最盡頭則集結了大批俄軍，他能看到在那里有另一批大炮；在更左邊，在菲久克希高地的低坡上，他能看到那里的俄軍也部署了一個炮臺。如果拉格倫的命令能更清楚些，特別指明盧肯必須奪回的是堤道高地上的英軍大炮，那么接下來的“輕騎兵沖鋒”的結局將會大不一樣，但當時的實際情況是這道命令讓盧肯不清楚到底騎兵部隊要奪取的是哪些大炮。

唯一可以回答他這個問題的是傳達這道命令的副官，國王御用驃騎兵團（King’s Hussars）的諾蘭上尉。和其他許多英軍騎兵一樣，諾蘭對盧肯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無所作為感到越來越憤懣，覺得他沒有好好利用騎兵發動大膽勇猛的沖鋒，而騎兵沖鋒過去曾為英國在國際上贏得最佳聲譽。在布爾加納克河和阿爾馬河戰斗中，騎兵被下令停止追擊逃跑的俄軍；在朝著巴拉克拉瓦行軍的路上，騎兵在麥肯齊高地目睹俄軍在自己面前向東行進，而盧肯卻下令不許騎兵發起攻擊；就在這一天早晨，當重騎兵旅面對俄軍騎兵在人數上處于劣勢時，英軍輕騎兵旅就在不遠處，幾分鐘內就能趕到，但是指揮官卡迪甘勛爵卻拒絕調用輕騎兵追擊逃跑的敵人。輕騎兵旅的戰士們不得不在一邊眼睜睜地看著重騎兵旅的戰友與哥薩克騎兵搏殺，而就是這些哥薩克人曾在布爾加納克對停止作戰的輕騎兵各種嘲笑譏諷。一名軍官好幾次向卡迪甘勛爵請戰，都被拒絕，最后這名軍官將敬禮用劍在自己的腿上打了一下，以示不敬。隊伍中已經開始出現不服從命令的跡象。第八國王御用皇家愛爾蘭驃騎兵團（8th King’s Royal Irish Hussars）的列兵約翰·多伊爾（Private John Doyle）回憶道：

輕騎兵旅不得不旁觀重騎兵旅與敵作戰，自己卻不被允許上前協助，這讓他們很不高興。他們踩著馬鐙站直身體，喊道：“我們為什么待在這兒？”同時還有人沖出隊列，然后又跑回來，準備隨時出發追擊撤退的俄軍。但是敵人已經跑得太遠，我們追不上了。[[26]](#_26_Spilsbury__Thin_Red_Line__pp)

所以當盧肯詢問諾蘭，拉格倫的命令到底是什么意思時，兩人之間氣氛緊張，有一種以下犯上的感覺。盧肯在后來給拉格倫的信中說，當他詢問諾蘭哪個是他的攻擊目標時，諾蘭“以一種最為不敬，又極其肯定的姿勢”指著遠處的峽谷盡頭說：“您的敵人，長官，在那里；您的大炮在那里。”根據盧肯的說法，諾蘭指向的，不是堤道高地上的英軍大炮，而是集結在北部峽谷最遠處的哥薩克騎兵主力。在通往那里的道路兩邊，在堤道高地和菲久克希高地上，俄軍都布置了很多加農炮和來復槍手。盧肯向卡迪甘下達了進攻的命令，卡迪甘指出讓輕騎兵沖向一個被敵人火力三面包圍的峽谷是瘋狂之舉，但是盧肯堅持他必須服從命令。卡迪甘和盧肯是連襟，卻又相互討厭對方。這一點通常被歷史學家們用來解釋為什么兩人沒有好好商量，找出一個規避拉格倫命令的辦法（拉格倫的命令得不到下屬的執行，也已經不是第一次了）。但也有另外的證據顯示，盧肯擔心如果他違抗拉格倫的命令，再一次不讓輕騎兵旅發起沖鋒，部隊的反抗情緒將會爆發。盧肯自己在后來寫給拉格倫的信中說，如果他違抗這道命令的話，將“讓我和騎兵部隊遭到各種誹謗中傷，而我將無法為自己辯護”——顯然當說“誹謗中傷”時，他想到的是自己的手下以及其他英軍部隊。[[27]](#_27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p)

輕騎兵旅一共六百六十一名騎兵開始沿著北部峽谷平緩的下坡路向前行進，第十三輕龍騎兵團和第十七槍騎兵團（17th Lancers）組成第一道陣線，由卡迪甘帶隊，第十一驃騎兵團（11th Hussars）緊隨其后，再后面是由第八驃騎兵團和第四（女王御用）輕龍騎兵團（4th ［Queen’s Own］Regiment of Light Dragoons）組成的陣線。他們距離北部峽谷的盡頭約兩千米遠，按標準速度通過需要七分鐘時間——在那段時間內他們將面臨來自左側、右側和前方的敵方炮火和滑膛槍的攻擊。當第一行騎兵進入小跑狀態時，與第十七槍騎兵團在一起的諾蘭獨自沖向前方，揮舞著手中的劍，向騎兵們呼喝。描述這一事件的各種版本中，大部分說他要騎兵們盡快加速跟上，不過也有一些版本說他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試圖引導輕騎兵旅轉向堤道高地，也可能是南部峽谷，在那里輕騎兵可免遭俄軍炮火的轟擊。不論真實情況如何，俄軍發射的第一發榴彈在諾蘭頭頂爆炸，他當即身亡。不知道是因為效仿諾蘭的榜樣，還是他們自己迫切的求戰心情，抑或是為了以最快速度避開來自側面的火力，反正打頭的兩個騎兵團在還沒有收到沖鋒命令的時候，就開始策馬向前狂奔了。“加油！”一名第十三輕龍騎兵團的士兵喊道，“別讓那些混蛋 （第十七槍騎兵團） 搶先了。”[[28]](#_28_R__Portal__Letters_from_the)

英軍輕騎兵冒著來自周圍山坡上的交叉火力全速向前，加農炮彈飛舞而下，炸開地面，滑膛槍子彈如同冰雹一般砸來，擊中士兵，射倒戰馬。“炮聲和爆炸聲震耳欲聾，”第十一驃騎兵團的邦德軍士（Sergeant Bond）回憶道。

煙霧濃得讓人幾乎什么也看不見。到處都有戰馬和騎兵倒下，沒有受傷的戰馬都飽受驚嚇，我們無法讓它們直線奔跑。一個名叫奧爾里德（Allread）的士兵騎在我的左側，忽然就像塊石頭一樣掉下馬去。我回頭一看，只見這個可憐的家伙仰面躺在地上，右邊太陽穴處被打得稀爛，腦漿流了一地。

第十七槍騎兵團的騎兵懷特曼（Trooper Wightman）目睹了自己的軍士被擊中：“他的腦袋被一顆加農炮彈打飛，但是無頭的身體依然坐在馬鞍上，繼續向前了約三十碼，長矛依然緊緊地夾在他的右臂下。”第一條沖鋒陣線上倒下的士兵和戰馬實在太多，在后方一百米處的第二條線的騎兵不得不繞行或是減速，以避免踩到地上的傷員，或是躲開飽受驚嚇、到處亂跑的無人戰馬。[[29]](#_29_Spilsbury__Thin_Red_Line__pp)

在幾分鐘內，第一條沖鋒線上幸存的騎兵已經沖到了俄軍炮兵陣地上。據說卡迪甘第一個穿過了敵人陣線，他的戰馬在最后一刻往后縮了一下，躲過了近距離的齊射。“火焰、濃煙、吼叫，迎面直撲而來”，第十七槍騎兵團的托馬斯·莫利下士（Corporal Thomas Morley）回憶道，他將之比作“騎馬沖進火山口”。用手中長劍砍倒俄軍炮手之后，輕騎兵旅揮舞著馬刀向哥薩克騎兵沖去。哥薩克騎兵本來是受雷若夫命令向前保護炮兵的，其中一些大炮正被英軍騎兵拖走，但是哥薩克騎兵還沒來得及準備好就已經遭到輕騎兵旅的攻擊。“看到一支軍紀嚴明的騎兵部隊向他們逼近”，哥薩克騎兵“陷入了一片驚慌混亂中”，一名俄軍軍官回憶道。當哥薩克騎兵調轉馬頭，想奪路而逃時，卻發現逃生之路被后面的驃騎兵堵住了。為了求生，他們拿出滑膛槍在貼身距離內朝友軍開槍。俄國驃騎兵遭此意外，也開始恐慌，轉身向后逃跑，結果又撞上他們身后的其他騎兵部隊。整個俄軍騎兵部隊開始相互踩踏，朝恰爾根方向狼狽潰逃，有些還不忘拉上大炮。英軍輕騎兵旅的尖兵雖然在人數上處于一比五的劣勢，卻一直追擊到了喬爾納亞河邊。

一名下級炮兵軍官斯捷潘·科茹霍夫（Stepan Kozhukov）在喬爾納亞河邊的高地上目睹了俄軍騎兵的大潰逃。他描述說騎兵們擠在橋梁附近，而俄軍烏克蘭斯基團（Ukrainsky Regiment）和他所屬的炮兵連收到命令，必須堵住他們的退路：

他們一直在那里相互踩踏，混亂程度有增無減。在恰爾根山溝（Chorgun Ravine）的入口處，也就是包扎站所在的地方，四個驃騎兵團和哥薩克騎兵團擠在一起。就在這一大堆混亂的人馬中，有孤立的幾處，你能憑他們的紅色制服分辨出是英國人。看到眼前發生的一切，他們大概和我們一樣驚訝……敵人很快得出結論，他們完全不用擔心這些被嚇蒙了的驃騎兵和哥薩克人，在厭倦了砍殺之后，他們竟然決定按原路返回，再次穿過加農炮和來復槍的交叉火力。幾乎沒有語言可以描述這些瘋狂的騎兵所取得的戰績。在進攻途中他們損失了至少四分之一的兵力，卻似乎對危險和損失完全沒有感覺，很快整理隊伍返回，重新經過那一片遍地都是死傷戰友的空地。懷著令人恐懼的勇氣，這些兇猛的瘋子又出發了，沒有一個活著的、哪怕是受了傷的英軍騎兵投降。我們的驃騎兵和哥薩克騎兵花了很長時間才緩過神來，他們一直以為敵人的整個騎兵部隊都在追殺他們，當得知擊垮他們的不過是一小隊不怕死的敵人時，他們惱羞成怒，不愿意承認事實。

哥薩克騎兵最先從驚慌中清醒過來，但是他們不愿意返回戰場，而是“為自己找了其他一些事情做——抓戰俘，殺害躺倒在地的傷員，把英軍戰馬聚集起來售賣”。[[30]](#_30_S__Kozhukov___Iz_krymskikh_v)

當輕騎兵旅在返回路上重新經過北部峽谷的交叉火力帶時，利普蘭季下令在堤道高地的波蘭槍騎兵（Polish Lancers）對他們進行攔截。但是在目睹了輕騎兵旅沖過俄軍火力網、擊垮哥薩克騎兵的舉動之后，波蘭槍騎兵沒什么意愿和這些勇猛的輕騎兵作戰。他們攻擊了一小股英軍傷兵，但在大隊人馬經過時卻沒有什么動作。第四龍騎兵團的指揮官喬治·佩吉特勛爵（Lord George Paget）將第八驃騎兵團和第四輕龍騎兵團組織在一起撤退，當他們臨近波蘭槍騎兵時，“[槍騎兵們]小跑著向我們的方向移動”。

然后槍騎兵們停了下來（當然談不上是“立正”），露出一種困惑的神情（我想不出其他詞來形容），而這天在此之前我已經兩次使用了這個詞。他們先頭中隊右翼的一些士兵……和我們的右翼有短暫的沖撞，但是除此之外，他們什么也沒有做。事實上兩軍之間只有不到一匹馬的距離，但是他們就讓我們這樣小心翼翼地從面前過去了。當我們通過他們的防線時，我相信，沒有損失一個人。這是怎么做到的，我不知道！對我來說還是一個謎！即使那支部隊是由英國女士組成的，我覺得我們中都不可能有一個人能逃得出來。[[31]](#_31_G__Paget__The_Light_Cavalry)

實際上，英國女士們此時正在薩坡恩高地上，和其他觀戰者一起看著輕騎兵旅的戰士們三三兩兩地往回撤退，許多都受了傷。觀戰者之一是范妮·杜伯利，她不僅心懷恐懼地觀看了戰事，那天下午她還和丈夫一起，就近觀察了戰場上的慘狀：

我們慢慢地騎過早晨戰斗發生的地點，周圍是已經死去的和瀕臨死亡的戰馬，不計其數。在我身邊背部朝天趴著一名俄軍士兵，一動不動。在我右邊不遠處的一座葡萄園里，一名土耳其士兵四肢張開，已經死了。戰馬大部分都死去了，全都沒有了馬鞍，死去時的姿態表明它們經歷了極端的痛苦……然后我們還看到受傷的士兵正在向山坡上爬去！[[32]](#_32_Mrs_Duberly_s_War__p__95)

在六百六十一名參加沖鋒的輕騎兵中，一百一十三名戰死、一百三十四名受傷、四十五名被俘，三百六十二匹戰馬失蹤或被殺，這個數字并不比俄軍方面的傷亡人數高出多少（俄軍有一百八十人傷亡——幾乎所有傷亡都發生在第一和第二條防線），也遠遠低于英國報刊報道的數字。《泰晤士報》報道說八百名騎兵發起沖鋒，只有兩百人返回；而《倫敦新聞畫報》（Illustrated London News）報道說只有一百六十三人安全返回。根據這些報道，這場戰斗很快演變成一個憑借英國將士的英勇犧牲來挽回“失誤”的悲劇傳說——在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著名詩歌《輕騎兵沖鋒》（“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出版后，這一神話就在英國文化中永遠扎下根來。這首詩發表在事件發生的兩個月后：

“前進，輕騎兵！”

有沒有哪個驚慌失措？

雖然無人退縮，但戰士們知道

有人犯了大錯。

他們的職責不是抗命，

他們的職責不是辯駁，

他們的職責是行動和付出。

沖進死亡峽谷的

是那六百名騎手。

但是和這一“光榮失敗”神話所描述的情況相反，盡管付出了沉重的傷亡，但輕騎兵沖鋒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成功。騎兵沖鋒的目的是打亂敵人防線，把他們從戰場上嚇跑，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說，正如俄軍所承認的那樣，輕騎兵沖鋒達到了目的。英軍在巴拉克拉瓦戰場上的真正失誤，不是輕騎兵沖鋒，而是當重騎兵打退了俄軍騎兵，以及在輕騎兵擊潰對方陣線后，沒有采取任何后續動作，一舉消滅利普蘭季的部隊。[[33]](#_33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p)

英國人責怪土耳其人造成了巴拉克拉瓦的失敗，指責土耳其人因怯懦而丟掉了土崗。英國人后來還聲稱土耳其人搶劫財物，不僅偷盜英軍騎兵的東西，還去周圍村莊打劫，“對巴拉克拉瓦周圍不幸的村民施以冷血暴行，割開男人的喉管，把他們柜子里的東西洗劫一空”。盧肯的土耳其語翻譯約翰·布倫特認為這一指責是不公平的，而且即使搶劫真的發生了，作孽的也是那些“跟著軍隊跑的來路不明的人，經常能看到他們游蕩……在戰場”。在以后的日子里，土耳其人受到了極為惡劣的對待，據布倫特說，他們經常被英軍毆打、咒罵、吐口水、譏諷，有時候被迫“替英軍扛背包蹚過巴拉克拉瓦道路上的積水和泥沼”。在英軍眼里，土耳其士兵和奴隸沒什么兩樣，命令他們挖戰壕，或是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爾高地間運輸沉重的物資。因為宗教信仰的原因，大部分英軍配給的口糧土耳其士兵都不能吃，所以他們從來都沒有足夠的食品供應。情況嚴重時，一些土耳其士兵開始偷東西，因此遭受英軍指揮官鞭笞，遠遠超過英軍自己最多四十五下的規定。有四千名土耳其士兵參加了10月25日的巴拉克拉瓦戰役，到1854年年底，這些人中一半死于營養不良，還有許多因為太虛弱而無法參戰。然而，土耳其人依然舉止莊重，至少在布倫特看來是這樣，“遭遇惡劣的對待和長時間的折磨，他們卻表現堅忍，讓人感到震驚”。巴拉克拉瓦的土耳其軍隊指揮官，埃及人呂斯泰姆帕夏（Rustem Pasha）呼吁士兵們“耐心服從，不要忘記英國軍隊是蘇丹的客人，是來捍衛奧斯曼帝國尊嚴的”。[[34]](#_34_N__Woods__The_Past_Campaign)

在俄羅斯方面，巴拉克拉瓦戰役被當作一場勝仗來慶祝。占領堤道高地的土崗確實可以說是一場戰術勝利，俄軍已經占領關鍵位置，可以隨時進攻聯軍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爾高地之間的補給線，英軍退縮到了卡迪科伊附近的內部防線。第二天，塞瓦斯托波爾舉行了東正教游行，繳獲的英軍大炮被拉到街上，俄軍士兵還展示了其他各種戰利品：英軍大衣、佩劍、軍袍、頭盔、靴子還有軍馬。塞瓦斯托波爾城內的士氣也因為這場勝利立刻高昂起來。自從阿爾馬戰敗以來，俄軍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在開闊地上與聯軍一爭高下了。

10月31日，沙皇正在加特契納（Gatchina）行宮，來自塞瓦斯托波爾的信使一大早就給他帶來了勝利的消息。當時安娜·丘特切娃正陪伴皇后在軍火庫大廳（Arsenal Hall）欣賞貝多芬樂曲的演奏，她在日記中描述了當天的情景：

這條消息讓我們所有人的情緒都高漲起來。當沙皇來見皇后，告訴她這個好消息時，因為實在太激動了，他在我們所有人面前一下跪倒在神像面前，眼淚直流。皇后和她女兒瑪麗亞·尼古拉耶芙娜（Maria Nikolaevna）看到沙皇這副嚇人的樣子，以為塞瓦斯托波爾淪陷了，也雙雙跪倒在地。但是他終于冷靜下來，告訴了她們這一讓人高興的消息，并且馬上下令舉行感恩祈禱儀式，宮廷里所有人都參加了。[[35]](#_35_N__Dubrovin__349_dnevnaia_za)

\* \* \*

受到巴拉克拉瓦之戰勝利的鼓舞，俄軍在第二天向英軍右翼的哥薩克山（Cossack Mountain）發起了進攻。這是一座V字形的山梁高地，兩千五百米長，由北向南連接塞瓦斯托波爾東部和喬爾納亞沿岸地區，整個地區被英軍稱為因克爾曼山（Mount Inkerman）。10月26日，五千名俄軍士兵從塞瓦斯托波爾出發，在費奧多羅夫上校（Colonel Fedorov）的指揮下，向東行軍，然后轉向南方，爬上了哥薩克山。當時德萊西·埃文斯指揮的英軍第二師駐守在山頂高地南部的“故鄉山脊”（Home Ridge），從那里再往南是陡峭的下坡路，一直延伸到巴拉克拉瓦平原。此時埃文斯手下只有兩千六百名士兵可以調度，其他人都在別處挖塹壕。雖然英軍完全沒有防備，但是部署在炮彈山（Shell Hill）的外圍警戒哨在發現俄軍后，成功地用手中的米涅來復槍抵擋了一陣，讓埃文斯有時間調來炮火支援，在俄軍視野之外布置了十八門大炮。他讓手下部隊把俄軍引誘到大炮射程之內，然后一陣炮轟，把俄軍趕了回去，幾百名死傷的士兵被丟在故鄉山脊前的樹叢中。[[36]](#_36_A__Kinglake__The_Invasion_of)

還有更多的俄軍士兵被英軍俘虜了，許多人自愿投降或是偷偷逃到了英軍這邊。他們帶來了有關塞瓦斯托波爾的各種可怕故事，說那里水源不足，醫院人滿為患，到處是在炮擊中受傷的人和霍亂患者。一名在俄軍中服役的德國軍官告訴英國人“他們不得不離開塞瓦斯托波爾，因為城內氣味實在難聞，街道上躺著死傷者。以他的觀點，這座城市很快將落入英國人手中”。據第二十團的主計官戈弗雷·莫斯利（Godfrey Mosley）的說法：

幾天前出城襲擊我們的部隊……全都醉醺醺的。醫院里的味道如此難聞，你最多只能在里面待幾分鐘。一名被俘的軍官告訴我們，他們都是先被灌了許多酒，等到情緒激昂的時候，就有人鼓動他們，說誰和我一起去把英國狗趕下大海。結果是他們被我們趕回了老地方，而且在短時間內損失了約七百名士兵。這位軍官還告訴我們，如果我們在剛剛抵達時就發起進攻，很容易就能把城攻下，但是現在會有點困難。[[37]](#_37_NAM_1963_11_151__Letter__27)

事實上，俄軍的這次襲擊只是一次試探，目的是為在因克爾曼山對英軍發動大規模進攻做準備。這是沙皇本人的主意。他在得到拿破侖三世準備向克里米亞投入更多兵力的消息后，認為緬什科夫應該利用俄軍在人數上的優勢，在增援法軍到來之前，盡快打破圍困，或者至少將戰事拖延到冬天（“我有兩個將軍，他們從來沒讓我失望過：一月將軍和二月將軍。”尼古拉說道，用了一句1812年戰爭后流傳下來的俗話）。11月4日，俄軍又得到了更多增援：兩支從比薩拉比亞趕來的步兵師到達了，分別是隸屬第四軍的第十師，由索伊莫諾夫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Soimonov）指揮，以及第十一師，由帕夫洛夫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Pavlov）指揮。現在緬什科夫手下已有一支十萬七千人的部隊可以調動，這還不包括水手。一開始緬什科夫還反對發動新一輪進攻的想法（他依然傾向于放棄塞瓦斯托波爾），但是沙皇態度堅決，甚至派他的兩個兒子米哈伊爾大公（Grand Duke Mikhail）和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前來鼓舞部隊并且保證施行他的計劃。在這樣的壓力下，緬什科夫終于同意發起攻勢，他相信相對于法軍來說，英軍比較好對付。一旦俄軍攻占因克爾曼山，在上面建立炮臺，那么聯軍圍困部隊的右翼后方將暴露在俄軍炮火之下，這時聯軍必須得重新奪回因克爾曼高地，否則將不得不放棄圍困計劃。[[38]](#_38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vol)

俄軍10月26日發動的襲擊雖然損失慘重，卻暴露了因克爾曼山上英軍防守的薄弱。德萊西·埃文斯和伯戈因好幾次提醒拉格倫這些關鍵的高地易受攻擊，必須加強防守兵力構筑工事。博斯凱指揮的法軍步兵師駐守在因克爾曼山南側的薩坡恩高地，他幾乎每天都寫信給拉格倫，發出同樣的警告，而且法軍總指揮康羅貝爾還承諾立即提供協助。但是拉格倫沒有采取一點措施加強防守，即使是在遭到俄軍襲擊之后也不見動靜。法軍指揮官大為不解，為什么“如此重要、如此暴露的位置”竟然“完全沒有防御工事保護”。[[39]](#_39_B__Gooch__The_New_Bonapartis)

拉格倫的無所作為不僅僅是出于疏忽，也是一種對風險的估算：英軍人數太少，戰線嚴重拉開，不可能保護所有位置。如果敵人在多個位置同時發起進攻，英軍將無力應付。在11月的第一個星期，英軍步兵已經精疲力竭。自從在克里米亞登陸以來，他們幾乎沒有好好休息過，就像列兵亨利·史密斯（Private Henry Smith）在1855年2月給父母的信中所寫的那樣：

在阿爾馬和巴拉克拉瓦戰役結束后，我們立刻投入了工作。從9月24日起，我們每天的休息時間從未超過四個小時，很多時候，甚至連一杯咖啡都沒來得及煮，就被分派執行其他任務了，這樣直到10月14日。雖然炮彈和子彈像冰雹一樣在頭頂飛過，但是我們已經太疲倦了，這時候你讓我們睡在炮口都可以……我們經常必須連續二十四小時待在塹壕里，而且那里沒有一個小時是干的，所以當我們回到營地時全身都濕透了，泥巴甚至浸沒到肩頭。就是這樣，我們還得行軍前往因克爾曼，饑腸轆轆、口渴難耐，卻連一塊面包和一口水都沒有。[[40]](#_40_NAM_1994_02_172__Letter__22)

緬什科夫的計劃就是10月26日襲擊（后來這場演練被稱為“小因克爾曼”）的放大版。11月4日，第四軍的兩個師剛從比薩拉比亞趕到，緬什科夫就下達命令，宣布進攻將在第二天早晨六點開始。索伊莫諾夫將帶領一萬九千人的部隊和三十八門大炮，沿著與10月26日相同的路線發起攻擊，占領炮彈山。帕夫洛夫的部隊（一萬六千人和九十六門大炮）從東面過來，在越過喬爾納亞河之后，從因克爾曼橋（Inkerman Bridge）上山。兩支部隊在炮彈山會合后，由丹嫩貝格將軍（General Dannenberg）接替指揮，將英軍從因克爾曼山上趕下去。與此同時，利普蘭季的部隊負責干擾博斯凱在薩坡恩高地上的部隊。

這個作戰方案要求不同攻擊部隊之間高度協調行動，在一個無線電還沒有發明的年代，這個要求對任何軍隊來說都太高了，更別說是俄羅斯軍隊了，他們連高分辨率的地圖都沒有。[††](#___Suo_Yi_Mo_Nuo_Fu_Yi_Kao_De_Sh)在作戰中途還要更換指揮官——這樣的安排幾乎是在等待災難發生，特別是接替指揮的還是丹嫩貝格。他是參加過拿破侖戰爭的老兵，有一系列失敗和遲疑不決的紀錄，難以激發士兵的斗志。但是這個作戰方案的最大缺陷是以為能將三萬五千名士兵和一百三十四門大炮布置在炮彈山狹窄的山脊上，那里是一片崎嶇的灌木叢地，只有三百米寬。丹嫩貝格意識到這樣的安排不現實，于是在行動開始的最后關頭改變計劃。11月4日深夜，他命令索伊莫諾夫改變計劃，不要從北邊爬上因克爾曼山，而是向東行軍至因克爾曼橋，掩護帕夫洛夫的部隊渡河。然后以這座橋為起點，進攻部隊從三個不同方向爬上因克爾曼山，從側翼包抄英軍。這一突然改變令人迷茫，但是更讓人迷茫的事情還在后頭。凌晨三點鐘時，索伊莫諾夫已率領部隊從塞瓦斯托波爾向東，朝著因克爾曼山的方向行進，忽然收到另一條丹嫩貝格的命令，讓他調轉方向，準備從西邊發起進攻。索伊莫諾夫認為現在改變行動將危及整個計劃的成功機會，于是決定不聽從丹嫩貝格的命令，轉而采用他本人傾向的方案，從北邊發起進攻。就這樣，仗還沒有開始打，三名指揮官的作戰方案就已經不一樣了。[[41]](#_41_Khrushchev__Istoriia_oborony)

凌晨五點鐘的時候，索伊莫諾夫部隊的尖兵已經悄悄爬上了高地，還運上去了二十二門野炮。過去三天一直在下大雨，陡峭的山坡泥濘濕滑，士兵和馬匹艱難地運送野炮上山。那天晚上雨停了，升起一片厚厚的霧，掩護了他們行動。“濃霧保護了我們，”安德里阿諾夫上尉（Captain Andrianov）回憶道，“我們只能看到前方幾英尺遠的地方。濕氣讓人感覺寒冷刺骨。”[[42]](#_42_A__Andriianov__Inkermanskii)

濃霧對后來的戰事發展起了關鍵作用。士兵看不到高級指揮官在哪里，命令失去了意義。士兵只能依賴連隊指揮官，當連隊指揮官也找不到的時候，就必須自己做決定，依靠自己獨立作戰，或是與那些他們能看得到的戰友協同，基本上必須自己想辦法。這場戰斗將成為一場“士兵的戰斗”——這是對現代軍隊的終極考驗。所有進展都依賴小作戰單位的內部合作，每一名士兵都成為自己的將軍。

在開始的幾個鐘頭內，濃霧對俄軍有利，掩護了他們的行動，讓他們能摸到離英軍位置非常近的地方，滑膛槍和大炮在射程上與米涅來復槍的差距也不重要了。英軍設在炮彈山的警戒哨沒有察覺到俄軍的逼近。為了躲避惡劣的天氣，他們轉移到了山腳，在那里他們什么也看不到。他們在晚上稍早時聽到了軍隊行進的聲音，卻未能觸發應有的警覺。列兵布盧姆菲爾德當天晚上在因克爾曼山擔任警戒任務，能夠感覺到來自塞瓦斯托波爾的躁動，整個晚上教堂的鐘聲都斷斷續續地響著，但是他什么也看不到。“外面是一片濃霧，濃到我們都看不見在十碼以外人，而且幾乎整夜都在下小雨，”布盧姆菲爾德回憶道，“直到午夜前，一切還都很正常。午夜時分，一些哨兵報告說聽到輪子滾動的聲音，還有聽上去像是上子彈和炮彈的聲音，但是執勤軍官沒有進一步關注。整個夜晚，從九點鐘開始，教堂的鐘聲一直在敲，樂隊在演奏，整個鎮子籠罩在一片巨大的噪音中。”

在他們還沒醒悟過來時，炮彈山的警戒哨就被索伊莫諾夫的騷擾部隊占領了。緊接著，俄軍步兵的先頭部隊在霧中出現，一共有六千人，分別來自科雷萬斯基（Kolyvansky）、葉卡捷琳堡（Ekaterinburg）和托姆斯基（Tomsky）三個團。俄軍在炮彈山上架好了大炮，開始用火力壓制英軍防線。“當我們后撤時，俄軍正像惡魔般吼叫著向我們沖來。”指揮警戒任務的休·羅蘭茲上尉（Captain Hugh Rowlands）回憶道，他帶領手下人后撤，沿著山坡往上爬，撤到后方一個制高點后，命令手下開槍還擊，結果發現來復槍的火藥已經被雨完全淋濕，打不響了。[[43]](#_43_Dubrovin__Istoriia_krymskoi)

槍炮聲終于驚醒了第二步兵師，士兵們身著內衣東奔西跑，忙著穿上衣服，收起帳篷，然后抓上來復槍加入隊伍。“非常匆忙混亂，”德比郡團的喬治·卡邁克爾（George Carmichael）回憶道，“一些拉零散包裹的牲畜被槍聲驚嚇了，在營地里狂奔，在各處執行不同任務的士兵紛紛趕回來加入隊伍。”[[44]](#_44_NAM_1968_07_264_1___The_95th)

當天第二師的指揮官是彭尼法瑟將軍（General Pennefather），他是德萊西·埃文斯的二把手，埃文斯早前因為從馬上摔下來受了傷，把指揮權交給了彭尼法瑟，但是他依然留在營地指導工作。彭尼法瑟選擇了與10月26日不同的戰術，沒有像埃文斯那樣將敵人引誘到英軍部署在故鄉山脊背后的大炮射程內，而是不斷向警戒哨增兵，盡量阻止俄軍靠近，以此爭取時間等待援軍到來。彭尼法瑟不知道這一天英軍面對的是超過六倍人數的俄軍，但他的戰術靠的是在濃霧掩護下，敵人不知道他缺乏兵力。

英軍士兵在彭尼法瑟的指揮下勇敢抵抗俄軍的進攻。他們在前方以小組方式作戰，相互之間被濃霧和煙塵隔離。因為位置太靠前了，彭尼法瑟根本看不到他們，更別說指揮他們，或是用炮火支援了。故鄉山脊上兩個野炮連的炮手只能朝著大概是敵人的方向開炮。卡邁克爾和他的部隊一起躲在英軍大炮后方，他看到炮手們正在盡其所能跟火力猛得多的俄軍炮臺抗衡：

我想象他們是對著敵人設在炮彈山上的大炮發射時的火光開炮的，每次都吸引更多的炮火到自己身上。一些[炮手]倒下了，我們也被殃及，盡管我們被命令臥倒在地，盡可能利用山脊保護自己。一顆加農炮彈落在我們連隊的藏身之處，前排一名士兵的左臂和雙腿被打飛，他后面的一名士兵被打死，身上卻看不出有什么傷痕。其他連隊也有傷亡……大炮……以最快的速度裝填、發射，每次成功的發射，后坐力都讓大炮朝我們的方向沖來……我們幫助炮手把大炮推回原來位置，有些人還幫著搬運炮彈。[[45]](#_45_NAM_1968_07_264_1___The_95th)

這一階段英軍炮手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大炮高頻率發射，讓俄軍通過英軍大炮發射的轟鳴聲以為英軍的大炮數量比他們實際擁有的多，用炮火換時間，等待援軍到來。

如果索伊莫諾夫知道英軍防守的弱點，他一定會命令俄軍向故鄉山脊發動沖鋒；但是在濃霧中，他什么也看不到，而敵人的猛烈射擊，特別是英軍采用米涅來復槍在俄軍逼近后才開始射擊，致命地精準，因此他決定等待帕夫洛夫的部隊上來之后才發動進攻。幾分鐘之后，索伊莫諾夫被英軍來復槍子彈擊中身亡，接替指揮的普利斯托夫伊托夫上校（Colonel Pristovoitov）也在幾分鐘后中彈身亡，繼續接替指揮的烏瓦日諾夫-亞歷山德羅夫上校（Colonel Uvazhnov-Aleksandrov）也被打死了。在那之后，誰應該接替指揮就不是很清楚了，也沒有誰急切地想出面承擔責任。安德里阿諾夫上尉被派騎馬去與幾位將軍商量此事，又浪費了寶貴的時間。[[46]](#_46_Andriianov__Inkermanskii_boi)

與此同時，在凌晨五點鐘，帕夫洛夫的部隊抵達了山腳下的因克爾曼橋，卻發現海軍分遣隊沒有遵照丹嫩貝格的命令為他們準備好渡河工具。他們只好等到七點鐘橋梁架好之后才渡過喬爾納亞河。過河之后，他們分三路爬上高地：鄂霍次基（Okhotsky）團、雅庫茨基（Yakutsky）團、色楞金斯基（Selenginsky）團和大部分炮兵在右側，通過薩珀路（Sapper Road）向上攀登，與索伊莫諾夫的部隊會合。博羅金斯基（Borodinsky）團在中路，從沃洛維亞山溝（Volovia Ravine）向上。左路的塔魯京斯基團沿著采石場山溝（Quarry Ravine）陡峭多石的山坡向上攀登，在索伊莫諾夫部隊炮火的掩護下向沙袋炮臺（Sandbag Battery）進發。[[47]](#_47_P__Alabin__Chetyre_voiny__Po)

此時在高地上，到處是激烈的槍戰。小股武裝東奔西走，利用厚密的樹叢做掩護，相互射擊，就像騷擾部隊慣常做的那樣，但是最激烈的戰斗發生在英軍防線右翼的沙袋炮臺附近。渡過喬爾納亞河二十分鐘之后，塔魯京斯基團的先頭營打退了炮臺的英軍警戒部隊，但立即遭到一支七百人的英軍混合部隊的攻擊，指揮這支部隊的是亞當斯準將（Brigadier Adams）。在激烈的徒手搏斗中，沙袋炮臺幾度易手。到八點鐘時，亞當斯部隊與俄軍人數之比已達一比十，但由于戰斗是在一條狹窄的山脊上進行，俄軍在每次單獨進攻中顯現不出人數優勢。一旦英軍重新控制炮臺，俄軍立刻對他們發動數次反攻。列兵愛德華·海德（Private Edward Hyde）當時就在炮臺內，是亞當斯手下部隊中的一員：

俄軍步兵直逼上來，從前面和側面爬上來，我們很艱難地把他們趕出去。我們可以直接看到他們的腦袋從堞墻上冒出來，或是從炮眼外看進來。我們以最快的速度向他們開槍或捅刺刀。他們像螞蟻一樣冒出來，一個被我們打倒在地，下一個馬上踩著他的尸體沖過來，所有人都呼喝吼叫著。我們在炮臺里的也并不示弱，高聲歡呼叫喊。擊打的砰砰聲，刺刀和佩劍相擊的聲音，子彈聲，炮彈呼嘯而過的尖叫，加上周圍濃霧密布的景象，還有火藥和鮮血的氣味，我們所處炮臺里的情景超過了人類能夠想象或是描述的范圍。[[48]](#_48_Spilsbury__Thin_Red_Line__pp)

最終英軍再也抵擋不住了——俄軍已經擠滿了整個炮臺——亞當斯和他手下的部隊被迫撤向故鄉山脊。但是很快增援部隊來了，劍橋公爵帶著擲彈兵團趕到了這里，向沙袋炮臺周圍的俄軍發起了新的一輪進攻。這時候沙袋炮臺對交戰雙方的象征意義已經遠遠超過了實際的戰略意義。擲彈兵端上刺刀向俄軍發起沖鋒，劍橋公爵向手下士兵呼喊，讓他們留在高處，不要因為追擊俄軍下山坡而分散了隊形，但是沒有幾個人能聽到他在喊什么，也沒有人能在霧中看到他。擲彈兵喬治·希金森（George Higginson）看到沖鋒“直朝崎嶇的山坡而下，迎面沖向正往上推進的敵軍”。

戰士們發出狂熱的呼喊……這正是我擔心之處：我們勇猛的戰士很快將失去控制。事實上，在這漫長的一天里，只有在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們還試圖保持某種隊形；其他時間里，作戰依靠連隊指揮官帶領小股部隊進行，因為濃霧和步槍射擊產生的大量煙霧，這些小股部隊之間無法知道相互的位置。

戰斗變得越來越激烈而混亂，有時候一方發起沖鋒把對手趕下山坡，卻遭遇另一股部隊從更遠處山坡上發起的反沖鋒。雙方士兵都完全喪失軍紀，成為一群無秩序的暴徒，不受軍官管制，完全被狂怒和恐懼支配，濃霧中無法看到對手更是增加了恐懼感。他們發動沖鋒和反沖鋒，呼喊尖叫，發射子彈，舉劍狂舞，子彈打完之后就撿起石頭相互投擲，用槍托砸，甚至用腳踢、用牙咬。[[49]](#_49_G__Higginson__Seventy_One_Ye)

在這樣的戰斗中，小作戰單位內部的協同起了決定性作用。一切都取決于小股部隊和他們的指揮官能否保持軍紀和團結——這決定了他們是否能自我組織、守望相助地繼續作戰，而不是被嚇破了膽或是逃之夭夭。在這次考驗中，塔魯京斯基團的士兵是不及格的。

霍達謝維奇是塔魯京斯基團第四營的一名連隊指揮官。他們的任務是占領因克爾曼山東部，掩護帕夫洛夫手下其他部隊把石籠網和木柴捆運到高地，并針對英軍位置構筑工事。在濃霧中他們迷了路，偏向了左邊，與葉卡捷琳堡團滿腹牢騷的士兵混在了一起，作為索伊莫諾夫的部下，這些士兵早已登上高地。霍達謝維奇手下的士兵被帶回了采石場，這時候他們已經完全和葉卡捷琳堡團的士兵混在一起，無法指揮了。在沒有軍官帶領的情況下，塔魯京斯基團的一些士兵開始重新爬山，他們能夠辨認出在前方有一些友軍“站在一座小炮臺前，高喊歡呼，搖著軍帽示意我們向前”。霍達謝維奇回憶道：“軍號一直在吹前進號，我手下的一些士兵脫離了隊形，直往前跑！”在沙袋炮臺上，他發現手下士兵已完全失去秩序，來自各個團的士兵全部混在一起，軍令結構徹底失效。他命令手下上刺刀沖鋒，確實也打退了炮臺里的英軍守軍。但是他們沒有接著追擊英軍，而是留在炮臺里，“忘記了自己的任務，開始到處亂跑找東西搶”，另一位軍官回憶，他認為“會發生這樣的事完全是因為沒有軍官和缺乏領導力”。

因為濃霧以及作戰單位被打亂，俄軍這邊出現了多次友軍互射事件。索伊莫諾夫的部隊，特別是葉卡捷琳堡團的士兵，開始向沙袋炮臺里的俄軍開槍。有些人以為自己是在向敵人開槍，另一些人則是收到了指揮官的命令。這些指揮官因為手下抗命而感到害怕，于是讓其他人向自己的手下開槍，作為維護軍紀的辦法。“當時的混亂真是異乎尋常，”霍達謝維奇回憶道，“有些人在抱怨葉卡捷琳堡團，另一些在呼喊讓大炮上來，軍號繼續不停地吹前進號，軍鼓敲響讓我們進攻，但是沒有人往前動，他們就像一群綿羊似的呆呆地站在那里。”一聲命令向左轉的軍號在塔魯京斯基團里造成了突然的恐慌，他們覺得聽到了遠處法軍的戰鼓聲。“到處都有人在喊：‘預備隊在哪兒？’”一名軍官回憶道。士兵們害怕沒有人來支援他們，開始往坡下逃跑，相互踩踏。據霍達謝維奇說：“軍官向士兵們叫喊，讓他們停下，但是無人理會，沒人想停下來。每個人都憑著自己的想象和恐懼亂跑。”沒有任何軍官，不管職位多么高，能夠阻止士兵們驚慌后撤。他們一路潰逃，直到采石場山溝最底下，聚集在塞瓦斯托波爾引水渠周圍，這條引水渠成為唯一能擋住俄軍士兵潰逃的屏障。當第十七步兵師的指揮官基里阿科夫中將，就是在阿爾馬戰斗中途不見蹤影的那位，出現在引水渠附近時，他騎著一匹白色軍馬，手里舉起馬鞭抽打士兵，呼喝著要他們爬回山上，但是沒有一個士兵聽他的，而且還有人頂撞道：“你自己上去！”霍達謝維奇收到命令，要他重新集結手下，但這時他連隊原來的一百二十人就只剩下四十五人了。[[50]](#_50_R__Hodasevich__A_Voice_from)

當塔魯京斯基團的士兵說他們聽到了法軍戰鼓時，他們并沒有弄錯。早晨七點，拉格倫在抵達故鄉山脊視察戰斗情況時，就向位于薩坡恩高地的博斯凱發出了救援信息，他還下令將兩門十八磅大炮從圍困塞瓦斯托波爾的炮臺處運上來，對抗俄軍的加農炮，但是他的命令被傳錯了。博斯凱的部隊其實在聽到早前的槍炮聲之后就意識到英軍陣地出現了險情，朱阿夫士兵甚至聽到了前一晚俄軍行軍的聲音——在非洲作戰的經歷讓他們學會了如何收聽地面上傳來的聲音——所以他們已經準備好了，只等命令下來就馬上出發殺敵。他們最得心應手的，就是在濃霧中、在布滿矮樹叢的山地作戰：他們習慣了阿爾及利亞的山地戰，最擅長以小股武裝伏擊敵人。朱阿夫士兵和法軍的非洲獵兵急切地想投入戰斗，但是博斯凱卻按兵不動，擔心南部峽谷利普蘭季部隊兩萬二千名士兵和八十八門野炮的動向，這支部隊已經在戈爾恰科夫的指揮下向薩坡恩高地進行遠距離的炮擊了。“前進！讓我們出發！是消滅他們的時候了！”當博斯凱來到朱阿夫部隊跟前時，士兵們迫不及待地呼喊起來。他們心懷怒火，“就快發生暴動了”，路易·努瓦爾回憶道，當時他處在朱阿夫部隊的第一方陣。

非洲人的急性子，讓我們對博斯凱深深的敬意和真切的愛戴遭到了最大的考驗。忽然間，博斯凱轉過身去，拔出佩劍，身后是他手下的朱阿夫部隊、土耳其部隊和非洲獵兵，這些是他相處多年，從未給他打過敗仗的部隊。他將佩劍指向對面高地土崗上的兩萬名俄軍，以雷霆之勢喊道：“前進！上刺刀！”[[51]](#_51_L_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

其實對面利普蘭季部隊的人數并沒有博斯凱擔心的那么多，因為戈爾恰科夫愚蠢地決定把一半部隊留在喬爾納亞河后面作為預備隊，又把其余部隊分散布置在薩坡恩高地和沙袋炮臺的底部斜坡上。但是朱阿夫部隊并不知道這一情況，在濃霧中他們看不到敵人，以為自己人少力寡，決心憑著自己令人恐懼的戰斗力出奇制勝。他們以小股部隊為單位，以樹叢為掩護向俄軍隊列射擊。他們的戰術是以各種方式嚇跑俄軍。他們一邊向前跑，一邊呼喝叫喊，同時朝天開槍，吹起軍號，打起軍鼓，盡量發出最大的聲音。第二朱阿夫團的一名上校讓·克萊爾（Jean Cler）甚至在戰前動員時對他手下的士兵說：“把你們的褲子張開得越大越好，盡量讓你自己顯得更大。”[[52]](#_52_J__Cler__Reminiscences_of_an)

朱阿夫部隊的猛烈進攻把俄軍擊垮了。剛一交手，他們的米涅來復槍就打掉了幾百個俄軍。在沖上故鄉山脊后面的斜坡后，朱阿夫部隊把沙袋炮臺里的俄軍趕了出去，然后一直追擊到山腳下的圣克萊門山溝（St Clement’s Ravine）。由于奔跑勢頭太猛，他們繼續前進，沖到了采石場山溝。這里擠滿了從山上撤下來的塔魯京斯基團的士兵，當他們看到朱阿夫部隊朝自己沖來，便驚慌地擠在一起，試圖向敵人開槍，結果打到的大部分是自己人。朱阿夫部隊的士兵面臨俄軍的交叉火力，向后撤去，往故鄉山脊的方向爬去。

到了故鄉山脊之后，他們發現英軍面對帕夫洛夫部隊夾擊行動的右翼，正處于非常危險的境地。丹嫩貝格正指揮著鄂霍次基團、雅庫茨基團和色楞金斯基團，加上索伊莫諾夫部隊的剩余人員，再次向沙袋炮臺發起進攻。戰斗非常殘酷，冷溪近衛團的威爾遜上尉（Captain Wilson）回憶，一波又一波的俄軍端著刺刀沖上去，如果沒有被子彈打倒，就與英軍士兵展開“手對手、腳對腳、槍口對槍口、槍托對槍托”的搏斗。[[53]](#_53_Spilsbury__Thin_Red_Line__p)面對人數遠遠超過自己的俄軍，冷溪近衛團的守軍得到了卡思卡特第四師下屬的、由托倫斯將軍（General Torrens）率領的六個連的增援。新來的戰士們急于參加作戰（他們錯過了巴拉克拉瓦和阿爾馬戰役）。當接到命令向沙袋炮臺附近的俄軍發起進攻時，他們沿著山坡一路狂追下去，完全忘了聽從命令，結果在近距離被雅庫茨基和色楞金斯基團從高處襲擊。卡思卡特也在一片彈雨中陣亡，他被埋葬的地點后來被稱為“卡思卡特山”（Cathcart’s Hill）。

在這時候，沙袋炮臺里劍橋公爵的近衛團就剩下最后一百人了，彈藥也打光了，外面仍有兩千名俄軍。劍橋公爵提議在沙袋炮臺堅持到最后——為這個沒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據點做出愚蠢的犧牲——但是他手下的參謀們勸服了他：如果女王的侄子和她的近衛軍軍旗被帶到沙皇面前，對英國來說將是一場災難。希金森也在這群軍官中，他將帶領剩下的士兵撤向故鄉山脊。“圍在軍旗周圍，”他回憶道，

士兵們慢慢地向后退，保證正面對著敵人，手握刺刀，已準備好迎接敵人“沖鋒”的那一刻。當一名戰友倒下，不論是死是傷，他的同伴馬上頂上他的位置。人數雖然越來越少，但一直保持著緊密的隊列，眼睛都不眨地保護著軍旗……好在我們右側的地形非常陡峭，阻止了敵人試圖從側翼襲擊的企圖。時不時地，就有一些比其他人更愿意冒險的俄軍士兵沖上前來，這時兩到三個擲彈兵就會挺著刺刀沖出迎戰，直到將其擊退。總而言之，我們的處境非常危急。

就在此時，博斯凱手下的人馬出現在了山脊之上。對英國人來說，法國人的身影從來沒有如此讓人歡欣鼓舞過。近衛軍們向趕來的法國士兵歡呼，喊道：“法蘭西萬歲！”法國人則回應道：“英格蘭萬歲！”[[54]](#_54_Higginson__Seventy_One_Years)

俄軍被突然出現的法軍士兵嚇著了，撤回到炮彈山，打算鞏固陣地。但是部隊的士氣已經受創，他們覺得面對英軍和法軍聯手，自己勝算不大。許多人在濃霧掩護下，不被指揮官注意地悄悄溜走了。有一陣子丹嫩貝格認為他依然能憑炮火優勢取勝：他手里有近一百門大炮，包括十二磅野炮和榴彈炮，數量比英軍在故鄉山脊上的多。但是在九點半時，拉格倫下令調來的兩門十八磅重炮終于運到了，開始向炮彈山開火。巨大的炮彈在俄軍炮臺上炸開，迫使炮兵撤退。這時俄軍并沒有完全失敗，在高地上還有六千人，在山下河對岸還有兩倍人數的預備隊。有些俄軍依然在進攻，但是進攻陣形卻被英軍重炮撕開了。

終于，丹嫩貝格決定放棄進攻，將部隊撤回，同時不得不忍受緬什科夫和兩位大公憤怒的抗議。他們當時都在炮彈山后方五百米處的安全地帶觀戰，要求丹嫩貝格收回撤退命令。丹嫩貝格對緬什科夫說：“殿下，如果不讓部隊撤下來，那就是要他們戰死到最后一人。如果您覺得結果不會是這樣，那么不如把指揮權從我這里拿走，您親自指揮。”這番對話之后，兩人間激烈爭執了很長時間，他們相互都受不了對方，都把因克爾曼戰役的失敗歸咎于對方。無人愿意承擔這場戰役失敗的責任，因為俄軍人數可是占絕對優勢的。緬什科夫怪罪丹嫩貝格，丹嫩貝格把責任推到索伊莫諾夫身上，而索伊莫諾夫已經陣亡無法辯駁，所有人又都責怪俄軍士兵軍紀不嚴且貪生怕死。但其實最終造成俄軍作戰過程中局面混亂的原因是缺乏有力的指揮，責任應該在緬什科夫身上。作為俄軍總指揮，他主意全無，沒有參與任何指揮行動。尼古拉大公看穿了緬什科夫，在給兄長、不久就將成為新沙皇的亞歷山大的信中寫道：

我們[兩位大公]在因克爾曼橋附近等待緬什科夫親王，但是他直到六點三十分才離開屋子，那時候我們的部隊已經占領了第一個位置。我們一直和親王待在右翼，一直沒見到有哪位將軍向他匯報作戰進展……士兵們不守秩序，是因為沒有人指揮他們……一切紊亂都源自緬什科夫。難以想象的是，緬什科夫竟然沒有作戰指揮部，他身邊一共只有三個人。以他們的工作方式，如果你想了解什么情況，都不知道應該問誰。[[55]](#_55_Seaton__The_Crimean_War__pp)

收到撤退命令后，俄軍開始在驚慌中潰逃，軍官們沒有辦法阻止這場“人肉雪崩”，而英法兩軍的炮火還在從后面飛來。“他們都嚇傻了，”一名法國軍官回憶道，“那已經不是一場戰斗，而是一場屠殺。”成百俄軍被擊中倒地，其他人則被踩倒在地，潰軍逃下山坡，直奔喬爾納亞河上的橋梁而去，掙扎著過了河，有些干脆游到了對岸。[[56]](#_56_M__O__Cullet__Un_regiment_de)

有一些法軍部隊一路追殺過去，其中有十幾個盧爾梅爾旅（Lourmel Brigade）的士兵還闖進了塞瓦斯托波爾。他們追殺得忘乎所以，不知道自己已經孤軍深入，而其他法軍部隊早已停止追擊回頭了。當時塞瓦斯托波爾的街道幾乎空無一人，因為整個城市的人都在戰場作戰，或是正在守衛棱堡。這些法軍士兵一邊前行，一邊從街邊屋子里搶東西，一直到了碼頭邊。城里的平民百姓忽然看到幾個法軍士兵，嚇得四散而逃，以為敵軍已經攻進城里。這幾個法國兵自己也嚇得夠嗆，他們試圖從海上離開，找到一條船后立即劃船逃離。正當他們的船經過亞歷山大要塞快要進入港口外的海面時，卻被一顆從隔離炮臺發射過來的炮彈直接擊中沉沒。盧爾梅爾旅戰士的故事在漫長的圍困戰期間一直鼓舞著法軍的士氣，讓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憑大膽一擊奪取塞瓦斯托波爾。許多人認為他們的經歷表明聯軍可以也應該在俄軍從因克爾曼高地上潰逃的時候繼續追擊，然后闖進城里，就像這幾個大膽的士兵所做的那樣。[[57]](#_57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e)

俄軍在因克爾曼高地戰役中損失了一萬二千人，英軍公布的傷亡數字是兩千六百一十人，法軍是一千七百二十六人。這么多人在短短四個小時的戰斗中陣亡，實在讓人感到恐怖——這樣的人員損失速度幾乎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索姆河（Somme）戰役有得一比。死傷的士兵被堆在一起，被炮彈炸飛的肢體到處都是。英國戰地記者尼古拉斯·伍茲（Nicholas Woods）寫道：

有些尸體的腦袋不見了，就像被斧頭砍掉了一樣；一些大腿連根被炸飛；另一些手臂不見了；還有那些胸口或是腹部中彈的，就像被機器壓爛的一樣。橫亙在道路上，肩并肩地躺著五名[俄軍]近衛軍士兵[‡‡](#_____Wu_Zi_Nong_Cuo_Le__E_Guo_Ji)的尸體，他們是在沖鋒時被同一顆彈丸打死的。他們臉朝下，以同樣的姿勢趴著，雙手還緊緊地握著滑膛槍，臉上嚴峻的表情一模一樣，都痛苦地皺著眉頭。

被殺的俄軍大部分是被刺刀刺死的，路易·努瓦爾認為，他們臉上還留著被殺那一刻“狂熱的仇恨”表情。

有些奄奄一息，但大部分已經死去，疊在一起，橫七豎八地躺著。從一堆泛著黃色的血肉之軀中，有時能看到伸出的手臂，仿佛在祈求憐憫。仰面躺在地上的尸體，一般雙臂伸出，看上去要么是在抵擋危險，要么是在祈求寬恕。每個人的脖子上都掛著獎章，或是小小的銅盒，里面是圣徒的畫像。

在死人堆下有時還能發現活著的人，因為受傷倒地，后來陣亡的士兵就倒在了他們身上。“有時候，在一堆尸體下，”一名法國隨軍神父安德烈·達馬斯（André Damas）寫道，“我們能聽見有人還在呼吸，但是他們沒有力氣把壓在身上的軀體移開。即使他們微弱的呻吟有人聽到，也還需要等待很長時間才能被救出來。”[[58]](#_58_Woods__The_Past_Campaign__vo)

英軍輕步兵師的科德林頓少將被那些趁火打劫尸體的行為驚呆了。“最令人感到惡心的是，你發現那些在戰場上轉悠著偷搶東西的人已經在你之前來過了，尸體身上的口袋被翻開了，東西被人割開了。這些人的目的就是找錢，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搜過了——軍官的衣服被扒光了，因為他們穿得比較好，身上就被隨便扔了件東西蓋住。”他在11月9日寫道。[[59]](#_59_RA_VIC_MAIN_F_1_38)

聯軍花了好幾天時間才掩埋了自己軍隊的陣亡者，同時把傷員送到戰地醫院。俄軍的死傷者要等更長的時間。緬什科夫拒絕了聯軍提出的停戰清理戰場的建議，擔心一旦俄軍士兵看到己方死傷人數遠遠多于敵人，會影響士氣甚至引發嘩變。于是死傷的俄軍就被丟在戰場上好多天甚至好幾個星期。戰斗結束十二天后，法軍上校克萊爾在采石場山溝底下發現了四名還活著的俄軍傷兵。

這些可憐的人躺在一塊突出的石頭下面。當我問他們是怎么熬過這些天的時候，他們用手勢回答。先是指向天，上天給他們送來了水，給他們帶來勇氣；然后又指向幾塊長了霉的黑面包碎塊，是他們在周圍躺著的眾多尸體的背袋中找到的。

有些尸體直到三個月后才被發現。他們躺在泉水山溝（Spring Ravine）底下，已經凍僵了，用克萊爾的說法，看上去就像“干枯的木乃伊”。他注意到在阿爾馬戰役陣亡的俄軍“看上去比較健康——衣服、內衣和鞋子都是干凈整齊的”，而在因克爾曼陣亡的俄軍就“看上去痛苦且疲憊”。[[60]](#_60_Cler__Reminiscences__pp__219)

和阿爾馬戰役一樣，因克爾曼戰役之后，同樣流傳著俄軍對英法聯軍傷員施展暴行的傳說。有人說他們打劫然后殺害躺在地上的傷員[§§](#SSSS_Zhe_Shi_Yi_Ge_Ke_Yi_Li_Jie)，有時還殘害尸體。英法聯軍的士兵把這些說法當作俄軍“野蠻”的證據，還說這些人都被灌醉了酒。“他們毫無憐憫之心，”蘇格蘭燧發槍近衛團的休·德拉蒙德在11月8日給他父親的信中寫道，“這些事情應該讓世人知道，因為一個號稱文明強國的俄羅斯，竟然能做出這樣野蠻的事來，實在是一樁丑聞。”另一位佚名的英軍士兵在他的回憶錄中也描述了俄軍的“卑鄙行徑”：

在夜色掩護下，他們從濃霧中忽然出現，就像魔鬼一樣……心懷殺人的企圖（公平作戰不是他們的目標）。得到無良教士的祝福，獲得擔保說什么都可以偷。在烈酒刺激下，受到兩個大公的鼓勵……醉酒、瘋狂、各種邪惡的情緒都被挑動起來，他們瘋狂地沖向我方士兵。在因克爾曼，我們就看到俄軍士兵不管在哪里看到受傷的聯軍士兵，都會用刺刀捅向他們已被撕裂劃開的身體，毆打至腦漿迸裂，像惡魔一般撲向他們。俄軍的丑惡行徑給他們國家帶來惡名，讓全世界都感到恐懼和厭惡。[[61]](#_61_RA_VIC_MAIN_F_1_36__Colonel)

但事實上俄軍的這些行為更多與宗教仇恨有關。當拉格倫和康羅貝爾在11月7日向緬什科夫寫信，抗議俄軍暴行時，緬什科夫回復說，發生這些殘殺的原因是赫爾松涅索斯的圣弗拉基米爾教堂被聯軍破壞了——這座教堂建在弗拉基米爾大公受洗，并帶領基輔羅斯人投入基督教懷抱的地方，卻被法軍洗劫一空，還被用來修建圍城工事。緬什科夫的回信經過了沙皇批準，他寫道，摧毀圣弗拉基米爾教堂的舉動，傷害了“我們士兵深切的宗教感情”，并且一再強調，在因克爾曼，俄國軍人自己也是英國軍隊“血腥報復”的“受害者”。這方面的事實有些得到了法國克里米亞遠征官方歷史學家塞薩爾·德·巴藏古（César de Bazancourt）的承認，在他1856年的記載中提到：

在離海岸不遠處，在一片高低不平的地面上，有一座熱那亞人要塞（Genoese Fort）的遺跡。從那里下坡，朝著隔離灣（Quarantine Bay）的方向，矗立著一座小小的圣弗拉基米爾禮拜堂。有一些零星的士兵，膽子比其他人大一些，經常會悄悄地摸到那里。在隔離灣方向有一片高低起伏的地帶，那里有一些俄軍棄用的建筑，他們就由那里進入禮拜堂，所有有用的東西都會被拿走——要么用來擋風遮雨，要么用來當柴火，當時柴火已經開始難以找到了。這些士兵洗劫禮拜堂，本身已經犯下了罪行，然而他們還會繼續在戰場上游蕩，尋找任何可以搶掠的東西，不把任何軍紀和法律放在眼里。他們跑到警戒線外，在夜幕中侵犯了這座被俄羅斯保護神庇佑的小禮拜堂。

但是如果俄軍士兵真的是因為深切的宗教感情而做出種種暴行的話，可以很肯定地說，他們的行為是受到教士鼓勵的。在因克爾曼戰斗打響的前一晚，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教堂舉行的禮拜中，俄軍士兵們被告知英法聯軍是在為魔鬼而戰，教士們要求士兵毫不憐憫地殺死他們，報復他們破壞圣弗拉基米爾的行為。[[62]](#_62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6)

\* \* \*

因克爾曼之戰對英法聯軍來說，是一場空虛的勝利。他們確實抵擋住了俄軍最大規模的攻勢，并且依然控制著塞瓦斯托波爾附近的高地。但是由于付出了很大的傷亡代價，國內輿論難以接受這一事實，特別是在公眾了解到傷員們在軍隊醫院內受到的糟糕對待之后。當這場戰事的消息傳回國后，整個克里米亞戰爭是否明智將受到嚴重質疑。遭到如此重大的人員損失之后，在援軍到來之前，聯軍已不可能再對塞瓦斯托波爾發動新的進攻了。

11月7日，聯軍在拉格倫的指揮部召開了聯席會議，法軍從英軍手里接管了因克爾曼山，不言而喻，現在法軍已經代替英軍成為聯合軍事行動的領導者。當時英軍只剩下一萬六千名可用兵力，控制著塞瓦斯托波爾城外聯軍塹壕的四分之一。在會議上，康羅貝爾堅持在明年春天之前，暫停任何對塞瓦斯托波爾的攻擊，到時候聯軍應該會有更多的生力軍加入。俄軍的防守系統在聯軍第一次轟擊時勉強挺住，但是在那之后已被大大加強。康羅貝爾指出，俄軍已派來大批援軍，再加上原來在塞瓦斯托波爾的軍隊，人數總計達十萬之多（事實上，在因克爾曼作戰后，俄軍總人數僅為這個數字的一半）。他擔心“只要奧地利對東方問題的態度不明朗，俄軍將繼續能夠從比薩拉比亞和俄羅斯南部派兵增援克里米亞”。他的結論是，在英法兩國與奧地利結成軍事聯盟，并且向克里米亞派來“數量巨大的援軍”之前，聯軍沒有必要在圍困戰中浪費士兵生命。拉格倫和他手下的幕僚同意康羅貝爾的分析，現在的問題是如何籌集物資讓聯軍士兵能在塞瓦斯托波爾外的高地上度過冬天，當時他們攜帶的只有適合夏天作戰的輕型帳篷。然而康羅貝爾相信“只要在現有帳篷下墊上一層石頭，部隊也許就能在這里過冬”。英軍指揮部和他的想法差不多，“這里氣候健康，”英軍上校羅斯向時任英國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勛爵解釋道，“除了北風較冷之外，冬季的寒冷不是那么嚴重。”[[63]](#_63_FO_78_1040__Rose_to_Clarendo)

想到要在俄羅斯度過冬天，許多人心中充滿了一種不祥之感：他們想到了1812年的拿破侖。德萊西·埃文斯懇求拉格倫考慮放棄圍困塞瓦斯托波爾，并將英軍撤出。劍橋公爵提議將部隊撤到巴拉克拉瓦，那里不僅容易獲得給養，而且和無遮無擋的塞瓦斯托波爾周圍高地相比，還能憑地形躲避寒風。拉格倫否決了兩人的提議，堅持讓部隊駐扎在高地上度過整個冬季。兩人認為這樣做等于犯罪，雙雙辭去職務，在冬天到來之前，滿懷厭惡和失望地回到了英格蘭。兩人的辭職在英軍軍官中引發了一陣離職的浪潮，在因克爾曼之戰后的兩個月時間里，在克里米亞的一千五百四十名英軍軍官中有二百二十五人離去，其中只有六十人后來返回。[[64]](#_64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__2)

在各級官兵中，意識到無法很快在這里取得勝利更讓他們士氣低落。“為什么我們沒有在阿爾馬戰役之后馬上盡全力一擊？”第三十三步兵團（33rd Regiment of Foot）的芒迪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Mundy）質問道。在11月7日給母親的信中，他概括了軍中的普遍情緒：

如果俄軍真的像他們所說的那么強大，則我們必須放棄圍困，因為大家都知道，憑著我們目前的力量，不可能在塞瓦斯托波爾有所作為。艦隊派不上用場，目前的工作又如此讓人困擾。當冷空氣來襲時，成百上千的人將因為疲勞和疾病倒下。有時候士兵們連續六天都睡不上一場好覺，經常要連續工作二十四小時。別忘了，他們除了一條薄毯外，沒有其他冬天的衣物。晚上的寒冷與潮濕非常厲害，而且因為擔心敵人對塹壕、炮臺和土崗發起進攻，我們一直處于焦慮中，根本睡不好覺。

因克爾曼戰役之后的幾個星期，寒冷的冬天到來了，聯軍士兵開小差的人數急劇上升，幾百名英軍和法軍士兵主動向俄軍投了降。[[65]](#_65_NAM_1984_09_31_63__Letter__7)

對俄軍來說，因克爾曼戰役的失敗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緬什科夫確信塞瓦斯托波爾被聯軍攻陷已不可避免，在11月9日寫給戰爭部長多爾戈魯科夫親王的信中，他建議放棄塞瓦斯托波爾，以讓俄軍集中力量防御克里米亞的其他地方。沙皇被手下軍事總指揮的失敗主義激怒了。“我們部隊的英雄主義在哪里？付出了這么慘重的代價，我們現在就接受失敗？”他在11月13日給緬什科夫的信中寫道。“我們的敵人也一定遭受了重創吧？我不能同意你的觀點。不要低頭好嗎？也不要鼓勵其他人這么想……上帝在我們這邊。”盡管言辭上顯得不屈不撓，但是因克爾曼戰役的失敗讓沙皇陷入深深的憂郁中，宮廷中所有人都能看出他的懊惱情緒。在過去，尼古拉一世會試圖在其他人面前隱藏自己的心情，但是因克爾曼戰敗后，他再也不做掩飾了。“加特契納宮既陰郁又沉寂，”丘特切娃在她的日記中寫道，“到處都是憂郁的情緒，人們幾乎不敢說話。看到君主的樣子就足以讓人心碎了。最近他越來越憂郁，臉龐憔悴，了無生氣。”在戰敗的打擊下，尼古拉一世對這位曾向他保證可以打贏克里米亞戰爭的軍事總指揮喪失了信心，他開始后悔與西方列強開戰的決定，轉而向那些一直反對開戰的幕僚——比如帕斯克維奇——尋求安慰。[[66]](#_66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這些奸險的事情想起來就令人作嘔。”托爾斯泰11月4日在日記中描寫戰敗的情形。

第十和第十一師進攻敵人的左翼……敵人陣地上有六千人——只有六千人，而我們有三萬人——結果卻是我們撤退了，損失了六千勇敢的戰士。[¶¶](#PP_Tuo_Er_Si_Tai_Yin_Yong_De_Shi)我們不得不撤退，原因是一半部隊沒有炮火掩護——因為路不好走，大炮運不上來，而且——天知道為什么——我們沒有來復槍營。可怕的屠殺！這一失誤會重壓在許多人的靈魂之上！老天，饒恕他們吧。戰敗的消息傳來，不由讓人情緒失控。我看到老人放聲大哭，年輕人發誓要殺了丹嫩貝格。俄羅斯人的精神力量是偉大的。在當前困難的日子里，許多政治真相會顯露出來，繼續發展。當俄羅斯身陷厄運中時，蓬勃升起的愛國主義熱情將長久地留在她的身上。這些付出[如此巨大]犧牲的人將成為俄羅斯的公民，我們不會忘記他們的犧牲。他們將懷著尊嚴和驕傲參與俄羅斯的公眾事務，因為戰爭而激發的熱情，將把自我犧牲的精神和崇高的價值永遠印在他們身上。[[67]](#_67_Tolstoy_s_Diaries__vol__1__1)

自從隨俄軍從錫利斯特拉撤退后，托爾斯泰一直在基什尼奧夫，戈爾恰科夫把他的指揮部建在了那里。在那里他生活舒適，參加各種舞會，在牌桌上輸了不少錢，但是他很快就厭倦了這種生活，夢想再次貼近觀察戰斗。“我現在有各種舒適的享受：住宿條件很好，有一架鋼琴，吃得也好，經常有事可做，還有很好的朋友圈子，我又開始向往營地生活了，羨慕那里的人們。”托爾斯泰在10月29日給他姨媽圖瓦內特的信中寫道。[[68]](#_68_H__Troyat__Tolstoy__London)

出于為軍中戰士做點事情的想法，托爾斯泰和一群軍官們計劃出版一份期刊。他們把它叫作“軍隊公報”（“Military Gazette”），目的是教育戰士，鼓舞士氣，并且將士兵們的愛國與人性展現給俄羅斯社會。“這個計劃讓我非常高興，”托爾斯泰告訴他哥哥謝爾蓋，“刊物將發表對戰事的描述——各種英勇行為；杰出人物的生平和哀悼詞，特別是那些不為人知的人物；戰場上的故事、士兵唱的歌、讀者愛看的描寫工兵本領的文章等等。”這份刊物必須很便宜，這樣士兵們才買得起。為了提供資金，托爾斯泰把家里出售亞斯納亞波利亞納的一棟宅子的錢挪用了過來，這本來是讓他用于償還賭債的。托爾斯泰最早的幾篇小說就是為這份刊物寫的：《俄羅斯戰士是如何戰死的》（“How Russian Soldiers Die”）和《日丹諾夫叔叔和馬夫切爾諾夫》（“Uncle Zhdanov and the Horseman Chernov”）。在第二篇故事中，他揭露了一名軍官的殘暴。這名軍官毆打一名士兵，不是因為他做錯了什么，而是“因為他是一個大兵，而大兵就是該打的”。托爾斯泰意識到這么寫不可能通過審查，于是在將出版刊物的計劃遞交戈爾恰科夫之前，把這兩篇故事都抽走了。戈爾恰科夫把計劃轉給了戰爭部，但是被沙皇否決了，甚至類似的出版也不允許，因為沙皇不愿意出現一份非官方的士兵報紙來挑戰政府自己的報紙《俄軍傷員》（Russian Invalid）。[[69]](#_69_Tolstoy_s_Letters__vol__1__p)

因克爾曼戰敗的消息讓托爾斯泰下決心一定要去克里米亞。他的親密戰友之一科姆斯塔迪烏斯（Komstadius）在因克爾曼戰役中陣亡，兩人原來還準備一起編輯“軍隊公報”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他的陣亡，這促使我要求分配到塞瓦斯托波爾去。”他在11月14日的日記中寫道。“他讓我為自己感到羞恥，”他后來向哥哥解釋道，他的動機“大部分是出于愛國——我必須承認這種感情在我心中越來越強。”[[70]](#_70_Troyat__Tolstoy__p__162)但是還有另一個同樣重要的原因促使他去克里米亞，那就是他對自己成為一名作家的預感。托爾斯泰想觀察戰爭，想描寫戰爭：向公眾展示完全的真相——既有普通人出于愛國而做出的犧牲，也有軍事領袖們的失職——從而促發一場政治與社會的變革，他認為戰爭必然會引發這場變革。

托爾斯泰從基什尼奧夫出發，路上花了幾乎三個星期的時間，于11月19日抵達了塞瓦斯托波爾。他晉升為二級中尉，被分配到第十四炮兵旅第三輕炮兵連。讓他惱火的是，他被分配在城里居住，離防御工程很遠。那年秋天，托爾斯泰在塞瓦斯托波爾一共只待了九天，但是他在這段時間內看到的景象，已足以激發他的愛國自豪感，并從普通俄羅斯人身上看到了希望。這些情緒洋溢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 in December”）中，即他的成名作《塞瓦斯托波爾故事》的第一篇。“部隊士氣高昂，非筆墨所能描述，”他在11月20日向謝爾蓋寫道，

一名奄奄一息的傷兵告訴我他們占領了法軍第二十四炮臺，卻沒有援軍上來增援。他一邊說一邊哭了起來。一個堅守炮臺的海軍陸戰隊連，頂著敵人的炮轟堅守了三十天，在被命令撤下來時，幾乎要造反了。戰士們從沒有爆炸的炮彈里取出引信，婦女冒著炮火給棱堡送水、為戰士祈禱，[在因克爾曼戰役中]一個旅的十六名傷兵堅決不撤離前線。多么了不起的時代！但是現在……我們安靜下來了——現在的塞瓦斯托波爾非常美麗。敵人幾乎不再向我們開炮，每個人都相信敵人不會攻占這里，真的是不可能的。目前有三種假設：第一是敵人正在準備發動進攻；第二是敵人用假工事吸引我們的注意，掩護他們悄悄撤離；第三是敵人在加強工事準備過冬。第一種假設最沒有可能，第二種最有可能。我還沒有機會參加作戰，但是感謝上帝讓我見到這些人，讓我生活在這榮耀的時代。[10月17日的]炮轟不僅將是俄羅斯歷史上，也將是世界歷史上最燦爛輝煌的成就。[[71]](#_71_Tolstoy_s_Letters__vol__1__p)

[\*](#_87) 裝滿泥土的柳條筐，用作防守之用。——譯注

[†](#_88) 一種由蜂蜜和辣椒沖沏的熱飲。——原注

[‡](#_89) 約四千八百千克。——譯注

[§](#SS_7) 這是土耳其人對穿著不得體的女人的叫法，在奧斯曼帝國時期被用來描述非穆斯林女人，并且有性意味，暗示那個女人在經營妓院，或本身就是妓女。——原注

[¶](#P_7) 這場戰斗中的一個歷史謎團是為什么俄軍在面對這樣人數極少的抵抗部隊時，沒有以更快的速度，投入更大的兵力向巴拉克拉瓦發起進攻。不同的俄軍指揮官事后提供了各種解釋，聲稱他們沒有足夠兵力攻占巴拉克拉瓦，或這場行動的目的是偵察，或這場行動的目的是分散聯軍用來圍困塞瓦斯托波爾的兵力而不是為了占領港口，不一而足，但這些只是為失敗尋找的借口而已。俄軍沒有發動大規模進攻，或許可以用在阿爾馬河戰敗之后，俄軍指揮官在開闊地上面對聯軍時自信心不足來解釋。——原注

[\*\*](#_90) 約八厘米。——編注

[††](#_91) 索伊莫諾夫依靠的是一份海軍地圖，上面對陸地沒有任何標記。他的一名參謀用手指在地圖上比劃了一下地形。（A. 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I oborona Sevastopolia ［nabroski uchastnika］, St Petersburg, 1903, p. 15）——原注

[‡‡](#_92) 伍茲弄錯了，俄國近衛軍當時不在克里米亞。——原注

[§§](#SSSS_6) 這是一個可以理解的誤會，因為在高地的濃霧和樹叢中，躺在地上的不一定是傷兵，有些士兵會躺在地上伏擊敵人。——原注

[¶¶](#PP_6) 托爾斯泰引用的是經過軍隊審查后公布的官方數字。俄軍損失的真實數字是這個的兩倍。——原注

注釋

[[1]](#_1_8)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39, 42–3. 引用已獲授權。

[[2]](#_2_8)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 9; N. Berg, Desiat’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 15.

[[3]](#_3_8)Tolstoy, Sebastopol Sketches, p. 43;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 29.

[[4]](#_4_8)M. Bot’anov, Vospominaniia sevastopoltsa i kavkatsa 45 let spustia (Vitebsk, 1899), p. 6.

[[5]](#_5_8)E. Totleben, Opisanie oborony g.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863–78), vol. 1, p. 218; 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57), p. 7; Sevastopol’ v nyneshnem sostoianii: Pis’ma iz kryma i Sevastopolia (Moscow, 1855), p. 19; WO 28/188, Burgoyne to Airey, 4 Oct. 1854; 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8 Oct. 1854.

[[6]](#_6_8)Tolstoy’s Letters,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44. 場景描述參見 Sebastopol Sketches (p. 57).

[[7]](#_7_8)S.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od Sevastopolem (St Petersburg, 1897), p. 84; R. Egerton, Death or Glory: The Legac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0), p. 91.

[[8]](#_8_7)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38; Gershel’man, Nravstvennyi element, pp. 70–71; Totleben, Opisanie, vol. 1, pp. 198 ff.; J.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33.

[[9]](#_9_7)RGVIA, f. 846, op. 16, d. 5613, l. 12;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2, p. 31.

[[10]](#_10_8)NAM 1968–07–292 (Cathcart to Raglan, 27 Sept. 1854); NAM 1983–11–13–310 (12 Oct. 1854).

[[11]](#_11_7)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142–4; Baron de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to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 2 vols. (London, 1856), vol. 1, pp. 343–8.

[[12]](#_12_7)NAM 1982–12–29–13 (Letter, 12 Oct. 1854).

[[13]](#_13_7)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69; E. Wood, The Crimea in 1854 and 1894 (London, 1895), pp. 88–9.

[[14]](#_14_7)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 111.

[[15]](#_15_7)Sevastopol’ v nyneshnem sostoianii, p. 16.

[[16]](#_16_8)V. Bariatinskii, Vospominaniia 1852–55 gg. (Moscow, 1904), pp. 39–42; 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p. 126–9.

[[17]](#_17_7)NAM 1969–01–46 (Private journal, 17 Oct. 1854); Den’ i noch’ v Sevastopole: Stseny iz boevoi zhizni (iz zapisok artillerista) (St Petersburg, 1903), pp. 7, 11.

[[18]](#_18_8)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 30; WO 28/188, Lushington to Airey, 18 Oct. 1854.

[[19]](#_19_8)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 87.

[[20]](#_20_7)Sevastopol’ v nyneshnem sostoianii, p. 16.

[[21]](#_21_7)WO 28/188, Burgoyne to Raglan, 6 Oct. 1854;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138.

[[22]](#_22_7)Calthorpe, Letters, p. 125; 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 125;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p. 82–3.

[[23]](#_23_8)D. Austin, ‘Blunt Speaking: The Crimean War Reminiscences of John Elijah Blunt, Civilian Interpreter’, Crimean War Research Society: Special Publication, 33 (n.d.), pp. 24, 32, 55.

[[24]](#_24_8)Mrs Duberly’s War, p. 93; 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p. 119–120; W. Munro, Records of Service and Campaigning in Many Lands, 2 vols. (London, 1887), vol. 2, p. 88.

[[25]](#_25_7)H. Franks, Leaves from a Soldier’s Notebook (London, 1904), p. 80; NAM 1958–04–32(Forrest letter, 27 Oct. 1854).

[[26]](#_26_7)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155–6; 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71–2.

[[27]](#_27_7)Small, The Crimean War, pp. 73–82.

[[28]](#_28_7)R. Portal,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1854–1855 (Winchester, 1900), p. 112. 關于諾蘭上尉試圖引導輕騎兵改變進攻路線的說法，參見 D. Austin, ‘Nolan Did Try to Redirect the Light Brigade’, War Correspondent, 23/4 (2006), pp. 20–1.

[[29]](#_29_7)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161–162.

[[30]](#_30_7)S. Kozhukov, ‘Iz krymskikh vospominanii o poslednei voine’, Russkii arkhiv, 2 (1869), pp. 023–025.

[[31]](#_31_6)G. Paget, The Light Cavalry Brigade in the Crimea (London, 1881), p. 73.

[[32]](#_32_7)Mrs Duberly’s War, p. 95.

[[33]](#_33_6)Small, The Crimean War, pp. 64, 86–8; RGVIA, f. 846, op. 16, d. 5585, l. 31;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144–7.

[[34]](#_34_6)N. Woods, The Past Campaign: A Sketch of the War in the East, 2 vols. (London, 1855), vol. 2, pp. 12–4; Austin, ‘Blunt Speaking’, pp. 54–6.

[[35]](#_35_6)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91;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161.

[[36]](#_36_6)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5, pp. 1–24.

[[37]](#_37_6)NAM 1963–11–151 (Letter, 27 Oct. 1854); NAM 1986–03–103 (Letter, 31 Oct. 1854).

[[38]](#_38_6)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140.

[[39]](#_39_6)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 145.

[[40]](#_40_7)NAM 1994–02–172 (Letter, 22 Feb. 1855).

[[41]](#_41_6)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pp. 38–42;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161–4.

[[42]](#_42_7)A. 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i oborona Sevastopolia (nabroski uchastnika) (St Petersburg, 1903), p. 16.

[[43]](#_43_3)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194–5;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196–198.

[[44]](#_44_3)NAM 1968–07–264–1 (‘The 95th Regiment at Inkerman’).

[[45]](#_45_3)NAM 1968–07–264–1 (‘The 95th Regiment at Inkerman’).

[[46]](#_46_3)Andriianov, Inkermanskii boi, p. 20.

[[47]](#_47_3)P. Alabin, Chetyre voiny: Pokhodnye zapiski v voinu 1853, 1854, 1855 i 1856 godov, 2 vols. (Viatka, 1861), vol. 2, pp. 74–5;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203–5.

[[48]](#_48_3)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211–2.

[[49]](#_49_3)G. Higginson, Seventy-One Years of a Guardsman’s Life (London, 1916), pp. 197–198;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5, pp. 221–57.

[[50]](#_50_3)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p. 190–8;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169.

[[51]](#_51_2)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78.

[[52]](#_52_2)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 211; Historique de 2e Regiment de Zouaves 1830–1887 (Oran, 1887), pp. 66–7.

[[53]](#_53_2)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 214.

[[54]](#_54_2)Higginson, Seventy-One Years, p. 200;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 232.

[[55]](#_55_1)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175–6.

[[56]](#_56_1)M. O. Cullet, Un re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 112.

[[57]](#_57_1)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81–3.

[[58]](#_58_1)Woods, The Past Campaign, vol. 2, pp. 143–4;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78; Cler, Reminiscences, p. 216; 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ee (Paris, 1857), p. 70.

[[59]](#_59_1)RA VIC/MAIN/F/1/38.

[[60]](#_60_1)Cler, Reminiscences, pp. 219–20.

[[61]](#_61_1)RA VIC/MAIN/F/1/36 (Colonel E. Birch Reynardson to Colonel Phipps, Sebastopol, 7 Nov.); H. Drummo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855), p. 75; A Knouting for the Czar! Being Some Words on the Battles of Inkerman, Balaklava and Alma by a Soldier (London, 1855), pp. 5–9.

[[62]](#_62_1)RGVIA, f. 846, op. 16, d. 5634, ll. 1–18; Bazancourt, The Crimean Expedition, pp. 116–7;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p. 278–279; 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5, pp. 324, 460–63.

[[63]](#_63_1)FO 78/1040, Rose to Clarendon, 7 Nov. 1854.

[[64]](#_64_1)Small, The Crimean War, p. 209.

[[65]](#_65_1)NAM 1984–09–31–63 (Letter, 7 Nov. 1854); 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pp. 11, 15; RGVIA, f. 846, op. 16, d. 5629, l. 7; d. 5687, l. 1;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 384.

[[66]](#_66_1)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34–42; d. 5452, ch. 2, ll. 16–18;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vol. 2, pp. 272–3;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p. 165.

[[67]](#_67_1)Tolstoy’s Diaries, vol. 1: 1847–1894,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 95.

[[68]](#_68_1)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p. 161–2.

[[69]](#_69_1)Tolstoy’s Letters, vol. 1, p. 45; A. Opul’skii, L. N. Tolstoi v krymu: Literaturno-kraevedcheskii ocherk (Simferopol, 1960), pp. 27–30.

[[70]](#_70_1)Troyat, Tolstoy, p. 162.

[[71]](#_71_1)Tolstoy’s Letters, vol. 1, pp. 44–5.

# 第九章 一月將軍和二月將軍

11月的第二個星期，冬天到來了。三天三夜，冰冷的風雨席卷塞瓦斯托波爾外的高地，吹倒了英法聯軍的帳篷。泥濘中，士兵們只能抱在一起取暖，全身濕透，瑟瑟發抖，能用來擋風遮雨的，只有薄毯和大衣。緊接著在11月14日，克里米亞沿岸遭遇了暴風雨的襲擊。帳篷像紙片一樣飛向天空，盒子、木桶、箱子和篷車被刮起來又重重摔下。帳篷支撐桿、毯子、帽子和外衣、桌子和椅子在空中打轉，受驚的馬匹掙脫韁繩在營地狂奔踩踏。樹被連根拔起，窗子被打爛，士兵們東奔西跑追著自己的衣物和物品，或是焦急地尋找任何可以躲藏的地方。沒了屋頂的谷倉和馬廄、土崗背后或是地上的洞穴都成為他們的藏身之處。“當時的情景讓人難以想象，所有的帳篷都倒了，所有人，有些還在床上，另一些像我一樣……還穿著襯衣……全身濕透，高喊著自己仆人的名字，”冷溪近衛團的查爾斯·科克斯（Charles Cocks）在11月17日給兄弟的信中寫道，“最嚇人的是大風，我們像張開翅膀的老鷹一樣壓在帳篷上，不然它們就會被刮到塞瓦斯托波爾去了。”[[1]](#_1_NAM_1988_06_29_1__Letter__17)

狂風刮了一上午，下午兩點鐘的時候，風停了，士兵們終于可以從躲藏的地方出來尋找自己被吹得七零八落的東西：泥地上濕透了的臟衣服和毯子、砸壞了的家具碎片，還有鍋碗瓢盆和各種摔碎的東西。到了傍晚時分，氣溫開始下降，雨變成了大雪。士兵們試圖重新搭起帳篷來，但是手指已經被凍僵，有些人干脆繼續躲在谷倉和馬廄里過夜，抵著墻壁，相互抱在一起，徒勞地尋求一絲溫暖。

但是，相對暴風雨在港口和海面上造成的破壞來說，聯軍的高地營地還算不了什么。范妮·杜伯利當時正在“南方之星號”（Star of the South）上，看到港口水面漂滿了白沫，就像海水沸騰了一般，艦船劇烈搖晃，讓人害怕。“浪花飛濺起來，越過懸崖，從幾百英尺的高空落到港口，就像下大雨一樣。艦船擠擠挨挨，一起隨著海浪起浮，相互擠撞，成為碎片。”當時劍橋公爵正在其中一艘“嚴懲號”上休養，這場風暴把他嚇壞了。“狂風非常恐怖，”他第二天向拉格倫寫信報告，“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可怕的二十四小時。”

風暴中，兩支錨都斷了，船舵也折了。[我們]不得不把上甲板上的大炮丟到海里，僅僅依靠一支錨把船穩住。我們離海岸邊的巖石只有兩百碼遠，感謝上天，這支錨讓我們沒有撞上去……在顛簸中我撞得暈頭轉向，健康全垮了……我希望您不會反對我到君士坦丁堡修養一陣。吉布森（Gibson）（他的醫生）的看法是，如果我此時在這樣惡劣的天氣條件下返回營地，將會臥床不起。[[2]](#_2_Mrs_Duberly_s_War__Journal_an)

港口外的情形更加糟糕，因為擔心俄軍會對巴拉克拉瓦發起新一輪進攻，大批供給船錨泊在一起。二十多條英軍船只因為撞上岸邊巖石而被毀，幾百人喪生，損失了大量寶貴的冬季裝備。最大的損失是蒸汽機船“親王號”（Prince），船只沉沒了，一百五十名船員中只有六人生還，同時還損失了四萬套冬服。“果斷號”（Resolute）被毀，損失了一千萬發米涅來復槍子彈。在卡米什，法軍艦隊損失了戰列艦“亨利四號”（Henri Quatre）和蒸汽機船“冥王星號”（Pluton），運輸艦隊損失了兩條船和船上所有的船員和物資。一箱箱法國食品被海浪沖上俄軍在隔離灣防線后方的海灘，最北的甚至漂到了葉夫帕托里亞。伊萬·孔德拉托夫（Ivan Kondratov）是一名從庫班來的步兵，11月23日他在貝爾貝克河邊的露營地上給家人寫信：

暴風雨如此強烈，連巨大的橡樹都被吹斷了。許多敵人的船只沉沒了。在舍基（Saki）附近沉沒了三艘蒸汽機船。日羅夫（Zhirov）的哥薩克騎兵團從一艘沉沒的運輸艦上救起了五十名落水的土耳其人。他們相信在克里米亞海岸，有三十多艘船只沉沒。所以我們到現在都一直在吃英國腌牛肉，喝朗姆酒和外國葡萄酒。[[3]](#_3_Ia__Rebrov__Pis_ma_sevastopol)

遭到暴風雨破壞之后，法軍在幾天內就恢復過來，但是英軍花的時間卻長得多。后來在冬天，他們遇到的許多問題，如食品、住宿和醫療供應的短缺等，都直接和這場暴風雨有關，同時也說明英軍供應系統的失敗。冬天的來臨，將這場戰爭變成了一次對后勤管理效率的考試——法軍剛剛及格，英軍則失敗得非常難看。

聯軍指揮官們曾相信戰事會速戰速決，因此沒有為在塞瓦斯托波爾外高地過冬做好準備，而且他們也沒有想到此地的冬天會這么冷。英國人在這方面特別疏忽，沒有給部隊提供合適的冬裝。士兵們是穿著軍禮服來克里米亞的，一開始甚至連大衣都沒有，第一批運來的冬裝又隨著“親王號”沉到了海底，所以部隊的冬裝要到后來才會運到。法軍的準備工作則好得多，他們給部隊配發了羊皮外套，后來又配備了襯著皮毛、帶帽子、被叫作“克里米亞人”（criméennes）的斗篷。先是發給軍官，后來配給了所有士兵。法軍當局還讓士兵想穿多少層衣服就穿多少層，一點都沒有英軍要求所有士兵有“紳士般”著裝和外表的怪癖。進入深冬之后，為抵御嚴寒，法軍士兵穿得雜七雜八，看上去都不像支正規軍了，但重要的是他們比英軍士兵暖和得多。“放心吧，”第三朱阿夫團的弗雷德里克·雅皮（Frédéric Japy）寫信安慰遠在博庫爾（Beaucourt）的焦慮的母親：

我身上穿著很多層衣服，從里到外分別是：一件絨布背心（馬甲）、一件襯衫、一件羊毛背心、軍裝、外套（短大衣），腳上是靴子，如果不執勤的話，我會穿皮鞋和裹腿——所以你看我沒什么可抱怨的。我有兩件外套，一件是朱阿夫部隊發的，另一件又大又重，是我在君士坦丁堡買的，就是為了防寒，差不多有五十公斤重。當我在塹壕執勤時，我就穿著它睡覺。如果它被浸濕了的話，我提都提不動，更別說帶著它行軍了。如果可能的話，我會把它當作一件好玩的東西帶回法國去。

路易·努瓦爾描述了朱阿夫部隊的過冬穿著：

我們營的戰士，特別是那些從非洲來的，在冰冷的氣溫中存活下來，讓人非常佩服。我們穿得很好，一般在軍裝外再穿一件很大的帶帽子的斗篷，要么是一件“克里米亞人”，要么是由羊皮剪成、看上去像外套一樣的衣服。腿上穿的是襯著皮毛的裹腿。然后每個人還發了一頂暖和的羊皮帽。但是我們沒有統一的軍裝，每個人按照自己的風格穿衣服。有一個穿得像貝都因人（Bedouin）[\*](#__A_La_Bo_You_Mu_Min_Zu_______Yi)，另一個像馬車夫，還有一個像神父，其他人喜歡希臘風格，不過有些堅忍的人在軍裝外什么也不加。每個人腳上的木底鞋和靴子也是各式各樣的，有皮做的、橡膠做的、木底的等等。頭上戴什么完全任由每個人自己想象……

此時，英軍士兵穿的卻還是夏天的軍裝，他們羨慕法國人的羊皮衣和“克里米亞人”。“顯然他們穿的是適合這里生活的衣服，”軍醫喬治·勞森在給家里人的信中寫道，

我希望我們的士兵也有差不多的東西可以穿……許多人幾乎沒有鞋子，也沒有襯衣，他們的風衣全部磨爛了，因為不僅白天要穿，晚上也要睡在里面，最多再加一條從塹壕帶回來的潮濕的毯子。[[4]](#_4_Lettres_d_un_soldat_a_sa_mere)

聯軍指揮官們對士兵住在哪里也沒有好好想過。他們隨身帶來的帳篷底部是不隔熱的，面對惡劣的自然條件起不到什么保護作用，而且許多已經被暴風雨打壞了，沒法修好。在輕騎兵旅湯姆金森上尉（Captain Tomkinson）服役的團里面，一半的帳篷都壞了。他抱怨這些帳篷沒法住人：“它們不防水，下大雨時，漏水情況非常嚴重，帳篷里一片汪洋，士兵們只好圍著撐桿站著度過整個夜晚。”在視察卡迪科伊的營地時，盧肯勛爵發現大量的帳篷不適合住人，它們被“磨爛、撕破了，無法為士兵提供住所”，士兵們“幾乎都被凍死了”，而且腹瀉嚴重。[[5]](#_5_WO_28_162___Letters_and_Paper)



《克里米亞的冬天，克里米亞的夏天》，亨利·霍普·克里洛克繪，1850年代（版權所有：南拉納克郡議會. 許可方：www.scran.ac.uk）

英國軍官的居住條件比手下的士兵要好得多。大部分人都有仆人伺候，可以讓他們給帳篷鋪上木地板，或是在地上挖洞，再鋪上石頭。有些干脆挖了一個大坑，壁上砌著石塊，頂上蓋上樹枝。11月20日，第二十團的威廉·拉德克利夫上尉在給父母的信中寫道：

我的小屋進展很快，希望在這個星期結束時我就能住進“地下室”了。工程一開始是挖一個坑，三英尺六英寸深，八英尺寬，十三英尺長。[†](#__Yue_Yi_Mi_Shen__Liang_Mi_Si_Ku)在兩頭的中間位置各豎起一根桿子，上面放一個橫梁，用繩子、釘子，或是其他任何可以找到的東西綁緊。然后在橫梁和地面上搭起木桿或是各種能求來、借來，或是偷來的木片，同樣固定好。山墻的位置是用石頭和泥巴砌起來的，這樣就算是屋頂的結構……地坑的邊緣就是墻壁，我們把屋頂建得有足夠高度，讓人可以站立。現在輪到蓋屋頂了，一般是把纏繞在一起的枝條放在頂上的木桿之間，然后在上面澆上泥巴。但是我打算做一點改進，做成斜屋頂，鋪上馬匹和牯牛皮（現在有很多馬匹奄奄一息），希望能保證屋頂防水。這樣就要花很長時間才能做完，因為必須要先對皮“用某種方式”進行處理。麥克尼爾［中尉］（［Lieutenant］ McNeil）和我住在一起。我已經給住所取好了名字，叫作“獸皮隱園”（Hide Abbey）[‡](#___hideJi_Zhi_Shou_Pi__You_You)。他現在在做一個壁爐：在一側墻上挖一個洞，然后用錫罐和黏土做成一個煙囪。啊！我是多么期待住在里面啊。

在當時的情況下，位居社會最高層的英國軍官卻依然能享受各種特權，這在飽受煎熬的普通士兵看來，是令人發指的。卡迪甘勛爵（他確實身患疾病）住在自己的私人帆船上，享受法國大餐，招待了一批又一批來自英國的客人。有些軍官獲得準許在君士坦丁堡過冬，或是自己出資到附近村莊里尋找住所。“如果只考慮舒適程度，”查爾斯·戈登中尉（Lieutenant Charles Gordon）在家信中寫道，“親愛的，我向你保證，我在英國都不會這么舒適。”他就是未來的“中國戈登”（Chinese Gordon）[§](#SS_Ta_Hou_Lai_Dao_Zhong_Guo_Can)。薩克森派駐倫敦的大臣菲茨圖姆·馮·艾克施泰德伯爵后來記錄道：“度過那場嚴冬的英軍軍官中，有幾個后來笑著跟我說，[部隊]遭了這么多罪，他們還是從報紙上聽說的。”[[6]](#_6_NAM_1982_12_29_23__Letter__22)

法軍軍官跟自己手下的士兵住得很近，與英軍高級軍官的舒適生活形成了鮮明對比。在11月20日給家人的信中，埃爾貝上尉解釋了暴風雨對自己生活條件的影響：

軍官和士兵們都一起住在一個小帳篷里，在天氣好的時候，或是在行軍中，這樣的安排很不錯，但是在長期下雨又寒冷的季節就極為不方便了。地面因為踩踏而一片泥濘，泥水濺得到處都是。在塹壕或是營地里，每個人都是一邊走，一邊泥水四濺。每個人都全身濕透……在這些帳篷里，士兵們擠著躺在一起。一組六人，每個人只有一條毯子，所以他們一起在身下的泥濘地上墊三條，身上蓋三條，背包在塞滿之后就當作枕頭用。[[7]](#_7_Herbe__Francis_et_russes_en_C)

一般來說，法軍的住宿條件比英軍好。不僅帳篷更寬敞，而且他們還會在帳篷外建起木頭柵欄或是用雪砌成墻來擋風。法國人建起了各式各樣的臨時住所：被士兵們稱為“鼴鼠丘”（taupinères）的大棚屋是先在地上挖出一米深的坑，在底部鋪上石頭，然后用編織好的樹枝做墻和屋頂；“帳篷小屋”（tentes-abris）是把士兵的背包布縫在一起，綁在支在地上的木棍上；錐形帳篷（tentes-coniques）是把帆布縫在一起，搭在中間一根木桿上做成帳篷，大到可以睡六個人。所有這些臨時住所里都有烤爐可以用來做飯和取暖。“我們的戰士知道怎么砌爐子，這讓我們的英國盟友們敬佩又羨慕，”努瓦爾回憶道，

這些爐子的爐身有些是用黏土砌成的，有些是用水泥把大片的炮彈片粘起來做成一個拱頂。煙囪是用金屬盒子或廢鐵接在一起做成的。幸虧有這些爐子，當我們的戰士從塹壕或哨所執勤回來，凍得半死的時候，可以有個地方取暖。他們可以烘干衣物，睡個好覺，不必像可憐的英國人那樣，半夜因發燒醒來。我們的士兵燒了那么多的木柴，幾個月下來，因克爾曼高地上所有的森林都被砍光不見了，一棵樹、一片矮樹林都沒剩下。看到我們的爐子后，英國人抱怨說我們砍光了樹……但是他們自己為什么不讓這些樹派上用場呢。沒有一個英國士兵想到要給自己砌個爐子，他們更不愿意自己砍樹用來燒柴。他們什么都指望部隊派給他們，如果沒被派到東西的話，他們就一籌莫展。[[8]](#_8_J__Baudens__La_Guerre_de_Crim)

努瓦爾這種瞧不起英國人的想法在法軍中很普遍，他們覺得自己的盟友缺乏適應野外生活條件的能力。“哎！這些英國人，他們的勇氣無可置疑，但是他們只知道怎么去送死，”埃爾貝在11月24日向家人寫道，

在圍困之初他們就有大型帳篷，但是至今還沒學會怎么把它們支起來。他們甚至還沒學會在帳篷周圍挖溝排水！他們吃得很糟糕，盡管他們的口糧配給是我們的兩到三倍，而且花錢比我們多得多。他們缺乏韌性，在困苦不幸面前束手無策。

甚至連英國人自己也不得不承認法國人比他們組織得更好。“啊，法國人在各方面都比我們高明得多！”范妮·杜伯利在11月27日寫道：“我們的棚屋在哪里？我們的馬廄在哪里？都還在君士坦丁堡。當法國人在到處打獵的時候，我們卻躺在泥濘中，士兵和馬匹在饑寒交迫中死去，而這些卻都那么容易就可以避免。各處的情況都一樣，到處都是極端的疏忽和管理失誤。”[[9]](#_9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和法國人不同，英國人似乎沒有辦法建立一個制度來集體收撿柴火。他們給士兵分配了木炭用來生火，但是因為拉車的牲畜找不到草吃，讓它們把木炭從巴拉克拉瓦拉到塞瓦斯托波爾外的高地太困難了，于是士兵們就沒有木炭可用。軍官們倒是可以派仆人騎上自己的戰馬去取燃料。在嚴寒的12月和1月份，英軍士兵飽受折磨，幾千人都長了凍瘡，特別是那些新兵，他們還沒有適應克里米亞的冬天。在虛弱的士兵中，霍亂和其他疾病的蔓延更是雪上加霜。“我在士兵中間看到的是傷心痛苦；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燃料，所有樹根，甚至連矮樹林的樹根都被挖光了，”高地旅的斯特林中校寫道，

每個人都有配給的木炭，但是沒辦法把木炭拉上來，而且［因為疾病］減員厲害，騰不出手來派人到六至七英里[¶](#P_Yue_Shi_Qian_Mi_______Bian_Zhu)遠的巴拉克拉瓦去運木炭。后果是他們沒法弄干自己的長襪和鞋子，從塹壕回來，他們腳趾凍傷、腳浮腫、長凍瘡等等。鞋子凍硬了，穿不進去。盡管苦難重重，只要還有能力的，就繼續履行自己的職責，經常自愿光著腳進塹壕，或者把鞋跟砍掉以把腳放進去……如果這樣下去，塹壕必須得放棄了……我聽到有戰士疼得跪在地上直喊。[[10]](#_10_NAM_1968_07_270___Letters_fr)

在食品供應上，兩軍待遇更是天差地別。“把這個營地的英軍和法軍相比，讓我痛心，”辛普森將軍（General Simpson）[\*\*](#___1855Nian_2Yue_Qi_Dan_Ren_La_G)在給潘穆爾勛爵（Lord Panmure）[††](#___Ying_Guo_Zheng_Ke__1855Nian_S)的信中寫道，“我們的盟友的裝備真是奇妙。我看到連綿不斷、設備齊全的大車和篷車……運送物資供應等等……在法軍中，軍隊所需要的任何東西都運行良好，他們甚至每天都烤面包，一切都在部隊的管制下有紀律地進行著。”法軍每一個團都有一批人為士兵的基本需要提供服務，食品供應和準備、治療傷兵等等，不一而足。每個團都有自己的面包師傅和一批廚師，另外還有女輔工（vivandières）和女廚工（cantinières），她們身穿經過改造后的軍服，負責從移動食堂向部隊售賣食物飲料。法軍集中準備食物，每個團都有自己的廚房和廚師。相比之下，英軍營地里，口糧配給個人，每個士兵都得自己做飯。這一差異也許可以解釋為什么和英軍相比，法軍的健康狀態出人意料地好，盡管他們的口糧只有英軍的一半，其中肉只有英軍的三分之一。直到12月，英軍才開始學習法軍的辦法，由食堂集中準備食物。他們采用了這一系統后，英軍營地的情況馬上開始好轉。[[11]](#_11_I__G__Douglas_and_G__Ramsay)



一名身穿朱阿夫部隊軍服的女廚工，羅杰·芬頓攝，1855（圖片來源：國會圖書館印刷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拿破侖曾經說過：“是湯造就了一名戰士。”湯是克里米亞法軍的主力菜，即使在深冬，當新鮮食物的供應達到最低點時，法軍還可以依靠大量的干制食品：做成小硬圓餅狀的腌制蔬菜，只要放入熱水中，加上鮮肉或咸肉，就可以做成一盆營養豐富的湯；可以保存好幾月的小麥餅干，比普通面包還有營養，因為含水少而脂肪更多；還有大量的咖啡豆，沒這東西法國人活不下去。“我只喝咖啡，不管是熱的還是冷的，”一名年輕的龍騎兵夏爾·米斯梅（Charles Mismer）回憶道，“除了其他的好處外，咖啡能刺激神經，保持道德勇氣，是抵御疾病最好的東西。”在很多時候，法軍士兵就靠“一種咖啡和碎餅干做成的湯生存”，米斯梅寫道。不過一般來說，法軍士兵的口糧“包括咸肉、豬油和米，有時候有鮮肉，配以葡萄酒、糖和咖啡，只是面包有時會發生短缺，但是我們有餅干，硬得像石頭一樣，得用斧頭砸碎或切開”。[[12]](#_12_C__Mismer__Souvenirs_d_un_dr)

法軍部隊的供應如此豐富，原因是他們建立了一套高效的后勤系統，在卡米什和圍困線之間修了路，運送物資的篷車隊源源不斷地來往。卡米什的港口遠比巴拉克拉瓦更適合卸下物資。在寬廣的馬蹄形海灣邊，各種倉庫、屠宰場、私人開的商店、做生意的攤位紛紛冒了出來，三百條來自世界各地的船只可以同時在這里卸貨。碼頭邊還開起了酒吧、妓院、旅館和餐廳。其中一間餐廳只要軍人們交一筆錢就可以在那里吃飽喝足、玩夠女人，所有這些都是從法國送來的。“我去了趟卡米什，”埃爾貝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那里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鎮子了。”

在這里，你想要什么都能找到，我甚至看到有兩間時裝店正在出售巴黎運來的香水和帽子，都是為女廚工準備的！我去過巴拉克拉瓦，比起來真讓人可憐！那個小港口岸邊建起的小屋子里堆滿了可以售賣的東西，但是所有東西都亂七八糟地堆著，沒有一點規律，對買家一點吸引力都沒有。英國人選擇了那個地方，而不是卡米什作為他們的供應基地，實在讓我吃驚。[[13]](#_13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e)

巴拉克拉瓦是一個擁擠混亂的港口，在卸貨時，政府供應物資不得不和私人商賈競爭。黑海地區的各種商人都在這里——希臘人、土耳其人、猶太人、克里米亞韃靼人、羅馬尼亞人、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甚至還有幾個俄羅斯人，他們被允許留在鎮上。“如果有誰想在英格蘭建一個‘巴拉克拉瓦模型’，”范妮·杜伯利在12月寫道，“我可以告訴他配方是什么。”

找一個只有斷壁殘垣，到處是各種最惡心污穢的村子，讓大雨滂沱，直到整個地方變成齊腳踝深的沼澤。抓來一千名身患瘟疫的土耳其人，把他們胡亂塞進屋子里頭去。每天弄死一百人，掩埋尸體的時候確保僅蓋上少許泥土，讓他們慢慢腐爛——注意保障不斷有死尸供應。把所有筋疲力盡的矮馬、瀕死的牯牛、快累死的駱駝都趕到海灘的一角，讓它們在那里餓死。它們一般會在三天左右死去，然后尸體很快腐爛，散發出相應的氣味。讓港口水面上漂滿各種動物內臟，有的來自供給船只，有的是鎮上的人所吃掉的動物，再時不時漂上幾具人尸，缺胳膊少腿的也都可以，加上隨處可見的沉船碎片——把這些都放在一起，擠在狹窄的港口里。這樣就能制成大致體現巴拉克拉瓦精髓的復制品來。[[14]](#_14_Mrs_Duberly_s_War__p__118)

英軍所面臨的難題眾多，巴拉克拉瓦只是開始。所有物資必須得到后勤部文書的批準之后才能離開碼頭，這是一套復雜的系統，包括各種表格和授權等，所有文件必須一式三份。一箱箱的食品和草垛可能在岸邊待上幾個星期，都已經開始腐爛了，低效率的官僚卻還沒有完成識別和批準它們被送走的程序。[‡‡](#_____Hou_Qin_Bu_Guan_Yuan_Wu_Nen)英軍沒能在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爾外高地上的營地之間修建一條正常的道路，于是每箱子彈、每條毯子、每塊餅干都必須由馬或騾子拉著大車，沿著一條陡峭的泥路送到十至十一公里高處的營地上。在1854年12月和1855年1月，大部分物資不得不靠人力運輸，每人一次二十公斤負重，因為牲畜沒有草吃，很快都死了。

英軍的問題不僅是后勤組織差，而且士兵也不習慣自發尋找食物或保護自己。他們大都來自沒有土地的階層，或是都市貧民，不像來自農村的法軍士兵有這方面的技能。法軍士兵會捕獵野獸、在河海里捕魚，幾乎能把任何東西變成食物。“英軍士兵已經養成了習慣，”路易·努瓦爾的結論是，“他只管打仗，每頓飯都得端到他面前。英國人寧愿餓死也不愿意改變他們的習慣，這種頑固就是他們的個性基礎。”因為無法照顧自己，英軍部隊必須依賴一支龐大的隨軍家屬隊伍為他們煮飯、洗衣服，或是做一些法軍士兵可以自己做的瑣碎家務。這就是和法軍相比，英軍中婦女的數量相對比較多的原因。法軍沒有隨軍家屬，只有女廚工。第二十八步兵團的瑪麗安娜·揚（Marianne Young）抱怨英軍士兵“手里拿著分配到的口糧也會餓個半死，因為有三塊石頭和一個錫罐，他們卻沒有能力把口糧變成可以吃得下的食物”。而法軍就不一樣，“如果能變成食物，沒什么東西是法軍士兵看不上的”。他們抓青蛙和烏龜，然后“憑著自己的口味煮熟了吃”。他們還會挖海龜蛋，把老鼠肉變成美味。英軍外科醫生喬治·勞森看到一名法軍士兵把一只活青蛙的腿砍下來時，批評他殘忍，但是那名法軍士兵卻“靜靜地微笑著——大概是笑我無知吧——然后拍拍肚子，說這是用來吃的”。[[15]](#_15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e)

和法軍相比，英軍吃得很差，雖然至少在一開始他們的肉和朗姆酒的供應很充足。“親愛的太太，”第十二皇家炮兵營（12th Battalion Royal Artillery）的一名半文盲炮手查爾斯·布蘭登（Charles Branton）在10月21日寫道，“因為霍亂[§§](#SSSS_Yuan_Wen_Wei_Corora_Ying_Ga)，我們中死了很多人，他們就像腐爛的綿羊一樣死去。但是我們有足夠多的吃的和喝的。我們每天有兩及耳（Gill）[¶¶](#PP_Liang_Ji_Er_Yue_Wei_Er_Bai_Ba)的朗姆酒、很多咸豬肉，還有半磅[\*\*\*](#____Yue_Si_Liang_Ban_______Bian)餅干。我和你說，如果有四及耳朗姆酒的話，那就太妙了。”從秋天漸漸到了冬天，把物資經由泥濘的道路從巴拉克拉瓦送到營地變得越來越困難，英軍的口糧配給很快變得不足。到12月中時，不管什么樣的水果或蔬菜都沒有了，偶爾只有些檸檬或青檸果汁。為防止患上敗血癥，士兵們把果汁加到茶里或是朗姆酒里。不過有錢的軍官可以從巴拉克拉瓦和卡迪科伊的商店里買到各種東西：火腿和奶酪、巧克力和香煙、葡萄酒、香檳，什么都有，甚至包括福特納姆和梅森（Fortnum & Mason）[†††](#____Dang_Shi_Ying_Guo_De_Gao_Ji)出品的豪華什錦食品箱。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成千士兵病倒在地，然后因病死去，霍亂重新爆發，并迅猛傳播開來。到1855年1月，英軍只剩下一萬一千可以作戰的士兵了，不足兩個月前的一半。來復槍旅（Rifle Brigade）的列兵約翰·派因（John Pine）在1月8日給他父親寫信時，已經患敗血病、痢疾和腹瀉好幾個星期了：

已經有很長時間了，我們在營地就靠餅干和鹽過日子，時而會給我們鮮牛肉，還有一兩次羊肉，但是東西都非常糟糕，在英國扔給狗都不吃。但這已經是我們能吃到的最好的東西，所以我們必須為此感謝上帝。米麗婭姆（Miriam）（他的姐姐或妹妹）告訴我許多德國香腸正被送到部隊手里。我希望他們動作快點，因為我真的覺得現在我就可以吃掉一兩磅香腸。……在過去的五六個星期里，我真的一直都很餓……親愛的父親，如果您能隨信寄來些治敗血病的藥粉，那我就太感激了，因為我一直受著敗血病的折磨。以后我一定好好報答您，請上帝饒恕我吧。

派因的病情隨后加重，被送到君士坦丁堡附近庫拉利（Kulali）的軍隊醫院，不到一個月就病死在那里。英軍的管理工作非常混亂，連他的死亡記錄都沒有，家人一年之后才從他的一位戰友那里得知他的死訊。[[16]](#_16_NAM_1996_05_4_19__Pine_lette)

沒過多久，英國部隊的士氣就一蹶不振了，官兵們開始批評軍事當局的無能。“我們這兒的人都非常希望和平能很快到來，”第三十三團的芒迪中校在2月4日給母親的信中寫道，“后方的人可以對軍事秩序什么的夸夸其談，但是在這兒，看著成千的戰士因為疏于照料而死去，每一個人都受夠了。”隨增援部隊第二十三團于11月底抵達克里米亞的列兵托馬斯·哈格爾（Private Thomas Hagger）給家人寫道：

我很難過地看到，在我們抵達前，駐守這里的戰士們已經有兩個月沒有一件干凈的襯衫換了。家鄉的人們以為這里的士兵配給得很好，但是很抱歉，我得說他們受到的對待還不如生活在英格蘭的狗。我能向英格蘭的人們保證，如果這些人回了家，要再讓他們出征就不那么容易了，他們不是害怕打仗，而是受到的惡劣對待讓人心寒。

有人向報刊揭露部隊的糟糕情況。第一（皇家）團的喬治·貝爾中校在11月28日起草了一封寫給《泰晤士報》的信：

所有的破壞性因素都針對我們而來：疾病與死亡、衣不蔽體、咸肉的不穩定供應。兩天沒喝上一滴朗姆酒了，這可是唯一還能讓戰士們站起來的東西。如果連這都沒有了，那么我們就完了。向巴拉克拉瓦傳遞消息是不可能的，六英里的路程積雪深至膝蓋。車輪轉不動，可憐的拉車牲畜已經餓得連拉空車的力氣都沒有了。馬匹——騎兵的、炮兵的、軍官坐騎和拉車的，每天晚上都因凍餓而死掉一批。更糟糕的是不斷有士兵倒地身亡，讓人感到恐懼。到今天為止，我看到皇家團第一營的一個帳篷里就有九名戰士去世，還有十五人已經奄奄一息，都是因為霍亂……可憐的戰士們后背從來就沒干過，他們身上的衣服已經破爛不堪，每晚下塹壕時已經全身濕透，躺在雨水、泥濘和融了一半的臟雪中直到天明。全身抽搐地找醫院，但是醫院的帳篷已經被暴風雨破壞，他們只能躺在惡臭的環境中，痛苦掙扎，這兒的條件本身就足以讓疾病蔓延。這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我作為一名軍官的責任是努力保證我手下勇敢而謙卑的戰士盡量少受苦，但是我做不到，我手中沒有權力。醫院幾乎什么都缺，建的時候就沒有好好地計劃。團部醫療官的意見最大，許多隨軍醫生也很有看法。

他在第二天寫完了這封信，在信的最后，貝爾附加了一段單獨寫給報紙編輯的話，請編輯發表他的信，結語是：“寫出這里的真實狀況讓我感到擔憂。”這封標明12月12日的信后來在29日的《泰晤士報》上發表了。雖然在發表時編輯已經把語氣改輕了，但貝爾認為，即便如此，這封信的發表還是毀滅了他的軍事前途。[[17]](#_17_NAM_1984_09_31_79__4_Feb__18)

\* \* \*

英國公眾是通過《泰晤士報》的報道才第一次了解到英軍傷病員所處環境之惡劣的。10月12日，《泰晤士報》的讀者在早餐看報時，讀到了一則觸目驚心的報道，作者是《泰晤士報》駐君士坦丁堡記者托馬斯·切納里（Thomas Chenery），報道中說英軍在克里米亞前線的傷病員必須被送往五百公里遠的斯庫臺，“醫療準備不夠充足，無法給傷員提供適當的照顧，”他寫道，“沒有足夠的外科醫生，這也許可以說是無法避免的；沒有足夠的包扎員和護士，這也許是系統的錯，誰也怪不著；但是連做繃帶的亞麻布都不夠，這還能怎么說？”第二天的《泰晤士報》上刊登了主編約翰·德萊恩（John Delane）一篇語氣憤怒的社論，讀者紛紛給報社寫信、捐款。在此基礎上，前首相之子羅伯特·皮爾爵士創立了《泰晤士報》克里米亞傷病員救治基金（Times Crimean Fund for the Relief of the Sick and Wounded）。大量讀者來信關注英軍在克里米亞竟然沒有護士這一丑聞，許多熱心做善事的婦女發出倡議進行補救，其中之一是弗洛倫絲·南丁格爾，當時她是哈利街（Harley Street）[‡‡‡](#_______Lun_Dun_Shi_Zhong_Xin_De)上的淑女醫院（Hospital for Invalid Gentlewomen）一名不領工資的監督，還是軍務大臣悉尼·赫伯特一家的朋友。她向赫伯特夫人寫信，主動請纓召集一批護士前往近東；而就在同一天，悉尼·赫伯特也給她寫了信，向她提出同樣的請求，兩封信就這樣擦肩而過。

在為傷病員提供醫療安排上，英國遠遠落后于法國。克里米亞和君士坦丁堡法國軍隊醫院的訪客都對那里的干凈整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醫院里有許多護士，大部分是從圣文森特·德·保羅修會（Order of St Vincent de Paul）[§§§](#SSSSSS_Yi_Ge_Tian_Zhu_Jiao_Guo_J)招募的修女，全都在醫生的指揮下照顧傷病員。“我們看到這里的條件比斯庫臺好太多了，”去到君士坦丁堡法軍醫院的一名英國訪客寫道：

這里更干凈、舒適，傷病員更受關心，病床更舒服，床位安排得也更合理。空氣流通非常好，根據我們看到的和了解到的情況，這里什么都不缺。一些受傷最嚴重的傷員，由修女慈善會（Sisters of Charity）專門負責照料，一個修會分部（圣文森特·德·保羅）因而在此建立。這些卓越女性的勇氣、能量和耐心據說再怎么贊美也不為過。而在斯庫臺，一切都單調沉寂，將其形容為嚴酷和可怕幾乎算得上是對它的贊美。在這里我看到的是生命與喜悅，我的那些法國老朋友們在床邊玩多米諾骨牌、卷香煙，或是相互拌嘴……我還喜歡這里的醫生在和傷病員說話時的親切態度。當他走近時，這些“我的孩子”或是“我的勇士”們一個個眼睛都亮了。

同一年稍晚些時候，埃爾貝上尉也被疏散到這家醫院。他在給家人的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生活規律：

早晨吃巧克力，午餐十點鐘開始，晚餐五點鐘。醫生在十點鐘之前查看病房，下午四點還有一輪。下面是今天早晨發的午餐菜單：

木薯粉濃湯

羊骨頭配蔬菜

烤雞肉

烤土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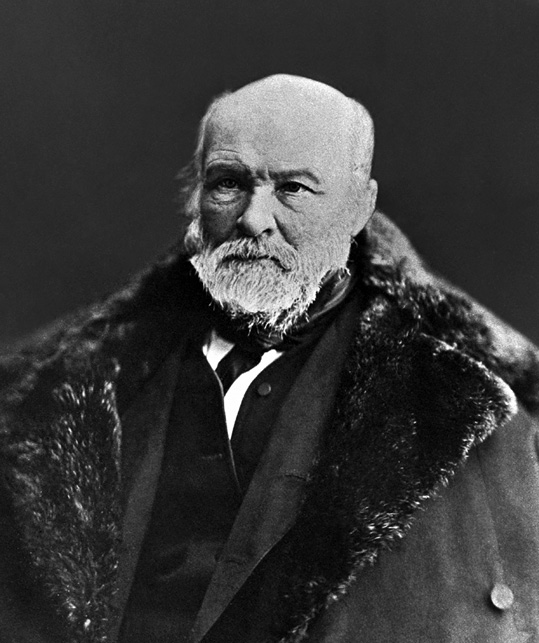
波爾多葡萄酒

新鮮葡萄和餅干

你可以想象，伴著從窗口吹進來的海風，這份菜單非常溫暖人心，能讓我們很快恢復健康。[[18]](#_18_K__Chesney__Crimean_War_Read)

在克里米亞戰爭的第一個冬天，法軍傷病員的死亡率比英軍低很多（但是第二年法軍因病死亡造成的損失非常可怕）。除了醫院干凈外，另一個關鍵因素是法軍在離前線不遠處建立了救治中心，同時在每一個團配置衛生兵。他們受過急救訓練，被稱為“士兵包扎員”（soldats panseurs），能夠在戰場上為戰友提供協助。英軍所犯的最大錯誤是把傷病員從克里米亞送到斯庫臺——這是一段漫長而且難熬的旅途，在擁擠超載的運輸船上，很少配有超過兩名醫療官。拉格倫在制定這個政策時，完全是以軍事作為出發點的（“不要讓傷員妨礙戰斗”），當手下人抗議不適合讓傷病員做這番長途旅行，而應該立即給予救治時，他一點也聽不進去。在“亞瑟大帝號”（Arthur the Great）上，三百八十四名傷員被放在甲板上，一個挨一個，排得密密的，如同販奴船一般。已經死去的、奄奄一息的，都緊挨著其他傷病員。沒有床、枕頭或毯子，沒有水盆和便盆，也沒有食物和藥品。船上只有供船員使用的藥品，船長不允許其他人動用。因為擔心霍亂蔓延，英國海軍的運輸總負責人彼得·克里斯蒂船長（Captain Peter Christie）下令將所有患病者放到一條名為“袋鼠號”（Kangaroo）的船上。這條船的運載能力為二百五十人，但是在準備起航前往斯庫臺時，船上已經擠了約五百人。“一個可怕的場景展現在我們面前，死去的和快死的，患病中的和正在恢復的，全部被胡亂地堆在甲板上。”船上兩名醫療官之一、二十三歲的助理外科手術醫生亨利·西爾維斯特（Henry Sylvester）寫道。船長一度拒絕將超載如此嚴重的船只駛入大海，但是最終“袋鼠號”卻載著近八百名病人出發了。西爾維斯特不在船上，他乘坐“鄧巴號”（Dunbar）去了斯庫臺。這些船只上的死亡率駭人聽聞：“袋鼠號”和“亞瑟大帝號”每艘船都有四十五人死亡，“雙蛇杖號”（Caduceus）三分之一的乘客在抵達斯庫臺之前就已經死去了。[[19]](#_19_Baudens__La_Guerre_de_Crimee)

俄羅斯方面也十分清楚必須盡快救治傷員，但是比起南丁格爾在斯庫臺看到的英軍醫院，俄軍醫院的條件更差。俄羅斯醫生尼古拉·皮羅戈夫（Nikolai Pirogov）最早采用了一套戰地手術系統，其他國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趕上。盡管在俄羅斯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俄羅斯他卻是一位民族英雄。他對戰地醫療的貢獻絕不比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取得的成就低——如果不是更高的話。



尼古拉·皮羅戈夫，1880（圖片來源：科學照片庫）

皮羅戈夫1810年出生在莫斯科，十四歲就進入莫斯科大學學醫，二十五歲便成為多爾帕特（Dorpat）[¶¶¶](#PPP_Jin_Ai_Sha_Ni_Ya__Estonia_De)德語大學（German University）的教授，后來擔任位于圣彼得堡的軍事醫學院（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ine）的外科手術教授。1847年，他在高加索地區擔任隨軍醫生，在那里首創使用乙醚，成為第一個在戰地手術中使用麻醉術的外科醫生。在1847年至1852年間，他在幾份俄語刊物上發表文章，介紹使用乙醚的好處，但是在俄羅斯以外卻沒有幾個醫生知道他的文章。皮羅戈夫強調，讓剛被送到醫院的病人吸入乙醚，除了能緩解疼痛和驚恐外，還能讓他們保持鎮靜，防止昏迷，這樣有利于外科醫生更好地判斷哪些人需要立即進行手術，哪些人可以再等一會兒。不過皮羅戈夫在戰地醫療上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他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首創的傷病員分流系統。

皮羅戈夫于1854年12月抵達克里米亞，立刻被那里處理傷病員時的混亂和不人道激怒了。幾千名傷員被放在無遮無蓋的大車上向彼列科普疏散，送到時許多人都已經凍死了，或是手腳被嚴重凍傷，不得不截肢。因為缺乏運輸工具，另外一些傷員就被丟棄在骯臟的谷倉里，或是被遺棄在路邊。長期缺乏醫療用品的部分原因是腐敗，醫生們把藥品偷偷賣掉，給傷員們用劣質的替代品，傷員想要得到適當的治療必須向醫生行賄。醫院難以應付人數龐大的傷員，在聯軍登陸時，克里米亞的俄軍醫院一共有兩千個床位，但是在阿爾馬戰役后，一下子有了六千名傷員，因克爾曼戰役后這個數字又翻了一番。[[20]](#_20_N__Pirogov__Sevastopol_skie)

塞瓦斯托波爾醫院的惡劣條件駭人聽聞。阿爾馬戰役兩個星期后，霍達謝維奇所在團里的一名外科醫生訪問了海軍醫院：

他看到那里擠滿了傷員，傷口從阿爾馬戰役那天起就沒被包扎上過藥，傷員只好撕下身上的襯衫給自己包上。他一走進屋子，里面的人認出他是醫生，立即蜂擁上來。這些悲慘的可憐人向他伸出被截肢的手臂，只裹著一條骯臟的毯子，哭喊著請求他幫助。那里的氣味讓人惡心。

一名俄軍軍官估計，醫院的外科醫生絕大多數沒有好好地培訓過，與其說是醫生，不如說是“江湖郎中”。他們在做最簡單的手術時，用的還是骯臟的屠夫砍刀，對衛生的要求、感染的危害一點概念都沒有。皮羅戈夫還發現有被截肢的傷員在自己的血泊中躺了好幾個星期。[[21]](#_21_N__Berg__Desiat__dnei_v_Seva)

一到塞瓦斯托波爾，皮羅戈夫就開始向醫院發布命令，逐步實施他創建的傷病員分流系統，他的回憶錄中記載了這一過程。他剛接管由貴族議事廳改建的主醫院時，情形非常混亂。每次遭到炮擊之后，所有傷員都被送到這里，沒有一點秩序，已經死去的、瀕臨死亡的、需要緊急救治的、只受輕傷的全都混在一起。起初皮羅戈夫馬上處理那些受了重傷的人，讓護士把他們直接送到手術室。但是當他還在集中精力救治一名傷員時，其他傷員一直不斷被送進來，他根本無法應付。當他還在救護那些受傷太重已沒有希望救活的傷員時，其他傷員等不到治療就死去了。“我終于認識到這么做毫無意義，因此決定更加決斷、更加理智，”他回憶道，“在拯救生命上，包扎站簡單的組織工作比醫治傷員本身重要得多。”他的解決方案是一個簡單的分流系統，在1855年1月20日塞瓦斯托波爾遭受炮擊時，將這一系統投入使用。當傷員被送到貴族議事廳的大禮堂后，首先被分到三個組別中的一個，確定接受治療的優先級別：受了重傷急需救治，依然能救活的，馬上送到另一個房間盡快接受手術；只受了輕傷的，讓他們領一個號碼，然后去旁邊的軍營等待，直到外科醫生有時間處理他們的傷口；已經無法救活的傷員被送到一間休息室，讓他們在那里休息，由醫療看護、護士和神父照顧他們，直到死去。[[22]](#_22_N__Berg__Desiat__dnei_v_Seva)

托爾斯泰在《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爾》中向讀者們描述了大禮堂的景象：

一打開大門，眼前的景象和空氣中的味道就向毫無戒備的你直撲而來。這里有四五十名被截肢或是受了重傷的人，有些躺在野營床上，但大部分都被放在地上……現在，如果你神經堅強的話，那么請穿過左邊的門廊：那是包扎傷口、進行手術的地方。在那里你會看到面色蒼白、神情陰郁的外科醫生。他們的注意力正高度集中在眼前的傷員身上，躺在手術臺上的傷員吸了氯仿，睜著眼，卻如同癡呆了一樣，發出沒法聽懂的聲音，有時夾帶一兩個簡單的詞語或是發出激動的聲音。外科醫生們做的是截肢工作，令人厭惡但對傷員有好處。你會看到鋒利的弧形手術刀扎入白色、健康的身體；你會看到傷員忽然恢復知覺，發出一聲可怕又讓人難過的尖聲詛咒；你會看到手術助手把截下來的手臂扔到房間的一個角落；你會看到房間里的另一個傷員正躺在擔架上看著面前的手術，扭動呻吟，不是因為身上的痛楚，而是因為心理上的驚懼。你看到的恐怖景象會讓你內心最深處都驚顫起來；你會明白戰爭不是一個漂亮大方、井然有序、閃閃發光的陣形，不是音樂和鼓聲、連串的旗幟，也不是坐在前蹄騰空的戰馬上的將軍；你看到的是戰爭最真實的一面——鮮血、痛苦和死亡。[[23]](#_23_L__Tolstoy__The_Sebastopol_S)

使用麻醉術極大提高了皮羅戈夫和他手下外科醫生的工作效率，通過同時在三張手術臺上做手術，每天工作七小時，他們可以完成超過一百個截肢手術（批評者說他運行的是一個“工廠系統”）。他發展出了一種新的技術，在腳踝處截肢，留下部分腳跟骨，給腿部一點支持。一般來說，他在做截肢手術時，截口都比其他醫生選得更靠下，盡量把創口和失血降到最低，他知道手術后失血過多是最嚴重的一個威脅。最為重要的是，皮羅戈夫清楚感染的危險（他以為是來自被污染的霧氣），特地將那些手術后傷口干凈的傷員和另一些傷口化膿、有壞疽癥狀的傷員分開。通過這些首創的措施，皮羅戈夫實現了比英軍和法軍醫院都高的存活率——手臂截肢的傷員中，65%能活下來；大腿截肢是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最危險也是最常見的手術，皮羅戈夫的存活率是25%，而在法軍和英軍醫院里，只有十分之一的傷員在接受手術后能活下來。[[24]](#_24_Giubbenet__Ocherk__pp__5__7)

跟俄羅斯人和法國人相比，英國人對麻醉的使用遠不是那么熱衷。在即將從瓦爾納啟程前往克里米亞時，英軍軍醫總管約翰·霍爾醫生（Dr. John Hall）簽發了一份備忘錄，警告軍隊外科手術醫生“不要在治療嚴重槍傷時使用氯仿……因為不管看上去多么野蠻，受到刀扎是一種強大的刺激；聽到一個人狂喊比看著他靜靜地沉入墳墓好得多”。對于麻醉這項新技術，英國醫學界的觀點有分歧，有些人擔心使用氯仿會松懈病人的斗志，另一些人認為在戰地手術期間使用麻醉不現實，因為缺乏有資格的醫生來監督實施。這些態度還和英國人將忍受痛苦作為男子漢氣概表現的奇特想法（所謂保持一個“僵硬的上嘴唇”）緊密相關。一種十分常見的想法是英軍戰士更能忍受痛苦，一位醫生在克里米亞寫下的文字便體現了這一點：

還沒有人真正描述過戰士們的膽量。他們笑對痛苦，極少會因面對死亡而屈服。精神戰勝身體，真的極不平凡。如果在家里手腳被拉斷或是壓壞，被送來時肯定就已經暈倒，或是恐慌得六神無主了；但是在這里，當他們帶著一只晃蕩的手臂，或是被打爛的手肘進來時，他們會說：“醫生，請您快點，我的情況還不太糟糕，我還能再回去！”這些勇敢的人，許多只用一條浸了冷水擰干的毛巾裹上殘肢，就爬回戰場，不管炮彈在他們周圍爆炸，彈丸掀起腳邊的草地，繼續觀察戰事進程。讓我告訴你一個完全真實的故事，我曾經截下一位軍官、某上尉的腳，手術完成之后，他堅持要我把他扶上戰馬，宣稱他可以繼續作戰，因為他的“腳已經包扎好了”。[[25]](#_25_H__Connor___Use_of_Chlorofor)

和法國人一樣，皮羅戈夫對醫院中護士的作用非常重視，護士幫助分流傷員，給予安慰。她們還負責分派藥品、端茶送酒、替傷員給家人寫信、給瀕死的人精神上的支持。護士們的慈愛贏得了許多傷員的心，把她們比作自己的母親。“這實在讓人驚訝，”皮羅戈夫在給妻子的信中寫道，“在醫院中出現一位穿著雅致的女性，竟然有緩解傷員緊張情緒、減低苦楚的功效。”皮羅戈夫對由俄羅斯貴族女性發起的征召護士前往克里米亞的舉動贊賞有加。沙皇的弟媳、在德國出生的葉蓮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Elena Pavlovna）[\*\*\*\*](#_____Ta_Yuan_Wei_Wei_Teng_Bei_Ge)在聽說了俄軍在因克爾曼戰敗的消息后，創建了圣十字架社團（Community of the Holy Cross）。這個團體派出了三十四名護士隨同皮羅戈夫一起前往克里米亞，從圣彼得堡出發，踏上一段漫長艱苦的路程，在泥土路上行進了一千公里之后，終于在12月1日抵達辛菲羅波爾。她們中許多人是軍人的女兒、妻子或是遺孀，有些來自商人、教士或小貴族出身的官員家庭，本身沒有經歷過戰場的艱苦條件，許多人很快患上斑疹傷寒或是其他流行病而病倒了。皮羅戈夫把護士們分為三組：有的照顧傷員和協助手術，有的負責分派藥品，還有的在醫院管理家政。亞歷山德拉·斯塔霍維奇（Alexandra Stakhovich）被分派到了手術室，對她來說，協助參與的第一場截肢手術是一場嚴峻的考驗，但是她成功地過了這一關，過后她寫信告知家人：

我經歷了皮羅戈夫主持的兩個手術。我們給其中一個截了手臂，另一個截的是腿。上帝恩典，我沒有昏過去，因為在第一個手術中，當我們截掉他的手臂時，我得按住這個可憐的人的后背，然后包扎他的傷口。將我大膽的行為寫下來，只是為了讓你相信我什么都不害怕。如果你能明白幫助這些受苦的人是一件多么讓人高興的事就好了——你沒法想象醫生們是多么感謝我們來到這里。[[26]](#_26_Pirogov__Sevastopol_skie_pis)

在克里米亞當地，來自不同社區的女性居民自發組織起來，組成護士隊前往塞瓦斯托波爾周圍的包扎站和戰地醫院服務，其中之一是達莎·塞瓦斯托波爾斯卡婭，那個在阿爾馬照顧傷員的姑娘，現在到了貴族議事廳的手術室協助皮羅戈夫工作。另一位是伊麗莎白·赫洛波京娜（Elizaveta Khlopotina），她丈夫是一位炮臺指揮官，在阿爾馬戰役中頭部中彈受傷。她跟隨丈夫一起上戰場，在卡恰河的包扎站擔任護士。皮羅戈夫非常敬佩這些女性的勇氣，對不喜歡女性在戰場出現的軍事當局進行了頑強抵抗，并爭取有更多的護士被組織起來。大公夫人的影響力最終起了作用，沙皇認可了圣十字架社團的工作。圣十字架社團在克里米亞的工作，最早是由大公夫人出資的。她通過家庭關系從英格蘭購買醫療用品，其中包括珍貴的奎寧，儲藏在圣彼得堡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宮（Mikhailovsky Palace）她家的地下室里。當社團工作被沙皇肯定之后，俄羅斯貴族、商人、政府官員還有教會紛紛捐款支持。1855年1月又有兩支由圣十字架社團組織的護士隊抵達塞瓦斯托波爾，其中第二支由葉卡捷琳娜·巴枯寧娜（Ekaterina Bakunina）帶隊，她是圣彼得堡市長的女兒，無政府主義革命家米哈伊爾·巴枯寧（Mikhail Bakunin）的表親，巴枯寧當時正被囚禁在位于俄羅斯首都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羅要塞（Peter and Paul Fortress）。和許多俄羅斯上層社會人士一樣，她童年的夏天都是在克里米亞度過的，她喜歡的度假勝地竟然遭受侵略，這讓她驚嚇不已。“我無法想象我們偉大帝國的這個美麗小角落竟然變成了殘酷的戰場。”[[27]](#_27_Gosudarstvennoe_podvizhnoie)

和大公夫人一樣，弗洛倫絲·南丁格爾在管理事務上也有一種類似的強烈動力。她出生在德比郡一個成功的工業家家庭，接受的教育比同一時期英國政府中絕大多數男性都好。她家與英國政府有諸多淵源，但因為是女性，她只能做一些慈善活動。受到基督教精神的鼓勵，在二十五歲時，她不顧家庭反對，成為一名護士，先是在英國窮人社會，然后在德國杜塞爾多夫（Düsseldorf）附近的萊茵河畔凱撒斯韋特（Kaiserswerth-am-Rhein）做一名社會改革者。在德國，她目睹了特奧多爾·弗利德納牧師（Pastor Theodor Fliedner）和他手下女執事們照顧病人的情形。1851年她從凱撒斯韋特畢業，把那里的護理原則帶到了哈利街的醫院，并從1853年起在那里擔任監督工作。這些護理原則，即基本的干凈整潔和良好的病房管理等后來被南丁格爾帶到了克里米亞。這些觀念并不新穎，克里米亞的英軍醫療官都知道保持干凈、管好醫院的好處，但是他們的主要問題是缺少人力和資源——而南丁格爾也僅部分地解決了這個問題。

盡管南丁格爾不在克里米亞，軍務大臣赫伯特仍將她任命為土耳其英國綜合醫院女護士館（Female Nursing Establishment of the English General Hospitals in Turkey）總監督，然而一直到1856年春天，南丁格爾才獲得對克里米亞地區護士的管轄權，那時戰爭已接近尾聲。南丁格爾的地位并不穩固，在名義上她必須聽從軍隊的調遣，但是赫伯特給了她直接向他匯報軍醫部（Army Medical Department）失誤的特權。軍醫部從來都反對派女護士到前線或是接近前線的地方，在南丁格爾的職業生涯中，她一直與軍醫部做著針鋒相對的斗爭。南丁格爾個性強勢，而同時也只有大權獨攬，她才能夠設法推行機構改革、爭取軍方尊重。在土耳其，受到認可的職業護士組織并不存在，她在那里召集不到護士，只好在赫伯特夫人的協助下自己建立一支護士隊伍。她的選擇條件非常現實，完全不帶感情色彩：她喜歡招收來自社會底層貧困家庭的年輕姑娘，因為她覺得這些人吃苦耐勞，能夠適應艱苦的生活條件。她還招收了一批有護理經驗的修女指導這些姑娘，在她看來，招收修女實際上是對愛爾蘭天主教會的讓步，因為英軍中三分之一的戰士是愛爾蘭天主教徒。但與此同時，她拒絕了幾百名熱心服務的中產階級家庭婦女的申請，認為她們的敏感性會讓其“不好管理”。

南丁格爾帶著三十八名護士于1854年11月4日抵達斯庫臺，恰逢大批在巴拉克拉瓦戰役中受傷的傷兵被運到那里。法國人已經占據了由最好的房子改成的醫院，留給英軍的房子不僅條件惡劣，而且十分擁擠。骯臟的地面上排著床和床墊，受傷的和已經奄奄一息的傷員與其他生病的士兵挨個躺在一起。很多人患有腹瀉，然而唯一可以排泄的地方是病房里和走廊上的大木桶。水幾乎沒有，老舊的水管已經壞了，供暖系統也不能工作。南丁格爾抵達之初，那里的情況正變得更加糟糕，因為又有幾百名因克爾曼戰役的傷兵送到。在斯庫臺附近的海德帕夏醫院（Hyder Pasha Hospital）工作的助理外科醫生沃爾特·貝柳（Walter Bellew）在日記中寫道，這些士兵的條件“真正可悲”，“許多人上岸時就已經死了，有幾個死在去醫院的路上，剩下的都非常可憐，衣服上沾滿了污穢和排泄物，手上和臉上因為沾上火藥和泥土而變得黑乎乎的，身上布滿了各種蟲子”。傷病員以每天五十至六十人的速度死亡。人一死，尸首便立刻被裹進其身上的毯子里，埋進醫院旁邊的萬人坑，同時另一個傷病員馬上占據他騰出的位置。護士們不得不連軸轉地給傷病員喂食、清洗身體、分派藥品，還要在他們垂死時給予安慰。許多護士無法承受這樣的壓力，開始酗酒，有些還抱怨南丁格爾小姐的專橫作風以及各種交由她們做的瑣碎工作。南丁格爾發現后，便讓這些人打道回府了。[[28]](#_28_NAM_1951_12_21__Bellew_journ)

12月底，第二批護士抵達，依然由南丁格爾指揮，同時她還獲得了對《泰晤士報》克里米亞傷病員救治基金的控制權，這讓她手里有了資金，可以購買物資和藥品供斯庫臺地區的英軍醫院使用。南丁格爾可以完全自主行事，軍事當局已不再給她設置障礙，因為他們身陷醫療災難之中，還指望著南丁格爾來救他們一把。南丁格爾是一個能力很強的管理者，不過她引進的變革被后來將她神化的人們夸張了，英軍里的醫療官、包扎員和配藥員所做的貢獻幾乎被后人完全遺忘。但是不管怎么說，南丁格爾確實在斯庫臺的醫院里推動了許多新措施。她重新規劃了廚房，買了新的鍋爐，雇用土耳其洗衣工并監督他們工作，主導了對病房的清潔。每天工作二十個小時后，她還在深夜親自巡房，給傷病員們帶去基督教的寬慰之辭。正是因為這些行動，她被人稱頌為“提燈女士”（Lady with the Lamp）。然而，盡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軍醫院里的死亡率依然以驚人的速度上升。1855年1月，近東地區所有英軍部隊中，10%的人因疾病而死。2月份，斯庫臺的病人死亡率達到了52%，而上一年11月南丁格爾剛到時，死亡率還只有8%。那一年的冬天，在一場暴風雨之后的四個月時間里，有四千名英軍戰士死在斯庫臺的醫院里，而大部分人都不是因傷而死。如此重大的人員損失讓英國公眾震驚，《泰晤士報》的讀者強烈要求當局做出解釋，于是在3月初，英國政府任命一個衛生委員會來到斯庫臺進行調查。他們發現被稱作 “兵營醫院”（Barrack Hospital）[††††](#_____You_Yuan_Tu_Er_Qi_Bing_Ying)的醫院主體部分下面是一個污水池，下水道系統滲漏，污水滲入了飲用水中。醫院的下水道系統確實不合格，而南丁格爾卻不了解這一危險，以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霧氣造成的。其實，當時由她照顧的士兵，如果住到任何一個土耳其村子里，生存機會都會比住在斯庫臺的醫院大得多。

\* \* \*

在英國、法國和俄羅斯，公眾每天都在關注戰事的發展，興趣與擔憂均不斷增長。通過報紙上的報道、期刊上的照片和圖片，人們可以很快了解戰爭的最新進展，和以往的任何沖突相比，公眾對這次戰事真實情況的了解要多得多。人們對戰爭新聞的反應成為軍事當局做決策時的一個主要考慮因素，因為軍事決策也前所未有地受到公眾批評，這是過去戰爭中從未有過的事。克里米亞戰爭是歷史上第一場輿論起了關鍵作用的戰爭。

英國對戰事新聞的興趣尤為突出。有關士兵遭受的磨難以及傷病員悲慘處境的新聞在全國上下營造了一種焦慮的氣氛。人們關心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高地上聯軍部隊的處境，而且那一年冬天英國天氣特別寒冷，更是加深了公眾對遠征俄羅斯英軍士兵的擔憂。《泰晤士報》克里米亞傷病員救治基金以及皇家愛國基金（Royal Patriotic Fund）援助士兵家屬的呼吁發出之后，立刻產生了巨大反響，來自社會各個階層的人有的捐錢出資，有的寄送食品包裹，還有的為士兵編織防寒的衣物，其中包括在那時候發明的“巴拉克拉瓦頭盔”（Balaklava Helmets）[‡‡‡‡](#_________Yi_Zhong_Tou_Tao__Yi_Ba)。女王告訴劍橋公爵說，溫莎城堡里“所有的女士們”，包括她自己，“都在忙于為軍隊織毛衣”。[[29]](#_29_G__St_Aubyn__Queen_Victoria)

在當時，英國享受的出版自由比歐洲大陸其他國家都多，此時這種自由的效果便真正顯露了出來。1855年新聞印花稅廢除之后，大批廉價報紙涌現出來，連體力勞動者都買得起。除了刊登大批軍官和士兵來信之外，克里米亞戰爭還促成了一種新的職業，即“戰地記者”的誕生，這些人把戰場上發生的事件帶到了中產階級的早餐桌上。在以往的戰爭中，報紙依賴業余“通訊員”——通常是外交官或是軍方指定的軍官——發回報道，而這一傳統一直延續到19世紀末，當時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就曾作為一名現役軍官為英國報紙發回關于蘇丹報道。這些報道通常根據軍事通訊記錄寫成，必須經過軍方審查，而且“通訊員”們極少會加上他們親眼看到的第一手材料。1840年代到1850年代初期，這一情況開始發生改變。一些報紙開始在重要地區雇用駐外記者，例如托馬斯·切納里從1854年3月起擔任《泰晤士報》駐君士坦丁堡記者，就是他第一個報道了斯庫臺醫院里可怕的醫療條件。[[30]](#_30_A__Lambert_and_S__Badsey__ed)

蒸汽機船和電報的出現，讓報社有能力派遣記者前往戰爭地帶，而且他們撰寫的報道幾天之后就能見諸報端。克里米亞戰爭期間，隨著克里米亞與歐洲城市之間的電報設施逐步修建起來，戰事新聞的傳播速度也就越來越快。在戰爭剛開始時，新聞最快要五天才能傳到倫敦：兩天時間花在從巴拉克拉瓦到瓦爾納的蒸汽機船上，然后騎馬三天才能送到布加勒斯特，當時那里是離克里米亞最近的有電報設備的城市。到1854年冬，法軍已經在瓦爾納建好了電報設施，于是新聞傳送所需時間縮短到兩天。到1855年4月底，當英軍鋪設好連接巴拉克拉瓦和瓦爾納的海底電纜之后，克里米亞的戰事新聞只需幾個鐘頭就可以傳到倫敦了。[§§§§](#SSSSSSSS_Jun_Fang_Ren_Wei_Dian_B)

對于每天追著閱讀戰事新聞的公眾來說，重要的不僅僅是報道的速度，還有新聞報道的坦率和細致。因為沒有審查，克里米亞的戰地記者為讀者發回了大量詳盡的報道，促成了新聞和期刊的蓬勃發展。他們用生動的筆調將戰斗的情形、可怕的條件和士兵遭受的苦難一一描述出來，把戰爭帶進了每家每戶，讓公眾積極參與到應該如何打贏這場戰爭的大討論中。《泰晤士報》從來沒有收到過這么多讀者來信，幾乎所有來信都在為改善戰事進展提供自己的觀察和見解。[¶¶¶¶](#PPPP_Yi_Wei_Ming_Jiao_Yue_Se_Fu)英國的中產階級也從來沒有對政治如此投入。即使偏遠的鄉村也忽然能了解世界大事了，英國詩人埃德蒙·戈斯（Edmund Gosse）在他備受贊譽的回憶錄中描述了戰爭對其家庭的沖擊。他們一家居住在德文郡（Devon）的鄉村，屬于一個小小的基督教教會，平日只與自己社交圈內的人交往，然而“對俄羅斯宣戰的消息，第一次為我們這個加爾文主義（Calvinist）式的隱居生活帶來一絲外面世界的氣息。我父母每天都買報紙，這是過去從未發生過的事。父親和我在地圖上尋找報紙上提到的那些漂亮的地方，而在那些地方發生的事情也成了家里熱烈討論的話題”。[[31]](#_31_E__Gosse__Father_and_Son__Ox)

公眾強烈需要各種生動描述克里米亞戰事的報道，隨著戰爭的延續，這種渴求毫無減退之意。就連范妮·杜伯利這樣的戰爭游客，都有一群讀者追看她對親眼目睹事件的描述。但是公眾興趣最大的當屬圖片，當時的制版印刷已經夠快夠便宜，《倫敦新聞畫報》這樣的刊物已經可以印刷圖片，這些刊物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銷量大幅上漲。最讓公眾感興趣的還是照片，因為照片似乎能夠給予一種“真實”的戰爭影像，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成名的詹姆斯·羅伯遜和羅杰·芬頓（Roger Fenton）等人的照片有極大市場。當時照相技術剛剛為人所知，在1851年的世界博覽會上，照相技術的展示曾讓英國公眾大為驚嘆，而克里米亞戰爭則是第一場有照片記錄并且讓公眾“看到”戰斗場景的戰爭。1846—1848年的美墨戰爭期間出現了用銀版攝影法拍攝的照片，1852—1853年的英緬戰爭期間有用碘化銀紙照相法拍攝的照片，但這些照片簡陋模糊，均無法與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拍攝的照片相提并論。當時的一份報紙評價說，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照片顯得“準確”并且“即時”，是一扇“直接通往戰爭真相的窗口”。



死亡之影峽谷，羅杰·芬頓攝，1855（圖片來源：國會圖書館印刷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但事實卻遠非如此。由于濕法攝影的局限，玻璃板底片每次曝光需要長達二十秒時間，基本上不可能拍攝任何移動的物體。一直到1860年代早期美國內戰期間，攝影技術得到改進，拍攝移動目標才成為可能。絕大部分羅伯遜和芬頓的照片是擺拍的肖像或者是地形地貌，借鑒了不同類型的繪畫以討好中產階級市場的口味和感情。雖然兩人都見過不少死亡的場面，但是他們都沒有在照片中展示死亡，因為照片必須符合維多利亞社會對這場戰爭正義性的普遍認同，不過芬頓在他最著名的照片《死亡之影峽谷》（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中象征性地提到了死亡。這幅照片展示的是一個荒涼冷清的峽谷，地面上布滿了加農炮的彈丸（為了加強效果，他從別處搬來彈丸擺放在鏡頭前面）。羅伯遜對戰爭場面所做的修飾更多是因為商業壓力而不是為了應對審查；但是芬頓的情況卻有所不同，他是一名御用攝影師，之所以被派往克里米亞，部分是為了抗衡《泰晤士報》和其他報紙對克里米亞戰爭的負面報道，所以他對攝影對象的選擇就帶有宣傳的成分在內。例如，為了告慰公眾英軍士兵穿得很暖和，芬頓拍攝了一張照片，上面的一群士兵腳蹬質量上乘的靴子，身穿政府新近配送的厚重羊皮外套。但是芬頓1855年3月才到達克里米亞，那張照片只可能是在4月中旬之后拍攝的，那時許多士兵已經死于嚴寒，需要這些保暖衣服的時候早就過去了。克里米亞4月份的氣溫達到二十六度，芬頓照片中的士兵一定都熱得要死。[[32]](#_32_M__Lalumia__Realism_and_Poli)



穿著冬裝的第六十八團士兵，羅杰·芬頓攝，1855（圖片來源：國會圖書館印刷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如果說芬頓的鏡頭會說謊的話，《泰晤士報》上威廉·羅素的文章則正好相反。他的文章是所有關于克里米亞戰爭的報道中最重要也是最廣為閱讀的。羅素1820年出生于都柏林附近一個英國和愛爾蘭混血的家庭中，他在1841年愛爾蘭大選期間開始為《泰晤士報》工作。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前，羅素只報道過1850年普魯士和丹麥軍隊的一場小型邊境沖突[\*\*\*\*\*](#______Ji_Di_Yi_Ci_Pu_Dan_Zhan_Zh)。1854年2月，《泰晤士報》主編約翰·德萊恩派他隨英軍前往馬耳他報道可能爆發的與俄羅斯的戰爭。德萊恩向英軍總指揮保證羅素在復活節前就會返回，但實際上之后的兩年內，羅素一直和英軍在一起，幾乎每天都向報社發回來自克里米亞戰爭的新聞，曝光了軍隊當局的種種失誤。羅素的盎格魯-愛爾蘭混血背景讓他對英國軍事當局保持一種天生的距離，這對他的寫作非常關鍵。在揭露英軍當局的無能方面，他從來沒有猶豫過，很明顯他同情的是普通士兵一方。英軍中三分之一的士兵是愛爾蘭人，與他們交往時，他顯得非常放松，士兵們也愿意和他聊天。英軍輕步兵師參謀亨利·克利福德把他描述為：

一個粗鄙的愛爾蘭人，叛教的天主教徒（Apostate Catholic）……但是他天生會瞎扯，筆頭和嘴一樣鋒利。他唱得一嗓子好歌，不管是誰遞過來的白蘭地和水他都能喝，如果哪個年輕軍官傻到請他抽雪茄，他就會一支接一支地猛抽。他被軍營中許多人看作一個“挺不錯的家伙”。他正是那種有辦法搞到消息的人，特別是從年輕人嘴里。[[33]](#_33_H__Clifford__Letters_and_Ske)

軍事當局對羅素十分憎惡。拉格倫曾命令手下的軍官不要和羅素說話，聲稱他是一個安全隱患。《泰晤士報》上發表的軍官和士兵來信特別突出部隊悲慘的生活條件，這讓拉格倫格外惱怒。有謠言說報紙付錢買這些信件，有些寫信的人并沒有想到要發表，但是卻被家屬交給了報紙。軍事當局一向把忠誠和服從看得比士兵福祉更為重要，對寫信人的越級投訴感到非常惱火。“軍官們所寫的荒謬無賴的信件甚于過去任何時刻，或者可能是《泰晤士報》教唆他們這么做的。不管怎么樣，這么做非常糟糕，一點不像戰士應有的行為。”蘇格蘭近衛團的金斯科特少校（Major Kingscote）和指揮部的參謀都為此憤懣不已。“我依然認為戰士們都很快樂，總是情緒高漲。軍官們我見得不多，但是我觀察到了一件事，那就是貴族血統越純正的軍官，抱怨得就越少，不管《泰晤士報》怎么說。”

拉格倫決定以攻為守。11月3日，他給戰爭大臣紐卡斯爾公爵寫信，聲稱《泰晤士報》刊登的信息會被敵人利用。確實有報告說俄羅斯方面在看到羅素有關英軍物資短缺、條件惡劣的報道后，士氣得到了提升（沙皇本人也在圣彼得堡閱讀羅素的報道）。在收到拉格倫的信后，軍法處副處長（Deputy Judge Advocate）威廉·羅曼（William Romaine）向克里米亞的英國記者發出警告，紐卡斯爾公爵則寫信給報紙主編加以提醒。但是德萊恩抵制了這些限制出版自由的企圖，他本人相信拉格倫確實無能，認為揭露軍隊管理中的混亂是一種維護國家利益的行為，對報道危害國家安全的說法不予理會。12月23日，《泰晤士報》主編在一篇社論中批評軍隊高層無能昏聵，其中最具破壞力的攻擊大概是指出拉格倫憑借裙帶關系任命貼身參謀，當時他的副官（ADC）中至少五人是他的外甥。從更廣的層面上看，這種攻擊涉及了一場職業精英主義與貴族特權之間的爭斗，因此這一指控在當時相當具有殺傷力。

拉格倫的耐心最終耗盡，1月4日他再次給紐卡斯爾公爵寫信，等于在指控羅素犯了叛國罪：

我可以不計較這位寫手能夠在所有人、所有事情上挑出毛病的本事，他精心編織的非難也許只是為了挑動不滿、鼓勵違紀，但是我想讓你考慮一下，任何一個從俄羅斯皇帝那里領錢的人，在為主子效力方面，會比這份歐洲銷量最大報紙的通訊員做得更好嗎？……在當今通訊如此迅速的情況下，我非常懷疑，英軍還能在強大的敵人面前站得穩腳跟嗎？敵人現在隨時可以從英國報紙那里得知我方的數量、條件和設備，然后通過電報飛快地從倫敦傳回他們的指揮部里。[[34]](#_34_NAM_1968_07_284__Raglan_to_N)

但是紐卡斯爾對此卻不以為然。他已經能感到因為《泰晤士報》報道而產生的政治壓力，圍繞部隊生活條件引發的丑聞正日益構成英國政府的威脅。對軍事當局的批評聲音不斷高漲，連紐卡斯爾公爵自己都加入其中，要求拉格倫撤銷總軍需官艾雷將軍和總副官埃斯特科特（Estcourt）將軍的職務，希望借此平息公眾要求有人對此負責的呼聲。拉格倫卻不愿讓步，他似乎從未想過軍隊指揮高層中有誰必須為部隊遭遇的困難負責。然而，他卻很愿意接受把盧肯勛爵召回英國的命令，因為他一直把輕騎兵旅的犧牲歸咎于盧肯勛爵，雖然這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公平。

盧肯在2月12日接到召回令時，報刊的力量和公眾的批評已經迫使英國政府下臺了。1月29日，下議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了一個由激進派（Radical）議員約翰·羅巴克（John Roebuck）提出的動議，任命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軍隊條件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作為，這實際上相當于一個表達對政府領導克里米亞戰爭的不信任的動議。羅巴克原本并沒有打算推翻政府，他只想在議會責任制這一原則上做出一個姿態，但是政府面臨的壓力已不僅僅來自議會內部，而更多來自公眾和輿論。投票之后的第二天，阿伯丁勛爵就辭職了，一個星期后的2月6日，女王傳召她最不喜歡的政客、當時已經七十歲的帕默斯頓，令其組成新內閣，這將是他第一次領導政府。帕默斯頓獲任成為首相的消息大受愛國中產階級的歡迎，通過長期與報刊培養良好關系，他已贏得了英國公眾的信任。他們把帕默斯頓激進的外交政策視為英國民族性格和普世理念的代表，現在就盼著他把克里米亞戰爭從無能的將軍手中挽救過來。

“在我們所處的文明階段，”法國皇帝在1855年宣布，“軍隊的成功，無論多么杰出，總歸是短暫的。在現實中，公眾輿論總是能贏得最后的勝利。”路易-拿破侖對報刊和公眾意見的威力非常了解，他就是靠這一點獨攬大權的。因為同樣的原因，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法國報刊的運作都是在政府的審查和控制之下進行的。報社社論經常是由政府支持者“買斷”，文中觀點通常比報紙讀者的政治立場更保守。拿破侖三世把這場戰爭當作贏得公眾支持的手段，在執行政策時隨時關注公眾反應。他指示康羅貝爾（以猶豫不決聞名）不要隨意發動進攻，“除非完全肯定結果對我們有利，但是如果人員可能犧牲太大，那么也不宜有所動作”。[[35]](#_35_Gooch__The_New_Bonapartist_G)

因為對公眾輿論非常敏感，拿破侖三世下令警察收集平民對戰爭的看法。警方線人偷聽人們的私下對話、神父的講道、演講者的發言等等，記錄在地方檢察官和行政官向上呈送的報告里。根據這些報告的內容來看，法國公眾其實從未支持過這場戰爭，加上軍方未能快速取勝，人們對繼續打仗越來越沒有耐心，普遍持批評態度。他們的不滿主要集中在康羅貝爾的無能和拿破侖親王這個“懦夫”身上。因克爾曼戰役后，拿破侖親王離開克里米亞，在1月回到了法國。為了拉攏反戰勢力，他故意向人們透露自己的觀點，聲稱塞瓦斯托波爾是“無法攻破”的，應該結束圍困。也就在這個時候，地方官呈上的報告已經向拿破侖三世發出警告，說公眾對戰爭的厭倦正演變成對政府的反抗。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的塹壕里，法國工兵亨利·盧瓦齊永（Henri Loizillon）聽到士兵們說一場革命已經計劃好了，將在法國發動罷工游行反對繼續調集軍隊。“到處流傳著各種最最嚇人的謠言，”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談的都是革命：巴黎、里昂，所有大城市都會被起義者占領，馬賽居民將起來反對士兵上船。每個人都想要和平，為了和平似乎什么樣的代價都愿意付出。”在巴黎，心浮氣躁的法國皇帝對暴力革命深懷恐懼，暴動群眾沖進軍營推翻七月王朝不過是六年半前的事情，他因此暗中制定了詳細的計劃，應對可能在巴黎出現的騷動。在巴黎市中心建樓時，必須“考慮能夠同時集結幾支部隊對付暴動”，他告訴維多利亞女王，“幾乎所有街道都鋪上了碎石路面，以防止平民把街道上的石塊推起來‘建成路障’”。他還考慮了如何讓公眾不再批評克里米亞戰爭，結論是應該立刻對軍隊最高指揮加強控制，并且由他親自前往克里米亞指揮，加快攻陷塞瓦斯托波爾的速度，恢復法國在拿破侖時代的光輝。[[36]](#_36_L__Case__French_Opinion_on_W)

在俄羅斯，有關戰爭的公開信息少得可憐。整個黑海地區只有一份俄語報紙《敖德薩簡報》（Odesskii Vestinik），但是該報在克里米亞地區卻沒有一個記者，只刊登有關戰爭的最簡單消息，而且往往已經是兩三個星期前發生的舊聞了。例如，對阿爾馬戰役的報道出現在1854年10月12日，而那時戰事已經結束二十二天了。在新聞里，阿爾馬戰役的失敗被描述為“面對兩翼以及海上人數多得多的敵人，所實施的戰術撤退”。這樣簡單而又虛假的新聞當然無法滿足讀者的需求，他們聽到的謠言是塞瓦斯托波爾已經被攻陷，俄羅斯黑海艦隊已被摧毀。這份報紙在11月8日刊登了有關阿爾馬戰役的較為詳細的報道，而此時已經過去四十九天了。報道雖然承認阿爾馬戰役失敗了，卻沒有提到俄軍的恐慌潰逃，也未提及敵人來復槍的威力勝過沙皇步兵手里過時的滑膛槍。俄羅斯當局不允許公眾知道俄軍在指揮上無能、在技術上落后于歐洲軍隊這樣的事實。[[37]](#_37_Za_mnogo_let__pp__75_8)

因為不相信官方消息，俄羅斯公眾中受過教育的階層開始從各種傳言中獲取信息。一位住在圣彼得堡的英國女士寫道，在上層社會中流傳著一些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荒誕想法”，原因是“政府完全不讓他們獲得信息”。例如有謠言說英國正在鼓動波蘭起來暴動反抗俄羅斯；印度馬上將投靠俄羅斯；還有美國即將在克里米亞出手救援等，許多人相信美國已經簽署了軍事協定[†††††](#______Zhe_Ze_Guan_Yu_Mei_Guo_De)。“他們對美國總統的期待，就像是在暴風雨中抱著備用大錨的水手一樣。”一位佚名的英國女士寫道。在俄羅斯的美國人到處接受宴請并收下俄羅斯人送上的各種榮譽，“而且看上去很因此而得意，”她寫道。

很奇怪，作為一個像美國這樣的共和制國家的公民，他們居然如此看重頭銜、勛章、星章等等華而不實的東西……就在我離開［圣彼得堡］的那一天，他們大使館里的一名參贊非常得意地向我的朋友們展示這個公主、那個伯爵夫人，還有幾個宮廷高官贈送給他的復活節彩蛋。他還展示了一幅整個皇室成員的肖像畫，說等他回到紐約之后，打算把這幅畫當作家族財富掛在墻上。

雖然據說警方的線人無處不在，但他們還是無法控制傳言的蔓延。這位英國女士還寫道，兩位婦女被叫到秘密警察第三科首腦奧爾洛夫伯爵的辦公室里，因為她們在一家咖啡館里談話，表達了對俄羅斯報紙上戰爭新聞真實性的懷疑，被人聽到了。“我聽說她們倆被嚴厲警告，并且被命令相信所有政府認可的文字。”[[38]](#_38_The_Englishwoman_in_Russia)

這場戰爭在俄羅斯社會激發了各種不同的反應。西方列強入侵克里米亞，在受過教育的群體內激起了強烈憤慨，對1812年的記憶讓他們團結在了一起。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俄羅斯公眾的憤怒，絕大程度上是針對英國人而不是法國人的。根據我們這位佚名的英國女士的說法，這是因為1812年對抗拿破侖取得勝利后，俄羅斯人把法國人視為“太渺小無助，而不值得施以除了最深的憐憫和關懷之外的任何感情”。仇英（Anglophobia）情緒在俄羅斯有著長久的傳統，在某些上流社會的圈子里，什么事情都可以怪罪到“背信棄義的英國人”頭上。“如果只聽他們的談話，你會想象也許世界上所有的罪惡都可以歸咎到英國人的影響。”這位英國女士寫道。在圣彼得堡的沙龍里，英國人總是戰爭的挑動者，英國人的錢財總是問題的根源。有些人說英國人挑起戰爭，目的是為了霸占俄羅斯在西伯利亞的金礦；還有人則說英國人想把自己的帝國擴大到高加索和克里米亞。他們都認為帕默斯頓是英國政策的主要推手，一手帶來了俄羅斯的厄運。在大半個歐洲大陸，帕默斯頓都是一個被仇視的人物，是英國人欺凌弱小、虛偽狡詐的象征，表面上宣揚自由貿易和人身自由，實際上卻以此為手段在全世界推動英國的經濟利益和帝國擴張。但是俄羅斯人還有一個特別的理由憎惡他，因為帕默斯頓帶頭倡導了歐洲的反俄政策。根據這位圣彼得堡的英國女士的說法，帕默斯頓，還有領導英國在波羅的海戰事的內皮爾上將這兩個名字，“能在下層百姓中產生巨大恐懼”，以至于女人為了讓小孩上床睡覺，都會嚇唬他們說：“那個英國將軍來了！”

普通男人在用完了所有能想到的罵人話之后（俄語中這方面的詞匯是極為豐富的），會轉向對方說“你這條英國狗！”在這之后當然免不了又是一頓謾罵，最后他們會以互罵“帕默斯頓！”告終，盡管可能完全不知道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不過在仇恨與報復的最高潮，他們會高喊“內皮爾！”，仿佛那個詞比撒旦還要邪惡五十倍。

有一首在俄羅斯軍官中廣為流傳的詩歌展示了當時的愛國情緒：

在求戰的狂熱中

指揮官帕默斯頓

在地圖上戰勝了俄羅斯

用的是他的食指。

被他的勇氣激勵，

那個法國人也緊緊跟隨，

揮舞著他伯父的寶劍

呼喊著：勇氣可勝！[[39]](#_39_The_Englishwoman_in_Russia)

泛斯拉夫主義者和斯拉夫派是克里米亞戰爭最積極的支持者。他們把俄羅斯入侵巴爾干看作一場解放斯拉夫人的宗教戰爭的開端，當沙皇命令俄軍從多瑙河兩公國撤軍時，他們感到很失望，許多人呼吁沙皇與整個歐洲開戰。《莫斯科人》主編波戈金在得知俄軍撤退的消息后，他的泛斯拉夫主義觀點變得更為激進，呼吁沙皇不顧一切發動一場同時針對奧地利和奧斯曼帝國的革命戰爭，解放斯拉夫人。聯軍入侵克里米亞的行動讓他們盼望已久的歐洲戰爭變成了現實，愛國主義情緒席卷俄羅斯社會，泛斯拉夫主義者的求戰愿望沖上了這一情緒的浪尖。波戈金獲得沙皇贊許，讓他有機會進入宮廷，還可以寫信闡述自己對外交政策的看法。波戈金到底對沙皇有多大影響力，這點并不清楚，但是他能出入宮廷這一事實本身，就讓許多貴族敢于公開表示贊同他的理念。根據這位在圣彼得堡的英國女士的說法：“不管沙皇本人多么想要掩飾自己對土耳其和君士坦丁堡的野心，俄羅斯貴族們卻不愿意遮遮掩掩，即使在兩年以前也是如此，而那時還根本不能肯定這場仗是否會打起來。‘至于君士坦丁堡，我們一定會擁有的’[‡‡‡‡‡](#___________Yuan_Wen_Wei_Fa_Yu_Qu)，一位貴族曾在某天晚上說道。”[[40]](#_40_E_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2)

但是在以自由派為主導或是親西方的圈子里，對戰爭的支持就沒有那么強烈了。那些能看到外國報紙的人，則更可能對戰爭持批評態度。許多人覺得俄羅斯沒有必要卷入東方問題，更別說是參加一場與西方列強的戰爭了，因為這場戰爭很有可能演變成一場災難。“以圣羅斯的名義實行各種骯臟的伎倆。”維亞澤姆斯基親王（Prince Viazemsky）這樣寫道。他是參加過1812年俄法戰爭的老兵，也是一位觀點傾向自由派的批評家及詩人，在財政部任職二十年后，于1856年成為總審查師。“這一切的結局會是怎樣？以我卑微的看法……我們沒有取勝的機會。英國與法國聯合，肯定會比我們強大。”根據1854年秘密警察第三科的報告，在受過教育的人中，許多人從根本上反對戰爭，希望政府繼續談判以避免戰爭爆發。[[41]](#_41_A__Zaionchkovskii__Vostochna)

俄羅斯底層人民的看法就比較難以把握。商人擔心戰爭讓他們丟失生意，傾向于反對戰爭。這位圣彼得堡的佚名英國女士寫道：“每一條街道，每一座房屋都顯示出他們正面臨的艱難——生意幾乎停頓，沒有幾家店鋪里還有客人，每個人都開始節省開支以備艱難時光的到來。”農奴階層受苦最多，因為軍隊抓壯丁，農民家庭里失去了年輕健康的勞動力，同時因戰爭而增加的賦稅中最大部分也由他們來承擔。農民人口急劇下降，有些地區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下降了6%。地里收成變差了，天氣是部分原因，但同時也因為征兵造成勞動力和牲畜短缺。俄羅斯各地爆發了約三百起農奴起義或是騷動，攻擊地主并燒毀他們的物產。這位英格蘭女士寫道，俄羅斯上流社會擔心革命將會爆發：“當我離開圣彼得堡時，許多人認為那八萬（據俄羅斯人的說法）露營街頭或寄宿民宅的士兵的主要功用是保護市鎮內的和平，而不是抵御外國軍隊入侵。”[[42]](#_42_I__Ignatovich__Pomeshchichie)

但是也有農民把戰爭視為一個改變人生的機會。1854年春季，一則謠言在俄羅斯鄉間流傳：任何志愿加入陸軍或海軍的農奴將保證能獲得自由。這則謠言的根子在于政府為創建一支波羅的海槳帆船艦隊而招募農奴的決定：在作戰期間，這些農奴將被從地主手里解放出來，但是他們必須答應在打完仗之后回到原來的地主那里。謠言傳開后，大批農奴涌向俄羅斯北部港口。警方為此封鎖了道路，幾千名農奴被關押起來，鎖在一起送回原籍。但是，通過當兵能獲得自由的謠言一旦傳開，政府之后的每次征兵活動都被農奴們視作一次機會。教士、會寫字的農奴，還有鼓動者們都在散布錯誤的信息。例如在梁贊（Riazan’），一名教堂執事告訴農奴們說，如果他們加入軍隊，能每個月拿到八個銀盧布的軍餉，而且當兵三年之后他們和家人都能擺脫農奴身份。

這樣的故事隨處可見。農奴們相信沙皇陛下發出了圣旨，承諾給志愿參軍者自由，當被告知并無此事時，他們就認定圣旨被邪惡的官員藏起來了或是被掉了包。很難說他們這樣想有多少是出于天真，有多少是故意為之，用以表達他們迫切希望從農奴制中解放出來的強烈愿望。在許多地方，類似的謠言和一則過去流傳的“金色宣言”（Golden Manifesto）混淆在了一起。在“金色宣言”中，沙皇將解放所有的農民，把所有的土地都分給他們。例如，一群來到一座征兵站的農奴稱，他們聽說沙皇坐在克里米亞一座山頂上的“金色大屋”里，并且“會給所有來到他面前的人自由，但是那些沒有來或是來得太遲的人就只能繼續做農奴”。在其他一些地方，這一謠言的內容則變成了英國人和法國人會給任何在克里米亞志愿加入他們隊伍的人以自由，造成大批農奴向南方奔逃。在農民心目中，南方代表著土地和自由。自中世紀以來，南方的草原就是農奴逃離主人、尋求自由的地方。南方各省的農奴一直有志愿加入自由哥薩克軍隊的傳統，強烈到幾乎可以說他們身上帶有某種革命特質。在那里，農奴成群結隊找到當地駐軍，要求征召入伍，拒絕再為地主干活。他們手持長矛、大刀和棍棒，經常與阻擋他們的駐軍和警察發生沖突。[[43]](#_43_J__Curtiss__Russia_s_Crimean)

\* \* \*

俄軍不乏迫切參軍的志愿者，而且沙皇可以調動廣袤帝國的一切資源。1854年底到1855年初，塞瓦斯托波爾城外天寒地凍的高地上英法聯軍力量已被極度削弱，這本來可以成為俄軍發起攻勢、一舉擊潰聯軍的最佳時機，然而俄軍卻一直按兵不動。因克爾曼戰役之后，俄軍最高指揮失去了自己的權威與自信。沙皇對其手下的指揮官們也失去了信任，變得越來越陰郁沮喪，認為克里米亞已經不可能打贏，后悔自己發動了這場戰爭。宮廷幕僚們形容這時候的沙皇是一個被打垮的人，憂郁、病懨懨、疲憊不堪，自從戰爭打響以后，仿佛迅速衰老了十歲。

也許沙皇依然在等待他信任的“一月將軍和二月將軍”來摧毀英法聯軍。只要高地上的英法聯軍不斷因寒冷、疾病和饑餓減員，沙皇也樂于讓俄軍指揮官將進攻局限于僅僅使用小股武裝來擾襲聯軍的前哨陣地。這些擾襲不會造成真正的破壞，但能讓英法聯軍士兵更為疲倦。“我們的沙皇不會讓他們好吃好睡，”一名哥薩克士兵在1月12日從塞瓦斯托波爾給家人的信中寫道，“只可惜他們沒有統統死掉，要不然我們就不用和他們開仗了。”[[44]](#_44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俄軍在補給上存在問題，讓其難以制定野心較大的戰略。因為聯軍的海軍控制了海面，俄軍只能通過內陸輸送物資，依靠馬或牛拉的大車穿越大雪覆蓋的泥濘道路把補給從俄羅斯南部送過來。當時沒有鐵路。颶風發生時，整個克里米亞都缺乏飼料，造成拉車的牲畜以驚人的速度死亡。12月的第一個星期，皮羅戈夫在從彼列科普到塞瓦斯托波爾的路上，看到“沿路每一步都有腫脹的牛尸”。到了1月份，克里米亞的俄軍一共只剩下兩千輛大車，是11月初的三分之一。在塞瓦斯托波爾，士兵口糧配給大大減少，唯一的肉類食品是從死牛身上割下已經開始腐爛的肉做成咸肉。托爾斯泰在12月被從塞瓦斯托波爾調到辛菲羅波爾附近的埃斯基奧德（Esky-Ord），他發現當地駐軍沒有冬季的大衣，卻有大量的威士忌，是發給他們御寒用的。在塞瓦斯托波爾，守衛棱堡的俄軍士兵和城外高地塹壕里的英法聯軍士兵一樣饑寒交迫。整個冬天，每天都有十幾名俄軍士兵開小差逃跑。[[45]](#_45_Pirogov__Sevastopol_skie_pis)

沙皇沒有在克里米亞發動大型攻勢的主要原因，是他擔心奧地利會乘機入侵俄羅斯。謹慎的帕斯克維奇現在是沙皇信任的唯一高級將領，他一直提醒沙皇注意奧地利對波蘭的威脅，認為這比克里米亞面臨的危險還大得多。在12月20日給沙皇的信中，帕斯克維奇說服沙皇在杜布諾（Dubno）、卡緬涅茨（Kamenets）和加利西亞邊境地區保持大規模部隊以防奧地利進攻，而不是將這些部隊派往克里米亞。在兩星期前，奧地利與法國和英國簽署了軍事聯盟協議，承諾保衛多瑙河兩公國抵御俄軍入侵；作為交換條件，英法兩國承諾協助奧地利抵御俄羅斯入侵，并許諾在戰爭期間保證奧地利對意大利的擁有權。事實上，奧地利的企圖是利用這個軍事聯盟協議迫使西方列強與俄羅斯在維也納談判停戰，并從中施加影響，而不是真的要和俄羅斯開戰。但是沙皇依然不能忘記奧地利的背叛。當年在多瑙河流域，奧地利出兵是俄羅斯不得不撤軍的原因，現在他擔心奧地利會故伎重演。在1月7日到2月12日之間，沙皇親手寫下很長的筆記，明確了一旦俄羅斯與奧地利、普魯士和其他德意志國家發生戰爭，他將如何應對。這也許顯示了沙皇在最后日子里焦慮無助的情緒。他無法擺脫俄羅斯帝國將會崩潰的可怕念頭：祖先打下的江山會因為他愚蠢的“圣戰”而毀于一旦，因為英國和瑞典會進攻波羅的海，奧地利和普魯士會進攻波蘭和烏克蘭，西方列強會進攻黑海和高加索，最后則合圍消滅俄羅斯。意識到不可能同時抵御多方進攻，沙皇為將防線設置在哪里而思前想后，最后決定實在不行的話，就算把烏克蘭犧牲給奧地利，也比削弱中央地帶“俄羅斯心臟”的防線要好。[[46]](#_46__Vostochnaia_voina__Pis_ma_k)

最后在2月份時，因為擔心西方列強馬上會派遣增援部隊登陸，在彼列科普切斷克里米亞與俄羅斯其他地區的聯系，沙皇下令發起攻勢，奪回聯軍增援部隊可能的登陸地點葉夫帕托里亞。當時這個港口由奧馬爾帕夏指揮的兩萬土耳其軍隊把守，并由聯軍艦隊從海上提供炮火支援。葉夫帕托里亞的防御工事十分堅固，還配有三十四門重炮，該地區的俄軍騎兵指揮官弗蘭格爾男爵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Baron Wrangel）認為重新奪回絕無可能，因此拒絕擔任這場戰斗的指揮。但是尼古拉一世心意已定，堅持將指揮權交給了弗蘭格爾的副手赫魯廖夫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Khrulev）。赫魯廖夫炮兵出身，被戈爾恰科夫形容為“沒有什么頭腦，但是非常勇敢和積極，你命令他做什么他一定照做”。當緬什科夫問赫魯廖夫能否奪回葉夫帕托里亞時，他十分自信能夠取得成功。2月17日一大早，赫魯廖夫率領一萬九千人的部隊，其中包括二十四支騎兵中隊和一百零八門大炮，出發了。這時沙皇對這次進攻是否明智已經產生了懷疑，認為不如暫且按兵不動，等待聯軍增援部隊登陸后向彼列科普轉移之時再從側翼發起攻勢。但已來不及通知赫魯廖夫了。這次進攻只持續了三個小時，俄軍很快就被打退，損失了一千五百人后，在空曠的鄉野上向辛菲羅波爾方向撤退。因為沿途無處休憩藏身，大批兵員因疲憊和寒冷倒下，他們凍僵的尸體就這樣被丟棄在茫茫草原之上。

2月24日，當戰斗失敗的消息傳到圣彼得堡時，沙皇已極度病危。他在2月8日就因流感臥床不起，但是依然堅持處理日常政務。2月16日，當他感覺好一些時，不顧醫生的勸阻，在零下二十三度的天氣下，沒有穿上冬衣就外出檢閱軍隊。第二天他又再次外出，當晚健康狀態急劇惡化，患上了肺炎。醫生們聽到沙皇肺部有積液的聲音，而這一癥狀也終于讓其私人醫生曼特（Dr Mandt）做出沙皇已沒有康復希望的結論。葉夫帕托里亞戰斗的失利讓尼古拉一世大受打擊，在曼特的建議下，他把皇位交給了皇儲亞歷山大（Tsarevich Alexander）。他讓皇儲撤銷了赫魯廖夫的職務，并讓戈爾恰科夫接替緬什科夫（這時也已身患疾病）擔任總指揮。但所有人都知道沙皇只能怪自己下令發動進攻，他為此充滿了愧疚。沙皇臨終時，曼特一直陪伴身邊，根據他的說法，“比身體疾病更甚的精神折磨”讓沙皇倒下了，葉夫帕托里亞失利的消息讓他已經孱弱的身體遭受了“最后一擊”。[[47]](#_47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沙皇尼古拉一世于3月2日去世。俄國公眾對沙皇患病一無所知（他禁止公布任何有關其健康的消息），他突然去世的消息一經公布，馬上就有謠言說沙皇是自殺身亡的。謠言說沙皇在得知葉夫帕托里亞失敗后，心煩意亂，讓曼特給他毒藥服下而死。在懸掛黑旗的冬宮（Winter Palace）外，人群開始聚集，憤怒的聲音呼喊著要處死這個有德國名字的醫生。擔心生命受到威脅，曼特被送上一輛馬車匆匆離開冬宮，不久之后就離開了俄羅斯。[[48]](#_48_Poslednie_minuty_i_konchina)

其他各種謠言同時開始流傳：有的說曼特殺死了沙皇，這個版本由宮廷內的一些人制造傳播，用以抵消尼古拉一世自殺的謠言；還有謠言說曼特因其忠誠，獲得了一幅沙皇肖像，畫框上鑲滿了鉆石；另有謠言說一個名叫格魯伯（Gruber）的醫生因為對沙皇的去世表現出過分的興趣而被關押在彼得保羅要塞里。許多反對沙皇專制統治的人很愿意相信沙皇是自殺身亡的，在他們看來，自殺表示沙皇間接承認了自己的罪惡。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前的幾十年間，一些著名學者也在為這些謠言提供支持，其中包括尼古拉·希爾德（Nikolai Shil’der），四卷本尼古拉一世傳記的作者，他的父親卡爾·希爾德（Karl Shil’der）曾是尼古拉一世的宮廷幕僚。在蘇聯時期，這些謠言繼續被一些歷史學家傳播，即使在今天，還有一些歷史學家相信這些謠言。[[49]](#_49_Can_Jian_Zhu_Ru__V__Vinograd)

在安娜·丘特切娃描述宮廷生活的日記中，有許多尼古拉一世最后時刻的細節，基本上足以排除沙皇自殺的可能性。但是她同時也清楚地寫道，尼古拉一世在精神上被摧垮，對自己的錯誤感到悔恨，因為自己沖動的外交政策把俄羅斯引向了一場災難性的戰爭，他因此歡迎死亡的到來。也許他覺得上帝不再與他同在。臨終前，他把兒子召到床邊，讓他轉告軍隊，特別是塞瓦斯托波爾守軍：“為他們我已盡心盡力，之所以失敗，不是因為我沒有良好的意愿，而是因為知識情報上的不足。我請求他們寬恕我。”[[50]](#_50_A__Tiutcheva__Pri_dvore_dvuk)

身著軍服的尼古拉一世被埋葬在彼得保羅要塞內的大教堂里，這是自彼得大帝以來歷代俄羅斯君主墳墓的所在地。在棺蓋合上之前，皇后在尼古拉心口放了一個刻著君士坦丁堡圣索菲亞大教堂的銀色十字架，“這樣他在天堂就不會忘記為在東方的兄弟們祈禱了”。[[51]](#_51_A__Tiutcheva__Pri_dvore_dvuk)

[\*](#_93) 阿拉伯游牧民族。——譯注

[†](#_94) 約一米深，兩米四寬，四米長。——譯注

[‡](#_95) hide既指獸皮，又有“躲藏”之意。——譯注

[§](#SS_8) 他后來到中國參加鎮壓太平天國，因此得到這個外號。——譯注

[¶](#P_8) 約十千米。——編注

[\*\*](#_96) 1855年2月起擔任拉格倫勛爵的參謀長。——譯注

[††](#_97) 英國政客，1855年上半年被任命為戰爭大臣。——譯注

[‡‡](#_98) 后勤部官員無能到把綠色的、尚未烘焙的咖啡豆，而不是茶葉，送到習慣喝茶的、為一個靠茶葉貿易發財的帝國打仗的士兵手中。對大部分英軍士兵來說，烘焙、研磨和準備咖啡實在太麻煩了，于是紛紛把發給他們的咖啡豆扔掉。——原注

[§§](#SSSS_7) 原文為Corora，應該是霍亂（Cholera）的誤寫。——譯注

[¶¶](#PP_7) 兩及耳約為二百八十四毫升。——譯注

[\*\*\*](#_99) 約四兩半。——編注

[†††](#_100) 當時英國的高級百貨公司。——譯注

[‡‡‡](#_101) 倫敦市中心的一條街道，自19世紀起就因有大量私人診所而聞名。——譯注

[§§§](#SSSSSS_3) 一個天主教國際志愿服務組織。——譯注

[¶¶¶](#PPP_2) 今愛沙尼亞（Estonia）的塔爾圖（Tartu）。——譯注

[\*\*\*\*](#_102) 她原為維滕貝格的夏洛特公主（Princess Charlotte of Württemberg），在1814年嫁給米哈伊爾·帕夫洛維奇大公（Grand Duke Mikhail Pavlovich）之前，被東正教接納并改名為 葉蓮娜·帕夫洛夫娜。——原注

[††††](#_103) 由原土耳其兵營改建而成。——譯注

[‡‡‡‡](#_104) 一種頭套，一般由毛線織成，只露出眼睛。——譯注

[§§§§](#SSSSSSSS_1) 軍方認為電報應該用于軍事用途，不允許記者發送長篇文章，堵塞電報通路，因此在新聞摘要和報道全文之間有一段間隔，因為新聞摘要是通過電報發的，而報道全文要靠蒸汽機船送到倫敦。由于這個原因，常常出現新聞出錯的情況，最著名的一次發生在《泰晤士報》上：1854年10月2日，《泰晤士報》宣布塞瓦斯托波爾已被攻打下來。這條新聞是基于聯軍在阿爾馬戰役中獲勝的電報以及戰地記者羅素從克里米亞發來的第一份報道，即有關聯軍登陸的詳情而寫成的。直到10月10日，羅素的阿爾馬戰役報道全文才被送到倫敦，這時候真實戰況已經被后來的幾封電報澄清了。——原注

[¶¶¶¶](#PPPP) 一位名叫約瑟夫·布萊克斯利（Joseph Blakesley）的牧師，自稱為“赫特福德郡在職牧師”（A Hertfordshire Incumbent），給《泰晤士報》發去了大量篇幅很長的信件，提供各種跟戰爭有關的知識，從克里米亞的氣候到俄羅斯人的性格等等，不一而足。他為自己贏得了大眾歷史學家的聲譽，后來還被劍橋大學授予皇家欽定歷史學教授（Regius Professorship of History）的職位，盡管他其實缺乏學術資格。——原注

[\*\*\*\*\*](#_105) 即第一次普丹戰爭。——譯注

[†††††](#_106) 這則關于美國的謠言還是有一點根據的。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美國的公眾輿論總體來說是親俄羅斯的。北方廢奴主義者傾向于同情西方列強，但是蓄奴的南方堅定地站在依然實行農奴制的俄羅斯這邊。大英帝國是美國的老對手，俄羅斯相對弱小，因此獲得一些美國人對弱者的同情。美國人還擔心一旦英國打贏了這一仗，將更有可能再次攪和美國事務。在那幾年英美兩國的關系出現了新麻煩，因為倫敦方面擔心美國會宣布擁有加拿大領土，還擔心美國會入侵古巴（外交大臣克拉倫登曾向英國內閣表示，如果古巴遭到美國侵略，英國將被迫向美國宣戰）。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俄羅斯在歐洲備受孤立，卻發展了和美國的關系。把兩個國家帶到一起的是雙方共同的敵人——英國。不過俄羅斯方面一直對實行共和的美國人有所懷疑，而美國方面也不敢信任實行君主獨裁的沙皇。兩國之間簽署了一些貿易協議。一個美國軍事代表團（其中包括喬治·B. 麥克萊倫［George B. McClellan］，未來南北戰爭早期北方軍隊的指揮官）前往俄羅斯指導俄軍。美國公民向俄羅斯寄送武器彈藥，武器制造商塞繆爾·柯爾特（Samuel Colt）甚至提出送手槍和來復槍給俄軍。一些美國志愿者前往克里米亞與俄軍一起作戰或是擔任工程師。也正是在那時候，美國第一次提議購買當時被稱為俄美共屬的阿拉斯加（Alaska），最后終于在1867年成交。——原注

[‡‡‡‡‡](#_107) 原文為法語Quant à Constantinople, nous l’aurons, soyez tranquille. ——原注

注釋

[[1]](#_1_9)NAM 1988–06–29–1 (Letter, 17 Nov. 1854).

[[2]](#_2_9)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p. 102–3; NAM 1968–07–288 (Cambridge to Raglan, 15 Nov. 1854).

[[3]](#_3_9)Ia. Rebrov, Pis’ma sevastopol’tsa (Novocherkassk, 1876), p. 26.

[[4]](#_4_9)Lettres d’un soldat à sa mère de 1849 à 1870: Afrique, Crimée, Italie, Mexique (Montbéliard, 1910), p. 66; 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88; V. Bonham-Carter (ed.), Surgeon in the Crimea: The Experiences of George Lawson Recorded in Letters to His Family (London, 1968), p. 104.

[[5]](#_5_9)WO 28/162, ‘Letters and Papers Relating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Cavalry Division’.

[[6]](#_6_9)NAM 1982–12–29–23 (Letter, 22 Nov. 1854); D. Boulger (ed.), General Gordon’s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the Danube and Armenia (London, 1884), p. 14; K. Vitzthum von Eckstadt, St Petersburg and London in the Years 1852–64, 2 vols. (London, 1887), vol. 1, p. 143.

[[7]](#_7_9)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144.

[[8]](#_8_8)J. 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Les campements, les abris, les ambulances, les hopitaux, etc. (Paris, 1858), pp. 63–66;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48.

[[9]](#_9_8)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151; Mrs Duberly’s War, pp. 110–1.

[[10]](#_10_9)NAM 1968–07–270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Written during the Years 1854, 55 and 56 by a Staff Officer Who Was There’), pp. 188–9.

[[11]](#_11_8)I. G. Douglas and G. Ramsay (eds.), The Panmure Papers, Being a Selection from the Correspondence of Fox Maule, 2nd Baron Panmure, afterwards 11th Earl of Dalhousie, 2 vols. (London, 1908), vol. 1, pp. 151–2; B. 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pp. 159–60.

[[12]](#_12_8)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p. 59–60, 96–7.

[[13]](#_13_8)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91;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25–6.

[[14]](#_14_8)Mrs Duberly’s War, p. 118.

[[15]](#_15_8)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288; H.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p. 38; Bonham-Carter, Surgeon in the Crimea, p. 65.

[[16]](#_16_9)NAM 1996–05–4–19 (Pine letter, 8 Jan. 1855);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pp. 124–125; NAM 1996–05–4 (Letter, 8 Jan. 1855).

[[17]](#_17_8)NAM 1984–09–31–79 (4 Feb. 1855); NAM 1976–08–32 (Hagger letter, 1 Dec. 1854); G. Bell, Rough Notes by an Old Soldier: During Fifty Years’ Service, from Ensign G.B. to Major-General, C.B., 2 vols. (London, 1867), vol. 2, pp. 232–3.

[[18]](#_18_9)K. Chesney, Crimean War Reader (London, 1960), p. 154;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343.

[[19]](#_19_9)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pp. 101–3; J. Shepherd, The Crimean Doctors: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Crimean War, 2 vols. (Liverpool, 1991), vol. 1, pp. 135–6, 237; Health of the Army in Turkey and Crimea: Paper, being a medical and surgical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rmy which served in Turkey and the Crimea during the Russian war, Parliamentary Papers 1857–1858, vol. 38, part 2, p. 465.

[[20]](#_20_8)N.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i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0), pp. 28–37, 66, 147–8, 220–3; 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p. 82–3; Kh. Giubbenet,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p. 2.

[[21]](#_21_8)N. Berg, Desiat’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p. 17–9;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129;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 82;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p. 151–2.

[[22]](#_22_8)N. Berg, Desiat’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pp. 17–9; R. Hodasevich,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p. 129; E. Kovalevskii,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p. 82;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p. 155–6, 185.

[[23]](#_23_9)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44, 47–8.

[[24]](#_24_9)Giubbenet, Ocherk, pp. 5, 7.

[[25]](#_25_8)H. Connor, ‘Use of Chloroform by British Army Surgeon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Medical History, 42/2 (1998), pp. 163, 184–188; Shepherd, The Crimean Doctors, vol. 1, pp. 132–3.

[[26]](#_26_8)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 27; Istoricheskii obzor deistvii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sester’ popecheniia o ranenykh i vol’nykh k voennykh gospitaliakh v Krymu i v Khersonskoi gubernii c 1 dek. 1854 po 1 dek. 1855 (St Petersburg, 1856), pp. 2–4;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 22.

[[27]](#_27_8)Gosudarstvennoe podvizhnoie opolchenie Vladimirskoi gubernii 1855–1856: Po materialam i lichnym vospominaniiam (Vladimir, 1900), p. 82;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pp. 115–7.

[[28]](#_28_8)NAM 1951–12–21 (Bellew journal, 23 Jan. 1855); Rappaport, No Place for Ladies, pp. 101, 125.

[[29]](#_29_8)G. St Aubyn, Queen Victoria: A Portrait (London, 1991), p. 295.

[[30]](#_30_8)A. Lambert and S. Badsey (eds.),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Crimean War (Strand, 1994), p. 13; S.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2009), p. 16.

[[31]](#_31_7)E. Gosse, Father and Son (Oxford, 2004), p. 20.

[[32]](#_32_8)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 120.

[[33]](#_33_7)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146.

[[34]](#_34_7)NAM 1968–07–284 (Raglan to Newcastle, 4 Jan. 1855).

[[35]](#_35_7)Gooch,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p. 192.

[[36]](#_36_7)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2–6, 32; 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e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à sa famille (Paris, 1895), p. 82; RA VIC/MAIN/QVJ/1856, 19 Apr.

[[37]](#_37_7)Za mnogo let, pp. 75–8.

[[38]](#_38_7)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London, 1855), pp. 292–3, 296–8.

[[39]](#_39_7)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London, 1855), pp. 294–5; Za mnogo let, p. 73.

[[40]](#_40_8)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1, pp. 454–9;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 305.

[[41]](#_41_7)A. Zaionchkovskii,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vol. 2, p. 76; GARF, f. 109, op. 1, d. 353 (chast’2), l. 7.

[[42]](#_42_8)I. Ignatovich, Pomeshchichie krest’iane nakanune osvobozhdeniia (Leningrad, 1925), pp. 331–7; 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pp. 302–3, 313.

[[43]](#_43_4)J. Curtiss,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pp. 532–46; D. Moon, ‘Russian Peasant Volunte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imean War’, Slavic Review, 51/4 (Winter 1992), pp. 691–704. 關于基輔、波多爾和沃里尼亞（Volhynia）等地在1855年初出現的類似現象，參見RGVIA, f. 846, op. 16, d. 5496, ll. 18–52.

[[44]](#_44_4)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 166; Rebrov, Pis’ma sevastopol’tsa, p. 3.

[[45]](#_45_4)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p. 148; A. Markevich,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vo vremia krymskoi voiny: Po arkhivnym materialam (Simferopol, 1905), pp. 107–51; A Opul′skii, L. N. Tolstoi v krymu: Literaturno-kraevedcheskii ocherk (Simferopol, 1960), p. 12; Hodasevich, A Voice, pp. 24–5; RGVIA, f. 9198, op. 6/264, sv. 15, d. 2.

[[46]](#_46_4)‘Vostochnaia voina: Pis’ma kn. I. F. Paskevicha k kn. M. D. Gorchakovu’, Russkaia starina, 15 (1876), pp. 668–70;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224–8.

[[47]](#_47_4)RGVIA, f. 846, op. 16, d. 5450, ll. 50–54; 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l. 166, 199–201; ‘Doktor Mandt o poslednikh nedeliiakh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 (iz neizdannykh zapisok odnogo priblizhennogo k imperatoru litsa)’, Russkii arkhiv, 2 (1905), p. 480.

[[48]](#_48_4)Poslednie minuty i konchina v bozhe pochivshego imperatora, nezabvennogoi vechnoi slavy dostoinogo Nikolaia I (Moscow, 1855), pp. 5–6; ‘Noch’c 17-go na 18 fevralia 1855 goda: Rasskaz doktora Mandta’, Russkii arkhiv, 1 (1884), p. 194; ‘Nekotorye podrobnosti o konchine imperatora Nikolaia Pavlovicha’, Russkii arkhiv, 3/9 (1906), pp. 143–145;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 233.

[[49]](#_49_4)參見諸如：V. Vinogradov, ‘The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of Emperor Nicholas I for the Coming of the Crimean War: An Episode in the Diplomatic Struggle in the Eastern Question’, in H.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 170.

[[50]](#_50_4)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178.

[[51]](#_51_3)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20–1.

# 第十章 炮灰

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的消息在1855年3月2日傳到了巴黎和倫敦。維多利亞女王是最早收到消息的人之一，她在日記中對沙皇的去世做了一番反思：

可憐的皇帝，唉！確實成千上萬人的鮮血要算在他的頭上，但他曾經也是一個好人，擁有許多優秀的品質，有的相當出類拔萃。對于什么是正確、什么是他有權做的以及有權擁有的，他有一種錯誤的認知，卻依然固執己見，這就是他行為的根源。十一年前，他曾來到我們這里，言行親善，美好迷人，英俊瀟灑。在那之后的數年間，他都對我們充滿了友好的感情！他的離世會有什么樣的后果，沒有人能夠預測。[[1]](#_1_RA_VIC_MAIN_QVJ_1856__2_Mar)

沙皇的死訊立即在英國各地通過戲院、會場和其他公共場所被廣而告之。在諾丁漢，消息公布之時正是多尼采蒂（Donizetti）的歌劇《拉美莫爾的露琪亞》（Lucia di Lammermoor）第一幕落幕之際。聽眾為之喝彩，樂隊演奏了國歌，人們涌向街頭慶祝。所有人都以為戰爭結束了，因為正是尼古拉一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導致了這場戰爭，現在他不在了，俄羅斯應該清醒過來，祈求和平了。《泰晤士報》宣稱尼古拉一世的離世是天意，期待聯軍能夠很快取得勝利。在巴黎和倫敦的證券交易所里，股票價格急速上揚。

這一消息花了更長時間才傳到克里米亞的聯軍部隊那里，而且是通過一個出人意料的途徑。3月4日，也就是有關沙皇死訊的公告通過電報傳至那里的幾天前，一名法軍士兵發現一塊從塞瓦斯托波爾城外俄軍塹壕里扔過來的石頭上系著一張紙條，紙條上用法語寫著幾句話，聲稱代表了許多俄軍軍官的觀點：

俄羅斯的暴君死了。和平馬上就要到來，我們將沒有任何理由與我們敬重的法國人交戰。如果塞瓦斯托波爾陷落了，那也是暴君罪有應得。

—一個熱愛祖國、痛恨獨裁者的真正俄羅斯人[[2]](#_2_L_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

然而，不管這些俄羅斯人多么渴望和平，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并不打算馬上放棄父親的政策。他在三十六歲時登基，之前做了三十年的皇儲，登基后的第一年依然被籠罩在父親的陰影之下。與尼古拉一世相比，他更傾向自由派，曾受到其宮廷教師、自由派詩人瓦西里·茹科夫斯基（Vasily Zhukovsky）的影響，而且去過歐洲許多地方旅行。他對軍事不感興趣，這讓他父親感到失望，但他是一個俄羅斯民族主義者，公開表示過對泛斯拉夫主義的同情。繼任之后，他很快就公開表示不會接受任何有辱俄羅斯的和平條件（而英國只可能接受這樣的和平條件），承諾將繼續為俄羅斯的“神圣使命”和“在世界上的光榮”而戰。但與此同時，他又通過外交部長涅謝爾羅迭表明他愿意參加談判，達成一個能夠維護“俄羅斯完整與榮譽”的和平方案。亞歷山大了解到反戰情緒在法國日益高漲，他的這一策略的主要目的，是通過提出盡早結束沖突的建議，離間法國人與英國人。“法國與俄羅斯雖然交戰但并無仇恨，”涅謝爾羅迭在給他的女婿、駐巴黎的薩克森大使馮·澤巴赫男爵（Baron von Seebach）的信中寫道，“當拿破侖皇帝想要和平時，和平就會實現。”馮·澤巴赫男爵把這封信念給了拿破侖三世聽。[[3]](#_3_F__Charles_Roux__Alexandre_II)



亞歷山大二世，列維茨基攝，1870年代（圖片來源：國會圖書館印刷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然而在1855年初的幾個月里，拿破侖三世一直面臨來自英國的壓力，要求他投入一場野心更大的反俄羅斯戰爭。英國新任首相帕默斯頓長期以來一直在力推這一想法——不僅要摧毀俄軍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海軍港口，還要通過拉入更多的盟友、支持反抗沙皇統治的解放運動等手段削減俄羅斯在黑海地區、高加索、波蘭、芬蘭和波羅的海的勢力。對俄羅斯的打擊范圍將遠遠超過在1854年由英國、法國和奧地利共同簽署的《四點方案》。在該方案中，阿伯丁主持下的英國聯合政府謹慎地限制了戰爭范圍，阿伯丁只想通過一場有限戰爭逼迫俄羅斯就《四點方案》進行談判。但是帕默斯頓在上臺后已下定決心，要將克里米亞戰爭發展成為一場遏制俄羅斯在歐洲和近東勢力的大戰。

大約一年前，即1854年3月，帕默斯頓就曾在一封給英國內閣的信中勾畫了他對“這場戰爭最佳結果”的設想：

（波羅的海中的）奧蘭群島和芬蘭歸還瑞典。俄羅斯控制下的一些波羅的海沿岸的德意志省份割讓給普魯士。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王國，作為德國與俄羅斯之間的屏障……從俄羅斯手中奪下克里米亞、切爾克斯和格魯吉亞；將克里米亞和格魯吉亞給予土耳其；切爾克斯或是獨立，或是作為附屬國給予蘇丹。沒錯，要想實現這樣的結果，就必須聯合瑞典、普魯士和奧地利，加上英國、法國和土耳其，還必須假設對俄羅斯取得了重大勝利。但是這樣的結果并非不可能，不應該完全從我們的設想中剔除。

帕默斯頓這份野心勃勃的計劃，在當時的英國內閣中遭到了很大的質疑。如前文所述，阿伯丁反對這一計劃，認為這將把歐洲大陸引向一場新的“三十年戰爭”。但是現在的英國首相已經是帕默斯頓，俄羅斯力量已被削弱，嚴酷的冬天也接近尾聲，展開一場大規模戰爭并非完全不可能。[[4]](#_4_The_Later_Correspondence_of_L)

在英國政府內部有很多人支持這一方案。例如在1855年春，代表白金漢（Buckingham）選區的自由黨下議院議員哈里·弗尼爵士（Sir Harry Verney）[\*](#__1857Nian_Ta_He_Fu_Luo_Lun_Si)出版了一份叫作《我們與俄羅斯的爭執》（Our Quarrel with Russia）的小冊子，在外交官和軍事領導人之間廣為流傳。斯特拉特福德·坎寧顯然對小冊子中的觀點持贊同態度，不但把小冊子送給帕默斯頓和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同時還送給了愛德華·科德林頓爵士，當時他還是輕步兵師的指揮官，很快就會升職擔任英軍在近東的總指揮。這本小冊子現在依然保存在科德林頓的文件收藏品中。弗尼主張英國應該花更大的力氣說服德國人加入針對俄羅斯的戰爭，因為柏林離沙皇俄國邊境不過幾天的行軍路程，德國居民主要為新教徒，與英國有很多共同之處，所以他們應該很擔心俄羅斯入侵。而且從地理上說，德國是一個理想的基地，可以從那里出發將基督教西方從“野蠻”的俄羅斯手中解救出來。弗尼使用了歐洲恐俄派的標準表述，主張應該將俄羅斯人驅除到“第聶伯河以東荒蠻的亞洲草原上”。

作為一個國家，俄羅斯在知識或工業上沒有任何建樹，完全沒有給世界帶來任何正面影響。政府自上而下徹底腐化，依靠爪牙施展種種詭計，并在國內外通過高薪收買大量間諜。它闖入比它更文明、管理更完善的國家，千方百計將其變得跟自己一樣墮落。它抗拒《圣經》的傳播，阻撓傳教士的工作……土耳其的希臘人身上已沒有多少基督徒的品質，他們對基督教造成的傷害，甚至遠遠超過土耳其人的所作所為。在整個土耳其帝國，希臘人都是俄羅斯人的同伙，為他們提供情報，執行他們制定的方案。如果說俄羅斯也追求極致的話，那就是在戰爭方面，為此付出任何代價他們都在所不惜。

我們與俄羅斯的對抗，圍繞著一個根本的問題，那就是我們這個已達成各種最可貴成就的世界，是否還將在文明方面繼續進步。這里所指的進步是對該概念最高層次的詮釋。許多東西都建立在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之上：宗教、文明、社會與商業自由，平等法律的帝國，合乎自由原則的秩序，上帝圣言的傳播，基于《圣經》的種種原則的頒布。[[5]](#_5_H__Verney__Our_Quarrel_with_R)

總體來說，拿破侖三世同意帕默斯頓通過一場大戰重新劃分歐洲版圖的想法。但是他對在高加索地區展開反俄軍事行動興趣不大，因為那么做主要對英國有利。另外，在法國國內，因未能迅速取勝而導致反戰聲音越來越大，他也不愿意讓法國陷到一場曠日持久、沒有盡頭的戰爭中去。拿破侖三世左右為難，在實際操作層面，他的本能反應是把兵力集中在克里米亞，將奪取塞瓦斯托波爾作為法國“榮譽”和“地位”獲得保障的標志。他非常需要用這一點來鞏固自己的政權，顯示自己領導戰爭走向了一個快速而“光榮”的終結。然而，在內心深處，他從來沒有打消過以偉大的拿破侖構想重劃歐洲版圖的念頭。他暗自思忖，如果法國人意識到可以通過戰爭來實現革命夢想，把歐洲變成一個由民主國家組成的大陸的話，也許法國民眾會重新燃起對戰爭的熱情。

拿破侖三世的設想是把克里米亞歸還給奧斯曼帝國。他是意大利獨立的堅定支持者，相信克里米亞戰爭是一個機會，能夠以此迫使奧地利放棄倫巴第和威尼西亞（Venetia）地區；作為補償，奧地利可以獲得對多瑙河兩公國的控制權。但是他寄予最大同情的還是波蘭獨立運動，這也是法國外交政策最緊迫的問題。他認為奧地利和普魯士可能會同意重建一個獨立的波蘭，因為這些國家需要在自己與俄羅斯之間有一個緩沖地帶，以應對俄羅斯的擴張企圖。他試圖說服帕默斯頓將波蘭重建作為和平談判的條件之一，但是帕默斯頓擔心波蘭重建之后，神圣同盟可能因此死灰復燃，甚至在意大利和德國地區激發革命浪潮，那樣的話，歐洲又會卷入新一輪拿破侖式的戰爭。

所有這些因素都造成了維也納會議（Vienna Conference）的失敗，這是1855年初的幾個月間由奧地利主持的和平談判進程。奧地利在上一年12月加入了西方列強的軍事同盟，但是目的并不是支持延長對俄羅斯的戰爭，因為那樣做會損害自己的經濟，并且在本國境內的斯拉夫少數民族中造成不穩定。奧地利希望利用同盟伙伴的關系，促使英法兩國與俄羅斯在自己的主導下進行和平談判。

1855年1月是重回外交途徑的好時機。軍事進展遲緩和冬季的磨難讓西方政府面臨公眾越來越大的壓力，不得不尋求結束戰爭的辦法，其中法國特別樂意探索外交解決方案。一些高級政府官員，如外交部長德魯安和駐奧斯曼帝國大使圖弗內爾（Thouvenel），開始懷疑軍事勝利是否可能達成。他們擔心戰事拖延時間越長，就越會遭到公眾反對，因為大部分作戰都依靠法軍進行，法國公眾已經覺得他們是在替英國利益而戰。這方面的考慮促使拿破侖三世接受和平談判的想法，他希望能借此推動自己有關波蘭和意大利理想前景的設計。不過他依然是帕默斯頓的同盟，而帕默斯頓既不相信也不期望和平。然而在1855年的頭幾個星期里事情出現了轉機，帕默斯頓為了爭取主和的皮爾派（Peelites）支持以組成內閣，不得不表現出一種溫和姿態，考慮（或是表現出在考慮）奧地利的和平談判建議。

1月7日，沙皇派駐維也納的大使亞歷山大·戈爾恰科夫親王（Prince Alexander Gorchakov）[†](#__Bu_Yao_Gen_Sha_Huang_De_Jun_Sh)宣布俄羅斯接受《四點方案》，包括有爭議的第三點，終止俄羅斯在黑海的主導權。在尼古拉一世最后的日子里，他急切地希望重新開啟和平談判。在奧地利加入英法軍事同盟后，尼古拉一世意識到一場針對俄羅斯的歐洲大戰一觸即發，他對此擔憂不止，因此愿意尋求一個“體面”結束克里米亞戰爭的途徑。英國對俄羅斯的動機持懷疑態度，1月9日，維多利亞女王告訴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在她看來俄羅斯接受《四點方案》不過是一個“外交伎倆”，目的是阻止聯軍占領克里米亞。女王認為軍事行動不應停止，為保證俄羅斯接受《四點方案》，聯軍必須奪下塞瓦斯托波爾。帕默斯頓同意這一看法，無意讓任何和平談判阻礙計劃中的春季軍事行動。[[6]](#_6_G__B__Henderson___The_Two_Int)

法國政府的部長們則更傾向于把俄羅斯的讓步當作真誠的行動，并以此為契機談判出一個解決方案。到了2月份，他們的和談愿望進一步增強，原因是拿破侖三世不顧眾多擔心他生命安全的部長和盟友的警告，堅稱有意前往克里米亞親自指揮作戰。帕默斯頓同意克拉倫登的意見，必須盡一切努力制止法國皇帝這個“瘋狂”的念頭，即使這意味著必須馬上在維也納開始和平談判。當時英國內閣中三名皮爾派高級大臣（財政大臣格拉德斯通、海軍大臣格雷厄姆、殖民地事務大臣赫伯特）在帕默斯頓上任僅兩個星期之后，就因對其在和平進程問題上的真誠度產生懷疑而相繼辭職。為了保全聯合政府內閣，也為了顯示政府對和平談判的認真態度，帕默斯頓任命約翰·羅素勛爵作為代表參加維也納會議。[‡](#___He_Bo_Te_Zai_Ci_Qu_Zhi_Min_Di)

羅素長期以來一直是內閣主戰派成員，所以把他派往維也納符合帕默斯頓企圖破壞和談的猜測。然而沒想到羅素很快轉變態度，認為奧地利和平談判是有意義的，甚至開始質疑英國在東方問題和克里米亞戰爭上的政策。在3月一份言辭精彩的備忘錄中，羅素列出了英國可以采納的各種方案，以保護奧斯曼帝國對抗俄羅斯的侵略：例如可以給予蘇丹召集聯軍艦隊至黑海的權力，或是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設要塞、駐兵把守以防突然襲擊等，他指出要實現這些目標，并不需要發動一場意在把俄羅斯擊垮的戰爭。羅素對英國在奧斯曼帝國為改善穆斯林與基督徒關系而進行的自由主義改革持批評態度，認為英國采取的措施是不切實際的。他指出英國傾向于強加一套基于英國行政原則的單一改革體系，而不是根據當地的制度、宗教網絡和社會實踐采取更保守和務實的策略來促進實際的改善。羅素的這些想法和奧地利人很接近，這讓白廳警覺起來。帕默斯頓忽然發現自己有可能要被迫簽署一項他并不想要的和平方案。當時他面臨的壓力不僅來自法國人，還有英國國內支持奧地利方案的人士，包括女王丈夫阿爾伯特親王。原來持主戰態度的阿爾伯特親王，在5月初態度發生了改變，認為四強聯盟加上德國可以保障土耳其和歐洲的安全，這樣做比繼續與俄羅斯作戰要好。

維也納談判時間拖得越長，帕默斯頓就越堅定地要中止和談，繼續一場大規模的對俄戰爭。但是選擇戰爭還是和平的決定權最終還是在優柔寡斷的法國皇帝手上，關鍵在于他到底是聽從外交部長德魯安還是英國駐法國大使考利勛爵的意見。德魯安建議接受奧地利的和平方案，并以此約束俄軍在黑海地區的勢力，考利勛爵則試圖勸說拿破侖三世消滅俄羅斯黑海艦隊是必需的，在未實現這一戰略目標前就簽署和平協議將是國家的恥辱。5月4日在巴黎舉行了一場非常關鍵的會議，會上法國戰爭部長瓦揚元帥和考利勛爵一起向與會者強調，在沒有取得軍事勝利之前就接受和平條件將成為一樁丑聞，還將對法蘭西第二帝國的軍事和政治穩定造成沖擊。最后維也納和平方案被拒絕了，德魯安辭職而去，拿破侖三世心不甘情不愿地繼續與英國聯盟，接受了擴大戰爭規模的想法。[[7]](#_7_P__Schroeder__Austria__Great)

要繼續打這一仗，英法聯盟方面倒并不缺新的盟友。在1855年1月26日，法英兩國與皮埃蒙特—撒丁王國[§](#SS_Xia_Wen_Zuo_Zhe_Jiao_Ti_Shi_Y)簽署了一項軍事協議。皮埃蒙特—撒丁王國是一個意大利地區的王國，已經擺脫了奧地利的控制。簽約后，它派出了一支一萬五千人的部隊，在意大利將軍阿方索·拉馬爾莫拉（General Alfonso La Marmora）的指揮下，于5月8日抵達克里米亞與英軍會合。對身為皮埃蒙特人首相的加富爾伯爵卡米洛（Camillo）[¶](#P_Quan_Ming_Qia_Mi_Luo__Ben_Suo)來說，派出這支部隊參加遠征，是一個與西方列強建立盟友關系的機會，可以借此推動在皮埃蒙特領導下的意大利統一進程。加富爾伯爵支持對俄羅斯展開一場大戰，恢復神圣同盟，并重塑自由主義的歐洲版圖。但是對皮埃蒙特人來說，就這樣投入軍隊參戰是有一定風險的，因為他們尚未從英法兩國那里得到支持意大利統一的承諾（在12月22日，法國甚至與奧地利簽署了一項秘密協議，同意在對俄羅斯的戰爭同盟期間，維持意大利現狀不變）。然而皮埃蒙特人也明白，除非他們能證明自己對西方列強有用，否則自己在國際關系中沒有任何談判資本。同時，因為奧地利基本上不可能出兵，皮埃蒙特人可以抓住這個機會證明他們比奧地利人更有價值。確實，聯軍指揮們認為撒丁士兵“看上去精神抖擻”，是一流的軍人。一名目睹他們在巴拉克拉瓦登陸的法國將軍認為，他們似乎“軍容良好，軍紀嚴明，身著深藍軍裝，顯得生氣勃勃”。[[8]](#_8_P__Jaeger__Le_mura_di_Sebasto)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皮埃蒙特—撒丁王國派出的部隊表現良好，作戰勇敢。

波蘭人也支持發動一場歐洲大戰對付俄羅斯。在朗貝爾集團的亞當·恰爾托雷斯基的敦促下，法英兩國資助組建了一支波蘭軍團，由扎莫伊斯基指揮。這支波蘭軍團由一千五百名波蘭流亡者、沙皇軍隊中的波蘭戰俘和逃兵組成，由西方提供武器，以“蘇丹的哥薩克”（Sultan’s Cossacks）為名做掩護，在克里米亞和高加索與俄軍作戰。[\*\*](#___You_Xu_Duo_Bo_Lan_Ren_Cong_E)根據一名被囚禁在金本（Kinburn）的俄軍軍官的說法，聯軍從這座監獄里招募了五百名波蘭籍俄軍戰俘，愿意加入的大部分收了錢，那些拒絕加入的則被打了一頓。[[9]](#_9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85)波蘭軍團直到1855年秋天才投入戰斗，但是組建波蘭軍團的計劃從春季開始就不斷被討論。棘手的核心問題是西方列強是否承認這支部隊代表波蘭出戰——如果承認的話，則是在事實上支持把波蘭獨立作為這場戰爭的目標之一，而這一問題從來沒有被好好地研究和澄清過。

帕默斯頓急于招募更多士兵以發起更大規模的反俄戰爭，他呼吁從世界各地招募雇傭兵，并建議招募四萬人。“讓我們招募盡可能多的德國人和瑞士人參戰，”他在1855年春天說道，“讓我們到哈利法克斯（Halifax）[††](#___Zai_Ying_Guo___Mei_Guo___Jia)招兵，讓我們征募意大利人，讓我們增加犒賞而不必提高征兵標準。我們必須這么做，我們必須有更多部隊。”英國因為缺乏強制征兵制度，無法大規模增加受過軍事訓練的預備役軍人，傳統上一直依賴外籍雇傭兵，1854年冬季在克里米亞的大批兵員損失讓英軍更加依賴招募外籍軍團補充兵力。英國在克里米亞的部隊人數只有法軍的一半，這意味著在決定聯軍作戰目標和戰略上，法國占據上風。1854年12月，英國議會匆匆通過《海外募兵法案》（Foreign Enlistment Bill）。但由于同時面臨相當強烈的反對意見，主要是因為對外國人的不信任，這項法案在通過時不得不做了修改，增加了募兵總數不得超過一萬人的條款。在雇傭兵中，最多的是來自德國地區的，達九千三百人左右，絕大部分是工匠和農業勞工，約一半有軍事訓練基礎或作戰經驗。排在第二位的是瑞士人，約有三千人。雇傭兵在1855年4月抵達英國，每人都收到十英鎊的賞金。在奧爾德肖特（Aldershot）接受訓練后，一支由德國和瑞士人組成的七千人部隊在1855年11月被送到斯庫臺。然而，他們到得太遲了，沒趕上參加克里米亞的作戰。[[10]](#_10_H__Bell__Lord_Palmerston__2)

\* \* \*

英法兩國所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吸納更多盟友和招募更多部隊，準備打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而且還需要決定在哪里集中發起攻勢。1855年春，俄軍不僅兵力不足，而且極為分散，在防御上出現了許多薄弱點，因此在克里米亞以外地區尋找新的攻擊點就很有意義，問題在于選擇什么地方。當時俄軍的一百二十萬作戰部隊中，二十六萬駐防波羅的海，二十九萬三千在波蘭和烏克蘭西部，十二萬一千在比薩拉比亞和黑海沿岸，還有十八萬三千駐扎在高加索。[[11]](#_11_F__Kagan__The_Military_Refor)

俄軍的防線如此漫長，自己也極其擔心聯軍會取得突破長驅直入，因此制定了一份在1812年戰爭路線上發動游擊戰的計劃。1855年2月，戈爾恰科夫將軍策劃制定了秘密備忘錄《敵人入侵俄羅斯時的全民抵抗方案》（“On National Resistance in the Event of the Enemy’s Invasion of Russia”）。戈爾恰科夫擔心歐洲聯軍正在囤積兵力準備發起春季攻勢，也擔心俄軍由于缺乏足夠兵力無法在每一處都做出有效抵抗。與帕斯克維奇和尼古拉一世一樣，他最擔心的是奧地利發兵從波蘭向烏克蘭方向進攻，原因是那里的種族成分和教派組成對奧地利有利。如果奧地利在那里取得突破的話，不僅波蘭人會加入，沃里尼亞（Volhynia）[‡‡](#_____Jin_Bo_Lan___Wu_Ke_Lan___Ba)和波多利亞（Podolia）[§§](#SSSS_Jin_Wu_Ke_Lan_He_Mo_Er_Duo)篤信天主教的魯塞尼亞人也會加入。戈爾恰科夫提議俄羅斯的游擊戰區域應該選擇在這些邊境地區的后方，根據居民的教派組成劃界：在基輔和赫爾松等地，居民大部分是東正教徒，也許能被說服參加游擊戰。在俄軍南方面軍（Southern Army）的指揮下，游擊部隊將會按照1812年的焦野政策，破壞橋梁、作物和牲畜，然后躲進森林，以那里為據點伏擊入侵的外國部隊。在得到沙皇亞歷山大的批準后，戈爾恰科夫的計劃從3月份開始實施。教士們被派往烏克蘭，拿著尼古拉一世的臨終遺言，鼓動東正教農民對侵略者發動一場“圣戰”。然而，這項計劃沒有取得成功。雖然在基輔附近確實出現了一些農民武裝，且有些人數眾多，最多達七百人左右，但是多數人以為他們是為解放自己的農奴地位，而不是為了打擊侵略者而戰。他們手執草叉和獵槍向當地富戶莊園進發，當地駐軍不得不派出士兵將他們驅散。[[12]](#_12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4)

與此同時，聯軍還在繼續討論春季攻勢應該從哪里入手。許多英國領導人寄希望于高加索，那里的穆斯林叛軍領袖沙米勒伊瑪目已經和土耳其軍隊建立聯系，準備好在格魯吉亞和切爾克斯向俄軍發起進攻。1854年7月，沙米勒曾發動一場大型攻勢，攻擊俄軍在格魯吉亞的據點。他率領一萬五千名騎兵和步兵，曾一度推進到離第比利斯僅六十公里遠的地方。當時第比利斯的俄軍守軍只有兩千人，但是土耳其未能從卡爾斯派出部隊增援，沙米勒只能撤回到達吉斯坦。他的兒子加齊·穆罕默德（Gazi Muhammed）率領一部分部隊向格魯吉亞恰夫恰瓦澤親王（Prince Chavchavadze）位于齊南達利（Tsinandali）的夏季莊園發起攻擊，抓走了親王夫人和她的姐妹（她們是最后一位格魯吉亞國王的孫女），以及他們的孩子和法國女教師。沙米勒希望用他們來交換自己被囚禁在圣彼得堡的兒子賈邁勒丁（Jemaleddin）。但是這個消息傳開后，引起了強烈的國際反應，法國和英國代表都寫信給沙米勒要求他放人。不過他們的信件于1855年3月才送到沙米勒手中，那時他已經成功地用人質換回了賈邁勒丁和四萬銀盧布。[[13]](#_13_C__Badem___The_Ottomans_and)

英國人從1853年起就開始向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輸送槍支彈藥，但是一直不愿意全力支持沙米勒以及這一地區的土耳其部隊。對于這兩支軍隊，英國人一直帶著殖民者的蔑視眼光，很瞧不起他們。劫持親王夫人和孩子的行為，更是不可能為沙米勒在倫敦贏得更多朋友。但是在1855年春，為了找到擊垮俄羅斯的新途徑，英法兩國開始探尋與高加索的穆斯林部落進一步發展關系的可能。在4月份，英國政府派出特使約翰·朗沃思（John Longworth）秘密前往高加索。他曾經擔任過駐莫納斯提爾（Monastir）[¶¶](#PP_Xian_Ming_Bi_Tuo_La__Bitola)領事，與著名的親土耳其派、切爾克斯人的支持者戴維·厄克特來往密切，此行的任務是向沙米勒承諾英國的支持，以此鼓勵沙米勒將穆斯林部落團結起來，發動針對俄羅斯的“圣戰”。法國政府也派出了自己的代表、駐雷杜特克爾（Redutkale）的副領事夏爾·尚普索（Charles Champoiseau），前往格魯吉亞的蘇呼米（Sukhumi）聯絡當地的切爾克斯部落。[[14]](#_14_FO_881_1443__Clarendon_to_Co)

英國人曾答應向沙米勒的部隊提供武裝，并承諾將俄軍驅逐出切爾克斯。6月11日，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向外交部報告說他已經讓高門“簽發了詔令，在將俄羅斯人從帝國疆土上驅逐出去后，宣告切爾克斯獨立”。但其實在這個部落形式復雜的地區，這個詔令的效果如何很值得懷疑。這時候，朗沃思抵達了切爾克斯，他報告說山區部落已有很好的裝備，配有米涅來復槍和獵槍等。英國人認為土耳其軍隊可以領導切爾克斯的部落，在庫班平原向俄軍發起攻勢。朗沃思還報告說，土耳其軍隊在巴統的總指揮穆斯塔法帕夏已經會見了切爾克斯部落領袖，并“已實質上成為切爾克斯總督”。有謠傳說穆斯塔法帕夏已經集結了一支規模龐大的切爾克斯部隊，數量達六萬人，準備從高加索向俄羅斯南部發起進攻。但是朗沃思同時擔心土耳其人是在利用目前的局面加強他們自己對高加索的控制，而無意讓這個地區獨立，他提醒英國政府必須對此提出反對。許多原來的土耳其高官在和高門重新建立聯系之后，憑此關系繼續在本地區實行專制統治，并在許多部落中進行離間，讓他們不相信英法兩國與土耳其的盟友關系。朗沃思同時還反對支持沙米勒的抵抗運動，理由是此運動已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滲透。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沙米勒在切爾克斯的特使（Naib）穆罕默德·埃明（Muhammed Emin），他宣稱要將所有基督徒從高加索驅逐出去，并且禁止沙米勒的追隨者與任何非穆斯林人士發生接觸。根據朗沃思的說法，埃明計劃建立一個“以伊斯蘭狂熱主義原則為基礎的封建帝國”。朗沃思在支持沙米勒問題上所持的保留態度，得到了英國外交部許多東方問題專家的支持。他們反對使用穆斯林武裝（特別是土耳其武裝）對抗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的俄軍，理由是只有歐洲軍隊才能對當地的基督教居民擁有真正的權威。[[15]](#_15_FO_881_1443__Clarendon_to_Co)

英法兩國既不愿意派兵到高加索，又對依靠當地穆斯林武裝感到擔憂，于是在制定針對這一關鍵地區的政策方面不斷拖延。如果聯軍在高加索部署一支強大的部隊，則可以對俄羅斯實施更為迅速、破壞力更強的打擊，比圍困塞瓦斯托波爾長達十一個月的戰略會有效得多；但是他們過于謹慎，不敢利用這一機會。

聯軍在1855年春重新開始了波羅的海的海上攻勢，英法兩國對此抱有很大期望。原海軍總指揮內皮爾爵士現已離職，取而代之的是海軍少將理查德·鄧達斯（Rear Admiral Richard Dundas）。1854年聯軍的海上攻勢無疾而終，許多人歸咎于內皮爾，現在人們又出現了樂觀的期望，原因是聯軍的海軍配備了新型蒸汽機船艦隊和海上浮動炮臺，這次應該能拿下喀瑯施塔得和芬蘭堡了。這兩座要塞都是上一年內皮爾沒能發起進攻的地方，奪下這兩處之后，海軍即可直逼圣彼得堡。負責制定作戰計劃的是海軍水道測繪師巴塞洛繆·沙利文上尉（Captain Bartholomew Sulivan），他曾陪同達爾文參加“小獵犬號”（Beagle）的遠航。沙利文經過初步研究認為，這兩處只靠海軍軍艦就可以攻下，而不需要陸軍登陸。當1855年3月英國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前往巴黎勸說拿破侖三世不要親自前往克里米亞時，他隨身攜帶了沙利文的報告。拿破侖三世很看好這份報告，認為1854年海軍未能進攻喀瑯施塔得是一樁令人蒙羞的事情。和英國人一樣，他也相信一旦奪取喀瑯施塔得，瑞典人將更愿意加入到對抗俄羅斯的聯盟中來。

第一批英國軍艦于3月20日從斯皮特黑得起航，兩周之后更多軍艦也加入進來。由佩諾上將（Admiral Pénaud）率領的法軍艦隊在6月1日抵達波羅的海。為了封鎖俄羅斯的貿易通路，英軍艦隊向俄羅斯海岸上的各個據點發動進攻，進行破壞，但這一封鎖的意義其實并不大，因為俄羅斯對外貿易依然可以通過德國地區進行。不過英軍的主要目標依然是喀瑯施塔得和芬蘭堡。6月3日，在一條離喀瑯施塔得八公里遠的軍艦上，萊寧根親王歐內斯特（Prince Ernest of Leiningen）在給他的堂姐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寫道：

在我們眼前的這座鎮子里，能看見許多教堂和尖頂，還有無邊無際的炮臺，仿佛是露著的一排牙齒，一有機會馬上就會咬上來。港口的入口處由兩座巨大的要塞把守著：亞歷山大和緬什科夫炮臺，而且在抵達入口前，船只還必須通過一座有三層炮臺（七十八座大炮）的里斯班克要塞（Fort Risbank）……爬上主桅桿，我們能看清圣彼得堡鑲金的圓頂和塔樓，正對著我們艦隊的是輝煌的奧拉寧鮑姆宮（Oranienbaum），用白色的石頭砌成，看上去就像白色大理石一般……這里依然很冷，但是天氣晴朗，幾乎沒有夜晚，每天只有十一點到一點天色才會暗一些。[[16]](#_16_RA_VIC_MAIN_F_2_96)

在等待法國艦隊前來會合期間，沙利文對波羅的海的淺水區進行了仔細的偵察，其中包括愛沙尼亞海岸線，在那里他受到一位親英的貴族家庭邀請，在其鄉村別墅參加了一場奇異的晚餐。“真的就像一場夢一樣，”他寫道，

那是在離海岸三英里[\*\*\*](#____Yue_Si_Qian_Ba_Bai_Mi)遠的敵方境內，我們卻經歷了一番非常英國的場景，一位彬彬有禮的年輕小伙子英語說得和我一樣好，除了帶著一丁點外國口音以外……我們享用了一頓盛宴，不過肉和禽類比我想象的要多。咖啡和茶是在一棵樹下享用的。我們在十點鐘左右離開，正是黃昏時分。男爵派了一輛輕型四駕馬車送我們回到船邊，馬車跑得飛快，拉車的是英國馬，馬夫的穿著跟在英國完全一樣，配著皮帶、皮靴等等。

沙利文在6月份呈交了自己的偵察報告。現在他的想法改變了，和1854年的內皮爾一樣，他對攻克喀瑯施塔得的強大防御態度悲觀。在過去的一年中，俄軍加強了艦隊（沙利文數出了三十四條炮艦），同時還強化了海面防御。除了布置通過電路和化學反應控制的潛水水雷（被稱為“地獄機器”）外，還設置了海底障礙，把木架子固定在海底，其中填滿石頭。要冒著要塞的炮火清除這些障礙必然會付出極大代價。進攻喀瑯施塔得的計劃于是被放棄了，在波羅的海取得決定性突破的想法自然隨之煙消云散。[[17]](#_17_T__Royle__Crimea__The_Great)

與此同時，聯軍還想到要擴大克里米亞地區戰事的規模。冬季戰事的停滯讓許多人得出結論：繼續從南部炮擊塞瓦斯托波爾不會取得什么結果，因為俄軍仍然可以通過彼列科普和亞速海從俄羅斯大陸派遣增援部隊并輸送物資。為了讓圍困戰取得成功，聯軍必須從北邊包圍塞瓦斯托波爾。這本來是1854年夏天聯軍最初的計劃，但是被拉格倫否決了，他擔心為了切斷塞瓦斯托波爾與彼列科普的聯系，英軍必須占領克里米亞平原，而這樣士兵就會在熱浪中受罪。到了年底的時候，誰都能看出拉格倫的決定是多么愚蠢，于是指揮官們紛紛要求擴大戰事規模。例如在12月的一份備忘錄中，拉格倫的工兵總指揮約翰·伯戈因爵士呼吁調集一支三萬人的部隊到貝爾貝克河，“為將來針對巴赫奇薩賴和辛菲羅波爾的行動做好準備”，同時還可以切斷塞瓦斯托波爾兩條供給線中的一條（另一條通過克里米亞東部的刻赤）。[[18]](#_18_WO_28_188__Burgoyne_to_Ragla)

俄軍在2月對葉夫帕托里亞發起的進攻成了一個契機，聯軍因此制定了更多的軍事方案，意在加強力量切斷俄軍的彼列科普供給線。在3月份，一支聯軍部隊被派往葉夫帕托里亞，增援那里的土耳其防御部隊。他們發現當地情況十分惡劣，正在發生一場真正的人道主義危機：多達四萬名韃靼農民睡在街頭，既無食物也無住所，他們都是因為害怕俄軍而從自己村莊里逃出來的。這一危機促使聯軍指揮部考慮向克里米亞西北部投入更多兵力，哪怕只是為了動員韃靼人口起來反抗俄軍。[[19]](#_19_A__de_Damas__Souvenirs_relig)

但是直到4月份，聯軍才真正開始認真考慮其在克里米亞的戰略。4月18日，帕默斯頓、拿破侖三世、阿爾伯特親王、克拉倫登、潘穆爾勛爵（新任戰爭大臣）、瓦揚元帥、伯戈因爵士，以及接替德魯安的法國外交部長瓦萊夫斯基伯爵（Count Walewski）在溫莎城堡一起出席了戰爭會議。帕默斯頓和拿破侖三世都堅定地支持改變戰略，減少對塞瓦斯托波爾的炮擊，轉而集中力量占領克里米亞全境，兩人都將此舉視為對俄羅斯發動一場大戰的前奏。該新方案的一個優越性是可以讓克里米亞地區的韃靼人參與聯軍行動。更重要的是，這意味著戰斗將在開闊地進行。在阿爾馬和因克爾曼的兩次戰役都證明，在開闊地戰斗中，聯軍的軍事技術和來復槍火力比俄軍強很多，而這些優勢在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中很難體現出來。在構筑工事和炮兵戰方面，俄軍至少不會比英法聯軍差。

拿破侖三世對改變克里米亞地區戰略最為熱心。雖然占領塞瓦斯托波爾是他的主要目標，但是他相信除非這個城市被完全包圍起來，否則是不可能被打下來的；而一旦被包圍，塞瓦斯托波爾將不戰而降。他提議停止對塞瓦斯托波爾的炮擊，而是在其東邊七十公里的阿盧什塔（Alushta）登陸，從那里向俄軍后勤補給中心辛菲羅波爾進發。英國方面大致同意拿破侖三世的戰略構想，不過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他們成功地說服拿破侖三世放棄前往克里米亞親自指揮戰斗的念頭。阿盧什塔方案后來在法國人圈子里被稱為“皇帝的計劃”，成為向克里米亞內陸發起進攻的三個方案之一。其他兩個方案分別是由圍困塞瓦斯托波爾的聯軍向巴赫奇薩賴發起進攻，以及派兵在葉夫帕托里亞登陸，然后跨越克里米亞平原向辛菲羅波爾進攻。英法兩國的戰爭部長在同意這三個方案的備忘錄上簽字，潘穆爾勛爵隨后代表內閣將這一備忘錄發給了拉格倫，他的指令是拉格倫有權在這三個野戰方案中任選一個，但是清楚表明拉格倫必須采用其中之一。塞瓦斯托波爾城外的聯軍塹壕將移交給三萬名法軍和三萬名土耳其部隊，由他們繼續炮擊，防止城內守軍突圍。

拉格倫對野戰方案持懷疑態度，他想繼續炮擊，相信炮擊行動已接近成功的轉折點，認為如果調開兵力在別處發動攻勢，剩下的部隊將無法守住聯軍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的據點。他在克里米亞召集了一次戰爭會議，在會上他對聯軍指揮官康羅貝爾和奧馬爾帕夏說，潘穆爾勛爵的備忘錄不過是一個“建議”，他自己可以斟酌決定是否執行。拉格倫的這一舉動如果不算嘩變，也是公開的犯上。他一再拖延時間，想出各種借口拒絕調兵。法軍總指揮康羅貝爾是支持新方案的，甚至好幾次提議如果拉格倫開始執行野戰行動方案，他愿意把手下的法國軍隊交給拉格倫調遣。最后康羅貝爾終于受不了爆發了，他向拿破侖三世投訴：“陛下制定的野戰計劃，已經被拒不合作的英軍總指揮搞得無法操作了。”[[20]](#_20_H_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Q)

許多年后，法國人依然責怪英國人沒有執行向辛菲羅波爾進軍并占領克里米亞其余地方的計劃。他們對拉格倫的惱怒是有道理的，在他拒絕向克里米亞內陸發起進攻后，帕默斯頓完全可以將其撤職，即使不能以指揮無能，也可以用拒不執行命令作為撤職理由。憑著英軍強大的來復槍火力，加上韃靼人的支持，完全有理由相信在平原地帶的野戰中，英軍能夠占領辛菲羅波爾，切斷俄軍的主要供給線。這正是俄方最擔心出現的局面，也正是尼古拉一世要在2月份下令對葉夫帕托里亞發動進攻的原因。他們知道自己的供給線很容易遭到攻擊，一直認為聯軍最有可能從葉夫帕托里亞出發進攻辛菲羅波爾或是彼列科普。俄軍后來都承認，他們很驚訝英法聯軍從未發動這一攻勢。[[21]](#_21_V__Rakov__Moi_vospominaniia)

在試圖切斷塞瓦斯托波爾供給線上，聯軍唯一一次真正的努力是對控制亞速海補給線的刻赤港發起進攻，不過即使是這次攻勢，也是通過兩次努力才最后實現的。進攻刻赤的計劃在克里米亞作戰之初就已經提出了，但是直到1855年3月26日，當潘穆爾勛爵勒令拉格倫組織“一次海陸作戰”以“破壞刻赤的防御”后，第一道命令才得以下達。這項計劃對英軍很有吸引力，至少皇家海軍可以一顯身手了。自開戰以來，皇家海軍一直無所作為，而此時英軍對戰事的貢獻正受到法軍的強烈質疑。康羅貝爾起初對此行動抱有疑慮，但是在4月29日，他同意派出一支由布呂阿上將（Admiral Bruat）率領的法國海軍中隊和八千五百名士兵加入遠征艦隊。指揮這支遠征艦隊的是輕步兵師的布朗中將，艦隊在5月3日起航，先是朝西北的敖德薩方向行駛以掩蓋真實目的，然后在海上掉頭駛向刻赤。但是就在艦隊即將抵達目的地之時，一條快船趕上了艦隊，送來康羅貝爾的命令，讓法國軍艦折返。原來就在遠征艦隊起航后不久，拿破侖三世通過新架設的電報向康羅貝爾發出命令，讓他將君士坦丁堡的預備隊調到克里米亞。這一調動需要用到布呂阿上將的海軍中隊，康羅貝爾雖不情愿，但還是決定讓法國軍艦從刻赤遠征艦隊中撤出。英國皇家海軍艦隊也因此被迫折返，康羅貝爾在英國人以及很多法國人眼中威信大跌。[[22]](#_22_WO_6_74__Panmure_to_Raglan)



佩利西耶將軍，羅杰·芬頓攝，1855（圖片來源：國會圖書館印刷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這一事件讓原本已經不佳的英法兩軍關系變得更為糟糕，康羅貝爾決定在5月16日辭職，這是很大一個原因。他覺得自己的權威遭到了削弱，他讓英軍失望了，因此再無力量迫使拉格倫執行野戰計劃。新任法軍總指揮是佩利西耶將軍（General Pélissier），他長得矮小粗壯，行為舉止粗魯豪爽，遠比康羅貝爾有決斷力，更是一個說干就干的人。康羅貝爾猶豫不決的性格，早就讓英軍起了外號“羅貝不能”（Robert Can’t）。佩利西耶的任命在英軍中受到熱烈歡迎，常駐法軍總司令部的英軍代表羅斯上校在給克拉倫登的報告中寫道，現在是需要“能做到”精神的時刻，而佩利西耶正是這么一個人。羅斯與康羅貝爾關系密切，因此他對佩利西耶的評述應該是真誠的：

佩利西耶將軍絕對不會允許誰在執行他命令時三心二意。如果能做得到的話，那就必須做到。他性格暴躁，舉止粗魯，但是我相信他是公正而真誠的。我相信在所有重要的事情上，他的這兩個品質將會比他暴躁的脾氣更為要緊。他思維敏捷，見識豐富，堅決果斷，面對困難時想的是如何克服，而不是因此退縮。[[23]](#_23_FO_78_1129_62__Rose_to_Clare)

雖然佩利西耶和拉格倫的觀點一樣，認為聯軍戰略的重點是塞瓦斯托波爾，但是他急于修復和英軍的關系，因此同意重新啟動對刻赤的行動。5月24日，在布朗的指揮下，六十條聯軍軍艦，載著七千名法軍、五千名土耳其士兵和三千名英軍出發了。當刻赤的居民看到聯軍艦隊到來時，大部分都逃到了鄉下。在短促的炮擊之后，聯軍沒有遭到抵抗就上岸了。在岸上，一支由剩下居民組成的代表團前來會見布朗，說他們非常害怕受到當地韃靼人的攻擊，請求聯軍保護他們，布朗對此不予理會。在下令破壞刻赤的軍火庫之后，布朗在這里留下了一支小分隊，主要由法軍和土耳其士兵組成，讓大部隊前進到海岸線上的要塞耶尼科萊（Yenikale）。在那里，就在布朗的眼皮底下，偷搶俄羅斯人財物的行為不斷發生。與此同時，聯軍軍艦進入亞速海，駛向俄羅斯海岸，消滅俄羅斯的運輸船，并炮擊破壞了馬里烏波爾和塔甘羅格兩個港口。[†††](#____Ya_Su_Hai_Hai_An_Xian_Shang)

在刻赤和耶尼科萊，搶奪俄羅斯人財物的行為很快變成醉酒胡鬧，聯軍士兵的一些暴行非常可怕。最惡劣的事件發生在刻赤，當地韃靼人借著聯軍占領的機會，對鎮里的俄羅斯人施以暴力報復。在土耳其士兵的協助下，韃靼人偷搶商店和民宅，強奸俄羅斯婦女，殺害并肢解俄羅斯居民，其中甚至還有兒童和嬰兒。暴力事件還包括對鎮上博物館的破壞，那里曾收藏著豐富華美的古希臘藝術品。《泰晤士報》記者羅素在5月28日報道了這些惡行：

博物館的地面上覆蓋了厚厚一層被打碎的玻璃、花瓶、甕、雕像、砸成粉的珍貴收藏品，以及燒焦的木頭和骨頭，混在一起的還有新近被砸碎的架子、桌子和箱子這些曾被用來保護藏品的東西。任何東西，只要還能被砸得更碎或被燒毀的話，都會毫無例外地成為錘子或火焰的犧牲品。

盡管布朗已經收到報告說有一些英法士兵參與了偷盜搶劫，但是過了好幾天他都沒有采取任何行動制止這些暴行。他把韃靼人視為盟友，認為他們的行為是針對俄羅斯統治的“合法反抗”。最后，在得知發生了更為惡劣的暴行之后，布朗派出了一小支部隊（僅由二十名英國騎兵組成）負責恢復秩序。他們人數實在太少，根本不可能起到什么實質性作用，不過他們的確向一些正在強奸婦女的英軍士兵開了槍。[[24]](#_24_A__Kinglake__The_Invasion_of)

根據俄羅斯目擊者的說法，參與偷搶、施暴和強奸的不僅有聯軍的士兵，還有軍官。“我看到幾個英國軍官正往船上抬家具、雕塑，還有其他各種從我們家園中搶來的東西。”一名刻赤的居民回憶道。幾名婦女聲稱他們曾遭到英國軍官強奸。[[25]](#_25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5)

\* \* \*

然而，沒過多久，所有這些擴大戰場的計劃全都暫停了，因為隨著春天的到來，英法聯軍的兵力再次被塞瓦斯托波爾圍困戰牽制，這里依然是聯軍作戰最重要的目標。盡管已經意識到需要改變作戰方案才能讓圍困成功，但是聯軍依然抱有幻想，以為只要發起最后一擊，塞瓦斯托波爾的城墻就會倒下，俄軍就會在羞辱之下接受和平。

在冬季的幾個月里，圍困戰進入了一段平靜時期，因為雙方都在集中力量加固自己的防御工事。在聯軍這邊，挖塹壕的工作主要由法軍承擔，主要原因是英軍陣地上巖石太多。根據法軍上尉埃爾貝的記錄，在長達十一個月的圍困戰期間，他們共挖出了六十六公里長的塹壕，而英軍只有十五公里。這是一項危險、緩慢、令人疲憊不堪的工作，必須在冰冷的氣溫下挖掘被凍得發硬的泥土，用炸藥炸碎地下的巖石，與此同時敵人的槍炮火力還會不斷襲來。“每挖一米的塹壕都會真的付出一個人，甚至經常是兩個人的生命。”法軍朱阿夫部隊的士兵努瓦爾回憶道。[[26]](#_26_J_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

俄軍在修筑防御工事上特別活躍。在工程天才托特列邊的指揮下，俄軍發展出了一套在圍困戰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尖端復雜的土工工事和塹壕系統。在圍困戰之初，俄軍的防御工事僅僅是匆忙中用柳條、柴束、石籠網加固的土木工程，但是在冬天的幾個月時間里，俄軍修建了更為牢固的新型防御工程，在棱堡中添加了炮位掩體以增強防衛能力。這些掩體在地下幾米深處，頂部覆蓋著從船上拆下來的厚重木條并蓋以土木，可以經受最猛烈的炮擊。在防衛最強的兩個棱堡，即馬拉霍夫和棱尖（第三棱堡）中，修建了迷宮似的掩體和房間。棱尖棱堡內的一個房間里甚至還有臺球桌和沙發椅，每個棱堡內都有一間小型的祈禱堂和一座醫院。[[27]](#_27_A_Visit_to_Sebastopol_a_Week)

為了保護這些重要的棱堡，俄軍又在城墻外修建了新的工事：馬拉霍夫棱堡前的“乳頭”堡（Mamelon）[‡‡‡](#_______Zhe_Shi_Fa_Jun_Gen_Ju_Qi)，俄軍稱之為堪察加弦月窗（Kamchatka Lunette），以及棱尖棱堡前的“采石坑”（Quarry Pits）。乳頭堡是由俄軍堪察加團（Kamchatka Regiment）修建的，在2月到3月初的修建過程中，幾乎每時每刻都面臨來自法軍的炮火。堪察加團的士兵陣亡人數之多，即使是借著夜幕掩護，都無法將尸體一一運回，于是許多陣亡士兵的尸體就留在土木工程之中了。乳頭堡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要塞系統，由一對被叫作“白色工程”（White Works）的土崗保護其左翼——土崗因為在修建挖掘時翻出了白色黏土而得名。法軍工兵亨利·盧瓦齊永描述了法軍在6月初占領乳頭堡后看到其內部結構時，戰友們的驚訝之情：

地面上到處都有厚木頭覆蓋的掩體，士兵可以在里面躲避炮火的襲擊。另外，我們還發現一間巨大的地下室，可以容納幾百人，所以他們遭受的損失遠比我們想象的要低。奇異的是這些掩體內的舒適程度讓人驚訝：有些床上有鴨絨被，還有瓷器、完整的茶具等等，所以這里的士兵待遇不是很差。還有一間祈禱堂，里面唯一一件異乎尋常的東西是一座非常精致的木制涂金的耶穌雕像。[[28]](#_28_M__Vrochenskii__Sevastopol_s)

因為忙于挖建工事，這期間沒有什么大的戰斗，但是俄軍還是對英法聯軍的塹壕發動了零星的襲擊。其中最大膽的幾次襲擊是由一個名叫彼得·科什卡（Pyotr Koshka）的水手指揮的，他的戰果為人所熟知，使其成了俄羅斯的民族英雄。聯軍不清楚俄軍這些襲擊到底用意何在，因為這不會對聯軍的防御工事產生長期破壞，而且對聯軍造成的傷亡也很小，通常是以俄軍自己的更大損失為代價的。埃爾貝認為這些襲擊的目的是讓聯軍士兵更加疲憊，因為經常在夜晚遭遇俄軍襲擊，這讓他們在塹壕里無法入睡，事實上這也正是俄軍的意圖。根據英國皇家工兵（Royal Engineers）惠特沃思·波特少校（Major Whitworth Porter）的說法，俄軍襲擊即將來臨的第一個征兆是“發現幾個灰蒙蒙的東西悄悄爬過塹壕的胸墻”。

警報立刻響起，瞬間他們就向我們撲來。我們的士兵分散四處，遭遇意外襲擊，在沖過來的敵人面前只得步步退讓，最后終于站穩腳跟，開始徒手搏斗。我們戰士的歡呼聲、叫喊聲、招呼聲；俄軍士兵憤怒的吼叫聲，就像被丑惡的精靈上身一樣，他們在發動進攻前一定已經被這些精靈弄瘋了；來復槍子彈尖利的響聲四處回蕩；急匆匆發布命令的聲音；俄軍的軍號聲在各種喧鬧聲中清晰地響起，催促進攻——所有這些聲音讓人產生一種眩暈的感覺，足以讓最堅強的神經迷茫。這樣的戰斗還可能發生在炮臺里，那里有無數的過道、大炮和其他障礙物，占滿了空間，讓雙方都難以運動，這一奇異的景象實在可以讓人浮想聯翩。或早或遲，一般也就是幾分鐘的時間，我方戰士就聚集了足夠多的人數，大膽向前沖去。敵人被趕了回去，越過胸墻逃跑。一陣齊射向他們追去，讓他們逃得更快了，然后就是洪亮的英式歡呼四處回響……[[29]](#_29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聯軍也會向俄軍外部據點發起突然襲擊，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占領這些位置，而是打擊俄軍士氣。朱阿夫部隊是執行這些突襲任務的最佳選擇，因為在徒手搏斗方面他們是世上最出色的。在2月23日晚、24日凌晨，負有盛名的朱阿夫第二團向“白色工程”發起沖鋒并短暫占領了這座剛剛修好的工事，目的就是為了向俄軍顯示法軍可以隨心所欲地占領他們的陣地。在這次沖鋒中有二百零三人受傷，六十二名軍官和士兵陣亡。撤退時朱阿夫部隊不愿把死傷戰友丟給俄軍，冒著猛烈的炮火，把他們都帶回了自己的陣地。[[30]](#_30_E__Boniface__Count_de_Castel)

和聯軍的突襲相比，俄軍發動的襲擊有些規模相當大，足以說明其意圖是將敵人從防守陣地上驅逐出去。但事實上，這些襲擊又不足夠強大，不可能實現這一意圖。在3月22日晚、23日凌晨，約五千名俄軍向乳頭堡正面方向的法軍陣地發起了襲擊，這是俄軍截至當時最大規模的進攻。承受最大沖擊的是朱阿夫第三團，他們與敵人徒手搏斗，堅守陣地。戰斗在黑暗中進行，來復槍和滑膛槍射擊時的火焰是唯一的亮光。俄軍發動側翼包抄，很快占領了處于他們右翼、防守薄弱的英軍陣地，從那里他們開始向法軍射擊。但是朱阿夫士兵依然堅守陣地，直到英國援軍趕到，協助他們將俄軍逐回乳頭堡方向。俄軍在這次襲擊中損失慘重：一千一百人受傷，另有超過五百人陣亡，幾乎所有傷亡都發生在朱阿夫部隊的塹壕里面或周圍。戰斗結束后，雙方同意停戰六小時，在這段時間內各自運回堆滿了戰場的陣亡和受傷官兵。于是幾分鐘前還在相互搏斗的官兵開始友好交流，用各種手勢和一兩句對方的語言表達自己的意思。幾乎所有的俄國軍官法語都說得很好，這是俄羅斯貴族使用的語言。第八十八步兵團（88th Regiment of Foot）[§§§](#SSSSSS_Ying_Jun_Zhong_De_Yi_Ge_A)的納撒尼爾·斯蒂文斯上尉（Captain Nathaniel Steevens）目睹了這一場景：

在這里，我們看到一群英國軍官和士兵正和一些打著停戰旗的俄國軍官和護衛兵混在一起，這是一幕讓人感到無限驚奇的景象。軍官們在一起聊得輕松歡快，仿佛是最親密的朋友，士兵們也一樣。那些五分鐘前還在相互對射的人，現在卻一起抽煙，分享煙葉，喝朗姆酒，問候恭維“英國人好”等等。俄國軍官看上去很有紳士風度，都說法語，一個會說英語。最后雙方看了看手表，發現“時間快到了”，于是各自退回工事，從對方的視野中消失，但在這之前我們的士兵都和俄軍戰士們握手告別，還有人用法語喊道“別了”。[[31]](#_31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e)

除了這些襲擊外，雙方在1855年最初的幾個月內都待在各自的工事里。“圍困戰現在已經是走走形式，”英軍參謀亨利·克利福德在3月31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們在白天射幾發炮彈，但是一切似乎都處于僵持的狀態。”這是一個奇怪的局面，幾乎表明聯軍已經對圍困戰失去了信心，因為其實還有大批炮火空閑著沒有派上用場。這段時間里士兵們用在挖掘工事上的時間比開火的時間多得多，許多士兵對此感到不滿。據皇家工兵惠特沃思·波特少校的說法，英國士兵不喜歡干“鐵鏟活兒”，認為那不是正經士兵的職責。他引用了一名愛爾蘭步兵的話說：

“長官，我不喜歡這種活。當我領餉當兵時，我想當一個真正的兵。讓我用刺刀的時候，我會用，但是我從沒想過會是這樣。長官，我報名參軍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我不喜歡干鐵鏟活兒，召我入伍的軍士以圣帕特里克（Saint Patrick）[¶¶¶](#PPP_Gong_Yuan_5Shi_Ji_Zhi_Ai_Er)的名字發誓說我再也不會見到一把鐵鏟了，但是我一到這兒，一支鐵鎬和一把鐵鍬就被塞到我手里，和在愛爾蘭老家一樣糟糕。”然后這名愛爾蘭步兵繼續干他的工作，牢騷不斷，嘴里罵著俄羅斯人，發誓如果能進入那座被他咒罵無數次的城市，一定會讓他們為所有這一切付出代價。[[32]](#_32_H__Clifford__Letters_and_Ske)

當圍困戰漸漸變成單調的日常互射之后，塹壕里的戰士們開始習慣在持續不斷的炮擊之下生活。在局外人看來，他們似乎對周圍的危險毫不在意。當二十二歲的法軍龍騎兵夏爾·米斯梅第一次來到塹壕時，他驚異地發現戰士們正在打牌或睡覺，而炮彈就在他們周圍紛紛落地。塹壕里的士兵已經學會了根據聲音辨別各種炮彈和炸彈，然后采取相應的躲避行動。波特回憶道，實心彈“穿過空中時會發出一聲銳利刺耳的尖叫，讓年輕戰士非常害怕”；霰彈“嗡嗡飛過，和一群急速扇著翅膀的鳥兒沒什么兩樣”；“花籃”是指裝在一個炸彈中的一組小榴彈，“每一顆都在飛行軌跡上留下一道長長的弧光，當它們抵達目標相繼爆炸時，會發出短促而顫動的閃光，照亮天空”；大型的迫擊炮彈“自豪地大模大樣地升向空中，燃燒的導火索留下明亮的痕跡，在夜晚時很容易看到。一道恢宏的弧光升入空中，在抵達最高點之后開始降落，越來越快，直到落地……發出的聲音從空中傳來，仿佛是田鳧嘰嘰喳喳的叫聲”。沒人知道迫擊炮炮彈會落在哪里，彈片會在哪里爆炸，于是“當聽到這樣像鳥叫的聲音時，你能做的就是臥倒在地，希望不會落在自己身上”。[[33]](#_33_C__Mismer__Souvenirs_d_un_dr)

慢慢地，當雙方都在圍困戰中無法取得什么進展時，交火成了象征性的行為。在無事可做的時候，當士兵們變得越來越無聊時，他們能把交火變成體育活動。朱阿夫部隊的一名上尉弗朗索瓦·盧格斯（François Luguez）回憶他手下的士兵是怎么和對面的俄軍玩射擊游戲的：一方會在步槍刺刀尖上綁一塊布伸出塹壕當靶子讓對方瞄準射擊，對方擊中了就發出一陣喝彩歡叫，沒打中就是一片噓聲。[[34]](#_34_F__Luguez__Crimee_Italie_185)

因為越來越沒什么可害怕的，前沿哨崗里的士兵開始摸到兩軍之間的無人地帶玩樂或是在晚上取暖。俄軍的前哨陣地不過就在一個足球場那么遠的地方，有時候聯軍士兵還會與俄軍進行友好交流。拉格倫的侄子和副官考爾索普記錄了這樣一個事件，當時有一群未帶武器的俄軍戰士向英軍哨位走來：

他們打著手勢表示想借個火抽煙斗，我們的一個哨兵給了他們火，然后他們停留了幾分鐘和我們的哨兵交談，或者說是試圖和我們的哨兵交談。雙方的對話差不多是這樣的——

俄軍士兵甲：“英國人好！”

英軍士兵甲：“俄羅斯人好！”

俄軍士兵乙：“法國人好！”

英軍士兵乙：“好！”

俄軍士兵丙：“奧斯曼不好！”

英軍士兵丙：“啊哈！土耳其人不好！”

俄軍士兵甲：“奧斯曼！”做了個鬼臉，然后向地上吐了口唾沫表示蔑視。

英軍士兵甲：“土耳其人！”假裝因為害怕逃跑，這時候所有人都狂笑起來，然后雙方握手之后，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崗位。[[35]](#_35_J__Cler__Reminiscences_of_an)

為了消磨時間，戰士們發展出各種愛好和游戲。年輕的俄軍炮兵軍官葉爾紹夫寫道，在塞瓦斯托波爾的棱堡里，“隨時都有人在玩各種各樣的紙牌游戲”。軍官們下棋或是貪婪地閱讀。在第六棱堡（Sixth Bastion）的掩體內，甚至還有一架三角大鋼琴，其他棱堡里會演奏樂器的將被請到這里舉行音樂會。“剛開始的時候，”葉爾紹夫寫道，“音樂會還是莊重的，有儀式感，遵守聆聽古典音樂會時應有的禮儀。但逐漸地，隨著我們情緒的變化，演奏得越來越多的是代表國家的樂曲、民間歌曲和舞曲。有一次還安排了假面舞會，一名軍校學員扮上女裝演唱了民歌。”[[36]](#_36_Ershov__Sevastopol_skie_vosp)

在法軍營地里，戲劇娛樂非常流行。朱阿夫部隊有一個自己的易裝雜耍團，在一間嘈雜的木屋里娛樂一大群亂哄哄的士兵。“想象一下，朱阿夫士兵扮成放羊女和士兵們調情！”法軍中的教士安德烈·達馬斯回憶道，“接著另一名朱阿夫裝扮成上流社會女子，表演不容易追求的女士！我從來沒見過這么好笑的場面和演技這么高超的紳士。他們真的太好玩了！”[[37]](#_37_Damas__Souvenirs__p__265)

賽馬也很流行，特別是在英軍中，他們的騎兵部隊幾乎完全沒事可做。但不是只有騎兵部隊的馬才參加賽馬。惠特沃思·波特少校參加了一場由第三師組織的在山坡上的賽馬。“今天非常寒冷，”他在3月18日的日記中寫道，

西風刺骨，然而賽道上依然擠滿了各支部隊的散兵。只要有辦法弄到一匹矮馬的都來了，大多數人看上去都很古怪。我看到一名英軍軍官，足足有六英尺三英寸[\*\*\*\*](#_____Yue_Yi_Mi_Jiu_______Yi_Zhu)高，穿著馬靴騎在一匹我見過的最矮小、最瘦弱、最可憐巴巴的矮馬上。[[38]](#_38_Porter__Life_in_the_Trenches)

在那些閑暇的日子里，部隊喝酒也喝得很厲害。在各支部隊中，飲酒都造成了各類問題：違反紀律、罵臟話、傲慢無禮、醉酒打架，還有不聽從指揮，所有這些都說明軍隊的士氣低落到了危險的程度。英軍在整個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一共有五千五百四十六人——占部隊總人數的八分之一——曾因各種醉酒行為被送上軍事法庭。這個數字非常驚人，但沒有理由認為俄軍和法軍的情況會比英軍好。許多士兵早餐就要喝一大杯酒——俄軍喝伏特加，英軍喝朗姆酒，法軍喝葡萄酒，然后晚餐時還要再喝一大杯。許多人白天也喝，有些人在整個圍困戰期間就沒有清醒過。各支軍隊中，喝酒是士兵們最大的娛樂，其中也包括土耳其部隊，他們喜歡的是甜甜的克里米亞葡萄酒。英軍參謀亨利·克利福德在回憶聯軍營地中的飲酒文化時寫道：

幾乎每個團都有一間食堂，在食堂的門口站著——不對，沒有幾個能站得住的——躺著或翻滾著一群法國和英國士兵，都處在不同程度的醉酒狀態。快活、歡笑、哭泣、跳舞、打架、傷感、親熱、唱歌、說話、爭吵、呆傻、兇惡、殘忍，所有人都醉得一塌糊涂。法國人和英國人一樣糟糕，英國人和法國人沒什么兩樣……多付給士兵軍餉是多么大的錯誤！多給他一個銅板，他馬上失守底線，立刻喝醉……不管是英國人、法國人、土耳其人還是撒丁人，只要給他足夠的錢，他馬上會把自己搞醉。[[39]](#_39_WO_28_126__Register_of_Court)

溫暖的春天忽然到來，提高了部隊的士氣。“今天這里是春天了，”埃爾貝在4月6日寫道，“過去三個星期一直出太陽，所有東西的面貌都發生了改變。”法軍士兵在帳篷周圍開辟了花園。許多人和埃爾貝一樣，把留了一個冬天的胡子刮干凈，清洗了床單，改善了穿著打扮，“如果塞瓦斯托波爾的女士們舉辦舞會邀請法國軍官參加，我們的軍裝在她們優雅的裝束間，依然能閃閃發光”。在嚴酷的冬天，一切似乎都被掩埋在泥濘和積雪之下，而現在克里米亞在一瞬之間變成了一個極為美麗的地方，草地上開滿了各色鮮艷的花朵，黑麥草長得有一米多高，到處都是悅耳的鳥鳴。“溫暖的天氣不過才幾天，”羅素在3月17日的《泰晤士報》上寫道，

然而在地面上，只要有機會發芽，到處都長滿了大量的雪花蓮、番紅花和風信子……燕雀和云雀度過了自己的情人節，依然成群結隊地在空中飛翔。有顏色非常鮮艷的金翅雀、體型龐大的頰白鳥、頭頂有一道金色的鷦鷯鳥、云雀、紅雀、鷚鳥、三種不同的山雀、籬雀、一種漂亮的鹡鸰，這些在切爾松尼斯（Chersonese）[††††](#_____Sai_Wa_Si_Tuo_Bo_Er_Fu_Jin)都很常見。在大炮轟鳴的間隙聽到鳥兒在叢林間嘰嘰喳喳地歌唱，在成堆的彈藥間、在炮彈和重型軍械下看到春天的花朵成群地鉆出來，讓人感覺奇異。[[40]](#_40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在英軍營地里，部隊的士氣還因為食品和其他基本物資供應的改善而有所提高，這主要應歸功于私人商貿的蓬勃發展。英國政府在軍隊供給上的嚴重失職，為商人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到了1855年春天，一大批商人在巴拉克拉瓦港附近的卡迪科伊村建起了各種售貨攤位和商店。雖然價格夸張，但是貨品豐富，從罐裝的肉類和腌菜、瓶裝啤酒和希臘清酒到烘烤好的咖啡、盒裝的阿爾伯特餅干（Albert biscuits）、巧克力、雪茄、化妝品、紙張、筆墨，應有盡有。高檔百貨公司奧本海默（Oppenheim）以及福特納姆和梅森都在這里開設了自己的分店，出售上好的香檳。這里有修馬鞍的、修鞋的、裁縫、烤面包的、開旅館的，其中包括著名的瑪麗·西科爾（Mary Seacole）。這個牙買加女人在卡迪科伊村附近一處被她稱作“春天山”（Spring Hill）的地方建起了一座“不列顛旅館”（British Hotel），提供豐盛的飯菜和招待服務，兼賣藥品并提供草藥治療等等。

瑪麗·西科爾是一個經歷傳奇的女人，她于1805年出生在牙買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父親是蘇格蘭人，母親是克里奧人（Creole）[‡‡‡‡](#_________Jia_Le_Bi_Hai_Di_Qu_Duo)。她本人曾在牙買加的英國軍營當過軍隊護士，并嫁給了一個姓西科爾的英格蘭人，但是丈夫在一年內就去世了。后來她在巴拿馬和自己的兄弟一起經營餐館和雜貨店，經歷了流行疾病的爆發。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初，她來到英國，希望加入南丁格爾的護士隊伍，但是多次被拒。毫無疑問，她的膚色是被拒的原因之一。但是她下定決心要開一家餐館和旅店，一邊賺錢一邊為戰爭服務。她和丈夫的一個遠方親戚托馬斯·戴（Thomas Day）一起開了一家名為“西科爾和戴”（Seacole and Day）的公司。他們于2月15日從英格蘭南部肯特郡的格雷夫森德（Gravesend）出發，在經過君士坦丁堡時采購了貨物，同時還雇了一個年輕的希臘猶太人，西科爾叫他“猶太人約翰尼”（Jew Johnny）。她開設的“不列顛旅館”雖然聽上去很宏大，但其實不過就是一間餐館和一間雜貨店而已，被《泰晤士報》記者羅素形容為“鐵皮棧房和木棚”。但是她的主要客戶、英國軍官們卻非常喜歡這里，將其當作軍官俱樂部，在此放縱一下并享受暖心的英國食物，回想家鄉的味道。[[41]](#_41_M__Seacole__Wonderful_Advent)

對普通士兵來說，在改善食品質量方面，瑪麗·西科爾和卡迪科伊的其他私人商販所做的貢獻，遠遠比不上著名廚師亞歷克西斯·索耶（Alexis Soyer）。索耶于1810年在法國出生，曾是倫敦改革俱樂部（Reform Club）的主廚，輝格黨和自由黨政府領導人都知道他。他所著的《先令烹飪書》（Shilling Cookery Book，1854）很出名，可以說每一戶致力于提升自己地位的英國中產階級家庭里都有一本。1855年2月，在看到斯庫臺醫院廚房條件惡劣的報道后，他給報社寫信，志愿前往克里米亞為英軍提供烹飪指導。他先到了斯庫臺，但很快就隨同南丁格爾一起來到了克里米亞。南丁格爾此行是為了訪問巴拉克拉瓦的醫院，但是她自己病倒了，情況嚴重，不得不返回斯庫臺。索耶接管了巴拉克拉瓦醫院的廚房，帶領一批法國和意大利廚師每天為一千人做飯。索耶的主要貢獻是把集中準備食物，再通過移動戰地食堂向士兵供餐的系統引進到英軍中來，而法國軍隊自從拿破侖戰爭時就開始采用這樣的系統了。索耶自己設計了野戰爐子，被稱為“索耶爐”（Soyer Stove），這種爐子英國軍隊直到20世紀下半葉還在使用。他讓人制作了四百只爐子，從英國運來，足夠為克里米亞的整個部隊煮食。他還建立了軍隊面包房，并開發出了一種不用發酵的面包，可以保存好幾個月。他為每支部隊都培訓了一個廚師，學會按照他的菜譜烹飪簡單但有營養的食物。索耶的天才體現在能把軍隊口糧配給變成能夠下咽的食物。他的特長是湯，例如下面這種湯可以供五十人食用：

1. 向鍋里加30夸脫的水，即7 ½加侖或者5 ½ 營地水壺的量；

2. 向水中加入50磅肉，可以是牛肉或羊肉；

3. 加入配給的蔬菜，可以是罐裝的或是新鮮的；

4. 10小茶勺鹽；

5. 小火煨3小時，即可食用。[[42]](#_42_A__Soyer__Soyer_s_Culinary_C)

英軍營地補給得到改善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建成了一條從巴拉克拉瓦到塞瓦斯托波爾外高地英軍裝卸場的鐵路。修建一條克里米亞鐵路，即歷史上第一條專為戰爭修建的鐵路的想法在上一年11月就已經提出了。當時《泰晤士報》首先報道了英軍的惡劣生活條件，很明顯一個主要問題是必須把所有物資從巴拉克拉瓦沿著泥濘的道路運到高地上。一名鐵路修建專家塞繆爾·皮托（Samuel Peto）看到了這些報道，他曾是倫敦一名成功的建筑承包商[§§§§](#SSSSSSSS_You_Pi_Tuo_He_Ta_De_Bia)，在1840年代進入修建鐵路這一行業。他從當時的首相阿伯丁勛爵那里得到了十萬英鎊的資金，采購了修建鐵路所需的物資并招募了一只龐大的施工隊，以不怎么守規矩的愛爾蘭勞工為主。他們在1月底抵達克里米亞，然后就開始飛快地施工，速度快到每天能鋪設半公里長的鐵軌。到3月底，連接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爾英軍營地裝卸場的十公里長鐵路就完工了。這時候剛好有一批重炮和迫擊炮炮彈運到，拉格倫下令將這些武器從巴拉克拉瓦運到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高地上，準備對塞瓦斯托波爾進行第二次大規模炮擊，時間定在4月9日，復活節星期一。[[43]](#_43_B__Cooke__The_Grand_Crimean)

\* \* \*

聯軍的計劃是對塞瓦斯托波爾進行連續十天的炮擊，然后發起進攻。到時候將有五百門英法聯軍的大炮不間斷地轟擊，幾乎是上一年10月第一次炮擊的兩倍。這不僅將是這次圍困戰中最大規模的炮擊，也將是當時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炮擊。聯軍部隊都急于盡快結束戰爭，因此對這次進攻抱有很大希望，焦急地等待進攻的開始。“我們的工作還在繼續，和過去一樣，但是我們沒有任何進展！”埃爾貝在4月6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軍官和士兵不耐煩的情緒制造了不滿的氣氛，每個人都相互責怪對方過去犯下的錯誤，你能感到現在需要一個全新突破才能重整秩序……不能再繼續這樣下去了。”[[44]](#_44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俄軍知道聯軍正在準備第二次大規模炮擊。聯軍中的逃兵向他們發出了警告，俄軍自己也能親眼看到敵人土崗上的忙碌景象，幾乎每天都有新的大炮出現。[[45]](#_45_RGVIA__f__481__op__1__d__18)在復活節星期天前夜，就在炮擊即將開始前幾個小時，塞瓦斯托波爾城里各座教堂都舉行了祈禱儀式。每座棱堡都進行了祈禱，教士們舉著神像在部隊面前走過，其中包括奉沙皇指令從謝爾吉耶沃鎮（Sergiev Posad）的特羅伊茨基修道院（Troitsky Monastery）送來的圣謝爾蓋（St Sergius）神像。這尊神像在羅曼諾夫王朝早期一直陪伴軍隊征戰，并在1812年和莫斯科民兵一起抗擊拿破侖軍隊入侵。每個人都能感到這些儀式的神圣和重要意義，聽天由命的情緒在城內的軍中蔓延。由于1855東正教和拉丁日歷的復活節剛好是同一天，于是交戰雙方都在紀念節日，更加強了這種氛圍。“我們熱切地祈禱著，”一名俄羅斯護士寫道，“我們使出所有的力氣祈禱，為這座城市，也為我們自己祈禱。”

在城市主教堂里舉行的午夜彌撒上，無數蠟燭把教堂和街道照得通明，即使在敵人的塹壕里也能看得到，龐大的人群一直蔓延到周圍的街道上，站在那里默默地祈禱。每個人手里都拿著一支蠟燭，時不時地低頭在胸口劃著十字，有許多人跪在地上。教士們舉著神像在人群中穿行，唱詩班在不停地誦唱。夜深時，一場狂烈的暴風雨降臨。大雨傾盆而下，但是沒有一個人走開，他們都把這場暴風雨看作上天顯靈。祈禱的人群一直待在雨中，直到清晨天邊第一道光線亮起，聯軍炮擊開始了，人群才四散而去，還沒來得及換下復活節穿的最好的衣服，就開始協助棱堡的防御。[[46]](#_46_V__Kolchak__Voina_i_plen_185)

根據惠特沃思·波特的記錄，早晨暴風雨愈加猛烈，以至于第一輪炮擊的聲音“幾乎被淹沒在呼嘯的強風和瘋狂落下的單調雨聲之中”。當時，他正從英軍駐守的高地觀察炮擊。塞瓦斯托波爾完全籠罩在炮火的黑煙和早晨的濃霧中，鎮上的人們無法分清炸彈和炮彈是從哪里飛來的。“我們知道就在港口入口外有一支龐大的聯軍艦隊，但是在濃煙和迷霧、狂風和大雨中，根本看不見它們。”葉爾紹夫回憶道。迷惘驚恐的人群在街道上呼叫狂奔，尋找可以躲藏之處。許多人涌向尼古拉要塞（Fort Nicholas），這個塞瓦斯托波爾唯一一處還算安全的地方此時變成了繁忙的避難所。在市中心，到處都是被炸毀的房屋，街道上堆滿了瓦礫和碎玻璃，加農炮彈就像“橡皮球一樣四處滾動”。葉爾紹夫留意到人們的各種細節：

一個生病的老人被兒子和女兒抱著穿過街道，加農炮彈和榴彈就在他們身邊炸開，一名年長的婦人跟在他們后面……一些年輕的姑娘穿著漂亮的衣服，靠在美術館的欄桿上，和駐守的驃騎兵眉來眼去。在他們旁邊，三個俄羅斯商人正在交談中——每當有炸彈爆炸，他們就在胸口劃個十字。“老天！老天！這比地獄還糟！”我聽到他們說。

在城內位于貴族議事廳的主醫院里，成千的傷員被送到那里，護士們疲于應對。在手術室里，皮羅戈夫和其他外科醫生在做截肢手術時，一面墻壁被炮彈擊中倒下，手術卻仍然繼續進行。聯軍并沒有試著避開醫院，他們的炮擊目標是不分軍事和平民的，在受傷者中，有許多是婦女和兒童。[[47]](#_47_Porter__Life_in_the_Trenches)

第四棱堡在整個圍困戰期間一直是最危險的地方。棱堡的炮臺指揮官之一利普金上尉在4月21日給他兄弟的信中寫道，這里的戰士在炮擊期間“幾乎沒睡過覺”。“我們最多可以穿著軍裝皮靴躺下睡上幾分鐘。”聯軍的炮臺離這里不過幾百米遠，炮聲連續不斷、震耳欲聾。炸彈和炮彈飛過來需要的時間非常之短，守軍還沒意識到危險它們就已經落地了，任何細小的差池都會帶來生命危險。生活在連續炮擊之下的人們產生了一種新的思想方式。葉爾紹夫本人是經驗豐富的炮兵，但是當他在炮擊期間造訪第四棱堡時，感覺自己“好像一個沒有經驗的游客踏足另一個世界”。“每個人都在跑來跑去，到處看上去都是一片混亂。我什么也不明白，什么也搞不清楚。”[[48]](#_48_Vospominaniia_ob_odnom_iz_do)

托爾斯泰在炮擊期間回到了塞瓦斯托波爾，他在十二公里以外的貝爾貝克河邊聽到了炮擊的開始，這年冬天他是在那里的俄軍第十一炮兵旅的營地上度過的。他已做出決定，自己為軍隊服務最好的方式是用筆，于是申請加入戈爾恰科夫將軍的參謀部做一名副官，好有機會寫作。但是讓他非常惱怒的是，他和所屬的炮兵連一起被調往了第四棱堡，直接置身于最激烈的戰斗中。“我特別窩火，”他在日記中寫道，“尤其是我現在病了（他患上了感冒）。好像沒有人想到讓我做什么都比當炮灰強，而且我當炮灰是最沒用的了。”

不過，一旦從感冒中恢復過來，他的精神就立即振作起來，開始喜歡上了自己的生活。每八天他都要在第四棱堡做四天的軍需官，其余的時間住在塞瓦斯托波爾城里主街邊的一處簡單但干凈的住宅里。執勤的時候，他必須睡在掩體內的一個小房間里，那里有一張行軍床，一張桌子上攤放著紙張、他的回憶錄《青年》（Youth）的手稿、一只鐘和一尊嵌有照明燈的神像。一根冷杉樹枝頂著天花板，上面掛著一塊篷布，可以擋住落下的瓦礫。他在塞瓦斯托波爾期間，一直有一個名叫阿列克謝（Alexei）的農奴陪著，從他上大學起阿列克謝就一直跟著他，這個農奴的形象以“阿廖沙”（Alyosha）為名，出現在托爾斯泰的幾部作品中。當托爾斯泰在棱堡執勤時，阿列克謝會把他的配給口糧從城里背過來，經常要冒著相當大的危險才能送到。[[49]](#_49_H__Troyat__Tolstoy__London)

聯軍的炮擊持續不斷，每天至少有兩千發榴彈落在第四棱堡。托爾斯泰感到害怕，但是他很快就克服了恐懼，在自己身上發現了新的勇氣。剛被派到棱堡時，他抱怨自己被當作炮灰，兩天后卻在日記中寫道：“因危險而產生的魅力持續不斷，可以就近觀察和我生活在一起的戰士們和水手們，還有作戰的各種具體細節，這一切如此讓人喜愛，讓我不想離開這里了。”他開始對棱堡里的戰友產生親密的關懷之情，其中之一后來在回憶托爾斯泰時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戰友”，他的故事“抓住了我們在戰斗緊要關頭的精神”。托爾斯泰在給他哥哥的信中表達了一種想法，這后來成為《戰爭與和平》的中心思想：和這些“淳樸而仁慈的人，這些在真正的戰爭中清楚展現善良之心的人”在一起，讓他“喜歡和他們一起在炮火下生活的經歷”。[[50]](#_50_Tolstoy_s_Diaries__vol__1__p)

在長達十天的時間里，聯軍的炮擊從未停止過。在這次大規模炮擊結束之后，俄軍清點出有十六萬枚炮彈和迫擊炮彈落在塞瓦斯托波爾，炸毀了幾百座房屋，共炸死炸傷四千七百一十二名士兵和平民。炮擊行動并非只是一面倒，俄軍投入了四百零九門大炮和五十七門迫擊炮反擊，十天內共發射了八萬八千七百五十一枚加農炮彈和榴彈。但是俄軍很快發現彈藥不夠，不能維持高強度的炮火回擊。炮臺指揮官收到命令，敵人每發射兩發炮彈才可以回擊一次。英國皇家炮兵（Royal Artillery）的愛德華·蓋奇上尉在4月13日晚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防守的頑強與進攻的猛烈不相上下，如果事情只靠才智和勇敢就能做到，那么俄軍一點都不比其他人差。但是不得不說他們的火力相對較弱，雖然他們還是讓我們的炮手吃了不少苦。我們比上次炮擊承受了更多的傷亡，但是我們這次有更多的戰士和炮臺參加作戰……我覺得炮擊不會再持續超過一天了，因為我們的戰士已疲憊不堪，自從炮擊開始以來，他們每十二小時輪班待在塹壕里，憑著血肉之軀是不可能再支持多久了。[[51]](#_51_Vrochenskii__Sevastopol_skii)

俄軍火力的減弱讓聯軍取得了主動權，炮擊密度越來越高。乳頭堡和第五棱堡幾乎完全被摧毀。俄軍預期聯軍馬上會發起進攻，急切地增援兵力，并讓大部分士兵藏在地下掩體內，準備伏擊沖過來的敵人。但是敵人卻一直沒有出現。也許俄軍頑強勇敢的抵抗讓聯軍指揮官氣餒，因為俄軍士兵即使在猛烈的炮擊下，依然繼續重修被炸毀的工事。但是聯軍內部對下一步行動也有分歧，就是在這段時間里，康羅貝爾公開表達了他的挫敗感。他支持聯軍的新戰略，就是減少對塞瓦斯托波爾的炮擊，轉而集中力量占領整個克里米亞。因此他不愿意投入兵力攻城，因為知道這樣會造成大量傷亡，還不如把這些兵力用在新的野戰方案上。他的手下、法軍工兵總指揮阿道夫·尼埃爾將軍（General Adolphe Niel）也進一步勸說他暫緩進攻。尼埃爾收到了來自巴黎的秘密指令，讓他拖延攻城計劃，等待拿破侖三世的到來。當時這位法國皇帝還在考慮前往克里米亞，拖延下去就能讓他親自指揮攻城戰。

因為不愿意獨自發動大型攻勢，英軍選擇了在4月19日晚向沃龍佐夫山溝東頭的俄軍來復槍陣地發起進攻，俄軍的這個陣地阻擋了英軍，使其無法繼續向棱尖棱堡挺進。在與守備的俄軍激烈交戰之后，第七十七團占領了這個陣地，但同時也付出了代價。團長托馬斯·埃杰頓上校（Colonel Thomas Egerton）和他的第一副手、二十三歲的奧德利·倫普里爾上尉（Captain Audley Lemprière）都在戰斗中陣亡。埃杰頓上校是一個兩米多高的巨人，而倫普里爾上尉身高不足一米五。納撒尼爾·斯蒂文斯目睹了戰斗經過，在4月23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我們損失嚴重，六十名士兵和七名軍官死傷，其中第七十七團的埃杰頓上校（一個高大強壯的人）和倫普里爾上尉都陣亡了。倫普里爾上尉非常年輕，剛剛被派到連隊里，大概是整支軍隊中個頭最矮小的軍官，極受埃杰頓上校喜愛，被他稱作自己的孩子。可憐的人，在向來復槍陣地發起的第一波進攻中就陣亡了。埃杰頓上校雖然自己也受了傷，但還是一把將他抓起并背了回來，同時喊道：“我的孩子永遠不會落在他們手里。”上校接著返回戰斗，在第二波進攻中陣亡了。[[52]](#_52_J__Jocelyn__The_History_of_t)

當時，在沒有法軍配合的情況下，這也就是英軍獨立所能實現的最大軍事目標了。4月24日拉格倫向戰爭大臣潘穆爾勛爵報告：“我們必須說服康羅貝爾將軍攻下乳頭堡，不然我們向前推動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或是獲得安全保障。”對法軍來說，清除乳頭堡內的俄軍對進攻馬拉霍夫棱堡非常關鍵。同樣，對英軍來說，只有占領了“采石坑”才有可能進攻棱尖棱堡。在康羅貝爾的指揮下，法軍行動被推遲了。但是他在5月16日把指揮權交給了佩利西耶，這名法軍新任總指揮和拉格倫想法一樣，決心一舉攻克塞瓦斯托波爾。在他的指揮下，法軍全力投入了對乳頭堡和“采石坑”的聯合進攻。

聯合進攻在6月6日開始，先是對敵人的外圍陣地進行炮擊，一直延續到第二天晚上六點，這正好是步兵進攻開始的時間。根據計劃，拉格倫和佩利西耶將在戰場上碰頭，然后分別發出進攻信號。但是在事先約定的時間已到時，佩利西耶卻還在睡覺。他原來想著可以在戰斗打響之前先打個盹，但是時間到了卻沒有人敢去叫醒這位脾氣暴躁的將軍。結果他遲到了一個小時，戰斗已經開始了——法軍首先發起突擊，英軍在聽到法軍歡呼聲后，也立即發動了進攻。[¶¶¶¶](#PPPP_You_Yi_Ju_Zhu_Ming_De_Hua)法軍進攻的號令是由博斯凱將軍發出的，范妮·杜伯利也在他的隨行人員中：

博斯凱將軍向每個連隊訓話，每次說完，部隊的反應都是歡呼、叫喊、不約而同地歌唱。從士兵們的情緒和動作上看，他們更像去參加一場婚禮而不是馬上要投入生死搏斗。在我看來，這是一幅多么悲壯的景象！大部隊開始向前移動，列隊走下山溝，穿過法軍炮臺，正對著乳頭堡。博斯凱將軍轉過身來，眼中滿含淚水，對我說：“夫人，巴黎只知道展覽、舞會和慶典；但是到一點半的時候，這些勇敢的人中，一半將已戰死。”我實在無法忍住眼中的淚水。[[53]](#_53_Mismer__Souvenirs_d_un_drago)

法軍在朱阿夫部隊的帶領下一股腦地向乳頭堡沖去，完全沒有秩序，俄軍一陣巨大的排炮把他們打退了回來。許多士兵在恐慌中四散奔跑，不得不依靠軍官讓他們重新歸隊，再度進攻。這一次，進攻者冒著敵人滑膛槍的火力沖到了乳頭堡底下的壕溝，開始往墻上爬；俄軍在墻頂居高臨下射擊，因為沒有時間給滑膛槍重裝彈藥，就搬起胸墻上的石頭往下砸。“墻壁有四米高，”參與了第一波進攻的奧克塔夫·屈萊特（Octave Cullet）回憶道，“爬起來很困難，而且我們沒有梯子，但是我們的氣概無人能擋。”

一個墊一個，我們爬上了外墻，打退了胸墻上的敵人，向守衛土崗的大批敵軍猛烈開火……接下來發生的事情我實在無法描述，那是一幅殘酷殺戮的景象。我們的戰士打起來像瘋子一樣，堵塞了敵人大炮的點火孔，一些敢于和我們對抗的俄軍都被我們殺死了。[[54]](#_54_M__O__Cullet__Un_regiment_de)

攻上乳頭堡后，朱阿夫部隊沒有停留，而是繼續向后方的馬拉霍夫棱堡沖鋒，這是士兵們在殺得興起時的自發舉動，但是沖鋒的法軍士兵成百成百地被俄軍擊倒。英國皇家炮兵的圣喬治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St George）目睹了這一可怕的場景，他在6月9日的一封信中描述道：

然后馬拉霍夫塔樓開火了，其規模之大，我以前從未見過：成片的火焰，連續的爆炸，一個緊接著一個。俄軍的大炮操作得非常好（這是我的本行，我能判斷），如同魔鬼一般地向可憐的小朱阿夫戰士們開火。這些士兵憑著膽量沖到了馬拉霍夫跟前的壕溝邊，卻沒有辦法越過去，正在猶豫不決時，就被俄軍擊倒。他們實在頂不住了就開始動搖，撤回到乳頭堡內，而這時候他們也都不敢待在那里，直接撤回到自己的塹壕里。大批的增援部隊來了，他們再次沖入乳頭堡，俄軍大炮的點火孔已經被堵住，他們殺死了剩下的守軍。然后，他們又一次向馬拉霍夫沖過去，這在我看來很是愚蠢。這一次他們又失敗了，不得不撤退，但是這次只撤退到乳頭堡內。法軍憑借可嘉的勇氣攻下了乳頭堡，而且終于把它守住了，但是在戰場上留下了兩三千名死傷的戰士。[[55]](#_55_NAM_1974_05_16__St_George_le)

與此同時，英軍向采石場發起了進攻。俄軍在采石場陣地只留下了小股部隊防守，相信一旦被敵人占領，他們可以立即從棱尖棱堡發動反沖鋒奪回陣地。英軍輕而易舉地奪下了采石場，但是立刻發現自己兵力不足，抵擋不住俄軍從棱尖棱堡發動的一波又一波反擊。在幾個小時里，雙方一直都在進行白刃戰，當一方把另一方逐出陣地后，馬上就被對方增援部隊的反沖鋒趕了回去。直到凌晨五點，英軍才打退了俄軍的最后一次反擊，在戰場上留下了成堆的死傷者。

6月9日中午，一面白旗在俄軍的馬拉霍夫要塞上升起，接著另一面白旗也在已被法軍占領的乳頭堡升起。雙方發出了停戰信號，各自運回戰場上的死傷者。為了攻占乳頭堡和“白色工程”，法軍付出了巨大的犧牲，死傷者幾乎達七千五百人。埃爾貝上尉和法伊將軍（General Failly）一起來到雙方陣地間的無人地帶，與俄軍波盧斯基將軍（General Polussky）達成停戰安排。在幾句走形式的話之后，“雙方的談話變得友好起來——話題是巴黎、圣彼得堡、上一年冬天的艱苦等等”，埃爾貝當晚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當尸體被清理走之后，軍官們之間“互贈雪茄”。埃爾貝寫道：“不知內情的人看到這一景象，可能會以為是幾個朋友在打獵間隙聚在一起抽煙。”沒過多久，幾名軍官拿來了一大瓶香檳，這是法伊將軍的指令，他還提議“為和平干杯”，俄軍軍官們誠心接受。六個小時過后，幾千具尸體被清理干凈，停戰即將結束。在雙方各自檢查沒有在無人地帶留下自己的戰士后，兩面白旗降了下來。根據波盧斯基的建議，俄軍從馬拉霍夫要塞發射了一枚空包彈，這是雙方恢復交戰狀態的信號。[[56]](#_56_A__du_Casse__Precis_historiq)

在占領了乳頭堡和“采石坑”之后，向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發起進攻的條件都具備了。聯軍定下的進攻日子是6月18日，滑鐵盧戰役四十周年。聯軍指揮部希望勝利將會彌合英法兩國過去的對立，讓這一天成為一個新的值得紀念的日子。

取得軍事勝利的代價必然是犧牲許多人的生命。要攻占俄軍要塞，進攻者必須扛著梯子，在上坡路上沖過幾百米的開闊地，其間要冒著來自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猛烈炮火，越過壕溝和鹿砦[\*\*\*\*\*](#______Lu_Zhai_Shi_Yi_Xie_Liang_M)，同時還要遭受來自側翼旗桿棱堡的火力。當他們沖到要塞跟前時，必須沿梯子爬下壕溝，然后再從壕溝底部爬上棱堡外墻，此時敵人將居高臨下從近距離向他們開火。如果能爬上城墻，還必須擊退胸墻上的守軍，頂住躲在要塞各處障礙物后面的大批俄軍的反撲，直到己方增援部隊到達。

聯軍同意法軍首先向馬拉霍夫發起進攻，一旦他們打啞了俄軍炮火，英軍步兵將立刻開始向棱尖棱堡沖鋒。在法軍總指揮佩利西耶將軍的堅持下，攻勢將只限于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而不包括塞瓦斯托波爾的其他防御工事。其實向棱尖棱堡發起進攻可能是多此一舉，因為一旦法軍占領了馬拉霍夫要塞、把自己的火炮運到那里并開始炮擊，俄軍幾乎肯定會放棄棱尖棱堡。但是拉格倫認為非常有必要讓英軍找一個目標發起沖鋒，即使這意味著不必要的損失，因為如果要讓這次攻勢實現其象征意義，即英法聯軍在滑鐵盧戰役紀念日攜手行動、共同取得勝利，這樣做是必需的。法國人一直對英軍在克里米亞沒有對等的投入持批評意見。

聯軍預計這次進攻會帶來巨大的人員傷亡。法軍被告知在向馬拉霍夫發起沖鋒時，有一半人在到達要塞之前就會被打死。士兵們要拿到賞金和升官機會才愿意參加第一波進攻。在英軍營地里，參加沖鋒的人被叫作“渺茫的希望”（Forlorn Hope），這個詞源自荷蘭語的Verloren hoop，意思實際上是“損失的部隊”。英國人雖然翻譯有誤，意思卻很傳神。[[57]](#_57_Cullet__Un_regiment__p__182)

在向馬拉霍夫發起進攻的前一天晚上，法軍士兵在露營地休整，每個人都在為第二天的戰斗做準備，有些試圖睡一會兒，另一些在清洗槍支，或是自言自語，還有一些找個僻靜的角落祈禱。一種不祥的預感籠罩在營地里，許多戰士把自己的姓名和家庭地址寫在一張卡片上掛在脖子上，這樣如果他們戰死了，別人還能通知他們的家人。另一些給親朋好友寫信告別，把信件交給隨軍神父，如果他們戰死就讓神父寄出去。隨軍神父安德烈·達馬斯身邊有一個大大的郵袋，他對士兵在大戰來臨前的最后時刻還能保持冷靜感到欽佩。在他看來，似乎沒有幾個人對俄羅斯人懷有強烈的仇恨，或是急于報復對手。一名戰士寫道：

我冷靜而自信——我為自己感到驚訝。在這樣的危險面前，我只敢把這一心思告訴你，我親愛的兄弟。如果告訴任何其他人，就會顯得傲慢了。為了有力氣，我吃了些東西，戰場上我只喝水，不喜歡因為喝酒搞得過于興奮，這沒什么好處。

另一名士兵寫道：

我在給你寫這封信的時候，已經能聽到召集戰斗的聲音了。偉大的日子到來了。兩小時以后我們將開始進攻。我虔誠地佩戴著圣母的徽章，穿著修女們送給我的披肩。我覺得很冷靜，跟自己說上帝一定會保佑我的。

一名上尉寫道：

讓我握你的手，我的兄弟，我想讓你知道我愛你。上帝啊，憐憫我吧。我虔誠地把自己交給你——我的命運由你而定！法蘭西萬歲！今天我們的雄鷹必須在塞瓦斯托波爾上空飛翔！[[58]](#_58_Cullet__Un_regiment__pp__278)

并不是所有的準備工作都如聯軍所愿。那天晚上，法國和英國營地上都有逃兵，其中不僅有士兵，還有軍官，因為不敢面對即將來臨的沖鋒而投奔了敵人。一名法軍總參謀部的下士給俄軍送去了一份詳細的法軍進攻計劃，讓俄軍事先就對進攻方案了如指掌。埃爾貝寫道：“俄羅斯人知道我們每個營的詳細位置和實力”，他是后來從一名俄軍高級軍官那里了解到這一情況的。俄軍還從英軍逃兵中收到警告，其中一名是從第二十八（北格洛斯特郡［North Gloucestershire］）團逃出來的。但是即使沒有這些警告，俄軍也已經因為17日晚英軍陣地上嘈雜的備戰工作而提高了警惕。第十四團的詹姆斯·亞歷山大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James Alexander）回憶道：“士兵們因為過于興奮而無法入睡，我們在午夜時分收到命令躺下。我們的營地看上去就像游樂場一樣，照得亮堂堂的，到處都是說話的嗡嗡聲。俄羅斯人一定已經注意到了。”[[59]](#_59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俄軍確實注意到了。棱尖棱堡指揮官戈列夫將軍（General Golev）的勤務兵波普羅科菲·帕德羅夫（Prokofii Podpalov）回憶他當晚曾注意到采石場陣地上不斷加強的備戰行動：“塹壕里的說話聲、腳步聲、炮架輪子向我方滾來的隆隆聲”，這些動靜“清楚地顯示聯軍正在準備發動進攻”。那時候俄軍正在讓駐守棱尖棱堡的部隊撤出，士兵們將在城內過夜。在注意到英軍即將發起進攻的種種跡象后，帕德羅夫下令所有部隊馬上返回棱尖棱堡，架好加農炮，在胸墻上的防守崗位待命，等待敵人進攻的開始。“那如同墓地般的寂靜隱含著一種險惡的感覺：每個人都覺得有一個可怕的東西正在向我們逼近，這個東西強壯而危險，我們將與之進行一場生死搏斗。”[[60]](#_60_V__Liaskoronskii__Vospominan)

法軍本預定天不亮就開始進攻，在凌晨三點將開始三個小時的炮擊，然后步兵在日出后一個小時、早上六點鐘的時候向馬拉霍夫發起沖鋒。但是在17日晚，佩利西耶忽然改變了計劃。他認為，日出之后俄軍不可能不注意到法軍在準備進攻，一定會將預備隊派上來守衛馬拉霍夫，給法軍的攻勢帶來更多困難。于是他在深夜發出了一項新的命令，把步兵沖鋒時間提前了三個小時，在凌晨三點就向馬拉霍夫發動進攻，法軍指揮部將在乳頭堡后方的維多利亞土崗（Victoria Redoubt）向天空發射一枚火箭作為步兵進攻的信號。當晚的臨陣變化還不止于此，狂怒之下，同時也是為了獨攬功勞，佩利西耶解除了博斯凱的職務，理由是博斯凱對新的作戰計劃中沒有向敵人陣地進行炮擊就讓步兵沖鋒的方案提出了質疑。博斯凱對俄軍位置有非常詳細的了解，而且深受士兵愛戴，而他的接替者這兩項品質都不具備。這些突然的變化讓法軍部隊感到不安，即將率領第九十七團發起進攻的邁朗將軍（General Mayran）對此最為焦慮。他曾在另一次爭執中被暴躁的佩利西耶當面羞辱，怒氣沖沖地走開回到自己的崗位，丟下一句話：“現在沒什么可做的了，就只有等死。”[[61]](#_61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p__1)

但當天法軍的攻勢中，在急切中犯下致命錯誤的卻正是邁朗將軍，他誤把一顆榴彈的彈尾火焰當作了步兵沖鋒的信號火箭，下令第九十七團提前十五分鐘發起了沖鋒，而當時法軍其他部隊還沒有為沖鋒做好準備。埃爾貝當時和第九十五團在一起，集結在第九十七團后方作為第二梯隊，他就在邁朗將軍身后的位置。根據埃爾貝的說法，稍早時候邁朗受到了另一個事件的刺激：在凌晨兩點過后，兩名俄軍軍官悄悄爬到法軍塹壕，在黑暗中喊話。

“來吧，法國先生們，你們什么時候準備好，我們都會等著。”我們非常吃驚，顯然敵人已經知道我們所有的計劃，我們將面對的是一支準備充分的守軍。邁朗將軍對這一膽大妄為的挑釁極為憤怒，準備一看到沖鋒信號就立即進攻……所有人的眼睛都盯著維多利亞土崗。忽然間，大約在離三點鐘還有十五分鐘的時候，一道炮彈的尾光閃過，伴著一陣煙霧。幾名圍在邁朗身邊的軍官喊道“這就是信號”。很快又出現了第二道炮彈尾光。“毫無疑問，”將軍說道，“這就是進攻信號。再說，早出發總比遲到好。第九十七團，前進！”

收到命令后，第九十七團向前沖去，俄軍致命的炮火加上滑膛槍的火力向他們齊齊射來。俄軍當時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躲在每一道胸墻后等待法軍。“忽然間敵人像一陣巨浪般向我們沖來”，帕德羅夫回憶道，他當時正在棱尖棱堡上觀戰。

很快，在昏暗的光線中，我們僅能分辨出敵人扛著梯子、繩子、鐵鏟、木板等等……看上去就像螞蟻大軍在向前運動，越靠越近。忽然，我們整條防線上軍號齊鳴，隨后是加農炮的轟鳴、步槍的射擊。大地都在顫抖，周圍全都是大炮雷鳴般的回響，炮彈爆炸時濃煙四起，一切都變得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當煙霧散去后，我們看到在面前的空地上，躺滿了倒下的法軍尸體。

邁朗本人在第一波沖鋒時也被炮火擊中。埃爾貝把他從地上扶了起來，雖然手臂嚴重受傷，但他拒絕撤退。“第九十五團，前進！”他向第二波部隊發出了命令。增援部隊向前沖鋒，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大批士兵被俄軍炮火擊倒。這不是戰斗，而是一場屠殺。進攻隊伍本能地臥倒在地，沒有聽從邁朗發出的前進命令，而是開始與俄軍展開槍戰。二十分鐘之后，戰場上已滿是同伴的尸體，這時法軍官兵看到一支信號火箭升上天空：這才是真正的沖鋒信號。[[62]](#_62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佩利西耶命令發射信號火箭，急切地試圖協調法軍的進攻。但是如果說邁朗下令發起沖鋒太早，其他法軍將領則剛好相反，他們的準備工作遲了，因為他們預計進攻時間還要更晚一些，所以沒能按時調配好部隊。仍然集結在預備隊位置的部隊忽然被命令向前沖鋒，讓士兵們感到不安。根據法軍政治部德桑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Dessaint）的說法，許多人“拒絕離開塹壕，即使軍官們威脅會對他們施以最嚴厲的懲罰”，他認為士兵們“對等待他們的災難有一種本能的預感”。[[63]](#_63_Boniface__Campagnes_de_Crime)

在沃龍佐夫山脊上觀戰的拉格倫很快看出法軍協同混亂，這場進攻將是一場災難。一支法國部隊在馬拉霍夫左側取得了突破，但是他們的支援部隊卻被來自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炮火打垮了。拉格倫這時可以根據聯軍原來的作戰方案，先對棱尖棱堡進行炮擊，然后發起步兵沖鋒；但是他覺得基于責任和榮譽，必須放棄炮擊，立刻下令向棱尖棱堡發起沖鋒，雖然他肯定知道，即使僅從剛剛發生在法軍身上的情況判斷，這樣做也只會導致一場災難，無謂地犧牲士兵的性命。“我總是警惕著不讓自己被迫必須和法軍同時沖鋒，我希望在我投入部隊前，法軍已經取得了成功，”拉格倫在6月19日向戰爭大臣潘穆爾寫道，“但是當我看到他們正遭遇頑強抵抗時，我認為作為一種義務，我必須立刻發起沖鋒來協助他們……有一點我很肯定，那就是如果我們的部隊這時依然留在塹壕里，法國人一定會將他們未取得成功的原因歸咎于我們拒絕加入作戰。”[[64]](#_64_Kinglake__Invasion_of_the_Cr)

英軍的沖鋒在五點半開始。攻擊部隊從采石場兩側的塹壕出發，扛著梯子的支援部隊緊隨其后，準備爬上棱尖棱堡的外墻。然而很快戰場形勢就十分清楚了：這一攻勢毫無成功希望。“士兵們剛剛從塹壕的胸墻上冒出頭來，就遭到一陣我所見過的最具殺傷力的霰彈的攻擊。”負責指揮進攻的喬治·布朗爵士后來報告。俄軍的第一輪齊射就打掉了英軍三分之一的沖鋒部隊。在左側陣地的塹壕里，科德林頓少將觀察到，對那些試圖穿過兩百米開闊地帶沖向棱尖棱堡的部隊來說，俄軍連串霰彈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他們剛一現身，霰彈就向他們飛來。除了打倒很多士兵外，霰彈還砸開地面，激起沖天塵土，讓士兵們什么也看不見。我看到許多人轉向他們左側的塹壕。軍官們事后告訴我，他們被霰彈掀起的塵土蒙住了雙眼；其中一個告訴我，還沒有沖過一半的距離，他就被塵土弄得喘不過氣來。[[65]](#_65_A__Massie__The_National_Army)

被漫天的霰彈所壓制，攻擊部隊的決心開始動搖。即使軍官們還在呼喝威脅，試圖把士兵重新組織起來，還是有一些被嚇破膽逃跑了。終于，第一波進攻者和抬梯子的支援部隊中有一些沖到了俄軍設置的鹿砦位置，這里離棱尖棱堡僅有三十米遠。但當他們掙扎著從鹿砦之間的縫隙里穿過時，俄軍“在棱堡胸墻上向我們一輪又一輪地展開齊射”，蒂莫西·高英（Timothy Gowing）回憶道：

他們升起一面巨大的黑旗，嘲笑地讓我們上去。戰場上，可以聽到有人在喊“謀殺”，因為當我們的同伴已經受傷倒地，在血泊中痛苦地扭動時，怯懦的敵人卻在幾個鐘頭內一直繼續向他們開火。我們的一些軍官說：“他們不能這樣干——我們要讓他們為此付出代價！”如果他們沒有對著那些無力還手的可憐傷員開槍的話，我們還會饒恕他們的。

沖鋒部隊人數越來越少，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他們開始違抗命令后撤。軍官們威脅說要槍斃逃跑的人，但是無人理會他們。根據一名當時仍然在催促士兵繼續進攻的軍官的說法：“他們相信只要再往前走一步，就會被炸飛到空中。他們說，不管敵人有多少他們都愿意作戰，但是不愿意再往前走被炸死。”[[66]](#_66_T__Gowing__A_Soldier_s_Exper)英軍部隊中有個廣為流傳的謠言，說棱尖棱堡前是埋了地雷的。

與此同時，英軍第三師的兩千名士兵在艾爾少將（Major-General Eyre）的率領下從左翼突進了塞瓦斯托波爾郊區。他們收到的命令是占領一些俄軍來復槍陣地，然后如果英軍對棱尖棱堡的進攻順利，則繼續往“哨兵屋山溝”（Picquet House Ravine）進發。但是艾爾超越了他收到的指令，擅自讓其部隊繼續前進，打退了駐守在墓地的俄軍，抵達塞瓦斯托波爾街頭，卻在那里遭到了俄軍炮火的猛烈攻擊。據第九團的斯科特上尉（Captain Scott）回憶，他們被困在一個“死胡同”里，“我們既不能前進也不能后撤，不得不從上午四點到晚上九點一直守在這里。在這十七個小時里，我們遭到了各種實心彈、榴彈、霰彈、榴霰彈，再加上幾百個俄軍狙擊手的襲擊，唯一的掩護是被打爛的房屋，每被打中一次就坍下一片”。與此同時，據第十四團亞歷山大中校的說法，對某些部隊來說，向城里進攻變成了某種發泄的機會，一些愛爾蘭士兵“沖進塞瓦斯托波爾的一些地方，跑進民宅，在女人們面前搶走了圖畫、桃花心木、家具和鋼琴，他們還搞到了烈性葡萄酒……有些愛爾蘭小年輕穿上女人的衣服接著戰斗，有些還帶回了放大鏡、桌子和一把長著醋栗的灌木！”但是對于其余的部隊來說，在斷壁殘垣里躲避敵人的槍炮襲擊，這一天過得并不歡樂。只有當夜幕來臨時，他們才能夠撤退，把幾百名受傷的戰友也帶了回來。[[67]](#_67_NAM_1966_01_2__Scott_letter)

第二天早晨，雙方再次宣告停戰，從戰場上清理死傷人員。這場戰斗的死傷人數非常多，英軍死傷了約一千人，法軍損失的人數是這個的六倍，不過確切的數字被當局壓下不報。一名朱阿夫部隊上尉被派往無人地帶清理尸體，他在6月25日的家信中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景象：

我不會告訴你當我來到那片戰場時的恐怖感覺，到處都是尸體，在炎熱的天氣下已經開始腐爛，我認出其中一些是我的戰友。有一百五十名朱阿夫戰士和我在一起，我們抬著擔架，身上的酒壺里裝著葡萄酒。醫生讓我們先照顧那些受了傷還能被救活的。我們找到很多這樣不幸的人，他們都向我們要水喝，我的朱阿夫士兵就給他們喝酒……到處都是難以忍受的腐爛味道，朱阿夫士兵們不得不用手絹掩住鼻子，才能繼續抬走死尸。在擔架上，死人的頭顱和腳就這么晃著。[[68]](#_68_Luguez__Crimee_Italie__pp__4)

邁朗將軍也在陣亡者之列。佩利西耶在向拿破侖三世匯報時，把失敗的責任全部推到邁朗頭上。但事實上，佩利西耶本人至少應該為他臨陣改變作戰方案負責。拉格倫肯定認為佩利西耶應負主要責任，不僅因為他改變了計劃，而且因為是他決定將進攻局限在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如果聯軍發動全面進攻，也許能達到分散俄軍力量的目的。他相信佩利西耶做出這個決定的原因是擔心法軍士兵會在城里“亂來”，他在給潘穆爾的信中詳細說明了這一點。

不過毫無疑問的是，拉格倫對佩利西耶的批評帶有某些主觀色彩，他自己也在為無謂地犧牲這么多英軍戰士而感到負疚。根據他的一位醫生的看法，在這次進攻失敗后，拉格倫陷入了深深的抑郁中。當他在6月26日病危時，病因不是謠傳的霍亂，而是“一種劇烈的精神煎熬，先是出現了嚴重的抑郁，接著是心臟功能的完全衰竭”。[[69]](#_69_NAM_1968_07_287_2__Raglan_to)他死于6月28日。

[\*](#_108) 1857年他和弗洛倫絲·南丁格爾的姐姐帕爾特諾普·南丁格爾（Parthenope Nightingale）結婚，一直和前者保持著密切聯系。——原注

[†](#_109) 不要跟沙皇的軍事總指揮米哈伊爾·戈爾恰科夫混淆。——原注

[‡](#_110) 赫伯特在辭去殖民地事務大臣之前的幾個星期，遭到了英國報刊苛刻和帶有排外主義的攻擊，對他的攻擊集中在他的家庭與俄羅斯的關系上。例如1854年12月29日的《貝爾法斯特新聞通訊報》（Belfast News-Letter）就說他的母親赫伯特伯爵夫人，是一位俄羅斯親王（沃龍佐夫伯爵）的妹妹，而這位親王“擁有的一座位于敖德薩的輝煌宮殿”因此免遭了英軍炮擊（事實上沃龍佐夫伯爵的宮殿在炮擊中嚴重受損）。1855年1月31日的《埃克斯特飛行郵報》（Exeter Flying Post）指控赫伯特試圖“阻撓[政府]行動，支持沙皇的企圖”。——原注

[§](#SS_9) 下文作者交替使用皮埃蒙特和撒丁指代皮埃蒙特—撒丁王國。——編注

[¶](#P_9) 全名卡米洛·奔索（Camillo Benso）。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領導人物，后來成為統一后意大利王國的第一任首相。——編注

[\*\*](#_111) 有許多波蘭人從俄軍中逃跑，并加入蘇丹部隊，其中包括一些職位頗高的軍官。他們給自己起了土耳其名字，部分原因是為了不讓俄羅斯人認出來：在多瑙河流域奧馬爾帕夏的部隊中有伊斯坎德爾·貝（Iskander Bey）即后來的伊斯坎德爾帕夏（Iskander Pasha），薩迪克帕夏（Sadyk Pasha）即米夏·恰依科夫斯基（Micha Czaykowski），還有“希達亞特”（“Hidaiot”即Hedayat）。駐守葉夫帕托里亞的埃及軍隊總參謀長是庫琴斯基上校（Colonel Kuczynski）。在克里米亞的土耳其軍隊中有科勒欽斯基少校（Major Kleczynski）和耶日馬諾夫斯基少校（Major Jerzmanowski）。——原注

[††](#_112) 在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都有叫哈利法克斯的地方，這里應指英國以外的某個哈利法克斯。——譯注

[‡‡](#_113) 今波蘭、烏克蘭、白俄羅斯交界處。——譯注

[§§](#SSSS_8) 今烏克蘭和摩爾多瓦交界處。——譯注

[¶¶](#PP_8) 現名比托拉（Bitola），位于馬其頓境內。——譯注

[\*\*\*](#_114) 約四千八百米。——編注

[†††](#_115) 亞速海海岸線上的塔甘羅格沒有足夠的部隊抵抗聯軍，當地僅有一個營的步兵，一個哥薩克團，加上兩百人左右的武裝民兵，總共不過兩千人左右，而且沒有炮兵。這里的總督急于讓鎮子免遭炮擊，于是派出使者會見聯軍艦隊指揮官，提出通過在野外打一仗決定鎮子的命運。他甚至提出雙方派出作戰的人數可以不同，以反映聯軍的海上優勢。這一奇異的騎士做派簡直是直接從中世紀歷史書上摘抄出來的。聯軍指揮官們對此不以為然，會見結束回到軍艦上就立即開始炮擊。整個港口、大教堂穹頂和其他許多建筑都遭到破壞。大批居民逃離市鎮，其中包括葉夫根尼婭·契訶娃（Evgenia Chekhova），未來著名劇作家安東·契訶夫（Anton Chekhov）的母親，契訶夫是五年之后在塔甘羅格出生的。(L. Guerrin, Histoire de la derniere guerre de Russie ［1853 –1856］, 2 vols. ［Paris, 1858］, vol. 2, pp. 239–40;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3, p. 191）——原注

[‡‡‡](#_116) 這是法軍根據其外形起的外號，后來也被英軍采用。——譯注

[§§§](#SSSSSS_4) 英軍中的一個愛爾蘭步兵團。——譯注

[¶¶¶](#PPP_3) 公元5世紀至愛爾蘭傳教的基督教主教，被視為愛爾蘭的守護神。——譯注

[\*\*\*\*](#_117) 約一米九。——譯注

[††††](#_118) 塞瓦斯托波爾附近一帶的古希臘名。——譯注

[‡‡‡‡](#_119) 加勒比海地區多種族混血的民族。——譯注

[§§§§](#SSSSSSSS_2) 由皮托和他的表親托馬斯·格里塞爾（Thomas Grissell）合辦的“皮托和格里塞爾公司”（Peto & Grissell）修建了倫敦許多著名的建筑，包括改革俱樂部、牛津與劍橋俱樂部 （Oxford & Cambridge Club）、蘭心劇院（Lyceum）和納爾遜柱（Nelson’s Column）。——原注

[¶¶¶¶](#PPPP_1) 有一句著名的話（譯者注：指“雄獅卻被驢子指揮”［lions led by donkeys］）就來自這一事件。最早源于俄軍工兵指揮托特列邊說過的一句話：“法國軍隊是一支獅子被驢子指揮的部隊。”這句話后來被廣泛用來形容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的英國軍隊。——原注

[\*\*\*\*\*](#_120) 鹿砦是一些兩米高、一米寬左右的障礙物，由倒下的樹、木條和灌木建成。——原注

注釋

[[1]](#_1_10)RA VIC/MAIN/QVJ/1856, 2 Mar.

[[2]](#_2_10)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312.

[[3]](#_3_10)F. Charles-Roux, Alexandre II, Gortchakoff et Napoleon III (Paris, 1913), p. 14.

[[4]](#_4_10)The Later Correspondence of Lord John Russell, 1840–1878, ed. G. Gooch, 2 vols. (London, 1925), vol. 2, pp. 160–161; Lady F. Balfour, The Life of George, Fourth Earl of Aberdeen, 2 vols. (London, 1922), vol. 2, p. 206.

[[5]](#_5_10)H. Verney, Our Quarrel with Russia (London, 1855), pp. 22–4.

[[6]](#_6_10)G. B. Henderson, ‘The Two Interpretations of the Four Points, December 1854’, in id.,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Glasgow, 1947), pp. 119–22;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 1907–1908), vol. 3, pp. 65–6.

[[7]](#_7_10)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p. 256–77.

[[8]](#_8_9)P. Jaeger, Le mura di Sebastopoli: Gli italiani in Crimea 1855–1856 (Milan, 1991), p. 245; C.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92), p. 191.

[[9]](#_9_9)RGVIA, f. 846, op. 16, d. 5855, ll. 36–7.

[[10]](#_10_10)H. Bell, Lord Palmerston, 2 vols. (London, 1936), vol. 2, p. 125; Hansard, HC Deb. 21 May 1912, vol. 38, p. 1734; C. Bayley, Mercenaries for the Crimean: The German, Swiss, and Italian Legions in British Service 1854–6 (Montreal, 1977).

[[11]](#_11_9)F. Kagan,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Nicholas I: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London, 1999), p. 243.

[[12]](#_12_9)RGVIA, f. 846, op. 16, d. 5496, ll. 1–4, 14, 18–9, 22–8.

[[13]](#_13_9)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182–4.

[[14]](#_14_9)FO 881/1443, Clarendon to Cowley, 9 Apr. 1855.

[[15]](#_15_9)FO 881/1443, Clarendon to Cowley, 13 Apr. 1855; Stratford to Clarendon, 11 June 1855; Longworth to Clarendon, 10 June, 2 and 26 July 1855; FO 881/547, Brant memo on Georgia, 1 Feb. 1855; L. Oliphant, The Transcaucasian Provinces the Proper Field of Operation for a Christian Army (London, 1855).

[[16]](#_16_10)RA VIC/MAIN/F/2/96.

[[17]](#_17_9)T. Royle, Crimea: The Great Crimean War 1854–1856 (London, 1999), pp. 377–8; B. Greenhill and A. Giffard, The British Assault on Finland (London, 1988), p. 321.

[[18]](#_18_10)WO 28/188, Burgoyne to Raglan, Dec. 1854.

[[19]](#_19_10)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149–150; NAM 6807–295–1 (Sir Edward Lyons to Codrington, March 1855).

[[20]](#_20_9)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125–33.

[[21]](#_21_9)V. Rako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pp. 52–56; 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217; The Times, 14 June 1856, p. 5.

[[22]](#_22_9)WO 6/74, Panmure to Raglan, 26 Mar. 1855; Royle, Crimea, p. 370.

[[23]](#_23_10)FO 78/1129/62, Rose to Clarendon, 2 June 1855.

[[24]](#_24_10)A. Kinglake,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vol. 8, pp. 48–55; E. Perret, Les Franc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287–9; The Times, 28 May 1855.

[[25]](#_25_9)RGVIA, f. 846, op. 16, d. 5563, l. 322; N. Dubrovi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vol. 3, p. 179.

[[26]](#_26_9)J.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ca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37;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314.

[[27]](#_27_9)A Visit to Sebastopol a Week after Its Fall: By an Officer of the Anglo-Turkish Contingent (London, 1856), p. 34.

[[28]](#_28_9)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p. 77–84; 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é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a sa famille (Paris, 1895), pp. 106–7.

[[29]](#_29_9)Herbé, Francais et russés en Crimee, p. 199; RGVIA, f. 846, op. 16, d. 5452, ch. 2, l. 166; W.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before Sevastopol (London, 1856), p. 111.

[[30]](#_30_9)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e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p. 168–73.

[[31]](#_31_8)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p. 313;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p. 167–73; NAM 1965–01–183–10 (Steevens letter, 26 Mar. 1855).

[[32]](#_32_9)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194;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p. 64–5.

[[33]](#_33_8)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ee (Paris, 1887), p. 140; 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p. 68–9.

[[34]](#_34_8)F. Luguez, Crimee-Italie 1854–1859: Extraits de la correspondence d’un officier avec sa famille (Nancy, 1895), pp. 61–2.

[[35]](#_35_8)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p. 233–4; S. Calthorpe,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pp. 215–6.

[[36]](#_36_8)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224–30.

[[37]](#_37_8)Damas, Souvenirs, p. 265.

[[38]](#_38_8)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 127.

[[39]](#_39_8)WO 28/126, Register of Courts Martial;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p. 269. 關于俄軍醉酒情況的海量報告的一些例子，參見 RGVIA, f. 484, op. 1, dd. 398–403.

[[40]](#_40_9)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225; The Times, 17 Mar. 1855.

[[41]](#_41_8)M. Seacol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 (London, 2005), p. 117.

[[42]](#_42_9)A. Soyer, Soyer’s Culinary Campaign (London, 1857), p. 405.

[[43]](#_43_5)B. Cooke, The Grand Crimean Central Railway (Knutsford, 1990).

[[44]](#_44_5)Herbe,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ee, p. 223.

[[45]](#_45_5)RGVIA, f. 481, op. 1, d. 18, ll. 1–8.

[[46]](#_46_5)V. Kolchak, Voina i plen 1853–1855 gg.: Iz vospominanii o davno perezhitom (St Petersburg, 1904), pp. 41–2;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 113;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p. 37–40;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 91.

[[47]](#_47_5)Porter, Life in the Trenches, p. 144;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97–107; 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p. 49–55; N. Pirogov, Sevastopol’skie pis’ma i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0), p. 62.

[[48]](#_48_5)Vospominaniia ob odnom iz doblestnykh zashchitnikov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57), pp. 14–18;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 34.

[[49]](#_49_5)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p. 170–71; Tolstoy’s Diaries, vol. 1: 1847–1894,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 103; 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p. 111–2.

[[50]](#_50_5)Tolstoy’s Diaries, vol. 1, p. 104; V. Nazar’ev, ‘Zhizn’ i liudi bylogo vremeni’, Istoricheskii vestnik, 11 (1890), p. 443; M. Vygon, Krymskie stranitsy zhizni i tvorchestva L. N. Tolstogo (Simferopol, 1978), p. 37.

[[51]](#_51_4)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 117; 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p. 161–7; NAM 1968–07–484 (Gage letter, 13 Apr. 1855).

[[52]](#_52_3)J. Jocelyn, The History of the Royal Artillery (Crimean Period) (London, 1911), p. 359; NAM 1965–01–183–10 (Letter, 23 Apr. 1855).

[[53]](#_53_3)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pp. 179–180; 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ed. C. Kelly (Oxford, 2007), pp. 186–7.

[[54]](#_54_3)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p. 165–166; 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60–265.

[[55]](#_55_2)NAM 1974–05–16 (St George letter, 9 June 1855).

[[56]](#_56_2)A. du Casse, Précis historique des opérations militaires en orient de mars 1854 à septembre 1855 (Paris, 1856), p. 290;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67–72.

[[57]](#_57_2)Cullet, Un régiment, p. 182; 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p. 278–9.

[[58]](#_58_2)Cullet, Un regiment, pp. 278, 296–9.

[[59]](#_59_2)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285; NAM 1962–10–94–2 (Alexander letter, 22 June 1855).

[[60]](#_60_2)V.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rokofiia Antonovicha Podpalova (Kiev, 1904), p. 17.

[[61]](#_61_2)Small, The Crimean War, p. 159.

[[62]](#_62_2)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 280–1;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p. 17.

[[63]](#_63_2)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ée, p. 235.

[[64]](#_64_2)Kinglak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vol. 8, pp. 161–2.

[[65]](#_65_2)A. Massie,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 (London, 2004), pp. 199–200.

[[66]](#_66_2)T. Gowing, A Soldier’s Experience: A Voice from the Ranks (London, 1885), p. 115; 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p. 282–286; A Visit to Sebastopol, pp. 31–2.

[[67]](#_67_2)NAM 1966–01–2 (Scott letter, 22 June 1855); NAM 1962–10–94–2 (Alexander letter, 24 June 1855).

[[68]](#_68_2)Luguez, Crimée-Italie, pp. 47–9.

[[69]](#_69_2)NAM 1968–07–287–2 (Raglan to Panmure, 19 June 1855); NAM 1963–05–162 (Dr Smith to Kinglake, 2 July 1877).

# 第十一章 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

“我親愛的父親，”博斯凱將軍的副官皮埃爾·德·卡斯特拉尼（Pierre de Castellane）[\*](#__Fa_Guo_Yuan_Shuai_De__Qia_Si_T)在1855年7月14日寫道，“我覺得我所有的信件都應該以同一句話開頭：‘沒有新的進展’，也就是說我們在繼續挖塹壕，繼續整理炮臺。每天晚上我們圍坐在篝火邊喝酒，每天兩個連的士兵被送到醫院。”[[1]](#_1_E__Boniface__Count_de_Castell)

自從對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的進攻失敗以來，圍困戰又回到了單調的挖塹壕和炮擊，沒有任何取得突破的跡象。在經過了九個月的塹壕戰之后，雙方普遍產生了一種精疲力盡的感覺，一種圍困將永遠進行下去的沮喪感。盡快結束戰爭的想法是如此迫切，各種打破僵局的奇異念頭紛紛冒了出來。托爾斯泰的朋友烏魯索夫親王（Prince Urusov）是位一流的國際象棋棋手，他試圖說服塞瓦斯托波爾守軍總司令奧斯滕-薩克恩伯爵向聯軍發出挑戰，通過一盤國際象棋決定爭奪最激烈的一條塹壕應該歸屬哪一方。這條塹壕已經易手多次，造成幾百人傷亡。托爾斯泰的建議是戰爭勝負應該通過一場決斗來決定。[[2]](#_2_A__Maude__The_Life_of_Tolstoy_1)盡管克里米亞戰爭是第一場現代戰爭，甚至可以說是后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塹壕戰的彩排，但是在它發生的年代，某些騎士精神依然存在。

低落的士氣在聯軍部隊中迅速蔓延。沒有人覺得再發動一次進攻會有多大的成功希望，因為俄軍正在修建更強大的防御工事。所有人都開始擔心他們將不得不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高地上度過第二個冬天，每個戰士都開始在家信中寫道他們是多么想返回家園。“我已經下定決心，不管怎么樣都要回家，”英軍第三十三團的芒迪中校在7月9日給母親的信中寫道，“我不能也不會再忍受一個冬天。我知道如果再在這里過一個冬天，一年之內我就會變成一個無用衰弱的老頭。我寧愿做一頭活著的驢，也不愿做死掉的獅子。”戰士們羨慕那些因為受傷而被送回家的戰友，根據一名英國軍官的說法：“許多人會很樂意少一條胳膊的，只要能離開這些高地，逃離這場圍困。”[[3]](#_3_NAM_1984_09_31_129__Letter__9)

想到這場戰爭永遠不會結束，讓人心情絕望，許多士兵開始質疑他們為什么而戰。戰場上的殺戮拖得越久，戰士們就越會把敵人看作跟自己一樣受苦的士兵，這場戰爭也就越發顯得沒有意義。法軍隨軍神父安德烈·達馬斯講了一個朱阿夫戰士的故事。這名戰士來找他，因為在信仰上對戰爭產生了懷疑。和所有戰士一樣，朱阿夫士兵也被告知他們是在跟“野蠻人”交戰。但是在6月18日停戰清理死傷戰士的過程中，他幫助了一個受重傷的俄軍軍官。出于感激，這名軍官從脖子上取下一個皮革垂飾送給他，上面壓花印著圣母與圣嬰（Madonna and Child）的圖像。“這場戰爭必須停止，”這名朱阿夫戰士告訴達馬斯，“這是一場懦夫的戰爭。我們都是基督徒，我們都相信上帝和宗教，沒有宗教信仰我們不會這么勇敢。”[[4]](#_4_A__de_Damas__Souvenirs_religi)

在夏天的幾個月中，塹壕疲乏癥是最大的敵人。當圍困戰進行到第十個月時，士兵們因為長期生活在連續炮擊之下缺乏睡眠而疲憊不堪、精神崩潰，許多人再也無法承受了。在他們的回憶錄中，許多戰士描述了“塹壕瘋狂”的情況：各種精神疾病的混合體，能辨別出來的癥狀包括幽閉恐懼癥以及后來被稱為“炮彈休克”或“戰斗應激”的病癥。例如路易·努瓦爾曾回憶了許多事件，其中一例是“整個連隊”身經百戰的朱阿夫戰士會“在半夜忽然躍起，抓起武器，歇斯底里地呼叫支援，抗擊想象中的敵人。這些神經過度興奮的事例后來變得似乎可以傳染，許多戰士都出現了類似的癥狀。令人驚訝的是，它最先影響的是那些身體和精神最強壯的人”。朱阿夫部隊中的一名上校讓·克萊爾也回憶說戰斗經驗豐富的戰士“忽然發瘋了”，跑到俄軍那邊，或是有人再也無法忍受，朝自己開了槍。許多回憶錄都有對自殺事件的記載。其中有一人寫道一名朱阿夫“非洲作戰老兵”，看上去一切正常，直到有一天，在帳篷里和戰友們坐在一起喝咖啡時，他忽然說他受夠了，拿起自己的槍走開，然后向自己腦袋開了一槍。[[5]](#_5_L__Noir__Souvenirs_d_un_simpl)

失去戰友是對戰士最大的精神折磨。這個主題士兵們在寫信時很少觸及，即使在沒有信件審查的英軍中也是如此。能夠堅忍地接受戰場上的死亡是對優秀士兵的期待，也許還是生存的需要。但是每當他們提及失去的朋友時，文字中傾瀉而出的悲哀之情或許可以讓我們了解到一些寫信者本人感到無法表達的令人擔憂的情緒。例如米歇爾·吉爾貝（Michel Gilbert）在看到自己的戰友亨利·盧瓦齊永公開出版的信件時，注意到他在6月19日給家人的信中展現出的煩悶和悔恨。這封信包含了長長的一串名字，是前一天進攻馬拉霍夫時倒下的戰士的“葬禮清單”，但是吉爾貝認為，讀者可以感覺到“他的靈魂如何被死神的呼吸所困擾。這份名單上的名字一行又一行，無窮無盡的絕望，消失的朋友，被殺的軍官”。盧瓦齊永似乎在哀傷和負疚中迷失了自我，他因為自己依然幸存而感到負疚，只有在這封信最后一行的幽默文字中，在描述一位戰友不成功的祈禱時，他“頑強的自我保護精神才重新浮現出來”：

［盧瓦齊永寫道］我可憐的朋友科內利亞諾（Conegliano），當我們正要出發參加進攻時，他告訴我（他是一名非常虔誠的教徒）：“我帶上了念珠，那是教皇曾經賜福過的。我為將軍［邁朗］念了十幾行祈禱文，為我兄弟念了十幾行祈禱文，也為你做了祈禱。”可憐的人啊！在那三個祈禱中，只有為我做的祈禱管用了。[[6]](#_6_H__Loizillon__La_Campagne_de)

除了目睹大量死亡帶來的精神壓力之外，受傷人數的巨大和受傷狀況的恐怖也的確對戰士們的作戰意志有所消磨。在塞瓦斯托波爾之后，如此大量的肢體摧殘，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會再次出現。軍事技術的進步意味著和拿破侖戰爭或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相比，炮火和來復槍彈對士兵造成的傷害會大得多。現代的長型子彈比過去的實心彈分量更重，因而造成的破壞也更大。過去的彈丸比較輕，打到人的身體時，往往會開始轉向，而且一般打不碎骨頭；而長型子彈進入人體后，會沿途將骨頭擊碎。在圍困戰剛開始時，俄軍用的是重五十克的錐形子彈，但是自從1855年春天開始，他們開始采用一種威力更大的來復槍子彈頭：彈身長達五厘米，重量是英法聯軍使用的子彈的兩倍。當這樣的子彈打中人的軟組織后，在飛出時會留下一個更大的洞，這種情況傷口尚可痊愈；但是如果子彈打中的是骨頭，就會將其打碎，幾乎馬上就需要截肢。俄軍在戰斗中習慣等敵人靠得很近時才進行射擊，以保證來復槍的威力達到最大。[[7]](#_7_J__Baudens__La_Guerre_de_Crim)

聯軍醫院里擠滿了身上帶著可怕傷口的士兵，而俄軍醫院里傷員同樣很多，他們是聯軍更先進的大炮和來復槍的受害者。曾經在塞瓦斯托波爾軍隊醫院工作過的外科教授赫里斯季安·吉爾貝內特（Khristian Giubbenet）在1870年寫道：

我在圍困戰最后階段不得不處理的傷員，其傷口可怕程度是我見過最厲害的。經常出現的腹部受傷毫無疑問是最糟糕的，沾血的腸子會從傷口流出來。當這些不幸的人被送到包扎站時，他們還能說話，意識還清醒，還能繼續活上幾個小時。在另一些情形下，腸子和骨盆從背后撕裂，這些人下身已無法活動，但是意識依然清醒，直到在幾個小時后死去。毫無疑問，最讓人害怕的是那些面孔被榴彈炸爛的人，他們已經失去了自己的面目。想象一下，一個人的頭和臉變成了一團血肉和骨頭——眼睛、鼻子、嘴巴、臉頰、舌頭、下巴和耳朵都看不見了，但是他依然站在那里，走來走去，揮舞手臂，讓人感覺他們依然頭腦清醒。還有一些情況，原先臉應該在的地方，現在就只剩下一些血淋淋地飄掛著的皮膚了。[[8]](#_8_Kh__Giubbenet__Ocherk_meditsi)

俄軍的傷亡人數比聯軍多得多。到6月底，塞瓦斯托波爾的俄軍死傷人數達到了六萬五千人，比聯軍受傷人數的兩倍還多，這還沒有算上因疾病造成的減員。聯軍在6月份進行的炮擊又在俄羅斯方面造成了幾千人受傷，其中有軍人也有平民，都被送到了已經擁擠不堪的醫院（6月17、18日兩天就有四千名傷員送來）。吉爾貝內特回憶道，在貴族議事廳的木地板上，傷員們不僅一個挨一個地躺著，而且一個又一個被摞在其他傷員身上。“一千名垂危士兵的呻吟和呼喊聲響徹昏暗的大廳，而這里只靠勤務兵的蠟燭照明。”在巴甫洛夫斯克炮臺（Pavlovsk Battery）另有五千名傷員同樣被擠擠挨挨地放在碼頭和商店光溜溜的地板上。為了解決醫院的擁擠問題，7月份俄軍在離塞瓦斯托波爾六公里遠的貝爾貝克河邊建起了一座大型戰地醫院，那些被皮羅戈夫的傷員分流系統確定為傷勢不重的傷員就直接被轉移到那里。因克爾曼高地、麥肯齊高地和巴赫奇薩賴過去的可汗宮殿等地還有預備醫院。有些傷員被轉移得更遠，到了辛菲羅波爾，有些甚至在鄉間大道上被馬車送到了六百五十公里遠的哈爾科夫（Kharkov）。所有這些醫院都擠滿了圍困戰的傷員，但是依然無法應付越來越多的傷病人員。在6、7月間，每天至少有兩百五十名俄軍被加到傷病員名單上。根據后來被聯軍俘虜的一名俄軍士兵的說法，在圍困戰的最后幾個星期，這個數字上升到每天多達八百人，是戈爾恰科夫正式報告的數字的兩倍。[[9]](#_9_Kh__Giubbenet__Ocherk_meditsi)

俄軍面臨越來越嚴重的資源緊缺問題。自從聯軍在6月初占領刻赤、封鎖了亞速海俄軍供給線之后，俄軍就開始受到缺乏彈藥火炮的困擾，特別是缺乏小型迫擊炮彈。炮臺指揮官收到指令，遭到敵人炮擊四次，才可回擊一次。與此同時，聯軍火力集中的程度已經達到了圍困戰中前所未有的水平，英法兩國的工業水平和運輸能力讓炮兵可以每天發射七萬五千發炮彈。[[10]](#_10_M__Vrochenskii__Sevastopol_s)面對這種新型工業化戰爭，依然以落后的農奴經濟為主的俄羅斯是無法打贏的。

俄軍的士氣也低落到了危險的程度。6月，塞瓦斯托波爾的俄軍失去了兩位富有感召力的軍事領袖：工兵天才托特列邊在6月22日的炮擊中受了重傷，不得不退居二線；六天之后，軍港總指揮、錫諾普海戰英雄納希莫夫在視察棱尖棱堡的炮臺時，被一顆子彈擊中面部，隨后被送回住所，在昏迷了兩天之后于6月30日去世。他的葬禮是一個肅穆的儀式，城里所有人都參加了，聯軍都停止了炮擊，士兵們在高地上看著葬禮隊伍在他們下方的城墻邊走過。“我無法向你描述葬禮時深深的悲哀，”一名在塞瓦斯托波爾做護士的修女寫道，

海上是敵人龐大的艦隊，山坡上是納希莫夫日夜辛勞巡視的棱堡，這些不是語言所能描述的。在山坡上威脅著塞瓦斯托波爾的炮臺上，敵人可以看到我們，可以直接向葬禮隊伍開火，但即使是他們的大炮也敬畏地沉默著，在整個葬禮期間沒有發射一顆炮彈。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還有天空中黑暗的風暴云團，襯托著地面凄然的音樂、幽怨的鐘聲、哀傷的葬禮禱告。水手們就是這樣掩埋他們的錫諾普英雄的，塞瓦斯托波爾就是這樣讓它英勇無畏的守護者安息的。[[11]](#_11_E_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2)

到了6月底，塞瓦斯托波爾的供給情況變得十分危急，不僅彈藥不足，連食物和供水的缺乏都已經到了危險的程度，戈爾恰科夫開始準備全線撤離。城內人口大部分已經離開了，他們擔心留在這里會被餓死，或是染上霍亂或斑疹傷寒，這些傳染病在夏季蔓延很快。一個專門處理霍亂傳染情況的委員會報告說，6月份塞瓦斯托波爾每天有三十人死于霍亂。那些依然留在這里的人絕大部分也早就在炮擊中失去了家園，都聚集在城市最遠端、靠近港口入口處的尼古拉要塞避難。在那里，所有的兵營、辦公室和商店都擠在要塞城墻內。另一些人在港口北邊找到了相對安全的地方居住。“塞瓦斯托波爾看上去開始像是一座墓地了，”俄軍炮兵軍官葉爾紹夫回憶道，

隨著每一天的過去，即使是市中心的大道也變得越來越空曠陰暗，看上去像一座被地震摧毀的城市。葉卡捷琳斯卡婭大街（Ekaterinskaia Street）5月份的時候依然是一條秀麗熱鬧的大馬路，而到現在7月，已被破壞殆盡，人去樓空。不管是在那里還是在別的林蔭大道上，你都看不到一個女人，現在也沒有人自由走動了，街上只有一隊隊臉色嚴肅的軍人……在每一張臉上你看到的都是疲憊和不祥的悲傷表情。現在去市中心已沒有意義了，沒有任何喜樂的聲音，找不到任何可以讓人開心的東西。

托爾斯泰的《八月的塞瓦斯托波爾》（Sevastopol in August）是基于真實事件與人物而寫成的故事。在書中，一名駐扎在貝爾貝克河邊的戰士向另一名剛從被圍困的塞瓦斯托波爾過來的戰士詢問他的房間是否還在。“親愛的同胞，”他答道，“那里的房子早就被炸到另一個世界去了，你現在已經認不出塞瓦斯托波爾了。那地方現在沒有一個女人，沒有一座酒館，沒有軍樂隊，最后一家酒吧昨天關門了。那里已經變得和太平間差不多了。”[[12]](#_12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7)

不僅平民開始逃離塞瓦斯托波爾，夏天軍隊開小差的人數也在增長。那些投奔聯軍的逃兵聲稱開小差已是大規模現象，俄軍當局零星的數字和通信也證實了這一說法。例如在8月份，有一份報告說自6月以來，軍隊開小差人數“急劇上升”，特別是在那些被調到克里米亞的預備役部隊中：第十五預備役步兵師（15th Reserve Infantry Division）中有一百人逃跑，從華沙軍事區（Warsaw Military District）調來的四支增援部隊中，有三支開小差的情況與此類似。在塞瓦斯托波爾城里，每天約有二十名士兵失蹤，大部分是在突圍或是炮擊期間，指揮官無法盯緊手下士兵的時候發生的。在夏天，法軍營地接收了源源不斷的俄軍逃兵。據法軍報告，逃兵給出的理由是他們已基本上沒有東西吃，有的也是爛肉。有各種謠傳說在8月的第一個星期，塞瓦斯托波爾守軍兵營里的一些預備役士兵發動了嘩變，但是很快被殘忍地鎮壓下去，任何嘩變的證據都被當局壓下了。英軍參謀亨利·克利福德不久之后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有報告說一百名俄軍士兵因為在鎮里發動嘩變，被軍事法庭判以死刑槍斃了。”有幾個團被拆散了放到預備役部隊中，因為他們已經不再可靠了。[[13]](#_13_RGVIA__f__9196__op__4__sv__2)

\* \* \*

沙皇意識到塞瓦斯托波爾已堅持不了多久，他命令戈爾恰科夫發起最后一次進攻以擊破聯軍戰線。戈爾恰科夫懷疑此舉不會取得成功，他認為“對一個數量上有優勢、建立了穩固工事的敵人”發起進攻“將是愚蠢的”。但是沙皇堅持俄軍必須做一點什么，他正在尋找以俄羅斯開出的條件結束戰爭的辦法，保護俄羅斯的國家榮譽和尊嚴，因此他需要一場軍事勝利，讓他可以站在一個比較有利的位置開始與英國和法國談判。在把三個預備役師調到克里米亞的同時，他一次又一次向戈爾恰科夫發出命令讓他進攻（但沒有建議在哪里），他認為聯軍增援部隊即將抵達克里米亞，因此必須立即行動。“我堅信我們必須發起進攻，”他在7月30日向戈爾恰科夫寫道，“否則的話，我派給你的所有援軍就會像過去那樣掉進塞瓦斯托波爾那個無底洞里去。”[[14]](#_14_A__Seaton__The_Crimean_War)

戈爾恰科夫相信襲擊聯軍戰線唯一有可能成功的地方是由法軍和撒丁尼亞部隊駐守的喬爾納亞河。他向沙皇寫道，通過攻擊喬爾納亞河“可以占領敵人的水源，也許可以威脅他們的側翼，限制他們對塞瓦斯托波爾的攻擊，可以為以后進一步進攻打開大門”。“但是我們不能欺騙自己，因為這一進攻行動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亞歷山大對戈爾恰科夫的保留意見一點都聽不進去，在8月3日他再次向戈爾恰科夫寫道：“你每天在塞瓦斯托波爾遭受的損失證明了我多次在信中跟你說的——做一點有決定意義的事情來中止這場可怕的屠殺。”（粗體為沙皇所加）亞歷山大知道戈爾恰科夫本質上不過是一個宮廷幕僚，是一貫小心謹慎的帕斯克維奇的助手，懷疑他不愿意為發起攻勢承擔責任。因此他在信中最后作結道：“我要發動這一攻勢，但是如果你作為總指揮官害怕承擔責任，那么就召開一次戰爭會議替你分擔責任。”[[15]](#_15_A__Seaton__The_Crimean_War)

戰爭會議在8月9日召開，討論的議題是可能的進攻辦法。許多高級指揮官反對發起攻勢，奧斯滕-薩克恩因為納希莫夫陣亡受到很大打擊，相信塞瓦斯托波爾的陷落已不可避免，他提出已經犧牲了太多戰士，現在是撤離的時候了。大部分其他將領和他的想法相似，但是沒有人敢像他那么說話，他們反而同意了發動一場攻勢以取悅沙皇的想法，雖然沒人有信心制定任何詳細的方案。最大膽的方案來自狂熱賣力的赫魯廖夫將軍，他就是在2月份率領騎兵進攻葉夫帕托里亞失敗的那位。赫魯廖夫中意的方案是將塞瓦斯托波爾全部摧毀（甚至比1812年燒毀莫斯科做得還徹底），然后全部戰士集體向敵人的位置沖鋒。當奧斯滕-薩克恩質疑這樣的自殺行動將導致成千上萬無謂的傷亡時，赫魯廖夫答道：“那又怎么樣？讓每個人都戰死！我們將在地圖上留下我們的痕跡！”最后較為冷靜的意見占了上風，會議結束時，全體參會者投票通過了戈爾恰科夫進攻法軍和撒丁尼亞部隊在喬爾納亞河邊位置的計劃，不過戈爾恰科夫本人對這一方案能否成功很沒信心。“我將向敵人的位置進發，因為如果不這么做，塞瓦斯托波爾將很快陷落。”他在發動攻勢前一晚向戰爭部長多爾戈魯科夫親王寫道。但是如果進攻沒有成功，“那將是[他的]責任”，他將“盡力以最小的損失撤離塞瓦斯托波爾”。[[16]](#_16_A__Khrushchev__Istoriia_obor)

俄軍將進攻時間定在8月16日。頭一天晚上，法國軍隊還在慶祝“皇帝節”（fête de l’empereur），撒丁尼亞部隊在慶祝“圣母升天節”（Feast of the Assumption）——一個意大利的重要節日，兩國部隊都一直喝酒作樂直到深夜。第二天凌晨四點，他們剛剛躺上床，俄軍加農炮的炮聲就把他們驚醒了。

借著晨霧的掩護，俄軍向特拉克特爾橋（Traktir Bridge）進發。這支部隊有四萬七千名步兵，一萬名騎兵和兩百七十門野炮，分別由利普蘭季將軍指揮左翼，面對撒丁尼亞部隊；由里德將軍（General Read）指揮右翼，面對法國軍隊，里德是一個移民俄羅斯的蘇格蘭工程師的兒子。兩位將軍得到的指令是在未收到來自戈爾恰科夫的命令之前，不得越過喬爾納亞河。戈爾恰科夫尚不肯定應該向哪里投入預備役師，是針對法軍駐守的菲久克希高地，還是撒丁尼亞部隊駐守的加斯福特山（Gasfort Hill）。他要依靠進攻開始時的炮擊來弄清敵人的位置，幫助他做出決策。

但是，俄軍的加農炮沒辦法打到目標，反而把一萬八千名法軍和九千名撒丁尼亞部隊驚醒了，讓他們有時間做好戰斗準備，并讓那些前哨陣地的守軍向前推進到特拉克特爾橋。戈爾恰科夫對戰事沒有進展感到惱火，派他的副官克拉索夫斯基中尉（Lieutenant Krasovsky）通知里德和利普蘭季“是時候開始了”。當這道命令傳到里德那里時，其含義很不清楚。里德問道：“是時候開始干什么？”克拉索夫斯基也不清楚。里德認為這不可能指開始炮擊，因為炮擊已經開始了，所以這道命令只可能是要開始步兵進攻。于是他命令手下的步兵過河，向菲久克希高地沖鋒，盡管這時候應該來支援沖鋒的騎兵和預備役步兵還沒有到。與此同時，戈爾恰科夫決定將預備役部隊集中在左翼，因為他看到利普蘭季的騷擾部隊已經把撒丁尼亞部隊的前哨從電報山趕了下去，這個山頭被意大利人叫作“皮埃蒙特石”（Roccia dei Piemontesi）。當聽到從里德指揮的右翼傳來的滑膛槍槍聲，他抽出了一些預備役部隊前往增援，但是正如他事后承認的那樣，在那一刻他就意識到進攻失敗了。他手下的部隊被分成兩路進攻兩個不同的目標，而這次進攻中俄軍的唯一優勢就是他們可以集中部隊給敵人全力一擊。[[17]](#_17_M__O__Cullet__Un_regiment_de)

里德的部隊在特拉克特爾橋附近渡過了河，在沒有騎兵和炮兵掩護的情況下，這樣的沖鋒幾乎是送死，菲久克希高地山腰上的法軍炮兵和來復槍兵居高臨下向他們開火。不到二十分鐘，兩千名俄軍步兵就全部被打倒在地。這時候增援部隊、第五步兵師來了，師長建議整個師的士兵同時沖鋒，這樣也許可以憑借人數優勢取得突破。但是里德選擇了逐步增兵的辦法，一個團接一個團地往前送，就這樣，俄軍被輪番射倒。駐守高地的法軍這時候已經完全有信心打敗俄軍了，一直等到俄軍進攻部隊靠近后才開火。“我們的炮兵把俄軍打得一團糟，”當時在菲久克希高地上的法軍上尉奧克塔夫·屈萊特回憶道，

我們有力而自信的戰士從兩條防線冷靜地發出致命的齊射，這只有身經百戰的士兵才能夠做到。當天早上每一名士兵都配備了八十發子彈，但是一共也沒有打出多少發。我們完全沒有理會射向我們側翼的子彈，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對付向我們逼近的俄軍士兵……只有當他們非常靠近，幾乎要把我們包圍起來時，我們才開始射擊——子彈射向這個由沖鋒的俄軍構成的巨大半圓，一顆都不會浪費。我們士兵的鎮定讓人欽佩，沒有人想要后退。[[18]](#_18_Cullet__Un_regiment__pp__207)

最后還是戈爾恰科夫制止了里德的拙劣指揮，下令整個步兵師投入進攻。有一段時間他們把法軍逼退到山坡更上方，但是敵人致命的來復槍齊射最終還是迫使他們撤退，退回到喬爾納亞河的另一邊。在撤退中，里德被彈片擊中身亡，戈爾恰科夫接手指揮，命令左翼利普蘭季手下的八個營前來支援他進攻菲久克希高地的東頭。但是這些增援部隊遭到了撒丁尼亞部隊來復槍的猛烈射擊，他們是從加斯福特山過來保護側翼這一片開闊地的，俄軍最后只能撤往電報山。俄軍的攻勢已毫無取勝的希望，十點剛過，戈爾恰科夫下令全體撤退，俄軍加農炮最后一起齊射，仿佛在顯示失敗中的不屈，其余的部隊就在炮聲中撤回去舔舐傷口了。[[19]](#_19_Seaton__The_Crimean_War__p)

聯軍在喬爾納亞河的戰斗中損失了約一千八百人，俄軍有二千二百七十三人陣亡，幾乎四千人受傷，還有一千七百四十二人失蹤，大部分失蹤者是趁著晨霧和戰場的混亂開小差逃跑的。[†](#__Wei_Le_Zu_Zhi_Shi_Bing_Tao_Pao)幾天之后死傷者才得到清理，俄軍甚至都沒有回來處理死傷的士兵。在這期間許多人來到這里，看到一幅可怕的景象。來到戰場的不僅有照顧傷員的護士，還有戰爭旅游者，這些人會從死人身上尋找戰利品。至少有兩名英軍隨軍牧師參與了偷搶紀念品的行為。瑪麗·西科爾形容地上“堆滿了傷員，有些平靜認命，有些急躁不安，空中充滿了一些傷員痛苦的呼喊——所有人都要水，對給他們送水的都很感激”。一名土耳其部隊里的英國醫生托馬斯·巴扎德（Thomas Buzzard）驚奇地發現大部分尸體“面朝下躺著，真的像荷馬所形容的‘吃了塵土’（biting the dust）”，而不像經典戰爭油畫上畫的那樣仰面躺著（大部分俄軍士兵是在向山坡上沖鋒時正面中彈的，所以很自然地向前倒下）。[[20]](#_20_Jaeger__Le_mura_di_Sebastopo)

俄軍居然敗給了人數比自己一半還少的敵人，戈爾恰科夫在向沙皇解釋時，把所有責任都推到里德將軍身上，辯解說里德沒能理解他的命令，擅自下令部隊向菲久克希高地沖鋒。他在8月17日向沙皇寫道：“如果里德能夠嚴格執行我的命令，我們也許能取得某種成功，至少今天犧牲的勇敢戰士的人數可以減少三分之一，想到這些令我心情沉重。”亞歷山大對戈爾恰科夫把責任推到陣亡將軍身上的做法并不認可。他本想在取得一次軍事成功后向聯軍提出和平要求，盡量獲得有利的結果，這次慘敗讓這一計劃泡了湯。“我們勇敢的戰士，”他回復戈爾恰科夫，“承受了巨大的損失卻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粗體為沙皇所加）事實真相是兩人都要為這場無謂的屠殺負責：亞歷山大要為他在沒有勝算的情況下堅持發動攻勢負責，戈爾恰科夫要為他未能頂住壓力負責。[[21]](#_21_Seaton__The_Crimean_War__pp)

喬爾納亞河的失敗對俄軍來說是一場災難，現在塞瓦斯托波爾落入敵手只是時間問題了。“我敢肯定這將是我們在克里米亞的倒數第二場戰斗，”埃爾貝在8月25日寫道，他在喬爾納亞河戰斗中受了傷，“最后一場戰斗將是占領塞瓦斯托波爾。”根據在海軍基地駐防的尼古拉·米洛舍維奇（Nikolai Miloshevich）的說法，在這場敗仗后“俄軍士兵對他們的指揮官和將軍們完全失去了信任”。另一名士兵寫道：“8月16日早晨是我們最后的希望，到這天晚上希望消失了。我們開始向塞瓦斯托波爾告別。”[[22]](#_22_Herbe__Francais_et_russes_en)

俄軍意識到局勢已無可挽回，開始準備撤離。喬爾納亞戰斗前一天晚上，戈爾恰科夫在寫給戰爭部長的信中也說，如果這一戰失敗，他將下令放棄塞瓦斯托波爾。俄軍撤退計劃的核心是修建一座跨越港口的浮橋通往北岸，在北岸俄軍依然占據著有利地形，可以對付進城的聯軍。修建浮橋的主意最早是由布赫梅爾將軍（General Bukhmeier）在7月的第一個星期提出的，他是一名優秀的工兵。但是這一意見被許多其他工兵否決了，理由是這是不可能做到的。特別是布赫梅爾提議在南岸的尼古拉要塞和北岸的米哈伊洛夫炮臺（Mikhailov Battery）之間架橋，這里水面寬度達九百六十米（建成后將是世界上最長的浮橋之一），而且風大浪高。現在因為情況緊急，戈爾恰科夫同意了這一危險的計劃，幾百名士兵被派去用大車搬運木材，有些甚至要跑到三百公里以外的赫爾松，另有大批士兵負責架橋。在布赫梅爾的組織下，浮橋終于在8月27日建成。[[23]](#_23_Vrochenskii__Sevastopol_skii)

\* \* \*

與此同時，聯軍在準備對馬拉霍夫和棱尖棱堡發動新的攻勢。8月底時他們已經意識到俄軍堅持不了多久了。喬爾納亞戰斗后，從塞瓦斯托波爾逃離的俄軍已成洶涌之勢，他們對城內惡劣情況的描述非常相似。一旦聯軍指揮官們意識到新攻勢有可能取得成功，他們都迫不及待地希望盡快開始。9月快到了，天氣漸冷，他們最擔心的是還要在克里米亞度過第二個冬天。

佩利西耶帶頭倡議攻城，在喬爾納亞河大敗俄軍之后，他的地位大大提升。拿破侖三世曾對佩利西耶堅持圍困的戰略持懷疑態度，因為他本人是支持野外作戰計劃的，但是喬爾納亞河的勝利讓他拋開了疑慮，全力支持佩利西耶的方案。

一旦法軍指揮官打定了主意，英軍則不得不跟從：他們既沒有足夠兵力，也缺乏勝利成績來推行自己的軍事戰略。在6月18日攻打棱尖棱堡慘敗后，戰爭大臣潘穆爾勛爵決心不能再有同樣的失敗。確實有一陣子英軍似乎不再打算攻打棱尖棱堡了，但是喬爾納亞河的勝利改變了一切，在各種情況的推動下，英軍漸漸接受了一種新的共識，再度準備奪取棱尖棱堡。

此時法軍已經將塹壕挖到了馬拉霍夫要塞前的鹿砦位置，并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人員代價。這里離要塞城墻前的壕溝只有二十米遠，連法軍官兵的說話聲都能被要塞里的俄軍聽見。英軍陣地前的區域石頭很多，但是他們也冒著高昂的代價將塹壕挖得盡可能靠近棱尖棱堡，然而距離依然有兩百米遠。在海軍圖書館屋頂，俄軍可以分辨出英軍塹壕里士兵的面孔。只要他們一抬頭，棱尖棱堡里的神槍手就可以毫不費力地打中他們。每天聯軍方面要損失兩百五十至三百名士兵，這樣的情況無法再維持下去。當時英軍的邏輯是，沒有必要再推遲進攻了，因為如果現在還無法成功的話，那可能永遠也不會成功了。要真是這樣的話，聯軍將不得不在第二個冬天到來之前放棄圍困。正是在此形勢下，英國政府準許接替拉格倫的詹姆斯·辛普森將軍參與法軍的攻勢，對塞瓦斯托波爾發起最后一次步兵進攻。[[24]](#_24_H__Small__The_Crimean_War__Q)

進攻的日子定在了9月8日。和之前6月18日的進攻不同，這次聯軍在步兵沖鋒前，從9月5日就開始對俄軍防線進行長時間的猛烈炮擊。其實在那之前，聯軍的炮擊從8月31日開始就已經越來越猛烈了。現在英法聯軍每天可發射五萬發炮彈，而且大炮位置比以前靠近很多，造成了更大的破壞。鎮中心已基本上沒有一座尚未倒塌的房子，仿佛經歷了一場地震一樣。傷亡情況驚人，從8月的最后一個星期起，每天就有約一千俄羅斯人傷亡，聯軍進攻前的兩天傷亡人數接近八千人。但即便如此，塞瓦斯托波爾最后的守衛者還是沒打算放棄這座城市。“相反，”葉爾紹夫回憶道，

即使我們守衛的是一座已經毀壞了一半的塞瓦斯托波爾，基本上已是一座鬼城，除了名字外已沒有什么重要意義，但我們還是準備堅持到街上的最后一人：我們把倉庫轉移到了北岸，在街道上建起了路障，準備將每一座被炸毀的房子都變成一座武裝的堡壘。[[25]](#_25_Za_mnogo_let__Zapiski__vospo)

俄軍知道聯軍即將發起進攻，連續的炮擊已讓他們對此確信無疑，但是他們以為聯軍進攻的日子會是9月7日，因為那一天是博羅季諾之戰的紀念日。1812年的那一天，俄軍對拿破侖的法國軍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三分之一的法軍被消滅。當9月7日聯軍沒有發動進攻時，俄軍的守衛部隊放松了警惕。9月8日凌晨五點，聯軍炮擊再次開始，炮擊頻率持續上升，達到了每分鐘四百發。上午十點時炮擊忽然停止，然而聯軍又沒有發起進攻。俄軍一直預計聯軍將和過去一樣，選擇黎明或黃昏時分發動攻勢，因此他們判斷聯軍白天這一輪炮擊是在為黃昏的進攻做準備。到了十一點鐘，這個判斷似乎得到了驗證，因克爾曼高地的觀察哨報告說聯軍軍艦有所行動，他們相信是在進行準備。然而俄軍觀察哨并沒有搞錯，聯軍確實讓海軍參與行動，負責炮擊塞瓦斯托波爾的海岸防御。但是9月8日天氣突變，原來一直晴朗溫暖，那天卻忽然刮起了強烈的西北風。海上的大浪迫使聯軍在最后一分鐘取消了海軍的炮擊行動，因此聯軍軍艦雖然聚集在港口入口處，卻并沒有顯示出已經準備好可以馬上發動進攻的樣子。然而此時陸上的聯軍已經準備好了，在博斯凱的堅持下，聯軍聰明地將總攻時間定在中午十二點，這剛好是俄軍換崗的時候，沒有人想到聯軍步兵會在這時發起沖鋒。[[26]](#_26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7)

聯軍的進攻計劃很簡單：重復6月18日的行動，但是投入更多兵力，不犯同樣的錯誤。在6月18日，他們投入了三個步兵師；這一次，法軍將投入十個半師，其中五個半進攻馬拉霍夫要塞，另五個師進攻其他棱堡和城墻，參加進攻人數達三萬五千人，同時還有兩千作戰勇敢的撒丁尼亞部隊支援進攻。法軍的指揮官們事先對好表，然后準時向各自的部下發出號令進攻，避免重犯邁朗將軍看錯火箭信號造成混亂的失誤。中午十二點，法軍指揮官們發出進攻信號，鼓手開始敲鼓，軍號吹響，軍樂隊演奏《馬賽曲》，隨著一陣“皇帝萬歲！”的呼喊，麥克馬洪將軍（General MacMahon）指揮的步兵師約九千人一起沖出塹壕，后面跟著其余的法國步兵。在大膽的朱阿夫部隊的帶領下，他們朝馬拉霍夫要塞沖去，使用木板和梯子下到壕溝里，然后開始爬墻。俄軍對此猝不及防。當時要塞守軍正在換崗，許多戰士已經退下去吃飯了，因為聯軍停止了炮擊，讓他們覺得現在是安全的。“我們的小伙子們還沒來得及抓起槍，法軍就已經爬上馬拉霍夫了，”波普羅科菲·帕德羅夫回憶到，他當時在那里觀戰，“幾秒鐘內他們幾百人就占滿了要塞，而我們這邊幾乎一槍都還沒來得及放。幾分鐘后，炮塔上就升起了法軍的旗幟。”[[27]](#_27_A__Niel__Siege_de_Sebastopol)

要塞守軍被法軍進攻的強大氣勢壓垮了，在恐慌中，他們調轉身體從馬拉霍夫要塞逃跑。棱堡內的守軍大部分是第十五預備役步兵師十幾歲的新兵，沒有作戰經驗，根本不是朱阿夫士兵的對手。

一旦占領了馬拉霍夫，麥克馬洪的手下便鋪天蓋地地涌向俄軍防線，跟朱阿夫部隊一起與位于馬拉霍夫要塞左翼的熱爾韋（Zherve，法語為Gervais）炮臺上的俄軍展開搏斗，其他部隊則開始進攻俄軍防線上的其他棱堡。朱阿夫部隊占領了熱爾韋炮臺，但是他們沒能擊退右翼的俄軍卡贊團（Kazan Regiment）。卡贊團勇敢地堅守陣地，直到援軍從塞瓦斯托波爾趕到，讓他們能夠發起反沖鋒。接下來發生的是克里米亞戰爭中最為激烈的戰斗之一。“一次又一次我們端著刺刀向他們沖去，”一名俄軍士兵阿納托利·維阿茨米季諾夫（Anatoly Viazmitinov）回憶道，“我們不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么，沒有想過自己能不能成功。我們只是向前猛沖，完全沉浸在交戰的興奮中。”短短幾分鐘內，馬拉霍夫和熱爾韋炮臺之間的地面上就堆滿了尸體，俄軍和法軍的混在一起，每一次沖鋒之后，就又留下一層尸體。一層疊一層，雙方都踩在死傷士兵的身體上繼續纏斗，直到戰場變成了“尸山”。維阿茨米季諾夫后來寫道：“腳下尸體的鮮血濺起，空氣中升起一層濃重的紅霧，讓我們看不到敵人在哪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在血霧中向敵人的方向開槍，保證槍支和我們面前的地面平行。”最終，源源不斷的法軍涌來，麥克馬洪手下的步兵憑著來復槍的優勢擊退了俄軍，迫使他們向后撤退。隨后，為保證對馬拉霍夫要塞的控制，法軍把俄軍士兵的尸體，甚至包括傷兵堆起來作為人肉沙袋，加上石籠網、柴捆，以及從部分摧毀的工事里拿來的炮眼等，修建起臨時路障。在路障的后方，法軍把大炮對準了塞瓦斯托波爾。[[28]](#_28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7)

與此同時，英軍開始了他們對棱尖棱堡的進攻。在某種程度上，攻克棱尖棱堡比馬拉霍夫要難得多。英軍無法在多石的地面上挖塹壕接近棱堡，不得不先沖過一片開闊地，然后再爬過棱堡前的鹿砦，這一切都必須冒著俄軍近距離的炮擊進行。棱堡的寬大V字形狀意味著沖鋒部隊在跨過壕溝爬上城墻時將會暴露在側翼火力之下。另外還有謠言說棱尖棱堡前被俄軍埋設了地雷。但是一旦法軍占領了馬拉霍夫要塞，棱尖棱堡的防守就變得脆弱、易于進攻了。

和6月一樣，英軍等待法軍先行發起進攻，一旦看到藍白紅三色旗飄揚在馬拉霍夫要塞之上，他們立即向棱尖棱堡發起沖鋒。一千人左右的第一波沖鋒部隊冒著各種實心彈、霰彈和滑膛槍子彈織成的彈雨往前沖，相當數量的戰士越過了鹿砦，爬下壕溝，不過至少一半的梯子在沖鋒時被丟下。躲在城墻頂部胸墻后的守軍居高臨下向壕溝近距離開槍射擊，造成一片混亂。英軍中一些人開始動搖，不知道該如何爬上胸墻，另一些試圖在壕溝底尋找躲避之處。最終有一批士兵成功爬上城墻，進入要塞，雖然其中大部分戰死，但為沖鋒部隊的其他戰士樹立了榜樣，大家紛紛效仿。第二十三（皇家威爾士）燧發槍團（23rd ［Royal Welch］ Fusiliers）的格里菲思中尉（Lieutenant Griffith）也在爬墻沖進要塞的人當中：

我們發狂似地沿著塹壕往前跑，霰彈在我們耳邊呼呼飛過。沿途我們遇到幾個受了傷往后撤退的軍官，對我們說他們已經進入過棱尖棱堡了，現在只等增援部隊到達就能取得勝利。我們繼續往前跑，沿途越來越多從前面抬下來的受傷的軍官和士兵……“第二十三團！這邊！”參謀官喊道。我們翻出塹壕，跳進開闊地。那一刻真是嚇人。我大概向前沖了不到兩百米，一路上霰彈紛紛砸在地上，到處都有戰士被擊中倒下。當我沖到棱尖棱堡前的壕溝邊時，我看到我們的人全都感到混亂困惑，不清楚要干什么，只能繼續向敵人猛烈開火……[在壕溝里]許多屬于不同團的人擠在一起，靠在墻上的梯子上也擠滿我們的人。雷德克利夫和我抓住梯子往上爬，一直爬到了胸墻邊，但是就在那里我們被堵住了，死傷的戰士不斷往我們身上壓。那個場面真是讓人又興奮又恐懼。[[29]](#_29_J__Spilsbury__The_Thin_Red_L)

壕溝和胸墻前的斜坡上很快擠滿了像格里菲思一樣的后來者，他們無法爬上胸墻，因為被上方的搏斗“堵住”了。棱尖棱堡內部有許多障礙物，后面都藏著俄軍士兵，可以源源不斷地把兵力往前送。少數爬上棱堡的英軍立刻被俄軍包圍，寡不敵眾，還要面對從V形棱堡北端兩個側翼射來的子彈。這時擠在下方壕溝里的士兵的士氣開始垮掉，不理會軍官要他們爬上胸墻的命令。“幾百名士兵躲在突出的尖角外面，”正在塹壕里觀戰的柯林·坎貝爾中尉[‡](#___Yuan_Wen_Ru_Ci__Ying_Wei_Ke_L)后來描述道，“但是他們被敵人側翼火力成片地打倒。”許多人完全嚇破了膽，逃回塹壕，但是塹壕里本來就擠滿了等待命令沖鋒的士兵。這時候軍紀已不復存在。英軍戰線后方一片混亂，相互踩踏。格里菲思也加入了潰逃的人群：

我覺得很羞恥，但是也已經盡力了。很不情愿地，我也轉身跟著士兵一起往回逃。我已經能看到遠處我方的塹壕，但我從未想到能夠活著逃回那里。俄軍火力十分嚇人，我不斷被絆倒，地面上已經遍布死傷者。最后我終于滿懷欣喜地逃到了我們的平行防線，連滾帶爬地進了塹壕……在路上一顆子彈打中了我斜背的水壺，水全都漏了，但是子彈被彈開了。霰彈掀起的一塊石頭打中了我的腿，但是沒怎么傷到我。不久之后我們找到了……一些士兵，漸漸把大部分沒受傷的人都聚齊了。可是還有那么多人不知所蹤，這讓我們覺得非常難過。

一些軍官在塹壕里徒勞地試圖重整軍紀，亨利·克利福德便是其中一個：“當士兵們從棱尖棱堡的胸墻前往回逃的時候，我們拔出佩劍抽打他們，讓他們站住別跑，不然就全敗了，但他們還是逃跑了。壕溝里擁擠不堪，一動就會踩到腳下受傷的人。”[[30]](#_30_Spilsbury__Thin_Red_Line__p)

要讓這些被嚇破膽的士兵再次發動沖鋒是沒有希望的了，他們中絕大部分都是年輕的預備役士兵。負責指揮進攻的輕步兵師師長科德林頓將軍下令中止了當天的軍事行動，這一天英軍損失了二千六百一十名士兵，其中五百五十人陣亡。科德林頓打算在第二天換上身經百戰的高地旅再度進攻，但是已經沒有必要了。當天深夜，俄軍認定一旦法軍在馬拉霍夫要塞安置好大炮，棱尖棱堡便不可能守得住，于是決定撤離。正如一位俄軍將領在一份也許是關于此事最早的回憶記錄中所說的，馬拉霍夫“不僅僅是一座要塞，它也是塞瓦斯托波爾防守的關鍵，從那里法軍可以隨時炮擊城內，殺死成千的戰士和平民，還可能破壞浮橋，切斷我們逃亡北岸的通路”。[[31]](#_31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7)

戈爾恰科夫下令整個南岸的軍民全部撤離。俄軍在撤退前炸毀了軍事設施，燒毀了物資，士兵和平民都做好了渡河的準備。不少俄軍士兵認為放棄塞瓦斯托波爾是一種背叛行為，他們把前幾天的戰事看作取得了部分勝利，因為除了馬拉霍夫之外，他們打退了敵人對所有其他要塞的進攻。他們不能理解，或是不愿意承認馬拉霍夫對保證城市防線完整性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許多水手不愿意離開他們一直生活的塞瓦斯托波爾，有些還發出了抗議。“我們不能離開，沒有誰有權命令我們”，一群水手聲稱，他們指的是自從納希莫夫陣亡后，就再沒有海軍總指揮了。

陸軍士兵可以離開，但我們是聽海軍指揮的，沒有海軍指揮官來命令我們走，我們怎么可以離開塞瓦斯托波爾？真的，敵人在每一處的進攻都被打退了，只有馬拉霍夫被法國人占領了，但是明天我們可以重新把它奪回來，我們不會離開崗位！……我們必須戰死在這里，我們不能離開，俄羅斯人民會怎么評價我們？[[32]](#_32_M__Bogdanovich__Vostochnaia)

撤離行動從晚上七點開始，進行了整整一個晚上。在港口邊的尼古拉要塞，一大群士兵和平民集結在一起渡河。傷員、病人、帶著小孩的婦女、拄著拐杖的老人，全都和士兵、水手、馬匹和炮車混在了一起。夜晚的天空被房子燃燒的火焰映紅，遠處棱堡的炮聲與塞瓦斯托波爾城內的爆炸聲混在一起，讓人無法分辨。俄軍把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自己又帶不走的東西：要塞、艦船等等，全都炸毀。因為擔心英法聯軍隨時可能出現，撤退的人群開始恐慌，推推搡搡地想盡快擠上浮橋。“你能聞到恐懼的味道，”一名俄羅斯婦女塔季揚娜·托利切娃（Tatyana Tolycheva）回憶，她當時正與丈夫和兒子在橋頭等待渡河，“周圍是巨大的嘈雜聲：人們尖叫、流淚、哭喊，受傷的在呻吟，炮彈從天空中飛過。”炮彈一直不斷地落在港口附近，一顆炮彈落在碼頭邊的人群中，炸死了八名聯軍戰俘。渡河時，士兵、馬匹和大炮先走，隨后是裝滿加農炮彈、干草垛和傷員的牛車。人們靜靜地從浮橋上走過，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著走到對岸。海上波濤洶涌，西北風依然強勁，雨點紛紛砸在他們臉上。平民們排成一隊過河，他們只允許攜帶手上拿得了的東西，托利切娃就在其中：

橋上人們擠作一團，一片混亂，驚慌，恐懼！在所有人的重壓下，浮橋幾乎塌了，水涌到了我們的膝蓋。忽然間有人害怕了，喊道：“我們要被淹死了！”于是人們調轉頭想逃回城里。在推搡中，人踩在人身上。馬害怕了，前身騰起……我以為我們要死了，開始祈禱。

第二天早晨八點，渡河行動完成。最后一批守軍收到離開棱堡、燒毀城市的信號。他們用剩下的大炮擊沉了海港里俄軍黑海艦隊的最后一批艦船，這才撤到北岸。[[33]](#_33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7)

托爾斯泰在北岸的星星要塞目睹了塞瓦斯托波爾的淪陷。在聯軍進攻期間，他負責指揮一個有五門炮的炮臺，他還是最后一批過河的守軍之一。這一天是他二十七歲的生日，但是眼前的情景讓他心碎。“當我看到整座城市陷入火海，法國旗幟在我們的棱堡上升起時，我哭了，”他在給姨媽的信中寫道，“從各方面來說，這都是非常悲哀的一天。”[[34]](#_34_Tolstoy_s_Letters__vol__1__p)

那天早晨從北岸回望火海中的城市的人當中，還有亞歷山德拉·斯塔霍娃（Alexandra Stakhova）。她是一名護士，正在協助傷員撤離塞瓦斯托波爾。第二天她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

整個城市被大火包圍……到處都傳來爆炸聲。那是一幅恐怖而混亂的景象！……塞瓦斯托波爾被黑煙籠罩，我們的部隊正在燒毀城市。這一情景讓我流淚（我其實很少哭），這減輕了我心中的積郁，為此我感謝上帝……親身經歷眼前的這一切真是好痛苦啊，死去都會容易一些。[[35]](#_35_Sobranie_pisem_sester_Kresto)

塞瓦斯托波爾大火是1812年莫斯科大火的翻版，這場大火持續了好幾天。當聯軍部隊在9月12日進入城市時，有些地方還在燃燒。他們看到了一幕悲慘的景象，不是所有的俄軍傷員都被撤離，因為人數太多無法運走，有三千名傷員被丟棄在城里，既沒有食物也沒有水。負責醫院撤離的吉爾貝內特醫生把這些傷員留在那里，以為他們馬上會被聯軍發現，沒想到聯軍在四天之后才入城。當后來從西方報刊上讀到對塞瓦斯托波爾醫院的報道時，他羞愧萬分。羅素在《泰晤士報》上的報道就是其中之一：

在世界上所有和戰爭有關的恐怖場景中，塞瓦斯托波爾醫院是最讓人心碎，也最讓人作嘔的。進入大門之后，感謝上帝，我看到的景象是沒有幾個人目睹過的……士兵腐爛流膿的尸體，他們被丟在那里，在極度痛苦中死去，無人照料，無人關心，密密麻麻地堆在一起……他們泡在到處流淌、混著腐爛之物的血水之中。許多人躺在那里，仍然活著，蛆蟲卻已經爬滿他們的傷口。許多人已經差不多被他們周圍的景象給嚇瘋了，在極端痛苦中，為了解脫而滾到床下，瞪著眼睛看著我們這些旁觀者。許多人的手或腿斷了或是扭曲了，尖利的彈片從肉里伸出。他們哀求幫助、水、食物或是憐憫，或者因為臨近死亡或傷勢嚴重已無法說話，用手指著自己致命的傷口。許多人似乎只想早點死去，或已平靜地接受死亡。有些人情緒極度瘋狂，讓人不得不在驚異中停步。一些尸體已經膨脹到難以置信的程度，面部脹得極大，眼球從眼窩中掉了出來，黑色的舌頭掛在嘴外，被牙齒緊緊卡住。看到這些景象，不禁讓人毛骨悚然，身體都不由自主地蜷縮起來。[[36]](#_36_Giubbenet__Ocherk__pp__19__1)

每一個進入城市的人都被這里飽受蹂躪的景象驚呆了。“塞瓦斯托波爾呈現出一種你所能想象的最奇異的景觀，”法軍軍務長邦迪朗男爵（Baron Bondurand）在9月21日給德·卡斯特拉內元帥的信中寫道，

我們原來并不知道自己的炮火有這么大的破壞力。整座城市幾乎被夷為平地，我們的炮彈沒有漏過任何一座房屋。已沒有一座房屋還有屋頂，幾乎所有的墻壁都被摧毀。軍營里一定傷亡嚴重，因為我們的所有炮擊都打中了目標。這是對俄軍無可辯駁的戰斗精神和忍耐力的見證，他們堅持了這么長的時間，直到我們占領馬拉霍夫，無法再守之后他們才投降。

到處都是遭到破壞的痕跡，托馬斯·巴扎德對這座城市廢墟的美麗感到驚訝：

在城里最秀美的街道上，有一座精致的古典主義建筑，據說是一座教堂，完全用石頭砌成，采用了雅典帕特農神廟的風格。一些巨大的石柱幾乎被打成了碎片。進入這座建筑后，我們發現有一顆炮彈曾從屋頂穿入，在地面爆炸，把內部都炸成了碎片。當我們把目光從這里轉開時，卻看到緊挨著教堂的是一座郁郁蔥蔥、枝繁葉茂、一片祥和的花園。[[37]](#_37_Boniface__Campagnes_de_Crime)

對軍隊來說，占領塞瓦斯托波爾是偷搶東西的好時機。法軍的偷搶行動是有組織的，軍官們不僅準許士兵偷搶，自己也加入其中，還把從俄羅斯人那里偷搶來的戰利品寄回國，仿佛這是戰爭中完全正常的行為。在10月16日給家人的信中，法軍中尉旺松（Lieutenant Vanson）開了一個長長的清單，列出了他寄回家的戰利品，其中包括一塊銀制和一塊金制的銘牌，一套瓷器，一把從俄軍軍官身上取下的佩劍。幾個星期之后他又寫道：“我們繼續在塞瓦斯托波爾搶東西。已經找不到什么古玩了，但是我一直想找一把好看的椅子。我很高興地告訴你們，昨天我找到了一把，少了一條腿，椅墊也不見了，但是椅背雕刻得非常漂亮。”與法國軍隊相比，英軍的偷搶行為收斂一些。9月22日，托馬斯·戈拉夫（Thomas Golaphy）在一份俄語文件的背后給他家人寫信。其中他談到：

士兵們把凡是能搞到的東西都拿走了，賣給任何愿意買的人。有一些非常華美的東西很便宜地就賣掉了，但是在這里除了希臘人之外沒有人會買這些東西。我們不被允許像法國人那樣到鎮上偷搶東西，他們哪兒都能去，但是我們就只讓去工事對面的那一塊地方。[[38]](#_38_E__Vanson__Crimee__Italie__M)

如果說英軍在偷搶東西方面落后于法軍，那么他們在狂飲酗酒上就遠遠超過法國人了。占領軍在塞瓦斯托波爾發現了大量酒水，英軍決定要將它們喝光，士兵們認定在艱苦作戰取得勝利之后，指揮官們一定會準許他們喝酒的。醉酒斗毆、不服管理、違犯軍紀等行為成了英軍營地里最大的問題。潘穆爾在聽說了士兵“大規模醉酒”的報告后，向科德林頓寫信，警告他“如果不盡快將這一惡魔控制住的話，你部隊士兵的身體必然會遭受極壞影響，而且這樣日積月累會使國家的品格蒙羞”。他呼吁扣下士兵的軍餉，并用軍事法庭對付酗酒鬧事的士兵。從10月份到第二年3月，共有四千名英軍士兵因醉酒而被送上軍事法庭。絕大部分被判鞭笞五十下，許多被扣下一個月的軍餉，但是醉酒狀況依然繼續，直到所有的酒都被喝完，部隊離開了克里米亞。[[39]](#_39_WO_28_126__NAM_6807_379_4__P)

\* \* \*

塞瓦斯托波爾被攻克的消息傳來，倫敦和巴黎一片歡騰。街道上有人跳舞，有人喝酒慶祝，還有很多人高唱愛國歌曲。不少人以為這意味著戰爭結束了，占領這座俄軍軍港、摧毀沙皇的黑海艦隊一直是許多人心目中的戰爭目標，而這些目標現在實現了。但事實上，從軍事角度說，占領塞瓦斯托波爾離打敗俄羅斯還差得很遠：還需要大規模陸地入侵，占領莫斯科或在波羅的海上對圣彼得堡取得軍事勝利之后才談得上打敗俄國。

如果西方國家領導人曾經希望塞瓦斯托波爾的淪陷能迫使沙皇祈求和平的話，他們很快就失望了。《帝國公告》（Imperial Manifesto）在向俄羅斯人民宣布塞瓦斯托波爾失守的消息時，帶著明顯的不屈口吻。9月13日亞歷山大搬到了莫斯科，特意安排重演了亞歷山大一世在1812年7月拿破侖入侵之后忽然出現在“國家”首都的一幕，在馬路兩邊群眾的歡呼聲中步入克里姆林宮。“記住1812年，”沙皇在9月14日給軍隊總指揮戈爾恰科夫的信中寫道，“塞瓦斯托波爾不是莫斯科，克里米亞不是俄羅斯。莫斯科被焚毀兩年后，我們勝利的隊伍行進在巴黎街頭。我們還是同樣的俄羅斯人，上帝在我們這一邊。”[[40]](#_40_S__Tatishchev__Imperator_Ale)

亞歷山大想盡辦法讓這場戰爭繼續下去。9月下旬，他寫了一份1856年在巴爾干地區發動新攻勢的詳細計劃。在這份計劃中，俄羅斯將協助斯拉夫和東正教徒組成黨派武裝，以挑動民族主義暴動的方式，將戰火引到歐洲地區敵人的領土上。根據皇后女侍官丘特切娃的記載，亞歷山大對“任何提議和平的人加以斥責”。外交部長涅謝爾羅迭肯定是歡迎和平談判的，并告訴奧地利人他歡迎“與我國榮譽相襯”的和平談判。但當時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卻只談論如何繼續戰爭——即使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以向聯軍施加壓力給俄羅斯開出更好的和平條件。沙皇知道法國人已對戰爭感到疲倦，他知道拿破侖三世傾向和平，因為在占領塞瓦斯托波爾之后，法國皇帝已經實現了取得一場“輝煌勝利”的目標。亞歷山大意識到不愿意結束戰爭的是英國人。帕默斯頓一向都把克里米亞戰爭視為開端，希望針對俄羅斯打一場更大規模的戰爭，以此削減俄羅斯帝國的勢力。英國公眾的態度，從能夠了解到的情況看，也是站在帕默斯頓這一邊的。甚至連維多利亞女王都不能接受英軍“攻打棱尖棱堡的失敗”將會是——用她的話說——“我們的最后一戰（fait d’armes）”。[[41]](#_41_RGVIA__f__481__op__1__d__36)

在長期忽略小亞細亞和高加索地區之后，英軍目前最擔心的是俄軍對土耳其要塞卡爾斯的圍困。在塞瓦斯托波爾失守之后，亞歷山大下令加強了對卡爾斯的圍困，以贏得更多和平談判的籌碼。一旦攻克卡爾斯，俄軍即可長驅直入埃爾祖魯姆和安納托里亞，威脅從陸地前往印度的路線，損害英國利益。亞歷山大在6月下令進攻卡爾斯，目的是希望能牽制聯軍在克里米亞的部隊。俄軍派出了一支由兩萬一千名步兵、六千名哥薩克騎兵和八十八門大炮組成的部隊，由穆拉維約夫將軍（General Muraviev）率領，從俄土邊境出發，行進到不過七十公里之外的卡爾斯。卡爾斯當時有一萬八千名土耳其守軍，由英國人威廉·威廉斯將軍（General William Williams）指揮，他們知道自己在野戰中一定不敵俄軍，于是把所有力氣都花在加固城防上了。當時土耳其軍隊中有一批外國軍官，包括在1848—1849年革命失敗后逃到土耳其的波蘭、意大利和匈牙利難民，其中有許多技術出色的工程師。俄軍在6月16日發起進攻，被守軍頑強擊退后，他們開始了圍困，一再用饑餓來迫使守軍投降，他們把對卡爾斯的圍困看作聯軍對塞瓦斯托波爾包圍的回應。

土耳其人希望能派出一支遠征部隊救援卡爾斯。奧爾馬帕夏向英法聯軍提議，由他從駐防刻赤和葉夫帕托里亞的土耳其部隊中（一共約兩萬五千步兵和三千騎兵）抽調一支部隊，“由我占領切爾克斯海岸某處，威脅俄軍交通線，逼迫他們放棄對卡爾斯的圍困”。克里米亞的聯軍指揮部不愿在這個問題上做決定，于是把難題交給了倫敦和巴黎的政客們。英法兩國一開始不愿意從克里米亞抽調土耳其部隊，后來總體上同意了這一計劃，但是又對抵達卡爾斯的最好途徑展開爭論。直到9月6日，奧爾馬帕夏才離開克里米亞，率領四萬人的部隊前往格魯吉亞海岸線上的蘇呼米，從那里他還需要行軍幾個星期才能抵達高加索南部。

與此同時，圍困卡爾斯的穆拉維約夫將軍越來越沉不住氣了。圍困戰對守軍造成了很大打擊，城內不僅食物短缺，而且霍亂肆虐；但是盡管如此，因為塞瓦斯托波爾已經失守，沙皇需要盡快占領卡爾斯，同時奧爾馬帕夏的部隊正在趕來增援，穆拉維約夫沒有時間繼續等待，無法依靠圍困磨垮守軍的意志。于是在9月29日，俄軍對卡爾斯的棱堡發動了一場全面進攻。然而盡管實力已被削弱，土耳其守軍依然極為頑強，有效地發揮了炮兵威力，造成俄軍巨大傷亡，約兩千五百人戰死，兩倍于此的人受傷，而土耳其守軍只有一千人傷亡。穆拉維約夫不得不重新恢復圍困戰略。到10月中旬，當奧爾馬帕夏的部隊經過多次延遲，終于從蘇呼米出發時，卡爾斯的守軍已飽受饑餓煎熬，醫院里擠滿了患上敗血癥的軍人。鎮上的女人把家里的孩子帶到威廉斯將軍府前，丟在那里讓他給孩子喂食。所有的馬匹都被殺了吃肉，人們已開始靠挖野菜度日。

10月22日，消息傳來說奧馬爾帕夏的兒子塞利姆帕夏（Selim Pasha）帶領一支兩萬人的部隊在土耳其北海岸登陸了，正向埃爾祖魯姆進發。從埃爾祖魯姆到卡爾斯只需幾天路程，但這時卡爾斯的狀況已更為惡劣：每天有一百人死亡，士兵們不斷開小差。在那些還能打仗的人中，士氣也低落到了極點。10月底的大雪讓土耳其救援部隊幾乎不可能很快抵達卡爾斯。奧爾馬帕夏的部隊在明格里連（Mingrelia）[§](#SS_Jin_Tian_De_Sa_Mei_Ge_Lie_Luo)地區被俄軍阻擋了一下，然后也并不急于前往卡爾斯，反而在明格里連首府祖格迪迪（Zugdedi）休息了五天，部隊在那里偷搶財物并劫持小孩賣作奴隸。從祖格迪迪出發，沿途是茂密的森林和沼澤，土耳其部隊在大雨中行進緩慢。同時從埃爾祖魯姆出發的塞利姆帕夏的部隊行進甚至更慢，原來他并沒有兩萬人馬，手下部隊的人數連這個數字的二分之一都不到，實力不足以獨自擊退穆拉維約夫的部隊，于是塞利姆帕夏決定沒必要做此嘗試。11月22日，一名英國外交官交給威廉斯將軍一個便條，告知他塞利姆帕夏的部隊不會前來卡爾斯增援。一切希望破滅之后，威廉斯將軍帶領守軍向穆拉維約夫將軍投降。值得一提的是，穆拉維約夫保證四千名傷病的土耳其士兵將得到救治，并向三萬名被他的部隊餓垮的守軍和平民分發了食物。[[42]](#_42_Tarle__Krymskaia_voina__vol)

占領卡爾斯之后，俄軍占領的敵方土地超過了聯軍占領的俄羅斯土地。亞歷山大將這一勝利視作對塞瓦斯托波爾失守的反擊，認為現在是向奧地利和法國人發出和平信號的時候了。11月底，巴黎與圣彼得堡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系，拿破侖三世的表親、法國外交部長瓦萊夫斯基伯爵找到了涅謝爾羅迭的女婿、在巴黎代表俄羅斯利益的馮·澤巴赫男爵。澤巴赫向涅謝爾羅迭匯報說，瓦萊夫斯基“個人非常傾向”與俄羅斯進行和談，但警告說拿破侖三世“被他對英格蘭的恐懼所支配”，決意維護與英國之間的聯盟。如果俄羅斯想要和平的話，必須提出一些建議，比如限制俄羅斯海軍在黑海的勢力，讓法國能借此說服英國開始談判。[[43]](#_43_Mosse___How_Russia_Made_Peac)

這么做并不容易，在卡爾斯失守后，英國政府更加堅定決心，要繼續與俄羅斯開戰，并將戰爭擴大到其他地區。英國內閣在12月開會，討論將克里米亞地區的聯軍部隊抽調一半前往位于黑海南岸的特拉布宗，切斷俄軍向埃爾祖魯姆和安納托里亞進軍的路線。英方準備好了行動方案，準備交由1月舉行的聯軍戰爭聯席會議討論。英國政府還在討論是否在波羅的海發動一次大規模攻勢。在8月份，聯軍海軍部隊摧毀了芬蘭堡，向聯軍領導人顯示了蒸汽裝甲艦艇和遠程艦炮的威力。在威斯敏斯特圈子外，英國社會幾乎一致認為攻占塞瓦斯托波爾不過是一場對俄大戰的開始，即使一直提倡和平的格拉德斯通也不得不承認英國公眾不希望戰爭就此終結。反俄報刊呼吁帕默斯頓在波羅的海發動一場春季攻勢，要求摧毀喀瑯施塔得，要求封鎖圣彼得堡港口，要求把俄羅斯人趕出芬蘭，總之必須將俄羅斯對歐洲自由和英國近東利益的威脅全部消除。[[44]](#_44_Baumgart__The_Peace_of_Paris)

帕默斯頓和他的“主戰派”在擴大對俄戰爭上有自己的目的，遠遠超出了克里米亞戰爭保衛土耳其的原始目標，而是為了永久地遏制俄羅斯，削弱俄羅斯帝國的力量，使之無法與大英帝國抗衡。“這場戰爭主要和真正的目的是遏制俄羅斯的擴張野心，”帕默斯頓在9月25日向克拉倫登寫道，“我們投入戰爭，除了幫助蘇丹和他的穆斯林子民保住自己的土地外，同樣重要的是為了不讓俄羅斯染指挪威和瑞典。”帕默斯頓提議繼續進行一場泛歐洲規模的戰爭并同時將戰火擴大到亞洲，“以鉗制俄羅斯的勢力”。從他的角度看，如果波羅的海各國能向土耳其那樣加入這場擴大戰爭的話，它們將構成“一條綿長的城墻的一部分，遏制俄羅斯將來的擴張”。帕默斯頓堅稱俄羅斯的“一半還沒被打倒”，堅持至少再打一年，直到克里米亞和高加索都脫離俄羅斯，波蘭也贏得獨立才行。[[45]](#_45_BLMD__Add__MS_48579__Palmers)

這一想法已經不再是通過結盟以一批親西方的國家包圍俄羅斯，而是試圖發動一場“民族主義戰爭”，從內部讓俄羅斯帝國分崩離析。帕默斯頓最早在1854年3月致英國內閣的備忘錄中就闡述了這一想法。那時候他提議把克里米亞和高加索歸還奧斯曼帝國，把芬蘭給瑞典，把波羅的海各省給予普魯士，把比薩拉比亞給奧地利，將波蘭重建為獨立于俄羅斯的王國。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這些想法曾被多位英國政治人物討論過，并已被暗中接受為英國內閣非官方的戰爭目標。正如阿蓋爾公爵（Duke of Argyll）[¶](#P_Shi_Ren_Zhang_Xi_Da_Chen__Lord)在1854年10月給克拉倫登的信中所解釋的那樣，帕默斯頓備忘錄的基本理念是，《四點方案》是一個“良好并且足夠的”戰爭方案，只要它可以在“任何程度上被修改和延伸”就行，如果“一場成功的戰爭能夠握在我們的掌心”，那么肢解俄羅斯這個目標將會變得既可取又可能。在占領塞瓦斯托波爾后，這些想法再一次在帕默斯頓的主戰派核心圈子里被提了出來。“我懷疑帕默斯頓希望克里米亞戰爭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一場民族主義戰爭，但是現在還不想公開承認。”政治記者查爾斯·格雷維爾（Charles Greville）在12月6日寫道。[[46]](#_46_Argyll__Duke_of__Autobiograp)

整個1855年秋，帕默斯頓一直鼓動在第二天春天重新開戰，哪怕只是為了持續向俄羅斯施加壓力，迫使其接受懲罰性和平條件。讓他非常惱怒的是，法國和奧地利已與俄羅斯開始直接對話，并且愿意考慮在《四點方案》的基礎上接受相對溫和的和平條件。在10月9日給克拉倫登的信中，他說他相信“涅謝爾羅迭和他的間諜們”正于“巴黎和布魯塞爾在法國人身上下功夫”，現在“奧地利和普魯士人已經和涅謝爾羅迭攜手合作”，英國方面需要投入“我們全部的意志和技巧，才能避免被卷入其中。這樣的和平只會辜負英國的首要期待，讓這場戰爭的真正目標無法實現”。在同一封信中，他還列出了和平的最低條件：俄羅斯必須停止對多瑙河兩公國的干涉，蘇丹“給予兩公國的親王們良好的執政法規，像那些過去就曾得到英國和法國認可的那樣”；俄羅斯將多瑙河三角洲給予土耳其；俄羅斯失去黑海地區的所有海軍基地，加上“他們手中任何可以用來向鄰國發起攻擊的地方”，其中包括克里米亞和高加索。至于波蘭，帕默斯頓不再確定英國能夠支持一場獨立戰爭，但是認為可以交給法國執行，因為這一想法正被法國外交部長瓦萊夫斯基推動，這樣做可以繼續向俄羅斯施加壓力，讓他們接受自己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已被削弱這一事實。[[47]](#_47_BLMD__Add__MS_48579__Palmers)

但是法國人對帕默斯頓的計劃并不太熱心。克里米亞戰爭中，大部分硬仗是法國人打的，所以他們的想法很有分量，不會比帕默斯頓的方案輕。如果沒有法國的支持，英國人要把戰爭繼續延續下去，幾乎連想都不用想，更別提說服其他歐洲國家參與了，這些國家絕大部分更愿意接受法國的領導。

法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遭受的損失比英國大。除了戰斗減員外，法軍還因各種疾病受到很大損失，主要是在1855年秋冬季發生的敗血癥和斑疹傷寒，再加上霍亂。他們遇到的問題和英軍上一年冬季的遭遇相似，不過兩軍的情況對換了一下。英國在過去一年大大改善了衛生情況和醫藥品供應，法軍原來的高標準卻下降了，原因是大批增援部隊來到克里米亞，法軍卻沒有足夠的資源應對新增的需求。

在這樣的情況下，讓拿破侖三世下令繼續作戰是不現實的。他可以下令暫停軍事行動，直到第二年春天，到時候法國軍隊的狀況也許已經恢復。但是此時法軍的士氣已非常低落，從官兵的家信內容上看，他們已無法忍受再在克里米亞待上一個冬天。例如夏爾·圖馬上尉（Captain Charles Thoumas）在10月13日寫道，他認為如果不能很快將部隊送回國的話，就有發生暴亂的危險。朱阿夫部隊的一名中尉弗雷德里克·雅皮也認為士兵們會起來反抗軍官，因為他們不愿意參加一場在他們眼里主要為英國利益服務的戰爭。亨利·盧瓦齊永擔心開展新的軍事行動將會讓法國卷入一場無休無止的戰爭，因為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領土廣袤到無法征服的國家——他相信這是他們應該從1812年戰敗中得出的教訓。[[48]](#_48_C__Thoumas__Mes_souvenirs_de)

法國的公眾輿論也不會再支持軍事行動。法國經濟已受到克里米亞戰爭的嚴重影響：貿易量下降；農業受困于征兵造成的勞力短缺，因為法國已派出了三十一萬人的部隊前往克里米亞；城市中還出現了食品短缺，從1855年11月起許多人都開始感覺到這一點。根據當地行政法律部門官員的報告，如果戰爭持續到冬天的話，真的有出現平民騷亂的危險。1854年時，法國地方報紙曾帶頭要求向俄羅斯開戰，現在連它們也在呼吁結束戰爭了。[[49]](#_49_A__Gouttman__La_Guerre_de_Cr)

拿破侖三世從來都對公眾輿論很敏感，在1855年秋天，他一直在尋找一種方案，既能夠結束戰爭，又不至于得罪英國人。他很想從占領塞瓦斯托波爾這場“輝煌的勝利”中撈取最大的政治資本，但又不希望損害與英國的聯盟關系，因為這正是他外交政策的基石。原則上拿破侖三世并不反對針對俄羅斯開展一場更廣泛的戰爭，對帕默斯頓通過打一場歐洲大戰來重劃歐洲版圖的愿景抱支持態度。他希望能因此在其他歐洲國家激發民族革命，打破1815年（拿破侖戰敗）后的歐洲體系，通過犧牲俄羅斯和神圣同盟的利益來確立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領導地位。但是他不會讓法國卷入在小亞細亞和高加索地區針對俄羅斯的戰爭，因為他覺得在那里發動戰爭主要是為英國利益服務。從他的角度來看，唯一能說服他繼續對俄羅斯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的理由是這場戰爭能實現他對歐洲大陸的偉大夢想。他在11月22日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提出三個可能的局面：一場有限的防御消耗戰；基于《四點方案》開展和平談判；或是“向所有民族呼吁，重建波蘭，實現芬蘭和匈牙利獨立”。拿破侖三世解釋道，他個人傾向和平，但是如果英國覺得基于《四點方案》的和平無法接受的話，他愿意商討進行一場更大規模的歐洲戰爭。“我能夠看出，這項政策，”他向維多利亞女王寫道，“具有宏偉的意義，因此取得的成果將可能與付出的犧牲相稱。”

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拿破侖三世的話是言不由衷的，他的提議是迫使英國加入和平談判的一個計謀。他知道英國人不愿看到一場拿破侖式的戰爭在歐洲大陸上實現國家解放。在言辭中，他放出一點暗示，如果帕默斯頓逼他攤牌的話，他真的會發動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幾年之后的1858年，他在向當時的英國駐法國大使考利勛爵回顧這段歷史時，解釋說因為法國民意希望和平，這迫使他接受結束克里米亞戰爭的決定；但如果他在帕默斯頓的逼迫下繼續這場戰爭的話，他決心“在歐洲沒有實現一個更好的平衡之前，不會接受和平”。[[50]](#_50_W__Echard__Napoleon_III_and)

不管拿破侖三世的意圖是什么，法國外交部長瓦萊夫斯基是強烈支持立刻實現和平的，而且明顯在利用拿破侖三世將會發動一場歐洲革命戰爭這一威脅來迫使英國、奧地利和俄羅斯啟動基于《四點方案》的和平談判。拿破侖三世自己也參與到這場游戲中來，他給瓦萊夫斯基寫信，并指示他交給克拉倫登看：

我想要得到和平。如果俄羅斯同意讓黑海地區中立化，我愿意與他們達成和平，不管英國會如何反對。但是，如果到了春天還是沒有什么結果，我會向歐洲各民族，特別是波蘭人發出呼吁。那場戰爭的出發點，不是為了歐洲的權利，而是為了每一個國家的利益。

如果說拿破侖三世發動一場革命戰爭的威脅是空話，那么他單獨與俄羅斯達成和平卻是實實在在的威脅。巴黎與圣彼得堡建立直接外交聯系這一舉動得到了一股強大的派別勢力的支持，領頭的是法國皇帝的同母異父兄弟德·莫爾尼公爵（Duc de Morny）。他是一名鐵路監察員，把俄羅斯視為“可以由法國開采的礦藏”。10月份，莫爾尼和俄羅斯駐維也納大使、很快將成為外交部長的戈爾恰科夫親王建立了聯系，并提出一份由法國和俄羅斯單獨談判、實現和平的計劃。[[51]](#_51_Gouttman__La_Guerre_de_Crime)

法國人的這些動作讓奧地利警覺起來，馬上介入了談判。外交部長布奧爾伯爵主動約見法國駐維也納大使布爾克內（Bourqueney），并與莫爾尼協同行動。此時，莫爾尼已從戈爾恰科夫親王那里探明了俄羅斯可能接受的條件，三人共同制定了一套和平提議，其方式是在英法兩國的支持下，由奧地利“為維護奧斯曼帝國的完整”而向俄羅斯發出達成和平的最后通牒。這一最后通牒基本上就是把《四點方案》換個說法重述一遍，不同之處是俄羅斯將交出比薩拉比亞部分地區，從而使俄羅斯疆土與多瑙河地區完全隔絕；黑海地區的中立化將由俄羅斯和土耳其通過雙邊協議實現，而不再由和平條約規定細節。另外，雖然俄羅斯已經接受將《四點方案》作為談判基礎，但是最后通牒又加上了第五條，規定勝利方保留在和平談判過程中“為了歐洲的利益”而添加條件的權利。[[52]](#_52_Mosse___How_Russia_Made_Peac)

11月18日，和平提議送達倫敦。這份最后通牒由法國和奧地利這兩個天主教國家共同制定，英國僅被知會了進展，這一點讓英國政府感覺受到了冒犯。帕默斯頓決意不接受這份提議，他懷疑俄羅斯在其中施加影響柔化了和平的條件。和平提議沒有提到波羅的海，也沒有說明如何保證俄羅斯不在黑海地區實施侵略行為。“我們依然堅持之前提出的‘和平原則’，維持歐洲未來的和平需要這個，”他在12月1日向克拉倫登寫道，“如果法國政府改弦易轍，那將來他們必須承擔責任，英法兩國人民都應該被告知這一點。”克拉倫登還是一貫的謹慎，他擔心法國也許真會單獨與俄羅斯達成和平，如果這樣的話，英國人不可能不加理會而獨自繼續作戰。英國外交部成功爭取到對和平提議做出一些小的修改：黑海地區中立化將由一項綜合條約保證，第五條中將包括“特別條件”等。但除了這些小修改外，克拉倫登贊成接受法國人和奧地利人制定的和平條件。在女王的幫助下，他說服了帕默斯頓接受這一計劃，至少暫時做此表示，以防法國與俄羅斯單獨媾和。他還提出反正沙皇很有可能拒絕這一和平提議，這樣的話英國可以繼續恢復交戰并且提出更為嚴苛的和平條件。[[53]](#_53_BLMD__Add__MS_48579__Palmers)

克拉倫登基本猜對了，整個秋天沙皇一直處于一種戰爭心態中。根據一位俄羅斯高級外交官的說法，沙皇“很不愿意和敵人達成妥協”，因為這時敵軍正面臨第二次在克里米亞過冬的前景。拿破侖三世對和平的渴求讓沙皇覺得俄羅斯也許有機會爭取更好的條件來結束戰爭，他所要做的無非是讓俄軍繼續保持作戰姿態，等待法國國內矛盾激化。在一封給軍隊總指揮戈爾恰科夫的信中，沙皇透露了他的想法，他聲稱看不到提早結束沖突的希望：俄羅斯將繼續作戰，直到法國在國內即將發生騷亂時被迫同意和平條件，因為農業歉收和底層人民的不滿，法國國內矛盾將會激化：

在過去革命都是這樣發生的，很有可能一場大革命已經不遠了。我認為這是目前這場戰爭最有可能的結局，我并不期待法國或英國會有真誠的和平愿望，接受符合我們想法的和平條件，只要我還活著，我不會接受任何其他和平條件。[[54]](#_54_Mosse___How_Russia_Made_Peac)

沒人能夠說服主戰的沙皇做出讓步。澤巴赫給沙皇帶來一封拿破侖三世的私人信息，呼吁沙皇接受和平提議，否則如果西方聯軍恢復對俄作戰，沙皇將面臨損失半個帝國的危險。11月21日，有消息傳來說瑞典終于同意與西方列強簽署軍事協議，這對俄羅斯來說是個不祥之兆，意味著聯軍有可能在波羅的海發動一場新的攻勢。甚至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聲稱，如果亞歷山大繼續進行一場“威脅歐洲所有合法政府穩定”的戰爭，他也許會被迫加入西方國家聯盟，站到俄羅斯的對立面。“我懇求你，親愛的外甥，”他向亞歷山大寫道，“做出你能接受的最大讓步，仔細考慮如果這場殘酷的戰爭繼續下去的話，將會給俄羅斯的真實利益、給普魯士和整個歐洲帶來怎樣的后果。破壞性的激情一旦被釋放出來，將會出現什么樣的革命影響，誰也無法估量。”然而，即使是在這些警告面前，亞歷山大依然固執己見。“我們已經達到所能做的極限，俄羅斯的榮譽所能接受的極限，”他在12月23日向戈爾恰科夫寫道，“我永遠不會接受恥辱的條約，我相信每一個真正的俄羅斯人都跟我有一樣的想法。現在我們能做的只是在心口劃上十字，然后勇往直前，憑借自己的力量團結一致，保衛我們的祖國和國家榮譽。”[[55]](#_55_Mosse___How_Russia_Made_Peac)

兩天之后亞歷山大收到奧地利的最后通牒，列出了西方聯盟的和平條件。沙皇邀請他父親最信任的幕僚們到圣彼得堡的冬宮召開會議商量對策。在會上，比沙皇年長、頭腦也冷靜一些的大臣們的意見占了上風。其中最關鍵的發言出自國家財產部長（Minister of State Domains）基謝廖夫（Kiselev），他管理著俄羅斯的兩千萬農民。他的發言明顯也代表了其他參會者的意見。他提出俄羅斯缺乏資源繼續維持戰爭，一些本來中立的勢力現在開始轉向西方聯盟，冒著與所有西方國家開戰的風險行事是魯莽的，即使僅僅和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敵對勢力繼續保持軍事敵對也是不明智的，這么做不僅俄羅斯贏不了，還會導致對方提出更為苛刻的和平條件。基謝廖夫說，他相信大部分俄羅斯民眾有著和沙皇一樣的愛國熱情，但是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的話，有些人可能會開始動搖，有可能出現革命騷動。當前農民中已經有動蕩的跡象，他們是戰爭負擔的主要承受者。基謝廖夫認為，不應該拒絕奧地利的和平提議，但是可以提供修改意見以保障俄羅斯的領土完整。會議同意基謝廖夫的看法，向奧地利發出回復，表示接受他們的和平提議，但是拒絕割讓比薩拉比亞，拒絕附加第五條。

俄羅斯的反建議讓西方盟國之間產生了分歧。對奧地利來說，比薩拉比亞的歸屬與它關系密切，因此立即威脅要與俄羅斯斷交；但是法國卻不愿讓和平談判因此而中斷，對拿破侖三世來說，那不過是“比薩拉比亞的幾塊土地！”他在1856年1月14日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女王的觀點是他們應該推遲和平談判，好好利用俄羅斯與奧地利之間的分歧。這是一個很好的建議，因為亞歷山大和他父親一樣，最擔心奧地利向俄羅斯宣戰，也許只有奧地利的威脅才能把他拉回到談判桌上。1月12日，奧地利外交部長布奧爾伯爵通知俄羅斯說如果他們拒絕接受和平條件，奧地利將在六天之后與俄羅斯斷交。腓特烈·威廉四世在一份發往圣彼得堡的電報中表達了他對奧利地和平提議的支持。沙皇現在已經處于孤立無援之境了。

1月15日，亞歷山大再次在冬宮召集高級幕僚開會商討對策。這次做關鍵發言的是涅謝爾羅迭，他警告沙皇盟國已決定在今后一兩年內向多瑙河和比薩拉比亞靠近奧地利邊境地區集中兵力，奧地利有可能會卷入針對俄羅斯的敵對行動，而且奧地利的決定將影響其他中立國家如瑞典和普魯士的立場。如果俄羅斯現在拒絕和平，將可能要與整個歐洲作戰。年邁的沃龍佐夫親王是前高加索總督，他支持涅謝爾羅迭的觀點，他用充滿感情的聲音勸說沙皇接受奧地利的和平條件，不管這一決定多么讓人痛苦。繼續戰爭不可能再取得更多成就，拒絕和平反而可能導致更恥辱的結局，俄羅斯也許會失去克里米亞、高加索，甚至芬蘭和波蘭。基謝廖夫同意沃龍佐夫的看法，并補充說這場戰爭如果繼續下去，奧地利軍隊逼近俄羅斯西部邊境時，沃里尼亞波多利亞地區的民眾可能會跟芬蘭人和波蘭人一樣起來暴動。和這些風險相比，奧地利最后通牒中的要求算不了什么。沙皇手下的高級官員們一個接一個地懇求他接受和平提議，只有亞歷山大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堅持繼續作戰，但是他在政府里并無職位，不管他以1812年的抵抗精神為號召在心理上多么打動人，他拿不出實際的理由來說服這些高級官員。最后沙皇做出決定，第二天奧地利人收到了來自涅謝爾羅迭的消息，宣布沙皇接受以他們的和平條件作為談判基礎。[[56]](#_56_Mosse___How_Russia_Made_Peac)

\* \* \*

在塞瓦斯托波爾，聯軍部隊正準備在克里米亞度過第二個冬天。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否需要繼續作戰，但是營地里流傳著各種各樣的謠言：說他們會被派往多瑙河，或是高加索，或是俄羅斯的其他什么地方參加春季攻勢。“我們下一步將會如何？”一名法國軍隊里的營指揮官約瑟夫·費弗爾（Joseph Fervel）在12月15日給德·卡斯特拉內元帥的信中寫道，“下一年我們會在什么地方？每個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但是沒有人能夠回答。”[[57]](#_57_Boniface__Campagnes_de_Crime)

與此同時，駐扎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高地上的部隊每天都忙于過日子。補給改善了，現在士兵們已經有了更好的帳篷和木屋。法軍供給港卡米什以及靠近英軍補給港的卡迪科伊村整天人滿為患，瑪麗·西科爾的餐館生意熱火朝天。有各種各樣的娛樂活動供軍隊消遣：劇院、賭博、桌球、打獵，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在平原上賽馬。一船又一船的英國游客前來參觀著名的戰場，收集紀念品：一把俄軍的槍或是佩劍，或者是在塞瓦斯托波爾陷落后，從留在塹壕里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俄軍尸體上偷來的制服等等。“只有英國人才會有這樣的嗜好。”一名法軍軍官寫道，游客對戰場的病態迷戀讓他大開眼界。[[58]](#_58_D__Noel__La_Vie_de_bivouac)

接近1856年1月底的時候，和平即將達成的消息傳來，聯軍士兵們開始與俄軍士兵進行越來越多的友好交流。戈列夫將軍的勤務兵、參加過棱尖棱堡守衛戰的年輕士兵波普羅科菲·帕德羅夫當時就駐扎在喬爾納亞河附近的營地，也就是8月份俄軍反擊戰的地點。“一天天過去，我們與駐扎在河對面的法軍部隊變得越來越友好，”他回憶道，“長官們告訴我們要和他們以禮相待。我們通常會走到河邊，隔著河給他們扔過去些東西（這條河不寬）：十字架、硬幣什么的，然后法軍士兵會扔給我們香煙、皮袋子、小刀、錢。我們是這么對話的：法國人會說‘俄羅斯同志們！’然后俄國人會說‘法蘭西兄弟！’。”后來法軍士兵開始過河來探訪俄軍營地里的士兵，他們在一起喝酒吃東西，為對方演唱，用手勢交流。這樣的探訪后來變得頻繁起來。有一天，法國士兵拿出一些卡片來，上面寫著他們的名字和部隊番號，邀請俄軍士兵回訪。幾天過去了，這些法軍士兵沒有再過來，于是帕德羅夫和一些戰友決定去探訪法軍營地。他們在法軍營地看到的景象讓他們十分驚訝。“到處都是干干凈凈的，在長官的帳篷旁邊甚至還種著花。”帕德羅夫回憶道。他們找到了那些法國朋友，被邀請到帳篷里一起喝朗姆酒。法軍士兵們把他們送回到河邊，多次和他們擁抱，還請他們下次再來。一個星期之后帕德羅夫又獨自來到法軍營地，卻找不到他的朋友們了。他被告知說，他們已經起程回巴黎了。[[59]](#_59_Liaskoronskii__Vospominaniia)

[\*](#_121) 法國元帥德·卡斯特拉內的兒子。——譯注

[†](#_122) 為了阻止士兵逃跑，俄軍軍官對手下士兵說，如果他們向敵人投誠，他們的耳朵會被割下來交給土耳其人（土耳其軍隊的傳統是割下敵人耳朵領賞），但即使這樣也沒能阻止俄軍士兵大規模逃跑。——原注

[‡](#_123) 原文如此，應為柯林·坎貝爾中將之誤，當時他已晉升為中將，任第一師師長。——譯注

[§](#SS_10) 今天的薩梅格列羅（Samegrelo），位于格魯吉亞西部。——編注

[¶](#P_10) 時任掌璽大臣（Lord Privy Seal），屬內閣成員但無特定職責。——譯注

注釋

[[1]](#_1_11)E. Bonifac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 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p. 247.

[[2]](#_2_11)A. Maude, The Life of Tolstoy: First Fifty Years (London, 1908), p. 119.

[[3]](#_3_11)NAM 1984–09–31–129 (Letter, 9 July 1855); NAM 1989–03–47–6 (Ridley letter, 11 Aug. 1855).

[[4]](#_4_11)A. de Damas,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pp. 84–6.

[[5]](#_5_11)L. Noir,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p. 282; J. Cler,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pp. 231–232; C. Mismer,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ee de Crimée (Paris, 1887), p. 117.

[[6]](#_6_11)H.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é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a sa famille (Paris, 1895), pp. x–xi, 116–7.

[[7]](#_7_11)J. Baudens, La Guerre de Crimée: Les campements, les abris, les ambulances, les hopitaux, etc. (Paris, 1858), pp. 113–15; G. Guthrie, Commentaries on the Surgery of the War in Portugal... with Additions Relating to Those in the Crimea (Philadelphia, 1862), p. 646.

[[8]](#_8_10)Kh. Giubbenet,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pp. 143–4.

[[9]](#_9_10)Kh. Giubbenet,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pp. 10, 13, 88–90; RA VIC/MAIN/QVJ/1856, 12 Mar.

[[10]](#_10_11)M.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pp. 164–169; W. Baumgart,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London, 1999), p. 159.

[[11]](#_11_10)E. Tarl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vol. 2, p. 328.

[[12]](#_12_10)RGVIA, f. 846, op. 16, d. 5732, l. 28; E.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pp. 244–5; 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 139.

[[13]](#_13_10)RGVIA, f. 9196, op. 4, sv. 2, d. 1, ch. 2, ll. 1–124; f. 9198, op. 6/264, sv. 15, d. 2/2, ll. 104, 112; f. 484, op. 1, d. 264, ll. 1–14; d. 291, ll. 1–10; 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ée, p. 267;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ee, pp. 105, 139; H.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p. 249.

[[14]](#_14_10)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 195.

[[15]](#_15_10)A. Seaton,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p. 196.

[[16]](#_16_11)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p. 120–2;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344–7;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197.

[[17]](#_17_10)M. O. Cullet,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pp. 199–203; 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202; D. Stolypin, Iz lichnyh vospominanii o krymskoi voine i o zemledel’cheskih poryadkakh (Moscow, 1874), pp. 12–16; I. Krasovskii, Iz vospominanii o voine 1853–1856 (Moscow, 1874); P. Jaeger, Le mura di Sebastopoli: Gli italiani in Crimea 1855–56 (Milan, 1991), pp. 306–9.

[[18]](#_18_11)Cullet, Un régiment, pp. 207–8.

[[19]](#_19_11)Seaton, The Crimean War, p. 205; J.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318.

[[20]](#_20_10)Jaeger, Le mura di Sebastopoli, p. 315;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ée, pp. 168–170; M. Seacol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 (London, 2005), p. 142; T. Buzzard, With the Turkish Army in the Crimea and Asia Minor (London, 1915), p. 145.

[[21]](#_21_10)Seaton, The Crimean War, pp. 206–7.

[[22]](#_22_10)Herbé, Franca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 321; N. Berg, Zapiski ob osade Sevastopolia, 2 vols. (Moscow, 1858), vol. 2, p. 1.

[[23]](#_23_11)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 201.

[[24]](#_24_11)H. Small,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pp. 169–70;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157, 242–3; Cullet, Un regiment, p. 220.

[[25]](#_25_10)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p. 90–1; Giubbenet, Ocherk, p. 148.

[[26]](#_26_10)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 57; Vrochenskii, Sevastopol’skii razgrom, pp. 213–220; 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360–61. 有關俄羅斯方面從聯軍戰俘處獲得的情報，參見 RGVIA, f. 846, op. 16, d. 5687, l. 7.

[[27]](#_27_10)A. Niel, Siège de Sébastopol: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u génie (Paris, 1858), pp. 492–502; E. Perret, Les Franç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p. 377–9;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pp.328–9; V. 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rokofiia Antonovicha Podpalova (Kiev, 1904), pp. 19–20; Tolstoy’s Letters, ed. and trans. by R. F. Christian,2 vols. (London, 1978), vol. 1, p. 52.

[[28]](#_28_10)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l. 58–60; A. Viazmitinov, ‘Sevastopol’ ot 21 marta po 28 avgusta 1855 goda’, Russkaia starina, 34 (1882), pp. 55–56; Ershov, Sevastopol’skie vospominaniia, pp. 277–9.

[[29]](#_29_10)J. Spilsbury,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p. 303.

[[30]](#_30_10)Spilsbury, Thin Red Line, p. 304; C. Campbell, Letters from Camp to His Relatives during the Siege of Sebastopol (London, 1894), pp. 316–7; Clifford, Letters and Sketches, pp. 257–8.

[[31]](#_31_9)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 65.

[[32]](#_32_10)M. Bogdanovich,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4 vols. (St Petersburg, 1876), vol. 4, p. 127.

[[33]](#_33_9)RGVIA, f. 846, op. 16, d. 5758, l. 68; T. Tolycheva, Rasskazy starushki ob osade Sevastopolia (Moscow, 1881), pp. 87–90.

[[34]](#_34_9)Tolstoy’s Letters, vol. 1, p. 52.

[[35]](#_35_9)Sobranie pisem sester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popecheniia o ranenykh (St Petersburg, 1855), pp. 74, 81–2.

[[36]](#_36_9)Giubbenet, Ocherk, pp. 19, 152–3; The Times, 27 Sept. 1855.

[[37]](#_37_9)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ee, pp. 295–296; Buzzard, With the Turkish Army, p. 193.

[[38]](#_38_9)E. Vanson, Crimee, Italie, Mexique: Lettres de campagnes 1854–1867 (Paris, 1905), pp. 154, 161; NAM 2005–07–719 (Golaphy letter, 22 Sept. 1855).

[[39]](#_39_9)WO 28/126; NAM 6807–379/4 (Panmure to Codrington, 9 Nov. 1855).

[[40]](#_40_10)S. Tatishchev, Imperator Aleksandr II: Ego zhizn’ i tsarstvovanie, 2 vols. (St Petersburg, 1903), vol. 1, pp. 161–3.

[[41]](#_41_9)RGVIA, f. 481, op. 1, d. 36, ll. 1–27; 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65; W. 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September 1855 to April 1856’, Cambridge Historical Journal, 11/3 (1955), p. 301; 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7.

[[42]](#_42_10)Tarle, Krymskaia voina, vol. 2, pp. 520–4; H. Sandwith, A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Kars (London, 1856), pp. 104 ff.; Papers Relative to Military Affairs in Asiatic Turkey and the Defence and Capitulation of Kars: Presented to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by Command of Her Majesty (London, 1856), p. 251;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197–223.

[[43]](#_43_6)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p. 302–3.

[[44]](#_44_6)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pp. 5–7.

[[45]](#_45_6)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5 Sept. 1855.

[[46]](#_46_6)Argyll, Duke of, Autobiography and Memoirs, 2 vols. (London, 1906), vol. 1, p. 492; The Greville Memoirs 1814–1860, ed. L. Strachey and R. Fulford, 8 vols. (London, 1938), vol. 7, p. 173.

[[47]](#_47_6)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9 Oct. 1855.

[[48]](#_48_6)C. Thoumas, Mes souvenirs de Crimee 1854–1856 (Paris, 1892), pp. 256–60; Lettres d’un soldat a sa mere de 1849 a 1870: Afrique, Crimée, Italie, Mexique (Montbeliard, 1910), pp. 106–108; Loizillon, La Campagne de Crimee, pp. xvii–xviii.

[[49]](#_49_6)A. 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ee 1853–1856 (Paris, 1995), p. 460; L. Case,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pp. 39–40; R. Marlin,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ee, Annales Litteraires de l’Universite de Besancon, vol. 17 (Paris, 1957), p. 48.

[[50]](#_50_6)W. Echard, Napoleon III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Baton Range, La., 1983), pp. 50–1.

[[51]](#_51_5)Gouttman, La Guerre de Crimee, p. 451;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1955), p. 78.

[[52]](#_52_4)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 303.

[[53]](#_53_4)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1 Dec. 1855;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p. 33.

[[54]](#_54_4)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 304.

[[55]](#_55_3)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p. 305–6.

[[56]](#_56_3)Mosse, ‘How Russia Made Peace’, pp. 306–13.

[[57]](#_57_3)Boniface, Campagnes de Crimée, p. 336.

[[58]](#_58_3)D. Noel, La Vie de bivouac: Lettres intimes (Paris, 1860), p. 254.

[[59]](#_59_3)Liaskoronskii, Vospominaniia, pp. 23–4.

# 第十二章 巴黎與新秩序

和平會議（Peace Congress）計劃于1856年2月25日下午在巴黎奧賽碼頭邊的法國外交部舉行。中午時分，興奮的人群就已經聚集在奧賽碼頭，等待各國談判代表團的到來。從協和橋（Pont de la Concorde）到耶拿路（Rue d’Iéna），到處都擠滿了圍觀人群，不得不出動步兵和憲兵維持秩序，以騰出道路讓外國使節的馬車通過，抵達新近建成的外交部大樓。外國代表團從下午一點開始逐漸抵達，每當他們步出馬車走進外交部大樓時，人群都自動爆發出“和平萬歲！”和“皇帝萬歲！”的歡呼。代表們身著晨禮服，聚集在華麗的大使大廳（Hall of Ambassadors）。大廳里擺著一張鋪著綠色天鵝絨的大圓桌，桌邊放著十二把靠背椅。大使大廳展示的是法國第二帝國的裝飾藝術，猩紅色的緞子垂簾從墻上掛下，廳內僅有的真人大小的畫像是拿破侖三世和歐仁妮皇后的肖像。畫像上的兩人注視著代表們，仿佛時刻都在提醒他們，現在法國已經成為國際事務的仲裁方。壁爐邊的一個臺子有拿破侖一世的大理石胸像，在過去的四十多年里，他一直是外交圈內不受歡迎的人。拿破侖三世相信，巴黎和平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法國的拿破侖王朝終于重新回到“歐洲協調”這個歐洲權力的中心了。[[1]](#_1_E__Gourdon__Histoire_du_Congr)

將和平會議的地點選在巴黎，體現出法國重新獲得了歐洲強國這一地位。和談唯一可能的另一個地點是維也納，那里是1815年條約的簽署地，但是維也納被英國人否決了，因為自從克里米亞戰爭開始以來，英國人就一直對奧地利人外交努力的真實意圖疑慮重重。現在，當各方外交勢力都聚集在巴黎時，維也納仿佛變成了一個過時的城市。“誰能否認，在這一切之后，法國的勢力已經擴大了呢，”法國外交部長瓦萊夫斯基伯爵在得知自己將被授權主持和談之后向拿破侖三世寫道，“只有法國才能從這一爭執中獲利。今天的法國，名列歐洲的首位。”

三個月前，巴黎舉辦了一場世界博覽會。那是一場光彩奪目的國際展覽，堪比1851年的倫敦萬國博覽會，五百萬游客訪問了位于香榭麗舍大街（Champs-Elysées）的展覽館。這兩個事件吸引了眾多關注，將巴黎置于歐洲中心。這對拿破侖三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勝果——渴求在國內外贏得威望，一直是他決定參加克里米亞戰爭的動力。自從去年秋天和平進程開始以來，他已成為其中的一個關鍵角色，各方勢力都要依靠他才能滿足自身的利益。“所有人都對拿破侖皇帝十分尊重，讓我感到驚訝，”利芬王妃（Princess Lieven）在11月9日給邁恩多夫男爵夫人的信中寫道，“這場戰爭讓他提升到了頗高的位置，而且法國也一樣。英格蘭卻沒有從中獲益。”[[2]](#_2_W__Baumgart__The_Peace_of_Par)

整個冬天，和平談判都一直在進行著，到了2月份，當各國代表齊聚巴黎時，絕大部分有爭議的問題已經獲得解決。談判的主要障礙是英國的強硬立場，英國并不急于結束戰爭，因為在過去十八個月里，他們未贏得一場主要戰役，無法讓自己的榮譽感得到滿足，也無法為巨大的損失做出交代，畢竟攻占塞瓦斯托波爾是法國人的功勞。在好戰情緒高昂的報刊和公眾的鼓勵下，帕默斯頓重申了他在10月9日提出的最低條件，并威脅說如果俄羅斯不接受英國提出的和平條件的話，英國將繼續作戰，并在波羅的海發動春季攻勢。他向外交大臣克拉倫登施加壓力，除非俄羅斯在巴黎和平會議上全面接受英國的條件，否則不要做出任何妥協。

盡管他態度堅決，但其實帕默斯頓的要求一直在發生變化。到11月份，他已經放棄了讓切爾克斯獨立的要求，原因是沒有任何一方能代表那一地區簽署條約。然而他繼續堅持俄羅斯必須放棄高加索和中亞地區，并且相信只要英國保持強硬立場，就能實現這一目標。他在2月25日給克拉倫登寫信，強調俄羅斯參加談判時位低勢弱，他們敢于反對英國的最新和平條件，是一種“肆無忌憚”的行為。英國的條件是俄羅斯的軍艦和武器完全撤離黑海地區，同時俄羅斯軍隊必須“從其占領的所有土耳其領土（包括卡爾斯）上離開”。帕默斯頓強調，這些條件“并非故意讓俄羅斯蒙羞……只是用來讓俄羅斯展示并宣誓其真心放棄了侵略意圖”。帕默斯頓提醒克拉倫登要提防俄羅斯巴黎和平會議代表團團長奧爾洛夫伯爵，其言語暴露了他的反俄立場：

至于說奧爾洛夫，我對他很了解：他外表文明禮貌，內心卻充滿了俄羅斯人的無禮、傲慢和驕傲。他會仗勢欺人，卻盡力不露痕跡。只要覺得有成功機會，他一定會錙銖必較。他身上帶有一個半文明的野蠻人的所有狡詐。[[3]](#_3_P__Schroeder__Austria__Great)

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都對帕默斯頓的行為感到厭惡，皮埃蒙特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Victor Emmanuel Ⅱ）干脆把帕默斯頓形容為一頭“瘋狂的動物”。法國人急于尋求和平，不像英國人那樣堅持要懲罰俄羅斯，他們需要與俄羅斯人和解，以實現拿破侖三世對意大利未來的計劃。法國一直對意大利統一持同情態度，認為可以幫助皮埃蒙特從奧地利那里奪回倫巴第—威尼西亞地區，并將哈布斯堡勢力從意大利其余地區清除出去。作為交換，法國可重新占領薩伏依（Savoy）和尼斯（Nice），這兩個地區在1792年被法國占領，但是在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上被重新歸還給皮埃蒙特。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法國需要得到俄羅斯的支持，或至少讓俄羅斯保持武裝中立，才能擊敗奧地利，因此法國人不愿意順從英國人懲罰俄羅斯的意圖。法英兩國的主要分歧在于比薩拉比亞的邊界劃分，各方原已同意俄羅斯必須將這一地區歸還奧斯曼帝國屬摩爾達維亞公國，然而帕默斯頓卻要求更高，提出不能讓俄羅斯有任何辦法進入多瑙河地區。這一強硬立場得到了奧地利的支持，因為這塊地方是奧地利人最大的心病。但同時俄羅斯人也想在談判中為自己在比薩拉比亞贏得最大權益，他們的籌碼是手中的卡爾斯，并且得到了法國人的支持。最終，面臨英國和奧地利的壓力，拿破侖三世說服奧爾洛夫伯爵接受了一個妥協方案：總的來說，俄羅斯丟掉了他們1812年從土耳其那里奪來的比薩拉比亞的三分之一土地，其中包括多瑙河三角洲，但是保住了比薩拉比亞的保加利亞人居住區，以及戰略位置很重要的從荷廷（Chotin）[\*](#__Ji_Jin_Tian_De_Huo_Jing__Khoty)向東南方延伸的山脊。英國人聲稱獲得了外交勝利，奧地利人慶祝多瑙河地區得到了解放，俄羅斯人則感到蒙受了一場國恥，因為這是17世紀以來，俄羅斯第一次向土耳其人割讓了領土。[[4]](#_4_Schroeder__Austria__Great_Bri)

在其他主要議題上，西方列強在巴黎和平會議前就已經基本達成統一意見，大致以1854年盟國制定的《四點方案》為主導。英國人試圖增加第五點，將高加索南部地區（切爾克斯、格魯吉亞、埃里溫和納希切萬）全部從俄羅斯人手里奪走，但是俄羅斯人堅持說他們是依據《哈德良堡條約》占領這些地方的，而土耳其人也同意這一說法。但是，俄羅斯不得不放棄了剛剛占領不久的卡爾斯。俄羅斯還試圖減少方案第三點（黑海非軍事化）給自己造成的制約，希望能把尼古拉耶夫（位于布格河內陸二十公里）和亞速海排除在外，但未獲成功。

《四點方案》第一點關乎多瑙河兩公國的命運，談判期間各方意見你來我往。英國人基本同意讓兩公國重歸奧斯曼帝國所有，法國人支持羅馬尼亞自由派人士和民族主義者將兩公國統一為一個獨立國家的訴求，然而奧地利人卻一口回絕了這個在自己東南邊境外建立一個新國家的想法，因為在奧地利境內就有相當數量的斯拉夫少數民族同樣有著建國的念頭。奧地利人懷疑法國人是以支持羅馬尼亞人為手段施壓，企圖逼迫自己放棄意大利北部地區，這一懷疑其實不無道理。所以雖然英法奧三國都同意中止俄羅斯對多瑙河兩公國的保護權，并將多瑙河變為一條對商業航行開放的河流（《四點方案》第二點），但在趕走俄羅斯人之后應以什么來取而代之這一點上，卻無法達成一致意見。最后只好提出讓奧斯曼帝國擁有名義上的主權，并由西方列強共同擔保，含糊地計劃等到將來某個時候再來確定摩爾達維亞和瓦拉幾亞兩地人民對自己未來的意愿。

至于保護奧斯曼帝國內基督徒這一問題（《四點方案》第四點），盟國代表1月初就在君士坦丁堡會見了首相阿里帕夏和坦齊馬特改革派福阿德帕夏（Fuad Pasha），這兩位是蘇丹派往巴黎參加談判的代表。盟國要求高門必須做出姿態，顯示正在給予奧斯曼帝國包括猶太人在內的非穆斯林人口完全的宗教和民事平等，并指出在這一點上盟國是認真的。時任英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的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在1月9日向克拉倫登匯報了這次會見的過程，但是他本人對土耳其部長們決心改革的表態是持懷疑態度的。他認為土耳其人對外國施壓逼迫改革感到不滿，相信這么做會削弱奧斯曼帝國的主權，因此真正落實對基督教人口的保護難度很大。土耳其人從來都相信基督徒比他們低一等，不管蘇丹通過什么法律，都不可能像西方國家期待的那樣，在短時間內糾正這一偏見。坎寧寫道：“我們也許要準備好應付各種拖延，理由可能是尊重宗教反感、公眾偏見和無關痛癢的習慣。”他還進一步警告說如果西方逼迫土耳其進行改革，則有可能導致穆斯林行動起來，反對蘇丹的西方化政策。作為對盟國代表起草的二十一點改革方案的回應，蘇丹在2月18日發布了《改革詔書》（Hatt-i Hümayun），許諾給予非穆斯林臣民完全的宗教和法律平等、擁有財產的權利、憑能力加入奧斯曼帝國軍隊和成為公務員的權利。土耳其人希望通過承諾這些改革，防止歐洲國家進一步干涉奧斯曼帝國的內政。他們希望將《改革詔書》排除在巴黎和平會議之外，理由是這涉及土耳其主權內政。但是作為《四點方案》規定的共同擔保蘇丹治下基督教臣民安全的五個西方國家之一，俄羅斯堅持這一改革必須放到談判桌上來。后來俄羅斯同意了一個折中方案：高門和西方列強共同簽署一個國際宣言，強調維護奧斯曼帝國內基督徒權利的重要性。在俄羅斯的對內宣傳中，這一妥協被描述為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俄羅斯贏得了“道義上的勝利”。在某種程度上，俄羅斯人說得也沒錯，因為巴黎和平會議恢復了圣誕教堂和圣墓教堂的原狀，而這正是俄羅斯代表希臘人提出的要求，沙皇曾多次強調這一點。在和平宣言發表的那一天，亞歷山大感謝上天實現了“戰爭原本的核心目標……俄羅斯人！你們的努力和犧牲沒有白費！”[[5]](#_5_FO_78_1170__Stratford_Canning)

最后還有一個一直未挑明的問題：波蘭。讓波蘭從俄羅斯統治下恢復獨立，這一議題最早是由法國外交部長瓦萊夫斯基伯爵在盟國外交官圈子內提出的，他是拿破侖一世和波蘭的瑪麗·瓦萊夫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Marie Walewska）的兒子。在占領塞瓦斯托波爾之后，拿破侖三世想為波蘭做點事情，而建立一個獨立的波蘭符合他建立新歐洲版圖、打破1815年格局的理念。最早他支持的是恰爾托雷斯基親王重建波蘭會議王國的想法，這是一個根據《維也納條約》建立的自治王國，但是其自由受到俄羅斯的侵蝕。在和平會議開始后，拿破侖三世很清楚其他各方都不會為波蘭伸張，原來的想法已不現實，于是表示自己會支持恰爾托雷斯基親王提出的等而下之的條件，包括維持波蘭語的地位，保護波蘭不被俄羅斯化等。但是俄羅斯代表奧爾洛夫伯爵不為所動，堅稱俄羅斯對波蘭的所有權不是基于1815年的《維也納條約》，而是因為在1830—1831年，俄羅斯在鎮壓波蘭起義期間征服了波蘭。拿破侖三世需要俄羅斯的支持以迫使奧地利放棄意大利北部，因此為了改善與俄羅斯的關系，他決定放棄對波蘭的支持。因為這些原因，波蘭問題不再成為巴黎和平會議的議題，即使是從來不放棄任何對抗俄羅斯機會的帕默斯頓，也指示克拉倫登不要在波蘭問題上做文章。他的解釋是：“現在不合適要求俄羅斯恢復波蘭王國。”

很不好說能給波蘭人帶來什么好處。如果波蘭人真能從俄羅斯手中獨立出來，那對波蘭人和歐洲都很好。但不論是對波蘭人也好，對歐洲也好，波蘭王國目前的狀況，與《維也納條約》規定的條件之間的那一點差別，與我們為實現這一目標必須花費的努力是不相稱的。俄羅斯政府會說過去波蘭反叛了，然后被俄羅斯征服了，因此俄羅斯是憑著軍事征服而不是《維也納條約》占領了波蘭，從而不再有義務遵守條約的規定。俄羅斯人還會說對波蘭問題提出要求是干涉俄羅斯的內政。

“可憐的波蘭！”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對恰爾托雷斯基的支持者之一、哈羅比勛爵（Lord Harrowby）表示：“它的重生，就像一艘時而閃現的飛翔的‘荷蘭人’（flying Dutchman）[†](#__Chuan_Shuo_Zhong_Yi_Sao_Wu_Ren)，從未實現過，總在等候中。”[[6]](#_6_FO_78_1170__Stratford_Canning)

由于事先已經解決了所有主要的問題，巴黎和平會議進行得很順利，沒有發生什么大的爭執。三場會談之后，和平條約草案就已經準備就緒。各國代表團成員有許多空閑時間參加社交活動：宴會、晚餐、音樂會、舞會、歡迎儀式等等，其中還包括一場慶祝拿破侖三世和歐仁妮皇后唯一的孩子、路易-拿破侖（Louis-Napoleon）王子誕生的特別慶典。3月30日星期日下午一點，各國代表團的外交官們聚集在一起，完成了和平條約的正式簽署。

巴黎城內各處都在宣布和平條約簽署的消息，電報站連續不斷地把這條新聞傳向世界各地。下午兩點鐘，巴黎榮軍院（Les Invalides）的加農炮發出一陣巨響，宣告戰爭結束。歡呼的人群聚集在街頭，餐館和咖啡館的生意異常紅火，晚上巴黎的天空被焰火映紅。第二天戰神廣場（Champ de Mars）上舉行了閱兵儀式，法軍軍隊接受了法國皇帝、拿破侖親王、高級軍官和外國使節的檢閱，成千上萬巴黎市民沿途圍觀。“人群的興奮之情如同電流一般顫動，”第二年出版的法國議會官方歷史上寫道，“滿懷對國家的驕傲和熱情，人們發出震耳欲聾的歡呼，響徹整個戰神廣場，勝過一千門加農炮的響聲。”[[7]](#_7_Gourdon__Histoire__pp__523_52)當初拿破侖三世決定讓法國參戰，期待的是獲得榮耀與喝彩，現在他終于如愿以償。

\* \* \*

和平的消息在第二天傳到了克里米亞——電報從巴黎接力傳到瓦爾納，然后再通過海底電纜傳到了巴拉克拉瓦。4月2日，克里米亞聯軍的大炮發出了最后的轟響，紀念戰爭的結束。

聯軍有六個月的時間撤離克里米亞。英軍從塞瓦斯托波爾港離開，臨走之前炸毀了氣勢雄偉的碼頭，法軍則摧毀了尼古拉要塞。大批的軍事物資裝備需要清點、裝船、運回國：繳獲的大炮和加農炮、彈藥、廢鐵和食物，其中還包括從俄羅斯人那里搶來的東西，數量巨大。把運載空間分配給各個作戰部門是一件復雜的后勤工程。許多東西無法運走，就只好留下，賣給俄羅斯人。英軍的小木屋被捐給了俄羅斯人，條件是必須給“那些因為戰爭而無家可歸的克里米亞居民”；俄方答應了英軍的條件，但還是把小木屋和軍營留給了俄軍使用。“要把在超過兩年時間里運來的東西在幾個月內運走，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埃爾貝上尉在4月28日給家人的信中寫道，“大量的馬匹和騾子只好被拋棄或是廉價賣給克里米亞人了，我不指望還能再次見到自己的馬。”被賣掉的交通工具不僅有馬匹，英軍在戰爭期間修建的巴拉克拉瓦鐵路被一家由卡林·厄德利爵士（Sir Culling Eardly）和摩西·蒙蒂菲奧里（Moses Montefiore）成立的公司買下，他們想利用這些材料設備在雅法和耶路撒冷之間興建一條鐵路線。帕默斯頓同意了這一售賣方案，認為這些新鐵路線將會“給一個荒野無序的地區帶來文明與發展”。這條鐵路線如果建成，將可以為越來越多的前往圣地的朝圣者提供交通服務。但是這條鐵路從未興建，最后巴拉克拉瓦鐵路線被當作廢鐵賣給了土耳其人。[[8]](#_8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91)

考慮到花了那么長時間才把所有物資裝備運到克里米亞，聯軍的撤離工作可以說完成得非常迅速。7月12日，英軍總指揮科德林頓把巴拉克拉瓦交還給俄羅斯人，然后乘坐“阿爾及爾號”（HMS Algiers）軍艦和最后一批英軍一起離開。科德林頓非常注重軍事禮儀，所以對俄羅斯方面派來巴拉克拉瓦執行交接的人員的官銜和裝束很不滿意：

有約三十名頓河（Don）哥薩克騎兵和五十名步兵前來接管。但這是一批什么樣的人吶！我沒法想象俄軍竟然會派出這樣一支臟兮兮的部隊。裹在灰色外套里的是衣冠不整的士兵，而且裝備破爛——他們的形象如此不敬，讓我們吃驚不已而又感覺滑稽可笑。我希望這批貨色是故意派來羞辱我們的，如果是這樣的話，聽了我們的評論，他們就知道受辱的其實是自己。禁衛軍士兵列隊登上了軍艦，俄軍布上自己的崗哨，撤離工作就此完成。[[9]](#_9_NAM_1968_07_380_65__Codringto)

永遠留在克里米亞的，是幾千名戰死沙場的聯軍士兵的遺體。在撤離前的最后幾個星期，聯軍士兵花了很大力氣為長眠在這里的戰友修建了墓地，豎起了紀念碑。在他從克里米亞發回的最后幾份報道中，《泰晤士報》記者威廉·羅素描述了軍隊墓地的景象：

切爾松尼斯遍布著單個小墳墓、稍大一點的墓葬地以及獨立的墓園，從巴拉克拉瓦到塞瓦斯托波爾錨地，到處都是。山溝與平地、山丘和凹地、大路兩邊或是隱蔽的山谷，從海邊到喬爾納亞河邊，長達幾英里的地方，隨處可見那些耀眼的白色石頭，孤零零地或是一群群地，有的豎立在光禿禿的土地上，有的委身在叢叢雜草之中。法國人沒有在修建墳墓上花太多力氣，他們在靠近因克爾曼營地的地方有一座精心打理且布置典雅的大型墓地，但并沒有圍欄……掩埋軍士和近衛軍旅士兵的墓園周圍是一道厚實的圍墻，入口處有一道雅致的雙開大門，很聰明地用木頭和由鐵環敲直的鐵條做成，刷上油漆，用鉸鏈分別掛在兩個由石頭鑿成的大柱子上，在石柱頂上還有裝飾用的柱頭，頂部是一顆加農炮彈丸。墓園里有六排墓地，每排掩埋著三十具或更多遺體。每一個墓上都豎著一塊墓碑，或是造一座小土丘，由一排排白色石頭圍起來，刻著被掩埋者的全名或是姓名縮寫，用卵石標記在小土丘上。在靠近墓園入口的地方，面朝大門矗立著一座巨大的石制十字架……這座墓園里沒有多少墓碑，其中之一是一個石頭做成的十字架，上面鐫刻著“紀念A.希爾中尉（Lieutenant A. Hill），第二十二團，逝世于1855年6月22日。他在克里米亞的朋友敬立”。另一塊墓碑上寫著“紀念倫尼軍士長（Sergeant-Major Rennie），第九十三高地旅。一位朋友立”。……[另一塊]寫著“軍需官J.麥克唐納（J. McDonald），第七十二團，12月8日在塞瓦斯托波爾前的塹壕里受傷，9月16日去世，終年三十五歲”。[[10]](#_10_The_Times__26_July_1856)

聯軍撤離后，原來向彼列科普方向撤退的俄軍又回到了克里米亞南部的城鎮和平原。這里的戰場再次成為農田和放牧地，牛群在聯軍的墓地邊游蕩吃草。漸漸地，克里米亞從被戰爭破壞的經濟中恢復過來，塞瓦斯托波爾獲得重建，修復了道路和橋梁，但是在其他方面，這座半島卻已經發生了永久性的改變。



卡思卡特山上的英軍墓地，羅杰·芬頓攝，1855（圖片來源：國會圖書館印刷品和照片分部，華盛頓特區）

最顯著的改變是韃靼人大部分消失了。戰爭開始時，小群韃靼人已經開始逃離家園，戰爭接近尾聲時，因為擔心聯軍走后會遭到俄羅斯人的報復，離開的人數越來越多。1855年5月，當地韃靼人借著聯軍占領刻赤的機會對俄羅斯人發動暴力襲擊，造成了刻赤慘案。在這之后，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就已經開始受到俄羅斯軍事當局的報復，包括大規模抓捕、沒收財產、集體處死“可疑的”韃靼人等。貝達（Baidar）谷地的韃靼居民因此向科德林頓請愿，希望聯軍能幫助他們離開克里米亞，他們擔心自己的村莊重新落入俄羅斯人手中的后果，“因為過去的經歷讓我們沒有任何理由相信我們將受到良好的對待”。他們的請愿書用當地的韃靼文字寫成，然后翻譯成英語。在請愿書中他們還寫道：

為報答英國對我們的善意，我們會像銘記上帝一樣永遠牢記維多利亞女王陛下和科德林頓將軍，我們會用穆罕默德教義給予我們的一天五次的祈禱機會為他們祈禱，我們對他們和所有英國人的祈禱會代代相傳給我們的子孫。

由以下十二個村莊的教士、貴族和居民簽署：貝達、薩格提克（Sagtik）、卡倫迪（Kalendi）、斯克里亞（Skelia）、薩瓦特卡（Savatka）、巴加（Baga）、烏庫斯塔（Urkusta）、烏尊紐（Uzunyu）、布尤克拉斯括米亞（Buyuk Luskomiya）、奇亞圖（Kiatu）、庫楚克拉斯括米加（Kutchuk Luskomiga）、瓦爾努特卡（Varnutka）。[[11]](#_11_RGVIA__f__846__op__16__d__58)

科德林頓沒有在任何方面向韃靼人施以援手，雖然在整個克里米亞戰爭期間，韃靼人曾為聯軍提供了食物、情報、運輸服務。盟國外交官們從沒想到要保護韃靼人不受俄羅斯當局報復，其實他們本可以為此在和平條約中加上一條措辭更強烈的條款。《巴黎條約》（Paris Treaty）第五條規定，任何參戰國有責任“對有跡象積極參與敵方軍事行動的本國臣民給予全面赦免”，這一條款似乎不僅適用于克里米亞的韃靼人，還可以用來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保加利亞和希臘人，他們在多瑙河戰役中都站到了俄軍這一邊。但是新俄羅斯地區總督斯特羅加諾夫伯爵（Count Stroganov）找到了一個不受該條款約束的辦法。他聲稱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韃靼人未經軍事當局批準離開了指定居住地，這就已經違反了俄羅斯法律，因此失去了《巴黎條約》第五條給予的保護。在戰爭期間，成千上萬的韃靼人為躲避戰火而被迫離開家園，按照這一邏輯，僅僅因為他們的護照沒有蓋上俄羅斯的大印，這些韃靼人在當局眼中就已經犯下了叛國罪，可判處流放西伯利亞。[[12]](#_12_M__Kozelsky___Casualties_of)

聯軍剛開始撤離時，就出現了韃靼人第一波大規模集體逃離。4月22日，四千五百名韃靼人從巴拉克拉瓦坐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他們相信土耳其政府已邀請他們到奧斯曼帝國重新定居。克里米亞當地的俄羅斯官員警覺到韃靼人大規模逃離將會給農業經濟帶來沖擊，于是向圣彼得堡請示是否應該阻止韃靼人外逃。在了解到韃靼人曾在戰爭期間大規模投靠聯軍之后，沙皇回復說不要阻止，還說“把這些有害民族從半島上抹去對我們是有利的”，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也重新利用了這一邏輯。斯特羅加諾夫在向當地官員傳達沙皇旨意時，把這句話詮釋成一道將韃靼人驅除出去的直接指令，他聲稱沙皇說的是“有必要”讓韃靼人離開（而不僅僅是這樣做是“有利的”）。于是俄羅斯當局向韃靼人施加各種壓力迫使他們出逃，比如有謠言說當局計劃把韃靼人大批遷移到北邊，或是哥薩克人洗劫了韃靼人村莊，或是當局計劃強迫韃靼人在學校里學習俄語或改信基督教。韃靼人的農場被增加稅賦，村莊被切斷水源，從而迫使他們把土地賣給俄羅斯地主。

在1856年至1863年間，約十五萬克里米亞韃靼人和約八萬諾蓋韃靼人（Nogai Tatars）[‡](#___Zhu_Yao_Sheng_Huo_Zai_Gao_Jia)，即約占克里米亞和俄羅斯南部韃靼人總數三分之二的人口，陸續遷移到了奧斯曼帝國。精確的數字很難統計，有些歷史學家認為實際數字比這個高很多。因為擔心這一地區的勞動力流失不斷加劇，俄羅斯當局在1867年試圖從警察統計數字中計算自從戰爭結束后，到底有多少韃靼人離開了克里米亞半島。他們的報告表明，有十萬四千二百一十一名男性和八萬八千一百四十九名女性離開了克里米亞，留下了七百八十四座空寂的村莊和四百五十七座廢棄的清真寺。[[13]](#_13_M__Kozelsky__Christianizing)

在驅逐韃靼人口的同時，從1856年起，俄羅斯當局還施行了一套讓克里米亞地區全面基督教化的政策。作為克里米亞戰爭的一個直接后果，俄羅斯當局更是把這里當作俄羅斯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宗教邊界，因此必須鞏固對這里的宗教控制。克里米亞戰爭前，這里的總督沃龍佐夫親王相對來說傾向自由主義，反對在克里米亞擴展基督教機構，理由是那將“在本地韃靼人中滋生毫無根據的危險念頭，以為我們會迫使他們放棄伊斯蘭信仰改信東正教”。沃龍佐夫在1855年退休，接替他的是激進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者斯特羅加諾夫，他積極支持克里米亞所屬的赫爾松—陶利德教區大主教因諾肯季的基督教化目標。在克里米亞戰爭接近結束時，因諾肯季的傳道宣講以小冊子和版畫（lubki）的形式在俄軍部隊中廣為傳播。他把這場戰爭描述為一場“圣戰”，克里米亞是俄羅斯東正教身份的中心，因為基督教正是從這里傳入俄羅斯的。通過強調克里米亞半島上希臘教堂的悠久歷史，他把克里米亞比作“俄羅斯的阿索斯山”，一座“神圣俄羅斯帝國”的圣山，與希臘東北地區阿索斯山半島上的東正教修道院之間有宗教上的紐帶。在斯特羅加諾夫的支持下，因諾肯季在戰后創建了克里米亞主教轄區，并在這里興建了幾座新的修道院。[[14]](#_14_Kozelsky__Christianizing_Cri)

為了鼓勵基督徒移民克里米亞，沙皇政府在1862年制定了一條法律，給予來自俄羅斯和海外的移民特殊權利和補貼。被韃靼人遺棄的土地被預留出來準備賣給外來移民。1860年代和1870年代涌入的基督教新移民完全改變了克里米亞的民族組成。過去的韃靼人定居點現在住滿了俄羅斯人、希臘人、亞美尼亞人、保加利亞人，甚至還有德國人和愛沙尼亞人。所有這些人都看中了這里廉價而豐饒的土地，或是被可以加入城市行會和團體的特殊權利所吸引，而這些權利以往是不會給予新來的居民的。亞美尼亞人和希臘人把塞瓦斯托波爾和葉夫帕托里亞變成了重要的貿易中心；與此同時，過去韃靼人定居的市鎮如卡法（Kefe，即錫奧多西亞）、古茲勒夫（Gözleve）[§](#SS_Ji_Ye_Fu_Pa_Tuo_Li_Ya__Zhe_Sh)和巴赫奇薩賴等則陷入沒落中。許多定居鄉村的移民是保加利亞人或其他來自比薩拉比亞的基督教移民，他們自己家園所在的地區在克里米亞戰爭后被割讓給了土耳其人。這些移民被當局安置在三百三十個原來韃靼人的村落中，還獲得資助把清真寺改造成教堂。與此同時，許多從克里米亞逃出去的韃靼人則定居在比薩拉比亞被基督徒遺棄的土地上。[[15]](#_15_Kozelsky__Christianizing_Cri)

克里米亞戰爭導致整個環黑海圈不同的宗教和民族團體被連根拔起，長途遷徙，越過俄羅斯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的宗教界線，移居他處。幾萬名希臘人從摩爾達維亞和比薩拉比亞遷往俄羅斯南部，反過來從俄羅斯遷往土耳其的是幾萬名在克里米亞和高加索的波蘭難民和曾經參與對俄作戰的波蘭軍團，即所謂的“奧斯曼哥薩克”（Ottoman Cossacks）。他們被高門安置在多瑙河三角洲的多布羅加地區、安納托里亞和其他一些地區，另一些則被遷到了亞當波爾（Adampol），即波洛內茲科伊（Polonezkoi），這是由波蘭流亡領袖亞當·恰爾托雷斯基于1842年在君士坦丁堡郊外建起來的波蘭人定居點。

在黑海的另一邊，因為克里米亞戰爭，幾萬名亞美尼亞基督徒離開他們在安納托里亞的家園，遷移到了由俄羅斯控制的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地區。他們擔心土耳其人會把他們當作俄羅斯的盟友而對他們施行報復。《巴黎條約》委托確定俄羅斯與奧斯曼邊界線的歐洲專門委員會發現，亞美尼亞村莊“只有一半人居住”，教堂處于“嚴重損毀”的狀態。[[16]](#_16_BLMD__Add__MS_48580__Palmers)

與此同時，數量更多的切爾克斯人、阿塞拜疆人和其他穆斯林部落在俄羅斯當局的逼迫下離開家園。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后，俄軍加強了對沙米勒武裝的軍事行動，采用了一種現在會被稱為“種族清洗”的一致政策對高加索進行基督教化。開展這一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巴黎條約》規定英國皇家海軍可以在黑海地區自由航行，而俄軍失去了海上軍事手段來對付黑海沿岸充滿敵意的穆斯林人口。俄軍首先將目標集中在高加索西部、靠近黑海海岸線、土地肥沃的切爾克斯地區。穆斯林村莊遭到俄軍部隊襲擊，不論男女都被屠殺，農莊和家園被毀，村民們被迫遷移或是挨餓。俄軍給切爾克斯居民兩個選擇：向北遷移到庫班平原，那里離海岸線足夠遠，如果遭遇入侵，他們不至于成為俄軍的威脅；或是移民到奧斯曼帝國。幾萬名穆斯林居民選擇向北遷移，但是同樣多數量的切爾克斯人被俄軍趕到黑海港口，有時候不得不在條件惡劣的碼頭等待好幾個星期才被裝上土耳其船只送往安納托里亞的特拉布宗、薩姆松（Samsun）和錫諾普。奧斯曼當局對大量移民涌入準備不足，有幾千人在抵達土耳其后的幾個月內死于疾病。到1864年時，切爾克斯的所有穆斯林人口都被清除了。英國領事C.H.迪克森（C. H. Dickson）說他可以在原切爾克斯人居住區走上一天也碰不上一個活人。[[17]](#_17_FO_195_562___Report_on_the_P)

在驅逐了切爾克斯人之后，下一個目標是阿塞拜疆的穆斯林，當時他們定居在蘇呼米卡萊（Sukhumi-Kale）地區。俄軍的驅逐行動在1866年開始，采用的戰術基本上和在切爾克斯一樣，只不過這一次因為擔心對經濟的沖擊，俄軍的政策是保留男性勞動力，迫使婦女、兒童和老人離開。英國領事、阿拉伯研究專家威廉·吉福德·帕爾格雷夫（William Gifford Palgrave）曾到訪阿塞拜疆地區并收集有關種族清洗的材料，他估計那里約四分之三的穆斯林人口被迫遷移。總的來說，把切爾克斯人和阿塞拜疆人加在一起，在克里米亞戰爭后的十年中，共有約一百二十萬穆斯林人口被趕出高加索地區，絕大部分重新定居在奧斯曼帝國。到19世紀末，那兩個地區的穆斯林人口已不足基督教新移民的十分之一。[[18]](#_18_McCarthy__Death_and_Exile__p)

\* \* \*

為了表示實行宗教寬容政策的誠意，1856年2月，蘇丹同意參加兩場由外國人在君士坦丁堡舉辦的舞會，分別在英國大使館和法國大使館。這是歷史上奧斯曼帝國蘇丹首次接受邀請，參加在外國大使官邸舉辦的基督教社交活動。

阿卜杜勒-邁吉德蘇丹來到英國大使館時，身上佩戴著幾周前英國為慶祝聯軍勝利而授予蘇丹的嘉德勛章（Order of the Garter）。英國大使斯特拉特福德·坎寧到蘇丹的馬車門邊迎候，當蘇丹走下馬車時，大使館通過一條電線向落錨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英國艦隊發出信號，艦隊立刻以長時間的禮炮轟鳴向蘇丹致敬。這是一場化裝舞會，客人們裝扮成王子、海盜、火槍手、假切爾克斯人和牧羊女等等。參加了舞會的霍恩比爵士夫人（Lady Hornby）[¶](#P_Ying_Guo_Pai_Zhu_Jun_Shi_Tan_D)第二天寫下了自己的觀感：

如果要把舞會上的裝束一一列出，我花上一天時間也只能列舉一半。參加過女王舉行的化裝舞會的人都清楚，在華美程度上，昨天的舞會有過之而無不及。除了法國、撒丁尼亞和英國的軍官外，各國客人都穿著他們自己奇妙的服裝，其美麗程度完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希臘主教、亞美尼亞大主教以及猶太長老們都穿著各自的正式禮服。真正的波斯人、阿爾巴尼亞人、庫爾德人、塞爾維亞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土耳其人、奧地利人、撒丁尼亞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都在那兒，穿著不同的服裝，許多還佩帶著鑲珠寶的武器。阿卜杜勒-邁吉德靜靜地向舞廳走來，陪伴他的是斯特拉特福德勛爵和夫人，他們兩人的女兒，后面跟著一群瀟灑的高級官員。他停下腳步，顯得非常高興，滿意地看著眼前的場景，向兩邊點頭，一直面帶微笑……軍官們喝了許多香檳，他們假裝不知道杯子里到底是什么，狡黠地稱之為“起泡水”（eau gazeuse）。

在法國大使館舉辦的舞會上，蘇丹佩戴了由法國大使圖弗內爾頒發給他的榮譽軍團勛章。在受致軍禮后，他和外國使節們進行了交談，漫步在舞者之間。當軍樂隊奏響土耳其的進行曲時，這些舞者還踩著鼓點即興表演了一番。[[19]](#_19_FO_78_1172__Stratford_to_Cla)

在這些活動中，讓蘇丹倍感喜愛的是歐洲女性的裝束，他聲稱這些裝束比穆斯林女性的服飾好得多。“如果與這些女士交往起來，她們的性格就像外貌一樣，”他對自己的奧地利醫生說，“那我真的很羨慕你們歐洲人。”在蘇丹的鼓勵下，宮廷中的女性和土耳其高官的夫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采納歐洲服裝的要素：緊身胸衣、絲綢披肩、透明面紗等。她們開始更多地在上流公開場合露面，更多地與男性交往。家庭內部的習俗也開始西方化，在君士坦丁堡的奧斯曼精英家庭中，出現了歐洲的餐桌禮儀、餐具和廚具，以及歐洲家具和裝飾風格。[[20]](#_20_Badem___The_Ottomans___pp__2)

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克里米亞戰爭都是土耳其社會開放及西化的轉折點。大批難民從俄羅斯遷移過來，成為奧斯曼帝國接觸外部世界的諸多途徑之一。克里米亞戰爭給奧斯曼帝國帶來了新的理念與科技，加速了土耳其與世界經濟的整合，極大增加了土耳其人與外國人之間的接觸。在戰爭期間以及戰后不久的那一段時間里，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外國人比過去任何時期都多，其中有大批的外交官、金融家、軍事顧問和軍人、工程師、旅客、商人、傳教士和教士，這些人均對土耳其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戰爭還使得外國在奧斯曼帝國的投資急劇增加，導致土耳其在財政上對西方銀行和政府產生了依賴性。例如，為支持戰爭和坦齊馬特改革，土耳其的外國貸款從1855年的約五百萬英鎊上升到了1877年的兩億英鎊，令人震驚。戰爭不僅刺激了電報和鐵路的建設，而且催動了“公共觀點”的出現。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對戰事信息的需求極為龐大，直接導致了新聞寫作這一新興文字類型的出現，報紙和新聞承載了表達公眾觀點的責任。在1860年代，一批記者和期望進行改革的人士組成了一個松散的團體“新奧斯曼人”（Yeni Osmanlilar），雖然存在的時間短暫，卻是一個類似政黨的組織。與此同時，戰爭還觸發了針對以上這些社會變革的反應，孕育了第一波奧斯曼（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新奧斯曼人”相信能夠在穆斯林的傳統框架內采納西方的制度，正是因為這一理念，這個組織可以稱得上是后來“青年土耳其黨人”（Young Turks）[\*\*](#___20Shi_Ji_Chu_Tu_Er_Qi_Zheng_Z)的“精神之父”，而正是這些“青年土耳其黨人”創建了現代土耳其國家。[[21]](#_21_Badem___The_Ottomans___pp__2)

“新奧斯曼人”反對歐洲列強對奧斯曼帝國事務的日益干涉，他們認為某些改革舉措是由西方政府強加在土耳其身上的，其根本意圖是推廣基督教。他們因此反對這些改革，特別是1856年在西方強迫下頒發的《改革詔書》。這份詔書由斯特拉特福德和圖弗內爾共同起草，作為繼續提供外國貸款的條件，逼迫高門接受。《改革詔書》重申了1839年《玫瑰堂詔書》提出的宗教寬容原則，但是采用的是西方的法律語言，定義更為清楚，卻沒有引用《古蘭經》。除了向非穆斯林承諾寬容政策和民事權利外，這份詔書還在英國人的要求下，在奧斯曼帝國引入了一些新的政治原則：嚴格的政府年度預算，建立銀行體系，編纂刑事和民事法律，改革監獄，建立混合法庭處理大部分同時涉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案件。這些原則可以說是對奧斯曼帝國徹底的西方化。“新奧斯曼人”支持以《玫瑰堂詔書》闡述的一些原則作為坦齊馬特改革的要點，因為其中提出的改革源于土耳其內部的需求，而且沒有威脅到伊斯蘭教在奧斯曼帝國中的地位。在“新奧斯曼人”看來，《改革詔書》就不一樣，它是在西方列強壓迫下被迫接受的，給了非穆斯林特許權，他們擔心這將侵犯伊斯蘭教的利益和土耳其主權。

《改革詔書》由外國人起草這一事實，加上其中使用的西方用語，更是在穆斯林神職人員和保守派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即使是老一輩的坦齊馬特改革派穆斯塔法·雷希德也認為其中對基督徒做出的讓步太多了。在斯特拉特福德·坎寧的堅持下，雷希德在1856年11月重掌首相職位，但任職時間很短。一些對《改革詔書》深感憤怒的神學家和學生暗中策劃了針對蘇丹和他手下大臣的行動，但在1859年被當局逮捕。被審問時，這些人聲稱《改革詔書》違反了伊斯蘭教法，因為它給予了基督徒和穆斯林同樣多的權利。主要策劃者之一艾哈邁德酋長（Sheikh Ahmet）稱基督徒借助外國勢力獲取了這些權利，對他們的讓步意味著伊斯蘭教在奧斯曼帝國中的優勢地位從此將會終結。[[22]](#_22_R__Davison___Turkish_Attitud)

許多穆斯林等級制度的當權者和受益人也持有同樣看法，這些人包括地方軍政官員、知事、地主和貴族、神職人員和官員、包稅人[††](#___Ao_Si_Man_Di_Guo_Zhong_Dai_Li)和借貸人等，他們都擔心一旦教育程度更高、更為活躍的基督徒擁有了宗教和民事上的平等權利，將很快占據奧斯曼帝國政治和社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幾個世紀以來，奧斯曼帝國的穆斯林聽到的說法都是基督徒是下等人。擔心被剝奪優越地位，越來越多的穆斯林加入了抵制活動，各地紛紛出現針對基督徒的暴亂和襲擊活動：1856年在比薩拉比亞、納布盧斯（Nablus）[‡‡](#_____Wei_Yu_Jin_Ba_Le_Si_Tan)和加沙地帶，1857年在雅法，1858年在漢志。1860年在黎巴嫩和敘利亞，兩萬名馬龍派（Maronite）基督徒遭德魯茲人（Druzes）和穆斯林屠殺。在每一起事件中，穆斯林和基督徒在宗教上的差異都增強了經濟上的分歧，反之亦然，雙發愈加對立。例如，以從事農業和小商業為主的穆斯林的生計直接受到基督教中間商進口的歐洲物資的沖擊。在反對《改革詔書》的神職人員煽動下，暴動分子攻擊基督徒的店鋪和住宅、外國人建的教堂和教會學校，甚至還沖擊外國大使館。

以納布盧斯為例，暴動發生在1856年4月4日，就在穆斯林領袖在星期五的祈禱中譴責了《改革詔書》之后。這里約有一萬名居民，其中五千為基督徒，在克里米亞戰爭前，他們與鎮上的穆斯林一直相安無事。但是戰爭讓雙方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當地的巴勒斯坦人把俄軍的失敗看作“穆斯林的勝利”，新頒布的《改革詔書》中有關宗教平等的條款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宗教自豪感受到了傷害。對基督徒來說，他們把克里米亞戰爭看作西方聯軍的勝利，在家門口升起法國和英國的旗幟，并在新教教會學校里架上了一口新鐘。這些舉動刺激了穆斯林的情緒，在星期五祈禱間，穆斯林教士譴責這些舉動為西方統治的象征，聲稱不久以后，召喚穆斯林們前來祈禱的將是英國人的鐘聲，除非穆斯林們現在就起來搗毀基督教堂，這將是“向上帝祈禱的恰當方式”。于是教眾們呼喊著發動圣戰的口號，涌向納布盧斯街頭，許多人聚集在新教教會外，把門口的英國旗扯了下來。

在高度緊張的形勢下，點燃暴力導火索的是一件涉及萊德牧師（Reverend Mr Lyde）的荒唐事件。他是一名新教傳教士，還是劍橋耶穌學院的成員（Fellow of Jesus College），當天意外射殺了一名想偷他外衣的乞丐。“狂熱的杯子已經滿了，一滴水就能讓它溢出。”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詹姆斯·芬恩在對此事的匯報中寫道。為避開暴徒，萊德躲到了鎮長馬哈茂德·貝克（Mahmud Bek）家中。鎮長安撫了受害者家屬，并提議將他埋葬。但是鎮上的烏理瑪對這樣的處理不滿意，在開了一場宗教會議后，下令禁止將受害者埋葬，并暫停所有清真寺的祈禱，“直到伊斯蘭的血債得以償還”。人群聚集在鎮長官邸前，叫喊著“向基督徒復仇！”，要求鎮長交出萊德。萊德自愿犧牲自己，但是馬哈茂德·貝克沒有答應。暴徒們開始在鎮上破壞襲擊，所有能拿走的財物都被偷搶一空，基督徒的住宅、學校和教堂被洗劫焚毀。根據芬恩的報告，幾名普魯士領事官員被殺，同時遇難的還有十幾名希臘人。他的報告還寫道，“十一名孕婦因驚嚇而早產”。最后，在蘇丹軍隊介入下，事件終于得以平息。4月22日，萊德在耶路撒冷出庭受審，一個由穆斯林和基督徒聯合組成的陪審團認定他謀殺罪名不成立，但還是下令他給乞丐家人支付一大筆賠償金。[§§](#SSSS_Kong_Gao_Lai_De_De_Ren_Shen)萊德后來回到英國時，腦子已經不正常了，幻想自己成了耶穌基督。這一地區針對基督徒的攻擊持續了好幾個月，穆斯林暴亂的領頭人物卻從未被送上法庭。1857年2月，芬恩匯報說三百名生活在加沙的基督徒“依然在恐懼中過日子”，因為“沒人能夠控制穆斯林狂熱分子”，而且因為擔心報復，沒有一個基督徒愿意出庭做證。[[23]](#_23_FO_195_524__Finn_to_Clarendo)

因為擔心在各地引發暴力事件，奧斯曼當局在落實《改革詔書》承諾的宗教寬容條款上不斷拖延。斯特拉特福德對此感到越來越不滿，“在宗教迫害問題上，土耳其官員不愿意采取任何措施來滿足女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他向克拉倫登寫道，“他們假裝擔心一旦讓步，將會激發穆斯林公眾的不滿。”土耳其參與克里米亞戰爭獲得勝利，引發了“穆斯林必勝”念頭的重新抬頭，斯特拉特福德寫道。戰爭的后果是土耳其人變得更加維護自己的主權，對西方干涉內政更為反感。新一代的坦齊馬特改革派人物個人地位穩固，不像克里米亞戰爭前雷希德那一代改革派需要依賴外國勢力和大使們的支持。正因為如此，他們在實施改革時更為小心務實，愿意推動西方國家要求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但不會急于實現《改革詔書》對宗教事務的承諾。在他擔任大使的最后幾年間，斯特拉特福德一直呼吁土耳其領導人更為真誠地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強調土耳其必須以此回報英法兩國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提供的協助。最讓他惱怒的是，在奧斯曼帝國中，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依然會被處以極刑，盡管蘇丹已經承諾保護基督徒免受宗教迫害并廢除“處死脫教者的野蠻行為”。斯特拉特福德在1856年12月23日給高門的信中引用了許多改信基督教的人被從家中趕出并被處死的事例，他寫道：

歐洲列強將永遠無法接受，土耳其依靠他們的炮艦和軍隊取得了軍事勝利，其結果卻是延續[叛教]法律，這不僅是對歐洲列強的一種侮辱，而且是對他們基督教同仁的殘忍迫害。他們有權要求，英國政府也特別提出要求，任何轉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不會因此遭受懲罰，就像轉信伊斯蘭教的基督徒不會受到任何懲罰一樣。[[24]](#_24_Correspondence_Respecting_th)

但是直到他第二年回倫敦時，高門還是沒有做出多少實際行動來滿足歐洲列強的要求。“在基督徒中，”芬恩在1857年7月匯報說，“一種強烈不滿的情緒正在增長，這都是因為土耳其政府在實施宗教寬容上的動作遲緩。”

基督徒們投訴說他們在街上被人侮辱，在公共法庭上遭受不平等待遇，如果他們在政府中有任何職位都會被趕走，他們沒有參軍的榮譽卻被迫繳納比過去高一倍的軍事稅。

根據芬恩的說法，在巴勒斯坦鄉村地區，多年以后《改革詔書》的條文依然沒有得到貫徹。當地政府官員貪污腐化，不按規章辦事，而且與本地的穆斯林名流、教士和官方人物過從甚密，確保不會改善基督徒的地位。高門遙遠而軟弱，連制裁地方官員鋪張浮華的能力都沒有，更不用提迫使他們接受宗教和民事權利平等的新法律了。[[25]](#_25_FO_195_524__Finn_to_Stratfor)

高門未能實行改革所帶來的后果，在巴爾干地區最為深遠。從1858年的波斯尼亞起義開始，這一地區的基督教農民將會再次起來反抗穆斯林地主和官員。繼續維持米利特系統激發了巴爾干地區的民族主義運動，一系列的巴爾干戰爭將再次把奧斯曼帝國和歐洲列強卷入進來，民族主義情緒越來越高漲，最終將觸發第一次世界大戰。

\* \* \*

《巴黎條約》沒有對歐洲版圖造成大的改變。在許多人看來，損失這么多生命，結果卻是這樣，實在不值得。俄羅斯確實丟失了比薩拉比亞南部，割讓給摩爾達維亞，但是除此之外，《巴黎條約》只是陳述了一些原則：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完整將由歐洲列強保證，這是國際法中第一次承認了一個伊斯蘭國家，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曾特別將土耳其排除在外；對蘇丹的非穆斯林臣民的保護由簽字各方共同擔保，從而廢止了俄羅斯聲稱獨自擁有的保護奧斯曼帝國內基督徒的權利；確認多瑙河兩公國為自治國家，主權歸奧斯曼帝國，從而終結了俄羅斯對兩公國的保護權；對俄羅斯人來說最恥辱的是第十一條，宣布黑海為中立地區，在和平時期對任何商業船只開放，但不對軍艦開放，從而讓俄羅斯在其關鍵的南疆海岸線上失去了使用軍港和軍火庫的權利。[[26]](#_26_Can_Jian__H__Wood___The_Trea)

但是，盡管《巴黎條約》沒有立即讓歐洲版圖發生改變，它仍然是國際關系與政治的一道分水嶺，在實質上結束了歐洲過去的權力平衡，即奧地利和俄羅斯共同控制歐洲；與此同時形成了新的勢力組合，為一批新的民族國家，如意大利、羅馬尼亞和德國等的興起鋪平了道路。

雖然《巴黎條約》懲罰的是俄羅斯，但是從長遠看，損失最大的卻是奧地利，盡管它和克里米亞戰爭只沾了一點兒邊。俄羅斯一直沒有原諒奧地利在1854年倒向英法聯盟、采取武裝中立的行為，奧地利從此失去了這個保守派盟友。與此同時，自由派的西歐國家又因為奧地利的政治保守，以及在戰爭期間提出“對俄羅斯軟弱”的和平倡議而對它不抱信任。1856年后，奧地利發現自己在歐洲大陸上越來越孤立。之后它在1859年與法國和皮埃蒙特的戰爭中丟掉了在意大利的地盤；在1866年與普魯士的戰爭中丟掉了在德國的地盤；在巴爾干地區，從1870年代到1914年，奧地利也節節敗退。

當然這一切在1856年4月尚不明顯，奧地利與法國和英國組成三國聯盟共同擔保《巴黎條約》的實施。三方簽署協約，同意任何觸犯《巴黎條約》的行為都將構成宣戰的理由。帕默斯頓將之視為針對俄羅斯的一個“很好的附加保險和團結紐帶”。他認為俄羅斯必將再次成為歐洲大陸的主要威脅，希望將該協約擴展為一個歐洲國家之間的反俄羅斯大聯盟。[[27]](#_27_W__Mosse__The_Rise_and_Fall)但是拿破侖三世卻不想在反俄羅斯方面走得那么遠，自從塞瓦斯托波爾被攻占以來，法俄關系正轉向和睦。拿破侖三世需要俄羅斯的支持，在意大利問題上共同對付奧地利。對俄羅斯來說，法國是最有可能在黑海問題上提供支持的西方國家，在1856年接替涅謝爾羅迭擔任外交部長的戈爾恰科夫親王堅信這一點。自《巴黎條約》簽署以后，俄羅斯一直想去除其中讓其倍感羞辱的黑海中立化條款，亟須西方國家的支持。法國與俄羅斯在這一問題上有共同點，雙方都想改變歷史協議中的規定：俄羅斯想改變1856年《巴黎條約》的條款，法國想去除1815年條約的殘余。兩國之間有共同利益，可以達成某種默契。

和他的前任、堅決支持神圣同盟及其正統原則的涅謝爾羅迭不同，戈爾恰科夫親王對俄羅斯在歐洲大陸上的地位持一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在他看來，俄羅斯不應該像克里米亞戰爭前那樣，與其他國家結盟的目的僅僅是為了維護某種原則，例如正統君主制。這場戰爭已經向俄羅斯顯示，它不能指望歐洲正統君主之間的團結。過去涅謝爾羅迭的政策讓俄羅斯受累于其他國家政府的失敗，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俄羅斯就因為奧地利政府而深受打擊。戈爾恰科夫親王本人自從在維也納擔任大使起，就十分厭惡奧地利。他認為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應為其國家利益服務，不要考慮意識形態，只要可以為俄羅斯贏得更多利益，就可以與任何強國結成聯盟。這是一種新型的外交政策，也就是日后德國首相俾斯麥（Bismarck）推行的實用主義原則。

《巴黎條約》剛一簽署，俄羅斯就對其條文發起了挑戰，集中在一些小問題上，試圖在由西方列強組成的克里米亞聯盟間挑起分歧。1856年5月，他們聲稱對位于多瑙河三角洲入海口附近、土耳其水域內的蛇島（Serpent Island）上的一座燈塔擁有主權，派出七名士兵，在一名軍官的帶領下登上蛇島，并在燈塔駐扎。法國外交部長瓦萊夫斯基傾向于允許俄羅斯擁有這個沒有什么戰略意義的燈塔，但是帕默斯頓則堅持必須驅逐這些俄羅斯軍人，因為他們侵犯了土耳其的主權。當一艘英國船的船長與島上的土耳其人建立聯系后，他被告知土耳其人不在意俄羅斯軍人待在島上，反而把他們視為客人，樂于向他們販賣物資。帕默斯頓不為所動，“我們必須避免阿伯丁政府的失誤，不能讓俄羅斯擴張的早期行動和跡象在眼皮底下漏過。”他在8月7日給克拉倫登的信中寫道。派出炮艦武力驅逐俄軍的行動已經準備就緒，但是英國駐圣彼得堡全權特使約翰·沃德豪斯（John Wodehouse）卻心有疑慮，不能肯定英國有權這么做，英國女王也有同樣的疑慮，因此帕默斯頓不得不做出讓步，改而通過外交途徑施壓。戈爾恰科夫親王堅稱俄羅斯自從1833年起就擁有蛇島，并就此向法國提出申訴，于是法國獲得了一個在英國和俄羅斯之間進行國際調停的地位。[[28]](#_28_BLMD__Add__MS_48580__Palmers)

與此同時，俄羅斯對《巴黎條約》發出了第二次挑戰，這次的焦點與俄屬比薩拉比亞和土耳其控制的摩爾達維亞之間的邊界線有關。由于制圖錯誤和對地名的混淆，盟國把邊境線劃到了一座古老村莊博爾格勒（Bolgrad）的南邊。在村莊南邊三公里處是新博爾格勒（New Bolgrad），一個坐落在雅爾普克湖（Lake Yalpuk）邊的集鎮，這片湖是多瑙河的水源之一。俄羅斯利用地名上的混亂，聲稱兩個博爾格勒都應歸其所有，目的是借此獲得對雅爾普克湖的共同擁有權。帕默斯頓堅持邊境線必須保留在古村邊，因為《巴黎條約》的意圖之一是不讓俄羅斯占有多瑙河。他呼吁法國保持強硬，在俄羅斯面前與英國統一立場，否則兩國之間的分歧將被俄羅斯利用。但是法國愿意向俄羅斯讓步以示好，不過他們接著又提議邊境線應該沿著新博爾格勒和雅爾普克湖之間的一小條陸地劃定，這樣的話俄羅斯可以得到更多領土，但是卻拿不到雅爾普克湖。在這一事件中，法國再次成為俄羅斯與英國之間的斡旋者。

到11月中，德·莫爾尼公爵已說服戈爾恰科夫親王放棄對蛇島主權的要求，接受新博爾格勒但是不包括雅爾普克湖，外加由法國皇帝斟酌決定的其他領土補償。這一交易同時又同一個由沙皇和戈爾恰科夫親王提出、德·莫爾尼在圣彼得堡協助起草的方案掛鉤，提議法俄之間簽署一項協議，保護黑海和多瑙河兩公國的中立。雖然《巴黎條約》確立了這兩個地區的中立，但是俄羅斯聲稱“條約已被英格蘭和奧地利踐踏”，并且兩國“試圖以欺詐方式”剝奪俄羅斯對多瑙河地區的合法擁有權。德·莫爾尼向拿破侖三世推薦了俄羅斯的提議，同時向其轉告了戈爾恰科夫親王的一項承諾：如果法國簽署這項協議的話，俄羅斯將會支持法國在歐洲大陸的領土訴求。“請考慮一下，”德·莫爾尼寫道，“俄羅斯將是唯一一個承認法國新增領土的強國。就這一點我已經得到明確承諾。試試看我們能不能從英國人那里得到同樣的保證！誰知道呢，也許有一天我們要靠俄羅斯的支持才能滿足我們苛刻又任性的國民。”在俄羅斯方面，應該對法國新增領土采取什么樣的態度，一份給基謝廖夫伯爵的秘密指令做了詳細說明。基謝廖夫伯爵是多瑙河公國的前任總督，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后被任命為俄羅斯駐法國大使，原因是俄羅斯想派遣一名高級政客到巴黎，以顯示沙皇對俄羅斯與法國之間友誼的重視。在給基謝廖夫伯爵的秘密指令中，他被告知如果拿破侖三世將目光投向意大利半島的話，俄羅斯“將支持尼斯和薩伏依歸屬法國，以及倫巴第與撒丁尼亞的統一”。如果拿破侖三世的野心是萊茵河的話，俄羅斯將“使用其影響力”幫助法國，同時繼續遵守自己對普魯士的承諾。[[29]](#_29_BLMD__Add__MS_48580__Palmers)

1857年1月，各方代表在巴黎開會，很快為兩處領土爭議提供了解決方案。蛇島主權確認歸土耳其所有，成立一個國際委員會控制燈塔；新博爾格勒歸摩爾達維亞所有，俄羅斯將在比薩拉比亞的其他地方獲得領土補償。表面上看，俄羅斯在兩處領土爭議上都沒有占到便宜，但是卻憑借這兩處爭議削弱了克里米亞戰勝國聯盟之間的團結，贏得了一場政治上的勝利。法國人的行為很清楚地表明奧斯曼帝國的領土完整對他們來說并不重要，他們愿意通過與俄羅斯進行交易以實現重新劃分歐洲版圖的夢想。

在之后的十八個月里，俄羅斯高級官員陸續造訪巴黎。1857年，沙皇的弟弟康斯坦丁大公訪問巴黎。在克里米亞戰爭后，他被賦予重任對俄羅斯海軍實行迫切需要的改革。他認為要讓落后的俄羅斯艦隊實現現代化，與法國合作以獲得技術支持是最好的途徑，因此把所有俄國造船廠無力承擔的訂單全部給了法國企業。在前往巴黎途中，他在尼斯附近的維拉弗蘭卡灣（Bay of Villafranca）做了停留，與撒丁尼亞首相加富爾伯爵達成協議，代表敖德薩海運署（Odessa Shipping Company）向撒丁尼亞政府租借了一座裝煤站，從而為俄羅斯船只在地中海上提供了一個落腳點。[¶¶](#PP_Cong_Zhe_Yi_Shi_Qi_Kai_Shi__N)在巴黎，拿破侖三世為康斯坦丁大公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還跟他就歐洲的未來私下進行了交談。法國皇帝清楚康斯坦丁希望在俄羅斯外交政策上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他的泛斯拉夫觀點與外交部長戈爾恰科夫親王針鋒相對，所以在交談中故意順著他的政治野心。拿破侖三世特別提到意大利人可能會起來反抗奧地利人統治，并最終在皮埃蒙特領導下實現統一，還談到了奧斯曼帝國中基督徒發動起義的可能性，這些都是康斯坦丁非常感興趣的議題。拿破侖三世表示這兩種可能出現的局面都符合他們的利益，因為他們都鼓勵歐洲小國獨立。[[30]](#_30_G__Thurston___The_Italian_Wa)

在康斯坦丁大公的鼓勵下，拿破侖三世與沙皇建立了直接聯系，目的是爭取沙皇支持法國與皮埃蒙特聯軍在意大利與奧地利人開戰。1857年9月，兩國元首在斯圖加特（Stuttgart）會面，在這之后，拿破侖三世對獲得沙皇的支持充滿了信心。第二年7月，當他在普隆比耶爾（Plombières）與加富爾伯爵會面，共同商定作戰計劃時，他向加富爾伯爵保證已從沙皇那里得到莊嚴承諾，俄羅斯將支持他們在意大利的計劃。在這之后的幾年里，皮埃蒙特王國在倫巴第—威尼西亞戰役中打敗奧地利軍隊，領土得以擴大，建立了北意大利王國（Kingdom of Northern Italy），類似1848—1849年間短暫成立的意大利北部王國。在這之后，北意大利王國統一了托斯卡納（Tuscany）公國，這里原來是直接受教皇統治的教皇國（Papal State），但當時疆土已經縮小。北意大利王國還統一了亞平寧半島南部的兩西西里王國（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____You_Yuan_Lai_De_Xi_Xi_Li_Wan)，成立了意大利邦聯（Italian Confederation），實現了意大利的統一。長期支持意大利統一的拿破侖三世則得到了尼斯和薩伏依作為回報。

加富爾曾經將統一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法英聯盟上，這也是他派遣撒丁尼亞部隊前往克里米亞參加聯軍的原因。在巴黎和平會議上，他在幕后施展影響力，贏得了法英兩國的同情和支持。雖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果，也未贏得兩國支持意大利統一的明確表態，但是他依然相信西方列強的支持是他唯一的希望。當他從拿破侖三世那里得知俄羅斯將會支持意大利民族革命時，幾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趕往附近的溫泉度假地巴登—巴登（Baden-Baden），那里是歐洲“沒落的國王和親王們”聚集療養的地方。加富爾在那里覲見了葉蓮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即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嬸嬸，她持自由派立場，很有影響力。大公夫人向加富爾保證說他確實可以依托俄羅斯的支持。“大公夫人告訴我，”加富爾在給撒丁尼亞軍隊的馬爾莫拉將軍的信中寫道，“如果法國與我們保持步調一致，那么公眾輿論將迫使俄羅斯政府也加入聯合陣線。”[[31]](#_31_C__Cavour__Il_carteggio_Cavo)

但事實上，沙皇并不愿意卷入任何戰爭。法國同意取消他們對《巴黎條約》中有關黑海中立條款的支持；作為回報，亞歷山大二世并未承諾武力介入，而是在意大利戰爭期間保持武裝中立，在俄羅斯與奧地利的加利西亞地區接壤處集結大批軍隊，以此來阻止奧地利派兵增援意大利。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奧地利以武裝中立來支持聯軍，現在亞歷山大二世采取一模一樣的手段來對付奧地利，是對奧地利背叛行為的一種報復。在法國方面，拿破侖三世不愿意在黑海問題上做出明確表態，擔心因此破壞法英兩國的關系，所以法國和俄羅斯之間無法達成正式協議。但是兩國君主在1859年3月簽署了一項君子協定：一旦法國與奧地利開戰，俄羅斯將持“善意中立”的立場；作為回報，法國將在“未來某個時候”為俄羅斯“施展其影響力”。[[32]](#_32_Mosse__The_Rise_and_Fall__p)

正是在此協議基礎上，法國和皮埃蒙特在1859年4月向奧地利宣戰。他們知道，根據法俄君子協議，當他們在意大利與奧地利交戰時，俄羅斯將會在其與奧地利的邊境地區集結三十萬軍隊。如果這樣的局面發生在幾年前，俄羅斯一定會給予奧地利軍事支持，反擊法國推翻《維也納條約》的任何企圖。克里米亞戰爭改變了一切。

在拿破侖三世和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的指揮下，法國—皮埃蒙特聯軍很快取得了一系列勝利。在6月24日的索爾費里諾（Solferino）戰役中，聯軍摧毀了由奧地利皇帝弗蘭茨·約瑟夫率領的奧地利軍隊，這是歷史上最后一場交戰軍隊均由各方國家元首親自率領指揮的戰斗。此時拿破侖三世開始擔心德意志地區各國可能會派出軍隊支持奧地利，于是在事先沒有取得皮埃蒙特同意的情況下，就與奧地利在維拉弗蘭卡簽訂了停戰協議。根據協議，倫巴第的大部分地區，包括其首府米蘭都歸屬法國。接著根據拿破侖三世和加富爾在普隆比耶爾達成的意見，法國人立刻將從奧地利人那里取得的擁有權轉交給了皮埃蒙特。法國與奧地利的停戰協議還規定在意大利中部的國家，包括帕爾馬（Parma）、摩德納（Modena）和托斯卡納恢復君主制，本來這些國家的君主在戰爭之初就被公眾暴動推翻了。這一交易激怒了皮埃蒙特人，卻合了俄羅斯人的心意——因為看到意大利獨立戰爭演變成了一場革命運動，讓俄羅斯人深感憂心。皮埃蒙特軍隊接著并吞了這些中部地區國家，同時把尼斯和薩伏依給了法國，作為其一貫支持意大利獨立的回報。但是這一領土割讓行為遭到了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將軍的反對，他是對奧地利作戰的英雄，同情革命，而且本人在尼斯出生。在1860年春，他率領手下一千名志愿軍“紅衫軍”（Redshirts）南下開始了一場征服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遠征，最后將這兩個王國統一，并加入了皮埃蒙特領導下的意大利。

加里波第對意大利革命的支持讓沙皇與拿破侖三世之間的關系變得非常緊張。對沙皇來說，這讓他清楚地意識到支持法國皇帝的擴張政策將可能帶來危險的后果。一旦意大利的民族主義革命成功，將難以阻止這一浪潮涌向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的奧地利，再從那里涌向波蘭和俄羅斯的其他屬地。1860年10月，俄羅斯與皮埃蒙特斷絕了外交關系，作為對其并吞那不勒斯王國的抗議。俄羅斯外交部長戈爾恰科夫譴責皮埃蒙特煽動革命，宣稱除非獲得國際會議批準，俄羅斯將反對任何發生在意大利的領土變動，并表示謹慎支持奧地利在意大利的軍事行動，當然現在俄羅斯已決不可能再與奧地利人在意大利并肩作戰了。此時第一屆意大利議會已于1861年在都靈（Turin）召開，只有威尼西亞和教皇城市羅馬尚未加入。當埃馬努埃萊在1861年3月加冕為意大利國王時，盡管受到來自英國和法國的壓力，奧地利和俄羅斯仍然共同決定不予承認他的國王地位。當英國人要求戈爾恰科夫親王運用他的影響力來說服普魯士承認意大利國王時，他拒絕合作。從這一點來看，原來的神圣同盟似乎還沒有完全煙消云散。戈爾恰科夫親王對英國人堅稱，如果從皮埃蒙特開始的民族起義浪潮不被遏制的話，將會威脅到奧地利和土耳其的穩定。也許是故意嘲諷英國人參與克里米亞戰爭的理由，戈爾恰科夫親王對英國駐圣彼得堡大使內皮爾勛爵[†††](#____Ji_Fu_Lang_Xi_Si__Nei_Pi_Er)說道：“我們有兩個根本的目標——保衛土耳其，保衛奧地利。”[[33]](#_33_K__Cook___Russia__Austria_an)

1863年的波蘭起義將俄羅斯與法國的友好關系推到了破裂點。在加里波第的感召下，波蘭學生從1861年起就開始游行示威，促使沙皇派駐波蘭的總督蘭貝特將軍（General Lambert）宣布實行軍事管制。波蘭領導人開始秘密集會商討戰略，一些人支持發動一場聯合農民和工人的全民民主革命，另一些較為保守的人士在恰爾托雷斯基的領導下，尋求發動一場貴族和知識分子領導的民族主義運動。波蘭起義的開端是一場自發的反抗俄軍在波蘭強制征兵的運動，小股武裝在立陶宛、波蘭、白俄羅斯和烏克蘭西部天主教聚居區的森林地帶與強大的俄軍展開游擊戰。參加游擊戰的人，包括許多“朱阿夫死軍”（Zouaves of Death）成員，他們曾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與俄軍作戰過。“朱阿夫死軍”由弗朗索瓦·羅什布呂納（Franois Rochebrune）創建，他是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法軍朱阿夫部隊里的一名軍官，還曾在1857年作為英法聯軍中的一員參加過第二次鴉片戰爭，后來定居在歸屬奧地利的波蘭城市克拉科夫（Cracow），在當地成立了一所擊劍學校。波蘭朱阿夫部隊的士兵身穿胸口繡著白色十字架的黑色制服，頭戴紅色土耳其氈帽，使用的是從克里米亞戰場上獲得的米涅來復槍，他們誓言寧愿戰死也不向俄軍投降。

一個革命政府在華沙秘密成立了，宣布“所有波蘭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公民”，允許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并向歐洲國家懇求支援。教皇庇護九世下詔為天主教波蘭反抗東正教俄羅斯進行特別祈禱，并積極地在意大利和法國煽動對波蘭起義者的同情與支持。拿破侖三世想派遣軍隊從波羅的海登陸支持波蘭革命，但是被英國人阻止了，擔心因此觸發又一場克里米亞戰爭。最后因為法國發動了對墨西哥的入侵戰，才無力派兵前往波蘭。西方列強為維護波蘭起義而進行的外交干預讓俄羅斯感到憤怒，特別是法國的行為被俄羅斯視為一種背叛，因此俄羅斯更是不惜一切代價鎮壓波蘭起義。俄軍在各處焚毀整座市鎮和村莊，幾萬名波蘭男女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幾百名起義者被公開絞死。



弗朗索瓦·羅什布呂納，瓦萊雷·熱武斯基攝，（圖片來源：波蘭國家圖書館，華沙）

在波蘭起義之初，俄羅斯就已經開始疏遠法國，恢復了與普魯士的聯盟。普魯士是參與瓜分波蘭的國家之一，也是唯一一個支持俄羅斯鎮壓波蘭起義的國家。兩國之間有著軍事協議，允許俄軍乘坐火車通過普魯士境內。亞歷山大二世一向對自由派的法國心存疑慮，普魯士看來是一個更為可靠的保守派盟友，可以共同對抗法國在歐洲大陸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俄羅斯給了普魯士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相當多的支持。早在俾斯麥于1859—1862年擔任駐圣彼得堡大使時，其保守主義立場就已經引起了沙皇的注意，俾斯麥也極為重視與俄羅斯保持友好關系。在這段時間里，俄羅斯一直支持普魯士的對外戰爭，包括1864年對丹麥、1866年對奧地利以及1870年對法國的戰爭。到了1871年，德國在俾斯麥的領導下取得了統一，而法國則剛剛戰敗。在德國的支持下，《巴黎條約》第十一條終于被取消，俄羅斯可以開始重建黑海艦隊了。在《巴黎條約》簽署后的十五年間，發生了許多事件，國際局勢已面目全非：拿破侖三世被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推翻，流亡到了英國；奧地利和法國的勢力和地位下降了；兩個新興國家德國和意大利成立了；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的種種考慮和激情已經煙消云散。

\* \* \*

《巴黎條約》沒有讓俄羅斯丟失大量領土，卻讓其備受挫折。除了損失了黑海艦隊、割讓了比薩拉比亞部分地區外，俄羅斯在巴爾干地區也不再有任何威望，18世紀以來俄羅斯在東方問題上獲得的利益丟失殆盡。一直要到1945年，俄羅斯才恢復了其在歐洲的主控地位。

黑海非軍事化對俄羅斯來說是戰略上的重大打擊，如果俄羅斯再與土耳其交戰，土耳其可以請求英國或是任何其他國家的艦隊進入黑海，而俄羅斯卻沒有能力保衛自己易受攻擊的南部海岸。摧毀黑海艦隊、塞瓦斯托波爾和其他軍港對俄羅斯來說是一場羞辱，被強制解除武裝這樣的事情過去從未發生在任何一個強國身上，即使法國在1815年拿破侖戰爭慘敗后也沒有被迫解除武裝。俄羅斯遭受的對待在歐洲協調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歐洲協調的建立本來就是為了保證一個強國不會被其他國家羞辱。但是盟國在對待俄羅斯時，并沒有將其看作一個歐洲強國，而是將其視為一個半亞洲（semi-Asiatic）國家。在巴黎和平會議期間，法國外長瓦萊夫斯基曾詢問英國代表團，如果在俄羅斯黑海港口設立西方國家的領事館以監督黑海非軍事化的執行，這樣做對俄羅斯來說會不會過于羞辱了。英國駐法國大使考利勛爵堅持認為不會，他指出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后，《南京條約》也對中國強加了類似的條款。[[34]](#_34_A__J__P__Taylor__The_Struggl)

在俄羅斯，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讓軍隊信譽掃地，突出了對國防進行現代化改革的迫切性，這不僅體現在軍事上，還包括建設鐵路、工業化、健全的金融系統等等。戰爭部自尼古拉一世以來一直受寵，現在風頭被財政部和內政部蓋過了，當然政府開支的很大一部分仍然用于戰爭部，這一點是不可避免的。

許多俄羅斯人心目中長期以來的國家形象——世界上最大、最富有、最強大的國家——忽然粉碎了，俄羅斯的落后暴露無遺。在社會的各個角落都可以聽到呼吁改革的聲音，每件事均遭到質疑。克里米亞戰爭這場災難暴露了俄羅斯各個機構存在的問題，不光是軍事指揮上的腐敗無能、海陸軍技術上的落后、因道路不佳和缺乏鐵路導致的長期存在的補給困難，還包括軍隊主要組成分子農奴的惡劣生存條件和教育匱乏、農奴經濟無法支持一場對手是工業化國家的戰爭，以及世襲制本身的失敗。批評者將矛頭集中在尼古拉一世身上，是他傲慢執拗的政策導致了這場災難和無數生命的消逝。“現在公眾輿論對記憶中的尼古拉非常輕蔑，”尼古拉一世的皇后身邊的女侍官丘特切娃在她的日記中寫道，

每一次新的挫敗都會導致對他的責難。他們指責他推行一套全憑個人好惡制定的政策；為了他自己的驕傲和榮譽而放棄了俄羅斯的傳統；對不起我們的兄弟、東正教斯拉夫人；當他應該也可以給近東和教會帶來新生命的時候，卻讓沙皇成了歐洲憲兵。

甚至政府精英層對尼古拉一世時期體制的失誤也有所認識。“我的上帝，這么多受害者，”沙皇的審查官亞歷山大·尼基堅科（Alexander Nikitenko）在他的日記中寫道，“都是因為一個人的瘋狂意志，沉醉在絕對權力和傲慢中……我們一直在發動戰爭，不是一年兩年，而是三十年，維持著一支一百萬人的軍隊，不斷威脅歐洲。到底有什么意義？俄羅斯從中得到了什么好處、什么榮耀？”尼基堅科反思道，在幾年前，莫斯科的泛斯拉夫主義者還在宣揚西方如何正在衰落，俄羅斯領導下的新斯拉夫文明將如何會取而代之。“現在歐洲向我們證明我們是多么無知沒落，我們對西方文明是多么傲慢無禮，俄羅斯真的多么腐朽！哦，我們是多么不幸！”[[35]](#_35_A__Tiutcheva__Pri_dvore_dvuk)

呼吁改革的人中也包括托爾斯泰。他的《塞瓦斯托波爾故事》讓其一舉成名，克里米亞戰爭的經歷塑造了他的人生觀和文學觀。他親眼目睹了許多軍官的腐敗無能以及對普通士兵和水手的殘暴對待，而普通士兵和水手的勇氣和堅韌則讓他振奮。在戰爭期間的日記中，他第一次表達了激進改革的想法，并發誓用自己手中的筆來反抗社會不公。1854年11月，在從敖德薩到塞瓦斯托波爾的船上，船長向他講述了運送士兵時的情形：“一名士兵如何在大雨中躺在潮濕的船艙底昏昏睡去；一名軍官如何鞭打一名士兵，僅僅因為這名士兵忍不住撓癢；一名遲到歸隊兩天的士兵，如何因為害怕而在船上開槍自殺，這名士兵的尸體如何沒有舉行葬禮就被扔到海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他了解到的西方軍隊中普通士兵的待遇，這讓他充分意識到必須有所改變。“我跟法軍和英軍傷病員聊了一兩個小時，”同一個月，托爾斯泰在辛菲羅波爾附近的埃斯基奧德寫道，

每一名戰士都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有自尊心，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就像軍隊機器上一個高效的彈簧。性能優良的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能、年輕、對政治和藝術的基本知識，這些都讓他們認識到自身的價值。而我們呢？愚蠢的徒步和武裝訓練、無用的武器、長官的壓迫、年邁、缺乏教育、惡劣的食物裝備把士兵們最后一點自豪的火花都撲滅了，甚至讓他們對敵人產生過高的看法。[[36]](#_36_Tolstoy_s_Diaries__vol__1__1)

在法國和英國軍隊中，是否許多士兵都對藝術有很強的認識，這一點其實是頗成疑問的。和其他許多俄羅斯對“西方”的崇拜一樣，托爾斯泰的分析中也有很大的幼稚成分，但是這些理想化的認識無疑強化了他的改革主義激情。

尼古拉一世去世時，托爾斯泰撰寫了一份“軍隊改革計劃”，呈給塞瓦斯托波爾守備司令奧斯滕-薩克恩伯爵，希望他能將此轉交給亞歷山大二世。新任沙皇據說傾向實行更為人道的政策，基于這一傳言，托爾斯泰開篇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原則，雖然所說的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對塞瓦斯托波爾的守衛者來說實在有失公允：

我的良知和正義感不允許我對在我眼前實施的罪惡再沉默下去，這一罪惡正造成百萬人的死亡，消磨我們的力量，破壞國家的榮譽……我們沒有軍隊，有的只是一群受軍紀威嚇的奴隸，而指揮他們的則是盜賊和販奴者。這群人不是一支軍隊，因為他們既不對信仰、沙皇和父國——這些詞在多大程度上被濫用！——有真正的效忠，也沒有勇氣或是軍事氣節。他們所有的，一方面是被動的耐心和被壓抑的不滿，另一方面是殘忍、奴役和腐敗。

托爾斯泰強烈譴責了對農奴士兵的殘忍對待。在一個早先的版本中，他甚至聲言在“每一個被鞭打的戰士”身上都埋藏著一種“報復的意愿”。這一意愿“被壓抑極深，尚沒有強烈涌現”，但是正在等待爆發之中，“我的老天，如果真正爆發的話，將會有什么樣的恐怖場景降臨我們的社會”。他后來把這一段煽動性的語句刪除了，估計意識到這些話會讓他的改革計劃斷送在政府圈子里。托爾斯泰呼吁在軍中廢除體罰，認為軍隊的殘暴化導致了俄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拙劣表現。他提出應該對炮兵進行改革，在克里米亞戰爭中，俄軍炮兵在聯軍米涅來復槍面前沒有什么用處。在提出如何提高軍隊指揮能力的想法時，托爾斯泰對克里米亞戰爭中的俄軍軍官做了強烈的批評，指責他們殘暴而腐化，關心的只是士兵的制服和演練上的細節，這些人當軍官是因為他們其他什么也做不了。但是，在這里他再次刪除了一段激烈的言辭，在那段話中，他聲稱俄軍高級指揮官們不過是一群宮廷幕僚，被選上指揮軍隊是因為沙皇寵信他們，而不是他們有多強的指揮能力。刪除這段話的目的也是為了讓他的方案能有更多機會受到關注。當時已有謠傳說他是一首諷刺歌的匿名作者，這首歌將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歸咎于扛著最高級肩章的軍官的無能表現。這首民謠在軍隊里和社會上廣為流傳，以至于托爾斯泰因為被懷疑是作者而遭到了沙皇的弟弟、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大公（Grand Duke Mikhail Nikolaevich）的訓斥，指責歌詞打擊了軍隊士氣。[‡‡‡](#_______1857Nian__Liu_Wang_Zhong)雖然托爾斯泰是否是這首歌的作者從未得到過證實，但他卻因此不再有晉升的機會，他在抵達塞瓦斯托波爾前的軍銜是二級中尉，后來一直都是二級中尉。[[37]](#_37_M__Vygon__Krymskie_stranitsy)

托爾斯泰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的經歷讓他不光對軍事系統產生質疑。詩人阿法納西·費特（Afanasy Fet）第一次見到托爾斯泰是在1855年冬天，在作家屠格涅夫（Turgenev）位于圣彼得堡的寓所里。他對這個年輕人“對任何廣為接受的觀點自動持反對態度”感到驚異。在克里米亞與普通士兵共同生活讓托爾斯泰看到了農民簡單樸素的美德，讓他投入了一場尋找新的真理的不倦旅程，試圖發現一種在不公正的農奴制下，如何讓俄羅斯貴族和地主過上有道義生活的方式。他過去的作品就曾經觸及這個話題，在1852年出版的小說《一個地主的早晨》（A Landowner’s Morning）中，他寫了一個地主（也就是他本人）在鄉村尋找快樂和公正的人生，發現只有在不停為那些沒有他快樂的人做好事的過程中，才能找到快樂和公正。大致在同一時期，他曾建議降低農奴在他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莊園中應繳的傭金，但是農奴們并不習慣于這樣的善意，因此對他的做法有所懷疑，拒絕了他的建議。然而，直到克里米亞，托爾斯泰才開始真正對穿軍服的農奴們產生了感情——這些“淳樸而仁慈的人們，這些在真正的戰爭中清楚展現自己善良之心的人們”。他對自己過去的生活感到厭惡——賭博、嫖妓、大肆吃喝、鋪張奢華、沒有真正的工作和缺乏人生目標。在克里米亞戰爭后，他更為堅定地投入了與農民生活在一起、過一種“有真正意義的人生”的使命。[[38]](#_38_Kelly__Toward_Another_Shore)

托爾斯泰從克里米亞返回時，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改革氣氛。傾向自由和開明的貴族普遍認為是時候結束農奴制了。用著名的十二月黨人謝爾蓋·沃爾孔斯基（Sergei Volkonsky）的話來說，廢除農奴制是“在認可農民在最近兩場戰爭中所付出的犧牲方面，國家至少應該做到的。現在是承認農民也是公民的時候了”。沃爾孔斯基是托爾斯泰的遠親，1856年時剛從西伯利亞流放中被釋放。參加克里米亞戰爭的農奴士兵曾經以為可因參戰而獲得自由，在1854年春，曾有謠言說沙皇承諾任何志愿參加陸軍或海軍的農奴都可以獲得自由，于是成千上萬的農奴涌向征兵站，在被驅逐時與士兵和警察發生了沖突。在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后，農奴們對解放的期待再一次高漲起來，在亞歷山大二世登基后的頭六年中，曾發生過五百起農奴起義和針對鄉紳的罷工。[[39]](#_39_IRL__f__57__op__1__n__7__l)

新沙皇相信解放農奴是防止革命發生的必要手段。“自上而下地廢除農奴制總好過等到某一天農奴制開始自下而上地瓦解”，他在1856年曾對一些莫斯科的貴族們如此說道。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讓亞歷山大二世相信除非能掃除落后的農奴制度并自我實現現代化，否則俄羅斯無法與西方列強競爭。當時的地主鄉紳們對如何讓自己的莊園贏利所知不多，他們中絕大部分人對農業或是會計一無所知，卻像過去一樣繼續大手大腳地花錢，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債務。到1859年，俄羅斯三分之一的莊園和三分之二的農奴已經被抵押給了政府和貴族銀行。解放農奴的經濟理由已無可辯駁，許多地主已紛紛通過與其他人的農奴簽約而轉向使用自由勞動力系統。因為農奴贖買自由的錢可以用來償還鄉紳的債務，解放農奴在經濟上的吸引力已越來越難以抵擋。[§§§](#SSSSSS_Gen_Ju_Nong_Nu_Jie_Fang_D)

1858年，沙皇任命了一個特別委員會，通過與地方鄉紳委員會協商來制定解放農奴的方案。一些頑固的鄉紳試圖施加壓力，限制土地改革的范圍，或是把土地轉讓變得對自己更為有利。在近兩年時間里，特別委員會陷入政治扯皮中，行動遲緩。最終在沙皇的親自干預下，保守的鄉紳被擊敗，溫和改革派占了上風。亞歷山大二世在1861年2月19日簽署了《解放詔書》（Edict of Emancipation），并通過教區教士向農民們宣讀。土地改革的程度并不如農民期待的那么徹底，《解放詔書》給予地主相當大的權利來選擇將哪些土地轉讓給農民，而且農民必須贖買自己獲得的土地，而不是像他們期待中的那樣不用付錢就被授予土地。[¶¶¶](#PPP_Zong_Ti_Lai_Shuo__E_Luo_Si_O)許多地方出現了暴亂，有些是發生在“假詔書”的謠言開始流傳之后。這個謠言說公開發表的詔書其實不是沙皇簽署的那一份，而是由貴族和政府官員們偽造的，為的是阻止真正的解放；真正的詔書是一份所謂的“金色宣言”，沙皇在這份宣言中宣布解放農民并把所有土地都賜予他們。

盡管農民們很失望，解放農奴仍然是一個極為關鍵的分水嶺。至少普羅大眾獲得了某種形式的、不管在實際操作中多么有限的自由，并有理由希望俄羅斯能因此而獲得重生。作家們把《解放詔書》和10世紀俄羅斯轉信基督教相提并論，宣稱年輕的俄羅斯需要把自己從過去的罪惡中解放出來，依靠人民的血汗創造財富，地主和農民必須克服舊有的分歧，以平等的國民身份進行和解，因為正如俄羅斯作家費奧多爾·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在1861年所寫的那樣：“每一個俄羅斯人首先是一個俄羅斯的人。”[[40]](#_40_F__Dostoevskii__Polnoe_sobra)

在解放農奴的同時，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還加快了沙皇改革軍隊的計劃。托爾斯泰并不是唯一一個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提出軍隊改革方案的軍官。1855年夏天，近衛軍和擲彈兵（Guards and Grenadiers）司令費奧多爾·里迪格爾伯爵（Count Fedor Ridiger）向沙皇呈上了一份備忘錄，其中對軍官群體的批評在許多方面與托爾斯泰的看法一致。里迪格爾把即將來臨的戰敗歸咎于高級軍官以及軍隊管理部門的嚴重無能，他建議軍官應該接受軍事科學的培訓，而不是只會行軍和檢閱，同時那些表現出軍事才華的人必須在戰場上被委以重任。不久之后，另一名高級軍官、副官長V.A.格林卡（Adjutant General V.A. Glinka）也提出了類似意見，并且還批評了軍隊的補給系統。另外還有人提出修建鐵路的建議，所有人都同意缺乏鐵路系統是造成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俄軍補給不善的主要原因。[[41]](#_41_N__Danilov__Istoricheskii_oc)

沙皇設立了一個“軍事領域改良委員會”（Commiss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the Military Sphere），交由里迪格爾負責，但是當委員會提出改革建議時，沙皇卻在實施上開始動搖了。他對改革建議是抱支持態度的，例如早在1857年1月就批準了修建鐵路網絡的方案，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與其他主要農業中心和邊境地區連接起來。但是他擔心貴族們對這些改革方案的反應，因為此時他正準備推行解放農奴的計劃，需要貴族們的支持。他把戰爭部交給尼古拉·蘇霍扎涅特將軍（General Nikolai Sukhozanet）負責，此人是出了名的忠心耿耿，但是能力低下。蘇霍扎涅特任職期間，主持了一系列修修補補式的改革，絕大部分是一些細小的法規，例如改進近衛軍的制服外觀等，但是其中兩項有較為重大的影響：第一是修改《軍事犯罪條例》（Military Criminal Statute），將體罰時最多可判的鞭笞數量從六千降到了一千五百，不過依然足以將士兵鞭打至死；第二是采取措施改善士兵的教育和軍事訓練，當時農奴士兵幾乎全都是文盲，克里米亞戰爭已清楚地顯示他們不能適應現代化戰爭。

在一系列改善軍隊教育的嘗試中，有一項是創辦一份新刊物《軍隊雜記》（Voennyi sbornik），目的是吸引軍官和士兵讀者，以生動的文章向他們呈現軍事科學與事務、故事、詩歌，還包括以自由主義精神撰寫的有關社會事務的文章。這份刊物與托爾斯泰在1854年提出的“軍隊公報”想法相似，但是可以免受軍事當局的言論審查。刊物的文學欄目主編是尼古拉·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他是著名民主刊物《當代人》的主編，曾經發表過托爾斯泰的作品。車爾尼雪夫斯基1862年發表的小說《怎么辦？》（What Is to Be Done?）影響了好幾代的革命者，其中包括列寧。到1860年代，《軍隊雜記》在銷量上已和《當代人》不相上下，有超過五千名訂閱者，顯示出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改革的理念在軍隊中有相當的反響。

創辦《軍隊雜記》的想法來自軍事學家德米特里·米柳亭（Dmitry Miliutin），他是克里米亞戰爭后俄羅斯軍隊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米柳亭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分析家，1838年在高加索戰場上受了重傷，以后就在軍事學院（Military Academy）擔任教授講課。俄軍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被西方軍隊全面打敗，他很快就得出教訓：俄軍必須以西方軍隊為榜樣進行改革和現代化，不久之后，他就有機會把一些理念運用到高加索的作戰中。

1856年，沙皇任命多年的親信A.I.巴里亞京斯基親王擔任高加索總督，授予他消滅沙米勒叛軍武裝的重任。巴里亞京斯基主張在克里米亞戰爭后，針對俄羅斯在歐洲被鉗制的局面，擴大本國在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的影響力。亞歷山大二世接受了他的觀點，甚至在《巴黎條約》公布前，就已經表示出要在高加索地區加強鎮壓穆斯林反叛武裝的意圖。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后，沙皇決定非但不解散高加索地區的軍隊，反而增添新部，并將從海外訂購的一萬支米涅來復槍交給巴里亞京斯基。到1857年底，巴里亞京斯基手中已經控制了超過六分之一的軍費和三十萬軍隊。他認為急需對高加索的俄軍進行改革，因此任命米柳亭為自己的參謀長，還相信如果在高加索改革成功的話，就更有說服力推動全軍的改革了。根據西方軍事理念和里迪格爾將軍的方案，米柳亭提出改進指揮鏈，使其更為合理，同時放權給前線指揮官，讓其根據自己對周圍環境的判斷進行指揮和控制資源，而這一切的基礎是提高軍官培訓水平。[[42]](#_42_E__Brooks___Reform_in_the_Ru)

克里米亞戰爭的結束大大打擊了沙米勒反抗運動的士氣。在既沒有西方國家支持，又難以得到奧斯曼帝國協助的情況下，穆斯林部落的游擊武裝已沒有能力繼續與俄軍抗衡。四十年的武裝反抗讓車臣人精疲力竭，各地武裝力量的代表紛紛向沙米勒請愿，希望他與俄羅斯人談和。沙米勒依然想繼續作戰，但是在巴里亞京斯基大規模增兵的局面下，他手下的武裝已支撐不了多久，終于在1859年8月25日向俄軍投降。[\*\*\*\*](#_____Sha_Mi_Le_Bei_Song_Wang_She)

由于俄軍在高加索作戰成功，在巴里亞京斯基的推薦下，米柳亭于1861年11月被沙皇任命為戰爭部長。沙皇覺得在《解放詔書》獲得通過之后，他終于可以積極推動軍事改革了。根據他過去的改革方案，米柳亭向沙皇呈上了一系列立法提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全民征兵制，所有男性到二十歲時都有義務參軍。這項提案到1874年才得以通過。在俄軍的新系統下，根據地理位置建立軍區，每一軍區在和平時期都會維持一定數量的軍隊。這一制度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現代征兵制相似，但是在沙皇統治期間，政府財政管理不善，階級、宗教和種族等級依然繼續影響著每一項政策的實施，全民征兵制從未完全實現。米柳亭改革的重點是軍隊效率，但是人道主義方面的考量也未落后。他最根本的使命是重塑俄羅斯軍隊文化，讓每一個農民戰士都被當作一位公民而不是一個農奴來對待。軍事院校也進行了現代化改革，更強調傳授軍事科學和技術。所有新兵必須上課學習基礎知識，使得軍隊成為農民接受教育的重要途徑。軍隊司法系統也進行了改革，至少在理論上廢除了體罰制度，雖然在實際中，俄軍士兵依然遭受體罰，有時候甚至因為輕微違反軍紀而遭受鞭笞。一直到1917年，俄軍中的普通士兵依然能感到自己被當作農奴對待。

\* \* \*

克里米亞戰爭強化了俄羅斯長期以來對歐洲的反感。西方國家選擇和土耳其站在一起，讓俄羅斯人覺得受到了背叛，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歐洲國家聯盟與穆斯林共同作戰，打擊另一個基督教國家。

對歐洲反感最強烈的莫過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因為參與了1849年彼得拉舍夫斯基（Petrashevsky）的左翼圈子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監獄。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他被釋放，在中亞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_____Zai_Jin_Ha_Sa_Ke_Si_Tan_Jin)要塞當兵服役。在他寫過的唯一一首詩《1854年歐洲事件》（“On the European Events of 1854”）中（從這首詩的水平看，不難理解為什么他再沒寫過詩），陀思妥耶夫斯基將克里米亞戰爭描繪為“俄羅斯的耶穌受難”。但是，他在詩中警告西方讀者，俄羅斯一定會重新崛起，當其重新站起來后，會把眼光投向東方，實現將基督教傳遍世界的天賦使命。

你們不清楚的是她的宿命！

東方——她的宿命！一百萬世代的人向著她

無倦地伸出手臂……

古代東方的重生

由俄羅斯來實現（就像上帝賦予的那樣）的日子已經臨近。[[43]](#_43_Yin_Yong_Yu_J__Frank__Dostoe)

在西方國家面前遭受挫折之后，俄羅斯轉向亞洲實現其帝國規劃。對于巴里亞京斯基和戰爭部來說，打敗沙米勒之后，高加索可以作為一個跳板，讓俄羅斯征服中亞地區的獨立汗國。戈爾恰科夫親王和外交部對這一想法就不那么積極，擔心這一擴張主義政策將破壞他們與英國和法國修好的努力。沙皇先是在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間猶豫不決，進而在1856—1857年間開始接受俄羅斯的使命在亞洲，而英國是實現這一使命的唯一障礙這一看法。受到克里米亞戰爭后英俄雙方互相極不信任氣氛的影響，“轉向亞洲”的觀點成為俄羅斯在“大博弈”時期，即雙方在中亞爭奪主動權時各項政策的出發點。

英國在1856—1857年的英國—波斯戰爭（Anglo-Persian War）中獲勝之后，進一步增強了其在波斯地區的勢力，這讓沙皇很是擔心。根據1857年3月簽署的《巴黎條約》[‡‡‡‡](#_________Bu_Tong_Yu_1856Nian_Jie)，波斯將從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撤出，這座城市是波斯于1852年和1856年在俄羅斯的支持下占領的。沙皇與巴里亞京斯基的通信很清楚地表明沙皇擔心英國人將會施展他們在德黑蘭的影響力，進而獲得在里海（Caspian）南岸駐軍的機會。他同意巴里亞京斯基的悲觀預測：“如果英國旗幟出現在里海，那不僅對我們在東方的影響力、對我們的對外貿易，而且對[俄羅斯]帝國的政治獨立將會是一個致命打擊。”

亞歷山大二世讓蘇霍扎涅特準備一份報告，分析“有關俄羅斯與英國在中亞地區發生武裝沖突的可能”。雖然這份報告排除了英國軍事威脅的可能性，但是沙皇依然擔心英國人會派遣印度軍隊去征服中亞，進而驅逐高加索地區的俄羅斯人。1857年春，英國蒸汽機船“袋鼠號”和另外幾艘稍小的船只在向沙米勒武裝運送軍事裝備的過程中，在切爾克斯海岸被截。沙皇要求英國政府做出“明確解釋”，英國政府卻不加理睬，而俄羅斯已經沒有黑海艦隊來阻止英國對高加索的干涉了。“袋鼠號”事件被沙皇稱為一次“無法名狀的羞辱”，也更讓他相信如果不能征服高加索，不能在政治上控制中亞草原，俄羅斯將永遠無法在英國的威脅下保障安全。

在整個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俄羅斯一直在考慮各種方案進攻中亞地區，向坎大哈（Kandahar）和印度逼近，主要目的是為了吸引英軍，減輕克里米亞戰場上俄軍的壓力。雖然這些方案都因為不切實際而被否決，但是在印度，俄羅斯可能入侵的謠言一直廣為傳播，頗有市場，一些煽動性的小冊子呼吁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趁著英國在克里米亞打得精疲力竭的機會發動起義推翻英國人的統治。1857年夏，印度民族起義（Indian Mutiny）讓沙皇受到鼓舞，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中亞戰略。現在英國皇家海軍可以在波羅的海、太平洋和黑海攻擊俄羅斯的海岸線，特別是在黑海，因為《巴黎條約》俄羅斯已無力自衛，唯一一處俄羅斯可以做出反擊，哪怕只是做做樣子的地方就只有印度了。英國人對印度可能遭受的任何形式的進攻都十分敏感，主要原因是那里的稅收基礎非常薄弱，因為政治原因英國當局不敢加稅。沒有幾個俄羅斯戰略家相信俄軍真的有能力發動針對印度的戰爭，但是挑動一下英國政府的緊張情緒倒是無妨。

1857年秋，沙皇讓一名年輕武官尼古拉·伊格納季耶夫（Nikolai Ignat’ev）準備一份有關中亞戰略的備忘錄。伊格納季耶夫是一名年輕有為的軍官，巴黎和平會議期間，他在有爭議的摩爾達維亞邊界線談判中表現出色，受到了沙皇的關注。在考慮與英國重新開戰的可能性時，伊格納季耶夫的報告提出，俄羅斯唯一可能有機會的地方是在亞洲。俄軍在中亞地區的實力是“和平的最佳保障”，因此俄羅斯應該利用印度危機，在那些“位于俄羅斯和英國領地之間、起分隔作用的國家”身上下功夫，在加強自己地位的同時削弱英國的影響力。伊格納季耶夫提議派遣人員去中亞草原探索并研究“尚未被發現”的地區，搜集貿易和軍事情報。通過培養商貿和外交關系，俄羅斯可以將浩罕（Kokand）、布哈拉（Bukhara）、希瓦（Khiva）等地的汗國[§§§§](#SSSSSSSS_Jun_Zai_Jin_Wu_Zi_Bie_K)作為阻止英國擴張的緩沖帶。沙皇批準了伊格納季耶夫的提議，讓他率領一支探索隊伍前往希瓦和布哈拉，在那里，伊格納季耶夫于1858年夏與兩個汗國簽署了經濟條約。名義上這一隊伍是由俄羅斯外交部派出的，但他們同時非正式地為戰爭部服務，搜集通往中亞的道路的地形、統計資料和“綜合軍事信息”。從一開始這一舉措就屬于前進政策，受到巴里亞京斯基和戰爭部的支持，長期目的是為了在這些汗國所屬地區建立保護國和軍事基地，為征服突厥斯坦（Turkestan）和中亞草原、直逼阿富汗邊境做好準備。[[44]](#_44_E__Steinberg___Angliiskaia_v)

俄羅斯進入中亞地區的行動由兩名克里米亞戰爭的老兵領頭。第一位是米哈伊爾·切爾尼亞耶夫（Mikhail Cherniaev），他曾參加了1853年在多瑙河地區與土耳其人的作戰，并且在因克爾曼和塞瓦斯托波爾的戰斗中表現出色，后來被調去守衛奧倫堡（Orenburg）南部，保護那里的俄羅斯殖民者免遭中亞部落的襲擊。從1858年開始，切爾尼亞耶夫親自帶領部隊深入突厥斯坦，摧毀克爾克孜（Kirghiz）和其他敵對部落的居住地，支援愿意效忠俄羅斯的中亞部落反抗浩罕和布哈拉汗國的行動。他的軍事行動雖然名義上并沒有得到官方批準，卻受到戰爭部的暗中支持，最終悄無聲息地讓俄羅斯并吞了突厥斯坦。在1864年，切爾尼亞耶夫率領一支一千人的部隊穿越突厥斯坦草原，占領了奇姆肯特（Chimkent）要塞。第二支俄軍部隊后來從塞米巴拉金斯克趕來加入，他們一起占領了南邊一百三十公里處的塔什干（Tashkent），實際控制了這座中亞棉花貿易基地。1865年，切爾尼亞耶夫被授予圣喬治十字勛章并被任命為突厥斯坦總督。英國擔心俄軍會從塔什干繼續前進到印度，多次提出外交抗議。俄羅斯政府在外部壓力下否認切爾尼亞耶夫的軍事行動受到官方認可，迫使他在1866年退休。但是在俄羅斯的任何非官方場合，他都是一位英雄，民族主義報刊把他稱為“19世紀的葉爾馬克”[¶¶¶¶](#PPPP_Ye_Er_Ma_Ke__Ji_Mo_Fei_Ye_W)。

與此同時，另一位克里米亞戰爭老兵考夫曼將軍（General Kaufman）也在執行征服中亞草原的行動，他曾領導工兵執行對卡爾斯的圍困，后來成為米柳亭在戰爭部的總工程師。考夫曼接替切爾尼亞耶夫成為突厥斯坦總督，在1868年完成了對撒馬爾罕（Samarkand）和布哈拉的征服。五年之后，希瓦也落入俄羅斯手中，浩罕在1876年步其后塵。這些汗國的內部事務依然由原來的可汗負責，但是對外政策一律由俄羅斯政府控制，布哈拉和希瓦實際上成為俄羅斯的保護國，和英屬印度的王侯國家相似。

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切爾尼亞耶夫和伊格納季耶夫成為泛斯拉夫運動的領袖人物。除了轉向亞洲之外，俄羅斯對克里米亞戰敗做出的另一個反應是泛斯拉夫主義的盛行，俄羅斯人對歐洲各國的反感演化成民族主義情緒的大爆發。在新沙皇統治下，言論審查有所放松，于是一大批新創辦的泛斯拉夫刊物開始強烈批評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前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因為尼古拉一世的正統主義原則，讓生活在穆斯林統治下的巴爾干基督徒成了維護歐洲協調的犧牲品。“為了維護歐洲的平衡，”著名泛斯拉夫主義者波戈金在1859年1月初的幾期泛斯拉夫刊物《風帆》（Parus）上寫道，“一千萬斯拉夫人被迫在最殘忍的獨裁統治、最恣意的狂熱、最絕望的無知的桎梏下呻吟、受虐、煎熬。”[[45]](#_45_M__Petrovich__The_Emergence)在戈爾恰科夫放棄了正統主義原則之后，泛斯拉夫主義者再次呼吁政府支持巴爾干地區斯拉夫人在土耳其統治下尋求解放的行動。有些人甚至聲稱為了保護自己免受西方敵對勢力的攻擊，俄羅斯應該發揮領導作用，把歐洲所有斯拉夫人統一起來。這一想法最早由波戈金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提出，并在他后來的寫作中多次重復提到，每次都變得更為執著。

隨著泛斯拉夫主義在俄羅斯知識分子和政府圈子內影響力的增強，涌現出了大批旨在推動泛斯拉夫運動的慈善機構。這些機構或是給巴爾干的斯拉夫人送去資金興建學校和教堂，或是讓斯拉夫學生到俄羅斯來學習。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委員會（Moscow Slavic Benevolent Committee）于1858年成立，并于1860年代在圣彼得堡和基輔設立了分支機構，資金由私人贊助和教育部提供，讓政府官員和軍人（其中許多是曾在巴爾干參加作戰的克里米亞戰爭老兵）與學者和作家（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詩人丘特切夫，兩人都隸屬于圣彼得堡委員會）走到了一起。

在戰后的頭幾年里，泛斯拉夫主義者還比較謹慎，避免公開討論更為激進的斯拉夫政治統一的理念，或是過于激烈地批評政府的外交政策（波戈金的文章導致了《風帆》被禁）。但是到了1860年代，當伊格納季耶夫公開支持泛斯拉夫運動，同時成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時，他們在表達意見時的聲勢就變得更大了。伊格納季耶夫在外交事務上的影響力提升，主要是因為他在與中國清政府談判1860年11月簽署的《北京條約》（Treaty of Beijing）時大獲成功，讓俄羅斯得到了阿穆爾河和烏蘇里江（Ussuri）以及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______Ji_Hai_Can_Wei_______Yi_Zh)。1861年伊格納季耶夫被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Asiatic Department）司長，這是負責俄羅斯對巴爾干地區政策的部門。三年后他被任命為沙皇派駐君士坦丁堡的特使，他擔任這一職位一直到1877—1878年的俄土戰爭。在這些年中，伊格納季耶夫一直在推動以軍事方式在巴爾干地區解決東方問題：由俄羅斯支持斯拉夫人起義反抗土耳其統治，沙皇軍隊進行干預，實現斯拉夫人的解放，創建在俄羅斯領導下的斯拉夫聯盟（Slavic Union）。

在巴爾干實現泛斯拉夫理想的焦點最早在塞爾維亞。1860年，一個歐洲化但依然專制的米哈伊洛親王（Prince Mihailo）復辟上臺，這被視為俄羅斯的成功、奧地利的失敗。俄羅斯外交部長戈爾恰科夫親王希望俄羅斯能夠積極支持塞爾維亞人擺脫土耳其統治的斗爭，擔心如果塞爾維亞人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獨立，將更加可能受到奧地利或是西歐國家的影響。在寫給俄羅斯駐布加勒斯特領事的信中，他強調“我們在近東的政策是直接向塞爾維亞提供物質和道義上的支持，讓它有機會成為巴爾干地區運動的排頭兵”。伊格納季耶夫則走得更遠，呼吁立刻通過軍事手段解決東方問題。他支持米哈伊洛提出的方案，呼吁俄羅斯政府支持塞爾維亞發動一場反抗土耳其的戰爭，并幫助他們和保加利亞人一起建立一個邦聯，然后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和黑山都可以加入。

面對來自泛斯拉夫主義者的壓力，俄羅斯外交部增強了對塞爾維亞解放運動的支持。在1862年土耳其炮擊貝爾格萊德事件發生之后，俄羅斯召集《巴黎條約》簽署國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卡利澤（Kanlidze）召開國際會議，終于成功地說服各方，使土耳其軍隊在1867年從位于塞爾維亞的最后一個駐防地撤離，這是克里米亞戰爭之后俄羅斯贏得的第一場外交勝利。在成功的鼓舞下，俄羅斯繼續支持塞爾維亞人建立巴爾干同盟（Balkan League）的努力。塞爾維亞與黑山和希臘建立了軍事聯盟，與羅馬尼亞領導層達成了友好協議，并與克羅地亞和保加利亞民族主義者聯系密切。俄羅斯為塞爾維亞軍隊提供援助，但是由米柳亭派遣的一個監察委員會卻發現塞軍內部一片混亂。1867年秋，米哈伊洛不再計劃與土耳其開戰，導致俄羅斯中止了戰爭貸款。第二年6月，米哈伊洛被刺身亡，俄羅斯與塞爾維亞的合作也隨即終止，巴爾干同盟就此崩潰。[[46]](#_46_D__MacKenzie___Russia_s_Balk)

在以后的七年時間里，巴爾干地區局勢相對平靜。俄羅斯、奧匈帝國和德國的君主們，即1873年建立的“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為維持巴爾干地區現狀提供擔保。在這段時間里，俄羅斯的官方政策是堅決保證歐洲勢力平衡，根據這一原則，戈爾恰科夫親王取得了一場重大的外交勝利：1871年在倫敦舉行的歐洲列強會議廢除了《巴黎條約》中黑海非軍事化的條款。但是在非官方場合，俄羅斯的政策依然是繼續支持巴爾干地區的泛斯拉夫運動，這一政策由伊格納季耶夫通過君士坦丁堡的俄羅斯大使館負責協調。1900年代，暮年的伊格納季耶夫在回憶錄中解釋，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在巴爾干地區的目標是廢除《巴黎條約》，重新奪回比薩拉比亞南部，與此同時或者直接通過軍事征服，或者間接通過與土耳其簽訂協議，重新取得對土耳其海峽的控制權，回到克里米亞戰爭前的狀況。“我在土耳其和與斯拉夫人的所有活動，”他寫道，“都受到了……俄羅斯可以獨自統治巴爾干半島和黑海地區這一想法的激勵……奧匈帝國的擴張將會遭到阻擋，巴爾干人，特別是斯拉夫人，將會把眼光投向俄羅斯，把他們的未來寄托在俄羅斯身上。”[[47]](#_47_D__MacKenzie___Russia_s_Balk)

1875年夏，黑塞哥維那爆發了基督徒反抗土耳其統治的暴動，暴動接著向北蔓延到波斯尼亞，再到黑山和保加利亞。暴動的起因是歉收造成高門財政危機，因此土耳其政府突然大幅提高了向基督教農民征收的賦稅。但是這場暴動很快帶上了宗教戰爭的色彩。暴動領袖向塞爾維亞和俄羅斯尋求支持，在伊格納季耶夫的鼓勵下，貝爾格萊德的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懇請政府派遣軍隊保衛斯拉夫人反抗土耳其，并借此統一黑塞哥維那，建立一個大塞爾維亞國（Greater Serbia）。

在保加利亞，反叛武裝裝備落后、組織混亂，但是對土耳其人的仇恨極為強烈。1876年春，暴動演變成對穆斯林人口的屠殺。這里的穆斯林人口在克里米亞戰爭后大幅增長，約有五十萬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和切爾克斯人逃到了保加利亞。這些新移民漸漸恢復了他們近似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襲擊搶掠基督教定居點，偷盜牲口。當地農民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侵擾，雙方的緊張關系不斷加劇。奧斯曼當局因為缺乏正規軍鎮壓保加利亞人的暴動，派上了巴什波祖克武裝，其中大部分是從當地征召的穆斯林。巴什波祖克武裝對基督徒居民進行了殘酷鎮壓，屠殺人數達一萬二千人。在巴塔克（Batak）山村，約一千名基督徒躲入一座教堂避難，巴什波祖克武裝將教堂燒毀，其中的基督徒全部被燒死，僅有一名老婦幸存，向世人報告了這一慘案。[[48]](#_48_Lord_P__Kinross__Ottoman_Cen)

保加利亞慘案傳遍了全世界，英國報刊宣稱有“幾萬”手無寸鐵的基督徒村民被“狂熱的穆斯林”殺戮。英國公眾對土耳其的態度發生了急劇轉變，過去輿論認為土耳其人是英國自由主義政體的好學生，應該積極協助推動坦齊馬特改革。這一想法在保加利亞慘案后被嚴重質疑，在許多基督徒心中，土耳其的正面形象已完全被摧毀。當時格拉德斯通是英國反對黨自由黨的領導人，他的外交觀點與正統圣公會（High Church Anglican）的道義原則緊密相聯。在保加利亞慘案發生后，他領導了一場群眾運動，呼吁英國政府進行干預，保護保加利亞的基督徒。本來他對克里米亞戰爭就僅持謹慎支持的態度，基于宗教理念，他對土耳其占據歐洲土地抱有敵視，一直希望利用英國的影響力讓奧斯曼帝國的基督徒獲得自治。1856年時，他甚至提出在巴爾干重建一個希臘帝國，以保護那里的基督徒，讓他們不僅免受土耳其穆斯林的壓迫，還可以躲避俄羅斯和教皇的欺凌。[[49]](#_49_A__Saab__Reluctant_Icon__Gla)

對保加利亞慘案反應最激烈的還是俄羅斯。在受過教育的階層中，幾乎所有人都對保加利亞人懷有同情，愛國熱情高漲，全國都彌漫著一股對土耳其人施加報復的情緒。發動干預、保護保加利亞人的呼聲來自社會的各個角落：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這樣的斯拉夫派，他認為一場解放巴爾干斯拉夫人的戰爭將會實現俄羅斯統一東正教的歷史使命；或是屠格涅夫這樣的西化派，他認為解放被奴役的保加利亞人是自由世界的責任。此刻正是泛斯拉夫主義者實現夢想的寶貴機會。

俄羅斯政府的官方立場是譴責巴爾干基督徒的暴動。由于被西方政府指責挑起暴動，俄羅斯政府不得不采取守勢。但是社會上有不少泛斯拉夫主義者站了出來，公開支持巴爾干基督徒的抗爭，并呼吁政府給予支持。其中特別突出的是《俄羅斯世界》（Russkii mir），這份泛斯拉夫主義刊物歸前突厥斯坦總督切爾尼亞耶夫所有，并由他編輯。“只要一提俄羅斯，”《俄羅斯世界》預言，“不僅整個巴爾干……而且所有斯拉夫人……都會拿起武器反抗壓迫者。與兩千五百萬東正教徒站在一起，俄羅斯將會讓整個西歐感到恐懼。”一切都取決于塞爾維亞——用切爾尼亞耶夫的話說是“巴爾干的皮埃蒙特”——會采取什么樣的行動。沙皇和戈爾恰科夫親王曾警告塞爾維亞領導人不要介入基督徒的暴動，但是在私下里他們對泛斯拉夫主義抱同情態度。俄羅斯外交部代理部長若米尼男爵（Baron Jomini）曾對圣彼得堡斯拉夫慈善委員會的一名成員說：“做你們想做的任何事，只要在名義上不讓我們知道。”受到伊格納季耶夫和俄羅斯駐貝爾格萊德領事的鼓勵，加上1876年4月切爾尼亞耶夫的志愿加入，塞爾維亞在6月份向土耳其宣戰。[[50]](#_50_A__Saab__Reluctant_Icon__Gla)

塞爾維亞依仗的是俄羅斯的干預，現在切爾尼亞耶夫是塞爾維亞軍隊的總指揮，伊格納季耶夫也一再做出承諾，讓塞爾維亞人相信1853—1854年巴爾干戰爭的局面將會重演。當時尼古拉一世派出部隊占領多瑙河兩公國，期待能激發斯拉夫人的起義，不過最終失望而歸。塞爾維亞向土耳其宣戰前后，俄羅斯公眾輿論越發好戰，民族主義者呼吁派出軍隊保衛基督徒抗擊土耳其人，泛斯拉夫組織還派出志愿者前往作戰，已有約五千人踏上了征途。[†††††](#______Tuo_Er_Si_Tai_Xiao_Shuo)還有人為斯拉夫人募捐籌款，斯拉夫至上情緒席卷了整個社會。這場戰爭被稱為一場圣戰，是1854年俄土戰爭的重演。

到了1876年秋，戰爭的狂熱已蔓延到俄羅斯宮廷和政府部門。當時切爾尼亞耶夫的部隊正面臨挫敗，向俄羅斯急切求助。沙皇在收到消息后，向高門發出最后通牒并開始集結軍隊。這一動作足以讓土耳其人停止進攻，塞爾維亞也馬上與土耳其達成了和平。俄羅斯接著提出要求，希望保加利亞也能獲得自治權，但是土耳其沒有接受。此時奧地利因為從俄羅斯那里得到了戰后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獲利的承諾，決定保持中立。俄羅斯沒有了這一后顧之憂，在1877年4月再次向土耳其宣戰。

從一開始，俄羅斯在巴爾干的軍事行動就帶有宗教戰爭的色彩，與克里米亞戰爭前期的俄土交戰極為相似。當俄軍在尼古拉大公的帶領下渡過多瑙河后，以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人為主的斯拉夫非正規武裝紛紛加入，有些人要給錢才肯上戰場，但絕大部分是為了國家獨立而與土耳其人作戰。這才是1853—1854年間尼古拉一世派兵渡過多瑙河時想看到的情景。受到斯拉夫人起義的鼓勵，亞歷山大二世考慮一直向南推進，占領君士坦丁堡，強制實施俄羅斯對巴爾干地區的規劃。不僅泛斯拉夫報刊懇請他這么做，他的弟弟、尼古拉大公在1878年1月率軍占領了哈德良堡之后也呼吁他做此決策，而哈德良堡離君士坦丁堡的行軍距離已經不遠了。“我們必須直撲中心，抵達沙皇格勒[‡‡‡‡‡](#___________Ji_Jun_Shi_Tan_Ding_B)，完成您肩負的神圣使命。”泛斯拉夫主義者對沙皇的期待達到了高峰。“君士坦丁堡必定是我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道，他把俄羅斯征服君士坦丁堡看作上帝對東方問題的決斷，讓俄羅斯實現其解放東正教基督徒的使命。

不僅因為那是一座雄偉的港口，不僅因為那是通往大洋的必經之路，讓俄羅斯……對這一問題的最終決斷觸手可及，甚至也不僅因為斯拉夫人的統一和重生。我們的目標更為遠大，無法度量。我們，俄羅斯人，對整個東方問題來說，對整個東正教未來的命運與團結來說，都是真正必需和不可或缺的。我們的人民和他們的統治者向來都明白這一點。總而言之，這個惱人的東方問題在今后許多年中，將會是我們命運的全部。就像過去一樣，這其中包含著我們所有的目標，以及讓我們走向完整歷史的唯一通路。[[51]](#_51_F__Dostoevsky__A_Writer_s_Di)

俄軍逼近哈德良堡的消息讓英國人警覺起來，地中海艦隊受命駛入達達尼爾海峽，英國議會還通過議案籌集六百萬軍費，當年英國就是這樣卷入克里米亞戰爭的軍事行動的。面對來自英國的壓力，俄軍同意與奧斯曼帝國停火，但卻繼續向君士坦丁堡逼近，直到受到皇家海軍艦隊火力威脅才終于在圣斯特凡諾（San Stefano）停了下來，這個村莊已經是君士坦丁堡郊外了。1878年3月，俄羅斯與土耳其簽署了《圣斯特凡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其中高門同意承認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黑山為獨立國家，同時大保加利亞（其中包括馬其頓和色雷斯［Thrace］部分地區）實現自治。以多瑙河南岸的一條狹窄地區作為交換，羅馬尼亞把土耳其人根據《巴黎條約》從俄羅斯那里得來的比薩拉比亞南部地區歸還給了俄羅斯。加上俄羅斯黑海艦隊已經在七年前重建，在二十多年后，俄羅斯成功地把在克里米亞戰爭中遭受的所有損失都奪了回來。

《圣斯特凡諾條約》主要是伊格納季耶夫的功勞，他的泛斯拉夫夢想絕大部分都因此而實現了。但是對西方國家來說，《圣斯特凡諾條約》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他們看來，西方聯盟在1854年對俄宣戰，成功阻止俄羅斯欺凌土耳其，現在可不愿意看到同樣的事情在二十四年之后重演。在英國，針對俄羅斯的敵意表現為“極端愛國主義”（jingoism）：一種帶侵略性的敢干好戰型外交政策。一首當時在酒吧和雜耍劇場非常流行的歌曲表達了這種情緒：

我們不想打仗，但如果我們要打，上帝在我們這邊

我們有軍艦，我們有戰士，我們還有錢

我們和狗熊干過仗，

只要我們還是真正的英國人

俄國人就不會得到君士坦丁堡。

沙皇擔心英國會實行軍事干預，再次上演克里米亞戰爭，于是命令尼古拉大公將軍隊撤回多瑙河。在回撤途中，他們對保加利亞的穆斯林人口進行了報復性襲擊，基督徒志愿者有些協助參與了襲擊，另一些干脆帶頭挑起報復行動。這場俄土戰爭結束時，幾萬名穆斯林從保加利亞逃到了奧斯曼帝國。

西方列強決意阻止俄羅斯將其勢力擴展到巴爾干地區，于是在柏林舉行和談（Congress of Berlin）以修改《圣斯特凡諾條約》。英法兩國主要反對的是建立大保加利亞，他們認為這是俄羅斯的特洛伊木馬，用意是威脅奧斯曼帝國的歐洲領土。大保加利亞包括馬其頓，通過馬其頓的愛琴海海岸，俄羅斯很容易就可以進攻土耳其海峽（Turkish Straits）。英國迫使俄羅斯同意將屬于大保加利亞的馬其頓和色雷斯歸還給奧斯曼帝國。在柏林和談前的一個星期，英國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與奧斯曼帝國簽署了一項針對俄羅斯的秘密聯盟協議，獲得了占領具有戰略意義的塞浦路斯島（Cyprus）的權利，并從印度調兵駐守。這一聯盟協議的內容被透露出來，加上迪斯雷利以戰爭相威脅，迫使俄羅斯讓步接受了他的強硬要求。

柏林和談終結了俄羅斯的泛斯拉夫夢想。伊格納季耶夫沙皇駐君士坦丁堡特使的職務被解除了，不得不退休。迪斯雷利帶著“和平榮譽”從柏林回到倫敦，受到英雄般的歡迎。他對英國議會表示，《柏林條約》（Treaty of Berlin）和《塞浦路斯協議》（Cyprus Convention）將在今后很長時間里保護英國及其通往印度的海路。但是巴爾干地區的緊張關系依然存在，從很多方面來說，因為對許多邊境爭議采取擱置態度而沒有加以解決，柏林和談為未來巴爾干地區的戰爭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了許多種子。最主要的問題是，東方問題的根本，即“歐洲病夫”土耳其，并沒有得到治愈。正如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在從柏林回國途中承認的那樣：“我們將在巴爾干南部扶持的是一個搖搖欲墜的土耳其政權。這不過是短暫的喘息而已，這一政權已不再有任何生命力。”[[52]](#_52_Taylor__The_Struggle_for_Mas)

\* \* \*

在耶路撒冷，所有這些國際爭端的發源地，克里米亞戰爭結束的消息是在1856年4月14日被宣布的。城堡里一聲禮炮轟鳴，宣告帕夏已收到和平的消息，他手下的士兵們聚集在雅法門（Jaffa Gate）外的廣場，參加由伊瑪目主持的感恩禱告。在1853年9月，就在同一座廣場上，士兵們被召集起來，出發抗擊俄軍，為蘇丹而戰。[[53]](#_53_Finn__Stirring_Times__vol__2)在耶路撒冷，歷史完成了一個循環。

十二天以后，即4月26日，宗教沖突重新爆發了。在圣墓教堂的圣火儀式期間，希臘人跟亞美尼亞人大打出手。在儀式舉行的前幾天，敵對的朝圣者組織已經將各種武器偷帶進了教堂并隱藏起來。另外還有一些刀子和長矛是從靠近圣尼古拉修道院（St Nicholas Convent）屋頂的一扇窗戶里扔進來的。英國駐耶路撒冷領事芬恩目睹了斗毆的發生，他在三天后撰寫的報告中說，不清楚斗毆是怎么開始的，但是“在斗毆過程中，投擲的東西甚至飛到了樓上的回廊，打碎了一排燈，弄破了教堂里展示的主題最神圣的畫作，碎玻璃和燈油倒在他們頭上，掛在銀鏈上的銀制燈具被砸倒在地，現在都找不到了”。帕夏從樓上回廊的座位上下來，下令警衛將打架斗毆者分開。但是他被人在腦袋上打了一下，受了重傷，不得不由手下人扛在肩上離開——教堂里的人太多，沒有其他辦法——他的秘書也被打了一頓。后來帕夏手下的一隊士兵終于把鬧事者抓了起來，教堂管事的把一片狼藉的教堂清理干凈，圣火儀式照常舉行，修道士們站著守衛耶穌的墓地，教徒們唱著《求主垂憐》（Lord have mercy），直到手捧點燃的蠟燭的主教現身。當教堂鐘聲響起時，朝圣者紛紛涌向主教，用那神圣的火焰點燃自己手中的火炬。[[54]](#_54_FO_195_524__Finn_to_Canning)

[\*](#_124) 即今天的霍京（Khotyn），位于烏克蘭境內。——編注

[†](#_125) 傳說中一艘無人駕駛的幽靈船，永遠無法靠岸返鄉，永遠在海上漂泊。——譯注

[‡](#_126) 主要生活在高加索北部地區。——譯注

[§](#SS_11) 即葉夫帕托里亞，這是它的土耳其名稱。——編注

[¶](#P_11) 英國派駐君士坦丁堡財務專員霍恩比爵士的夫人，她曾將自己在伊斯坦布爾的經歷編錄成書。——譯注

[\*\*](#_127) 20世紀初土耳其政治改革運動的代表。——譯注

[††](#_128) 奧斯曼帝國中代理政府征稅，只向政府繳納固定稅額的中間人。——譯注

[‡‡](#_129) 位于今巴勒斯坦。——譯注

[§§](#SSSS_9) 控告萊德的人聲稱他故意向乞丐開槍，但是僅有的目擊事件發生經過的人是三名婦女。在土耳其法庭，婦女的證詞是不被接受的。——原注

[¶¶](#PP_9) 從這一時期開始，尼斯成為俄羅斯貴族鐘愛的度假勝地，被英國報刊稱為“俄羅斯人的布賴頓”（Brighton，譯者注：英格蘭南部著名的海濱度假城市）。英國報刊對俄羅斯商船出現在地中海這塊被英國皇家海軍控制的海域感到緊張，警告說俄羅斯和天主教勢力正在進行勾結實施陰謀。后來的傳言說俄羅斯還打算在地中海其他地方建立裝煤站。1858年，已經下臺的帕默斯頓呼吁英國海軍向撒丁尼亞顯示武力以作為警告。但當時德比勛爵（Lord Derby）領導下的政府對此并不那么上心，將俄羅斯與撒丁尼亞政府的交易視為僅僅是一個商業協議而已。維拉弗蘭卡協議一直延續到1917年為止。——原注

[\*\*\*](#_130) 由原來的西西里王國和那不勒斯王國聯合而成。——譯注

[†††](#_131) 即弗朗西斯·內皮爾（Francis Napier，1819—1898）。——譯注

[‡‡‡](#_132) 1857年，流亡中的社會主義者亞歷山大·赫爾岑（Alexander Herzen）在他的期刊《北極星》（Polar Star）上發表了一首俄羅斯軍中歌曲。這首敘事歌曲表達了軍中普遍的不滿，在1860年代的學生革命者圈子中廣為流傳，后來甚至還被列寧引用。事實上，托爾斯泰不能為這首歌負完全的責任。它源自一群炮兵軍官，其中包括托爾斯泰，他們幾乎每天都在指揮官房間的鋼琴邊喝酒唱歌，自編自唱。因為這時托爾斯泰已經在寫作上享有名聲，他無疑在創作歌詞時起了主要作用，并且承擔了幾乎所有的后果。——原注

[§§§](#SSSSSS_5) 根據農奴解放的條件，農民在獲得轉讓到他們名下的土地時，必須支付一筆贖買費用。贖買費用的多少由鄉紳自己的土地委員會決定。政府在1861年一次性賠償地主，農民則在四十九年的時間內逐步支付給政府，所以實際上農奴是通過償還主人的債務來買回自由的。后來政府發現贖買費用變得越來越難收繳，原因之一是農民們一開始就認為這種做法是不公平的，于是在1905年終于取消了贖買費用。——原注

[¶¶¶](#PPP_4) 總體來說，俄羅斯歐洲部分的耕地中，大概有一半從地主那里轉移到了農民合作社手中，不過具體的比例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地主的意愿。——原注

[\*\*\*\*](#_133) 沙米勒被送往圣彼得堡與沙皇會面，在那里他被當作明星一樣對待，多年來俄國公眾都知道有關他的勇敢和大膽行為的傳說。他先是被流放到卡盧加（Kaluga），但是不適應那里的寒冷氣候，于是在1868年被轉移到較為溫暖的基輔，在那里政府給了他一座別墅，一份養老金，只受到當局松散的監視。1869年，他被批準前往麥加朝圣，條件是把他的兒子們留下作為人質。在完成朝圣之后，他于1871年死于麥地那。他的兩個兒子成了俄羅斯軍官，但是另兩個兒子在1877—1878年的土俄戰爭中加入土耳其方面參戰。——原注

[††††](#_134) 在今哈薩克斯坦境內。——譯注

[‡‡‡‡](#_135) 不同于1856年解決克里米亞戰爭的《巴黎條約》。——譯注

[§§§§](#SSSSSSSS_3) 均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境內。——譯注

[¶¶¶¶](#PPPP_2) 葉爾馬克·季莫費耶維奇（Ermak Timofeevich）是一位16世紀的哥薩克領袖和民間英雄，開創了對西伯利亞的探險和征服。——原注

[\*\*\*\*\*](#_136) 即海參崴。——譯注

[†††††](#_137) 托爾斯泰小說《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的最后，渥倫斯基（Vronsky）就是前往巴爾干的志愿者之一。——原注

[‡‡‡‡‡](#_138) 即君士坦丁堡。——譯注

注釋

[[1]](#_1_12)E. Gourdon, Histoire du Congrès de Paris (Paris, 1857), pp. 479–82.

[[2]](#_2_12)W.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p. 104.

[[3]](#_3_12)P. 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p. 347; 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5 Feb. 1856.

[[4]](#_4_12)Schroeder,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p. 348; W. Echard, Napoleon III and the Concert of Europe (Baton Rouge, La., 1983), p. 59.

[[5]](#_5_12)FO 78/1170, Stratford Canning to Clarendon, 9 Jan. 1856;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pp. 128–30.

[[6]](#_6_12)FO 78/1170, Stratford Canning to Clarendon, 9 Jan. 1856; Baumgart,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pp. 140–1; BLMD, Add. MS 48579,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4 Mar. 1856; M. Kukiel, Czartoryski and European Unity 1770–1861(Princeton, 1955), p. 302.

[[7]](#_7_12)Gourdon, Histoire, pp. 523–525.

[[8]](#_8_11)RGVIA, f. 846, op. 16, d. 5917, ll. 1–2; J. Herbé,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p. 402; 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4 Mar. 1856.

[[9]](#_9_11)NAM 1968–07–380–65 (Codrington letter, 15 July 1856).

[[10]](#_10_12)The Times, 26 July 1856.

[[11]](#_11_11)RGVIA, f. 846, op. 16, d. 5838, ll. 10–12; NAM 6807–375–16 (Vote of thanks to Codrington, undated).

[[12]](#_12_11)M. Kozelsky, ‘Casualties of Conflict: Crimean Tatar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Slavic Review, 67/4 (2008), pp. 866–91.

[[13]](#_13_11)M. 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p. 153. 有關移民的詳細統計數據，參見A. Fisher, ‘Emigration of Muslims from the Russian Empire in the Years after the Crimean War’, Jahrbucher fur Geschichte Osteuropas, 35/3 (1987), pp. 356–71. The highest recent estimate is ‘at least 300 000’, in J. 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 1995), p. 17.

[[14]](#_14_11)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p. 151.

[[15]](#_15_11)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p. 155; A. Fisher, Between Russians, Ottomans and Turks: Crimea and Crimean Tatars (Istanbul, 1998), p. 127.

[[16]](#_16_12)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24 Mar. 1856.

[[17]](#_17_11)FO 195/562, ‘Report on the Political and Military State of the Turkish Frontier in Asia’, 16 Nov. 1857; FO 97/424, Dickson to Russell, 17 Mar. 1864; Papers Respecting Settlement of Circassian Emigrants in Turkey, 1863–1864 (London, 1864).

[[18]](#_18_12)McCarthy, Death and Exile, pp. 35–6.

[[19]](#_19_12)FO 78/1172, Stratford to Clarendon, 31 Jan. 1856; Journal de Constantinople, 4 Feb. 1856; Lady E. Hornby,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863), pp. 205–8;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 290; D. Blaisdell, European Financial Control in the Ottoman Empire (New York, 1929), p. 74.

[[20]](#_20_11)Badem, ‘The Ottomans’, pp. 291–2.

[[21]](#_21_11)Badem, ‘The Ottomans’, pp. 281–283; R. Davison, ‘Turkish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 (1953–4), pp. 862–3.

[[22]](#_22_11)R. Davison, ‘Turkish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 (1953–4), p. 861.

[[23]](#_23_12)FO 195/524, Finn to Clarendon, 10, 11, 14 and 29 Apr., 2 May, 6 June 1856; 13 Feb. 1857; E. Finn (ed.), Stirring Times, or, Records from Jerusalem Consular Chronicles of 1853 to 1856, 2 vols. (London 1878), vol. 2, pp. 424–40.

[[24]](#_24_12)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1856), vol. 2, p. 119; FO 78/1171, Stratford to Porte, 23 Dec. 1856.

[[25]](#_25_11)FO 195/524, Finn to Stratford, 22 July 1857; Finn, Stirring Times, vol. 2, pp. 448–9.

[[26]](#_26_11)參見 H. Wood, ‘The Treaty of Paris and Turkey’s Status in International Law’,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7/2 (Apr. 1943), pp. 262–74.

[[27]](#_27_11)W.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1871: The Story of the Peace Settlement (London, 1963), p. 40.

[[28]](#_28_11)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7 Aug. 1856;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pp. 55 ff.

[[29]](#_29_11)BLMD, Add. MS 48580, Palmerston to Clarendon, 7 Aug. 1856; Mosse, The Rise and Fall, p. 93.

[[30]](#_30_11)G. Thurston, ‘The Italian War of 1859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20/1 (Mar. 1977), pp. 125–6.

[[31]](#_31_10)C. Cavour, Il carteggio Cavour-Nigra dal 1858 al 1861: A cura della R.Commissione Editrice, 4 vols. (Bologna, 1926), vol. 1, p. 116.

[[32]](#_32_11)Mosse, The Rise and Fall, p. 121.

[[33]](#_33_10)K. Cook, ‘Russia, Austria and the Question of Italy, 1859–1862’,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2/4 (Oct. 1980), pp. 542–565; FO 65/574, Napier to Russell, 13 Mar. 1861.

[[34]](#_34_10)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1955), p. 85.

[[35]](#_35_10)A. Tiutchev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p. 67; A. Kelly, Toward Another Shore: Russian Thinkers between Necessity and Chance (New Haven, 1998), p. 41.

[[36]](#_36_10)Tolstoy’s Diaries, vol. 1: 1847–1894,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London, 1985), pp. 96–97.

[[37]](#_37_10)M. Vygon, Krymskie stranitsy zhizni i tvorchestva L. N. Tolstogo (Simferopol, 1978), pp. 29–30, 45–46; H. Troyat, Tolstoy (London, 1970), p. 168.

[[38]](#_38_10)Kelly, Toward Another Shore, p. 41; Vygon, Krymskie stranitsy, p. 37.

[[39]](#_39_10)IRL, f. 57, op. 1, n. 7, l. 16; RGIA, f. 914, op. 1, d. 68, ll. 1–2.

[[40]](#_40_11)F. Dostoevskii, Polnoe sobranie sochinenii, 30 vols. (Leningrad, 1972–1988), vol. 18, p. 57.

[[41]](#_41_10)N. Danilov, Istoricheskii ocherk razvitiia voennogo upravleniia v Rossii (St Petersburg, 1902), prilozhenie 5; 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pp. 136–7.

[[42]](#_42_11)E. Brooks, ‘Reform in the Russian Army, 1856–1861’, Slavic Review, 43/1 (Spring 1984), pp. 66–78.

[[43]](#_43_7)引用于J. Frank, Dostoevsky: The Years of Ordeal, 1850–1859 (London, 1983), p. 182.

[[44]](#_44_7)E. Steinberg, ‘Angliiskaia versiia o “russkoi ugroze”v XIX–XX vv’, in Problemy metodologii i istochnikovedeniia istorii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 sbornik statei (Moscow, 1986), pp. 67–69; R. Shukla, Britain, India and the Turkish Empire, 1853–1882 (New Delhi, 1973), pp. 19–20; The Politics of Autocracy: Letters of Alexander II to Prince A. I. Bariatinskii, ed. A. Rieber (The Hague, 1966), pp. 74–81.

[[45]](#_45_7)M. Petrovich, 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Panslavism, 1856–1870 (New York, 1956), pp. 117–8.

[[46]](#_46_7)D. MacKenzie, ‘Russia’s Balkan Policies under Alexander II, 1855–1881’, in H. Ragsdale(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223–36.

[[47]](#_47_7)D. MacKenzie, ‘Russia’s Balkan Policies under Alexander II, 1855–1881’, in H. Ragsdale(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227–8.

[[48]](#_48_7)Lord P. Kinross, Ottoman Centur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urkish Empire (London, 1977), p. 509.

[[49]](#_49_7)A. Saab,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pp. 65–7.

[[50]](#_50_7)A. Saab,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p. 231.

[[51]](#_51_6)F. Dostoevsky, A Writer’s Diary, trans. K. Lantz, 2 vols. (London, 1995), vol. 2, pp. 899–900.

[[52]](#_52_5)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p. 253; The Times, 17 July 1878.

[[53]](#_53_5)Finn, Stirring Times, vol. 2, p. 452.

[[54]](#_54_5)FO 195/524, Finn to Canning, 29 Apr. 1856.

# 結語 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神話與記憶

當克里米亞戰爭結束的消息傳來時，英國只舉行了一些小規模的慶祝儀式。英國人總體的感覺是失望，英軍沒有打出一場可與法軍占領塞瓦斯托波爾相媲美的勝仗，而且英國也沒能推進一場針對俄羅斯的更大規模的戰爭。與這種失敗情緒交織在一起的，是對政府和軍事當局各種愚蠢錯誤的惱怒和國家受辱的羞恥感。“我承認和平猶如骨鯁在喉，”維多利亞女王在她3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整個國家也有同樣的感覺。”倫敦沒有舉行勝利游行，也沒有官方儀式歡迎歸來的戰士。根據女王的記錄，當部隊回到伍利奇碼頭時，戰士們看上去“曬得非常黑”。3月13日，看著一船船的士兵登岸，她意識到眼前的是“名副其實的斗士，這些高大優秀的男子，有些非常英俊——每一個都舉止驕傲、高貴，展現出戰士的英姿……他們都留著長長的胡子，扛著沉重的背包，背包上是大衣和被褥，還掛著水壺和滿滿的干糧袋，背著滑膛槍”。[[1]](#_1_RA_VIC_MAIN_QVJ_1856__11_and)

雖然沒有歡慶儀式，對戰爭的紀念卻非常多：在教堂墓地、軍隊本部營地、醫院和學校、市政廳和博物館，或是鎮中心的廣場和村里的綠地上，幾百座紀念銘牌和紀念碑被修建起來，大部分由個人和群體自發出資，用來紀念陣亡和因傷病去世的戰士。在一共九萬八千名被派往克里米亞的英軍戰士和水手中，約五分之一沒有回來：兩萬零八百一十三人戰死，其中80%死于傷病。[[2]](#_2_T__Margrave___Numbers___Losse)

為了反映公眾的失落感以及表達對受難部隊的敬仰，英國政府出資修建了一座近衛軍紀念碑（Guards Memorial）來紀念克里米亞戰爭中的英雄。在約翰·貝爾（John Bell）創作的一尊巨型青銅雕塑中，三名站崗的近衛軍士兵（分屬冷溪、燧發槍和擲彈兵近衛團）一起守衛著其背后上方的榮譽女神。雕塑由被繳獲的俄軍加農炮熔化后鑄成，于1861年在倫敦的下攝政街（Lower Regent Street）與蓓爾美爾街交匯的路口揭幕。對于這座雕塑的藝術造詣，人們褒貶不一。倫敦市民將代表榮譽的女神稱為“玩投環的”，因為在她張開的雙臂上，掛著由橡樹葉做成的王冠，看上去真有點兒像是用來玩投環游戲的。許多人認為這座雕塑不夠雅致美觀，配不上紀念這樣重要的事件。格萊亨伯爵（Count Gleichen）就曾說過，這座雕塑最好看的時候是在大霧中。但是不管怎樣，這座雕塑的象征意義是前所未有的，這是英國歷史上第一次豎立戰爭紀念碑紀念普通士兵。[[3]](#_3_R__Burns__John_Bell__The_Scul)

克里米亞戰爭讓英國公眾對軍人的態度發生了完全的改變。在現代國家神話中，戰士為保衛國家的榮譽、權利和自由而戰，克里米亞戰爭為這一國家神話的誕生播下了種子。在這之前，軍事榮譽由貴族決定，英勇無畏這樣的品質屬于出身高貴的軍事領導人，例如英國國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的兒子約克公爵（Duke of York）是與拿破侖作戰時的英國軍隊指揮官，他的紀念碑在他去世五年后的1833年建成，資金是從軍隊每一個士兵那里扣除一天軍餉籌集起來的。軍事繪畫作品中，展現的都是瀟灑的貴族軍官的英雄事跡，而普通士兵卻無人留意。近衛軍紀念碑就矗立在約克公爵紀念碑的對面，顯示了維多利亞時代價值觀的根本變化，代表了對貴族軍事領袖的挑戰。貴族軍官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犯下諸多錯誤，已經名譽掃地。如果說在過去，典型的英國軍事英雄形象是一個“頂戴花翎”的紳士，那么克里米亞戰爭后則是一名士兵，是民間傳說中的“列兵史密斯”（Private Smith）或是“湯米”，即“湯米·阿特金斯”（Tommy Atkins）。這些普通的士兵驍勇善戰，在將軍們犯下一系列愚蠢錯誤的情況下，仍然為英國贏得了戰爭的勝利。這種敘事方式貫穿英國歷史，從克里米亞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一直到最近的幾次戰事，都是如此。正像黑衛士團（Black Watch）中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列兵在1899年英軍于布爾戰爭（Boer War）中失敗后所寫的那樣：

如此便是我們團度過的一天，

為即將來臨的報復我們心生惶恐。

我們已經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只是因為

舒適客廳里將軍犯下的錯誤。

為什么沒人告訴我們有塹壕？

為什么沒人告訴我們有鐵絲網？

為什么我們要縱隊行軍？

大兵湯米都想知道……[[4]](#_4_T__Pakenham__The_Boer_War__Lo)

正如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在他的《英國筆記》（English Notebooks）中寫的那樣，在把貴族拉下神壇方面，1854年取得的進展“比普通時代的五十年都多”。[[5]](#_5_N__Hawthorne__The_English_Not)

英軍在戰爭指揮和后勤管理上的過失，還讓英國中產階級產生了一種新的自信。與英國貴族與生俱來的特權不同，中產階級崇尚的是專業能力、勤勞工作、任人唯賢、自力更生等原則。克里米亞戰爭為他們提供了許多例子，說明專業人士的才智如何挽救了一場指揮糟糕的軍事行動，例如弗洛倫絲·南丁格爾的戰地護理、亞歷克西斯·索耶的烹飪經驗、塞繆爾·皮托修建的巴拉克拉瓦鐵路。另外，還有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 Paxton）手下的建筑工人，他們被派往克里米亞，在塞瓦斯托波爾城外高地上為英軍修建了木棚，讓他們在第二個冬天有了棲身之所。大量的報刊也為中產階級提供了舞臺，他們中的許多人給報刊寫信投稿，貢獻有實用價值的建議，論述自己的觀點看法，積極參與到戰爭的日常運行之中。在政治上，中產階級是真正的勝利者，因為到了戰爭后期，英軍終于開始按照專業原則來管理戰爭行動。他們的勝利還表現在戰爭結束后的幾十年時間里，不管是輝格黨、保守黨還是自由黨當政，都通過了許多推動中產階級理念的改革：把投票權擴大到職業和工匠階層、出版自由、提高政府運行的透明度和受監督程度、任人唯賢、宗教寬容、公眾教育等。另一個獲得大力推動的方面，是對體力勞動階層和“值得關懷的窮人”的關注，這種態度的根源之一就是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對備受磨難的士兵們的關懷。這種關懷也是1868—1871年間格拉德斯通政府的戰爭大臣卡德韋爾勛爵（Lord Cardwell）推動的一系列軍隊改革的源頭。花錢買軍官職位的行為被憑能力晉升的制度所取代，列兵的服役期限大大縮短，士兵的軍餉和生活條件得到改善，和平時期的鞭笞制度也被取消了。

最能代表英國中產階級新近產生的自信感的是弗洛倫絲·南丁格爾。當她從克里米亞歸來時，已是一名民族女英雄。印著她圖像的明信片、小塑像和像章大量出售，很受歡迎。在幽默雜志《笨拙》中，南丁格爾化身為象征英國的布里坦尼婭，只是她手中握著的是手術刀和油燈而不是矛與盾。詩歌也暗示她比任何瀟灑的貴族軍官更值得受到公眾的愛戴：

公眾的贊美如白色浪花般

隨風飄動，

落在獎杯上，閃耀數日，

然后在幾百年內

慢慢銹蝕。

公眾的愛心，需要養料填補，但

卻不懂得如何選擇，

只會抓住隨手可得的，石頭

也會當作面包，不愿等待，不懂拒絕。

于是，對英雄崇拜的饑渴，讓他們匆匆抓住

最淺陋的偶像，最艷俗的神龕，

在那里，卡迪甘可以頂戴花翎，趾高氣揚，

赫德森身上徽章閃閃發亮。

然而，當普通人爭相傳頌

一個真正榮耀的名字，

不要鄙夷，僅僅因為已有太多花環

獻給了最不值的神龕。

人們，無論多么狂野或脆弱，

依然能被高貴的本能引導：

尋找真神，卻往往遇到假仙；

但真神一旦找到，就永遠不會放棄。

那么現在，不要再理會那些不值得的

或是匆匆給予的贊美，

這位偉大女性的神圣使命

在英格蘭的內心深處

熠熠生輝。[[6]](#_6__Florence_Nightingale___Punch)

認識到愚蠢及管理不善給士兵帶來的苦難比任何敵人都要多，英國人的自豪感受到了傷害，此時南丁格爾的愛國忠心和專業精神正好可以作為補償。她的事跡在流行劇場和民謠里非常流行，例如在倫敦布里坦尼婭沙龍（Britannia Saloon）演出的《土耳其之戰》（The War in Turkey）中，有一系列喜劇場景譏諷英國當局的無能，而在接著的一場戲中，“伯德小姐”（Miss Bird），也就是南丁格爾，出場解決了所有問題。這場戲的結語是：“在這位女士身上，我們看到了真正的英雄主義——她胸中那顆跳動的心能夠做出任何英雄舉動。”[[7]](#_7_S__Markovits__The_Crimean_War)

“提燈女士”的傳說成了英國的國家神話，一遍又一遍地在無數歷史書籍、教科書和南丁格爾的傳記中被重述。這個傳說包含了維多利亞時代中產階級理想的基本要素：從基督教角度說，這是一個有關女性關懷、工作出色和自我犧牲的故事；從道德角度說，這是一個自我提高和拯救值得關懷的窮人的故事；從家庭角度說，這是一個有關清潔、良好家務和改善家庭環境的故事；從職業抱負上說，這是一個有關執著精神和堅定信念的故事；從公眾角度上說，這是一個關于衛生和醫院改革的故事，從克里米亞回到英國后，南丁格爾將她的余生都獻給了這一事業。

1915年時，英國又一次參加了歐洲大戰，而這一回俄羅斯成了盟友，克里米亞戰爭紀念碑被向后朝攝政街方向挪了一些，空出來的地方安放了一座“提燈女士”的雕塑。在南丁格爾雕塑的旁邊是一座悉尼·赫伯特做沉思狀的雕塑，這座雕塑是從戰爭辦公大樓（War Office）搬來的。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赫伯特曾擔任軍務大臣，就是他把南丁格爾派到克里米亞去的[[8]](#_8_M__Bostridge__Florence_Nighti)，然而他自己卻因為公眾輿論壓力而被從職位上趕走，部分原因是他的家庭和俄羅斯有牽連。

\* \* \*

1857年6月26日是一個晴朗的星期五，那天下午，維多利亞女王和阿爾伯特親王在海德公園出席了一場軍事檢閱儀式。當年1月，女王頒發皇家特許令，設立了一種新的獎章：維多利亞十字勛章（Victoria Cross），專門用來獎勵軍人的勇敢行為，而不論軍銜高低或出身于什么階層。其他歐洲國家早就有了類似的獎章：法國從1802年起就有榮譽軍團勛章，荷蘭有威廉軍功章（Military Order of William），就連俄羅斯也在1812年之前就已經有了榮譽勛章。然而英國卻一直沒有針對士兵勇敢行為的獎勵，只有頒發給軍官的獎章。《泰晤士報》的羅素和其他記者從克里米亞前線發回的大量戰地報道，讓英國公眾了解到許多普通士兵的英勇事跡。在記者的筆下，前線戰士對戰爭苦難的忍受是一種英雄的行為，許多讀者都認為應該設立一個專門的獎章來認可戰士們表現出的勇氣。一共有六十二名克里米亞戰爭老兵被選上接受第一批維多利亞十字勛章。這是一塊小小的青銅勛章，號稱是用從塞瓦斯托波爾繳獲的俄軍加農炮上熔煉下來的青銅鑄成的。[\*](#__Hou_Lai_Fa_Xian_Zhu_Zao_Wei_Du)在海德公園舉行的儀式上，被授予勛章的老兵們列隊上臺，一一向女王鞠躬，接受榮譽，戰爭大臣潘穆爾勛爵則在一旁高聲念出受勛者的名字和英雄事跡。在這六十二名接受英國最高軍事獎勵的老兵中，有十六名陸軍列兵，四名炮手，一名工兵，兩名水手和三名水手長。[[9]](#_9_W__Knollys__The_Victoria_Cros)

頒發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的舉動，不僅反映了英國社會對英雄主義理念的改觀，而且也標志了對戰爭和戰士的一種新生的崇敬。戰后英國出版了一大批宣揚戰士英雄行為的圖書，尤其是那些獲得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的士兵們的事跡。這類圖書中最受歡迎的是由塞繆爾·比頓（Samuel Beeton）在1861年出版的《我們的戰士和維多利亞十字勛章》（Our Soldiers and the Victoria Cross），比頓在當時因出版了由他妻子撰寫的《比頓太太的家庭管理手冊》（Mrs Beeton’s Book of Household Management）而聞名。《我們的戰士和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的目的是激勵和教育男孩，書的前言中寫道：

少年之為少年，因為其天性勇敢。年輕人應該有什么樣的遠見？應該說出什么樣勇敢的話語？應該做出什么樣勇敢的行為？如果有必要時，應該如何勇敢地接受磨難！……這些都是本書將要闡述的有關戰士的觀點——目的就是讓少年在成年之時，依然能夠保持年輕人的勇敢。[[10]](#_10_S__Beeton__Our_Soldiers_and)

這種對男子漢氣概說教式的崇拜，同樣在兩本以克里米亞戰爭為背景的小說里活靈活現地展現出來。這兩本書在當時廣為流傳，分別是查爾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的《兩年前》（Two Years Ago，1857年出版）和亨利·金斯利（Henry Kingsley）的《雷文休》（Ravenshoe，1861年出版）。查爾斯·金斯利的另一部小說《向西去！》（Westward Ho!，1855年出版）也以此為主題，講的是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時期西班牙艦隊入侵英國前后，男主角在新大陸（New World）的冒險經歷，很明顯受到了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國軍國主義和排外情緒的啟發。作者自己在1854年把這本小說描述為“最為嗜血無情的小說，但我認為正是當今所需要的”。[[11]](#_11_Markovits__The_Crimean_War)

為戰爭辯護也是托馬斯·休斯（Thomas Hughes）的小說《湯姆·布朗的學校生活》（Tom Brown’s Schooldays，1857年出版）的中心思想。這部小說非常有影響，其中最著名的場景是男主角湯姆與欺凌者斯洛格·威廉斯（Slogger Williams）[†](#__Zhe_Ge_Jiao_Se_De_Ming_Zi_Ying)之間的一場打斗，很明顯是希望讀者聯想到不久前英國與俄羅斯間發生的戰爭：

從搖籃到墳墓，對抗擊的正確理解，是每一個男人應該做的事，這是最高尚、最真實的事情。每一個男人，只要身上有一點價值，就會有敵人，必須將之打敗。這些敵人可能是他自己邪惡的念頭或習慣，或者是身居社會高層的精神惡魔，或是俄羅斯人，或是邊境上的惡棍，或是另外什么人。如果不把這些敵人狠狠打倒，他就沒法過上平靜的日子。貴格會（Quakers）還有其他一些人強烈反對抗擊，這能有什么意義呢？人的本性太強，而且也不受自己的戒律控制。每個人都在做自己的抗擊，以自己的辦法、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抗擊。就我所知，一個沒有抗擊的世界也許是一個更好的世界，但不是我們生活的世界，所以我堅決反對在沒有和平可言，或是不應該出現和平的時候大談和平……[對別人的挑釁說“不”，是]最大勇氣的證明，如果這么做真的是出于基督教的動機的話。如果是出于避免肉體的傷痛和危險的話，也沒有錯，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你是因為害怕被打而說“不”，那就不要推說或自以為是因為害怕上帝不允而說“不”，因為那么做既非基督徒所為，也不誠實。[[12]](#_12_T__Hughes__Tom_Brown_s_Schoo)

對“勇武的基督教”的崇拜就源于這里，維多利亞時代的帝國使命就是被“基督教戰士”參加正義戰爭這一理念塑造出來的。在那個時代，英國人開始在教堂高唱這樣的歌曲：

向前，基督教戰士，邁步走向戰場，

在耶穌十字架的指引下。

基督我主，帶領我抗擊敵人；

沖向戰場，讓祂的旗幟飄揚！（1864年）

“勇武的基督教”是1857年在一篇對金斯利的小說《兩年前》的評論中提出的。就在同一年，英軍士兵在印度鎮壓了印度民族起義，“基督教戰士”的理念更因這一事變而加強。在《湯姆·布朗的學校生活》的續集《湯姆·布朗在牛津》（Tom Brown at Oxford，1861年出版）中，對男孩進行訓練，讓他們將來為基督教事業做出貢獻的理念也非常突出。書中把競技體育贊頌為培養男子漢性格、團隊精神、騎士精神和道德操守的途徑——這些都被視作戰場上的英國士兵表現出來的優秀品質。“勇武的基督徒擁有傳統的騎士精神和基督教信仰：人的身體應用來接受訓練和學會聽從指揮，然后用來保護弱小者，推動所有正義的事業，征服上帝賦予人類的土地。”[[13]](#_13_T__Hughes__Tom_Brown_at_Oxfo)這一理念的中心是關注身體訓練和控制軀體，將之視作為圣戰而進行的道德強化。這種品質和克里米亞戰爭中英軍士兵經歷的磨難聯系在一起。

這種磨難，同時也幫助轉變了英國公眾對士兵的印象。在克里米亞戰爭前，英國中產階層心目中的士兵比一群烏合之眾好不了多少，他們酗酒、不守軍紀、殘忍、粗鄙、來自社會上最窮困的階層。但是英軍士兵在克里米亞戰場上遭受的痛苦顯示了他們的基督教美麗心靈，并使他們成為新教宣傳培養的對象。在戰爭期間向普通士兵布道的頻率急劇增加，隨軍牧師數量翻了一番，每個士兵都有一本免費的《圣經》，經費來自中產階級向基督教知識促進會（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和海軍和軍人圣經公會（Naval and Military Bible Society）的捐款。[[14]](#_14_O__Anderson___The_Growth_of)

在許多福音派信徒眼中，士兵們成了神圣的群體，是為神圣使命獻身的烈士。凱瑟琳·馬什（Catherine Marsh）就是抱著這樣念頭的人，她寫了一本筆觸生動而充滿感情的圣徒傳《紀念第九十七團赫德利·維卡斯上尉》（Memorials of Captain Hedley Vicars, Ninety-Seventh Regiment，1856年出版），幾年內就售出超過十萬本，還出了許多縮減版和青少年版，熱銷情況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本書根據維卡斯上尉的日記和他給母親的信件編撰而成，作者把這本書獻給“基督教戰士這一高貴理念”，并提供給公眾“對那些在事實面前依然堅持說全心侍奉上帝必然會讓人無暇顧及許多人生責任……培養一個好的基督徒就會毀滅一個好戰士的人的一個全新而充分的反駁”。在書中，維卡斯上尉被描述成一個圣徒戰士，一個無私的英雄，在塞瓦斯托波爾外的高地上為戰友排憂解難，讓戰友分享自己的食物和帳篷，在戰友生病時照料他們，給他們誦讀《圣經》。書中俄羅斯人被稱為“外邦人”、“異教徒”和“野蠻人”，維卡斯上尉率領手下戰士投身的是一場對敵人的“圣戰”。他在1855年3月22—23日的戰斗中受了致命傷，在最后一章《勝利》中，他的犧牲被提到基督舍身救世的高度。這一章的引言是美國詩人朗費羅（Longfellow）對西班牙詩人豪爾赫·曼里克（Jorge Manrique）的一首詩的翻譯：

他的靈魂被送到天堂，

上帝讓他長眠安息，

在榮耀中安息！

雖然勇士的太陽已落，

光輝卻將長久地圍繞我們，

明亮，燦爛，幸福。

維卡斯上尉的遺體被埋在了塞瓦斯托波爾，但是在英國肯特郡貝肯翰姆（Beckenham）布羅姆利路（Bromley Road）上的圣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urch）內，有一塊白色的大理石板，上面刻著一把入鞘的劍，劍上是一個攤開的卷軸，上面刻著以下文字：

謹此獻給上帝的榮耀，以及對第九十七團赫德利·維卡斯上尉敬愛的回憶。他因為相信“圣子耶穌基督的鮮血洗清了我們的原罪”而將自己從身懷原罪變成正義的人生。他于1855年3月22日晚在戰場上倒下，在耶穌懷中長眠，當他被埋葬在塞瓦斯托波爾時，年僅二十八歲。[[15]](#_15_Memorials_of_Captain_Hedley)

除了對戰士的神圣化以及新的男子漢理想的興起之外，克里米亞戰爭的另一個影響似乎為終結英國的階層分化和1830年代與1840年代的勞資斗爭提供了一個和解的機會。在狄更斯編輯的《家庭箴言》中，跟伊麗莎白·加斯克爾（Elizabeth Gaskell）以結束社會階層沖突為主題的《北方和南方》（North and South）小說連載一起出現的，是維多利亞女王喜愛的詩人阿德萊德·安妮·普羅克特（Adelaide Anne Procter）的詩，其中有一首名叫《戰爭的教訓》（“The Lesson of the War”）：

國家的統治者，

大門外的窮人，

懷著同樣的渴望

等待同樣的消息！

窮人期待休息和舒適，

富人鐘情喜樂和榮譽，

但在蒼涼的克里米亞海岸

他們肩并肩而戰。[[16]](#_16_Yin_Yong_Yu__Markovits__The)

在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歌獨白劇《莫德》（Maud，1855年出版）中也有類似的思想，詩中因“貪圖利益”而導致的“內戰”最后讓位給了敘事者心目中更高尚、更符合上帝事業的海外戰爭：

猶豫不決之間，我了解到那片疆土的更高志向，

在那里對財富的貪婪從未平息，

對所謂和平的追求從未停止，

那是一種什么樣的和平，包藏了無盡的不義與侮辱，

恐怖、恨意、邪惡，掩人耳目；

然而戰旗已再次舉起！

雖然許多生命之火將被燃盡，

許多人會為那些因沖突而隕滅的生命而哭泣，

但是上帝的公正之怒必將懲罰不義之徒；

無邊的黑暗將被光明摧毀，

光輝的名字瞬間功成名就，

陽光下崇高的理想更為自由，

萬眾一心，呼吸與共；

因為和平，我從來不認作真正的和平的，已經不再，

在黑海和波羅的海深深的水邊，

城堡要塞正張開吃人的大嘴，

噴射出血紅色的戰爭火焰。

無論是燃燒或是熄滅，不管戰爭如風般蔓延，

我們已證明自己全心投入了一個高貴的事業，

就我而言，已被崇高的理念喚醒；

與其責罵邪惡，不如為正義而戰；

與我的祖國共存，與我的兄弟同在，

我全心擁抱上帝的意愿，以及由此注定的命運。

畫家們也采用了同樣的題材。約翰·吉爾伯特（John Gilbert）的油畫《女王陛下在白金漢宮大廳內視察冷溪近衛團傷員》（Her Majesty the Queen Inspecting the Wounded Coldstream Guards in the Hall of Buckingham Palace，1856年完成）是一幅相當受歡迎的畫作，直到1903年還有人將其復制為彩色版畫，可惜原畫已經失傳。這幅畫通過女王與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受傷的英雄會面的場景，展現出一種感人的憂傷，暗示了戰后社會的最高層和最底層之間形成團結的前景。杰里·巴雷特（Jerry Barrett）的大幅油畫《維多利亞女王第一次探訪傷員》（Queen Victoria’s First Visit to Her Wounded Soldiers，1856年完成）也表達了同樣的情緒。這幅畫表現了皇室成員訪問查塔姆（Chatham）軍隊醫院里克里米亞戰爭傷員的情景，畫風煽情，然而極受歡迎，第一次在倫敦皮卡迪利廣場（Piccadilly）的托馬斯·阿格紐（Thomas Agnew）畫廊展出時，向公眾賣出了幾千份不同版本的印刷版，每份售價從三幾尼（guinea）[‡](#___Ying_Guo_Jiu_Shi_Huo_Bi__1Ji)到十幾尼不等。[[17]](#_17_M__Lalumia__Realism_and_Poli)

女王自己也收藏克里米亞老兵的照片。她出資讓商業攝影師如約瑟夫·坎德爾（Joseph Cundall）和羅伯特·豪利特（Robert Howlett）等人到各地軍隊醫院，包括查塔姆醫院，為受傷和殘疾的戰士拍攝紀念肖像，專門收藏在溫莎城堡。坎德爾和豪利特所攝作品觸動人心，通過攝影展覽和流行畫報，讓英國公眾有機會真切細致地體會到戰士們的苦難和戰爭所付出的人員代價。這些先驅性的作品和羅杰·芬頓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拍攝的溫文爾雅的照片很不相同。例如，在坎德爾和豪利特的《三名克里米亞傷員》（Three Crimean Invalids，1855年拍攝）中，三名步兵傷員坐在醫院病床上，展示著自己傷殘的手腳。他們臉上沒有任何表情，畫面也沒有浪漫化或是加入煽情元素，只是用黑與白記錄了鐵制彈丸和凍傷對他們肢體造成的傷害。在皇家檔案保存的拍攝記錄中，坎德爾和豪利特記下了照片中三名戰士的身份：第二十三團的威廉·揚（William Young）[§](#SS_Yu_1839Nian_Ying_Guo_Zhu_Ba_L)，1855年6月18日在棱尖棱堡受傷；第三十四團的亨利·伯蘭（Henry Burland），在塞瓦斯托波爾前的塹壕中因凍傷而失去雙腿；第四十九團的約翰·康納里（John Connery），左腿因在塹壕中凍傷而被截肢。[[18]](#_18_M__Lalumia__Realism_and_Poli)

一直到1870年代，對克里米亞戰爭的記憶依然在為藝術家提供有價值的主題。這些克里米亞戰爭題材油畫中最著名的是伊麗莎白·湯普森（Elizabeth Thompson）即巴特勒爵士夫人（Lady Butler）的《戰后點名，克里米亞》（Calling the Roll after an Engagement，Crimea，1874年完成），這幅畫首次在皇家學院（Royal Academy）展出時，引起了轟動。前來觀看的人潮如此洶涌，以致不得不派一名警察站崗保護這幅畫。當時湯普森已經因她過去的軍事題材作品而出名，在卡德韋爾改革之后，軍事事務依然在公眾生活中處于主導地位，她因此產生了創作靈感。后來這幅作品普遍被稱為《點名》（The Roll Call），其特別的構圖引人注目，展現的是一場戰斗之后，幸存的擲彈兵戰士忍著傷痛、寒冷、極度疲倦，圍在一起，接受騎在馬上的指揮官的點名。與傳統作品中展現勇敢的指揮官光輝形象完全不同，這幅兩米高的油畫突出的是士兵們遭受的痛苦，去除了任何英雄壯舉，讓觀眾直視戰爭的真實狀況。在皇家學院展出后，《點名》到英國各地巡回展出，吸引了大批觀眾。在紐卡斯爾，宣傳畫展的人在身上前后各掛一塊板子，上面只是用大字寫著“《點名》來了！”在利物浦展出的三個星期里，有兩萬人觀看了這幅作品，在當時來說是極大的數字。看到這幅作品的人都被其深深打動，顯然這幅畫觸動了英國人的心靈。女王從這幅畫原來的買家、曼徹斯特的一名工業家手里買下了這幅畫，但是一家印刷公司保留了以版畫方式復制印刷的權利。湯普森自己也一夜之間成為民族女英雄，印著她照片的卡片賣出了二十五萬份，在許多人心目中，她與南丁格爾齊名。[[19]](#_19_M__Lalumia__Realism_and_Poli)

\* \* \*

在英格蘭，他們會說些什么，

當他們聽到

阿爾馬高地上的神奇事跡，

大膽勇敢的人的作為？

有關俄羅斯人，在正午時還趾高氣揚，

日落時已垂頭喪氣的故事？

他們會說：“就像老英格蘭做的那樣！”

他們會說：“多么非凡的壯舉！”

在英格蘭，他們會說些什么，

當因為震驚恐懼而默然無語，

所有快樂家庭中的愛戴之心

都在想念戰死的偉人，

在無聲的悲楚中想念，

父親、兄弟、兒子？

他們會說，在我們親愛的老英格蘭

“上帝的旨意一定會被遵守”。

在英格蘭，他們會說些什么？

當他們歡笑、哭泣，或是祈禱時

日日夜夜，我們的名字，

都在他們唇邊，在他們心底，

他們在人間凝望，他們向天堂祈求，

然后，向前投入戰斗！

當英格蘭歡呼，上帝保衛正義時，

誰將會膽戰心驚，畏縮不前？

J.S.B.蒙塞爾牧師（Reverend J.S.B. Monsell），  
 摘自《少女讀物》 （The Girl’s Reading Book，1875年出版）[[20]](#_20_Mrs_H__Sandford__The_Girls)

克里米亞戰爭給英國的國民身份認同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對學校里的兒童來說，這是英格蘭挺身而出面對俄國熊保衛自由的一個例子，一場直截了當的對與錯之間的斗爭，正如當時《笨拙》雜志展示的那樣。代表英國的約翰牛協助弱小者反抗暴君和欺凌者，這一形象成為英國國家敘事不可或缺的部分。讓英國卷入克里米亞戰爭的許多情緒力量，后來也促成了英國在1914年為了保衛“小小的比利時”、在1939年為保衛波蘭而與德國開戰。

在今天，阿爾馬、巴拉克拉瓦、因克爾曼、塞瓦斯托波爾、卡迪甘和拉格倫這些名字依然留存在英國人的集體記憶中——主要是以街道名和酒吧名這樣的方式。在克里米亞戰爭后的幾十年時間里，很流行給女孩起名為弗洛倫絲、阿爾馬、巴拉克拉瓦，給男孩起名為因克爾曼。戰爭老兵把這些名字帶到了世界的各個角落：在澳大利亞的南澳大利亞州（South Australia）和昆士蘭州（Queensland），各有一個鎮子叫巴拉克拉瓦；在美國西弗吉尼亞州（West Virginia），澳大利亞的南澳大利亞州、西澳大利亞州（West Australia）、昆士蘭州、維多利亞州（Victoria）、新南威爾士州（New South Wales），加拿大的格洛斯特郡（Gloucester County）都有因克爾曼；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California）、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和維多利亞州都有塞巴斯托波爾；在新西蘭有一座塞巴斯托波爾山（Mount Sebastopol）；在美國威斯康星州（Wisconsin）有四個、在科羅拉多州（Colorado）有一個、在阿肯色州（Arkansas）有兩個、在其他州有十個鎮子都叫阿爾馬；在加拿大有四個阿爾馬，還有一個湖叫阿爾馬；在澳大利亞有兩個阿爾馬；在新西蘭有一條河叫阿爾馬。



《對與錯之戰》，《笨拙》，1854年4月8日

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有三十一萬法國人參戰，三分之一沒能活著回來，跟這場戰爭有關的名字也到處都能看到。巴黎有一座阿爾馬橋（Alma Bridge），最早在1856年興建，后來在1970年代重建。因為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1997年在這里發生致命車禍，讓阿爾馬橋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在那之前，這座橋最出名的地方是其上的朱阿夫雕塑（原來的橋上有四座，重建時只保留了一座）。過去巴黎市民用這座雕塑來測量塞納河的水位，如果河水漫過了朱阿夫雕塑的膝蓋，就會宣布塞納河不適合航行。巴黎有一個阿爾馬廣場（place de l’Alma）和塞巴斯托波爾林蔭大道（boulevard de Sébastopol），兩處都有同名的地鐵站。在巴黎南郊有一個區叫作馬拉科夫。這里最早是一個獨立的小鎮，原名“新加利福尼亞”（New California）。馬拉科夫是克里米亞戰爭后幾年內在旺弗（Vanves）河谷地價便宜的采石場上興建的，開發商是法國19世紀最成功的地產開發商亞歷山大·肖夫洛（Alexandre Chauvelot）。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法國曾短暫出現過一陣紀念這場戰爭的熱潮，肖夫洛借此機會，在這里興建了一座游樂園以吸引工匠和工人從擁擠的巴黎市中心搬來。游樂園內有一座馬拉科夫塔（Malakoff Tower），是仿照塞瓦斯托波爾著名棱堡的樣子而建的主題公園，有塹壕、山坡、土崗和石窟等，一邊還有一座舞臺和露天劇場，夏天時游客們可以在這里觀賞克里米亞戰斗重演或是其他娛樂活動。在獲得拿破侖三世的許可之后，新加利福尼亞在1858年被正式改名為馬拉科夫，以紀念法國皇帝登基以來的第一場軍事勝利。作為私人住宅區，這一地區在1860年代發展非常迅速。但是當法國在1870年被普魯士打敗之后，馬拉科夫塔被旺弗市長下令拆除，他認為在國家新敗之后，提醒人們過去的軍事輝煌是件殘忍的事。

法國各省的市鎮鄉村都曾建有馬拉科夫塔，有些保存至今。在塞納—馬恩省（Seine-et-Marne）的錫夫里—庫爾特里（Sivry-Cortry）、涅夫勒省（Nièvre）的圖里—呂爾西（Toury-Lurcy）、約訥省（Yonne）的塞爾米澤萊（Sermizelles）、謝爾省（Cher）的南特（Nantes）和圣阿諾蒙特龍（Saint-Arnaud-Montrond）都有，在位于比利時列日（Liège）附近迪松（Dison）的哈薩德舍拉特（Hasard-Cheratte），盧森堡，德國的科隆（Cologne）、波鴻（Bochum）和漢諾威（Hanover），阿爾及利亞的奧蘭（Oran）和阿爾及爾（Algiers），以及巴西一座克里米亞戰爭后法國殖民者聚居的城市累西腓（Recife）等也有馬拉科夫塔。在法國，幾乎每個市鎮都有一條以馬拉科夫命名的道路，法國人還將馬拉科夫的名字給了廣場、公園、旅館、餐館、奶酪、香檳、玫瑰和法國歌曲。

盡管如此，克里米亞戰爭在法國人的國民意識上留下的痕跡，遠遠不如在英國那么深刻。對克里米亞戰爭的記憶很快就被緊接著的幾場戰爭淹沒了：1859年在意大利對抗奧地利的戰爭，1862—1866年對墨西哥的遠征，更重要的是在普法戰爭中的失利。今天法國很少有人知道克里米亞戰爭，它成了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在意大利和土耳其，跟法國一樣，克里米亞戰爭也很快便從國家神話和歷史演繹中消失，當這些國家重新構建19世紀歷史時，這場戰爭幾乎沒有什么地位。

在意大利，很少有紀念意大利參與克里米亞戰爭的地標。即使在皮埃蒙特，這個有二千一百六十六名戰士陣亡或病死的地方，也沒有任何紀念，而這還是官方統計數字，實際死亡人數幾乎肯定比這更高。在都靈有一條塞巴斯托波利大道（Corso Sebastopoli），還有一條喬爾納亞路（Via Cernaia）紀念意大利人參加的唯一一場較大規模的戰斗。民族主義畫家杰羅拉莫·因杜諾（Gerolamo Induno）曾和撒丁尼亞部隊一起前往克里米亞，并畫了許多戰斗場面畫的速寫。他在1855年返回之后畫了一些表現戰斗場面的油畫，包括由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二世出資的《喬爾納亞之戰》（The Battle of the Chernaia），另外還有《占領馬拉科夫塔》（The Capture of the Malakoff Tower）。戰后幾年，這兩幅畫曾在意大利北部地區激起一種愛國主義情緒。但是1859年戰爭以后發生了一系列事件：加里波第的南征、征服那不勒斯、1866年戰爭期間從奧地利人那里吞并威尼斯、1870年占領羅馬完成意大利統一等，這些事件引人注目的程度很快便超過了克里米亞戰爭，因為這些都是意大利“復興運動”（Risorgimento），即意大利重新誕生為一個現代國家的關鍵事件。克里米亞戰爭作為一場在皮埃蒙特和加富爾帶動下發動的海外戰爭，在民族主義者對意大利建國的理解中并沒有重大價值，而且在對“復興運動”的民粹主義詮釋中，加富爾本身就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角色。意大利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沒有公眾游行要求開戰，沒有志愿運動，沒有重大勝利，也沒有光榮的戰敗。

在土耳其，克里米亞戰爭與其說被遺忘了，倒不如說被從國家歷史記憶中剔除了出去，即使戰爭是從那里開始，而且根據官方數字，土耳其在戰爭期間損失了十二萬名士兵，占參戰人數的一半。伊斯坦布爾（Istanbul）有紀念參戰的西方國家戰士的紀念碑，卻沒有紀念土耳其士兵的。直到近幾年前，克里米亞戰爭幾乎完全被土耳其史學所忽略，被遺棄在早期奧斯曼帝國的“黃金時代”和后來阿塔圖爾克（Atatürk）建立現代土耳其之間的縫隙中。盡管土耳其是戰勝國，但是克里米亞戰爭卻被視為奧斯曼帝國一段恥辱的歷史，是帝國轉入衰落的轉折點。從那時起背上大量債務，不得不依賴西方列強，而西方國家卻并非土耳其真正的朋友。土耳其學校使用的教科書，大部分認定伊斯蘭傳統的消退是克里米亞戰爭之后西方國家越來越多干涉的結果。[[21]](#_21_Can_Jian__R__Basturk__Bilim)官方的軍事歷史也一樣，下面這段摘自1981年土耳其總參謀部出版的軍事歷史，反映了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和穆斯林對西方深深的反感：

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土耳其幾乎沒有真正的朋友。有些看上去像是我們的朋友，卻不是真正的朋友……在這場戰爭中土耳其失去了自己的寶藏。歷史上第一次向歐洲欠下了債務。更糟糕的是，因為土耳其與西方國家結成聯盟參加戰斗，成千上萬的外國士兵和平民有機會看到土耳其最秘密的所在和所有的弱點……這場戰爭的另一個負面影響是土耳其社會上一些半知識分子圈子里的人士開始崇拜西方時尚和價值觀，失去了自我。伊斯坦布爾的醫院、學校和軍事設施被交給聯軍使用，但是西方軍隊卻沒有悉心照料，讓歷史建筑毀于大火……土耳其人民顯示了傳統的好客精神，把他們的海邊別墅向聯軍指揮官們開放，但是西方士兵卻沒有向土耳其人民和土耳其墓葬地表示同樣的尊重。聯軍不讓土耳其部隊在高加索海岸登陸[以支持沙米勒的抗俄武裝]，因為這違反了他們的國家利益。總之，在克里米亞戰爭的各個戰場上，土耳其戰士都表現得十分無私，灑下了鮮血，但是我們的西方盟友們卻獨占了所有榮耀。[[22]](#_22_Genelkurmay_Askeri_Tarih_ve)

\* \* \*

克里米亞戰爭對俄羅斯的沖擊，和其對英國社會的影響一樣深遠，在塑造國家身份認同上起了顯著的作用。但是俄羅斯人對這場戰爭的感受是矛盾的。這場戰爭被視為一場可怕的羞辱，是西方與土耳其結盟共同對付俄羅斯，造成了極深的怨恨。但是對于塞瓦斯托波爾的守衛者，俄羅斯人又有一種民族自豪感，覺得他們做出的犧牲以及他們為基督教信仰而戰的動機，把戰場上的失敗變成了一場道義上的勝利。這一想法在沙皇得知塞瓦斯托波爾陷落的消息后發布的《致俄羅斯人民書》（Manifesto to the Russians）中清楚地表現出來：

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在軍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不僅在俄羅斯，在全歐洲都贏得了尊敬。那里的抵抗者們和所有那些為祖國贏得榮譽的英雄們一樣崇高。塞瓦斯托波爾守軍面對比他們強大的入侵者，堅持了十一個月之久，以異乎尋常的勇敢在各方面堪稱楷模……他們的英勇壯舉將永遠激勵我們的戰士，我們同樣信仰上帝、相信俄羅斯神圣事業的戰士。塞瓦斯托波爾，如此多的鮮血在這里灑下，它的名字將永垂青史，對其守衛者的回憶將永遠留在我們心中，就像那些在波爾塔瓦和博羅季諾戰斗過的俄羅斯英雄一樣。[[23]](#_23_A__Khrushchev__Istoriia_obor)

塞瓦斯托波爾的英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于托爾斯泰的《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在1855—1856年間，幾乎每一個識字的俄羅斯人都讀過這部作品。《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在俄羅斯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這座城市被視為特殊的“俄羅斯精神”的縮影，并且正是這種韌性和勇氣把俄羅斯從外國侵略者的威脅下解救了出來。1855年4月，托爾斯泰在圍困戰達到頂峰時，寫下了《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爾》，在文章的最后他寫道：

現在你已經探望了堅守在防線上的塞瓦斯托波爾的守衛者，你順著來時的路線返回，走向已成為一片廢墟的戰場中央（塞瓦斯托波爾城）。加農炮彈和子彈在你身邊飛過，你卻毫不在意，反而充滿平靜的喜悅。你從防線上帶回來最重要、最令你寬慰的信念，是塞瓦斯托波爾永遠不可能被敵人征服。不僅如此，你還堅信俄羅斯人民的力量永遠不可能消亡，不管考驗來自世界何處。你能得出這樣的結論，不僅因為你親眼目睹了陣地上的各種橫梁胸墻，或是縱橫交錯、設計巧妙的塹壕，或是地雷與火炮，雖然這些你都完全看不明白；你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是因為你從塞瓦斯托波爾守衛者的眼睛、言語和動作中，看到了一種精神。不管做什么，他們都做得直截了當，輕松自如，讓你相信他們能夠應對比這困難一百倍的事情……沒有什么可以難倒他們。你意識到驅動他們的精神跟你自己的空虛、瑣碎、不動腦子的感情沒有一點共同之處。他們擁有的，是一種截然不同的堅強有力的精神，正是因為這種精神，他們在彈雨之下依然能夠過著平靜的生活。他們面臨的危險，比大部分人高一百倍，同時還要承受失眠的痛苦、骯臟的環境以及無盡的苦活。戰士們愿意忍受這樣惡劣的生活條件，不是因為他們想得到一個十字勛章或是什么榮譽，或是因為受到威逼，他們這么做只因胸中懷有一種高尚的動機。這種動機在俄羅斯人身上很少顯露出來，卻深深地埋藏在他們心中——這是一種對故土的熱愛。塞瓦斯托波爾有其種種傳奇：在圍困戰開始時，這里沒有堡壘工事、沒有部隊，實在沒有守住的可能，人們卻毫不懷疑能夠打退敵人的進攻；當科爾尼洛夫將軍，這位可與古希臘勇士比肩的英雄，向受視察的部隊呼喊：“弟兄們，我們寧愿戰死，也不會交出塞瓦斯托波爾”時，本不善言辭的俄羅斯戰士們應聲答道：“我們寧愿戰死！萬歲！”現在，當你走在已成廢墟的戰場中央的路上，這些傳奇不再只是美麗的故事，而是歷歷在目的事實。你忽然清晰地意識到，你剛剛見到的戰士，正是那些在艱苦的日子里，沒有讓自己士氣沉淪，而是抖擻精神，欣然赴死的勇士。他們不是為這座城市，而是為自己的故土慷慨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塞瓦斯托波爾的史詩將長存于俄羅斯的記憶之中，其主角便是俄羅斯人民。[[24]](#_24_L__Tolstoy__The_Sebastopol_S)

“塞瓦斯托波爾的史詩”把軍事上的失利描繪成了俄羅斯的全民勝利。“塞瓦斯托波爾陷落了，但是如此輝煌的抵抗，俄羅斯人應該以此為傲，這樣的戰敗抵得上一場精彩的勝仗”，一位十二月黨人寫道。[[25]](#_25_N__Dubrovin__349_dnevnaia_za)俄羅斯人用一場敗仗建立了一個愛國神話，建立了俄羅斯人無私英勇、堅韌毅力和獻身精神的國家敘事。詩人們將其與1812年的精神相提并論，就像阿列克謝·阿普赫京（Aleksei Apukhtin）在他著名的敘事詩《塞瓦斯托波爾戰士之歌》（“A Soldier’s Song about Sevastopol”，1869年發表）中所做的那樣。在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許多俄羅斯學校的學生都學過這首詩：

我要唱的，小伙子們，不是一首快樂的歌；

它講的不是一場勝仗

不像我們的父輩在博羅季諾，

也不像我們的祖父輩在奧恰科夫唱的那樣。

我要唱給你聽，

一團塵土如何在

南方的田野高高卷起，

無數的敵人登上岸來

他們前來進犯，把我們打敗。

我們被打敗了，但從此以后

他們卻再也不敢前來進犯，

我們被打敗了，但敵人卻就此離去

鼻青臉腫地逃上帆船。

我要唱給你聽，

丟下舒適的家園

地主如何加入民兵武裝，

告別棚屋里的妻子

農民如何志愿參戰。

我要唱給你聽，

部隊如何越變越強，

勇士們從各處而來，如鋼鐵般健壯。

知道自己將一去不回，

他們虔誠地赴死疆場！

我們美麗的姑娘

如何成為護士

為苦悶的醫生分擔，

我們的每一寸土地

都要敵人付出血的代價；

在濃煙與烈火中，在手榴彈的巨響中，

在四周一片轟鳴聲中，

一個個碉堡隱隱出現，

像冷峻的幽靈一般，

棱堡漸漸地蔓延——

殺戮持續了十一個月，

這座神奇的要塞，俄羅斯的盾牌，

俄羅斯英勇的兒子們

每天都在這里被掩埋……

我唱給你的歌不是歡樂的曲子：

但它不比勝利之歌少一丁點輝煌

就像我們的父輩在博羅季諾，

我們的祖父輩在奧恰科夫唱的那樣。[[26]](#_26_A__Apukhtin__Sochineniia__2)

這就是托爾斯泰寫作他的“民族史詩”——《戰爭與和平》的背景。把拿破侖戰爭當作俄羅斯民族覺醒的時刻這一概念，反映了托爾斯泰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目睹俄羅斯人民英勇行為之后的內心歷程。在書中所述的故事中，通過參加一場抗擊外國入侵的戰爭，歐洲化的貴族重新發現了“俄羅斯信念”，農奴戰士的愛國精神得到了認可，為俄羅斯的民主建國奠定了基礎。《戰爭與和平》寫于1862年至1865年，當時正是農奴獲得解放后的頭幾年，俄羅斯社會的自由派人士將國家改革以及地主和農民階層之間的和解作為理想。托爾斯泰原來打算將這本描述十二月黨人的小說背景設置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后，早期手稿名叫《十二月黨人》（“The Decembrist”），其中男主角在西伯利亞流放三十年后被釋放回來，卷入了1850年代后期知識分子階層尋求變革的騷動之中。此時亞歷山大二世剛剛即位不久，俄羅斯進入了第二個亞歷山大時期（Alexandrine reign）[¶](#P_Shi_Er_Yue_Dang_Ren_Qi_Yi_Fa_S)，跟1825年一樣，人們對改革的期待亦非常急切。但是托爾斯泰對十二月黨人的研究越多，就越認為他們的理論根源來自1812年戰爭，于是將《戰爭與和平》故事發生的時間也做了修改。

克里米亞戰爭讓人們對俄羅斯的民族性格產生了新的認識，因此戰后對1812年戰爭的記憶也出現了激烈的爭執。像托爾斯泰這樣的民主派，受到俄羅斯農民戰士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所做犧牲的鼓舞，將1812年戰爭視為一場人民的勝利，依靠整個國家的愛國精神贏得。但是對保守派來說，1812年戰爭是俄羅斯世襲制度的神圣篇章，是俄羅斯貴族靠一己之力把歐洲從拿破侖手下拯救了出來。

對克里米亞戰爭的紀念也被卷入類似的意識形態沖突中。保守派和宗教領袖們將其描繪為一場圣戰，俄羅斯參戰是因為肩負著上天授予的捍衛東正教的使命。他們聲稱俄羅斯沒有辜負這一使命，因為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后，國際社會宣告將保護奧斯曼帝國內的基督徒，而且正像俄羅斯在戰前要求的那樣，《巴黎條約》確保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圣地將維持現狀。在他們的文字和布道中，克里米亞的守衛者被描繪為勇敢無私的基督教戰士，獻上生命成為“俄羅斯圣戰”的烈士。他們再次強調克里米亞是基督教傳到俄羅斯的圣地。克里米亞戰爭剛一結束，俄羅斯帝國皇室就試圖把對這場戰爭的紀念和1812年戰爭的記憶聯系起來。當塞瓦斯托波爾陷落的消息傳來，沙皇重返莫斯科的舉動被塑造成是對1812年亞歷山大一世在莫斯科人的歡呼聲中重返舊都的重演。在1856年，沙皇特意將登基的日期推后到1812年打敗拿破侖軍隊的博羅季諾戰役勝利紀念日。做出這一姿態的目的，是為了消弭克里米亞戰爭失敗的痛苦，并且以過去的輝煌勝利把皇室和人民團結在一起。[[27]](#_27_M__Kozelsky__Christianizing)

但是對于托爾斯泰所處的民主派知識分子圈里的人來說，把克里米亞戰爭和1812年戰爭聯系在一起的紐帶，不是沙皇的神圣使命，而是俄羅斯人民的愛國精神，他們為保衛自己的祖國而奉獻生命。然而俄羅斯人民到底做出了多大的犧牲，卻不容易計算清楚。沒有人確切知道有多少戰士陣亡。俄羅斯方面從未統計過準確的傷亡數字，許多涉及重大損失的信息都被軍事當局歪曲或掩藏了。不過據估計，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各大戰場陣亡的俄羅斯士兵總數在四十萬至六十萬人之間。戰爭部的軍醫部門后來發表數字，顯示在1853年至1856年的四年間，軍中共有四十五萬零一十五人死亡，這可能是最準確的估計了。[[28]](#_28_RGVIA__f__481__op__1__d__27)在沒有準確數字的情況下，在民主派的想象中，人民的犧牲被拔高到了一個神話般的高度。

在俄羅斯人的共同記憶中，塞瓦斯托波爾本身也被提升到了一個近乎神圣的地位。戰爭一結束，對圍困期間倒下的英雄的紀念就已經開始了，這些紀念活動并非出于政府或官方命令，而是由平民自發組織的，由老兵團體和家人修建紀念碑，或是用公眾捐獻的資金興建教堂、墓地，建立慈善基金。這些民間造神運動的焦點是對納希莫夫、科爾尼洛夫和伊斯托明（Istomin）三位海軍上將的紀念。三人都是塞瓦斯托波爾保衛戰的烈士，被神化為“愛民將軍”，全心關懷手下士兵的福祉。1856年，為了在塞瓦斯托波爾興建一座紀念這三位將軍的紀念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全國性基金。在俄羅斯其他許多市鎮也有類似的紀念活動。在眾多有關克里米亞戰爭的歷史作品中，黑海艦隊參謀長科爾尼洛夫一直都是中心人物。納希莫夫是錫諾普海戰的英雄和塞瓦斯托波爾軍港總指揮，在民間傳說中幾乎是一個圣人。在許多故事和版畫中，他是一個勇敢無私的戰士，一個為人民的神圣使命獻身的烈士，在視察第四棱堡中彈身亡之前，他就已經準備好獻出自己的生命了。1869年，完全依賴私人捐助的黑海艦隊博物館建成。在開館當日，訪問者可以看到從參戰老兵那里收集來的各種武器、藝術品以及個人物品、手稿和地圖、繪畫和雕刻等。這是俄羅斯歷史上第一座由公眾出資興建的歷史博物館。[\*\*](#___Lu_Mian_Cai_Fu_Tu_Shu_Guan_He)

直到1870年代后期，俄羅斯政府才開始參與對塞瓦斯托波爾的紀念活動，那是在俄土戰爭期間，原因主要是在政府圈子里泛斯拉夫主義勢力逐漸增強。但是政府組織的紀念活動集中在戈爾恰科夫將軍那樣的宮廷紅人身上，幾乎完全忽視了納希莫夫這樣的人民英雄。此時納希莫夫已經成為如火如荼的民族主義運動的象征，而政府則試圖通過修建克里米亞紀念碑把他納入官方民族主義（Official Nationality）[††](#___Ji_Zai_Ni_Gu_La_Yi_Shi_Shi_Qi)體系中。在日俄戰爭期間，同時也是俄羅斯國內革命爆發的1905年，一幅為紀念克里米亞戰爭五十周年而繪制的全景畫向公眾展出，被陳列在一座專門修建在第四棱堡原址上的博物館里。這幅名為《守衛塞瓦斯托波爾》（The Defence of Seavstopol）的精彩作品由俄羅斯藝術家弗朗斯·魯博（Franz Roubaud）創作，由真人尺寸的油畫和模型組成，再現了1855年6月18日俄羅斯守軍擊敗英法聯軍進攻的場景。[[29]](#_29_S__Plokhy___The_City_of_Glor)但是俄羅斯政府官員堅持將畫中的納希莫夫換成戈爾恰科夫，于是納希莫夫便沒有出現在博物館里。諷刺的是，博物館所在地，即原來的第四棱堡，正是納希莫夫中彈受了致命傷的地方。



《納西莫夫將軍之死》，瓦西里·季姆繪，1856（圖片來源：俄羅斯國際新聞通訊社及Topfoto機構）

在蘇聯時期，對克里米亞戰爭的紀念再次回歸到公眾心目中的英雄身上。納希莫夫這時成了俄羅斯人民面對強敵保衛祖國的英雄主義和愛國犧牲精神的象征，這一宣傳意義在1941年至1945年間再度得到加強。從1944年起，蘇聯海軍軍官和水手可以被授予納希莫夫獎章（Nakhimov Medal），海軍軍官學院也以他的名字命名。在圖書和電影中，他成了一個象征性人物，代表了一位偉大的領袖如何在強敵入侵時率領人民殊死抵抗。

由蘇聯著名導演弗謝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拍攝的愛國電影《納希莫夫將軍》（Admiral Nakhimov，1947年上映）從1943年起開始拍攝，計劃拍成一部可與由亞歷山大·科爾達（Alexander Korda）導演、以特拉法加海戰英雄納爾遜勛爵（Lord Nelson）為主角的英國電影《漢密爾頓夫人》（Lady Hamilton，1941年上映）[‡‡](#_____Dang_Shi_Zai_Zhong_Guo_Shan)相比肩的作品。當時英國還是蘇聯的盟國，所以影片第一版減輕了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作為敵對國的分量，而是聚焦在納希莫夫的個人生活和他與塞瓦斯托波爾居民之間的關系上。但是在影片剪輯過程中，冷戰前期的東西方摩擦已經開始了。湊巧的是，和克里米亞戰爭一樣，20世紀中期冷戰的沖突也源于土耳其海峽以及高加索地區。從1945年秋天開始，蘇聯就一直在推動修改1936年簽署的《蒙特勒公約》（Montreux Convention）中對這道海峽中立地位的規定。斯大林強烈要求由蘇聯和土耳其共同控制達達尼爾海峽，并且將卡爾斯和阿爾達漢割讓給蘇聯。這兩處曾由沙皇俄國占領，但是在1922年歸還給了土耳其。美國對蘇聯軍隊在高加索地區的集結感到擔憂，于是在1946年8月派出戰艦前往地中海東部。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斯大林下令對普多夫金的電影進行修改：由塑造納希莫夫的人物形象變為描述他如何成為反抗外國侵略的軍事領袖。在這個版本中，英國是俄羅斯的敵人，利用土耳其實現其對黑海地區的帝國主義野心，與斯大林所宣稱的美國在冷戰早期的所作所為一模一樣。[[30]](#_30_S__Davies___Soviet_Cinema_an)

斯大林時代另一位著名歷史學家葉夫根尼·塔爾列（Evgeny Tarle）在他的作品中也采取了類似的說法，其中包括兩卷本的歷史作品《克里米亞戰爭》（The Crimean War，1941—1943年完成）、傳記《納希莫夫》（Nakhimov，1948年出版），以及在1955年為紀念克里米亞戰爭一百周年而出版的《光榮的俄羅斯城市：1854年至1855年的塞瓦斯托波爾》（The City of Russian Glory: Sevastopol in 1854—1855）。他在作品中對沙皇統治做了強烈批判，但是拔高美化了俄羅斯人的愛國勇氣和堅韌品質，強調他們如何在納希莫夫和科爾尼洛夫這樣的愛國主義領袖的以身作則下，為抵抗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侵略”而戰。克里米亞戰爭時期俄羅斯的敵人：英國、法國、土耳其，當時都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而1955年華沙條約組織剛剛成立，兩大陣營成為敵人和對手，為蘇聯慶祝克里米亞戰爭一百周年添加了緊張感。

直到今天，為塞瓦斯托波爾這座“光榮的俄羅斯城市”的英雄們而自豪，依然是俄羅斯民族身份認同感的重要源泉，盡管現在它已變成了一座外國城市[§§](#SSSS_Ben_Shu_Yuan_Zhu_Yu_2010Nia)——蘇共前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在1954年把它劃給了烏克蘭，而烏克蘭又在1991年蘇聯解體時獨立。用一位俄羅斯民族主義詩人的詩句來說：

在我們超級大國的廢墟上

是歷史巨大的悖論：

塞瓦斯托波爾，這座光榮的俄羅斯城市

卻在……俄羅斯國土之外的地方。[[31]](#_31_Yin_Yong_Yu__Plokhy___The_Ci)

失去克里米亞對俄羅斯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擊，蘇聯解體之后，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已經遭受重創。俄羅斯民族主義者一直采取行動要求將克里米亞歸還俄羅斯，塞瓦斯托波爾也一直是一座俄羅斯人占主體的城市，但是要求將其歸還俄羅斯的民族主義者，并不局限于克里米亞本地人。

對克里米亞戰爭的記憶依然能夠深切地激發俄羅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對西方的仇視。在2006年，俄羅斯國家榮譽中心（Centre of National Glory of Russia）組織了一次以克里米亞戰爭為主題的會議，這次會議獲得了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的總統辦公廳（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教育部和國防部的支持。會后的一份新聞稿發布了這次會議的結論：克里米亞戰爭不應被視為俄羅斯的失敗，而應看作道義與信仰的勝利，是一個國家在一場正義戰爭中付出的犧牲；俄羅斯人應該將榮譽獻給尼古拉一世，這位常被自由派知識分子嘲諷的沙皇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不惜挺身而出與西方抗爭。[[32]](#_32_Hui_Yi_Lun_Wen_Ke_Zai_Wang_S)在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尼古拉一世這位把俄羅斯引向一場與全世界對抗的戰爭的沙皇，名譽已得到恢復。今天，在普京的命令下，尼古拉一世的肖像被懸掛在克里姆林宮總統辦公室前庭的墻上。

克里米亞戰爭結束時，共有二十五萬俄羅斯人被掩埋在塞瓦斯托波爾周圍不同地點的萬人坑里，在因克爾曼、阿爾馬、喬爾納亞谷地、巴拉克拉瓦和塞瓦斯托波爾等戰場，到處都有被掩埋的無名戰士的尸體。2006年8月，十四名弗拉基米爾團和卡贊團的步兵遺體被發現，他們在阿爾馬戰役中陣亡，就被埋在離他們倒下身亡處不遠的地方，在尸骨邊還找到了他們的背包、水壺、十字架和手榴彈。一場隆重的軍事葬禮在巴赫奇薩賴附近的阿爾馬博物館舉行，這些士兵被重新安葬，烏克蘭和俄羅斯兩國的官員都參加了葬禮，俄羅斯還有計劃在這一地點修建一座祈禱堂以致紀念。

[\*](#_139) 后來發現鑄造維多利亞十字勛章的金屬其實來自中國古炮。（J. Glanfield, Bravest of the Brave: The Story of the Victoria Cross ［London, 2005］）——原注

[†](#_140) 這個角色的名字應該是雙關語，slogger指匍行獸。——譯注

[‡](#_141) 英國舊時貨幣，1幾尼=21先令。——譯注

[§](#SS_12) 與1839年英國駐巴勒斯坦和敘利亞領事同名同姓。——譯注

[¶](#P_12) 十二月黨人起義發生在亞歷山大一世去世時。——譯注

[\*\*](#_142) 魯緬采夫圖書館和博物館（Rumiantsev Library and Museum）興建更早，于1862年在莫斯科開館，但它不是一座由公眾出資興建的博物館，而是由一位貴族捐給公眾的。——原注

[††](#_143) 即在尼古拉一世時期建立的宣揚東正教、世襲制和民族性三位一體的官方政策。——譯注

[‡‡](#_144) 當時在中國上映時片名為《忠魂鵑血離恨天》。——譯注

[§§](#SSSS_10) 本書原著于2010年出版。——譯注

注釋

[[1]](#_1_13)RA VIC/MAIN/QVJ/1856, 11 and 13 Mar.

[[2]](#_2_13)T. Margrave, ‘Numbers & Losses in the Crimea: An Introduction. Part Three: Other Nations’, War Correspondent, 21/3 (2003), pp. 18–22.

[[3]](#_3_13)R. Burns, John Bell: The Sculptor’s Life and Works (Kirstead, 1999), pp. 54–5.

[[4]](#_4_13)T. Pakenham, The Boer War (London, 1979), p. 201.

[[5]](#_5_13)N. Hawthorne, The English Notebooks, 1853–1856 (Columbus, Oh.,1997), p. 149.

[[6]](#_6_13)‘Florence Nightingale’, Punch, 29 (1855), p. 225.

[[7]](#_7_13)S.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2009), p. 68; J. Bratton, ‘Theatre of War: The Crimea on the London Stage 1854–1855’, in D. Brady, L. James and B. Sharatt (eds.), Performance and Politics in Popular Drama: Aspects of Popular Entertainment in Theatre, Film and Television 1800–1976 (Cambridge, 1980), p. 134.

[[8]](#_8_12)M. Bostridge, Florence Nightingale: The Woman and Her Legend (London, 2008), pp. 523–4, 528; M. Poovey, ‘A Housewifely Woma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lorence Nightingale’, in id., Uneven Developments: 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Victorian Fiction (London, 1989), pp. 164–98.

[[9]](#_9_12)W. Knollys, The Victoria Cross in the Crimea (London, 1877), p. 3.

[[10]](#_10_13)S. Beeton, Our Soldiers and the Victoria Cross: A General Account of the Regiments and Men of the British Army: And Stories of the Brave Deeds which Won the Prize ‘For Valour’ (London, n.d.), p. vi.

[[11]](#_11_12)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p. 70.

[[12]](#_12_12)T. Hughes, Tom Brown’s Schooldays (London, n.d.), pp. 278–80.

[[13]](#_13_12)T. Hughes, Tom Brown at Oxford (London, 1868), p. 169.

[[14]](#_14_12)O. Anderson, ‘The Growth of Christian Militarism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6/338 (1971), pp. 46–72; K. Hendrickson, Making Saints: Religion and the Public Image of the British Army, 1809–1885 (Cranbury, NJ, 1998), pp. 9–15; M. Snape, The Redcoat and Religion: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the British Soldier from the Age of Marlborough to the Eve of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2005), pp. 90–1, 98.

[[15]](#_15_12)Memorials of Captain Hedley Vicars, Ninety-Seventh Regiment (London, 1856), pp. x, 216–7.

[[16]](#_16_13)引用于 Markovits, The Crimean War, p. 92.

[[17]](#_17_12)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p. 80–6.

[[18]](#_18_13)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p. 125–6.

[[19]](#_19_13)M. Lalumia,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pp. 136–44; P. Usherwood and J. Spencer-Smith, Lady Butler, Battle Artist, 1846–1933 (London, 1987), pp. 29–31.

[[20]](#_20_12)Mrs H. Sandford, The Girls’ Reading Book (London, 1875), p. 183.

[[21]](#_21_12)參見 R. Basturk, Bilim ve Ahlak (Istanbul, 2009).

[[22]](#_22_12)Genelkurmay Askeri Tarih ve Stratejik Etüt Baskanlıgı, Selçuklular Döneminde Anadoluya Yapılan Akınlar – 1799–1802 Osmanlı-Fransız Harbinde Akka Kalesi Savunması – 1853–1856 Osmanlı-Rus Kırım Harbi Kafkas Cephesi (Ankara, 1981), quoted in C. Badem,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pp. 20–21 (translation altered for clarity).

[[23]](#_23_13)A. Khrushchev,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pp. 159–60.

[[24]](#_24_13)L. Tolstoy,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pp. 56–7.

[[25]](#_25_12)N. Dubrovin, 349-dnevnaia zashchita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2005), p. 15.

[[26]](#_26_12)A. Apukhtin, Sochineniia, 2 vols. (St Petersburg, 1895), vol. 2, p. iv. Translation by Luis Sundkvist and the author.

[[27]](#_27_12)M. Kozelsky,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pp. 130–9; R. Wortman, Scenarios of Power: Myth and Ceremony in Russian Monarchy, vol. 2: From Alexander II to the Abdication of Nicholas II (Princeton, 2000), p. 25; O. Maiorova, ‘Searching for a New Language of Self: The Symbolism of Russian National Belonging during and after the Crimean War’, Ab Imperio, 4 (2006), p. 199.

[[28]](#_28_12)RGVIA, f. 481, op. 1, d. 27, l. 116; M. Bogdanovich (ed.), Istoricheskii ocherk deiatel’nosti voennago upravlennia v Rossii v pervoe dvatsatipiatiletie blagopoluchnago tsarstvoivaniia Gosudaria Imperatora Aleksandra Nikolaevicha (1855–1880 gg.), 6 vols. (St Petersburg, 1879–1881), vol. 1, p. 172.

[[29]](#_29_12)S. Plokhy, ‘The City of Glory: Sevastopol in Russian Historical Myth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3 (July 2000), p. 377.

[[30]](#_30_12)S. Davies, ‘Soviet Cinema and the Early Cold War: Pudovkin’s Admiral Nakhimov in Context’, Cold War History, 4/1 (Oct. 2003), pp. 49–70.

[[31]](#_31_11)引用于 Plokhy, ‘The City of Glory’, p. 382.

[[32]](#_32_12)會議論文可在網上閱讀：http://www.cnsr.ru/projects.php?id=10.

# 縮略語說明

AN：法國國家檔案館，巴黎（Archives nationales, Paris）

BLMD：大英博物館手稿部，倫敦（British Library Manuscripts Division, London）

BLO：博德利圖書館特別藏品，牛津（Bodleian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Oxford）

BOA：巴什巴坎勒克奧斯曼檔案館，伊斯坦布爾（Basbakanlik Osmanlik Archive, Istanbul）

FO：英國外交部國家檔案館，倫敦（National Archive, London, Foreign Office）

GARF：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莫斯科（State Archive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oscow）

IRL：俄羅斯科學院俄羅斯文學研究所，圣彼得堡（Institute of Russian Literatur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St Petersburg）

NAM：英國陸軍博物館，倫敦（National Army Museum, London）

RA：英國皇家檔案館，溫莎（Royal Archives, Windsor）

RGADA：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古代歷史部，莫斯科（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Ancient Acts, Moscow）

RGAVMF：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海軍艦隊部，圣彼得堡（Russian State Archive of the Military Naval Fleet, St Petersburg）

RGB：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手稿部，圣彼得堡（Russian State Library, Manuscripts Division, St Petersburg）

RGIA：俄羅斯國家歷史檔案館，圣彼得堡（Russian State Historical Archive, St Petersburg）

RGVIA：俄羅斯國家軍事歷史檔案館，莫斯科（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y Archive, Moscow）

SHD：法國國防部歷史服務中心，文森城堡（Service historique de la Defense, Vincennes）

WO：英國國家檔案館陸軍部記錄，倫敦（National Archive, London, War Office）

# 致謝

為撰寫此書而做的研究工作歷經數年，其間有幸獲得了眾多人士的無私幫助。

在研究的早期，海倫·拉帕波特（Helen Rappaport）幫助我從無窮無盡的圖書、已出版的回憶錄以及參加過克里米亞戰爭的人寫下的日記和信件中篩選出一份可行的參考書目。她還從這場戰爭的社會歷史角度為我提供了寶貴的建議，并且與我分享她在撰寫《淑女無用：克里米亞戰爭中不為人知的女性故事》（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一書過程中所收集的資料。

我衷心感謝英國陸軍博物館（National Army Museum）的阿拉斯泰爾·馬西（Alastair Massie），他的著作《英國陸軍博物館館書之克里米亞戰爭：不為人知的故事》（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與《孤注一擲：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中的英國軍隊》（A Most Desperate Undertaking: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Crimea, 1854–56）激發了我寫作此書的靈感。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女王陛下同意我使用皇家檔案館的材料，對此我感激不盡。同時我也希望感謝索菲·戈登（Sophie Gordon）女士就使用溫莎皇家藏品中的圖片問題為我提供的幫助。在位于伊斯坦布爾的巴什巴坎勒克奧斯曼檔案館（Basbakanlik Osmanlik Archive），我得到了穆拉特·西維洛格魯（Murat Siviloglu）和梅勒克·馬克蘇多格魯（Melek Maksudoglu）的幫助。在位于莫斯科的俄羅斯國家軍事歷史檔案館（Russian State Military History Archive），我獲得了路易莎·卡比布琳娜（Luisa Khabibulina）的幫助。

很多人為本書草稿的全文或部分章節提供了意見，我對各位的幫助非常感激：諾曼·斯通（Norman Stone）、肖恩·布雷迪（Sean Brady）、道格拉斯·奧斯汀（Douglas Austin）、托尼·馬格雷夫（Tony Margrave）、邁克·欣頓（Mike Hinton）、邁爾斯·泰勒（Miles Taylor）、多米尼克·列文（Dominic Lieven） 和馬克·梅佐維（Mark Mazower）。我要特別感謝道格拉斯·奧斯汀和托尼·馬格雷夫, 你們簡直就是軍事問題活辭典，豐富的知識讓我受益匪淺。我也要感謝馬拉·科澤爾斯基（Mara Kozelsky）允許我閱讀她關于克里米亞戰爭的一本尚未完成的書稿，感謝梅汀·孔特（Metin Kunt）和奧納·烏諾（Onur Önul）就土耳其問題所提供的幫助，感謝埃德蒙·赫齊格（Edmund Herzig）就美國問題所提供的幫助，感謝露西·里亞爾（Lucy Riall）就意大利問題所提出的建議，感謝喬安娜·伯克（Joanna Bourke）在軍事心理學方面的見解，感謝安東尼·比弗（Antony Beevor）就歐洲軍隊輕騎兵問題所提供的幫助，感謝羅斯·貝爾森（Ross Belson）就悉尼·赫伯特辭職一事所提供的背景知識，感謝基斯·史密斯（Keith Smith）慷慨贈予我詹姆斯·羅伯遜名為《過去的斯庫臺和現代的于斯屈達爾》（“Old Scutari and Modern Üsküdar”）的經典照片，感謝休·斯莫爾（Hugh Small）所著的《克里米亞戰爭：維多利亞女王與俄國沙皇間的一仗》（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這本書改變了我對很多問題的看法。

一如既往，我感謝家人，感謝我的妻子斯蒂芬妮（Stephanie）與我們的女兒莉迪婭（Lydia）和艾麗斯（Alice）。雖然女兒們對我撰寫一本有關戰爭的書將信將疑，卻也跟我一起沉湎其中。感謝我的經紀人德博拉·羅杰斯（Deborah Rogers）以及她的團隊，包括羅杰斯（Rogers）、科爾里奇（Coleridge）和懷特（White）, 特別是露絲·麥金托什（Ruth McIntosh），她向我解釋了有關著書收入增值稅的種種細節，還有駐紐約的梅拉妮·杰克遜（Melanie Jackson）。我感謝塞西莉亞·麥凱（Cecilia Mackay）關于插圖的意見，感謝伊麗莎白·斯特拉特福德（Elizabeth Stratford）的校對工作，感謝艾倫·吉利蘭（Alan Gilliland）繪制的地圖，當然我還要特別感謝兩位出色的編輯：企鵝出版社的西蒙·溫德爾（Simon Winder）和大都會出版社的薩拉·伯沙特（Sara Bershtel）。

# 參考文獻

Aksan, V., Ottoman Wars 1700–1870: An Empire Besieged (London, 2007).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Franzöische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3 vols. (Munich, 1999–2003).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Öterreichische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3 vols. (Munich, 1979–1980).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Preussische Akten zur Geschichte des Krimkriegs, 2 vols. (Munich, 1990–1991).

Alabin, P., Chetyre voiny: Pokhodnye zapiski v voinu 1853, 1854, 1855 i 1856 godov, 2 vols. (Viatka, 1861).

Alberti, M., Per la storia dell’alleanza e della campagna di Crimea, 1853–1856: Lettere e documenti (Turin, 1910).

Anderson, M., The Eastern Question (London, 1966).

Anderson, O., A Liberal State at War: Englis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during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7).

—— ‘The Growth of Christian Militarism in Mid-Victorian Britain’,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86/338 (1971), pp. 46–72.

Andriianov, A., Inkermanskii boi i oborona Sevastopolia (nabroski uchastnika) (St Petersburg, 1903).

Anon.．The Englishwoman in Russia: Impressions of the Society and Manners of the Russians at Home (London, 1855).

Ascherson, N., Black Sea (London, 1995).

Baddeley, J., The Russian Conquest of the Caucasus (London, 1908).

Badem, C., ‘The Ottomans and the Crimean War (1853–1856)’, Ph.D. diss. (Sabanci University, 2007).

Bailey, F., British Policy and the Turkish Reform Movement, 1826–1853 (London, 1942).

Bapst, E., Les Origines de la Guerre en Crimée: La France et la Russie de 1848 à 1851 (Paris, 1912).

Baudens, J., La Guerre de Crimée: Les campements, les abris, les ambulances,les hôitaux, etc. (Paris, 1858).

Baumgart, W., The Peace of Paris 1856: Studies in War, Diplomacy and Peacemaking (Oxford, 1981).

Bayley, C., Mercenaries for the Crimean: The German, Swiss, and Italian Legions in British Service 1854–1856 (Montreal, 1977).

Bazancourt, Baron de, The Crimean Expedition, to the Capture of Sebastopol, 2 vols. (London, 1856).

Berg, M., Desiat ’ dnei v Sevastopole (Moscow, 1855).

Bestuzhev, I., Krymskaia voina 1853–1856 (Moscow, 1956).

Bitis, A., Russia and the Eastern Question: Army,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815–1833 (Oxford, 2006).

Bogdanovich, M.,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4 vols. (St Petersburg, 1876).

Bolsover, G., ‘Nicholas I and the Partition of Turkey’, Slavonic Review, 27 (1948), pp. 115–145.

Bonham-Carter, V. (ed.), Surgeon in the Crimea: The Experiences of George Lawson Recorded in Letters to His Family (London, 1968).

Boniface, E., Count de Castellane, Campagnes de Crimée, d’Italie,d’Afrique, de Chine et de Syrie, 1849–1862 (Paris, 1898).

Bostridge, M., Florence Nightingale: The Woman and Her Legend (London, 2008).

Bresler, F., Napoleon III: A Life (London, 1999).

Brown, D., Palmerston and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1846–55 (Manchester 2002).

Buzzard, T., With the Turkish Army in the Crimea and Asia Minor (London, 1915).

Cadot, M., La Russie dans la vie intellectuelle française, 1839–1856 (Paris, 1967).

Calthorpe, S., Letters from Headquarters; or the Realities of the War in the Crimea by an Officer of the Staff (London, 1858).

Case, L., French Opinion on War and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Empire (Philadelphia, 1954).

Cavour, C., Il carteggio Cavour-Nigra dal 1858 al 1861: A cura della R. Commissione Editrice, 4 vols. (Bologna, 1926).

Charles-Roux, F., Alexandre II, Gortchakoff et Napoléon III (Paris, 1913).

Cler, J., Reminiscences of an Officer of Zouaves (New York, 1860).

Clifford, H., Letters and Sketches from the Crimea (London, 1956).

Cooke, B., The Grand Crimean Central Railway (Knutsford, 1990).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Latin and Greek Churches in Turkey, 2 vols. (London, 1854–1856).

Crimée 1854–1856, Exhibition catalogue, Musée de l’Armée (Paris, 1994).

Cullet, M. O., Un régiment de ligne pendant la guerre d’orient: Notes et souvenirs d’un officier d’infanterie 1854–1855–1856 (Lyon, 1894).

Cunningham, A., Eastern Questio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ollected Essays, 2 vols. (London, 1993).

Curtiss, J., The Russian Army under Nicholas I, 1825–1855 (Durham, NC, 1965).

—— Russia’s Crimean War (Durham, NC, 1979).

Damas, A. de, Souvenirs religieux et militaires de la Crimée (Paris, 1857).

Dante, F., I cattolici e la guerra di Crimea (Rome, 2005).

David, S., The Homicidal Earl: The Life of Lord Cardigan (London, 1997).

—— The Indian Mutiny (London, 2002).

Davison, R. H., ‘Turkish Attitudes Concerning Christian–Muslim Equality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9 (1953–1954), pp. 844–864.

——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1856–1876 (Princeton, 1963).

—— Essays in Ottoman and Turkish History, 1774–1923: The Impact of the West (Austin, Tex., 1990).

Doré, G., Histoire pittoresque, dramatique et caricaturale de la Sainte Russie (Paris, 1854).

Dubrovin, N., Istoriia krymskoi voiny i oborony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900).

Egerton, R., Death or Glory: The Legac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0).

Ershov, E., Sevastopol ’skie vospominaniia artilleriiskogo ofitsera v semi tetradakh (St Petersburg, 1858).

Fisher, A.,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the Crimea, 1772–1783 (Cambridge, 1970).

—— The Crimean Tatars (Stanford, Calif., 1978).

——‘Emigration of Muslims from the Russian Empire in the Years after the Crimean War’, Jahrbücher für Geschichte Osteuropas, 35/3 (1987), pp. 356–371.

Florescu, R., The Struggle against Russia in the Romanian Principalities 1821–1854 (Monachii, 1962).

Gammer, M., Muslim Resistance to the Tsar: Shamil and the Conquest of Chechnya and Dagestan (London, 1994).

Gershel’man, S., Nravstvennyi element pod Sevastopolem (St Petersburg, 1897).

Giubbenet, Kh., Ocherk meditsinskoi i gospital ’noi chasti russkih voisk v Krymu v 1854–1856 gg. (St Petersburg, 1870).

Gleason, J., The Genesis of Russophobia in Great Britain (Cambridge, Mass., 1950).

Goldfrank, D.,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95).

—— ‘The Holy Sepulcher and the Origin of the Crimean War’, in E. Lohr and M. Poe (eds.), The Military and Society in Russia: 1450–1917 (Leiden, 2002), pp. 491–506.

Gondicas, D., and Issawi, C. (eds.), Ottoman Greeks in the Age of Nationalism: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1999).

Gooch, B., The New Bonapartist Generals in the Crimean War (The Hague, 1959).

Gouttman, A.,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3–1856 (Paris, 1995).

Guerrin, L., Histoire de la dernière guerre de Russie (1853–1856), 2 vols. (Paris, 1858).

Harris, S., British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1).

Henderson, G., Crimean War Diplomacy and Other Historical Essays (Glasgow, 1947).

Herbé, J., Françis et russes en Crimée: Lettres d’un officier françis à sa famille pendant la campagne d’Orient (Paris, 1892).

Hibbert, C., The Destruction of Lord Raglan: A Tragedy of the Crimean War, 1854–1855 (London, 1961).

Hodasevich, R., A Voice from within the Walls of Sebastopol: 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the Crimea and the Events of the Siege (London, 1856).

Hopwood, D., The Russian Presence in Palestine and Syria, 1843–1914: Church and Politics in the Near East (Oxford, 1969).

Ingle, H., Nesselrode and the Russian Rapprochement with Britain, 1836–1844 (Berkeley, 1976).

Jaeger, P., Le mura di Sebastopoli: Gli italiani in Crimea 1855–1856 (Milan, 1991).

Jewsbury, G., The Russian Annexation of Bessarabia: 1774–1828. A Study of Imperial Expansion (New York, 1976).

Jouve, E., Guerre d’Orient: Voyage à la suite des armées alliées en Turquie, en Valachie et en Crimée (Paris, 1855).

Kagan, F.,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Nicholas I: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ussian Army (London, 1999).

Keller, U., The Ultimate Spectacle: A Visual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1).

Khrushchev, A., Istoriia oborony Sevastopolia (St Petersburg, 1889).

King, C., The Black Sea: A History (Oxford, 2004).

—— The Ghost of Freedom: A History of the Caucasus (Oxford, 2008).

Kinglake, A., The Invasion of the Crimea: Its Origin and an Account of Its Progress down to the Death of Lord Raglan, 8 vols. (London, 1863).

Kovalevskii, E., Voina s Turtsiei i razryv s zapadnymi derzhavami v 1853–1854 (St Petersburg, 1871).

Kozelsky, M., Christianizing Crimea: Shaping Sacred Space in the Russian Empire and Beyond (De Kalb, Ill., 2010).

Krupskaia, A., Vospominaniia krymskoi voiny sestry krestovozdvizhenskoi obshchiny (St Petersburg, 1861).

Kukiel, M., Czartoryski and European Unity 1770–1861 (Princeton, 1955).

Lalumia, M., Realism and Politics in Victorian Art of the Crimean War (Epping, 1984).

Lambert, A., Battleships in Transition: The Creation of the Steam Battlefleet, 1815–1860 (Annapolis, Md., 1984).

—— The Crimean Wa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1853–56 (Manchester, 1990).

—— and Badsey, S. (eds.), The War Correspondents: The Crimean War (Stroud, 1994).

Lane-Poole, S., The Life of the Right Honourable Stratford Canning, 2 vols. (London, 1888).

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 A Selection from Her Majesty’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Years 1837 and 1861, 3 vols. (London, 1907–1908).

Lettres du maréchal Bosquet à sa mère 1829–1858, 4 vols. (Pau, 1877–1879).

Lettres du maréchal Bosquet à ses amis, 1837–1860, 2 vols. (Pau, 1879).

Lettres d’un soldat à sa mère de 1849 à 1870: Afrique, Crimée, Italie, Mexique (Montbéliard, 1910).

Levin, M., ‘Krymskaia voina i russkoe obshchestvo’, in id., Ocherki po istorii russkoi obshchestvennoi mysli, vtoraia polovina XIX veka (Leningrad, 1974), pp. 293–304.

Loizillon, H., La Campagne de Crimée: Lettres écrites de Crimée par le capitaine d’état-major Henri Loizillon à sa famille (Paris, 1895).

Luguez, F., Crimée-Italie 1854–1859: Extraits de la correspondence d’un officier avec sa famille (Nancy, 1895).

McCarthy, J., Death and Exile: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Ottoman Muslims 1821–1922 (Princeton, 1995).

MacKenzie, D., ‘Russia’s Balkan Policies under Alexander II, 1855–1881’, in H. Ragsdale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pp. 219–246.

McNally, R., ‘The Origins of Russophobia in France: 1812–1830’, American Slav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17/2 (Apr. 1958), pp. 179–183.

Markevich, A., Tavricheskaia guberniia vo vremia krymskoi voiny: Poarkhivnym materialam (Simferopol, 1905).

Markovits, S., The Crimean War in the British Imagination (Cambridge, 2009).

Marlin, R., L’Opinion franc-comtoise devant la guerre de Crimée, Annales Littéraires de l’Université de Besançon, vol. 17 (Paris, 1957).

Martin, K., The Triumph of Lord Palmerston: A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before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3).

Marx, K., The Eastern Question: A Reprint of Letters Written 1853–1856 Dealing with the Events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1969).

Masquelez, M., Journal d’un officier de zouaves (Paris, 1858).

Massie, A., A Most Desperate Undertaking: The British Army in the Crimea, 1854–1856 (London, 2003).

—— The National Army Museum Book of the Crimean War: The Untold Stories (London, 2004).

Mémoires du comte Horace de Viel-Castel sur le règne de Napoléon III, 1851–1864, 2 vols. (Paris, 1979).

Mémoires du duc De Persigny (Paris, 1896).

Mismer, C., Souvenirs d’un dragon de l’armée de Crimée (Paris, 1887).

Molènes, P. de, Les Commentaires d’un soldat (Paris, 1860).

Moon, D., ‘Russian Peasant Volunteer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rimean War’, Slavic Review, 51/4 (Winter 1992), pp. 691–704.

Mosse, W.,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rimean System, 1855–1871: The Story of the Peace Settlement (London, 1963).

Mrs Duberly’s War: Journal and Letters from the Crimea, ed. C. Kelly (Oxford, 2007).

Niel, A., Siège de Sébastopol: Journal des opérations du génie (Paris, 1858).

Nilojkovic-Djuric, J., Pansla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and in the Balkans, 1830–1880 (Boulder, Colo., 1994).

Noël, D., La Vie de bivouac: Lettres intimes (Paris, 1860).

Noir, L., Souvenirs d’un simple zouave: Campagnes de Crimée et d’Italie (Paris, 1869).

Osmanli Belgelerinde Kirim Savasi (1853–1856) (Ankara, 2006).

Pavlowitch, S., Anglo-Russian Rivalry in Serbia, 1837–39 (Paris, 1961).

Perret, E., Les Français en orient: Récit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89).

Petrovich, M., The Emergence of Russian Panslavism, 1856–1870 (New York, 1956).

Picq, A. du, Battle Studies (Charleston, SC, 2006).

Pirogov, N., Sevastopol ’skie pis’ma i vospominaniia (Moscow, 1950).

Plokhy, S., ‘The City of Glory: Sevastopol in Russian Historical Mytholog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35/3 (July 2000), pp. 369–383.

Ponting, C., The Crimean War: The Truth behind the Myth (London, 2004).

Prousis, T., Russian Society and the Greek Revolution (De Kalb, Ill., 1994).

Rachinskii, A., Pokhodnye pis’ma opolchentsa iz iuzhnoi Bessarabii 1855–1856 (Moscow, 1858).

Ragsdale, H. (ed.), Imperial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ambridge, 1993).

Rakov, V., Moi vospominaniia o Evpatorii v epohu krymskoi voiny 1853–1856 gg. (Evpatoriia, 1904).

Rappaport, H., No Place for Ladies: The Untold Story of Women in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7).

Rebrov, Ia., Pis’ma sevastopol’tsa (Novocherkassk, 1876).

Reid, D., Soldier-Surgeon: The Crimean War Letters of Dr Douglas A. Reid, 1855–1856 (Knoxville, Tenn., 1968).

Reid, J., Crisis of the Ottoman Empire: Prelude to Collapse 1839–1878 (Stuttgart, 2000).

Riasanovsky, N.,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Rich, N., Why the Crimean War? (New York, 1985).

Royle, T., Crimea: The Great Crimean War 1854–1856 (London, 1999).

Russell, W.,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the Crimea (London, 1858).

Saab, A., The Origins of the Crimean Alliance (Charlottesville, Va., 1977).

—— Reluctant Icon: Gladstone, Bulgaria, and the Working Classes, 1856–1878 (Cambridge, Mass., 1991).

Sandwith, H., A Narrative of the Siege of Kars (London, 1856).

Schiemann, T., Geschichte Russlands unter Kaiser Nikolaus I, 4 vols. (Berlin, 1904–1919).

Schroeder, P., Austria, Great Britain and the Crimean Wa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Concert (Ithaca, NY, 1972).

Seacole, M.,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Mrs Seacole in Many Lands (London, 2005).

Seaton, A., The Crimean War: A Russian Chronicle (London, 1977).

Shepherd, J., The Crimean Doctors: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Crimean War, 2 vols. (Liverpool, 1991).

Slade, A., Turkey and the Crimean War: A Narrative of Historical Events (London, 1867).

Small, H., Florence Nightingale, Avenging Angel (London, 1998).

—— The Crimean War: Queen Victoria’s War with the Russian Tsars (Stroud, 2007).

Southgate, D., The Most English Minister: The Policies and Politics of Palmerston (New York, 1966).

Soyer, A., Soyer’s Culinary Campaign (London, 1857).

Spilsbury, J., The Thin Red Line: An Eyewitness History of the Crimean War (London, 2005).

Stockmar, E., Denkwürdigkeiten aus den Papieren des Freiherrn Christian Friedrich V. Stockmar (Brunswick, 1872).

Stolypin, D., Iz lichnyh vospominanii o krymskoi voine i ozemledel ’cheskih poryadkakh (Moscow, 1874).

Strachan, H., From Waterloo to Balaclava: Tactics, Technology and the British Army (London, 1985).

Sweetman, J., War and Administra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rimean War for the British Army (London, 1984).

Tarle, E., Krymskaia voina, 2 vols. (Moscow, 1944).

Taylor, A. J. P.,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 (Oxford, 1955).

Thoumas, M., Mes souvenirs de Crimée 1854–1856 (Paris, 1892).

Thouvenal, L., Nicolas Ier et Napoléon III: Les préliminaires de la guerre de Crimée 1852–1854 (Paris, 1891).

Thurston, G., ‘The Italian War of 1859 and the Reorienta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Historical Journal, 20/1 (Mar. 1977), pp. 121–144.

Tiutcheva, A., Pri dvore dvukh imperatov: Vospominaniia, dnevnik, 1853–1882 (Moscow, 1928–1929).

Tolstoy, L., The Sebastopol Sketches, trans. D. McDuff (London, 1986).

Tolstoy’s Diaries,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85).

Tolstoy’s Letters, ed. and trans. R. F. Christian, 2 vols. (London, 1978).

Totleben, E., Opisanie oborony g. Sevastopolia, 3 vols. (St Petersburg, 1863–1878).

Ubicini, A., Letters on Turkey, trans. Lady Easthope, 2 vols. (London, 1856).

Urquhart, D., England and Russia (London, 1835).

Vanson, E., Crimée, Italie, Mexique: Lettres de campagnes 1854–1867 (Paris, 1905).

A Visit to Sebastopol a Week after Its Fall: By an Officer of the Anglo-Turkish Contingent (London, 1856).

Vrochenskii, M., Sevastopol ’skii razgrom: Vospominaniia uchastnika slavnoi oborony Sevastopolia (Kiev, 1893).

Vyskochkov, L., Imperator Nikolai I: Chelovek i gosudar ’ (St Petersburg, 2001).

Warner, P., The Crimean War: A Reappraisal (Ware, 2001).

Wirtschafter, E., From Serf to Russian Soldier (Princeton, 1990).

Zaionchkovskii, A., Vostochnaia voina 1853–1856, 3 vols. (St Petersburg, 2002).

Za mnogo let: Zapiski (vospominaniia) neizvestnogo 1844–1874 gg. (St Petersburg, 1897).

# 譯后記

一

2016年6月，一座青銅雕塑在倫敦的圣托馬斯醫院（St Thomas’ Hospital）揭幕。這座醫院位于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南岸、威斯敏斯特橋（Westminster Bridge）邊，雕塑為瑪麗·西科爾的全身站像，高達三米，矗立在醫院大樓外河畔的步行道邊，河對面就是議會大廈和大本鐘。

為瑪麗·西科爾樹立雕像一事，在英國引起了一番爭議，特別是給她樹立雕像的理由：她是“現代護士的先驅”，讓持相反意見的人士組成了極端對立的兩大陣營。在爭議中，這座雕像所安放的位置也被賦予了特別的含義，因為圣托馬斯醫院正是由弗洛倫絲·南丁格爾創立的世界上第一所現代護士及助產士學校所在地，而南丁格爾本人則長期被認為是現代護理事業的創始人。對于那些持反對意見的人來說，不僅瑪麗·西科爾本身配不上“現代護士先驅”這一稱號，而且在圣托馬斯醫院為她樹立雕像，無疑有挑戰南丁格爾的地位并取而代之的意圖。

把瑪麗·西科爾和南丁格爾聯系在一起的，是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克里米亞戰爭。戰爭爆發后，南丁格爾通過《泰晤士報》的報道了解到英國傷兵在后方醫院處境惡劣，主動請纓并獲得當時戰爭大臣手下要員悉尼·赫伯特授權前往君士坦丁堡，名義上是帶隊管理克里米亞地區英軍醫院內的護士，但實際上是監督改善戰區英軍醫院的運作管理。當時英軍對傷病員的救治極為忽視，位于君士坦丁堡郊外斯庫臺地區的軍隊醫院管理混亂，與臨近的法軍醫院形成鮮明對比，這一情況被《泰晤士報》揭露后，英軍當局遭到國內各方指責。南丁格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場，她作為“提燈女士”夜探傷員的神圣形象已成為其“現代護士先驅”神話的一部分，然而當代許多研究者認為她的貢獻并非在救護傷員本身，而是在系統化改善醫院管理上，所以更準確地說，她是一個以統計數字科學化管理醫院的先驅。

瑪麗·西科爾比南丁格爾稍晚登場，她是出生在牙買加的混血民族克里奧人后代，恰好在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來到倫敦，她有一些憑草藥治病的經驗，曾考慮過參加南丁格爾招募的志愿者護士隊伍，但并未正式遞交申請，而是選擇與人合伙自費前往克里米亞，在英法聯軍陣地后方的村莊開設了一座餐館兼俱樂部性質的商業場所。雖然她的主要客戶是英軍軍官，但是根據她的自傳和其他材料，她并不排斥英軍士兵，也為他們提供過免費的飲食和草藥治療服務，還曾經在戰斗結束后前往戰場照顧傷員。但是她究竟提供了什么樣的救治護理服務，有多大規模，算不算得上現代意義的護理，并沒有詳細客觀的記錄可供判斷。這一點正是反對將瑪麗·西科爾稱為“現代護士先驅”并在圣托馬斯醫院樹立雕像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

南丁格爾和瑪麗·西格爾可以說是克里米亞戰爭留下的眾多遺產之二，但這場戰爭本身似乎已被人遺忘，正如《克里米亞戰爭》一書作者奧蘭多·費吉斯所說，也許在公眾記憶中，這場發生在19世紀中葉的戰爭，早已被兩場世界大戰所掩蓋了。然而，克里米亞戰爭不管是對英國社會和歐洲格局，或是對俄羅斯和土耳其的現代化進程，都有著深遠的影響，甚至在當今發生在歐亞地區的許多沖突中，都可以看到這場一百六十多年前戰爭的影子。

2014年，俄羅斯“志愿者”武裝入侵克里米亞，驅逐了當地的烏克蘭政府和軍事人員，隨后舉行的克里米亞“全民公決”同意將“克里米亞共和國”并入俄羅斯，由此完成了俄羅斯對克里米亞地區的并吞，雖然至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并未予以承認。對于這場沖突，外界對俄羅斯動機的理解普遍集中在克里米亞半島的戰略位置以及俄羅斯總統普京對內對外宣示力量等因素上。這些看法都有道理，克里米亞確實是俄羅斯控制黑海、出師地中海的基地，黑海艦隊就一直駐扎在克里米亞半島西南角的塞瓦斯托波爾。在前蘇聯解體之后，克里米亞歸烏克蘭所有，但是黑海艦隊繼續以租借方式使用這個港口。當烏克蘭漸漸向歐盟靠攏，與俄羅斯的對抗公開化，甚至雙方陷入武裝沖突后，不管從戰略、民心士氣還是向西方示威方面來看，俄羅斯都有奪回克里米亞的強烈動機。

然而，對照發生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克里米亞戰爭，卻顯示出其中還有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費吉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指出，許多歷史學家在研究這場戰爭時，集中關注地緣政治、帝國紛爭、民族主義興起等，但是往往忽略了沖突過程中宗教因素所起的作用。在這場戰爭中，天主教國家法國和奧地利，聯合新教國家英國，與信奉伊斯蘭教的奧斯曼帝國攜手，共同對抗東正教國家俄羅斯，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俄羅斯一直以東正教領袖自居，認為上天賦予了自己神圣的宗教使命，要把同樣信奉東正教的斯拉夫人從奧斯曼帝國手中“解放”出來，被其視為上天賦予的神圣宗教使命。但在歐洲列強看來，雖然同屬基督教家庭，一個野蠻、不開化、具有擴張性的俄羅斯所帶來的威脅，甚至超過了已是奄奄一息的奧斯曼帝國。

2014年的克里米亞沖突，當然不是19世紀克里米亞戰爭的重演，但是其中的一些關鍵因素，卻還在發揮著作用。在歐洲和美國看來，21世紀的俄羅斯依然是一個具有擴張性的民族，還未擺脫其“野蠻”和不可理喻的特性，必須對其進行遏制。對于俄羅斯來說，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讓他們覺得被西方列強所背叛，其深深的傷害和敵意，在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蘇聯解體之后，依然存在。雖然東正教已不再擁有無上的權威，但是在列強環伺下重現帝國昔日光輝的前景，對一些俄羅斯人來說依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

克里米亞半島本身，除了其戰略位置外，還與俄羅斯的歷史息息相關。費吉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寫道，對俄羅斯人來說，克里米亞是一塊圣地。根據俄羅斯編年史記載，古代羅斯人的領袖、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就是于公元988年在克里米亞南岸的赫爾松涅索斯、也就是現代的塞瓦斯托波爾城外接受洗禮的，從而帶領基輔羅斯人接受了東正教。塞瓦斯托波爾是克里米亞戰爭的焦點，在經過了長達一年的圍困之后，英法聯軍終于攻陷了這座城市，但是在俄羅斯方面，塞瓦斯托波爾的堅守和失利卻被塑造成不屈不撓的俄羅斯精神的體現，在俄羅斯國家身份認同上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烏克蘭轉向西方，在一些俄羅斯人看來，卻是西方國家再次圖謀奪走塞瓦斯托波爾，而從實現打擊俄羅斯的目的。

所以說，歷史也許不是簡單的重復，但是了解歷史，無疑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今天。《克里米亞戰爭》就是這么一部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歷史、理解今天的作品。

二

相信本書的讀者中，許多人跟本書譯者開卷之初一樣，對克里米亞戰爭這段歷史所知甚少。雖然我們對英國歷史算是比較了解的，但過去并沒有把一些歷史事件或文化傳統和克里米亞戰爭聯系起來，比如南丁格爾創建現代護理職業的事跡，英國人常常提及的“輕騎兵沖鋒”所代表的士兵忠勇、長官無能的文化共識，以及英國與俄羅斯之間長期的猜疑和敵視等。

打開《克里米亞戰爭》一書，吸引我們的首先是作者費吉斯的文筆，在本書序言的短短數頁間，作者就描繪了一番這場戰爭在英國、法國和俄羅斯留下的印跡以及對后世的巨大影響，同時還勾勒出克里米亞戰爭本身的獨特之處：這是最后一場依然遵從“騎士精神”、交戰雙方會在戰斗間隙停火以便各自處理死傷者的大型戰爭；這又是第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現代戰爭，各種新技術例如新型來復槍、電報、蒸汽機船、火車等紛紛投入軍事用途，改變了戰爭格局；對英法兩國來說，這還是第一場官方政策被公眾輿論左右的大戰，在出版自由的英國，第一次出現了戰地記者這一職業。費吉斯的文筆清晰流暢，能將復雜的情況講得簡明生動，書中引用大量參與各方的敘述，大部分來自當事人的回憶錄、書信、記者報道等第一手材料，與作者的敘事編織起來，給予讀者身臨其境之感，卻并未因此影響敘述的流暢。

繼續讀下去，我們發現同樣令人佩服的是作者致力采取的中立立場和對各方史料的尊重。作為一本由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創作的英文作品，書中不免會引用較多的英語史料、英國方面的視點，但是費吉斯非常注重全面與平衡，搜集了大批法國、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方面的文獻，他本人也以這一點為自豪。費吉斯是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Birkbeck College）的歷史學教授、俄羅斯歷史專家，在本書之前，就已出版了幾部有關俄羅斯歷史和俄國革命的作品，包括收入理想國譯叢的《耳語者》和《古拉格之戀》。在本書序言中，他特別提到作為一名作家，沒有其他人比托爾斯泰更能提供俄羅斯人的視角了，其《塞瓦斯托波爾故事》和從前線寄回的家信，既有對戰場實況栩栩如生的描述，又為讀者了解俄羅斯知識分子對這場戰爭的思考打開了一扇窗。

在尊重各方史料的基礎上，費吉斯在分析闡述時局發展、公眾心態、各方動機、決策過程時，盡量做到客觀平衡。按照他的分析，克里米亞戰爭緣起于巴勒斯坦，19世紀時這里是奧斯曼帝國的屬地，但是兩座被基督徒視為圣地的教堂：伯利恒的圣誕教堂和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都是由基督教教士控制的。問題在于教士們分為兩派：由法國支持的拉丁人和由俄羅斯支持的希臘人教士，雙方各以自己為正統，長期為誰是圣地的真正守護者這一問題爭得不可開交，最終結果是讓兩派的后臺卷入了一場直接對抗的大戰。而交戰的每一方在上戰場時，都認為自己是被迫發動一場捍衛信仰的正義之戰，而上帝是在自己一邊。費吉斯把各方世界觀的差別、看問題的局限性，以及自以為是的天賦使命感梳理得非常清楚，對各方行為動機進行剖析、做出指責時亦毫不留情。

從一些細節上就看出作者努力站在一個全面客觀的位置上，讓我們回到前面提到的南丁格爾和西科爾的事跡上。《克里米亞戰爭》中有相當篇幅提到南丁格爾，講述她在招募組織護士前往克里米亞以及改善軍隊醫院的管理和衛生條件上，確實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雖然她推行的護理原則并非她發明的新概念，許多已經在法軍醫院貫徹實行，但是她堅毅執著，手中又掌握資金，能夠在阻力面前依然堅定有效地推動醫院管理改革，不過她的改革成果被夸大了，成了一套脫離事實的神話。而且盡管她做出了很多努力，英軍醫院的死亡率依然急劇上升，原因在于醫院建在一座污水池之上，因下水道滲漏污染了飲用水，而南丁格爾并不了解這一危險，她一直以為感染是由受污染的霧氣造成的。至于西科爾，《克里米亞戰爭》也有提及，但是把她的參與歸于戰爭期間具有冒險精神和創意的商業行為一類，同時還指出她的主要客戶是英軍軍官，所以在改善英軍普通士兵飲食質量上，西科爾和其他商販所做的貢獻，遠遠比不上著名廚師亞歷克西斯·索耶。索耶在克里米亞英軍中推行了建立戰地食堂集中供餐制度，他為軍隊設計的野戰爐子直到20世紀下半葉還在使用。

在費吉斯看來，為戰地救護作出最大貢獻的人士并非來自英法兩國，而是俄羅斯醫生尼古拉·皮羅戈夫。克里米亞戰爭期間，他最早采用了一套戰地手術管理系統，而其他國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跟上。與英法聯軍相比，俄羅斯軍隊遭受的損失更大，醫療條件更為落后，戰地醫院根本無法應付大批傷員，皮羅戈夫為此創建了一個傷員分流系統，最大程度地救治仍有希望救活的傷員，同時積極使用麻醉術，大大提高了外科手術的效率，更為重要的是他采取措施防止手術后感染，對護士的作用也極為重視。在他的領導下，俄軍醫院內傷員存活率遠遠高于英軍和法軍醫院。盡管如此，他的名字在俄羅斯以外卻鮮有人知。

如果你是一個軍事迷，主要是想看戰爭的具體過程的話，《克里米亞戰爭》也不會讓你失望。本書開篇作者就聲明將會花大量篇幅講述這場戰爭的起源、俄羅斯與西方列強在奧斯曼帝國問題上的沖突、英法兩國國內政治和公眾輿論對決策的影響等等，因此要到第五章，戰斗才會真正打響。克里米亞戰爭中有不少著名戰役，在本書中都得以展現：阿爾馬戰役是英法聯軍與俄羅斯軍隊之間的第一場大戰，因為聯軍士兵自發找到了發揮來復槍威力的辦法而改變了作戰方式；在巴拉克拉瓦戰役期間，發生了著名的英軍“輕騎兵沖鋒”和蘇格蘭高地師“一條細紅線”阻擋俄羅斯騎兵沖鋒的故事；在對塞瓦斯托波爾進行了近8個月的圍困后，英法聯軍終于開始強攻城堡，犧牲了大量士兵——那句著名的“雄獅卻被驢子指揮”就是源自此役，而不是普遍認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這些戰役過程相當復雜，而且在過去的一個多世紀中，流行著不少錯誤的說法，例如大部分人對“輕騎兵沖鋒”的理解，是來自英國詩人丁尼生的同名詩歌，盡管這首詩夸大了事實，而且缺乏對前因后果的解釋分析。費吉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試圖做到盡量還原歷史的真實，糾正過去出版物中的錯誤、夸張、片面和孤立的理解，其中對俄羅斯方面文獻的引用，起到了很好的平衡作用。

費吉斯文筆的生動流暢，在寫戰爭場面時充分體現了出來，通過他的描述，讀者首先能夠獲得對戰場全景的清楚認識。對于每一個重要軍事行動，都采用了第三者角度敘事和親歷者回憶交織的做法，令讀者既有身臨其境之感，又能緊隨戰況發展。書中展現的戰事緊張激烈，雙方鏖戰的慘烈程度令人動容。作者還為一些關鍵戰役提供戰場形勢配圖，大大有助于閱讀。對于一些歷史疑團，例如英軍“輕騎兵沖鋒”的責任與后果，作者還特別分析各種說法的可信度，引導讀者做出自己的判斷。

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并非將戰斗當作一個機械的過程來解釋，時刻強調在戰場上出生入死的每一個戰士，不管為哪方而戰，同時也都是兒子、兄弟或父親，他花費許多筆墨描述大戰前夕戰士們的緊張、期待和惶恐以及硝煙過后雙方死傷者面臨的悲慘處境。在他的筆下，克里米亞戰爭的傷亡人數，不再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

《克里米亞戰爭》史料豐富，作者文筆清晰流暢，閱讀本書是一種享受，有機會參與本書的翻譯實為我們的榮幸。作為譯者，我們希望中譯本能夠盡量保留原作的流暢感，對于書中提到的一些歷史人物、名稱或事件，我們在自覺有必要的地方附加了一些簡略的背景資料或解釋，均以譯者注方式出現，希望有助于中文版讀者更好地理解正文。

本書由微信公眾號【書單共享】（ID:DZSGX8）制作分享，  
  
 掃一掃下方二維碼關注我們，免費下載更多優質Kindle電子圖書。   
  
    
  
 你不是一個人在讀書！  
  
 掃碼關注我們，與兩千萬書友一起享受閱讀。   
  
 （本書僅供個人學習之用，請勿用于商業用途。如果閱讀后覺得好，請購買正版書籍！）

